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20

出版社

巴金全集

第二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巴金全集

（第二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3年北京第1版
1993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062-7/Z·55
定价 11.55 元



偕唐弢(右一)、峻青(左一)、罗荪(左二)、靳以(中)
摄于虹口公园鲁迅墓前(一九五七年冬)

《三同志》手迹之一页



偕罗荪(前右)、中岛健藏(前左)摄于沪人民大道
(一九六二年)



偕萧珊摄于沪寓（一九六一年）

目　录

创作回忆录

三 同 志

《三国志》，一九六一年秋作毕，未曾发表出版过。

我写了自己不熟习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王　全

九〇年一月八日

二

杨林爬过了一座山，在交通沟里走了一段路，到了八连连部，同路来的三个同志的背包已经放在洞口炕上了。连部那个面孔有点熟的通讯员满脸含笑地招呼他："你来了！"便伸过手来接他的背包，他连忙把背包放下，红着脸，抱歉地说了一句："我落后了。"通讯员拍了一下杨林的肩头，笑着说："他们也刚到，正在里面跟队长讲话，你快去。"他的眼睛朝洞内黑暗的甬道望了一望。杨林对他笑了笑，说一声："谢谢你，"就埋下头朝里面走了。

上个月杨林来过这里一次，他知道怎样去办公室。他埋着头，一边走，一边用手帕揩额上的汗珠。走不多远，到了可以朝左右两面转弯的地方，他弯进右面，便看见亮光，再走几步，又到了一个小洞口。

高身材的李连长坐在洞里一张小条桌的左面，条桌紧靠着石壁，石壁上开了一个像窗口一样的小洞，亮光就是从那里射进来的。先到的同志们都站在李连长的面前。

杨林立正，大叫一声："报告！"一面向连长敬礼。

李连长刚讲完话，这一声意外的大叫使他抬起头来，他注意地看了看这个小青年，满意地笑了笑，问道：

"你叫杨林吗?"

"是!"杨林大声回答，不转眼地望着连长黑黄黑黄的脸，他的额上仍然在冒汗。

李连长再问一句:"你要做什么工作?"

"报告连长，你叫我做啥子，我就做啥子，"杨林毫不犹豫地回答。

李连长点点头，又问:"那么叫你做通讯员，行吗?"

杨林红着脸，挺起腰，呆了一下才回答一声:"行!"他有一点点失望，可是马上又想：到了连队就好了，以后再想办法罢。

李连长又露出笑容，温和地说："好罢。你就留在队部当通讯员。别的同志都到班里去。你们去罢，他们给你们烧了开水。"

杨林和其他三个同志一齐向李连长敬了礼。他跟在那三个年纪比他大的战士后面走出了小洞。他们在暗中走了几步，听见有人说："同志们来喝水罢。"一个小孩面孔的年轻同志提着一盏用空罐头做的油灯来迎接他们。他们跟着他走进另一个小洞。那个同志把油灯挂在洞口一根木头柱子上。洞里有一个大炕，炕上放了四个搪瓷饭碗，碗里的水还在冒热气。

他们站在炕前端起碗喝水。年轻同志在旁边亲切地说："你们坐下歇歇罢。"

三个同志喝光了水，放下碗。其中一个左脸有一块紫印的同志说："我们不坐了，我们到班里去。"他又对杨林说："杨林，你好好待着罢。有空到班里来玩。"他捏了一下杨林的左

胳膊。杨林笑着答道："我会来看你们。"三个同志一齐向那个年轻同志说："同志，谢谢你，"便转身往外面走。杨林跟在他们的后面。

"我送你们去，"年轻同志说。接着他小声对杨林说："我叫王理明。从上海来的。"

杨林觉得这个人很有趣，也用小声回答："我是个四川乡里人，我叫杨林，入朝才三个多月。"他还想讲下去，却让王理明打岔了。

"以后慢慢讲罢，我也有很多话要告诉你，"王理明忍住笑说道，他觉得自己早就认识这个四川青年了。

众人到了大洞口，三个要到班里去的同志背上自己的背包走出去。王理明和洞口那个通讯员抢着要替他们扛行李，却无法把背包夺到手里。王理明便对那个通讯员说："刘加亮，队长叫我送他们到三排去，你看家。"

刘加亮点头答道："好，你去罢。我同他在家。"他看了杨林一眼。

那个左脸有紫印的同志走出了洞口，还回过头对杨林说："杨林，在队部也是一样，你好好地加油干。有空一定要到班里来找我。"他对杨林鼓舞地笑了笑。

杨林感谢地答道："方永章，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地干。再见！"他站在洞外望着那几个人的背影，他们在交通沟里走着就不见了。他回到洞里看见刘加亮打开了他的背包，正把被子叠好放在炕头，他连忙说："我自己来。"

刘加亮笑道："我来还不是一样。劳动起来还分你我吗？

今天我欢迎你。我们三个人连王理明在内就睡这个炕。"

"我看你今年不到二十罢？我十八岁零七个月。"杨林望着刘加亮说。

刘加亮笑答道："那么我最大，我二十二。王理明二十。你们从上面来的人到这里过不惯罢？"

"哪个说的？"杨林红着脸反问道。他昂起头说："哪个到朝鲜来不想上前沿参加战斗？告诉你，我向我们主任要求过好几次，碰到这个机会，他才让我下来的　你不信，你去问！"他没有提他本来要求到班里当战士的话。

刘加亮高兴地笑道："真有趣，我们三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

杨林觉得这个洞子打得好，环境也不错，他随意看了看四周。他忽然注意到刘加亮左边眉毛上头有一个半截小指头大的伤疤，便指着伤疤惊问道："同志，你挂过花吗？"

"这不算什么，小腿上还有一处。这是几个月前的事情，"刘加亮摇摇头淡淡地说。

杨林的眼睛马上发亮了。他兴奋地说："你打过仗了，你真好！"他拉起刘加亮的一只手央求道："快讲给我听，你怎样参加战斗的！你一定立了功了！"

"三等功，"刘加亮不好意思地答道。

杨林不肯放开刘加亮的手，接连地央求："快讲给我听。"

"立三等功的人多得很，有啥可讲的？"刘加亮答了一句。他望着杨林的红红的圆脸，好像看到一片阳光似的，他喜欢这个新来的同志，就说："你不用急，晚上讲罢，现在还有工

作。”

“那么晚上一定要讲啊，”杨林听见“工作”两个字就不再央求了，只是连说了两句：“晚上一定要讲啊。”

二

晚上郝指导员对杨林讲了些战斗的故事。

郝指导员在团部开过会，回到连队，天快黑尽了。他把杨林叫到面前，问了几句话，对这个小青年简单地谈了谈工作。等到排长们来汇报了情况以后，郝指导员便向杨林介绍了这个连队的几位英雄的事迹。子弹打完抱住敌人跳崖的丁子云烈士的故事，活捉五个俘虏的新战士周玉明的故事、把敌人埋的地雷一连起回来几十个的起雷英雄李方的故事……都讲过了。杨林睁大两只明亮的眼睛，注意地听着郝指导员讲的每一个字。郝指导员对他讲话，调子非常亲切，好像在对他谈家常，谈亲人的事情一样。但是他听得出声音里有感情，有很深的感情，好像这些人还在郝指导员的眼前活动。他听着也激动起来了。他觉得自己的心仿佛跟随这些人在前线跑来跑去。连部通讯员段明的故事使他格外感动。段明有一回跟着李连长（当时还是副连长）参加战斗。部队冲上阵地以后，李连长正在指挥战士消灭敌人的机枪阵地，段明忽然听见哗啦一声，知道敌人的机关枪顶上了子弹，就要发射了，害怕李连长受伤，不加考虑，便把李连长推倒，自己扑到李连长身上，敌人的机关枪扫射过来，段明牺牲了。……

郝指导员讲到这里，忽然伸起左手放在嘴上，五根指头用力把两边脸颊摸了一下，左手托住下巴，眼光起初落在遮窗洞的木板上面，然后移到杨林的脸上。两颗滚圆的漆黑眼瞳好像一对发光的玻璃珠子，停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圆圆的脸上没有什么惊人的特征。这是一个普通的健康的年轻人的面貌。但是他在这张脸上看到了新的、充满生气的东西。他高兴地想：有这样多可爱的小青年！他忍不住微微一笑，说："小鬼你要记住啊！"

杨林吃了一惊，两颗眼珠又动起来，他离开前线回到洞子里面了。他红着脸，看了看郝指导员。郝指导员脸上的喜色同和蔼的眼光鼓舞了他，他挺起腰结结巴巴地说："报告指导员，我保证，我一定记住。我绝不给八连丢脸！"

郝指导员满意地点头说："我相信你。"

杨林仍然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下去："报告指导员，我从祖国乡下出来不久，什么都不会，我一定好好学。指导员，请你只管批评我，我错了就改。"他很激动，他讲得很诚恳，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给郝指导员看个明白。他有决心学会一切，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他很想说：最好让我到班里去，在战斗中考验我。可是话到了口边，他又咽下去了。

郝指导员温和地笑了笑，重复说了一句："我相信你。"接着他又说："只要肯苦学苦练，什么都学得好。我当初参军，懂得更少，比你差得远。"

熄灯的时刻快到了。王理明在一排传达了命令回来，做完了自己的工作，便同杨林一路出去。刘加亮坐在炕上看一

本小人书。三床被子全铺好了。

杨林连忙感谢道："刘加亮，谢谢你。"

刘加亮头也不抬，只说了一句："你要客气，那么明天你替我们铺罢。"

"好，君子一言，明天我铺床。我是新来的，应当照顾我，有事情要让我多做才好，"杨林认真地说。

刘加亮将小人书往枕边一放，笑着说："为啥让你一个人多做？难道我是到朝鲜来吃饭的！"

"你们比我先来嘛，我年纪最小，当然要让我，我才好赶上你们，"杨林说。

王理明噗哧笑了起来说："睡罢，不要瞎扯了，你不必耽心没事做。杨林，你为啥不早报名到朝鲜来？来晚了赶不上打大仗，你怪啥人？"他一边说，一边脱衣服。

"同志，给你说，我去年就报过名了。人家嫌我小不批准；要不然，我已经打死好些鬼子了，至少也要捉他两三个活的来，"杨林答道。

王理明已经躺在被窝里面，刘加亮也在脱衣服，听见杨林的话两个人都笑了。王理明便说："杨林，你少吹牛！人家倒真的捉过美国鬼子，却一句话也不讲。"

杨林惊讶地看了刘加亮一眼。他的眼光又触到了左眉上头那个黑黑的小伤疤。刘加亮马上钻进了被窝，一声也不响。杨林却忍不住对着炕头说："王理明，你是在说刘加亮吗？明天一定要他讲活捉美国鬼子的故事……"

杨林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一个晴天霹雳，好像炮弹就落

在洞口一样，整个洞子摇晃了两下。王理明在炕上说了一句："好家伙！"刘加亮接着说："杨林，快睡下来。"

"你们这儿好，很热闹，"杨林说。他又问一句："敌人是不是天天晚上都打炮？"

"有时打，有时不打。我们都听惯了。你怕不怕？"刘加亮亲切地问他。

"哪个说我害怕？我害怕就不来了！"杨林昂起头说。他脱下了军装，吹灭灯，上了床，还在自言自语："你们不要以为我胆小。打起仗来，我绝不比旁人差。"他还要跟刘加亮讲话，可是他旁边那两个年轻人都发出鼾声来了。他想，他们一定很累，所以闭上眼就睡着了。

杨林躺在被窝里，好久都不想闭眼睛。洞子里很暗，炕上又很凉。可是他很兴奋。第一，他到了连队；第二，他喜欢这两个通讯员；第三，他喜欢李连长同郝指导员。他先前那一点点失望已经消散了。他想起了这个连队的英雄故事。他在朝鲜三个月中，听到不少的英雄故事，脑子里装了好些英雄的形象。然而刚才听到的故事似乎比过去的那些对他更亲切。先前他站在指导员的面前听得出神的时候，还不曾联系到自己的身上，现在他想来想去，却感觉到那些人同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好像英雄们就在炕前向他招手。他又仿佛看见那一小孩面孔的通讯员在对他微笑，那个年轻人又像是段明，他似乎早就认识了段明。其实段明的脸型是个什么模样，他并不知道。

他睡不着。不过他并没有烦恼。他想的都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敌人打过来的冷炮，声音还是那么响亮，听起来就像炮

弹落在不远的地方一样。王理明偶尔在梦中磨牙齿；刘加亮讲过两句梦话又不响了。……这些并不曾打断杨林的思路。他的思想在两个地方来回跳动。他一下子想这个连队的英雄，一下子又想自己的家乡，他仿佛看见了母亲和哥哥嫂嫂的笑容。"我能不能做一个英雄？"他暗暗地问自己。

郝指导员查哨回来，拿着手电筒朝通讯员睡的炕上照了一下，看见杨林还睁着眼睛，便关心地问道："小鬼，你是不是换了地方睡不好？冷罢？"顺手摸了一下他的被子。

"睡得好，"杨林有点慌张地答道，马上又加一句："指导员，我不冷。"

"那么闭上眼睛睡罢。不要胡思乱想啊。要睡得好，身体才会好，"郝指导员温和地说，就转身走了。

杨林答应着，他听见郝指导员的脚步声去远了，消失了，在暗中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他很满意，什么也不想了。

三

杨林紧紧跟在郝指导员背后，在交通沟里绕来绕去。郝指导员走得非常快，他跟在后面觉得有点吃力。郝指导员回过头来看他带笑问道："走不动吗？"他脸一红，马上挺起胸回答："指导员，我不累！"郝指导员对他笑了笑，笑得同他死去的父亲差不多。郝指导员接着鼓舞地说："那么走快些，前面就是封锁口啊！"他听到这句话，突然紧张起来。他看见郝指导员走得像飞起来一样，很着急，就拚命追赶。敌人的炮打过来了，而且越打越近。他只见尘土飞扬，郝指导员的黑影在前面摇摇晃晃。他一边跑一边伸手揩眼睛，心里在想：该怎么办？他还听见郝指导员在催他："小鬼，快跑，再加一把劲就成了！"忽然又一声巨响，他马上卧倒在沟里。等他站起来，烟消尘散，前面不见了郝指导员。他连忙跑上前去。他让一个人的身体绊倒了，原来郝指导员伏在地上。他唤："指导员，"不应，也不动。他伸手一摸，摸到了血和尘土。他吓得大叫一声！……

有人在推他，叫他。他睁开了眼睛。洞子里有亮光了。刘加亮站在炕前问他："你是不是做了怪梦了？"他看见自己一个人睡在炕上，连忙掀开被子坐起来，定了定神，才说出半句话："指导员……"

"指导员已经出去了，"刘加亮接下去说："王理明跟着他走了。"

杨林吐了一口气，笑了笑，就跳下来，把被子叠好，一面埋怨刘加亮："我睡懒觉，你应该喊醒我。"

刘加亮笑道："我不是喊醒你吗？指导员说你昨天晚上睡不着，今天是头一天，让你多睡一会儿，明天可不行啊！"

杨林脸通红，暗暗地怪自己为什么老是做梦。他看到刘加亮好意的眼光，抱歉地解释道："我明天一定不再落后了。"

"我看你是在做怪梦。是不是梦见了段明的事情？我当初也做过这样的梦，"刘加亮关心地说。他不等杨林答话，又说："我现在到三排去，你看家。队长在里面。你要注意啊！"

"我晓得，"杨林答了一句。刘加亮披起雨布走出去了。外面下着小雨，地上有些滑。杨林洗好了脸，心里还在想刘加亮的话和自己的梦，他越想越惭愧，越着急。在紧要关头我怎么先顾自己？刘加亮还以为我梦见了段明，我哪儿有脸见段明啊！他正在这样地责备自己，忽然听见了郝指导员的声音。郝指导员身上披着打湿了的雨衣，从外面进来。杨林应了一声，便跟着郝指导员往里面办公室走去。

他们走进了办公室的小洞。郝指导员脱下雨衣挂在洞口，回头含笑地问杨林："小鬼，你昨晚睡不着，是不是想家？"

"我没有想家。家里事情用不着我操心，"他摇摇头说，他的脸又红了。

"想家也不要紧，不过更要多想自己的工作，"李连长坐在小条桌前面，刚刚放下电话听筒，听见杨林的答话，便抬起头

插嘴道。

"那么你就是在想我讲的那些战斗故事，"郝指导员看了杨林一眼，温和地说。

杨林望着郝指导员黑黑的长方脸，不知道要怎样回答才好，他有点窘，又有些着急。可是郝指导员的眼光鼓舞了他，他便说："指导员，我听见你讲的英雄故事……我真着急，我好像见过他们一样，不过……"

郝指导员点了点头，打断了杨林的话："我明白你的想法。可不能着急啊！抗美援朝并不是几天、几个月的事情。以后要注意好好睡觉。睡得好才能打胜仗。我昨天讲的话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杨林爽快地答道，他觉得心里轻松多了，好像郝指导员把他从一个窄巷里引出来了一样。他感谢地加一句："指导员，请你放心。"

郝指导员带笑说了一声："好！"满意地望着这个眼睛明亮的年轻人，又问："你家里有什么人？"

"我有妈，还有个哥哥。哥哥大我六岁，前年才接了嫂嫂。"

"那么你家里过得不错罢。"

"我们以前受过很多苦，如今翻身了，有吃，有穿，有屋住。"

郝指导员又点点头，带笑说："所以你没有顾虑。"

杨林高兴地说下去："我妈今年五十七。我要参军的时候，我妈思想搞不通，我报了名回家，她不给我饭吃。我买了三个

鸡蛋，请嫂嫂煮给我吃。我又劝妈，我说：人不能忘本啊！想想当初我们怎样，如今我们又怎样。我妈思想搞通了，她自家送我去参军。”

“你妈倒也不错，想通了就好办了，”郝指导员称赞道。其实他想称赞的是杨林本人，可是他不等杨林搭腔，又往下说：“你们这些小青年都是一样。以后我们再谈罢。你现在到二排去把二排长找来。”

“是，”杨林马上收起了笑容，答应一声，就转身往外走了。

郝指导员走到条桌右边，在一个用木箱改做的凳子上坐下，从军服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了翻，然后抬起头，对正在看文件的李连长说：“老李，一排几个班的洞子都没有问题。炊事班的洞子得加两根木头。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吃过饭就去大队部吗？”

李连长也抬起头来，回答道：“刚才教导员来电话说是实习团刚到，时间安排在下半天，我迟些去不要紧。我现在等三排长来再谈一下。可能我明天跟着实习团一块儿回来。这里的事情你注意安排一下。”

“我会照昨晚谈的那样办。下半天我再到三排去一趟，”郝指导员说。他看见李连长又埋下头去看文件，便关心地问了一句：“老李，你看这个稿子用得吗？”

李连长埋着头答道：“很好。”接着他又说：“你又来了！老说客气话干吗？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也快半年了。你就是这个脾气改不了。”说到这里他笑了。

郝指导员虽也笑起来，声音不大，可是笑得高兴。他分辩

道："老李，哪里有什么改不了的脾气！到朝鲜以后，我变得多了。我越活越有劲，越活越有意思。我真喜欢这些小青年，他们比我们强。"

"可是我们吃的苦比他们多，"李连长接下去说。他站起来把文件折好，放在军服的右边口袋里。

"那还用说！再下一代一定比他们更幸福，"郝指导员微微笑道。

"对。我昨天得到家信，我儿子写的，他才十三岁，就会写信了。我在他那样年纪，做梦也不敢想念书，"李连长说。他儿子的来信使他很高兴，使他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他正要讲下去，忽然看见三排长走了进来，三排长的面容吸引了他的眼光，他换了话题关心地说："又熬夜了！你不要把身体拖垮啊。"

三排长坐在靠壁那个不大不小的炕上。他一双眼睛略略向外突出，眼白上有好几根红丝，脸上带一点倦容，明明是不曾睡好觉。他听见李连长的话，便张开两片干燥的厚嘴唇笑答道："队长，你放心，拖不垮的。"

李连长笑着说："以后不准你这样。"他又换过话题问："老乡都安顿好了？"

三排长点点头说："都安顿好了，完全照你们的指示。"他咳了一声嗽又往下说："就是那个小男孩，妈妈打死了，一个亲人也没有，他手上受了一点伤，我们给他包扎好了。等一会儿让小张送过来。队长，指导员，你们看是不是把他早些送到后面去？"

"我到营部去向教导员请示，回来再决定罢，"李连长

答道。

"孩子送来，先在这里待半天也好，"郝指导员接着说："他伤得不要紧罢？"

"不要紧，不过也够他受的，"三排长说，他皱了皱眉头，眼睛里冒出火来。"左手大拇指连肉连皮擦掉一块。……老乡们总是不愿意离开她的土地。我看还要好好地劝她们往后搬。"

"这个问题我同指导员研究过了，我等一会儿就向上级汇报，"李连长严肃地说；"听说朝鲜同志也在准备把老乡搬到后面去。不过这里是我们守卫的地区，我们有责任保护老乡的安全。你们要多加注意啊。"

三排长点点头说："对，我也是这样想法。看见老乡挨炮，战士们心里都不好受。敌人只会欺负老百姓！"他停了一下又说："朝鲜的妇女可真了不起，她们那样吃苦，一天还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的。"

"这是朝鲜人，英雄的人民嘛，"郝指导员忽然兴奋地说，"敌人再用多少炮弹也没法叫她们不种地，不唱歌，不跳舞！"他的长方脸上露出了笑容。

四

吃过早饭不久，李连长刚刚动身到营部去，联络员小张就把朝鲜小孩送来了。小孩光着头，穿一件白布短褂和一条白布灯笼裤，赤着一双脚，站在郝指导员面前，瞪起一对小眼睛望着他。

"这是我们指导员，"小张用朝鲜话对小孩说。小孩马上举起手认真行了个军礼，圆脸上现出成人那种庄严的表情。杨林在旁边差一点笑出声来。

郝指导员拉着小孩的右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小张替小孩回答："他叫崔东玉，今年八岁。"郝指导员指了指小孩那根包扎了的左手大拇指问道："痛不痛？"联络员翻译给小孩听了，小孩摇摇头，大声说："不痛！"

联络员解释道："小家伙真熬得住，说不痛是假的。"

小孩带着好奇心看眼前的几个人。指导员的黑黑的长方脸显得和蔼可亲；三个志愿军叔叔都带着笑容在看他。他又看小条桌上古怪的电话机。他忽然兴奋地说："我也要打仗。"

小张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三个通讯员齐声笑了。郝指导员喜爱地摸摸小孩的光头，温和地说："你长大了，当人民军。"

刘加亮忍不住插嘴说："人民军，志愿军，韩加起①，打美国鬼子，"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

小孩挺起胸膛，举起右手，露出笑容，大声说："人民军好！志愿军好！大家一起打美国鬼子！"

郝指导员赞了一句："说得好，有志气！"

小孩得意地往下说："打走了美国鬼子，我要到中国去！"他的话由小张译给大家听了，杨林首先说："好，我请你到我家去，我妈一定喜欢你。"王理明接下去说："你到上海去找我，我阿姐会好好招待你。"刘加亮笑道："那么我给他当翻译。"

小孩高兴地说："我要去，我去看你，看你，看你，"他把四个人一一地指过了。

王理明听见刘加亮的话，噗哧笑了起来说："刘加亮，你少吹点牛皮！你会说几句话，你能当翻译？"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把美国鬼子全赶下海的时候，"刘加亮笑着分辩道。"难道那个时候我还讲不好朝鲜话？"

郝指导员站起来说："你们尽讲这些废话！刘加亮，我就没有看见你认真学过朝鲜话，你怎么会讲得好？这也是吹牛啊。"虽是责备的口气，声音却很温和。刘加亮微微红了脸，仍然带笑答了一声"是"，便不作声了。小孩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睁大眼睛望望指导员，又望望刘加亮和王理明。

郝指导员的眼光又落到了小孩的脸上，他忽然想起家乡，想起过去了许久的事情。他伸起右手压着自己的嘴，用力擦

---

① 韩加起：朝鲜话，"一样"的意思。

了一下，然后对刘加亮说："我带杨林到三排去看看，你同王理明好好地守在家里。"刘加亮答应了一声。杨林脸上露出了喜色。郝指导员接着又说："你们好好地照顾崔东玉，不要老跟他开玩笑。"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小孩的右肩，带笑说："小同志，你好好地玩耍，我们会照顾你。"他还嘱咐刘加亮："不要忘记把卫生员找来给他的手擦点药。"最后他对杨林说："小鬼，我们走罢。"

五

雨已经住了。郝指导员的雨衣留在洞子里，杨林也没有把雨布带出来。杨林跟着郝指导员刚走出洞，听见一声炮响，郝指导员知道炮弹又落在右面友军的阵地上，并不停留，便顺着左边交通沟走，杨林紧紧跟在后面。交通沟里还不曾积水，但是有烂泥。郝指导员走得很快，他穿一双旧跑鞋，鞋面全是泥，脚尖上有小孔，泥水已经浸到他的脚背了。杨林看见自己脚上的鞋子比郝指导员穿的好，倒感到一点歉意，可是又不便讲出来。郝指导员好像在想什么重要事情，一直不开口，杨林也只好默默地跟着他走，有时看看他的背影，更多的时候看他的旧鞋。

杨林忽然记起了自己的梦，不觉紧张起来。在梦里他正是这样地跟着郝指导员在交通沟里走。难道考验他的机会真的来了？他抬起头朝前后左右看。他只看见阴暗的天，他的身材不及交通沟高。他侧耳倾听。他只听见敌人炮兵校正机的声音，还有郝指导员和他自己的脚步声，还有敌人打炮的声音。他放慢了脚步。郝指导员回头看了他一眼，温和的眼光仿佛在鼓舞他："快走呀！"他吃了一惊，脸上现出红色，连忙加快了脚步，一面跟着郝指导员走，一面留心看，注意听。

前面一段交通沟的胸墙给大雨冲塌了，泥土堆拦住了路。郝指导员一下子跳上了旁边的斜坡。杨林也跟着跳上去。坡上有几棵栗树，更多的是马尾松。一条小蛇在他们身边窜了过去。杨林吃了一惊。小蛇钻进草丛中不见了。郝指导员又回过头看杨林，说了一句："小鬼，快走，"顺着一条小路绕了一个弯，往下走，又有一道交通沟。郝指导员先跳下去。杨林也跟着下去了。他们在这道交通沟里走了一阵，忽然听见朝鲜女人讲话的声音。

"指导员，有人！"杨林带点紧张地小声说。

"这是朝鲜老乡，"郝指导员答道。他们再走几步，果然看见沟内前面那个小小防炮洞里已经住了人，湿地上铺了些树叶和干草，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坐在干草上，挨着一张朝鲜小饭桌，捧着铜碗，用铜匙把冷饭接连地送进口内。防炮洞的角落里还放了些坛坛罐罐。母女两个衣服相当干净，母亲灰衣青裙，女儿穿粉红短衣，系青色长裙。

"老乡怎么住在这儿？"杨林皱紧眉毛，自语道。

中年妇人笑着向郝指导员点头招呼。郝指导员站住对她讲了短短的两句话，杨林也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接着郝指导员才向他解释："她们的房子前天给炮弹打掉了。"

他们走过了这个地方，杨林激动地问："指导员，我们能不能给她们想个办法？住在这儿太苦了。"

"小鬼，你不看我们正在想办法吗？可是敌人老欺负她们，敌人就是不让老乡活下去。"郝指导员说到这里，声音也变了，他伸起右手，拿大拇指和第二根指头把两边脸颊用力擦了

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一句："我们正在想办法，不会让她们在这里久住的。"

"指导员，我现在明白了，"杨林昂起头说，脸涨得通红，眼睛显得更亮。他心里想：一定要给朝鲜老乡报仇。他的手紧紧地按住他挂在肩头的枪柄。

郝指导员一边走，一边想老乡的事情，听见杨林这句话，他回头看了看这个小青年，也不说什么，又继续往前走。他的思想转到杨林身上了。他觉得看到了这个小青年的鲜红的心。他高兴起来，他想道："我要好好培养他。"他到了一个丁字沟口，向右转了弯，顺着沟往上走，走了一段路，便看到一条坑道。两个战士正在洞口擦枪，他们看见郝指导员，连忙站起来敬礼。

"你们好好地擦罢，"郝指导员温和地说，他站在旁边看了两三分钟，又朝前走了。

他们再走过两个洞子，看见三排长刚从一条坑道里出来。三排长正在同八班长讲话，马上走过来迎接郝指导员。

"指导员，崔东玉送到了罢？"三排长问道。

郝指导员点点头："到了。小孩倒很坚强，他知道他全家都死了吗？"

"他知道，早晨还哭过一阵，"三排长答道，他用那对略略凸出的眼睛看了郝指导员一眼，紫红色脸膛显得更紫了。他陪着郝指导员走进了前面一条坑道。

洞子里两边炕上铺好了雨布，上面放着叠得整齐的被子。一个战士躺在右边炕角上，看见了郝指导员，便跳下来。

“你睡罢，王振江，”三排长连忙说。他告诉郝指导员：“他的摆子又发了。”

“那么你好好睡罢，把被子盖好，”郝指导员关心地对那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小的战士说，回头又问三排长：“卫生员来看过没有？”

“刚才来看过，给了药吃了，”三排长答道。

“好，让他休息罢，”郝指导员说了便走出洞子。杨林同新来的战士方永章一块儿在看洞旁贴的墙报《生活园地》，方永章指着墙报念出一首快板：

手榴弹　像个瓜
拉弦投出就开花
投在敌群一声响
敌人死的死来爬的爬

杨林跟着方永章低声在念。方永章看见郝指导员出来，便带笑地转过身敬礼。杨林仍然出神地对着墙报，口中念念有词。

“小鬼，你在念什么？”郝指导员问道。

杨林吃了一惊，他红着脸，睁着两只圆圆的眼睛，结结巴巴地答道：“这个快板写得好。我在学——”

“你要学写快板？好罢，你回去也写一首，”郝指导员含笑鼓舞道。

“指导员，有些字我认不得。方永章在教我，”杨林老实地说。

“对。那么你就记下来，回去我要考你，”郝指导员点了点

头说。杨林毫不迟疑地答应一声。郝指导员便同三排长一边谈一边往前走了。

他们还到过两个班的洞子，战士们都在专心地擦枪。郝指导员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向一个年轻的战士指点了几句，又拿过那个战士的枪来，擦了几下，杨林已经赶来了。他们出了洞子，顺着交通沟朝前走去。三排长走在前头，郝指导员在中间，杨林在后面，走出这条交通沟，一面转弯，一面慢慢地往下走，经过那个长了些杂草的相当大的旧炮弹坑，走进一条较宽的沟。沟内中间一段左面胸墙上，挖出了十几个浅洞子。每个洞子相隔只有几步的光景。一个洞子里住一家朝鲜老乡。每家人家都有几样破破烂烂的东西，有家具，也有箱子、篮子。人们都坐在铺了草席或者干草的地上，有些妇女在补衣服，有些小孩在念书，有些老年人在谈话。最后一个洞子里，有一位老大娘躺在地上呻吟，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跪在旁边小声安慰她。

郝指导员走过这些洞子，不得不接连地点头回答朝鲜老乡们带笑的招呼。三排长在旁边介绍这些人家的情况。他陪着郝指导员走到那个患病的老大娘的洞口，大姑娘站起来招呼他们。

“老大娘打摆子，卫生员来看过两次，给了药。说是身体太差，病了好久了，”三排长略略皱起眉头向郝指导员解释道。杨林用关心的眼光盯着老大娘，她的头发花白了，黄瘦的脸上好像就只有两边颧骨、一双眼睛和一张哼哼唧唧的嘴似的。他咬紧了牙齿，极力忍住自己的眼泪。他望着，望着，好像睡在

草席上的老大娘一下子变成了他的母亲。

大姑娘插进来，说了几句话，她又说，又用手比划。郝指导员和三排长听懂了她的意思：老大娘吃了药，不见效，不能吃东西，心里烧得厉害。

"你找卫生员给她好好地看一下，是不是还有别的病，"郝指导员低声对三排长说。他又回头用温和的眼光看看大姑娘，对她说了两三句话，把朝鲜字和中国字夹在一起，要她放心地看护病人。她唯唯地答应着。郝指导员正要离开这里往前走，老大娘忽然在席子上尖声讲起话来，而且撑起半个身子向他们挥手。大姑娘马上跪到母亲的身边。郝指导员便又站住，问三排长："老大娘在讲什么话？"他不等三排长回答，接着又说："我回去再向上级反映，先把她送到后面去也好。"他伸起右手在两边脸颊上用力擦了一下。

大姑娘走过来，对他们转达了老大娘的话：她感谢志愿军同志们送粮食给她们。

"一点点粮食算什么？朝鲜同志也常常帮助我们，都是亲人嘛！"郝指导员放下手含笑答道。

"你们同我们，真是亲人啊，"大姑娘含着眼泪用半朝半中的语言说了两遍。

杨林在旁边忽然红着脸，十分激动地插嘴说："朝鲜撒拉米① 大大的好！"他翘起了右手的大拇指，泪珠从眼角滚了下来。

---

① 撒拉米：朝鲜话，"人"的意思。

郝指导员诧异地侧过头看了杨林一看，短短地说了一句："你说得对，"然后向大姑娘说："我们明天再来，"便离开母女二人走了。

郝指导员同三排长一边走一边交谈，忽然回头看了看杨林。这个小青年噘着嘴，脸涨得通红，好像在生气一样。郝指导员知道他在想什么，便短短地说："小鬼，现在不是哭鼻子的时候。"

杨林马上回答一声"是"。郝指导员的脸上虽然没有笑容，可是声音很温和。他早已转过头去，杨林仍然感觉到他那父亲般的注视，这个小青年一路上都在想他那句话的意义同一些与那句话有关的事情。

六

傍晚，指导员叫杨林送文件到营部去。他在交通沟里起初还听见那讨厌的校正机的声音，也听见断断续续的几声炮响。后来这两种声音都听不见了。交通沟里有些地方积着雨水，有些地方还有烂泥。他索性跳上坡去。他走得相当快，只见他跳来跳去，似乎并不感觉吃力。他走到营部天刚黑。这是在一个小山坡上挖出来的有两个出口洞的半圆形坑道。营长的通讯员张少林站在右边洞口，看见他走来，亲热地说："你来了！"两个人紧紧地拉着手。

"给教导员送东西来的，"杨林笑答道。

"他们还在开会，你们队长也在，"张少林低声说，眼睛掉向里面看了一下。

"我交去，再来跟你讲话，"杨林放下张少林的手，取下枪来交给张少林，自己就往里面走。他走了几步，向右转一个弯，便看到营长和教导员的房门。房里有摇曳的烛光，有人声。是一个陌生人在讲话。但是他听见了教导员的轻声咳嗽。他走到门口，叫出一声："报告！"听见里面说："进来"，便推开那扇一半糊着报纸的小木门，红着脸，敬一个礼，把文件递到教导员的手中。教导员短短地说一声"好"。他连忙退出来，拉

上了门。营长和教导员都在，李连长也在，团长也来了。此外还有三个陌生人。

杨林走到洞口，张少林坐在炕前用树桩做的木凳上等他。他接过自己的枪，抱怨张少林道："二〇一来了，你怎么不对我讲？"

张少林带笑说："你不提二〇一，我倒忘记了！"他从军服裤袋里摸出五粒水果糖递给杨林："二〇一带来的，说是祖国来的，我特为留给你。"

"多谢你，"杨林说。他马上剥开一粒糖的包皮纸，将糖放进嘴里，充满感情地说："祖国来的东西多好！"他把其余的糖塞进军服左边的袋子里。"我带给刘加亮他们吃。"他把枪挎上，整理整理军服，说一句："我走了。"

张少林一把拉住他："坐一会儿，我们讲几句话再走。"

"你哪天到我们那里去，我们那里今天来了一个朝鲜男娃儿，"杨林说。

"几岁？"张少林感到兴趣地问道。

"八岁，叫崔东玉，"杨林眼睛发亮地说："跟我小时候差不多。"

"我小时候什么也不懂，比今天朝鲜小孩差远啦，"张少林正经地说。

"我看朝鲜老乡真勇敢，啥子都炸光了烧光了，他们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杨林刚说到这里，忽然听见脚步声，又听见李连长的声音。连长说："我知道你这个小鬼不会马上就回去。你们哪有这许多话讲？"连长的声音还是很温和的。他站

在连长面前，连长递给他一个封好的信封说："回去交给指导员。不要再吹牛了。你对指导员说，准备好明天下午把崔东玉送到团里去。"

杨林接过信封，大声答应一个"是"字，敬一个礼转身走出了洞子。他朝下走了两步，回过头，还看见张少林立在洞口，但是面貌已经看不清楚了，他向洞口挥一下手，便放开脚步，走下山去。

天黑尽了，上弦月给大片薄云遮住，老是冲不出来。板门店停战谈判会场区的探照灯光倒明不暗。坡上一堆一堆的黑影并不妨碍杨林的脚步。路清清楚楚地摆在他的眼前。他仍然像先前那样地跳来跳去。他有时忽然摸一下左边的袋子，那里有连长交给他带回去的信，还有张少林给他的四颗水果糖，他的手指挨到糖，他轻轻地唤了一声"祖国"，脸上露出笑容，他仿佛在唤他最亲近的人。他的步子更轻快了，他兴奋地朝前奔。他浑身发热，头上军帽下也冒出了热气。刘加亮和王理明的面孔，朝鲜小孩的面孔都在他的脑子里来来去去。他不久就到了连部的洞子。

刘加亮站在洞口，看见杨林回来，亲热地说："你回来了，我也是刚回来。"

杨林从袋里掏出一粒水果糖，拿给刘加亮，得意地说："给你的。"他接着又问："崔东玉在哪儿？"

刘加亮带笑接过糖，一边说："他睡了。这颗糖留给他罢。"

杨林笑道："你自己吃罢，祖国来的啊。张少林给我的。崔

东玉也有，王理明也有。”他又问一句：“指导员在不在？”

刘加亮仍然把糖捏在手里，一边答道：“在，一排长来了。”

杨林正要进去，忽然又站在刘加亮面前，拉住他左臂小声说：“刘加亮，队长说明天就把崔东玉送到团部去。”

刘加亮楞了一下，然后说：“我知道朝鲜同志会接他去，他们会照顾他。”

杨林进去，把信交给指导员，还讲了崔东玉的事。指导员看了信点了点头，仍继续同一排长谈话，杨林就出来了。他到了洞口才注意到炕上被子已经铺好，便问刘加亮：“怎么今天又是你铺床？”

刘加亮马上提醒他：“你小声点，崔东玉就睡在这里。”

杨林朝炕上看了一眼。借着昏暗的灯光，他才看见一张小孩脸露在被子外面，小孩睡在炕角，盖的是刘加亮的被子。杨林还听见了轻微的鼾声。他关心地问：“他临睡前闹不闹？伤口痛不痛？”

“小家伙很懂事，”刘加亮小声答道：“天黑了，他想他妈妈。可是他什么也不讲。我看见他流眼泪，问他，他只是摇摇头。在炕上呆呆坐了一阵，就倒下去睡着了。”

杨林在炕沿上坐下，忽然不高兴起来。刘加亮接着还讲了几句，可是他并没有听进去。他沉默了一会，便抓住刘加亮的手，激动地说：“刘加亮，他明天就要走了。我心里像火烧一样。我在想他的事，你说我能够为他做点啥子事？我真恨美国鬼子！我恨不得马上跟他们拚。我要向指导员要求派我到班里——”

“你不要急，注意不要把他吵醒了，”刘加亮温和地打断了杨林的话。杨林不自觉地回头朝炕角望了望，他安静下来了。他听见刘加亮说：“你刚刚来一天，就不安心啦？你应当向指导员谈谈你的思想情况。”刘加亮笑了笑又往下说：“你我都要求到班里当战士，那么谁来当通讯员呢？你的想法同我当初想的差不多。不过我听了指导员谈话以后，也就明白了……”

“刘加亮，你又在吹啥牛皮？”王理明从外面进来，听了半句话，便带笑打岔道。

“我们在谈正经话，”刘加亮答道，可是王理明已经到里面去了。刘加亮继续对杨林说：“打美国鬼子，不是只打一仗就解决问题。”

杨林点头说：“我知道。不过——”

刘加亮不等他讲完话，又说：“那么，我问你我们洞口指导员写的那副对联你记得不记得？”

“我不比你，我连字都认不全，你念给我听听看，”杨林央求道。

“好，我背给你听，”刘加亮说，“上联是：英雄出征把国保；下联是：美帝不灭誓不还。”

“上面有一张横条我认得：‘一人吃苦，万人’……”杨林兴奋地说。

刘加亮接下去道：“那四个字是‘万人享福’。”

“这个意思很好，我完全懂！”杨林满意地称赞道，他的心开朗了。“刘加亮，你比我强，这些字你都认得。”

“我哪比你强？我刚入朝的时候，认得的字不比你多。都

是后来在朝鲜学会认的。你只要肯学，并不难，"刘加亮带着鼓励的口气说。

杨林兴奋地站起来，央求道："刘加亮，你一定要帮忙我，我下决心抓紧时间学。我不学好文化不回国。"

王理明见过了指导员出来，听见杨林的话，他也很高兴，便笑道："我问你将来志愿军全部撤回国了，你一个人赖在朝鲜做啥事体？"

"王理明，你不要看轻人家。我一定不等到部队回国就学好文化，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杨林挣红脸着急地说。

"好罢，我们来个竞赛！"王理明认真地说："我也要好好学文化，我就向你挑战，大家都不能泄气啊。"

"我同意。我保证绝不落后，"杨林爽快地答道，便向王理明伸出手去。王理明满意地紧紧握住杨林的手。杨林用另一只手从袋里掏出一粒水果糖，递给王理明："先请吃颗糖。"

王理明放开杨林的手接过糖，看了一眼，满面笑容，亲切地说："从上海来的，我晓得。"他剥去糖纸，把糖放进嘴里，一面吮着，一面说："我好像回到家一样。这是亲人的手做出来的。"

刘加亮插嘴向杨林解释道："王理明的姐姐在上海糖果厂做工，所以他特别感谢你这颗糖。"

"不要感谢我，"杨林连忙说；"王理明你下回写信回家，请你跟你姐姐说，我们感谢她们厂里的工人同志，每一颗糖到我们手里都是了不起的贵重东西。"他刚说到这里，看见从外面进来一个人，便闭了嘴。来的是三排长。三排长对他们笑笑，

还向炕上望望，问道：

"崔东玉睡了？他的伤口不痛罢？"

"睡了，他很听话，"刘加亮答道。

"队长说明天送他到团里去，"杨林接着说。

三排长点头说："对。"他又向炕上望望，好像要同通讯员们讲几句话，这时二排长和炮排长一路走了进来，他也就同他们一起到指导员那儿去了。

"小队长们来汇报了，"刘加亮对杨林说，他也跟了进去。

七

早晨，天刚发白，从洞外渗进一点灰白色微光，崔东玉忽然在炕角发出轻微的哭声。刘加亮马上坐起来，问他什么事哭，孩子没有回答，原来他还在梦里。刘加亮轻轻叹了一口气，睡在旁边的王理明已经睁开眼睛，听见叹声，诧异地问道："刘加亮，你有啥心事？"

"我哪有心事？我听见崔东玉在梦里哭，心里难过，"刘加亮答道，他穿起衣服，下了炕。

"希望他快快长大起来，好替他妈妈报仇，"王理明坐起来自言自语似地说。

"用不着等他长大，应该由我们替他妈妈报仇，"刘加亮严肃地说。

"对！我一定要报这个仇，"杨林也醒了，听见这句话，忍不住大声插嘴说，他掀开被跳下来，站在炕前穿衣服。

王理明穿好衣服，正要讲话，听见崔东玉在叫"志愿军叔叔"，便批评杨林道："你总是大声讲话，你把他吵醒了。"他的话还不曾讲完，就被一个响雷似的声音打断了。

崔东玉又叫一声"志愿军叔叔"，马上从炕上爬下来。刘加亮连忙对他说："不要紧，敌人打冷炮。"拿过他的衣服，给他

穿上问他："痛不痛？"

崔东玉不管懂不懂，就挺起胸答了一个"好"字。

刘加亮又指着小孩那根包扎好的大拇指再问："这个痛不痛？"

崔东玉摇了摇头，又说一个"好"字。

"说不痛才怪！我就喜欢这种坚强的小娃儿，"杨林称赞道，他拉起小孩的手，说："你跟我出去洗脸，我送你一张脸帕。"

王理明马上说："我有，我拿给他。"刘加亮接着也说："我已经拿出来了。"

杨林听见他们的话，坚持地说一句："要我的，不要你们的，"便放开小孩的手，连忙到炕上去，取过作枕头用的小包，打开它，拿出一条白色新毛巾。王理明也已经把毛巾取出来了。三个人在争论崔东玉应当接受谁的毛巾，崔东玉觉得奇怪地在一旁望着。但是争论马上解决了。刘加亮拿出毛巾，王理明拿出牙刷，杨林拿出一块肥皂和昨天留下的两粒水果糖。崔东玉带笑连声道谢。四个人都很满意。

"你们在争论些什么？"指导员从里面出来，温和地问道。

"我们在装备崔东玉，"王理明抢先回答。

郝指导员看到那几样东西，马上懂得这句话的意思，脸上露出笑容，但又略带批评的口气说："你们还不快洗脸，天已经亮了。照顾崔东玉，也不能耽误工作啊。"

王理明对杨林闪闪眼睛，笑了笑，接着对指导员说："指导员，崔东玉今天就要到后面去。我们三个都喜欢他。"

"我知道，"指导员点点头说，他望着王理明忽然问一句："你们打算怎样呢？"

王理明闪着眼睛答不出来。刘加亮已经拉着崔东玉的手到洞外去了。杨林还站在旁边，他看见王理明不作声，便鼓起勇气说："我请求派我送他到团部去。"

指导员看了杨林一眼，说："你等一会跟我到二排去。"他又看看王理明，王理明正要开口说话，刚说了一个"我"字，就被他打断了，他温和地说："你们这些小青年，你们知道朝鲜有多少崔东玉啊！你说，你们应当怎么办？"

"我们要替他们报仇！"杨林抢先答道，这句话的确是冲口而出的。

"对！"指导员又点点头说，"你们时时刻刻记住这句话，就好了。王理明，你和刘加亮看家，好好照顾崔东玉，今天不用你们送他去。"指导员说完，就往里走了。

杨林走出洞子，看见刘加亮弯着腰在脸盆架前替崔东玉揩脸。崔东玉正在讲什么话。刘加亮拿开了毛巾，崔东玉忽然一本正经地双腿靠拢立正，举起手敬一个礼，杨林忍不住微微笑起来。他洗好脸，漱过口，又看崔东玉，这个白衣白裤的小孩右手高举，左手下垂，在洞口交通沟里跳起朝鲜舞来了。刘加亮在旁边用手打拍子，王理明站在洞口出神地看。杨林暗暗地想：我要有这样一个弟弟，多么好！他走进洞去见指导员。

指导员正坐在小条桌前，拿着耳机听电话，接连地点头讲了两个"对"字，最后说："我马上来，"放下了耳机，他看见杨林

直挺挺地站在旁边，便站起来说："我们走罢，现在不去二排，到三排去。"

杨林看见指导员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不知道他在电话上谈的什么事，默默地跟着他走到外面。刘加亮在洞口打扫；崔东玉靠着交通沟在翻看一本小人书，看见他们出来，马上敬个礼，唤一声"指导员"。

指导员轻轻摩一下小孩的光头，用口说带手比划告诉小孩以后不要再敬礼，小孩似懂非懂地接连点头。指导员带着杨林向左转了弯走了。

交通沟里已经没有烂泥了，不过土还是很松软，在某些地方甚至有点黏鞋。可是指导员始终走得很快。杨林跟在后面一直在想崔东玉的事情。后来他忍不住唤了一声："指导员。"指导员回过头看他，问他有什么事。他迟疑了一会，才说出一句："上级要把崔东玉送到哪儿去？"

指导员一边走，一边回答："你不用担心，朝鲜同志会作适当的安排，不但管他的生活，还要管他的学习。小鬼，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费脑筋。"

杨林想了一下，又说："指导员，我喜欢他，我真想有个这样的弟弟。"

指导员在前面说："在朝鲜像这样的弟弟多得很，你喜欢他们，你用什么来表示你的感情呢？你为他们做些什么事呢？"

杨林挣红脸，短短地答了一句："就是粉身碎骨，我也情愿。"

指导员又回过头，看了杨林一眼，他有点激动，那两只睁

得圆圆的眼睛给了他很深的印象，过了半晌，他才鼓励地说："小鬼，那么以后你要好好地学习啊。只要有这样的决心，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不久他们走到了那条熟习的交通沟里。他听见杨林说："指导员，刘加亮说过，我有啥子问题都可以跟你谈。"他一边走，一边亲切地答道：

"对，你有事都可以找我谈，你有问题我可以帮忙你解决。我参军的时候年纪比你还小，我也当过一年的通讯员。"

"是，我听你的话，"杨林兴奋地说。他听见了迎面走来的脚步声，指导员也加快了步子，他想：大概是三排长来接我们，抬头一看，果然有两个人从前面沟里转了出来，正是三排长和八班长。他们到了指导员面前，三排长报告："指导员，挖出来了，就是她们母女两个。"紫红色脸膛有些发黑了。

指导员注意地倾听三排长报告情况，一面往前走，一面伸起右手用力擦两边脸颊。八班长紧紧跟在后面。杨林走在最后，他只听见三排长的头两句话，可是他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心情突然紧张起来了。

他们又走过那个小小的防炮洞。那一对母女仍然安静地坐在洞里，母亲埋着头缝补旧衣，女儿俯在小饭桌上写字。指导员对三排长小声讲了两句话，就匆匆朝前走了。杨林松了一口气，他想：可能是我听错了。

仍然是三排长在前面带路，他们不经过战士们的住室，从另一条交通沟，走进了那个较宽的沟。他们刚进沟，就看见两个战士，一个拿十字镐，一个拿铁锹迎面走来。那两个年轻战士看见指导员便站住敬了礼。

“你们班长呢？”三排长问道。

“班长在前面，”拿镐的战士短短地答道。

指导员不作声，继续往前走。杨林经过那两个战士的身边，伸过头去小声问了一句：“出了啥子事情？”

拿镐的战士看他一眼，答道：“敌人的冷炮打垮了老乡的洞子。”杨林觉得心一紧，怒气直往上升。指导员他们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他连忙大踏步跟上去。他听见了闹哄哄的声音，接着看见朝鲜老大娘们聚在一起摇头比手在谈论什么。她们见到指导员，便散开让出一条路来。

沟里到处都是小土堆。前面不远，有一些破烂的箱子、篮子、坛坛罐罐堆在沟边，一位老大娘躬着腰，用一把破帚扫去它们上面的尘土。一个洞子被黄土封了一大半。再往前，路就给塌下来的土拦断了。不过已经挖出了一条窄路。七班长讲话的声音从前面送了过来：“盖子不要钉，等指导员来看了再说。”

指导员和三排长从这条窄路走到前面去了，八班长带着杨林跟上去。

“指导员，你来了！”身材瘦小的七班长大声说，那张瘦脸上一对冒着火的眼睛显得很突出。他向指导员敬个礼，接着报告：“两位老大娘受伤不重，已经包扎好了；能搬的东西都搬出来了，老乡们自己也动手。战士们做了两副棺材，把牺牲的人装好了。指导员，你看，葬在哪里？”

“你们倒搞得很快，”指导员说了这一句，他的眼光落在顺着沟边放的两副用弹药箱改做的薄棺上面，两个战士刚刚把

盖子取下来竖立在一边。指导员默默地走到棺材前，看了一眼，揭下帽子，埋下头走开了。杨林听见他对三排长说："找个地方把她们葬了罢；"又听见三排长回答："就埋在那个炮弹坑里罢。"

杨林的眼光落到那张瘦得见骨的黄脸和那张椭圆形的白脸上，它们和他昨天看见的差不多，不同的是：现在眼睛合拢，嘴唇微闭，鼻孔里有一点血迹，也有一点土。战士们刚刚放下棺盖，正要用钉子钉牢，忽然跑来几个朝鲜妇女，她们站在棺前，有的摇手，有的揭盖，有的讲朝鲜话。一个中年妇女用中国话央求道："我的看看。"

杨林听见指导员大声说："让她们看看罢，"他连忙退到一边。刚刚站定，就听见一片哭声。他忽然一阵鼻酸，泪水线似地从眼角挂了下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些眼泪。他又听见指导员说："不要哭啦！"他还以为是对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马上揩干了眼泪，掉开脸不看那几个朝鲜妇女的背影。

"三排长，你劝老乡们不要哭，现在就把棺材抬去葬了罢！"指导员说，他有点着急了；"小张怎么还不来？"

就在这时联络员小张气咻咻地穿过窄路跑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七班的战士。三排长便说："小张，你去把老乡们拉开，你对她们解释，我们一定要替牺牲的人报仇，现在要把棺材抬去安葬，请大家散开罢。"

小张马上走过去，用朝鲜话对妇女们讲了几句。大家果然散开了。棺盖钉牢，战士们抬走两副简单的棺材经过窄路往

到走了。妇女们跟在他们后面，一边在揩眼泪。

杨林站在指导员身边，他一面听指导员同三排长谈话，一面望着缺口旁边那个刚刚挖出来的长坑，土里还有破碎的木块和陶片，他想，我们昨天还到过这个地方，当时完全没有料到。小张走过来，对指导员汇报老乡的情况。指导员对小张说："你劝劝老乡们还是离开这里，搬到后面去。朝鲜同志已经在作准备，过两天我们就帮忙她们搬家。她们有什么困难，请告诉我们，我们部队帮忙解决。你对她们说，她们用不着待在这里冒危险，她们暂时离开，将来会回来的。你对她们说，这也是朝鲜政府的意思。你对她们说，她们搬走，我们会帮她们守住这块地方，绝不会让鬼子过来。"指导员又说："你今天就留在三排。有事情我会叫人来找你。"

小张唯唯地应着，就回头走了。指导员和三排长一行人也跟在小张后面，穿过了窄路。那位老大娘仍然弯着腰在整理放在沟边的东西。洞子前面有几个老大娘在小声讲话，她们脸上的泪水还没有干，看见指导员走近，却露出笑容讲起感谢的话来。

他们走过一个离落弹处较远的洞子，就是杨林以前看见朝鲜老大娘们聚在一起谈论的地方。现在人已散去，这里忽然清静了。洞子里铺了两张席子，四个妇女围了一张小桌坐在席子上，其中一位老大娘左手从指头一直到肘拐给包扎得紧紧的，用绷带吊了起来；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头上缠着绷带躺在另一张席上。她们不高声讲话，也没有人呻吟、叫痛。看见指导员和三排长走来，坐在小桌旁的妇女全带笑招呼他们，连

躺在席子上的女人也坐起来了。

指导员对小张说："小张，你问问老乡，有没有困难？有没有什么需要？你问问她们伤口包扎得好不好？"

小张把指导员的话翻译给她们听了。她们都站起来说没有困难。头上缠绷带的女人走过来用两只手握住指导员的右手，含笑说："指导员，志愿军同志真是我们的亲人，谢谢你们啊！"左手受伤的老大娘又讲了两三句，别的妇女拉着三排长在讲话。指导员对联络员说："小张，你对她们说，我们有事要走了。你把我先前那番话向她们讲清楚。她们有困难尽管讲，不要客气，中朝人民本来亲如一家嘛。"指导员说完，就向她们告辞，带着三排长一行人走了，让小张留在那里同朝鲜妇女们谈话。他们走了几步还听见后面妇女们的声音："指导员，再来啊。"杨林两次回头，都看见正在摆动的白衣白裙的身形和频频挥舞的手。他的眼睛湿了，他害怕会给走在他旁边的七班战士看见，便偷偷地擦干眼睛，挺起胸膛向前迈步。

指导员的脚步快，三排长的脚步快，杨林也想早早赶回连部去看崔东玉。他们走到沟口，杨林听见几个人在前面讲话，有男有女，有朝鲜话，有中国话。他的心情又有些紧张，他知道战士们在埋葬那两母女。他跟着前面的人上了那个矮矮的斜坡，便听见七班长说："指导员，已经埋好了。"指导员看了一眼，点一下头，说了一句："好，再给它弄点伪装罢，"就匆匆走进了交通沟，三排长和八班长紧紧跟着，他们边走边交谈。杨林朝那个地方多看了一眼。不仅是好奇心使他激动，复仇的欲望也在烧他的心。七班长在一个矮矮的土堆上放松枝。几

个朝鲜妇女也弯下身把野花、野草埋在堆上和堆旁。杨林还听见一个战士问："班长，要不要竖个牌子作记号？"又听见七班长回答："哪天有空再来立块碑，种点花。大家行个礼走罢。"他压不住这样一个思想：你凭什么漂洋过海来伤害朝鲜老百姓呢？他一面走一面用右手捏住挎在肩上的枪，他真想马上用这支枪来替那母女报仇。

八

郝指导员在三排停留了一些时候。他和三排长一起把几个洞子仔细检查了一下，才带着杨林回连部去。他们到了连部，王理明已经把早饭打来了。指导员匆匆地吃了饭，同营部通了电话，向指导员报告了情况，又带着王理明到二排去了。

刘加亮也早出去了。整个洞子里只有杨林和崔东玉两人。杨林回到连部看见崔东玉感到格外亲热。他很愿意同崔东玉在一起多待一阵，他还在想崔东玉的事。指导员回来以后不曾谈起把朝鲜小孩送走的话，他不知道是不是安排已经改变，但是他担心忽然来个电话，指导员就会把小孩送走。现在他应当坐在条桌前守电话，崔东玉却喜欢跑到洞口去。他要小孩安静地坐下，小孩坐了片刻又出去了。过一会小孩又走进来，手里拿一根树枝，对着窗口似的小洞做出瞄准的姿势。

"你在做啥子？"杨林觉得有趣地问道。

"我要打美国鬼子，报仇！"崔东玉抬起头一本正经地回答，小孩讲的是中国话，字音虽不准确，但是杨林容易地听懂了。

"你讲中国话讲得好，"杨林带笑地伸起大拇指称赞道。他

有点惊奇：小孩怎么学得这样快？

崔东玉望着他笑笑，摇摇头说："不好，"拿起树枝跑出去了。杨林大声说："回来！"可是小孩已经不见了。杨林满心欢喜地望着小洞外黑暗的甬道，他在自言自语："他们两个今早晨一定花了很多功夫。崔东玉只要在这儿住上一个月，保险什么话都会讲了。"但是他又想起了指导员的话，他的笑容消失了，圆圆的脸上现出了严肃的表情。

杨林的眼光落在条桌上放的一份《人民日报》上面。他拿过报纸摊开来，认真地读着，却念不出几句成句的话。他责备自己道："你如果不好好学文化，你连崔东玉也比不上！"

崔东玉捧着一样东西走进来兴奋地说："叔叔你看！"原来是一只小松鼠，关在一个简单的木笼里面。杨林接过木笼，放在条桌上，望着这个大尾巴的黑灰色尖嘴小动物不住地咬笼柱，他高兴地问崔东玉："哪里来的？"

"王理明捉的，王理明捉的！"崔东玉拍着手说。

"你看，它这对机灵的小眼睛真有趣，"杨林带笑说。

"我喜欢，我喜欢，"崔东玉说。他爬上了用木箱改做的凳子，跪在那里。

"我也喜欢，"杨林说，他不管小孩懂不懂，"这一绒线球一样的尾巴……"

"杨林，你在干吗？"刘加亮的声音打断了杨林的话，他连忙站起来，拿着小木笼说："崔东玉拿给我看的。"

"让我拿出去放好，"刘加亮说，就把木笼接到手里；"你在看家，不能分心啊，要是给指导员看见，会吃批评的。"

杨林红了脸坦率地说："这是我不好，我接受你的批评。"

崔东玉严肃地看看刘加亮，又看看杨林，忽然接下去说："叔叔，我不好。"杨林走过去，拿起小孩的手，紧紧地握住，激动地说："你好，你好。"

刘加亮捧着木笼带着崔东玉到外面去，让杨林一个人留在条桌前面守电话。他把木笼放在洞口地上，刚刚伸直身子，就看见指导员走了过来，他连忙招呼一声。崔东玉含笑敬个礼，唤一声："指导员。"

"你们又在玩什么？"指导员带点批评的口气对刘加亮说。

"王理明捉的！"崔东玉接嘴说。

指导员回过头去，王理明红着脸站在他身后不等他发问便说："我打饭回来在路上捉的，笼子也是我做的。"

刘加亮马上插一句："笼子是我们两个做的。"

指导员看了看眼前三个人，他微微一笑说："崔东玉今天下半天就要走了，你们不会哭鼻子罢。"

"我们不会的，"王理明答了短短的一句，指导员已经走进洞子去了。他蹲下去，看笼里可爱的小生物，一面问刘加亮："你看怎么办？"

刘加亮随口答道："还是放了它罢。"

"不，不放它，"王理明摇头说："我主张连笼子一道送给崔东玉。"

刘加亮点了点头："对，反正他到后面去，让他带去也多一样分心的东西。"

王理明站起来，自语似地说："不知道是不是派我送他到

后面去。我要向指导员要求这个任务。”

“杨林已经要求过了，其实我也想去，”刘加亮说，不过他已经打定主意把这个任务让给王理明或者杨林了。

崔东玉一直在注意小松鼠的活动。他们的话他虽然听见了，可是也并不完全了解。他忽然掉转身拉着刘加亮的手坚决地说：“叔叔我不走我不走！”

九

这天傍晚崔东玉走了，是团长把他带走的。团长陪了祖国华东区实习团的三位首长到八连来，指导员向首长们汇报了本连战士的思想情况，又找了附近三个排的五个战士来开了一个座谈会，谈一些坑道生活的情况和个人的感受。然后他们一起去看四个排的住室，还看了老乡们暂时住的那些洞子和今天早晨落炮弹的地方。实习团的首长们就留在三排，七班把洞子让给他们住两三个晚上。住在那里的除了三位首长和连长外，还有两个通讯员，一个是从军里来的警卫员马中，另一个是杨林熟习的营部通讯员张少沐。

连部的人们整整忙了大半天。只有崔东玉闲得无聊，一个人在洞中看松鼠，玩树枝。他看见人们来来去去，不知道在干什么，却担心有人把他带走，他不愿意离开这三位"叔叔"。他看见王理明对他眨眼睛做滑稽相觉得有趣；他听见刘加亮小声哼《志愿军战歌》觉得好听；他看见杨林挎着枪昂起头挺起胸走进走出，很羡慕这位叔叔。他看见松鼠嚼饭粒，小嘴动得那么快，觉得这个小生物十分可爱。可是他看见整天在空中慢慢飞来飞去的敌人的炮兵校正机，又怒气上升，拿起树枝对它"瞄准"。团长也曾摸摸他的头，同他谈过几句话，由小张

担任翻译，他只知道这位身材高大、面貌和善的人是一位首长，却弄不清楚是什么样的首长，总之是指导员的上级。这位首长和蔼地问他愿不愿意到后方去，他回答道他要同志愿军叔叔住在一起。首长笑了笑，对他说，要送他到朝鲜叔叔那里去，朝鲜叔叔们已经安排好了，要让他上学。他说："我不去后方，我要打美国鬼子，给妈妈报仇！"首长拍拍他的肩头，亲切地说："我送你去。金日成首相要你去上学。你将来长大了，当人民军我们一块儿打美国鬼子。"他没有办法说不去了。首长也走开了。不过他有时还这样想：你把我带走，不要紧，我认得这个地方，我会跑回来，找这几位叔叔。

后来团长带着他那个瘦小机灵的通讯员离开连部的时候，指导员跟着团长走到交通沟里，崔东玉正在同王理明、刘加亮讲话，小张替他们翻译，指导员看见崔东玉，亲切地唤他的名字，崔东玉有点紧张，不过还是走过来了。小张也跟着过来。指导员指着团长对他说："这位首长带你到后面去。崔东玉看看指导员，看看团长，又看看王理明和刘加亮，举起手认真地敬一个礼，说："指导员叔叔，再见！"他又到王理明和刘加亮跟前同他们说："叔叔再见！"也敬了礼。

王理明把放在洞口的木笼捧着交给崔东玉："送给你！送给你！"

崔东玉十分欢喜地接过笼子说："谢谢，谢谢。"他还向小张告别，他又看了看四周，他找不到杨林，刘加亮把他们送给他的毛巾等等用报纸包着交在他的手里，团长的通讯员已经把木笼接过去了。

“小同志，我们走罢，”团长在旁边温和地催促道。崔东玉只得跟着团长走了。团长看见小孩几次默默地回过头望洞前沟口的人影，心里也有些不好过。他想：“小孩倒很坚强。他将来一定是个很好的战士。他们那一代一定会把朝鲜建设成美丽的花园。”他便伸出手去拉小孩的右手。

杨林从三排回到连部，把带来的一封信交给站在洞口的指导员。听说崔东玉刚走不远，他急得满脸通红，便向指导员要求：“让我赶上去看看他罢。”指导员点了点头，他转身就跑。他跑得满头大汗，才逐渐在斜斜的交通沟口看见了团长的高大的身形。他看见团长回过头来，便立正敬礼说声：“报告！”

“什么事？”团长站住，温和地问道。崔东玉也转过身来，含笑地向他招手。

杨林楞了一下，答不出话。崔东玉唤了一声：“叔叔。”

“小鬼，你来报告什么？”团长又问了一句。

他想起来了，便答道：“实习团首长三天后上来。”

团长笑了笑，说：“我早知道了，你回去罢，”便转过身去。

杨林答应一声：“是”。他却走上前去抓住崔东玉的右手亲热地说：“崔东玉，再见。好好学习啊。”崔东玉也亲热地连说两声：“叔叔再见。”

团长又回身问杨林：“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首长，我叫杨林，四川来的，”杨林有点紧张地说。

团长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我说，你们这些小青年哪里来那么多的感情？快回去！”

杨林红着脸答道：“是！”他马上接下去说：“我到朝鲜才三

个多月，还没有打上仗。”

团长微微一笑，温和地说：“小鬼，你是说，你没有打过仗，所以你感情特别多，是这样吗？好罢，你好好练武，将来一定给你任务。可是你要把心放在工作上啊！”

杨林听见团长的温和的声音，觉得满身轻快，什么顾虑都没有了，兴奋地答道：“是，我听首长的话，不管首长给我啥子任务，我保证完成。”他说罢转身便跑，脚步比来的时候更快。

杨林一口气跑回连部，指导员还站在洞口，看见他便说：“现在你可以安心工作了。”他红着脸答一声“是，”便进洞去把自己的背包挂在背上和王理明一起出来，王理明拉住杨林的手小声问道：“你赶上他没有？”杨林点了点头。王理明又问一句：“二〇一没有骂你罢？”

“你是不是希望我挨骂？”杨林轻轻笑问道。他马上学着团长的声音说：“你们这些小青年，哪里来那么多的感情！”

“二〇一就是这样，他对人再好也没有了，”王理明带笑说。

指导员听见他们的笑声，便大声说：“杨林，你还不回去？你告诉队长说我明天一早到三排来。”

杨林答应一声“是”，刚刚举步，听见指导员又说：“崔东玉走了，你们的心也可以定下来了。”

杨林又应了一声“是”，这次他差一点笑出声音来。

指导员忽然指着洞口上方那张横条问杨林：“小鬼，你懂得这八个字的意思吗？”

红纸横条上的颜色快要褪尽，在黄昏的微光下字迹也有

点模糊了。杨林略略看了一下，老老实实地答道："我懂。字我认不全，意思我倒懂。刘加亮念给我听过，我记得这八个字：一人吃苦，万人享福。"

指导员满意地说："你记得就好。"

"报告指导员我不会忘记，我也是穷苦人出身，"杨林激动地说。他转过身扶了扶挎在肩头的枪，就用小跑步顺着左面交通沟走了。

指导员望着杨林的背影，好像在想什么，他忽然注意到王理明还带着笑容站在旁边，便说："王理明，我交给你和刘加亮一个任务：你们要认真帮助杨林学文化。我还要考察成绩啊。"

"我们三个都可以写保证书，"王理明眨了眨眼睛兴奋地答道："指导员，不用你考察，我们要向你汇报成绩。"

十

杨林到了三排，张少林站在七班的洞子前面等他，他拉着张少林的手一起走进那个小小的过道，一面问："首长呢？"

"在里面开座谈会；队长也在，"张少林小声答道。

"我进去见队长，"杨林说．他放开张少林的手，把背包取了下来搁在地上，走进里面去了。

洞子里面左边炕上放了两个小木箱，它们底朝上拼在一起成了一张小桌，桌上铺了一张雨布，上面有两支燃着的洋烛和三个搪瓷茶杯，三位首长盘起脚坐在桌子旁边，俯下头，拿着自来水笔，摊开笔记本在写字。李连长也在这一边，他坐在靠洞口的炕角上，两只脚朝下垂，快要挨到地了。从军里来的警卫员马申坐在靠里的炕沿上。右边炕上没有点洋烛，五个战士坐在那里，有的靠里坐，有的就坐在炕沿上。坐在外面炕角的战士正在慢吞吞地讲话。杨林就站在洞口向队长小声报告了指导员的话，队长点了点头。大家都在听那个战士讲话，杨林也注意地听下去：

"……后来连续上来六个同志都挂了花下来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守五个人的阵地。那个时候我的心是不寒的，因为我包里弹药很充足。我听见美国鬼子又哇哇地嚷着上来了。总

有十几个人罢。这次他们不打枪，只是嚷。他们大概也猜到这个山头没有别的人，要上来抓我俘虏。我心里想：你打我不抬头。你不打，我就出来。我是共产党员，决不让你们抓俘虏；我死也要死在阵地上。敌人的叫声越来越大。我就对准他们的脑袋把飞雷打下去，飞雷一爆炸，什么也没有了。我想，你们到西天去抓俘虏罢。我一连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反扑。弹药都打光了，只剩了两颗手榴弹。可是我也不着急。反正我一个人打死了几十个鬼子，也很合算了。敌人再要上来，我还可以请他们吃一颗手榴弹，另一颗就留给我自己，我绝不让他们抓到我。可是敌人胆怯了，好一会都没有动静。等到他们第四次反扑上来，援军已经到了，又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

这个二十二三岁的战士埋着头，两眼朝地一句一句地说下去，始终不曾提高声音，好像在叙述别人的寻常的遭遇一样。杨林出神地听着每一句话，他的眼光一直停留在这个战士的脸上。这些话搅动了他的心。他的心被那种英雄气概越来越紧地抓住了。他几次用尊敬和羡慕的眼光看这张脸，心里十分激动，他想："英雄啊，英雄啊！"他认出来了，这个战士是从坚守一四〇高地的九连来的。他听见李连长向实习团首长们介绍过这个九连战士的名字：李西成。李西成有着太阳晒黑的圆脸、浓眉毛、厚嘴唇，这样的面貌是他常见的。李西成比他大不了几岁，和他一样，也是穷苦人出身，从农村来的。他暗想："李西成能够做这些事，为什么我不能？"他又想："如果叫我像他那样守阵地，我怎么办？我打得好吗？"他再想，

“如果我打不好，守不住阵地……”他着急起来，他觉得自己脸在发烧了。他又不服地想：“为什么打不好？难道我害怕美国鬼子？”他又注意地看李西成。烛光摇曳得厉害，首长们正埋着头写字，李西成刚讲了最后一句话，带点抱歉地微微一笑。一位首长忽然抬起头，伸出手去拿小桌上的茶杯，把烛光遮住，李西成的脸一下子隐在阴暗里了。他没有看到李西成的笑容，却听到了那句抱歉的话：李西成说，自己到朝鲜来，没有能为祖国人民，为朝鲜人民，立下大功，非常惭愧。杨林又接下去想：“你倒这样说，那么我呢？我一次仗也没有打过，一个美国鬼子也没有捉到。”他想到了崔东玉，想到了今天清早牺牲的朝鲜母女，他的脸涨得通红，这次不是由于惭愧，是由于愤怒。“我一定要争取打仗，我一定要替朝鲜人民报仇，”他暗暗地下了决心。

另一个瘦小的战士马上接着谈起来。杨林认得这是八班的战士丘文金，他上午钉过棺盖，又把棺材一直抬到炮弹坑里，还提过“竖牌子作记号”的话。他现在谈的是挖工事的体会：

“我们刚刚上阵地，挖工事觉得手顶不住，头两天手上就起了泡。变得很疲劳，很艰苦，又下雪，又刮大风，一动手就出血。可是我们工事没有修好，敌人炮火打得厉害，我们又不能不加紧挖工事。我们感觉到怕吃苦，不加紧挖工事，就不能打胜仗，就不能完成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是我们怕吃苦，怕流血，我们怎么能支援朝鲜人民，怎么能打败美国鬼子呢？所以大家越是吃苦，反而越是高兴。我们班上的王振江

病了五天还是照样挖工事，越是疲劳，越是艰苦，也越是感到光荣。大家都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

杨林听一句，微微点一下头。他觉得句句合他的心意，句句有说服力。他越听，越高兴，越觉得精神爽快，仿佛有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上的门一样。可是张少林忽然在洞外唤他，他连忙挺起身子，好像从梦中惊醒似的。他走了出去。

“你在干吗？怎么不出来？”张少林低声笑问道。

“我听他们谈话，讲得很好，”杨林正经地答道。

“三排长叫你去讲话，”张少林又说。

杨林说：“我马上去。”他朝洞内张了一眼，才走出过道去找三排长。

三排长在八班的洞子里。他正在和七班长、八班长谈话，看见杨林进来，便说：“小鬼，我已经同马中、张少林谈过了。队长派你们三个在这里照料首长，你们好好地商量一下，分个工罢。”

“是，我晓得。三排长，还有别的话吗？”杨林说。

“从今夜起，你们轮流在洞口站岗，保卫首长的安全。你们三个自己去安排罢。我要来查岗。队长今夜住在这里，他也要查岗的。”

“我们保证一定很好地执行任务，通夜不睡，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杨林挺起胸膛说。

“我并没有说通宵不睡。三个人分三班，大家都有机会，对不对？”三排长带笑望着杨林说。

“三排长，说起分班，就有困难。哪个都愿意多站几个钟

头，不肯让给别人。你不如叫我一个人站通夜罢，他们就没有话说了，"杨林兴奋地说，脸发红，眼睛发亮，牢牢地望着三排长。

三排长笑了起来，说："你们这些小鬼啊！你们三个又不是一家人，怎么讲起话来一模一样？"

杨林听见这句话，知道张少林他们已经表示过同样的意见了，自己也觉得有趣，便插一句嘴："都是志愿军嘛。"他接着又向三排长要求："三排长，你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一个人罢，我的身体比他们两个好。"

"可是他们比你早到朝鲜啊，"三排长说。

杨林接下去说："我到得晚，你就应该照顾我，让我每夜多站两三个钟头……"

三排长打断了他的话，"你不必多讲，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了：马申头班，张少林二班，你最后一班。"

杨林还想说话，三排长含笑阻止道："小鬼，你的心思我全知道。你不用着急。任务有的是。下次要是有仗打，我倒想向队长、指导员要求把你调到我们排里来当战士。你满意不满意？"

杨林听三排长讲话的口气，知道不是在跟他开玩笑。他马上高兴地说："三排长，多谢你，到时候你不要忘记啊！"就走出了洞子。细细的水丝飘到了他的脸上。他抬起头，天空漆黑，一颗星也没有。凉凉的小雨点继续落下，但交通沟里的土还不曾打湿。他马上记起了座谈会。他刚刚走到七班住室门前，就看见参加座谈会的五个战士鱼贯地走出来，张少林跟在

后面送他们。杨林有一种失望的感觉：座谈会结束了。

张少林看见他，小声问道："三排长对你讲些什么话？"

杨林小声答道："你明明晓得，还要问我。他说，你跟我讲的话是一样的。"

张少林含笑拉着杨林的手，轻轻地说："那么你快进去照料首长。"

杨林把军服整理一下，弯进了过道，在洞口地上拿起自己的背包走进了洞子。

三位首长同连长站在洞子当中交谈，马申正在左边炕上铺被子，很快就铺好了。三位首长中那个左眼下面有一块大伤疤的看见杨林把背包放在右边炕角上，忽然问道："小鬼，你什么时候来朝鲜的？"

"报告首长，三个多月了，"杨林挺起胸答道。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问。

"我叫杨林。他们说就是白杨树的'杨'，树林的'林'。"

三位首长都笑了，连长带笑地插一句："他是四川人。"有伤疤的首长继续问道："你为什么说'他们说'呢？你自己不知道吗？"

"报告首长，我认字不多，"杨林正经地答道。

首长看了看这个年轻的通讯员，像父亲一样亲切地说："那么你要好好地学文化啊。出了国更要认真学。没有文化可不行啊。"

"是，我在学，"杨林说，他有点紧张了。

首长满意地点点头，温和地说："你休息罢，今天你们都辛

苦了。"他又和连长讲了两句，就拿起手电筒往洞外走，其他两位首长同连长也跟着他出去了。

杨林连忙说："首长，外面在下小雨，"他也跟了出去。

外面仍然飘着牛毛一样的细雨，交通沟里的土软软的，有了湿意。手电筒亮了一下，就照出来像灰尘一样飞舞的东西。首长们不穿雨衣，走到了坑道厕所。连长向杨林叮嘱了两句，到别处去了。杨林小心地站在外面等候首长，然后又陪他们回到七班的洞子。

首长们在炕上睡下以后，起初还在谈话，不到一会儿，就有人打起鼾来了。张少林披着雨布在过道口站岗。马申和杨林睡在右边炕上。杨林在黑暗中睁开眼睛。他想：我一定不要睡着，免得到上岗时候误了班。他又想到这一天的经历和见闻。他的眼皮越来越重。他终于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知道了。

"杨林，杨林，"他听见有人叫他。忽然一股冷风吹到他的身上，他坐起来，原来他的被子给人拉开了。他马上想到了上岗的事，便穿上军服轻轻跳下炕来。马申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小声说："快去。我差一点儿不想叫你了。队长早查过岗了。"

杨林说声："多谢你。"他正在扣钮扣，忽然打了一个冷噤。他连忙直起腰，睡意马上消失了。他问道："还下不下雨？"

"下一阵又停一阵，还是那样的小雨，"马申答道；"你把雨布披上罢，"马申正在解衣服的扣子，就把雨布披在杨林的身上。杨林又说一句："多谢你，"就拿起枪出去了。

杨林挎着枪站在过道口。他只听见洞子里的鼾声和风吹

动交通沟坡上树叶的声音。雨住了。可是天上仍然一片黑。他站了一会儿，便走到外面，交通沟里显得更宽、更静。他起初离开洞口走了四五步，后来觉得不对又站住了。他站在过道口外。忽然远方响起了一阵机关枪密放声。他侧耳倾听。过了几分钟，声音又没有了。他一个人立在那里渐渐感到一点冷意。他便掉转身，打算走进过道到洞口看看。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声震耳的响雷，一阵风吹得他的身子微微的晃了一下，砂土、石子落到交通沟里来了。

杨林连忙走到洞口，听见里面有人咳嗽，还有人讲话。他站住再一倾听，有人在翻身，语声却没有了。他把头伸进洞去，里面毫无动静。他想："首长们睡得好，"便轻轻地走到过道口来。

他抖了抖雨布上的砂土。他不再走动了，挺起胸膛站在那里。这一次轮到他的思想走动了。他起初想，只要首长睡得好，我多站几个钟头也高兴。接着他又想：我妈妈，我嫂嫂她们现在都睡得好罢，我在这儿站岗，我也在给她们站岗。他再一想：我好久没有寄家信了，自己写不好信，会写信的同志又忙。我一定要听指导员的话，好好地学文化。不然，将来我回到祖国，红领巾要我签个名，写两句话，我能说我是文盲，不会写字吗？如果我能到北京看到毛主席，毛主席带笑说："小鬼，你把在朝鲜打仗的事情写出来交给我看看。"我怎么办？我能说："报告主席，杨林没有文化"吗？我有了文化就可以把这里的事情写出来，递到毛主席手里，让他老人家看见他的战士在朝鲜干些啥事情。杨林的脸上现出了笑容，好像他当真见

到了毛主席，在听毛主席讲话一样。他又想：我听说毛主席通夜不睡觉，通夜都在办公，他老人家现在一定在埋头工作，在考虑整个国家的大事情，他老人家不会晓得有个杨林在朝鲜山沟里睁大眼睛，只想看看他老人家窗口的亮光。杨林想到这里，不知不觉地睁大了眼睛，他好像看见了毛主席埋着头专心在写字。他感到幸福，他觉得浑身发起热来。……他忽然听见了脚步声，马上挺起胸膛，警惕地提高声音问："哪个？"

"三排长，"三排长答道，的确是那个熟习的声音。三排长黑黑的身形到了他的面前。"你在这里？冷不冷？"

"我刚才接的班，我一点儿也不冷，"杨林挺起胸膛说。

接着又是一声大的响雷，一阵风挟着砂石吹了过来。三排长刚刚说了两个字，马上住了嘴，身子动了一下。杨林也晃了两晃，忍不住小声说了一句："好家伙！"

"你怕不怕？"三排长拍了拍自己的两只胳膊，带笑问道。

"三排长，我不怕，"杨林不加思索地答道。

"对。敌人打冷炮，不过是壮壮他们自己的胆子。他们把千吨万吨的钢铁倒在我们的阵地上，也夺不去我们一寸土地。几下冷炮，就像放几个屁一样，"三排长点头说。

"三排长，我真恨！鬼子害不了我们志愿军，他们可害苦了朝鲜老百姓！"杨林咬牙切齿地说，他想到了那一对母女的结局，想到了崔东玉，想到了住在交通沟里的那些朝鲜老大娘。他又挣出一句："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怒火烧着他的心，烧遍他全身，他恨不得马上拿起枪，拿起手榴弹，向美国鬼子冲过去。可是四周静静的，只有三排长一个人站在他的身

旁。连一个美国鬼子也看不见！他到朝鲜来，还不曾见过一个美国鬼子！

“三排长，你说过，有机会，让我到班里去，你不要忘记啊，”杨林正经地央求道。

三排长点点头微微笑答道：“我会向队长和指导员反映。到时候不会让你闲着的。”他朝过道里看了一眼，又说：“我进去看看，你要小心啊！”便转进过道，到黑暗的洞子里去了。

杨林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在回想三排长的话，好像机会就到了眼前一样。他兴奋地想：我也要上战场打鬼子，我一定不给祖国人民丢脸，我一定不给毛主席丢脸。他又想到了李西成。

三排长从洞子里走出来，看见杨林笔直地站在过道口外，便对他亲切地说：“首长们都睡得好。你要小心啊。”

杨林简单地答一声：“是！”他的思路给打断了。等三排长的脚步声消失以后，他才暗暗地责备自己：站岗的时候，不能胡思乱想啊！

十一

杨林一直站到天发白、马中和张少林起来的时候，他不曾闭一下眼睛。后来张少林拉他一路到坑道里的厨房去给首长们打饭。李连长已经回连部去了。马中把洞子打扫得十分干净，又把用小木箱拼成的小桌，放在炕上．张少林和杨林打了饭回来，在小桌上放好菜碗和饭碗。首长们坐在炕沿上吃早饭。通讯员们端着饭碗蹲在洞口过道里吃。

首长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谈。通讯员也是一面吃饭一面谈话，不过他们吃得快，谈话声音也小。杨林听见首长们在谈长征的事情，连忙几大口吞下碗里的饭，用冷水洗净了搪瓷饭碗，就走到里面去。

讲话的就是那位脸上有伤疤的首长，他正讲到：

“草地上没有人烟，气候时常变化，时而下雪，时而落霰。……我们晚上只好在山脚草坪上用竿子支雨伞或者拆被子搭帐篷，自己待在里面。……有时下大雨刮大风，把帐篷一吹就吹得很远。那时人就只好淋雨。有一次下了一整天的大雨，淋得人只想找个洞钻进去。……我们每天煮一点稀的东西吃。早晨起来一大便就晕倒。……后来实在没有东西吃，就把脚上穿的牛皮鞋脱下来煮起吃。……我们还走到一片陷泥地，

一个不小心陷下去，就起不来，死在里面……"

这位首长讲两句话又吃几口饭，他讲到陷泥地，忽然注意到杨林站在对面靠着炕沿，睁着两只黑亮黑亮的眼睛，出神地听他讲话，便含笑地说："小鬼，你听听也好。你们再也不会过那种日子。"他把碗中最后一点饭送进口里，放下了碗筷，其他两位首长也已经放下碗休息了。杨林便过去收拾饭桌。

有伤疤的首长看见杨林小心地把菜碗、饭碗叠在一起，准备捧出去，他用慈祥的眼光望着这个小青年，和蔼地说："小鬼，你不忙走，听我讲下去。你要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幸福啊。你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我就是在你这种年纪过雪山，过草地。我还记得那年我们过了金沙江以后，就爬上一座高山，正是在大热天，起先还很热，走了三分之二，有的人就气喘得不得了，也有人口渴得没有办法，把路旁的雪水捧起来喝，一喝下去就倒下死了。一坐下来休息，也就站不起来，闭气死了。我看见自己的阶级弟兄就这样白白地死去，也哭过好几次。可是哭有什么用呢？哭过后我还是要硬起心肠往前走。我们就是经过这样的考验来的，小鬼，你们过不上那种日子了。可是你们要知道幸福是来得不容易的！"

"首长说得对，"杨林感动地答道。"这个道理我们在农村的时候也懂得点，所以大家争着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我们到了朝鲜，看见美帝这样欺负朝鲜老百姓，气得不得了，我们更明白：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世界人民就过不了幸福生活。不过我们懂得的东西太少了。我们爱听首长讲的故事。我们希望几位首长在我们连多住几天，请首长多给我们讲些革命故

事、长征故事。”张少林也进来了，他端了一个小锅子的开水，来给首长们沏茶。

“小鬼，你倒会将我们一军，”有伤疤的首长笑道；“革命斗争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不然倒可以请他（他指着中等身材、有连鬓胡子的那位首长）讲点地道战的故事，也可以请他（又指着那位有一张白白的宽脸的首长）讲点监狱斗争的故事。他们都是经过九死一生的。他们的故事对你们也有教育的意义。”

那位宽脸的首长带笑接嘴说：“你不用替我们宣传。这一类的故事在朝鲜多得很。他们的军长、政委，经验就很丰富。”

有连鬓胡子的首长刚刚喝了热茶，他注意到杨林的殷切的眼光，便对宽脸的首长说：“你有空，讲一两个也好，我也想听听……”他的话还没有讲完，郝指导员和王排长进来了，马申跟在他们后面。

杨林连忙捧了碗走出去。他在洞口过道上遇见了刘加亮，便把碗放在小木箱上面，亲热地握住刘加亮的手，含笑说：“你来了，”仿佛他们分别了好久似的。他看见刘加亮左手拿了一束野花，觉得有趣，笑问道：“你给哪个献花？”

刘加亮兴奋地说：“我在路上采来的。我今天不回去了。指导员叫我来换张少林。我带了一个花瓶来给首长插花。”他抽出右手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铜炮弹壳，黄黄的颜色，擦得相当亮。

“首长们喜欢花？”杨林笑问道，他奇怪。在连部的刘加亮会关心这种事情，而在这里的他和张少林、马申三个人连想都

不曾想到！

“你问得奇怪，首长们为啥不喜欢花？”刘加亮带笑说。他蹲下去，从洞口靠壁的那个小水缸里舀了点冷水，盛在炮弹壳里，挑了几枝花插进去，继续往下说：“前几个月我陪军里来的两个文工团女同志到一个地方去，我看见山坡上迎春花开得好看，就折了两枝，想带回连部去。有位女同志就问我：‘小刘，你也喜欢花？’我觉得好笑，就说：‘同志，难道只有你们才喜欢花？’说得她们两个笑了好一会。今天你又问：‘首长们喜欢花？’不知道首长们听见了怎样说？”刘加亮越说越觉得有趣，一直小声笑着，便拿着这个代用花瓶站了起来。

杨林听见刘加亮这样说，自己也觉得好笑，便老老实实地说：“刘加亮，你说得对，你总是比我想得多，想得周到。”

刘加亮看见杨林那两只滚圆的又亮又黑的眼珠，笑答道：“小鬼，不要讲废话了。我看，你就比我聪明。”他要走进洞里，又站住压低声音对杨林说：“你不要忘记指导员要我们帮助你学文化啊。”

杨林感谢地笑了笑，爽快地答道：“你放心，我一定不叫你们失望。”

刘加亮满意地说：“我们相信你，”就捧着代用花瓶进去了。

杨林站在洞口，他想着刘加亮刚才那句话，心里很高兴，他觉得浑身都是力气，他暗暗对自己说：“我说话一定要算数。”他听见张少林在唤他，原来张少林刚从洞里出来，他拉住张少林，想对张少林讲话，他觉得有许多话要向一个熟人倾

吐。张少林小声说："我有事，我要去接大队长。"就大步走了，顺着交通沟小跑起来。

又飞起了小雨。杨林看见张少林没有披上雨布，连忙走进洞里去拿了自己的雨布追出去。他跑了十几二十步，张少林跟着营长一路来了。营长穿着雨衣，正在对张少林讲话。杨林想溜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迎上去，叫一声："报告，"立正，举手敬了礼。

"什么事?"营长看了看杨林，问了一句。

"报告首长，我给张少林送雨布来，"杨林红着脸老老实实答道。

营长点一下头，微微地笑了。张少林连忙说："快到了，我不要，你自己用罢。"杨林拿着雨布站在交通沟边，张少林走过他身旁，对他笑了笑，小声说："谢谢你。"

杨林嘟起嘴说："你用都不肯用，还要道谢!"其实他看见张少林的笑容心里很高兴。

十二

小雨一直下个不停，过道外的土已经湿了。杨林忽然听说营长实习团的首长们要到前面一四〇高地去，把他和张少林、马申带去，他很兴奋，连忙挎好枪，披好雨布，到洞外等着。

不久营长陪实习团的首长们出来了。营长在前面带路，张少林紧紧跟在他后面。杨林走在最后。刘加亮对他挥手说："多拣点炮弹皮回来啊！"

杨林得意地笑笑。他想："炮弹皮你还见得少吗？"他得意的是，入朝以后，他还不曾到过前面的阵地，只听见炮声，看见敌机，连敌人的山头是什么样子，也没有看清楚！今天总算得到机会了。

首长们都走得快。这正合杨林的心意。他巴不得马上就走到那个地方，好好地看看敌人的阵地，说不定还看得见一两个鬼子。雨丝变成了雨点，不断地打在他的脸上和身上。雨珠线似地从首长们的浅绿色雨衣上落下来，把雨衣洗得就像新长的树叶一样。他们通讯员身上披的深绿色雨布浸透了雨水，颜色倒像白杨的老叶。他边走边笑，心里想，这倒是很好的伪装啊。

交通沟曲曲弯弯地往下伸出去，沟里已经有了黏脚的泥，在一个地方出现了水荡，起初只是路中间积了水，人还可以靠着沟边走，但是这样走了二十多米，前面沟里的路完全给带泥的水淹没了。首长们毫不迟疑地继续往前走。杨林听见前面的溅水声，也听见首长们带笑讲话的声音，他索性脱下胶底鞋，光着脚在泥水里走起来，他一面走，一面尊敬地想：首长们已经上了年纪，还到朝鲜来吃苦，我们真该好好地照料他们啊！

走完这一段路，他们顺着交通沟慢慢地转弯，走了不多远，看见一个缺口，营长首先从缺口跳上去，别的人也跟着到了这个遍地杂草和矮松的斜坡。大家一口气下了坡。眼前横着一条小河，河边有好几棵大树。前面走的人就在河边站住了。杨林听见营长在说："是不是就让三个小青年背首长们过去？"他很兴奋，他想我就去背那位会讲长征故事的首长，连忙跑到前面去。

"我看水很浅，我没有问题，"会讲长征故事的首长回答营长道；他又掉头望着宽脸的首长说："你怎么样？你有寒腿。……"

宽脸的首长笑了，他望着水面说："这道小河沟几步就过去了，还是自己走罢。"他就弯下身去挽裤脚，鞋袜反正已经湿透了，他就让它们留在脚上。

营长陪笑道："水深的地方到了大腿，一般也只齐膝盖。"

"那么就这样过去罢。反正今天已经湿透了，"有连鬓胡子的首长也作好了过河的准备，情绪很高地说。

杨林看见到手的任务飞走了，有点失望，可是他也不敢讲出他的心思。他已经把裤脚高高的挽到大腿的上边。他心里盘算：过河的时候，我就紧紧跟着那位首长；我会水，万一有什么事情，我还可以照料他。果然营长过来在他的耳边交代了这个任务。

大家都到了水里，水并不太凉，流得也不急，不过雨忽然大了，上淋下泡，叫人不知道先顾哪里好。杨林并不觉得狼狈，他反而觉得有趣。可是他有些替那位首长耽心。谁知首长两手撩起雨衣，在水里哗哗地一直往前走，而且走得比他快。水花已经溅到他身上来了。首长还带笑催他："小鬼，不要落在后头啊。"他只是好意地对首长笑笑，他原是故意走慢的，为了让首长也放慢脚步。首长可能看不见他的笑容，雨会遮住他的脸，也遮住首长的眼睛。但是首长会听到他的声音："首长，走慢点，走慢点。"他看到水淹到首长的大腿了。他连忙赶上去。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拦住他，水又在朝上涨，一下子就到了他的大腿，他挽起的裤管也挨到了水。首长虽然仍在大步前进，可是他已经站到旁边，伸出右手去搀扶首长了。

"小鬼，你在干吗?"首长回过脸笑问道，雨帽上的雨水滴到杨林的脸上了。首长看见杨林答不出话来，便又说："你不要看我年纪大，身体不及你。叫我在朝鲜当十年八年的小兵，我跟你一样地干得了。"他笑笑，又说："不过，说实话，你比我从前聪明多了。你不用扶我，你先到岸上去。"

杨林听从这位首长的话先上了岸。他等在岸边伸出手去拉首长。首长本来可以自己走上来的，可是看到这只老早伸

出来的手，也就高兴地把自己的手伸了过去。首长觉得这只手很有力，这张年轻的圆脸也很可爱。

他们过了河，雨已经稀了，首长们抖掉雨衣上的水珠，又把裤脚放下了一半。杨林就让裤脚挽得高高的，不去动它。他听见营长在问："要不要休息一下？"三位首长都说："不用休息，"于是他们继续往前走了。河边有一带密林，他们绕过了林子，看到一座石板桥，过了桥，便是一条石子路。他们走到石子路上，雨点又密了。带伤疤的首长刚刚取下了雨帽，现在又把它拢到头上去。

"这里过去也是一个封锁口，不过最近炮打得少了，"营长在前面说，他走得更快了，大家都加快脚步走过这一段路。快到路口，他们看到一个炮弹坑已经用土和石子填满了，不过比路面稍微低一点，积了圆圆的一摊雨水。路口有十多间房屋，但没有一间完好的，有几间只剩了一个空架子。

"他们是给前沿阵地送饭的，"营长走过了路口，站在一间没有房顶和墙壁的屋子前面，对首长们说，他的眼睛和手指头都向着右面。离这里并不太远，在两片水田中间的田坎上，走着三个挑担子的人，他们头上那些有树枝树叶伪装的帽子远远看起来倒像斗笠。他们不是走在一起，每个人中间有四五米的距离。"每天两次，从来没有断过。这些炊事班的同志为了保证前沿战士吃上热饭，真是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前一个时期损失稍微大一些，"营长一面说一面继续往前走，杨林故意落在后面，把那三个挑担子的人多看了两眼，他用手揩去眼睛四周的雨水，却还是看不清楚他们的面貌，可是他觉得他们就

跟他村子里的叔叔、哥哥们一样。他听见营长还在前面讲话，就半走半跑地赶上去。他又在带伤疤的首长旁边了。

"我们刚入朝的时候，在前沿阵地上，我记得是二月初，炊事员把饭装在布袋子里面绑在背上，爬上山给我们送来，拿出来一看饭已经冻成了一个冰块，啃都啃不动。那个时候我们也熬过去了，"营长接下去说，他们已经走进了山沟，正顺着坡的小路上山。雨住了，只是从叶子茂盛的树枝上不断地落下些大的雨点。小路上尽是黏滞脚底的黄泥，营长在前面接连说："小心啊！"可是首长们走得并不慢，他们的帆布胶鞋让黄泥盖满了，连裤脚上也是一片泥水。杨林的赤脚踏在这条有点陡的小路上，好像在平地走路一样。一阵风吹来，打湿了的衣服贴着身子，使他的背感到凉意了。可是他的心仍然很热。"并不简单啊！"他这样想，这三个多月他听惯了这样一句话，这是连、营、团的首长们常常说的，现在他也会讲了。他看见实习团首长们的不停地往上移动的脚，他觉得"并不简单"；可是他马上想到了那三个挑着担子前进的身形，他也觉得"并不简单"。他越往上走，越觉得"并不简单"，他仿佛见到那三个人挑着担子慢慢地朝上爬，他又好像听见带伤疤的首长的喘气声。

他们在半山上找到了一条并不宽的交通沟，就顺着这条交通沟踏过好几个泥荡，翻过了这座山。杨林听见营长说："我们前面，隔两个山头就是敌人的阵地，在观察所就看得见，"他非常兴奋，恨不得马上跑到观察所去，在交通沟里他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他们还得在交通沟里绕来绕去，过了一阵才找

到一个坑道，洞口小，洞子深，望进去里面黑黑的，营长和带伤疤的首长进去，还要弯下身子。

九连的徐连长在洞口等候他们 首长们脱下了雨衣交给八连的通讯员挂在洞口，便同徐连长一起摸进洞去。杨林也跟着进去了。在前面走的人还有并不亮的手电光照路，杨林的头两次在石头上碰痛了，他只好躬着腰慢慢地向前摸，跟着前面的人声转弯。最后他也进了一个小洞。

这个洞子有点像八连那个办公室，也有一个小窗洞，不过多一个将就石头挖成的小坑。杨林看见地方小，张少林和马申都不曾跟进来，他也就站在白布帘子外面听里面首长们讲话。

徐连长开始介绍情况，可是他只讲了几句就被营长打断了话头。营长说："还是先去看了回来再介绍罢。"这句话正合杨林的心思，可是他又听见营长说："通讯员不用都去，带一个去就够了，"他着了急就掀了一下白布帘子，他想向营长提出要求，但自己马上觉得不对，就静静地站住了。他没有料到那个有伤疤的首长接下去说："那么就带杨林去罢。"这一下他高兴极了，便等在门口，跟着首长们钻出了洞子。在洞口张少林含笑问他："头碰痛了罢？"他诧异地问："你怎么晓得？"张少林指着他的头笑道："包都碰起了，自己还不知道？"他摸一下，左眉上果然有一个小包，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但是他不再讲话了，他兴奋地跟着首长们出去，他想就要看到敌人的阵地了。

徐连长引着他们在交通沟里左弯右拐，上上下下，到了几个地方。在路上杨林已经看到敌人的山头了，从雾里露出来

一片深绿，山头就只剩一点黑影，那里还在缓缓地冒烟。他看不到一点动静，心里想，要是跑到前面那两个山头去看看，那多好，一定能够看到敌人。可是他不敢把这个想法讲出来。他跟着首长们看了几处的工事，首长们发出一些问话，徐连长仔细地一一回答了，徐连长还在一个机枪掩体里对首长们说明最近一次打垮敌人进攻的经过（这是第三次了）。他们三个班打退了敌人一个营兵力十四次的进攻，杀伤了两百六十几个敌人，缴获了各种枪五十几枝，自己只牺牲了四个战士，伤了两个。首长们注意地听着。杨林也听得出神。他真愿意把听到的和看到的全吞进肚里，回去慢慢地消化。他觉得这些见闻同他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看过了工事，又在窄小的交通沟里走了好一阵，仍然是左弯右拐，首长们走得快，却都不作声；不过杨林觉得他们是在朝这座山的最前面走，因此他更兴奋。最后他们进了一个坑道。大家都弯下背往里面走，洞身不高，洞里却有几条路，他们走了一会，洞身渐渐地高起来，等到他们可以伸直身子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前面昏黄的灯光，也听见了讲话的声音。前面靠右边有两个炕，壁上挂着一盏用罐头盒子改做的油灯，那根用棉絮搓成的粗灯芯发出来带黑烟的火光，四个战士坐在一个炕上打百分，还有两个战士在旁边看牌。另一个炕上有一个战士用被子蒙头睡觉。

战士们看见了营长便放下牌，站在炕前。营长指着睡觉的战士问道："他怎么啦？"

"他发疟子，刚睡下，"一个脸色黄黄的年轻战士答道。

“叫卫生员给他送点药来，”营长回头对徐连长说。他马上又改正道：“我看还是让他到后面去住几天罢。”徐连长答应了一声：“是”。

“我们战士害这个病的不少啊，”有伤疤的首长关心地说。

“不过最近药来得多了，就好办了，”徐连长接嘴说；“我去年也老是发疟子。”

他们走过这两个炕，进了短短的甬道，埋着头走完这个甬道，进到另一个洞，踏上石阶，走了好几级，到了在岩石上开凿出来的射口了。亮光便是从射口进来的。射口外面放得有作伪装用的松枝。

杨林站在这个圆圆的空地的边缘上，看见营长第一个把两只手按在射口边上往上一纵，伸出半个身子到外面，靠松枝掩护，拿着望远镜看了看，然后跳下来，对有伤疤的首长说：“四道铁丝网，都看得见。”

那位首长接过望远镜上去看了一会儿下来说：“还有一个敌人，好像不是美国鬼子。”

“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营长答道；“上个月偷偷过来一个，给我们抓住了，是美国鬼子从台湾找来的。”

三位首长都看过了敌人的阵地。徐连长没有上去看，杨林也不敢说要看。他只好失望地跟着首长们回到了连部。张少林和马申都在洞口等候他。他们用羡慕的眼光看他。张少林拉一下他的手带笑地轻轻问道：“看到敌人没有？”

“首长他们看到了，”杨林答道。

“那么你没有看到。不要紧，下次就会看到的，”张少林捏

紧杨林的手安慰道。

杨林抬起脸，笑了笑，充满信心地说："下次看到敌人就捉几个活的回来。"他拉着张少林一起走进洞去。

这一次徐连长把首长们请到另一个较大的洞子里去了。这个洞子里原先点了一盏菜油灯，徐连长又点起了一支洋烛，插在用铁丝绕成的烛架上，让首长们在炕上坐下来。连部通讯员端进来一盆燃得很旺的木炭火，给大家烤鞋袜和衣裤。徐连长拿出两包压缩饼干放在炕桌上，连部通讯员用搪瓷饭碗盛了开水端到首长们的面前。

"这座山上的坑道都是在把敌人挤走以后三个月里面挖出来的，其实只挖了一个多月，营长含笑说，他的笑容里流露出对自己的战士的感情。

"真不简单啊！"有伤疤的首长赞叹道。

"都是战士们一镐一镐挖出来的，"徐连长接着说。"战士们的情绪可高了。本来分三班人挖，可是谁都不肯休息，有的你强迫睡下，他又偷偷起来挖。大家都说要早把铜墙铁壁修好，叫美国鬼子来碰得头破血流。"

宽脸的首长突然笑起来："说得好！美国鬼子真的碰得头破血流了！"

有连鬓胡子的首长说："两百六十几，还不算多。我看敌人会再来送死！"

营长说道："首长，我们不会老等他们来送死。我们要出去揍他们。前面两个山头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拿下来。"他满怀信心地笑了。

有伤疤的首长说："对，我们有了铜墙铁壁，就更有把握往前面挤了。"

这时候晚饭端来了，有油煎饼，有鸡蛋粉做的蛋片，有豆芽和豆腐。徐连长留首长们在这里吃饭，首长们也不推辞，就站在炕前，围着盛菜的洋铁盒子，拿起搪瓷饭碗，有说有笑地吃起来。杨林、马申、张少林和九连的两个通讯员都蹲在地上，围着另一个洋铁盒，用漱口缸盛油饼津津有味地吃着。

"你们这里倒很清静，"杨林对九连的通讯员说。

两个通讯员中那个胖胖的是杨林的同乡，他笑了笑，回答道："你嫌清静？你改一天来试试看？"

"你打过仗没有？"杨林激动地问道。

那个四川通讯员摇摇头，说："没有。我本来要求到二班去的，指导员把我留在连部了。不然我至少也要消灭他十个鬼子。"他忽然高兴起来："二班有个战士，也是我们同乡，他还是跟我们一路入朝的，不过年纪大我两岁。他可真勇敢。他身上四个地方挂花，他们那个组剩他一个人，他还用四种武器打垮鬼子几次冲锋，杀伤了几十个敌人，连刺刀上也染满了血。后来排长上来叫他下去，他还在喊：'打，打！替牺牲的同志报仇'……他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

"他叫啥子名字？"杨林出神地望着那张不太厚的嘴唇，半块油饼还捏在手里，他也忘记放到嘴里去了。

"他叫张守义，"四川通讯员答道，"他立了一等功，现在回到祖国休养去了，"杨林听他的声音、看他的面色，也传染到了他那种将尊敬和自豪揉在一起的感情。

“可惜我看不到他了，”杨林说。

“他的样子跟你差不多，他也是圆圆脸、浓眉毛，就是比你高一点儿，”四川通讯员望着杨林说。

杨林注意到了手里的油饼，便送进嘴里大口地嚼烂吞下了。他兴奋地想着那个通讯员的话：一路入朝的，样子差不多，可真勇敢。他觉得这些话是说来鼓励他的。这些话他听起来非常亲切。“张守义能够，我为啥就不能？”他暗暗地问自己。他站起来红着脸笑了。

首长们吃好饭，休息了几分钟，就动身回八连去。雨停了许久，可是天色仍然阴沉。徐连长陪着首长走到洞口。他们转进了交通沟，杨林还回头去望，看见那个四川通讯员站在洞子前面，对他挥手。杨林刚刚带笑说了一句：“我还要再来，”就听见轰隆一声炮响，沟里也震动了一下，他吃了一惊，便闭上嘴急急往前走了。他知道炮弹落在不太近的地方。不过他不能离首长太远。万一炮弹打到这里来，他有保护首长的责任啊。

“快走，敌人现在‘鸣炮欢送’了，”有伤疤的首长含笑说。大家都笑了。杨林望了望这位披着雨布在前面大步急走的首长，心里想：首长都这样镇静，我有啥理由着急？

这以后炮声又响了好几次。敌人好像是毫无目标地在放冷炮，又像是在欢送他们，一直把他们送到三排的坑道。天还不曾黑，但是深灰色的云盖满了天空。刘加亮正把一张纸贴在过道的矮壁上写字，看见他们回来，连忙把纸折起放进袋里去了。

"刘加亮，你在写啥？看都看不清楚了，你还要写字！你把眼睛弄坏了，你还想不想打仗？"杨林等到营长带着张少林走了，实习团的首长们在洞子里休息的时候，拉着刘加亮的手，带笑地小声责备道。

刘加亮笑笑，不作声。

"我晓得你在写信，告诉我，你给哪个写信？"杨林笑问道。

刘加亮笑答道："我不告诉你。"

"你不说，我也明白，你在给你那个对象写信。要不是，你就把信拿出来给大家看，"杨林说着就伸出手去讨信。

刘加亮抓起杨林的手，亲切地说："不要闹了。我倒不怕给你看。不过我才开了个头。哪天有空我跟你扯我自己的事，可是你也要扯你的事情啊。"

"好嘛，我没有秘密，啥事都可以公开。只要有空，只要你肯听，我都可以讲，"杨林小孩似地欢喜地说。他亲热地紧紧握住刘加亮的手。

十三

实习团的首长们在三排住了三个晚上。第四天吃过早饭，首长们动身回到后面去。杨林和刘加亮把首长们送到营部，在那里等候师部派小吉普车来接他们。

这两个八连的通讯员完成了任务，要回连部去了。不知道怎样，杨林对那个身材不矮、脸上有大伤疤的首长感到了依恋。首长昨天晚上还在七班的洞子里对他们三个年轻人讲了飞渡铁索桥的故事。宽脸的首长介绍这位首长是十八勇士里面的一个，有大伤疤的首长却不肯承认。可是首长讲起故事来，眼睛发亮脸发红，话来得多，手动得快，好像那些景象就在自己的眼前一样，好像那些英雄人物火热的心自己全知道一样，他们三个人听得什么都忘记了。他们仿佛也在参加那个极其艰苦而英勇的斗争，争取胜利地完成任务。这种故事给了他们多大的勇气，多大的信心！给了他们多大的鼓舞，多大的快乐！“可惜马上就要跟首长分别了。”杨林惋惜地想道，他不能不羡慕马申，马申至少还可以同首长们在一起过一两天。

首长们知道杨林和刘加亮要回去了，带伤疤的首长含着笑温和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加油干。立国际功，机会难得啊！好好地立它几个大功。我们回到祖国，每天在报上找你们的名

字。找到了，我们会多高兴。"他掏出两个有毛主席侧面头像的金色纪念章，给他们别在军服上。两个人都举手敬礼，有伤疤的首长看见杨林板起面孔，皱起鼻子，闭紧嘴唇，眼睛一闪一闪，不说一句话，他亲切地笑了笑，说："小鬼，记住我的话！能够到朝鲜来，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说老实话，我都不想走了。"

杨林仍然板起脸勉强吐出两个"是"字。刘加亮恭敬地问道："首长还有什么吩咐吗？"他听见首长们都说："没有了，"又敬一个礼，便拉着杨林走了。

杨林不曾忘记敬礼，但是他忘了讲话。他跟在刘加亮后面跳上了长满矮松和杂草的山坡。刘加亮忽然回过头问他："杨林，你今天怎么啦？刚才你一句话都不讲。真是好首长啊！"

"你还看不出，我拚命在忍！我就怕一开口忍不住闹笑话，"杨林带笑答道，可是他自己也知道眼泪终于流下来了。

"怎么你一下子就变成大姑娘了？你是不是嫌这几天雨下得不够，你还想添一点？"刘加亮故意嘲笑道，他并不曾回过头来看杨林的泪脸。

"刘加亮，你不要挖苦我，我跟你讲正经话，"杨林着急地说："我自己也不明白为啥心肠这样软。首长对你好，也不该动不动就哭。说真话，我在跟我自己生气。"

刘加亮回头看了杨林一眼。杨林的脸上已经没有眼泪了，可是还皱起浓浓的眉毛，脸色仍然是红的，鼻息也很重。刘加亮同情地笑了笑，好意地安慰道："你用不着跟自己生气。

以后多想想首长讲的那些话，那些故事。你想想看，首长经过多大的考验，立下多大的功劳。我们要牢记他的话啊。”

“对，你说得对！我们真该好好地加油干！”杨林忽然兴奋起来认真地点头说：“要是立不了功，怎么有脸再看见首长？”

“我们回去找王理明谈谈，我们三个人订个计划，又要挑战竞赛，又要互相帮助，一定要做到首长说的那样。你赞成不赞成？”刘加亮高兴地说。

“我当然赞成，”杨林爽快地答道，他笑了：“不过你要多多帮助我才好。你比我来得久，你又打过仗，立过功。”

刘加亮摇摇头说：“我说过那个小功不算，你不用提了。我们从头来比，什么都要比——”

“有一件事我就不能跟你们比，我不会写信看报，”杨林连忙插嘴说，他忽然想起了刘加亮写信的事情。

“你没有文化，就认真地学嘛，”刘加亮答道：“我不是跟你讲过，指导员已经给我们派下任务了。今后你不好好地学，我们都要挨批评。”

杨林抬起头笑答道：“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说实话，我这两天很想给我妈写封信，我有好多话要说，却写不出来。”

“不要紧。哪天找个时间，你说，我替你写，还不是一样！”刘加亮说。

“好嘛，我先谢谢你，”杨林笑答道：“我有一肚皮话写不出来，真急死人！”他一直跟在刘加亮后面跳来跳去，刘加亮忽然停下来，弯着身子，折了一枝黄色的野花拿在手里，回过头看他一眼问道：

"你入朝后寄过几封信回家？"

"你忘记了？我入朝才三个多月，连一封家信也没有接到。我也只打回去一封短信，"杨林答道。

"快走，回家有空我跟你慢慢地扯，"刘加亮含笑地说，又拔步往前急走了，他仿佛看见自己母亲那张笑得眯起了眼睛的、满是皱纹的瘦脸。他又加一句："我的信也还没有写好，我们一块儿寄出去。"

"我妈接到我这封信，一定很欢喜。我要跟她说，我在朝鲜过得很好，我决心要杀敌立功，"杨林兴奋地说，他好像也看见自己母亲包着白布帕子的前额下颧骨高高的长脸，露出了笑容。

他们两个一路上说说讲讲，不久就到了连部。

指导员和病愈后昨天回来的文书在家。王理明跟着连长到三排去了。刘加亮向指导员简单地汇报了情况，指导员又差他到二排去送信。杨林满心以为当天就可以把家信写好，却没有想到这一天任务特别多，他们三个轮流着到处跑，几个排都跑遍了。到晚上熄灯的时刻，他们三个人才又聚在一起。杨林已经忘记写信的话，他却想起了长征的故事，他还说，要把首长的故事讲给王理明听。可是他钻进炕上铺好的被窝以后，闭上眼睛，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其实也不能说杨林闭上眼睛就什么都不知道。他想的事在梦里都实现了。他回到了家，见到了他的母亲。母亲拉住他的手哈哈地笑，叫嫂嫂煮了三个鸡蛋给他吃。哥哥当了劳动模范，在县上开了会回来，说是在报上看到弟弟的名字；在

朝鲜立了三等功。母亲笑得更高兴了。他却挣红脸抓住她的手，着急地说："三等功不算啥，我不立头等功不回家！"他刚说完，自己觉得不对，明明已经回家了，还说不回家。再一急，就醒过来了。

洞子里有一股阴湿气味。王理明和刘加亮发出一起一落的鼾声。杨林觉得背上发冷，想侧起身子睡，四肢无力，又懒得动。他正在迟疑不决的时候，忽然听见刘加亮讲梦话："我们是团员，应该起带头作用，将来要是收女的，你也得去……"刘加亮说到这里，翻一个身，不响了，过了片刻又发出响亮的鼾声来。

第二天清早天濛濛亮，杨林起来，还记得刘加亮的那句梦话，可是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找到机会偷偷问他："女的"是什么人。刘加亮听见问话，不着急，也不红脸，只是笑笑，先说一句："我那个泄密的毛病又发了，"然后坦率地答道："我们本来就要结婚，我参加抗美援朝才把日期改了，等到把美国鬼子赶下海去再说。"

"你是不是在给那个人写信？"杨林感到了兴趣，继续问道。

刘加亮正在把高粮米饭大口地送进嘴里去，吃得津津有味，王理明在旁边代他回答："别人都寄了两封信来了，还说做了一个漱口缸的袋子托慰问团的代表带到朝鲜来。你说要不要写回信？"

杨林不加思索，就答道："当然要写。"

刘加亮吞完了这几口饭，又到水缸那里去洗了饭碗和匙

子。他仍然不害羞，他微笑地说："你就叫王理明讲罢。我自己讲起来，倒是干巴巴的。他讲得高兴了，还会扯他自己的事情。你问问看他那个放漱口缸的袋子是哪里来的？"

"不用问，我告诉你罢，是我自己从祖国带来的，"王理明忍住笑答道。他和杨林也吃好饭，把碗筷、匙子都收起来了。

"谁给你做的？"刘加亮追问一句。

"朋友送的，"王理明说着，噗哧笑了起来。

"你们都不要笑了。我也有一个。"杨林正经地说："我自己也不晓得是哪个做的。我刚到师里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个，说是朝鲜老乡送来的慰问品。上面绣了一枝花。还有十几个朝鲜字，我不认得。我没有用它，我收起来了，我打算将来带回祖国送给我妈做个纪念，让她常常记得朝鲜人跟我们是心连心的。"

"你说得好。不管是谁做的袋子，用心都是一样：好好完成任务，早早打退敌人，"王理明满心高兴地说，他想起了自己离开上海的前两天听到的那句话："希望你早日完成祖国人民交给你的任务，当了英雄回来。"波纹式的又亮又黑的浓发和瓜子脸上一对浅浅的酒涡又在他的眼前现了一下。

刘加亮含笑点了点头。但是他故意向王理明问一句："你想早回国吗？"

王理明正要回答，指导员走过来了。指导员笑问道："你们在讲些什么？现在不要乱想回国不回国的问题。最要紧的是多打击敌人！"

"指导员，我们晓得，"杨林老老实实地答道。

"你们知道就好,"指导员满意地说。他把他们三个看了看,又接下去说:"王理明和杨林,你们两个跟我到三排去,老乡们要搬家了。刘加亮留在家里。"

刘加亮听说要帮忙老乡搬家,很兴奋,便向指导员央求道:"指导员把我也带去罢。"

指导员摇摇头说:"你不能去,我要留你看家。"

刘加亮觉得有点扫兴,又说:"文书不是在家吗?"

指导员笑了笑,说:"用不着去这许多人,你还有别的任务。"

刘加亮听见这样说,就答应了一声"是"。他望着指导员一行三人的背影转了弯,一个人高高兴兴地把洞子前面打扫了一阵,看见地上干干净净,壁上那个简单的小橱里碗筷等等放得很有秩序。他便走进洞去找文书。

年纪比刘加亮大三岁的金文书正俯在指导员那个办公小桌上专心抄写文件。刘加亮在他的旁边站了两分钟,他连头也不抬一下,话也不讲一句。从窗洞射进来的光线已经不能照亮整个洞子了。可是他还分辨得出纸上的字迹:指导员打的草稿和他自己一行一行写下去的字。刘加亮继续站了几分钟。金文书仍然不觉得旁边有这个人似的。

刘加亮终于忍不住开口了:"文书,我到你们那个洞子去写信,有事情你来叫我。"金文书一边动笔,一边答应。刘加亮就走到旁边那个较大的洞子,点燃了油灯,伏在大炕上,拿出那支从祖国带来的自来水笔,摊开已经开了头的信纸,准备接着那天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他拿起笔好像就看见那张椭圆形的晒黑了的脸，不厚不薄的嘴唇，圆圆的眼睛和一根黑黑的粗辫子。他马上想起最近那封信上的话："我真恨他们总不让我到朝鲜来。我也知道志愿军中有女的，我们村里也有人上省听过女志愿军的报告。可是我要报名抗美援朝，他们总不收我。加亮哥，你说将来要收女的，你给我想个办法罢，让我早日来到朝鲜。我也想和你一样立个国际功，那才光荣啊！"他忍不住笑了，小声地自言自语："你真傻，叫我想办法？指导员，营长，二〇一他们都没有办法。我有办法？人家都是早来的。"他把自来水笔笔头放在自己的鼻尖上，一面又在想要写些什么话才适当。他忽然满意地微笑起来，仍然轻轻地对自己讲话："当初我出来，你还哭过，我们谈了一天，你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搞通。头半年你连一个字也不写给我，现在你自己也想到朝鲜来了。这真是大进步！"他好像马上见到了她那对哭红了的眼睛，可是他一点也不难过，他反而非常高兴。他想道："我应当多多鼓励她，帮助她，常常跟她挑战竞赛。"上次他刚写完他在朝鲜一切都好，决心多杀敌立大功……这一段，他便把笔尖放到信纸上兴奋地写起来。他叫她不要记挂他，他劝她安心在村里劳动生产，在民校教妇女认字念书。他说，要立功到处都是一样。他说，我们在朝鲜打美国鬼子就是保卫祖国，让你们安心在家劳动、生产。他提出竞赛的办法，他还说："看谁先上北京？"他又提起尚未到的慰问袋，还写上感谢的话。他甚至说，将来上阵杀敌都要把它带在身边。最后他提到了自己的母亲，那张灰白头发下面满是皱纹的瘦脸又在他的眼前晃了一下，那对小眼睛

上还有眼泪，今年过春节，母亲因为媳妇跟着大儿子到天津去了，小儿子远在朝鲜，一个人在家里哭过，这还是他一个要好朋友在信里告诉他的。那个朋友去给他母亲"拜年"，正看到她揩眼泪。他想到了母亲，想到了这些事情，他便写道："你不忙的时候，请你多去看看我娘，常常对她讲解时事，多讲些在我们祖国发生的大事情，让她也能同大家一起向前跑。我日后胜利回家，一定重重地谢你。"他写到这里，自己忍不住又笑着说："这些话她都知道，还用我说？"他想把它们勾去，可是他刚刚涂掉一个"你"字，便停住了笔，想了一下，又在旁边添上"你"字，这个字可以说是勉强挤进去的。他这封信里意思虽多，话却不长，字并不小，行与行之间又不留空隙，写到这里，信纸上也没有空白了，他在边上写下了这么一行："致以同志的敬礼。"下面署上名字"刘加亮"和日期（他只写了"九月"两个字），就把笔放进套内，插在军服的左边袋子里了。

他坐起来，拿着信纸念了一遍，觉得可说的话都写在信里了，感到一阵轻松，他满意地想：她会明白的。他把信纸折好，放进早已写好地址的信封里，就跳下炕来。他这时候才觉得眼睛酸痛，把它们揉了两下，吹灭了还在冒黑烟的油灯。

刘加亮又走到办公室，金文书仍然俯在条桌上写字，不过已经点起了油灯。油灯放在一个高高的罐头筒子上，用棉花搓成的灯芯也在冒黑烟。刘加亮从抽屉里拿出胶水瓶来，把信封黏好。他又唤一声"文书"。这次金文书过了片刻，忽然放下笔，抬起头来，问一句："是不是信写好了？"

刘加亮把信封放到金文书的面前，含笑说："交给你一起

送出去。"

"正好，后天就要收信了，"金文书点头答道；他看到了受信人的名字，微微笑起来，又说："王秀兰同志。你到底给人家写回信了。我记得第二封信也来了好久了。王秀兰同志一定早急坏了！"

刘加亮抱歉似地笑道："有什么办法呢？你我都不是专门到朝鲜来写家信的。"

金文书摇摇头说："你跟我不同，我入朝一年半，一封信也没有寄过。我就是孤零零一个人，我父母都给日本鬼子杀死了。"他收起了笑容，可是他那张长方形的脸上并不曾露一点忧愁的表情。他继续说下去："部队就是我的家，这个革命大家庭比什么家都温暖。我愿意一辈子都留在部队里。"

"我也愿意在八连干一辈子，不过——"刘加亮来不及把话说完，就看见李连长走了进来，连忙咽住了以后的话。

"指导员还没有回来？"李连长匆匆地问道。

"没有，"刘加亮答道。

"你到一排、二排和炮排去，把排长们请来，"李连长仍然匆忙地对刘加亮吩咐道。

刘加亮答应一声"是"，他知道连长在考虑什么重要事情，也不耽搁，转身就往外面走。

李连长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从军服左边袋子里掏出笔记本，仔细地翻看。金文书仍然坐在指导员的座位上，校对他刚刚抄好的文件。

十四

指导员带着杨林和王理明走到三排，听一个战士说排长到前面交通沟里去了。他们便继续朝前走去。敌人还在一发两发地打冷炮。他们走过那个新近填好的炮弹坑，杨林央求道："指导员，让我看一下罢，只耽搁两分钟。"

指导员微笑道："你的记性倒好，"他第一个跳上了矮矮的斜坡，杨林和王理明也跟上来了。他一边听杨林对王理明简单地讲当时的情景，一边看这个微微隆起的圆堆，心里也有点不好过。土堆四周已经种了些马尾松和草花，不知是哪一个战士在土堆前竖了一个木牌，写上一行歪歪斜斜的中国字："英雄的朝鲜母女之墓"。王理明称赞这几个字用得好；杨林却说，还应当写出两个人的名字来。

校正机还在他们头上绕大圈子，太阳离山头已经不远了。敌人朝一四〇高地接连打了几颗烟幕弹。

"快走，两分钟早过了，"指导员温和地说，他首先跳下去，走进那个较窄的交通沟。杨林他们又跟着跳下来了。他们还在后面谈那母女的事情。指导员不作声，他仍然觉得好像有一只手在抓他的胸膛。他伸起右手拿五根指头用力摸了一下两边脸颊。这些年他见过的死人不知道有多少。他亲手杀死的

坏人也不止十个八个。可是那些无辜的牺牲者的血常常像火似地在烧他的心。他常常感觉到自己有责任保护那些无辜的人。现在他不能不在心里宣誓：美帝国主义不消灭，共产主义社会不实现，我决不回家。他回过头，对后面两个小通讯员说："小鬼，你们好好记住我的话：在这里用不上婆婆妈妈的心肠。要解决问题，只有狠狠地揍！这些天美国鬼子在平壤扔了多少凝固汽油弹和定时炸弹，你们说该怎么办？你们还是去哭那些牺牲的人，还是硬起心肠去打鬼子替死人报仇？"

"报仇！"杨林和王理明好像事先约好地同时答道。

指导员满意地笑了。他又说："报仇不是一句空话。你们要打鬼子，就得好好学习啊。固然不学也能打仗，可是学得好，打起仗来更有把握。"

杨林抢先答道："我首先要学会使用各种武器……"他还不能了解指导员言外的意思。王理明也不了解。杨林还想往下说，可是指导员看见三排长向他们走来，就大步迎上去，不再注意杨林了。杨林和王理明却一直在考虑指导员的话。

"都准备好了。老乡们情绪很高，"三排长一边走，一边对指导员说："我就照上级的指示安排，七班、八班各出五个人帮忙搬东西，由八班长带去。战士们听说是帮忙老乡搬家，大家抢着报名，有的人还想跟着车去看看那边的条件究竟好多少。"

指导员笑了笑，说："用不着。那边的里委员会早已安排好了，有人接车。本来他们要派人来接，后来商量好我们负责送老乡上车。"

"这样更好，"三排长答道。他又问一句："现在就出发吗？"

指导员已经看见了老大娘们的笑容，听到了她们亲切的招呼。他忽然问三排长道："伪装弄好没有？"他听见三排长回答："弄好了，"又抬起头向上看，校正机刚飞过头上，便说："等我们去看一下，就出发罢。"

有几个老大娘跑过来和指导员握手，说着告别的话和感谢的话。不用说小张在这里充当译员。老乡们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除了每个人顶在头上的大衣包外，还有一些罈罈罐罐，有的装在木箱里，有的放在新编好的草袋内，有的就用麻绳绑在一起，它们都堆在交通沟的边上。帮忙搬家的战士们已经在军帽上加了伪装。他们正在跟老乡们谈话。

杨林拉拉王理明的袖子，小声说："我们也要搞点伪装才好。"

"不要紧，路上搞点树叶插在帽子上就行了，"王理明毫不在乎地答道。他的嘴刚刚闭上，就听见说"出发了"。他连忙弯下身子去抱起了一个草袋。杨林却把一个木箱扛在肩头。他们都是听从三排长的安排的。三排长还拍了他们两个肩头，说："到坡上要搞好伪装啊。"

战士们在前面走，老乡们跟在后面。指导员在交通沟里陪她们走了一段路，后来他要上坡往另一条路回连部去了，好几个老大娘大声说："指导员，再见！"她们用一只手扶着头上顶的包袱，挥着另一只手，几个人的声音同时说："你要来看我们啊！"笑容还挂在脸上，眼泪却像线一样流下来了。杨林看

见指导员在坡上挥手，又听见说了一句："阿妈妮，我要去看你们！"就转身走了。他便对走在前面的王理明说："指导员今天也不好过。"话刚说完，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湿了。

"我到八连快四个月，还是头一次看见指导员动感情，"王理明小声说。他回头看杨林一眼，关心地嘱咐道："等会上车的时候，你要坚强些。不要弄得哭哭啼啼，不好看。"

"你放心，我不会哭的，"杨林故意粗声答道，他勉强用笑容来掩饰他那对湿了的眼睛。他暗暗地想：我刚才不好过，因为听见了指导员那句话。我当初离开家也是高高兴兴的。我跟这些阿妈妮才见过几面，话都没有讲过，分别的时候，我不会哭。况且她们是搬到安全的后方去……

可是这一行人翻过了一座山，走过田畔的小路，穿过一个荒凉的在三四个月前遭到敌机轰炸的小村庄，两旁栽着栗树的公路就在眼前。上弦月已经高高地挂在天空，而且一直在白云堆里航行，在朦胧的微光下，看得见一辆嘎嘶车黑黝黝地停在路口一间只剩下空架子的房屋前面。驾驶员和他的助手正站在车旁讲话，看见老乡们来了，便走过去欢迎她们，帮忙她们拿包袱，搀扶她们上车。

老大娘们只顾跟战士们告别，连包袱和罈罈罐罐都不管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忙乱。后来人和东西都上了车，把车子挤得满满的。老大娘们还在车上跟下面的战士讲话。小张从袋子里掏出一只小鸡递给怀里抱着一岁多小孩的少妇，另一个战士也掏出一只小鸡交给坐在少妇旁边的老大娘，老大娘把小鸡捧在手里，刚说一声"谢谢"（她说的是读音不准确的中

国话)，忽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从八班长开始，战士们一齐挥手高声说："阿妈妮再见！"

"亲人们，儿子们，再见！"老大娘们在车上挥手说，一下子全哭起来了。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大娘一直望着杨林，谢谢他帮忙搬木箱，说了几声"再见"，这时忽然在车上翻一个身正要俯下身子去抱杨林。可是车子动了，车上的人连忙拉住了她。司机同志按了按喇叭，战士们往后一退。车子开进了公路。留下一片"来啊，来啊！"的哭声。战士们还隐约地看见那些一直在挥动的白色的胳膊。

杨林忘了自己地跟着车子跑了几步，大声叫着"阿妈妮，再见！"可是嘎嘶车已经隐在栗树枝叶间看不见了。他听见王理明和八班长都在唤他，连忙转身跑回来。八班长温和地对他说："把眼泪揩干，回去。"他答了一声"是"，就埋下头揩去了脸上的泪水。

杨林同王理明走在一处，他一直不好意思跟王理明讲话。他暗暗地责备自己为什么这样婆婆妈妈的，动不动就流眼泪。他知道王理明一定会批评他，他找不到话替自己辩护，他准备接受批评。他们又走到了田畔的小路，高高的、密密的水稻发出杨林熟习的香气。他不觉朝那一片青绿望了两眼。他想到了家乡，他的脸上又浮出了笑容。左面田里的水淙淙地在他的脚跟前流过，穿过这小路上的一条断痕，流到另一块稍微低一点的右面田里去。这水声在他的耳朵里也显得非常亲切。

他们到了山脚，杨林看见别人都在前面，只有王理明离他最近。他便对王理明说："我没有听你的话，我要向你检讨。"

王理明忽然拉一下杨林的手，笑了起来。他低声说："我们一道检讨罢，我并不比你坚强。"他又加一句："快走，不然，八班长又要讲话了。"杨林想想，也觉得好笑，就跟着王理明往前跑去。

大家翻过了山，杨林的军帽已经湿透了，他揭下来当作扇子当胸搧了两下。王理明在旁边说："快戴上，不然你会感冒的。"杨林真的把帽子戴上了。王理明走了一阵，又含笑对杨林说："我自己想想也觉得滑稽，我会管你，却不会管自己。"

杨林老老实实地接腔道："我自己也想不通，我离开家，我跟我妈分别，我都没有掉过眼泪，我妈眼睛倒红了，我总是高高兴兴的。怎么到了朝鲜，眼泪一下子就多起来了？这怎么好？"

"我也是，我们在上海走的时候，车站上敲锣打鼓，拍掌唱歌，好像在办喜事一样。多光荣啊！你哪里会有眼泪？"王理明回忆道。他又加一句解释："我们的人并不是没有感情。"

"感情再多，也要有行动来表现。不打垮美国鬼子，要感情来做啥用？"杨林正在想这个问题，忽然无意间大声说了出来。

前面有个八班的战士听见杨林的话，觉得正合自己的心意，就接下去说："对，没有行动，再说得好听，也是空话。我们写决心书向上级要求，把我们换到前面去。大仗也好，小仗也好，总之，我们要打美国鬼子。"

另一个战士响应地说："大家都写决心书，我保险没有一个人不写。坦白地说，要不狠狠地揍鬼子一顿，这些眼泪都是

自流的。”

杨林兴奋起来，他说：“我一个人写两份！”

八班长讲话了：“大家回去再商量罢。写决心书尽管写，要求换到前面去尽管要求，可是答应不答应是上级的事情。上级会有适当的安排。大家不要有急躁的情绪啊。”

“八班长，决心书都还没有写，你就给人家扣帽子了，”杨林不同意地说。

“小鬼，你不要以为我就不着急？刚才那些哭得伤心的阿妈妮，谁不像我们的娘，我们的奶奶？”八班长说着，也动了感情了。“她们天天在受罪，美国鬼子天天在欺负她们，害她们，我们怎么能够不着急？我大腿上还有一颗美国子弹没有拿出来，我亲手报销了敌人的一个地堡，总有四五个鬼子死在里面罢。可是这算什么呢？难道我就愿意整天憋在洞子里头？我也想夺它一两座山头过来，我也想早一天把美国鬼子赶下海去，让阿巴基、阿妈妮过幸福日子。我看，要打仗，机会也不远了。你们这两个小鬼心思多，你们说指导员为什么差你们两个来？我看就是为了锻炼你们，让你们多受点教育！”

杨林拉了一下王理明的袖子，悄悄问一句：“八班长说得对不对？”

“我看可能有道理。我回去问问刘加亮，”王理明迟疑一下，小声回答道。

“我倒希望他说得对，”杨林激动地再说一句。

“为什么呢？”王理明故意问道。

“他说打仗的机会不远了，”杨林答道。“王理明，我真希望

能早点打上仗。我又不是来白烧朝鲜的柴，白喝朝鲜的水！”

“我们找个机会跟指导员谈谈，向他汇报一下我们的思想情况，”王理明以为自己想到很好的主意了。

“对，”杨林同意地答道。他又想起了八班长的最后一句话。

这两个通讯员不久就跟八班长和七、八班的战士们分路了。他们直接回连部去。他们在路上讲话不多，因为两个人都在想八班长的那句话。

山路是暗灰色的，山坡也是暗灰色的，多云的天空也是暗灰色的。板门店谈判区的那根探照灯柱也是暗灰色的，它只比天空稍微亮一些，而且今天显得短些了。

杨林朝那根灯柱望了一眼，他忍不住大声说了出来：“你不要和平，你要打，好罢。我要狠狠地打你个落花流水！”他又踏着软软的草跟着王理明往前急走了。他还听见王理明在前面带笑说：“你讲得好，我一定要向指导员反映。”

十五

这两个通讯员回到连部，已经过了熄灯的时间。他们快到坑道口的时候，忽然听见旁边坡上有人在问："谁？"他们讲出了自己的名字，回答了口令。岗哨让他们过去了。他们到了坑道口，正看见排长们鱼贯地走了出来。三排长见到他们的身形，就问道："你们回来了，车子开了吗？没有问题罢？"

"我们一到，车子已经等在那里了，"王理明答道；"我们看见车子开了才回来。路上没有一点事故。"

"好，"三排长满意地说。其他三个排长都走了，他还站在坑道口跟他们讲话，他又问："没有人哭鼻子罢？"

"老大娘都哭了，"杨林连忙答道。

三排长笑了，他说："我问的不是老乡们，是你们。"

两个年轻人都迟疑一下，还是杨林先开口说："老大娘一哭，我们的眼泪也收不住了。"

三排长又笑了笑，轻轻拍一下杨林的肩头，说："我也知道你们会哭鼻子的。我刚入朝的时候，也流过好些不值钱的眼泪。现在我只要流敌人的血。"这最后一句话是用力说出来的。他还问："小鬼，懂吗？"他听见两个年轻人齐声回答："懂！"又说一句："那么你们要记住我的话，"就转身走了。

杨林和王理明走进坑道，到了办公室，指导员和连长都在那里，王理明简单地汇报了情况，指导员和连长又问了几句话，王理明一一地回答了，他觉得杨林在旁边用鞋尖轻轻踢他的左脚，踢了两次。指导员便说："你们去睡罢，时间不早了。"两个年轻人答应一声便走出了办公室。

"你怎么不开口？就让我一个人讲！"王理明抱怨杨林道。

"我讲啥？我讲我流眼泪，指导员会批评我，"杨林老实地答道。

"那么你为什么踢我的左脚？"王理明问道。

"你不是说要跟指导员谈谈，表示我们的决心吗？"杨林提醒他说。

王理明轻轻地笑了两声，说："你这样性急，是不是明天就要打仗？"

杨林自己也觉得好笑，他不再谈这个问题了，就说："怎么没有看到刘加亮？"

王理明接下去说："刘加亮不是在这里吗？"

刘加亮果然从旁边另一个洞子走了出来，低声说："你们才回来？"他一只手拉着每人的一只胳膊，同他们一路走到外面。他还说："有一件事情告诉你们，我们可能要到前面去。"

"你怎么晓得？"杨林惊喜地问道。

刘加亮坐到炕上去，正在脱衣服，便郑重地说："你不要乱说啊。我是猜到的。我听队长、指导员同排长们谈话的口气，觉得我们可能要换到前面去。那么打仗的机会就来了。"

杨林扫兴地叹了一口气说："原来你是猜到的。我还以为

你真正得到消息了，”他也开始脱衣服，准备睡觉。

“杨林，我问你，家信还写不写？我的信已经写好了。你要写明天就抓紧时间写罢，”刘加亮换了话题，关心地说。

“好嘛。明天我自己来写，只要你们两个肯给我帮忙，我不会写的字就向你们学，”杨林忽然下了决心地答道，他一下子又高兴起来了。

“你肯学就好了，我们还在指导员面前夸下了海口，要写保证书，包你学好文化！”王理明刚刚钻进被窝里，听见杨林的话，就带笑地鼓励道。

“你们放心。我打仗都不怕，难道还害怕学不好文化？”杨林充满信心地说。

刘加亮和王理明倒下去不久，就在打鼾了。杨林却一直在想刘加亮的那几句话。“究竟是真的，还是他在开玩笑？”他想了一会儿，眼皮快要睁不开了。他又翻一个身，忽然想起八班长的话。“八班长也说机会不远了。他还说指导员要锻炼我们。他又怎么晓得？”眼皮越来越重了，思想也越动越慢了。他最后闭上了眼睛。他真的跟着部队到前面去了。他守在一个单人掩体里，几个敌人哇哇地嚷着爬了上来。他手边有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他端起枪来打不响。扔出手榴弹不爆炸。一样武器都不会用。他就搬石头砸敌人，居然把敌人打退了。可是第二次几十个敌人一拥而上。他急得没办法，就拿起手榴弹乱打，忽然一颗手榴弹在他面前爆炸了。他一震就醒了过来。但是洞子的确震动了一下，巨响的余音还在，他又听见王理明半睡半醒地问：“哪里落了弹？”他才明白是炮声

把自己从梦中惊醒了。他也抱怨一句："在这里光听炮声，光挨揍！哪里有到前面好？他还想找王理明讲话，谈谈他的心情。可是他只讲出半句，就听见王理明的鼾声。他觉得好笑，他的眼睛也慢慢地阖上来了。……

杨林听见了刘加亮和王理明的声音，才睁开眼睛，天已经大亮，那两个通讯员也已经叠好被，穿好衣服，洗好脸了。他连忙从炕上跳下来，带笑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叫醒我？"

王理明眨了眨眼睛笑道："我们早叫过了，就是叫不醒你！"

"叫不醒，你就打嘛，"杨林觉得好笑地说。

"不要乱扯了，"刘加亮正经地插嘴道："快去洗脸。吃过早饭队长要带你到九连去。"

"带我去？"杨林惊讶地问道，他还疑心刘加亮在跟他开玩笑。

"说是你那天去过，"刘加亮短短地答道，他本来还想多讲几句，话到口边又被他咽下去了。他含笑地看了杨林一眼，又看了看王理明。

杨林知道刘加亮不是在开玩笑，他心里一动，想到一件事情，脸上现出了喜色，也不再说什么，就匆匆地洗了脸，和王理明一路去打了早饭回来。

指导员不在家。李连长、金文书和通讯员们在一块儿吃好了饭，司务长忽然来了，接着指导员也回来了，还有二排长和炮排长跟在后面。连长叫文书和王理明留在连部看家，他便和其余的人向前面出发。虽然是阴天，可是并无下雨的迹

象，所以大家都准备了伪装。

路是杨林走过的，还是他前几天看见的那个样子。只是路上多了几个炮弹坑，交通沟里没有烂泥。他走在最后，望着前面一行人，心里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去？他就轻轻拉一下刘加亮的袖子，小声问一句："你晓得不，究竟有啥子事情？"

刘加亮带着笑容，低声答道："到了九连你就知道了。"

他们到了九连，杨林在坑道口见到那个四川通讯员，四川通讯员等李连长和别人都进去了，便拉住杨林小声说："你们连里的一排长同三排长已经来了。"

"今天有啥子事情，你晓得不？"杨林忍不住又问一次。

"我不晓得，没有听见队长同指导员讲起，"那个通讯员答道；"是不是要打仗了？"

"你们不知道，就不要乱猜，乱扯！"刘加亮从里面出来，忍住笑，装出严肃的表情低声警告道。

杨林不作声了。他忽然想起了刘加亮昨夜讲的那句话。他偷偷地看了看刘加亮的脸色（刘加亮正在和四川通讯员讲话），他觉得刘加亮一定知道队长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来的，他觉得他自己也有些明白了。他很兴奋，又很高兴。他暗暗地想：要是真的成为事实，我一定向队长、向指导员要求，我一定向他们说出我的决心。我今天晚上就给我妈写信，表示我的决心。

十六

杨林给他母亲的信并不是在当天晚上写成的。这封信花了他整整五天的功夫。

第四天晚上排长们来向连长和指导员汇报的时候，杨林还在指导员和文书睡的洞子里写家信。他伏在炕上，望着眼前摊开的白纸，用他入朝前在安东买的那支自来水笔，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些歪歪斜斜的字。他这样地写着：

妈：儿入朝三个多月，没有接到一封家信，不晓得你老人家身体好不好，儿很挂念。上个月儿打过一封信回家，不晓得你老人家接到没有。儿在朝鲜前线身体很好。请你老人家不要担心。志愿军中有很多像儿这样的年青人，各省人都有，大家互相帮助，就像是亲弟兄一样。儿现在要学文化，又要学打仗。儿一定好好学习。儿看到朝鲜老乡受美国鬼子欺负，杀害，心里很难受，儿恨得不得了，赌咒要替朝鲜老乡报仇。儿一定要努力杀敌立功，不把美国鬼子赶下海去，决不回家。儿心中没有别的希望，只望你老人家身体健康，哥哥、嫂嫂搞生产搞得好，当上劳动模范。只望儿能够多多杀敌立功，给祖国争光，给

毛主席争光，给我们家乡争光，给你老人家争光。儿只有这番心思，儿每时每刻都记在心头。

等你老人家等儿的好消息。此致

敬礼

儿 杨林 九月

这已经是他写的第六张信纸了。他在头一个晚上就写坏了两张。他起初一个人偷偷地写，某个字写不出来就用记号代替，或者留个空白，然后去向文书或刘加亮、王理明请教，照他们的笔迹摹写。他不会写的字太多了，一个晚上写不完一封短信。一连五天他只要有一点点空暇，都用来摹写这个或那个字，记牢这个或那个字的意义，或者在《人民日报》和《志愿军》报上找那样的字来学习。他吃饭的时候在默念，睡觉的时候也在默念。王理明常常笑他要变成书呆子了，其实心里很高兴。刘加亮更不用说。杨林躲在那个洞子里写第六张信纸的时候，刘加亮和王理明在外面他们的炕上谈话。

"刘加亮，我们的保证书没有问题了，"王理明眨了眨眼睛兴奋地说。

"我早知道他不是个说空话的人。不过人家有些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啊！"刘加亮答道。他暗暗地想，我当初学文化也没有他这样的毅力。

"不过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以后还要帮忙他安排一下。我就担心他写好信，又把刚刚认得的字忘记了，"王理明小声说。

“不要紧。我已经想好了，我们三个人订个读报的计划。大家轮流读，”刘加亮从容地含笑答道；“他读不出的字我们教他。这样一逼，他一定进步得快。我们遇到不认得的字，还可以问指导员，问文书。拿我们来说，这样逼一下，也有好处。”

“好罢，我这点文化也很有限，不逼不会有进步。这个计划你对指导员讲过没有？”

“讲过了。指导员还说，光是读还不够，最好讲讲意思，有时间多读读也好。我看指导员的意思是要多逼我们两个，”刘加亮说到这里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我赞成！”王理明高兴地说，他忽然一把抓住了刘加亮的左胳膊。“你不要看我一天嘻嘻哈哈，我其实很着急。我到朝鲜好几个月，自己各方面的进步都很慢。我当初出国的时候，真是抱着赴汤蹈火的雄心。我常常想，我们祖国进步得那么快，我自己进步得这么慢，将来回国，什么都落在后头，那个时候怎么办？所以有人逼我，我很欢迎。”

“不过单靠逼也不成，你自己也得加油干。你比杨林来得早，你要给他立个榜样啊，”刘加亮同情地鼓舞道。

“你是老资格，那么你也要给我立榜样了，”王理明笑道。

“不要扯这些空话了，”刘加亮笑着站了起来，说：“你在这里守着，我去看杨林的信写得怎样了。”他亲切地拍了一下王理明的肩头，听见王理明答一声：“你去罢。”就往里走了。

刘加亮先走到办公室的洞口，站了两分钟，听见三排长在里面讲话，便转身到旁边那个住室去找杨林。他还不曾走到炕前，就听见杨林在念信里的话。这些话他早已知道了，原来

杨林写到第四张信纸，便把信稿交给他看，请他修改，他和杨林在一起研究了大半天，他出了些主意，加了些句子，这才把信稿改定了。"要学文化"这一句也是根据他的建议添上的。

杨林专心在写信，边写边念，写了两三句，又停下来念一阵。刘加亮走到了杨林面前，杨林也并不注意，还以为是文书来了。这时他刚写到"哥哥嫂嫂……当上劳动模范，"停笔在想，好像看见那一对夫妇胸前挂着大红花，一长、一圆两张脸都笑得那么高兴。他也衔着笔头笑了。

"你还不快写，你在想什么？"刘加亮忍不住发出笑声催促道。

杨林吃了一惊，连忙坐起来，看见刘加亮站在面前，不禁欢喜地说："你来得正好，你看我这些字笔划写对没有？"他把那张不曾写完的信纸递到刘加亮的手里。

刘加亮接到信纸，俯下头就着灯光看了一下。他看见每个字大小差不多，虽然歪歪斜斜，可是笔划全对，而且笔笔清楚。跟他昨天看到的信稿比起来，大有进步了。他不禁暗暗地佩服：杨林多么专心、多么认真地写这一封信！他交还信纸的时候，赞了一句："你写得这样清楚。"

杨林满意地笑道："我害怕别人认不出，念错了，我妈不懂我的意思。"

"你哥哥嫂嫂看了信，讲给你娘听不是一样！为什么还要请别人念？"刘加亮问道。

"我哥哥搞生产很有办法，就是没有文化。嫂嫂今年才到民校识字班念书，不晓得现在还念不念。我看可能没有念了，

所以没有人帮我妈写信，"杨林答道。

"好，你快写罢，我不打扰你了，"刘加亮好意地说。杨林果然又趴在炕上写起来。刘加亮并不即刻走出这个洞子，他还在炕前站了一会儿。他的眼光停留在杨林那只捏笔的手上，他的思想却一直在自已的身上打圈子。他想来想去，都离不开这一句话：我应当学习杨林的这种毅力。他还感觉到自己跟王理明一样，进步得太慢了。

刘加亮越想越着急，就离开杨林走回坑道口那个小洞，王理明还坐在炕沿上。他点起了油灯，在昏黄的灯光下，动着针线补衬衣。他听见刘加亮的脚步声，也不抬头就问道："他写好没有？"

刘加亮不答话，却站在炕前看王理明补衬衣，忽然称赞了一句："你的手比我的手巧。"

王理明笑道："我学过裁缝，我还会缝衣服。"他接着又说："我问你，杨林写好信没有？"

"快写好了，"刘加亮答道，他也在炕沿上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唤了一声："王理明！"看见王理明抬起头来看他，便认真地说："你先前那几句话我想过了。我也跟你一样地着急。日子一天天白白地过去，不能不叫人着急。我们真应该下定决心了。王理明，"他把头朝王理明伸过去，压低声音说："这回我们要是真的换到前面，那么立功的机会来了。我打算写个决心书交上去。……"

王理明放下了针线，兴奋地插嘴道："我和杨林都要写。杨林还说他要写两份。岂但两份，要我写十份，我也愿意。问

题在于——”他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一下。

刘加亮马上接下去说："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决心究竟是不是坚决。同时还要看我们的表现。"

王理明忽然站起来，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膛，说："你放心，我王理明一定不会落在你们的后头。我虽然不及你，我没有打过仗，立过功。不过到时候你会帮助我的。我一定要同你一道前进！一定！……"

"你们一道前进，可不能忘记我啊！"意外地响起了杨林的声音，他拿着抄好的信从里面出来，并未听全他们在谈什么，只听见"一道前进"的话就忍不住带笑地插嘴说了。他把信交给刘加亮，一面说："你再看看，如果没有错字，我就发了。"

王理明带笑拉着杨林的手，说："我们一道前进，当然少不了你。三个人一个都不能掉队。哈人"（他马上改正道：）"谁掉了队，拖也要把他拖上去，要是我落在后头，你也要拉我一把啊。"

"我看只要有决心，哪个都不会落后！如果光会说漂亮话，一个都跑不到前头去！王理明，我不赞成你这个说法。我看，单靠别人拉是不顶事的，"杨林充满信心地说。他把王理明的手用力捏一下，又放开了。他看见王理明眨了眨眼睛，好像要开口讲话，便立刻接下去解释道："你放心，我并不是在批评你，我是在讲我自己。我刚刚给我妈写好信，你也看过信稿，我那些话句句都要兑现。我如果倒在炕上睡大觉，等你们来拖来拉，那就糟糕了。"

王理明笑了起来，在杨林的肩头拍了一下，说："你算是会

讲话，我讲不过你。我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去对指导员讲，向指导员要求——”

“向我要求什么？”指导员讲起话来了。原来指导员要到坑道厕所去，走过坑道口，听见他们在小洞子里讲话，便过去插嘴问道，心里想：这几个小鬼又在想什么花样了。

三个通讯员都没有留心到指导员走来，听见这句意外的问话，都吃了一惊，尤其是王理明给窘了一下，一时回答不出。杨林看到指导员脸上带笑，胆子又大了，他红着脸抢先答道：“向指导员要求，到前面去打仗。”

指导员先看看杨林，接着又把王理明和刘加亮看了一下，他问杨林道：“是你一个人要去？还是三个人都要去？”

王理明眨了眨眼睛，连忙答道：“我们三个都要求去。”

指导员又温和地问：“你们下了决心吗？”

杨林马上挺起胸立正，答道：“我们都下了决心。指导员，你不信，请你看我给我妈写的信。”他又对刘加亮说：“刘加亮把信拿给指导员看看。”刘加亮不做声，就把信送到了指导员的手里。

指导员很快地看了信，递还给杨林，说：“写得好。是你自己写的？你不是说没有文化吗？”

“报告指导员，信是我自己学着写的，不过刘加亮他们给我帮了忙，”杨林接过信来兴奋地答道。

刘加亮这些时候脸上一直带着笑容，默默地望着指导员，听见杨林提到他的名字，他便接嘴说：“指导员，信的确是杨林自己写的。这几天他真用功，好些字都是他临时学起来的。”

王理明也笑道："指导员，我们是在认真地执行你交给我们的任务。这算是头一次考试的成绩，请你打个分数罢。"

指导员想起了自已从前说过的话，满意地笑了笑。他又看了看眼前这三张年轻的笑脸，这些愉快的笑容和兴奋的红色给这个小洞子带来了一股暖流，他忽然觉得浑身发热，一阵高兴，便说："你们不要着急，我总会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先把决心书写来。不过也要看你们的表现，决心并不在口头上。"他说完，就往外面走了。

"没有问题了，"刘加亮微微笑道，他现在更有把握了。王理明会意地眨了眨眼睛。只有杨林还不大了解地抱怨道："你们也不多讲几句。讲得具体些，不更好吗？"不过连他也猜到一点点了。

"小鬼，你还不明白？"王理明把声音压低再往下说："我们大家都要到前面去了。"

杨林马上伸起手去捂住王理明的嘴，警告地说："你不要乱说啊。给别人听见，会挨批评的。"他缩回手，正经地说："我们还是来商量写决心书罢。今晚上写好，明早晨就交给指导员。"

"你干吗这样着急？明天写也不迟！"刘加亮笑道。

王理明带笑接下去说："他一个人要写两份，当然要着急啊。"

"好，你们不着急，你们就慢慢写罢，"杨林红着脸噘起嘴说。他停了一下，看见那一对黑亮的眼睛钉住他的脸，他忽然扬起头高兴地微微一笑，好像在自言自语一样："我现在就去

写我的。我明早晨把两份都交去，看你们信不信!"他说完就走出这个小洞，往坑道口去了。

过了一两分钟，等杨林的脚步声去远了，王理明拉拉刘加亮的袖子说："刘加亮，他真的去写了。我们也不能掉在后头啊。"

刘加亮闭上眼睛，不做声。王理明使劲地拍一下他的肩头，又说："你究竟写不写？我明天早晨也要交上去。"

刘加亮惊讶地跳了起来，他接连说了几个"写"字，不慌不忙地又加一句："我早已想好了。"他走过去把那个当作灯用的罐头筒拿在手里，拨了拨那根粗的棉花灯芯，把火弄大一点，再说一句："我们就在这里写罢。"

王理明眨了眨眼睛，笑着说："我也要写两份。刘加亮，你就在炕上写。我去找个凳子来，我要坐在炕前，我们谁都不妨碍谁。"

"好罢，"刘加亮点头说，他已经掏出笔记本，把一张空白页撕下来了。他早想好了要写的话，这时便朝着挂在木柱上的那盏油灯，伏在炕上，开始写起来，他听见王理明回来的脚步声，又听见王理明还在说："我一定要写两份。"他不同意地笑道："你高兴，你写十份，我也不拦你。可是我只写一份。"

十七

接连下了好些天的雨，杨林跟着郝指导员到各个排去检查了洞子，到处都看见战士们在加坑柱，或者挖流水沟，或者铲走洞口塌下来的砂土。他跟着郝指导员冒雨跑了两天，第二天傍晚雨早已住了，他们刚走回连部的坑道口，忽然听见一声霹雳，连脚下的地也摇晃了两下，敌人又在打冷枪了。杨林站定了，抬起头，看见坑道口上方裂开一个大口，一大块砂土就要落下来了。走在前面的指导员刚走到那下面。杨林吃了一惊，他什么也不想，连忙跑上前去，把指导员往里面用力一推。指导员要讲话，或者他要对指导员讲话，都来不及了。两个人一齐倒在地上。指导员马上站了起来，拍去一身的尘土和砂石，大声叫"杨林"，只听见土堆里发出应声。这时王理明从洞里跑出来了，看见指导员弯下身子在弄开杨林身上的土，连忙过来帮忙，杨林已经抖去压在身上的砂土，用那枝自动步枪支撑着，站了起来，他极力忍住但终于发出了一声小声的呻吟："哎哟！"但是他马上问道："指导员，你没有受伤罢？"

指导员不管杨林满身的土，连忙扶着他，关心地问："小鬼，你伤到哪里了？痛不痛？"王理明站在杨林背后小心地轻轻拍去他军服上面的砂土。

杨林首先答了一句："不痛。"他要举起左手，却抬不起来，反而感到一阵彻骨的痛。皱紧眉毛说："指导员，我的左膀……不要紧。"

"不管要紧不要紧，你快进去歇会儿！"指导员怜惜地说。他又掉头吩咐王理明："你快去找卫生员来。"王理明立刻跑出去了。指导员回过头，看见杨林拿枪支住身子、摇摇晃晃地走着的背影，他把右手伸到鼻孔嘴唇上，五根指头放在两边脸颊上用力搽了一下，就大步走了进去。

杨林已经到了小洞里，放好了枪，脸朝下伏在炕上，不发出任何响声。指导员从袋里摸出打火机来，把炕柱上挂的油灯点燃。指导员看见杨林那件沾了不少砂土的军服上左肩下和左膀上都有裂缝，他轻轻地摸了摸杨林的左膀。杨林的身子立刻抖了一下，但是并没有出声。他看出来杨林左肩下一块地方和半个左膀都已经红肿了。他轻轻地把那两个地方揉了一下，再问一句："小鬼，痛吗？"

"指导员，我一点儿也不痛，"杨林答道，一下子坐起来了。他说完话，就紧紧地闭上嘴，脸还是红红的，眉毛也不曾展开，看得出来他在忍受痛苦。

指导员亲切地说："小鬼，你是在学段明是不是？不过你不要只顾我，你也要当心自己啊！"

"指导员，你比我重要得多，"杨林抬起头，挺起胸，严肃地说。

指导员不作声了。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搅动他的心，他有些难受，又有一种高兴的感觉。他望着这张闭紧了嘴的圆

圆脸，大颗的汗珠带着尘土在脸颊上滚。他才注意到好像谁拿笔在这张脸上横七竖八地画了好些道道，他便掏出自己的手帕，轻轻地在这张脸上揩起来。他看见杨林动了一下脸要躲开，又听见杨林唤一声“指导员”，还要说什么话，他就命令道：“不许动！”停了一下，他又温和地说：“小鬼，我的责任也比你大得多，这次的事情应当由我负责。”

“指导员，是我自己不小心。我们有责任保护首长……”杨林忽然站起来大声说，脸挣得通红。

“你忘记了，我检查了两天，各个班的洞子都检查过了，就单单没有检查自己的洞子，这不是我的责任吗？”指导员仍然温和地说。他的确因为这件事情在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想到杨林的行动又很兴奋。他又看了看这个倔强的小青年（杨林正在用右手拍去军服上的尘土，好像没有什么痛苦似的），他充满了怜惜和喜爱的感情说：“你好好地歇会儿罢。”他听见杨林大声说：“指导员，我好了，”他便说：“你还是歇歇罢，卫生员就要来了。我出去看看洞子。”

指导员走了两三步，听见杨林在后面答应了两个“是”字，便回头来，亲切地笑了笑，说：“小鬼，我谢谢你。”

杨林听见这句话，脸上立刻现出了喜色，可是他并不休息，反而朝指导员走过去，亲切地唤一声：“指导员，”正经地接下去说：“我们为了保护首长，就是牺牲了，也是应当的。”他说到这里不知不觉地又挺起了胸膛，左肩下面又痛起来了，好像有人用快刀子在割那里的肉一样。但是他昂着头，动也不动一下。

指导员像父亲看儿子似地看了杨林一眼，温和地说："小鬼，你为什么想到牺牲呢？"他亲热地拍了一下杨林的右肩。"我们的战士不怕死，这是不用说的。不过我们的战士非到必要的时候，也不肯轻易牺牲啊。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多杀伤敌人！"

"指导员，我懂，我懂！"杨林插嘴说，他的脸更红了。

指导员点了点头，又往下说："一个换十个，换一百个，越多越好。多杀敌人，就能够保存自己。我们的战士一个人也能够守住阵地。我们牺牲一个同志一定要向敌人索取很大的代价。"

"指导员，我明白，"杨林兴奋地插嘴说，他还害怕指导员不了解他的意思，又补充一句："你放心，我现在懂了。"

"你明白了，那么就不要动。我到外面去看看，"指导员满意地点点头嘱咐道。他就转身到外面去了。

指导员走出坑道，天还不曾黑，他站在外面，把洞壁上上下下看了一番，看不出还有什么裂缝。他忽然想起里面他们那个住室里还有两根木头，便进去自己扛了一根出来，打算试一下，在坑道口加一根支柱。他刚刚走近坑道口，看见杨林拿着铁铲弯着腰，在那里铲土，便叫一声："杨林，你在干吗？"

杨林听见指导员的声音，一抬头，看见指导员扛着木头出来，连忙放下铁铲跑过去，想帮忙接下指导员肩上的木头。指导员接连地摇头，说了一句："你让开。"一直走到坑道外，才把木头放下。他看见杨林跟着过来，就说："我叫你歇会儿，你怎么又跑出来劳动？老是不听话。"虽是责备的话，不过口气很

温和。杨林也感觉出来指导员对他的关心，他笑了笑，理直气壮地答道："指导员，打仗的时候，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我连轻伤也说不上！就是有点儿肿，有点儿痛。"

指导员也笑了。他望着杨林说："小鬼，你的理由倒很多。那么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进去守电话。"

杨林答应一声："是，"转身往里面走了。指导员望着这个一瞬眼就消失了的背影，不由自主地点了两下头，他满意地笑了。"比我从前强多了，"他一面想，一面就说了出来。他觉得浑身都是劲，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多快乐的情绪！他看见杨林先前用过的铁铲还靠在坑道口洞壁上，便拿起它，把那堆未铲走的砂土铲到前面坡上去。他刚刚铲了两下，王理明带着卫生员气咻咻地跑来了。

"指导员，杨林怎样了？"王理明着急地问道。

"不要紧，他在办公室，你们去看他罢，"指导员安静地说。王理明匆匆地答应一声，就跟在卫生员后面进去了。指导员继续在铲土，铲不到几下，王理明又急急地走了出来。他说："指导员，队长来电话，要你去接。让我来干。"他伸出手去接指导员手里的铁铲。指导员把铁铲交给了他，抬起头望了望坑道口的上方。他仍然没有看到裂缝。那一片砂石好像罩上了阴影，有些模糊了。横条上的字迹还看得见，可是只有六个字，开头的两个字"一人"不见了，那个地方现在剩下一大块灰白色的痕迹。他对王理明说："你等一会儿把我住室里那根木头搬出来，明天一早就动手，我们在这里再加两根支柱。"他说完就迈着大步进去了。

王理明起劲地铲了一阵土，把坑道口弄干净了。他用刘加亮扎的那把扫帚扫了扫地，又揭开那个当水缸用的汽油筒上的木盖子，看看里面还有没有水。夜已经来了。他还在整理脸盆架子，用带叶的树枝拂去架上的砂土。一根绳子断了，木板已经倾斜，他连忙将断绳接好，木板弄正。就在这样忙着的时候，他听见刘加亮在叫他，他高兴地一掉头，果然是刘加亮回来了。

"天都黑了，你还在这里干吗？"刘加亮笑问道。

"这样灰灰的天，你叫我穿针，我也看得见，"王理明笑答道，他马上做出严肃的表情说："你回来迟了。先前坑道口塌了一块，指导员跟杨林刚回来，两个人一齐倒在地上——"

"他们怎么了？伤了没有？"刘加亮变了脸色惊叫道。

王理明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往下说："你这个聪明人，怎么不多想想？要是伤了，我还会笑吗？杨林受了一点轻伤，卫生员来看过了，外伤，不要紧。他同指导员都在办公室。……"

"好，我现在就进去，队长叫我给指导员送信，"刘加亮匆匆地打断了王理明的话，埋下头急急走进里面去。

"你急啥？"王理明边说边走，想追上刘加亮。可是他忽然想起了指导员的话，连忙到那个住室去把木头扛到坑道口，靠外面洞壁放下。等着他走进办公室，指导员已经拆开信封在看信了。刘加亮、杨林和卫生员都坐在连长的小床上，低声谈话。他看见那里没有容纳他的余地，就站在洞口，用他那带好意的眼光望着他们。

指导员刚看完信和文件，电话铃又响了，便拿起了听筒。

刘加亮听见是连长打来的电话，马上站起来，他不知道是不是还要他到营部去送信，他听说“刚刚收到了”；又听说：“行，行”；又听说：“没有问题，都安排好了”；又听说：“对，对，就这样办，我知道”；他想一定不会差他再去营部了，便又坐到杨林的身边去，好像他还有很多的话要向杨林倾吐似的。可是杨林看见指导员放下了听筒，又把信和文件锁在抽屉里面，就站起来，走到条桌的另一面，含笑央求道：“指导员，请你讲下去罢。”

指导员先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然后抬起头，看看站在眼前的杨林，又看看坐在床上的刘加亮和卫生员范阳，再看看站在洞口的王理明，点了点头，便说：“好罢。现在还有点时间，难得你们都在，我刚才跟杨林讲到我当通信员的事情，刚刚开了头，就给打断了。我说，你们这些小青年比我强啊。我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就只知道恨日本鬼子，恨汉奸，恨反动派，恨地主……我从小就吃苦，也没有念过一本书，连个‘大’字也不认识。我后来参军，当了通信员。我跟着一位指导员，他对我真好，一有空就教我学文化，逼我认字。有一次我跟着他去打仗，我执行了通信任务回到他的身边，他挂了花，满身都是血。部队开始转移阵地，敌人炮打得猛，我把他背下火线。他休养的时候，我仍然跟着他。他一天天地好起来。他看了不少的书，他本本都要念给我听、讲给我听，有时还要出问题叫我回答。我要是答不出，或者不认真听他讲解，他就摇摇头说：‘小鬼，每个人都要往前走啊！你也不会当一辈子的通信员。你不好好学文化，学政治，要是你也当了指导员，你怎么办？你会

给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啊！'我听他这一说，再也不敢偷懒了。我真该感谢他。没有他，我今天恐怕真会给人民带来很大的损失。我时时想着他那几句话，我今天还在想。"

杨林不眨眼地望着指导员，听见指导员忽然静下来了，哪怕是一分钟，他也不能等待，他马上问道："那位指导员现在在哪里？是不是还在部队？"

指导员摇摇头，声音低沉地说："他牺牲了。他是在解放锦州的战役牺牲的。他指挥两个排堵住了敌人一个团十几次的猛攻，最后剩下十多个人，仍然守住阵地。他受了重伤，还趴在地上指挥作战，后来友军消灭了敌人跟我们会师了。我背他下去，他两手两腿都断了。我刚把他那个湿漉漉的身子背在背上，他就带笑说：'小鬼，又是你背我，这是第二次了。谢谢你啊。你背起来我一点也不痛。'他看见我掉眼泪，他还批评我：'小鬼，这是革命啊，像你这样哭哭啼啼怎么行？'我真不中用，我听他这一说，倒真的哭起来了。他又说：'我们打了大胜仗，正应当高兴啊。……少我一个，不要紧。……我们的人多得很，而且天天在增加。比我强的更不知道有多少。正应当高兴啊。……不要哭了！……记住我的话，你将来也会当指导员的，难道你动不动就哭鼻子吗？……要坚强啊……要乐观啊……'后面的话我听不清楚了。我把他背到包扎所，放下来，他已经牺牲了。"指导员掏出那块用降落伞改做的手帕在两只眼角上揩了一下，又把手帕放回在裤袋里，他压低声音接下去说："这是四年前的事情，想不到我还有眼泪。要是我那位老师能看见的话，他又会怎样批评我了。"指导员停了一下，

又抬起头去看那几个“小青年”。站在条桌前的杨林埋下脸接连地揉眼睛。卫生员范阳的眼睛里也有泪水。王理明仍然站在洞门，他故意掉过头避开指导员的眼光。只有刘加亮一个人的眼睛是干的，而且干得冒出怒火来。指导员正打算继续往下讲，杨林忽然抬起脸来，泪痕还不曾揩干，他红着脸，正经地大声说：

“指导员，我觉得他好像并没有死。我好像也看见他，听见他讲那些话。我说真的，不是在讲梦话。”

指导员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喜色，他点点头说：“我也觉得他没有死。他常常对我讲那些话：坚强，乐观，认真学习……，这几年我没有敢偷过懒。可是我的进步并不算大。他要是知道，一定不满意，一定要拉着我往前跑啊。”指导员又看了看那几个“小青年”，他露出笑容说：“要是他能够看到你们这些小青年，他会多高兴啊。我看到你们，就想到了他。你们一定要大步往前跑啊。”他的声音里流露出喜爱的感情。他忽然站起来，换过语调说：“我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要谈工作了。你们去把排长们请来。哪个去？”

“我去！”四个小青年齐声说。大家全站到指导员的面前。

指导员又看了他们一眼，便说：“这样罢：刘加亮到三排去，王理明到其它排里去。卫生员去把司务长找来。杨林就留在家里。”

“指导员，我也要去！为什么单单把我留在家里？”杨林着急地要求道。

“家里也需要人啊。你的胳膊上肿还没有消，少跑一趟也

好，"指导员答道。他看见杨林瞪着眼睛、挣红脸、着急的样子，不觉微微笑道："小鬼，你不用急啊，我不会让你闲着的。"

"那么让我明天多挑几担水，"杨林无可奈何地说。

指导员又坐下来，用柔和的眼光望着杨林那张通红的圆脸和那对漆黑的眼珠，愉快地笑了笑，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你要多挑，就得早去。迟了，会给别人抢先的。"他打开了抽屉，把先前放进去的文件取出来，埋下头注意地翻看其中的几段。

杨林本来还想讲话，可是看见指导员有事情，便默默地走开了。他走到洞口，却又站住，转过身看看指导员。那张黑黑的长方脸好像在油灯前面发亮。前额上有三条深的皱纹。指导员忽然伸起手把军帽往上一掀，手指头在额上搔了几下又放下来了。军帽的遮阳仍然朝上翘着。杨林这才注意到指导员的额上本来长头发的地方现在是一大块不好看的、发亮的、淡红和浅白的伤疤。他吃了一惊，怎么以前没有注意到？他的眼光停留在那个伤疤上，他把指导员先前讲的话同伤疤联系起来，他对两位连首长素来有好感，现在他对指导员的尊敬一下子又增加了许多。他觉得这张长方脸上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他心里想：指导员经过了多少锻炼啊。他又想：指导员从来没有讲过，他为了祖国流过多少血啊！他更想：队长一定也是这样。首长们都是这样。实习团的首长不是都经过重大的考验吗？他再想：他们都有过贡献了，现在应当我拿出什么来……

"小鬼，你在干吗？"指导员忽然抬起头，看见杨林站在洞

口呆呆地望着他，觉得奇怪，就问了这一句，把杨林的思路打断了。

杨林吃了一惊，但是马上又高兴地笑了。他爽快地说出了心里的话："指导员，我要认真地向你学习。"他正要转身出去，指导员却对他讲话了。

"向我学习？"指导员问道，他把右手放在下巴上一面擦，一面用惊讶的眼光看杨林。他看见杨林答不出来，便接下去说："小鬼，你要认真向全军的英雄模范学习啊。谁都有杀敌立功的机会，却要看自己是不是经得住考验？"

"指导员，我懂了，"杨林红着脸答道，便急急地走出去了。

十八

杨林急急忙忙地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走出坑道口看见砂土已经打扫干净，脸盆架和水桶都是好好的，没有损坏的痕迹。他东张西望，觉得无事可做，便从坑道前交通沟的缺口踏上三级土阶，到了坡上。他听见不熟习的声音问："谁？"他连忙答应了一句，他看见在前面左边栗树旁站着的岗哨了。他也看见了自己身旁一片绿色中一堆浅灰色的新土。他想，明天要在这里搞一点伪装才好。他忽然听见远远地一阵机关枪响。他注意地倾听，却只听见坡下排长们讲话的声音。他又站了片刻，风吹在脸上特别凉爽。可是他的左臂又在隐隐地痛了。他便走下交通沟，回到坑道里，看见小洞里有亮光，刘加亮和王理明在谈话，好像在谈论他。他们在小洞里听见脚步声，便大声唤道："杨林，杨林！"他本来打算到指导员的办公室去，听见他们的唤声，只好先回到自己的住室里。

"杨林，你到啥地方去哪？我到处寻你都寻不到！"王理明看见了杨林亲热地带笑说，好像他们整天不曾见过面一样。

"我出去看看有没有事情做，"杨林笑答道；"我刚才在坡上听见你们的声音。"

"小鬼，你应当休息啊，还跑到坡上去干吗？"刘加亮皱起

眉头责备道，他那个小伤疤也缩在一起了。可是他那对眼睛仍然亮得很。

“太早了，我睡不着。我想找点事情做。你们把事情都抢先做光了，还要我休息！”杨林带笑辩道；他又带孩子气地加一句：“我偏不休息！”

“你放心，事情哪里会做得光？”王理明噗哧笑了起来。“你要做，明天就让你一个人包干。”

“我倒不包干。不过今晚上先讲好，明天归我一个人挑水。你们不同意，我今晚上就不睡，”杨林红着脸认真地说。

刘加亮和王理明两人望着杨林那对睁得滚圆的眼睛笑了。王理明带笑说：“我还是像上回那样，不等天亮就把水缸装满。你不早睡，到那个时候偏偏起不来，就不能怪我了。”

杨林急得讲不出话，只见他那对漆黑的眼珠不停地在转动，挣了半晌才吐出一句：“我保证明天起得比你早。”

王理明正要接下去讲话，刘加亮连忙抢先说：“你们不要争论了。明天就让杨林先挑罢。不过杨林也不要太勉强啊。”

“我同意，刘加亮做事公平，”杨林脸上紧张的表情一下子松弛了，他点头答道。

“好罢，这回就让你了，”王理明好意地笑道。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刘加亮像哥哥似地说，“我们不是在搞资本主义的竞争，我们是兄弟般的竞赛，要互相帮助啊。”

“那么我先谢谢你们的帮助，”杨林故意感谢道，他的确感到满意了。

“小鬼，你不用谢，现在你应该休息了。我来给你铺床，”

刘加亮说，就转过身去拿杨林的铺盖。

“我自己来！”杨林连忙说，就到炕上去抢铺盖。可是刘加亮已经把他的铺盖铺好了。杨林就顺手将旁边王理明的被子摊开铺起来。王理明看见这样，便也爬到炕上去，把刘加亮的被窝叠好了。

刘加亮忍不住微微笑道：“这等于各人铺各人的了。你们两个谁也不肯让人，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王理明得意地眨了眨眼睛，笑答道：“这正是互相帮助啊！”

刘加亮本来还要讲话，忽然听见有人唤他，便应了一声，连忙跑出这个小洞子，走不了几步，就遇见了文书。文书对他说：“指导员叫你去催司务长马上来。”刘加亮答应一句：“我去。”他马上跑回小洞，拿起枪挂在肩头，匆匆地向王理明说：“我要出去。你得负责叫杨林马上睡觉。”他说完又对杨林笑笑就出去了。

刘加亮去后，王理明开始向杨林做说服的工作；出乎他的意外，并不用他发表长篇议论，杨林就像一个听话的小孩那样脱去军服钻进被窝里去了。王理明满心欢喜，就拿出一本小人书《钢铁战士》，在油灯旁翻看了一阵，他不久就听见了杨林的不太响的鼾声。但是鼾声时轻时重，有时又停止，忽然听见一声痛苦的呻吟，他吃惊地掉头去看，杨林翻了一个身又没有声音了。他轻轻地唤了两声“杨林”，没有回应。杨林侧着身子睡，他只看见那个头发推过不久的光光的后脑袋。他又继续看那本小人书，把图画下面的字轻轻地念出来。那个战士

坚强、勇敢、忠于革命、忠于党的崇高品质吸引了他的整个心。他最后慢慢地阖上书，闭上眼睛，好像就看见那个人民英雄站在他的面前。他睁开眼睛，觉得这个小洞子也突然发亮了。他小心地把书收起来，放在那个睡觉时当枕头用的包袱里面，仍然把包袱包好放回原处。他放好包袱以后，顺便看了杨林一眼，因为杨林的脸正朝着他这个"枕头"。但是杨林的下半边脸藏了在被窝里面，他只看见发红的前额和紧闭的眼睛。他伸过手去在那额上轻轻摸了一下，觉得有点烫，便缩回手，又看了杨林一眼。没有动静，也没有鼾声。他就下了炕，站在炕前，又望了望杨林，杨林还是睡得静静的。他忽然看到杨林军服上面那几条裂痕，便从铺盖上拿起它来，看了一下。他笑了笑，就爬到炕上去，从自己的包袱里取出了针线和旧布条。他坐在灯光下，用他那两只熟练的手，很快地把衣服缝补好了。他把它放回到原处去。杨林还是没有声音。他站在炕前想了一阵，因为没有得到解决，不觉说了出来："他先前还有点发热，明天要不要让他去挑水？……等刘加亮回来，再商量一下，刘加亮真不该一口答应了他。……"

王理明一个人的自言自语都给杨林听见了。后来刘加亮回来，两个人又交换了意见，刘加亮认为既然答应了，就不能不守信，还是到明天大清早看杨林身体怎样再说；王理明却主张先向指导员反映，请指导员下命令叫杨林待在家里，他害怕杨林会带病充健康人，劳动多了，弄坏了身体。最后刘加亮说："我不赞成你这个办法。你太婆婆妈妈了，只会引起他的反感。我们受不了的，他也受不了。我看就这样办：他要是吃

不消，我们两个给他帮忙。"这些话杨林也听见了。杨林先前钻进被窝里的时候，的确感到疲倦，倒下去，很快地就昏昏迷迷地睡着了。可是睡了不多久，他忽然在梦中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接着就惊醒了。他做过短短的梦。不过左肩、左臂痛还是梦醒以后的事。他本来仰着身子睡，感到了痛，就向右面侧起身子。王理明听见他翻身，就是在这一次。王理明的叫声他当然也听见了，王理明的手挨到他前额的时候，他几乎要叫出声来，但是他极力忍住了，他不愿意给王理明知道他的痛，他要让王理明、刘加亮他们相信他睡得好好的。王理明替他缝补衣服的时候，他差一点又要讲话，可是他仍然忍住了。他闭上眼睛装睡，心里又高兴，又感激。他想：明天要好好地谢他啊，真是好同志。这样一想，似乎痛也轻了些。他更放心了。他还以为自己再忍耐一阵，就可以沉沉地睡去，一直睡到天蒙蒙亮，他睁开眼就跑出去挑水。他什么也不想，紧紧地闭上眼睛。他好像也有一点睡意。但是这睡意始终不增加。他却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痛。那一大块先前涂了碘酒的地方像给火烧着似地又烫又痛。他咬紧牙齿不发出任何声音。痛似乎并不曾增加，却也一直没有停止。他觉得头有点点昏，眼皮有些重，好像要睡着了，却仍然睡不着。他希望王理明和刘加亮早些灭灯睡觉。可是他们两个不断地进进出出，仿佛有不少的任务。后来大概很晚了，排长们早已走了，王理明和刘加亮却还不曾回来。油灯暗得多了，洞子里阴沉沉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想这一下可以睡着了，可是左肩、左膀的痛楚感觉不断地搅他的脑子。他趁着洞子里没有别人，翻了一个身。

不对，痛得厉害了。仰起睡，还是痛得不轻。于是他又向右面侧起身子。他继续忍了一阵，忽然跟自己生起气来。他想：这点痛、这点伤就能制服我吗？我怎么这样不中用啊！他又想：小痛都熬不过，遇到大痛怎么办？难道我上阵地挂了花，还会像鬼子那样哇哇地乱叫吗？他一边想，一边忍痛，出了一身汗，内衣都打湿了。他忽然想到了指导员额上那块发亮的伤疤，尽管他闭着眼睛，那块伤疤明明摆在他的眼前。“指导员过去也是跟我们一样的通信员。他受得了，熬得过，我有什么理由受不了熬不过？”他刚刚这样一想，马上就接下去：“那么，首先就要熬得过这点小伤、小痛。”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脸烧得厉害，他在心里批评自己：“你真不害羞，连这点考验也经不起，还要呻唤？”他一动气，一着急，睡意就完全消失了。不过痛好像也不那么厉害了。他放心地吐了一口气，他想：勇气还在自己啊。这样一想，他忽然高兴起来，对自己又有了信心了。“我为什么不能向指导员学习呢？我为什么不能也把指导员当作‘老师’呢？”他把这两个问题反复地想了好几遍，他觉得眼前渐渐地亮起来。他那张藏了半截在被窝里的脸上开始露出了别人看不见的笑容。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地来了一个晴空霹雳，就像一个夏天的响雷打在洞子顶上，整个炕像一只船似地晃了两晃。他生气地出声骂道：“你再凶，也吓不倒我！你打不穿洞子，就该你倒楣！”他想起了指导员常常讲的那句话：“人是锻炼出来的。”他不觉顺口说：“对，对。”他刚刚说出了两个“对”字，就听见外面过道上的谈话声，连忙咽住了以下的话。刘加亮和王理明两人谈着话进来了。

他们这个晚上讲话和走路声音特别轻。刘加亮先走到炕前，朝杨林的光头看了看，在微暗的灯光下他只能看到静静地枕在包袱上面的圆头，可是他已经满意了，他转过身放心地对王理明说："杨林睡得很好，明天不要紧了。"

王理明正在拨灯芯，把灯光弄大一点，也不抬起头，随口答道："他要是能睡就好了。不晓得他现在还发热不发热，等一下我再摸摸看。"

"你不要再碰他，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罢，"刘加亮小声阻止道。"指导员刚才说的那些话很对，杨林是个好同志，我们要多多帮助他，爱护他。他从四川来到朝鲜真不容易啊。"

"不要多讲了，我们只顾讲他，会把他吵醒的；油也完了，灯就要熄了，还是早点睡罢，"王理明低声笑道。"其实我也很喜欢他。所以那件事情还是让我对他讲罢，"他自己又接下去说起来；"我愿意看见他高兴的样子。"

"你愿意看见他高兴，难道我不愿意？我们明天早晨等他挑水回来，一块儿跟他讲，"暗淡的灯光一下子灭了，刘加亮还在黑暗中讲话；"还是把志愿书交给他，让他自己填罢。他已经会写好些字了。"

"不过他学得快，我怕他不巩固，"王理明一面脱衣服，一面说。

"所以指导员要我们多多帮助他，"刘加亮答道，可是他马上又改正说："我看指导员也有意叫我们向这个小鬼学习。"

"那么我们三个人手拉手一道前进罢！"王理明已经钻进了被窝里，高兴地轻轻笑了两声，就不响了。

“我也讲不出理由，我们三个人从三个省来。我从来不知道上海有个小鬼叫王理明，四川省有个小鬼叫杨林，可是我们在一块儿碰到了，我觉得比亲兄弟还亲，我觉得……”刘加亮停了一下，他想等王理明搭腔，可是他听见了王理明的鼾声，自己也忍不住打了一个呵欠，便心情愉快地闭上了眼睛，不到两分钟他也打起鼾来了。

只有杨林一个人仍然醒在被窝里。他们的谈话他一字不漏地全听进去了。他越听，越高兴，也越感激。他觉得思路宽敞了。先前费了好多心思、想了好久的问题现在好像更弄清楚了。“三个人手拉手一道前进！”这句话说得多好。还有指导员的关心，同志们的爱护，还有志愿书，……他听见“志愿书”三个字的时候，心咚咚地跳起来，他差一点要掀开铺盖坐起来了。什么志愿书？难道就是入团志愿书吗？“我够不够入团的条件？”他忍不住暗暗地问自己。但是他接着又想：“我不够条件。一定是我听错了。不过大家都对我好。我应当加倍努力。我要对得起大家啊。”这些时候他的左肩、左臂仍然在痛，他一直侧着身子睡，不敢再翻身。不过他想到那些令人兴奋的事情，也不在乎这种伤痛了。他觉得浑身发起热来。但这不是病，这是温暖。这冷冰冰的砂土炕，铺了一点草，再铺上一幅雨布，湿气重，有时越睡越冷，穿在身上的内衣也会发潮。他明白，这样的温暖不会是草、雨布或者铺盖带给他的。他知道这温暖的来源了。他越想越有劲，越想越高兴。不管伤痛，他觉得自己有更大的勇气和信心了。他又在心里念了一遍：“三个人手拉手一道前进！”于是他眼前现出了一片阳光，在阳光

照耀下，那两个同志紧紧拉住他的手向前跑，他并没有落在后面。他忍不住高兴地说出了一句："这会是我杨林吗？"刚说出来，他自己就吃一惊，害怕首先让睡在旁边的王理明听了进去。他连忙侧耳倾听。王理明在磨牙齿，刘加亮在打鼾，此外没有别的声音了。不久远远地响起了一阵机关枪的声音。它响一阵，又停一阵，中间还夹杂得有枪炮声。他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他那两个同志仍然睡得很香。王理明也打起呼来了。刘加亮忽然又开始在说梦话。"杨林是个好同志……"他就只听见这没头没脑的一句，别的句子都不清楚，也不知道是不是关于他杨林的。他还注意地往下听。可是刘加亮翻一个身，又安静了，过了一两分钟甚至大声打起呼来。

"他们对我真好，"杨林感激地想道。"倘若我妈晓得，她会多高兴啊！"他满意地闭紧了眼睛，心里还是热烘烘的。他想这一下子该可以睡着了。他果然睡了片刻。但是他仿佛摔了一跤似地又忽然惊醒了。他仍然躺在炕上，左肩和左臂一带地方仍然在痛。现在似乎痛得不怎么厉害，他也容易忍受了。可是这点痛却妨碍他的睡眠。他想再进到梦中，却一直没有办法。他听见了脚步声，有人轻轻咳一声嗽，拿手电筒朝他们的炕上照了照。他知道指导员来查铺了，便静静地躺着动也不敢动一下。指导员看到王理明没有盖好铺盖，便走到炕前来，把垂到炕边的铺盖小心地拉到王理明身上，然后轻手轻脚地出去了。王理明继续发出不高不低的鼾声，并不知道指导员到过他们的炕前。

"现在该睡得着了，"杨林愉快地想道，便又放心地闭上了

眼睛。他起初什么都不想，他的脑子好像有些迟钝，可能他还有点热度，可是他也不去管它，他下了决心要马上睡着。他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连几次他刚刚睡着，又惊醒起来。不论是睡是醒，他总感觉到左边膀子痛。固然他现在已经熬得住不用担心会漏出痛苦的呻吟了。不过他要是不想别的事，他就摆脱不了痛；要是想别的事他越想越有精神。他就这样地跟伤痛斗争，他始终不曾真正地进到梦中。

忽然脚步声又响起来了。不久手电光又在他们的炕上闪了一下，刚巧照到他的脸上。他不由自主地动了动，马上听见三排长的熟习的声音唤"杨林"。三排长轻轻唤了两声，到第二声，他忍不住答应了。三排长走近炕前关心地问道："小鬼，怎么你还没有睡着？是不是伤处还在痛？"

他连忙撒谎道："三排长，我刚才醒过来的，你不喊我，我又会睡着了。"

"那么，你好好睡罢；要注意盖好铺盖啊，"三排长亲切地说，就走出小洞去了。

他在被窝里开始着急起来。"又换了一班了，"他不能不这样想。他暗暗地对自己说："我不相信，到下一班我还睡不着！"谁知下一班由司务长来查铺的时候，他仍然醒在被窝里。不过这一次他连一口气也不敢吐。司务长用手电筒照了一下就匆匆地走了。

杨林在被窝里暗暗地责备自己："你这个娇生惯养的人，睡不着就由它去罢。天都快亮了，你还想睡！明天哪个去挑水？"他闭着眼睛想好了主意，又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索性坐起

来，在黑暗中听听，那两个同志仍然睡得很好。他拿起自己的衣裤，慢慢地穿上，轻轻地下了炕，摸到胶鞋，穿好了。他还站在炕前再听听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响动。听到他们均匀的打呼声，他满意地笑了笑，就小心地走了出去。

杨林走到坑道口，还打了一个呵欠。这时东方还不曾发白，天已经晴正了。下弦月还挂在半天，地上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他想现在到坡下去挑水正合式。他脸也不洗，便动身到炊事班去借水桶。他在交通沟里往下走，脚步轻快，转两个弯，不久就到了炊事班的洞子。

炊事班的同志们都起来了，正在紧张地工作。洞外用树枝和树叶搭了一个棚，棚下一张木板案子，有的人在案上切菜，有的人在揉面。

"小鬼，你今天干吗起得这么早?"炊事班赵班长看见杨林急急地走来，便带笑地问道。

"往天晚了，总让人家抢先挑了。所以今天早一点，好多挑两担水，"杨林望着赵班长两边脸颊上那些小圈圈，高兴地答道。

"你来得刚好。要是再早一点，我们的水也要请你挑了，"赵班长一边剥白菜，一边眯着眼睛说。

"不要紧，只要你讲一声，我就给你们包下来，今天、明天、哪天都行，"杨林抬起头爽快地笑答道。

"好罢，下次一定找你，"赵班长看见杨林答得爽快，笑得开朗，两颗发亮的漆黑眼珠老老实实地盯着他，心里很喜欢这个"小青年"，便点头说；他看见杨林迈步朝里面跑 又温和地

在后面说："快去。今天请你吃饺子。白菜合鸡蛋粉包饺子，再好吃没有了！"

杨林回过头答了一句："我挑了水回来正好包饺子。"他在里面洞口找到了两个水桶和一根扁担，就挑起空桶高高兴兴地走了出来。他走过案旁，带笑地对炊事班长说："赵班长，你要留点面给我来包啊。"

"好罢，你要早点来；晚了，就没有你的事了，"赵班长眯起眼睛答道。可是杨林并不听他讲话就顺着交通沟往下飞跑了。

交通沟里的土又软、又湿，天亮以前的空气特别凉，半边的月亮被交通沟上面的山坡和树丛遮住了。吹起了一阵一阵的风，杨林不仅听见树叶的沙沙声，他还感觉到风透过他的军服、毛线衣(他在解放后才第一次穿到毛线衣)和内衣，吹到他的身上，他不觉打了一个冷噤，他那块昨天发肿的地方又痛起来了。他也不去管这点伤痛，其实先前他悄悄地穿衣服的时候，还痛得更厉害。他连忙挺起胸膛朝前跑。风再吹到他那有点发热的脸上，他反倒觉得更有精神，脑筋一夜未休息给他带来的疲劳也让风吹起走了。他看看天上那段还不曾褪色的天空，满意地微微笑了笑，他想：今天不会失信了。他又想起了赵班长的话。他的脚步变得更轻快了。他知道连长、指导员、文书和刘加亮他们都喜欢吃饺子，听他们说过去在家里只有逢年过节才吃得到饺子。不说别人，单是刘加亮端起碗来，一口一个饺子，吃得多高兴！他仿佛看见了刘加亮的紫红色的笑脸，他也想笑了。他转了两个弯，走出了交通沟，走下那个杂

草长得很高，而且到处是马尾松的斜坡，就到了小河沟旁边。沟口几块光滑的石头围成了一个不太小的圈子，看起来倒有点像井口，旁边有一棵倒在地上的松树，树枝不朝上长，却向河沟伸过来，把这个井口似的圈子遮了一小半。

杨林在一块石头上蹲下来，把桶放进圈子里去舀水。两个桶都装满了，他把桶拴好在扁担上，用右肩挑起扁担站起来。他刚刚走了两步，忽然听见有人唤："杨林。"他一听，就知道是王理明的声音，他一点也不吃惊，只是不大明白王理明什么时候赶来的，他先前明明听见王理明在炕上打呼。他刚站住，就看见王理明黑黑地从松树背后走出来。

"小鬼，你没有想到我会比你先来罢。我跟在你后头，你还不知道；等你到炊事班去借水桶，我就一口气跑到此地来了，"王理明得意地哈哈笑道。

杨林看见王理明意外跑来，他也很高兴，就含笑说："王理明，多谢你给我补衣服啊。"他接着又说："不过我们昨天讲好了的，由我来挑，你不能帮忙啊！"

"你放心，我来看你吃得消吃不消。你吃得消，我当然不帮忙，要是吃不消，你也不要勉强啊，"王理明带笑地说。

两个水桶一直在杨林的身前、身后摇晃，不断地泼出水来。杨林觉得左肩还是一阵一阵地痛，不过并不像昨夜那样厉害了。他毫不迟疑地说："没有问题，我吃得消。"他挑起水桶往坡上去了。他听见王理明跟在后面的脚步声，又加了一句："你有空，可以到厨房去包饺子，那里倒用得着你帮忙。"

王理明望着杨林一闪一闪地往前急走的背影，忍不住又

笑起来："小鬼，你的脾气跟我差不多。人家刘加亮就不同了。我不会妨碍你的，我现在就到厨房去。不过你当心啊。不要因为好强，就把身体弄坏啊。"他虽然说了这番话，可是他仍然跟在杨林的后面。杨林几次故意放慢脚步走在一边，想让他到前面去。他却始终不肯超过杨林。有时水溅到他的裤脚和胶鞋上面了，他也只是含笑警告道："当心啊，不要把水倒光了。"不过他开始看出来杨林有点吃力了。他很想伸出手去扶住后面那个水桶，却又害怕杨林不愿意。他想了想，就说："休息一下罢。"

杨林听见这句话，当然不同意，他说："你刚才说我们两个脾气差不多。你想想我哪个时候像你这样婆婆妈妈的？才走几步，就要我休息！"他想起了昨天晚上刘加亮批评王理明的那四个字"婆婆妈妈"，便讲了出来。他其实也想放下水桶休息一会儿，扁担一直压住右肩，左肩又常常痛，他一夜不曾睡好觉，本来他毫不在意的"轻活路"（他在家乡挑起重重的两桶大粪也是行走如飞的），今天他却感到吃力了。他不能不暗暗地生他自己的气："难道我到朝鲜就变成了娇生惯养的少爷不成？"他又记起了指导员常常讲的一句话："人是锻炼出来的。"他不仅因为话是他平日敬爱的指导员说的他就相信，更重要的是他在朝鲜看到的许多事实都证明这句话是多么正确。他看见别人在改变，也发觉自己在改变，不管变得多变得少，人都在变。所以他一定要管住自己，照着英雄模范的榜样来锻炼自己。"让你烈火来烧罢，要烧化了才能够铸成英雄模范啊。"……这都是他昨天晚上在被窝里忍受伤痛的时候，仔细

想过，而且最后决定了的。他现在又想起了这些，一下子又很兴奋了，埋下了的头又抬起来，背也伸直了。他忽然想起了王理明和刘加亮的一段谈话，不禁暗暗地问自己："他是不是故意来试我，看我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呢？"他在心里答道："一定是的，不然他怎么不提起'志愿书'呢？"这样一想，他忍不住高兴地暗笑："你来试罢，再大的考验我也不怕。我若是过不了这一关，你叫我填'志愿书'我也不填一个字！"他加快脚步往前走，他的额上已经出现了汗珠，浑身暖和起来了。他兴奋地等待着王理明对他谈"志愿书"的事情。可是王理明一直跟着他走回连部，在路上并没有讲几句话。

杨林把两桶水倒在坑道口的汽油筒里，天还没有发白，刘加亮正在坑道口面盆架前洗脸，王理明站在旁边低声讲话。杨林想起来了："他们原说过等我挑水回来他们一块儿跟我谈那件事情。我太急了。"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不去理他们就挑起空桶轻脚轻手地走了。他进了交通沟，就小跑起来。他把扁担放在左肩上。起初左肩上又痛了一阵，他不去管它，也不把扁担拿开，后来他只有一种不大舒适的感觉。他的信心更大了，一口气跑到了河沟边，他的额上在冒热气，内衣也给汗打湿了。他心情愉快地装满了两桶水。他在水面上看见天色发白了。他拴好桶站起来，觉得一个人影在眼前一晃。他想：难道王理明又来了？这次一定要谈那件事情罢。谁知他一抬起头，就听见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你好。"他不觉吃了一惊，先答声："你好，"再看来人。原来是一位白衣蓝裙的朝鲜姑娘，她刚刚从头上把盛水的瓦罐取下来，拿在手里。他走

过去伸出手说："我给你装水。"朝鲜姑娘真的把瓦罐递给他，笑着说一句"谢谢"。他接过瓦罐，蹲在沟口，装满了水站起来，捧着瓦罐递还给朝鲜姑娘。她又含笑地说声"谢谢"，便把瓦罐放在头上顶着它，用一只手扶着慢慢地走了。她讲了两句中国话，读音都不准确，显然是新近学会的。她顺着坡上一条小路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杨林挑着水走上山坡的时候，还听见她的愉快的歌声。

"朝鲜同志真坚强，"杨林忍不住称赞了一句。其实这句话他已经听见人说过不知多少遍，他自己也说过不止一次。可是这一次他是联系到自己说的：他，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他不能有丝毫的软弱啊！朝鲜姑娘的歌声消失了。他却兴奋地一路上唱起歌来。他唱了《东方红》，又唱《歌唱祖国》，再唱《志愿军战歌》。不过声音不大，他不想让别人听见。他越唱越高兴，天空越来越亮，好像太阳也被他的歌声惊醒了一样。他觉得并不费大力就走到了连部的坑道口。

指导员在坑道口刚洗好脸，看见他挑水回来，脸红红的，前额上冒热气，关心地问道："小鬼，累了罢？还痛不痛？"

"指导员，我不累，我已经好了，"杨林得意地笑答道，他放下扁担，提起一桶水往汽油筒里倒。指导员却把另一个水桶提起来。杨林连忙说："让我来。"他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指导员把水倒进"水缸"里去了。

指导员看见杨林现出着急的样子，便带笑提醒他道："小鬼，你着急干吗？我又不是在抢你立功的机会。"杨林连忙分辩道："指导员，我不是这个意思。"指导员挥一挥手说："你听

我说下去。工作是做不完的，只要肯花脑筋，工作多得很。不要以为只有挑这两担水才是工作。不然，三个人每天抢着挑这两担水怎么办？是不是大家每天要在河沟边会师？”指导员说到这里不觉笑了笑。

杨林一张脸涨得通红，两只漆黑的眼睛呆呆地盯着指导员的嘴。他起初有点扫兴，有点窘。但是他听完了指导员的话，又看见指导员嘴上带好意的微笑，他自己也想笑了。他半惭愧、半高兴地答道：“我明白了。我懂了。”他的眼珠动了两下，他望着指导员带笑地、亲切地说：“指导员，你每句话都有道理，我都相信。”他忽然看见王理明从里面走出来，对着他眨了两下眼睛，还做了一个倒笑不笑的鬼脸。他猜想：指导员一定对王理明讲过了类似的话，可是不知道王理明是不是明白了，心服了。

看得出来指导员心里高兴，他用喜爱的眼光看了看眼前这个小鬼，含笑说：“我不希望你盲目相信我。我说的话你也得多考虑。要是你不同意，也可以讲出来，大家辩论辩论。这跟命令不同，执行命令就不能讲价还价了。”

杨林马上点头说：“我同意。并不是勉强。我的确有点明白了。”惭愧的红色已经褪去，额上的汗珠已经揩掉，他整个脸上现出一种青春的朝气和一种毫无挂虑的喜悦。他的眼界渐渐地开阔起来了。为了两担水思索了一个晚上，死死地抓住这件小事情，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

“明白了，就好，”指导员满意地点头道，“今天我要出去，留你看家，你没有意见罢？”

杨林楞了一下，接着就带笑答道："我没有意见。"他还摇摇头补充一句："我的确没有意见。"他的黑亮的眼睛毫不躲闪地迎接着指导员的锋利的眼光。

王理明忍住笑在旁边插嘴说："他正好帮忙厨房包饺子。"

杨林也知道王理明在跟他开玩笑。要是他早些时候听见这句话，一定会嘟起嘴或者挣红脸，现在他不但心平气和，甚至愉快地笑起来，说："指导员，今天下午吃饺子，你要赶回来啊。"

"赶不回来，你给我留一点罢，"指导员笑答道。他正要转身进去，忽然又问道："小鬼，你不是不喜欢吃饺子吗？怎么听说包饺子又这样高兴？"

"指导员，你们不是都喜欢吃饺子吗？你还要问我！"杨林觉得有趣地说；他心里想："你们喜欢吃，你们高兴，我也高兴啊！"可是他并没有把这个解释讲出来。

指导员明白杨林的意思，不过他也不再讲话，他默默地看了杨林一眼，就带着笑容走进洞去了。

王理明望着杨林说了一句："小鬼，今天该你包饺子了，"便向着他走来，又关心地说："你快洗脸。我看你眼睛发红，昨天夜里没有睡好罢？还痛不痛？说真话！"

杨林不回答王理明的问话，却走到洗脸架跟前，拿出那个小小搪瓷面盆去舀了水，先漱了口，再洗脸。他一边洗脸，一边对王理明说："你挨了指导员的批评罢？"

"我挨批评？为啥事体？"王理明笑道；"你看，"他指了指坑道口的上方，"刚才指导员、文书和刘加亮，还有我，我们四

个人忙了一阵，才弄好的。你在挑水，我们也没有闲着啊！”

杨林抬起头一看，坑道口上方加了一根横木，两边各竖起上下两根木头作为支柱，托住那根粗木头，刚巧把原先贴的“一人吃苦……”的横条遮住了。

“这下更安全了！”杨林满意地称赞了一句。

“你跟我一道去打饭，我们在路上还可以谈谈，”王理明在旁边催促道。杨林心里想：大概要讲那件事情了。他连忙放好面盆，把几个军用水壶全挂在身上，就和王理明一路顺着交通沟到炊事班去了。

十九

杨林一直盼望着王理明对他提起填"志愿书"的事情，他在炊事班里把水壶装满了开水，扛着一个镔铁盒子的高粱米饭，又同王理明一路回到连部，王理明仍然连一句暗示的话也不讲。杨林想：一定是我听错了。不过他并没有失望或者扫兴的感觉。王理明的谈话中流露出指导员和同志们对他的关心，这使他感动。他蹲在坑道口外吃饭的时候，觉得刘加亮和王理明两个都在看他，他便抬起脸对他们微笑。他的脸上始终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他先吃好饭，洗好碗，把碗筷放好，站在旁边等大家都吃好了饭，就把装饭盛菜的盒子和盛汤的小镔铁桶用扁担挑着送回厨房去。他的动作是那样地快，好像他害怕会给别人抢先拿去似的。王理明向刘加亮眨了眨眼睛，微微地一笑，然后对杨林说："小鬼，你要包饺子拿回来包罢……"

"我晓得，"杨林不等王理明说下去，就短短地答道，他高高兴兴地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

刘加亮望了望杨林的背影。背影不见了，却送过来愉快的歌声。他小声问王理明："你跟他讲过没有？"

"你不是说我们一道对他讲吗？我等着你啊！"王理明望着刘加亮左眉上那个伤疤，笑答道："有两次我差一点讲出

来了。"

"你倒很讲信用啊，"刘加亮轻轻地拍了一下王理明的肩头说："我上午没有时间，你有机会，你单独跟他谈罢。"他走进里面去了。

"好，"王理明答道，他想起杨林脸上的笑容和那对好像在古罐古罐滚动一样的漆黑眼珠，觉得一身轻快，满意地微笑了。他还站在坑道口朝四面看看，各处打扫了一下。他弯着腰扫地的时候，忽然听见连长的声音问他："小鬼，指导员在不在里面？"他连忙直立起来，招呼道："队长回来了。指导员在。"

"杨林哪？"连长温和地再问一句。

"他到炊事班还东西去了；他已经好了，"王理明望着连长眨了一下眼睛，笑答道。

李连长的黑黄黑黄的四方脸上现出了笑容，他抬起头仔细地看了看坑道口上方的洞壁，又说一句："都弄好了。"

王理明答道："指导员跟我们一道弄好的。"

李连长点了点头，就大步走进里面去了。王理明心里想："队长回来，指导员大概要动身了罢，"也跟在后面到办公室去。

杨林在炊事班里也不敢耽搁，他拿到了饺子馅、揉好的面粉、擀面棒和一块木板，把它们分放在两个镔铁盒子里，仍然用扁担挑回连部去。他离开了厨房，还听见赵班长在洞口棚前大声说："小鬼，你不要送来，我们自己来拿！"他头也不回，

大声答了一句："我晓得，"就迈着轻快的步子往前走了。他心里想：我包好了，给你们送来，难道你们不收下？他这样一想，就好像又看见赵班长那张眯起眼睛和善地笑着的麻脸，他觉得好笑，又觉得高兴。他不由自主地小声说了一句："多谢你！"这个"你"字指的当然是赵班长，可是说了出来以后，他却觉得他应当感谢许多人。他自己好像是一个和睦、温暖的大家庭的爱子，他真的装了一肚皮的感激，也装了一肚皮的高兴。他的脚步越来越轻快了。快回到连部的时候，他忽然想起王理明和那个"志愿书"，他马上红了脸，他因为自己先前的着急感到羞愧。"这也是缺点啊，你为什么不想趁这个时候多干点成绩出来？却只顾等着别人来报好消息！"他暗暗地批评自己道。他觉得脸上发烫，额上也开始冒汗，不过他并不着急，他的脸上倒现出了抱歉的微笑。他下了决心："以后不要再想这件事了。多加一把劲争取嘛！"他不知不觉地到了连部的坑道口。他刚刚放下担子，抽出扁担来，打算把镔铁盒子拿进去，忽然听见一个并不怎么陌生的声音大声说：

"小鬼，你们队长、指导员在家吗？"

他连忙伸直身子，抬起脸来一看，原来是九连的徐连长。他带笑地答应了一声："在。"他这个时候才注意到徐连长那张颧骨高高的瘦脸上有一个伤疤，就在左耳前面的脸颊上。徐连长带着九连的三个排长走进坑道里去了。那个四川通信员并不跟着进去，他却走到杨林跟前，亲热地握住杨林的右手，带笑说："我到底来看你了。我记得你叫杨林。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我记得你叫小胖子，”杨林觉得有趣地笑答道。

“小鬼，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小胖子并不生气，他仍然拉着杨林的手正经地说，圆中带扁的胖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你还记得张守义吗？他有信来了。……”

杨林听到这里，马上打岔说：“小郭，你快给我讲张守义的事情。”他刚刚说了这一句，眼光无意间落在面前的镔铁盒子上，他又听见小郭说了“好消息”三个字，便第二次打断小郭的话：“我们到里面去说，我要包饺子。”

“好嘛，我也会包，”小郭满意地答道，就帮忙杨林把两个镔铁盒子搬到坑道口那个小洞里去。两个人就在炕上放好了木板、装馅的碗和揉好的面粉等等，一个人擀饺子皮，一个人包饺子。他们一边劳动，一边讲话。小洞里白天有一点微光，不点灯要在炕上读书、写字自然困难。不过要擀面、包饺子，还可以勉强对付过去。

“张守义从东北来信说，他的伤快治好了，不会成残废了。这两个月就可以回来。他回来，我一定给你们介绍，”小郭兴奋地说；“他在医院里接到好多人的信。常常有人去慰问他们。”小郭忽然笑了起来：“看相貌，你们就像两兄弟，他好像是你哥哥。”

“我还不配做他的兄弟，人家是英雄啊！”杨林顺口说了一句客气话。

“你怎么说出这种没志气的话来？难道英雄是天生就的！”小郭认真地批评道。

杨林楞了一下，接着就笑了起来，望着对面这张胖胖的

脸，故意说道："你说得好，那么你我两个怎么又没有当英雄？"

小郭急得红了脸，接连眨了几下眼睛，认真地答道："你不信，我们就来个竞赛，看哪个先当上英雄。我一定要在半年里面立功。"

杨林心里暗暗地佩服小郭，嘴里却还说："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说立功就立功；说当英雄就当英雄，怎么行！"

小郭拿擀面棒在木板上敲了两下，大声说："这看你的决心和干劲嘛。我上半年还不是团员，现在我是团员了。你不晓得我的志愿书批下来的时候，我多兴奋。我现在对无论什么事情，信心都更大了。你不要笑我，我还要争取做党员，我一定要争取到。我们再来个竞赛好不好？"

杨林不加思索，立刻大声回答："好嘛。不管你来一个竞赛、来十个竞赛，我都答应。"

"好，那么我们一言为定，"小郭高兴地说，就伸出手去，跟杨林握了手。两个人的手上都有面粉，紧紧地一捏再松开来，好像两只手有点不愿意分开似的。两个人都笑了。他们满面笑容地对望了一眼。这个阴暗的小洞一下子就变成灯火辉煌的大厅了。

杨林又包了好几个饺子，忽然兴奋地问小郭道："你已经订了立功的计划吗？"

小郭仍然在擀饺子皮，他点了一下头，答道："早就订好了。不过看情形，现在要另外订了。你哪？"

杨林楞了一下，他的脸红了，他老实地回答："我还没有订。我正在想这个问题。你说你为什么要另外订？"

"难道你还不晓得？"小郭带笑反问道。他正要讲下去，忽然听见徐连长的声音在唤："郭文化！"连忙放下擀面棒，跳下炕来，他先大声向洞口答应了一个"有"，然后向杨林说句："再会！"就走到外面去了。

"郭文化，你这个名字取得好！你等我一下，"杨林在后面大声说，他也跟着跳下来，跑到坑道口，看见李连长、郝指导员、徐连长和九连的排长们都站在坑道口前面，指导员正指着坑道口上方的洞壁在讲话。

刘加亮挎好枪站在指导员的背后。王理明刚从里面走出来，他站在杨林背后轻轻地拍了一下杨林的左肩，看见杨林吃惊地掉过头，便带笑问一句："还痛不痛？"

杨林摇摇头含笑答道："不痛。我已经把你吃的饺子包好了。"

"我们都要走了，你跟文书两个看家，你要当心，不能乱跑啊！"王理明忽然正经地嘱咐道。

"我知道，"杨林仍然含笑地回答。

王理明拉着杨林那只还有面粉的手，略略俯下头，亲切地小声说："我同刘加亮两个介绍你入团，已经跟指导员谈过了。明天我们一道帮忙你填志愿书。你高兴吗？"

"多谢你们，我只怕我不够标准啊！"杨林紧紧地捏住王理明的手，满脸喜色，连声音也在打颤了。

"我问你，你高兴吗？"王理明又问一遍。他听见刘加亮在

叫："王理明！"连忙应了一声。他看见连长、指导员他们都走了，可是他仍然站在杨林面前，等待着回答。

杨林的一张脸又红了，两个滚圆的又黑又亮的眼珠真像古辘古辘地转了两转，他把军帽的遮阳往上掀了一下，激动地大声说："我比你、我比刘加亮、比大家都高兴啊！"

"我也很高兴啊！"王理明眨了几下眼睛，十分愉快地说，他抬一抬挂在肩上的枪，就跑到外面，顺着交通沟走了。

杨林站在原地方，觉得满身都是劲，真想往上跳，真想飞出坑道，飞到天空去。他朝上举起了两只膀子。左肩还有点痛，他却不管它。他只顾把膀子一举一放，好像在练习体操一样。过了片刻，他又站定了，一个人快乐地自言自语："小郭，郭文化，你有多大的信心，我也会有多大的信心。我一定不输给你！"他忽然想起了炕上未包完的饺子，就批评自己道："不要欢喜得发了神经，连工作也忘记了！"他转身就走，几步就到了小洞口，可是他并不进去，却先到办公室去看了一下。他在门口看见文书坐在条桌前埋头写字，也不讲话，就放心走出去了。

他回到自己的小洞，在炕上坐下，看见揉好的面团还剩一半，有点着急了，就专心做起来。他一个人擀了一阵皮，又包一阵饺子，他觉得并不比起先两个人工作的时候慢。他把包好的生饺子一一地放在镔铁盒子里面，用报纸一层一层地隔好。他又高兴起来，小声唱起了《东方红》。这首歌还不曾唱完，有人走进来了，他便大声问："哪个？"并没有停止包饺子。

"医生看病人来了，"有人这样回答。杨林把眼睛掉向洞

口，可是看不清楚，眼睛倒接连眨了几下。他听声音，知道来的是卫生员范阳，便笑答道："我早好了，医生到现在才来。"

范阳的军服已经洗得变成了浅黄色，可是仍然整齐、干净。他把两边袖口都挽了起来，身上还挂了个有红十字的布袋。他笑着走到炕前，一面说："我知道你的伤问题不大，我先到几个排去看过，才来看你。"他轻轻地拍一下杨林的右肩，接着说："你给我看看你的伤。"

杨林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没有伤了，还看啥？耽误我包饺子。"可是他仍然听从范阳的话，转过身拿背向着卫生员，自己解开钮扣，把左边袖子脱下来，虽然范阳在旁帮忙，他还是感到一阵痛，不过他一咬牙就过去了。范阳用手电筒照着看了一会儿，说："没有问题了。我再给你擦点碘酒。"

杨林让卫生员用药棉在他的左肩和左臂上擦了一阵，他一面说："看你把我的汗褂儿都弄脏了。"

"好了，好了，"范阳笑答道："没有关系，你脱下来我给你洗。"

"我没有手吗？要你洗！"杨林笑道。

"你要洗，也不必着急，我不会抢去洗的，"范阳一边整理他的药袋，一边哂笑道："我帮忙你包饺子总可以罢？我先去洗洗手再来。"

"我也去。"杨林连忙跳下炕来，穿好了衣服，也跑到坑道口去。他舀了水倒在脸盆里，卫生员拿出一块药皂，两个人洗好了手。交通沟上摊开一片阳光，天已经晴正了。他们走到坑道口，就听见炮兵校正机的嗡嗡叫声。这一阵校正机的声

音特别响，杨林不用看，也知道：天气好，敌人多放几个"风筝"。他喜欢把这种炮兵校正机叫做"风筝"，他觉得形状相似，而且它飞得慢，老是在这一带打转。他们因为看见了阳光，很高兴，就在坑道口前面多耽搁了几分钟。就在这几分钟里面，他们已经听到好几响远处的炮声了。

还是杨林着急先跑回小洞去，范阳也跟着进来了。两个人马上紧张地工作。现在是杨林擀面皮，范阳包饺子。他们谈话不多，手却动得很快。不到一会儿功夫，面和馅都完了。两个人把包好的生饺子全放进镔铁盒子以后，一个人提着一个盒子走到坑道口，在洞外放下。杨林正要把担子挑走，范阳的颧骨略略突出、嘴唇薄薄的圆脸上露出一种有趣的笑容，他拉着杨林的袖子，低声问道："小鬼，你想好了没有？你留啥子给人家？"

杨林楞了一下，惊讶地大声问道："留给人家？留给哪个？我不懂你的意思！"

范阳连忙警告道："小声点，小声点。我说留给友军啊！你还不晓得？我们就要到前面去了。这不能乱讲啊！"

"真的？你怎么晓得？"杨林满脸喜色，两眼发光，高兴地问道，这次是他伸手去拉范阳的膀子，这次是他压低声音讲话。范阳的消息是他不曾料到的。不过他听见范阳这一说，又觉得并非来得突然，他想起刘加亮他们已经略略地提过了。

范阳看见杨林那种兴奋的样子，忍不住得意地微微笑了笑，仍然低声答道："你快点打算罢。我们都在准备了。我们今

天清早就晓得了，我看一定是指导员要你多休息，不叫你早晓得。”

“我不信！为啥要叫我多休息？”杨林听见这个解释，倒着急起来，摇摇头说，红着一张脸，瞪着两只黑亮的眼睛望着范阳。

范阳觉得有趣地噗哧笑起来，他轻轻拍一下杨林的左膀，回答道：“我昨晚上对指导员讲过，你的伤要休息两天才好得了，我哪里想到你会好得这么快。这不怪我，要怪你——”

杨林连忙插嘴问道：“怪我啥？”他现在放心了。

“怪你身体太好。我本来估计你至少要睡一天，哪个晓得你一清早就起来了！”范阳哈哈地笑道。

“这是你的药灵验嘛。我现在到炊事班去了，”杨林笑答道，他把担子套好，就挑在肩上，让扁担闪了两闪，就迈步走了。

“让我送去罢，那里有个病号找我，”范阳说，就赶上去，动手拿杨林的扁担。

杨林把扁担紧紧捏住，回头说：“你替我看看家罢，等我回来换你去，还不是一样。我跑得快！”他就跨起轻快的步子小跑起来。

范阳还站在坑道口前面。杨林的背影晃了几下就不见了。“这个小鬼就像一条小公牛，”卫生员觉得有趣地说，一只手不知不觉地摸着自己的药袋。

校正机仍然在天空飞来飞去。刚才从远处送来了一声炮响，现在忽然从顶上打下来一个大雷。卫生员吃了一惊，身子

动了一下。他马上站定了，噘起两片薄嘴唇，骂道："你就只敢放冷炮，欺负朝鲜老百姓！老子就要到前头去狠狠地揍你一顿！"

他骂了两句以后，想到自己不久就有机会"惩罚"那些强盗，又高兴起来了。他在洞前交通沟里走了好几步，看到头上那一段无云的蓝天，心里在想"惩罚"的计划。卫生员一样地可以杀敌立功，他含笑自语道。他的手又摸到了自己的药袋，他想起一件事情，就走进坑道里去了。

他先到办公室，看见文书埋着头在写字，便问一声："文书，指导员呢？"听见文书说"和队长一块儿出去了"，他便打开药袋，取出一小包药来，交给文书，慎重地嘱咐道："这包药你一定要给指导员啊。"

"给指导员？什么药？"文书抬起头惊讶地问道。

"奎宁丸，他要的，"范阳答道。

"他什么时候发疟子？我都不知道．"文书把药包放在条桌上容易看到的地方，还是有点不相信，又问道。

范阳笑答道："我们部队里就是有铁打的人。连病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他又开玩笑地加一句："卫生员究竟比你们懂得多些。"他说了，立刻往外跑，不要听文书的答话。可是没有想到他到了门口，就撞在一个人的身上，正巧是前额碰前额，而且发出了响声。他的帽子落在地上了。他连忙用一只手按住受撞的地方，听见杨林带笑问他："痛得厉害吗？"还说："对不住，我把病人给你请来了。打摆子，吃奎宁丸，我也会开方子。"他取下手来，注意地看了看杨林的前额，左眉的上面有一个小

小的红包。他奇怪：怎么杨林一点也不在乎？他也不说抱怨话，就问："你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

"我一高兴，走起路来，不知不觉地就快了，"杨林笑答道。"你快把药给人家罢。"

卫生员这时才注意到门口还有一个人，这是炊事班的老郑，他那张苍白色的瘦脸上带了点笑容，眼睛没有光，嘴唇上没有血色。范阳一看，就知道他是在打摆子，不过也仔细地向他问了几句，才把药拿给他。

"卫生员，我口干，喝水喝多了肚皮又胀得难受，再给点别的药罢，"老郑有气无力地说。

"用不着别的药了，"范阳摇摇头说；他忽然笑了笑，伸手在药袋里摸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桃子，递给老郑说："这个给你，你吃了就不会口干了。"

老郑并不伸手接桃子，他摇摇头迟疑地说："我不吃。"

"这也是药，公家买的，你拿去吃罢，"范阳一边说，一边把桃子塞在老郑的手里，他又向老郑说了几句话，便把这个病人送了出去。他站在坑道外面，望望晴朗的蓝空，心里在想这一天的工作，他觉得一身轻快。他忽然听见杨林在叫他。他转过身来，杨林已经到了他面前。

"你又在扯谎！"杨林对他笑道，一面伸手去摸了一下他的药袋。那里面还有三四个桃子。这个圆脸、浓眉的小通讯员看见他楞了一下，不等他答话，又往下说："哪里是公家买的桃子？明明是你自己花的钱。是不是？你老实说！"杨林故意用右手的食指指着他那根不算高的鼻子逼着他回答。

范阳忍不住笑了起来，杨林的神情和话语使他发笑，其实他先前在办公室里就看见杨林在对他做鬼脸了。他笑够了便说："你猜对了，我看见病人口干得难受，就拿出自己的津贴，请司务长设法换朝鲜币，买十几个桃子，给病人吃。哪晓得司务长和赵班长两个人又加了十多个，一共拿回来三十个桃子。我今天就要分光了。还剩了几个，等一会儿要给另外两个病人送去。有一个是阿妈妮，也打摆子，大半年没有断根，她就住在山脚下，公路旁边，孤零零一个人，只有一个远房亲戚偶尔来照料她。她打摆子的时候，就躺在地炕上哼哼唧唧，不打摆子，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劳动。我这回一定能治好她的病。"

"这本来是好事，你为啥子要扯谎呢？"杨林问道。

"我说是我买的，大家都不肯要，我只好扯谎了，就只有这一回嘛，"范阳笑答道。"不过你将来回国不能到我屋里去说我在朝鲜扯谎啊！"

"你倒想得好，我将来回家还要走四十里到你屋里去，对你爱人讲这些事情！你说，她拿啥子招待我？"杨林得意地开玩笑道，他知道范阳结婚不到三个月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到朝鲜前线来了。

"请你吃鲢鱼好不好？"范阳听见杨林的话，带笑地答了一句。他马上想到那张只会笑的微微黑的鹅蛋脸，接下去便想到这样的话："你放心去。我等着你的喜报。你也等着我到朝鲜来看你。"他看了看药袋，着急地说："我要走了，不能再耽搁了。"

杨林连忙拉住范阳的膀子说："我还有一句正经话：你下回买桃子，我把我的津贴拿出来。"

“你自己不花吗?”范阳问道。

“我有什么好花的?我在这儿什么都不愁。我家里不缺少劳动力,又有政府照顾,用不着我寄钱回家。我要钱做啥子用?”杨林带一种理直气壮的神气答道。他看见范阳点点头,拉拉挂药袋的带子,准备到别处去,便压低声音再问一句:“我问你,你打算把啥子东西留给友军?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一块药皂,一张新脸帕。可惜我不会写快板,不然我倒想写几句话留下来,”范阳心情愉快地答道。他已经迈步走了,又回过头大声说:“你好好打算罢!”

杨林听到这句话,大声答了一句:“我晓得!”他回到自己的小洞里去了。洞子里十分阴暗,不过似乎比先前亮了些。他爬到炕上,拿过包袱,打开来,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起来看。他看到了两张脸帕,便拿了一张出来。此外还有一个蓝布面的笔记本和一个慰问袋。他翻开了笔记本,第一页上印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红红的八个图案字,第二页上便是敬爱的毛主席的照相,第三页起便是划了绿色横格子的空白页。可是第三页上还有几行用蓝墨水写的字。他把笔记本拿到眼睛跟前,吃力地念道:“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同志、你们在朝鲜打美帝、我们在祖国打老虎、你们不打败美帝决不回祖国、我们不把大小老虎捉光、决不收兵。国棉五厂乙细男工小组唐金根上,1952、3、14。”他初到朝鲜的时候,还念不出这几句话,这上面的字他认识的至多也不过三分之一。可是现在他全念出来了,而且他还了解这些话的意义。这是几个月前正在参加五反运动的上海工人送来的慰问品,他在师里分到了一册,当

作宝贝一样，一直不肯拿出来用。他念完了那个上海工人写的简短、明确、坚决的话，不觉兴奋地点了点头，赞了一句："说得真好。"他便把笔记本阖上，跟那张脸帕放在一起。他又拿起慰问袋来。浅蓝色料子上绣着一枝两朵紫色的木槿花，还有两行红色的朝鲜字。他看了一下，低声说了一句："还是留给妈罢，"又把它放回原处，他动手将包袱包起来，他刚刚包好它，马上又打开，取出了慰问袋，再看了看。他对自己说："妈不见得需要它。纪念品有的是。这个袋子还是留给友军罢。"他便把袋子也放在笔记本旁边。他放好了包袱，再看看那三样东西，忍不住满意地笑了笑。他小心地折好脸帕，把它和笔记本都装进了慰问袋，又把慰问袋压在包袱底下。他从炕上跳下来以后，还站在炕前朝四面看了看。其实在这个小洞子里除了砂石挖成的炕和几根连着树皮的木头支柱外，什么也没有。木头柱上还有几根钉子，一根柱上挂了一盏空罐头做的菜油灯；另一根柱上挂了一把王理明用空罐头加上马尾做的胡琴，可是他从来不曾看见王理明拉过它。另外，炕前右面壁上贴了一张五六岁男孩的半身像，孩子胖脸带笑地举着肥肥的小手向人招手，这是从画报上裁下来的，真是一个逗人爱的孩子！左面壁上还挖得有一个方形的小龛，里面放了好几本书，比较厚的书都是刘加亮的，只有三本小人书是他杨林的，还有一本翻旧了的《新字典》，是刘加亮前不久送给他的。炕上铺着三张雨布，靠里并排放着三个夜里当枕头用的白色包袱。他看来看去，就只有这么些东西。他平日跑进跑出，从来不注意它们。可是今天他东看看、西看看，却感到留恋了。他便动手

在各处打扫了一遍，又把炕上整理了一下，先前包饺子时候撒在炕上和地上的面屑都弄干净了。他走出来，从阴暗的甬道上看见坑道外面交通沟里的阳光，觉得十分鲜明，他又有一种可惜的感觉。他走到外面，先看看坑道口的洞壁，又看看交通沟和天空。蔚蓝色的天空显得特别高，特别干净。但是可恶的"老汉奸"① 仍然在他的头上转来转去，虽然一下子就不见了（因为在交通沟里只看得见窄窄的一段蓝天），不过那种单调的声音整天在他的耳朵边响来响去。静了不多久的炮声又在远方响起来了。他听见飞机声和炮声，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怒气，立刻竖起眉毛，挣红脸，一个人自言自语起来。这次他不是在骂敌人，他在批评自己："杨林，你哪儿来这么多婆婆妈妈的心肠？又不是让给敌人嘛。你家都舍得离开，祖国都舍得离开，难道为了这个洞子还要哭一场吗？"他说到这里，忽然忍不住笑了。他的怒气消失了，留恋也消失了。他只有一肚皮的高兴，他想到自己要求到前沿去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摸摸自己军服的袋子，取出一个不太小的笔记本来。他翻开本子小心地撕下一页，然后带笑地走进了小洞，拿到那本《新字典》就走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里，杨林坐在文书的对面，俯在条桌上，用他那管自来水笔在刚才撕下的空白页上，慢慢地写下一些歪歪斜斜的字。这一次他写得不算慢，不一会儿功夫，他就写好了一封短短的信。可是他把纸拿起来，自己轻轻地念了两遍，总

---

① "老汉奸"：指侦正机。

觉得话不对。文书听见他念来念去，便抬起头问他是不是又在写家信，还笑他常常想家。他也不答话，却在动脑筋考虑应当怎样改写。他忽然把写好的信撕碎了，带着笑从笔记本里再扯下一张空白页来。他已经有了新的主意。他看见排里的墙报上常常有同志们写的快板、歌词一类的东西，刘加亮平常也喜欢编几句"顺口溜"，他现在也要来试一下。他便又摊开纸埋下头，专心地写起来，他边写，边念，边想，边改。他自己也想不到"顺口溜"会是这么容易。他先想到那张上面有"保家卫国"红字的脸帕，就写了一句："脸帕上面卫国又保家。"并不要他多费脑筋，下句就接着来了："留给同志把汗擦。"后来他又写了两句："从今接防坑道后，多打胜仗把俘虏抓。"他写好了，自己再念一遍，觉得还是不妥贴。他想：住在这个坑道里哪里有打仗的机会呢？可能他们还是从前沿换下来的。那么怎样办呢？再写一首罢。写了一首，写第二首就更容易了。于是他又在这张纸的背面另写了一首：

礼物太轻不可言　希望同志不要嫌
阶级弟兄感情厚　敬祝英名万古传

在这两首"顺口溜"里面，有几个字，例如"擦"啊，"嫌"啊，"厚"啊……他都不会写，他还是问了文书、又翻过了字典才写出来的。"俘虏"两个字他最近已经会写了。他插好自来水笔，再把两面纸上的字小声念了一遍，觉得勉强可以对付过去，高兴地站起来，拿着纸和字典，打算回到小洞，把自己编写的"顺口溜"放到慰问袋里面去。

二十

三天以后杨林跟着连长、指导员和连部的其他同志到了“新的家”，他很兴奋地这样称呼原先是九连连部的那个坑道。他们动身的时候太阳落下去还不久，可是到了这里，天早已黑尽了。对杨林他们来说这不是陌生的地方，他们三个通讯员在黑暗中走到这里，并不感到困难。有人在坑道口等候他们，把连长和指导员接进去了。杨林走在最后，他和刘加亮、王理明一样，每人都用扁担挑着一些东西。他们今天走的是另一条路，没有下河，却走过一道简单的木桥，所以裤脚管都是干的。不过平日容易出汗的杨林的内衣已经打湿了大半。他好些天没有到这里来，不曾料到甬道已经变高了，他只要埋下头，就可以放心地大步走进去，他兴奋地把东西拿进了坑道，在那个有灯光照着的小洞里放下来，把自己的背包放在铺了带香味的干草的炕上。刘加亮已经把连长和指导员的简单行李拿走，给他们铺床去了。王理明刚喝好水，看见杨林进来，便含笑道：“你看人家比我们弄得漂亮啊。”炕前还有一个大半个人高、一面靠壁、四四方方的小小砂石台，台上立着一个长长的炮弹筒，筒里插了些五颜六色的小花。王理明指着这个代用花瓶说：“刘加亮看见它，开心极了。”杨林觉得口渴，便拿起旁边一

一个小木凳上的搪瓷饭碗（这是王理明刚才放下的）从那个还在冒气的镔铁盒子里舀了半碗水，几大口就喝光了。王理明正跪在炕上打开背包铺雨布，叠铺盖，放好包袱，忽然在炕上大声叫"杨林！"杨林刚刚应了一声，王理明就递给他一个慰问袋，带笑说："给你的。"

杨林把慰问袋拿到灯光下一看，浅绿色绸子做成的袋子里也有脸帕，一个信封露了一半在袋外。他抽出信封来，信封上面有五个端正的字"杨林同志收"。他诧异地想道："怎么会给我……？"便把信拆开，拿出信纸来看，一面念了出来，原信是这样写着的：

亲爱的杨林同志：我没有更好的东西留给你，请你收下我这个小礼物。脸帕、笔记本、慰问袋都是从祖国来的。我们使用每样东西，都不能忘记祖国人民的恩情。你一定要多多杀敌立功，报答祖国人民。祝你努力在我们两个的竞赛中取得胜利。

郭文化

他虽然感到吃力，总算把信念完，而且懂得信上的意思了。他念到"脸帕、笔记本、慰问袋"的时候，他几乎要跳了起来。他又高兴、又觉得有趣地说："怎么我们两个的想法完全一样？怎么会的？"他仿佛看见小郭那张圆中带扁的胖脸正对他微笑。他接着又自言自语："可惜我没有写上他的名字。人家有文化，到底想得周到些。"他听见王理明在问他："你在说谁有文化？"就说："你看信罢，"顺手把小郭的信递了过去。他

又看慰问袋，上面用五色丝线绣着喜鹊闹梅，有花有鸟而且有两行中国字。一行字大些，是："等候英雄的喜报"；另一行字小些，是"上海市第三女中初三乙班丁玉芳赠"。他满意地想道："这个慰问袋更好，我还是给我妈带回去罢。"他也不看袋里装的东西了，便拿着袋子，打算到炕上去，打开背包，铺好床放好包袱。可是他转过头，便看见他的床已经铺好，那个小小的白布包袱安安稳稳地靠在洞壁上。王理明笑容满面地把信还给他，称赞了一句："小郭真有一套，写得好。"他不用问，也知道是王理明替他铺的床，他口里不讲什么，心里却在想："到了前沿来要多做事才好。一秒钟也不能浪费啊，不然，什么事都让人家替你做了。"他把小郭的信折好，小心地放在自己军服上左边袋里，他要常常取出它来念几遍。"我要记住他的话，"他这样地决定。

刘加亮回来了一趟，把那个上了锁的镔铁箱子搬走了。他走后杨林不觉暗暗地责备自己："箱子明明放在那里，你怎么看不见？怎么不先搬走？"不过他也不懊丧，他仍然和王理明一起整理这个洞子。其实这个洞子并不需要他们费多大力气。旧主人把这个地方不但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装饰得很漂亮。洞壁上贴的图片一共有三张，一张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群众挥手答礼的半身像，一张是成都望江楼的照片，另一张是"北京初雪"的木刻，都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毛主席的像，就贴在炕上那根挂灯的坑柱的旁边。杨林一眼就看见毛主席的笑容。他接连看了两眼。毛主席好像用长者鼓励的眼光在对他笑，好像在说：好好地努力啊，好好

地努力啊。他高兴极了，他觉得身上十分暖和，洞子里非常明亮。他暗暗地感谢道："小郭，多谢你啊。你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他刚刚说了出来，就听见王理明在旁边问道："小鬼，你一个人叽哩咕噜讲些啥？"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便带笑地说："你看，这张毛主席的像真好。"

王理明早已看过几次了，他便点点头，说："以后我们三个人要好好保护这张像啊。"

"包给我，我绝不让像粘一点点灰尘，"杨林马上挺起胸膛爽快地大声说。

王理明望着他眨了两下眼睛，笑道："为啥要包给你？毛主席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觉得他老人家在对你笑；我也觉得他老人家在对我笑。人家刘加亮还立过功的，难道毛主席不喜欢他！小鬼，我说句公道话：三个人轮流负责罢。你看，你那位有文化的同乡心眼多，也想得很周到，三个人每人一份，一定是他想的主意。"说到这里，王理明便拿出两个报纸包来："这是给刘加亮的，这是给我的，都写上了名字。可是我们就没有想到这个。"

"你不是把你顶喜欢的《钢铁战士》也留下了？"杨林说。

"尽管我们留下的礼物并不比人家差，尽管你编了顺口溜，刘加亮编了快板，我也编了歌，可是我们不及人家想得周到。人家写得又切实，又明白。这次我们掉在后头了。"王理明一边说，一边把上面写得有刘加亮名字的报纸包交给杨林。他虽然在批评自己，脸上还是带着笑容。

杨林接过纸包觉得相当重，打开一看，还是脸帕和笔记

本，不过没有慰问袋，却多了一本厚厚的书，他认得封面四个大字《真正的人》，还有人用蓝墨水在下面写了五个较小的字"无脚飞将军"。他知道这个失去双脚的英雄的故事。他真羡慕刘加亮能读到这样一本好书。他翻了一下书页，刚看到一张英雄在雪地里爬行的插图，忽然发现书页中间还夹得有一张信纸。并没有信封，信是三个人写给"亲爱的刘加亮同志"的，小郭的名字也在内。信不长，也有刚才他念过的那些话，不过多了几句，例如"祝你功上加功"啦，"你一定能学习真正的人的精神"啦，等等……。他看过信，就把信纸放在那页插图前面，关上了书，包好纸包，交还给王理明。他也不想再看王理明手里拿的那一包。他的眼前还现着苏联英雄在雪地爬行的图画。他很兴奋。他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他觉得自己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他轻快地含笑对王理明说："掉在后头就迎头赶上嘛。你光动口不动脚，有啥子用场？"

王理明看见杨林昂起头，帽檐朝上翘，脸红红的，眼睛黑黑的，满脸都是笑，好像这张圆圆脸既在放光又在冒热气，他真喜欢这个好像他兄弟一样的心地单纯的小鬼！他听见杨林这两句话，觉得正合自己的心意，不过他还故意激他道："赶上去？你倒说得容易！你那位同乡，人家有文化啊。"

最后的一句话在杨林的心上打击了一下。他楞了半分钟，再想了片刻，他的笑容又出现了。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他仍然高兴地答道："我说赶就要赶。没有文化，就认真学嘛。你不要站在旁边光看笑话。你既然喜欢叫我'小鬼'，你就应该多多教育我，帮助我。别的不讲，你看，连这样硬的石头也能

挖成这个漂亮的洞子，难道我的脑筋就比这座山还硬吗？”

王理明仍然带笑地望着杨林，他想不到杨林会讲出这样的话，不过他觉得杨林讲得对。他点头称赞道："看不出你现在倒学会讲话了。"他得意地眨了眨眼睛，又说："你自己请我帮助你，以后就不要怪我多提意见，还要虚心接受啊。"

杨林本来想问："我什么时候不肯接受意见？"但是马上就想起了一些事情，他的脸带点羞愧地红了一下，他改变了口气说："我一定接受。"

"那么，立刻把东西捡好，我们到队长他们那里去，"王理明收起笑容说，他到这时才想到他们在这个洞子里耽搁久了，他们本来应当先去那里帮忙刘加亮收拾的；还有文书保管的一个镔铁盒子在这里没有搬走，杨林听见他这样一说，一边答应，一边就把那个盒子抱起来，先往外面走了。王理明只好把两个报纸包丢下，追出去。

杨林出了小洞，在甬道里俯下头，抱着镔铁盒子往里走。甬道上点得有一盏油灯，挂在木头支柱上。甬道不短，灯不亮，可是对杨林来说，已经很方便了。他第一次经过这里，头上碰起了一个小包，第二次再来，虽然仍旧摸黑，却不曾碰到什么地方。现在是第三次，甬道变高了些，他借着这阴暗的微光，走得相当快。他也听见后面王理明跟上来的脚步声。他转了弯，并不问王理明的意见，就往大洞走去。他听见王理明也跟来了。到了大洞里面，他看见炕上铺得整整齐齐，靠着右边洞壁放了一张条桌，桌上点着一支蜡烛，仍然插在那个铁丝绕成的烛架上，条桌前还有一个不算矮的独脚凳子。杨林把

镔铁盒子放在条桌上。他听见王理明在称赞："这个洞子好清爽。"他懂得王理明讲的"清爽"就是清洁、干净的意思，他便点头道："我上回来看见的并不是这样，人家特地为我们打扫干净的。"

"我们留下的洞子也不错，就是不及他们想得周到，"王理明一边看一边说。

"你看，桌子、凳子都是最近添的，他们建设得不错，现在都留给我们了，"杨林兴奋地说。

"那么我们也应该搞点建设将来好留给别人，"王理明接口说，他在想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东西。

"留给别人？你才上来，就想下去了？"杨林带笑责备道；他接下去又说："我们的建设是多挤它几个山头过来，多挖它几十条坑道。"

王理明同意这个意见，他觉得杨林的想法是有可能实现的。他看了杨林一眼，杨林正在这里摸摸、那里弄弄，好像十分喜欢这里的洞子似的。他想：这个小鬼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喜悦，这样大的劲！他又想到挤山头的话。他也非常兴奋。他马上想到了连长和指导员，因为要实现那个想法就离不开他们。他对杨林说："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快去看队长他们。"他便带头走了出去。

杨林还走到条桌前站了片刻，他望着蜡烛在考虑要不要吹灭它。他已经掉转身子走了两步，忽然摸到袋里的火柴盒，连忙回去，一口把蜡烛吹灭。他记住洞口的方向，几个大步就走出去了，刘加亮正在叫"杨林！"他一下子就听见了。他借着

阴暗的灯光，找到了刘加亮。刘加亮看见他，便问道："你在干什么？怎么不见你的影子？"他脸红了一下，老实地答道："我把文书的东西搬到大洞里，东看看西摸摸，就忘记去看指导员了。"

刘加亮看不见杨林瞪着眼着急的窘相，可是他听见杨林的跟平日不同的声音，他便忍住笑做出严肃的声音说："指导员刚才还问过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啊。我现在跟着队长和指导员出去一趟。你同王理明好好地看家。"杨林小心地答应了两声。刘加亮便转了弯出去，追连长他们去了。

杨林走到办公室门口，就看见白布帘子里面摇曳的亮光。他掀开帘子走进去。王理明正坐在条桌前整理文件，把它们一一放进抽屉里面去。

"王理明，你倒跑得快，让我挨刘加亮的批评，"杨林一进来就嘟起嘴抱怨说。但是他马上又笑了："幸亏在阴暗里他看不见我。"

王理明眨了一下眼睛，笑答道："我来得快些，倒挨了指导员的批评。他只讲了两三句话，他讲得对，所以我服了，反而觉得一身轻快了。"他又埋头去理文件。

杨林站在旁边又抬起头东看看西张张。他发现石炕上面的洞壁上贴了一张彩色图画，他眼睛尖，再一看，原来是天安门前国庆节游行的彩色照片，也是从画报上裁下来的。他记起第四个国庆节马上就到了，他又兴奋起来问王理明道："王理明，你还记得国庆节吗？天安门多热闹啊！"

"我怎么不记得？我还在看台上观过礼，"王理明头也不

抬，脸上露出喜色回答道。

“你观过礼？哪一年？”杨林惊讶地睁大两只黑亮黑亮的眼睛，问道。

王理明又眨眨眼睛忍住笑答道：“就是今年。”

“你在扯谎了，今年国庆节到都还没有到！”杨林大声笑道。

“你真傻，我是说，我在梦里到过。我不骗你，你还没有来的时候，我的确做过一个梦，跟真的完全一样。”王理明正经地答道。他的手一直没有停过，他忽然拣出一个信封来，丢在条桌上，对杨林说：“这是你的信。”

杨林刚刚又把眼光射到那张画上去，穿着少数民族彩色服装的青年男女的舞蹈场面表现着解放了的和平人民的欢乐。他听见说有信，连忙把眼光收回来，惊喜地说：“一定是我妈寄来的。”他拿起信封，看见是一封厚厚的信，很高兴。可是信封上有发信地址，信是从上海一个医院里寄来的。他自语道：“奇怪，上海医院里有人写信给我！”

“上海来的？给我看看，”王理明听说是从上海来的，马上站起来伸过头去看信封，杨林念出来：“上海华东医院四〇二号房汪正东寄。”他念了两遍，马上省悟地说：“我想起来了，就是实习团的首长。”他连忙拆开信，取出了一叠信纸。一共六张，全是用墨笔写的并不太小的字。他的手开始发抖，他的声音也开始发抖，他激动地念起来：

亲爱的杨林同志：……

他忍不住微微地笑起来，他感到亲切地说："首长也喊我亲爱的杨林同志，跟小郭一样。"他觉得首长跟他中间的距离马上缩短了，好像首长就坐在炕上对他讲故事。他又往下念：

> 我从朝鲜回到祖国不久，我的病又翻了，现在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病。我进了医院，只好服从医生、护士的命令。天气好时还可以到楼下草地上散散步，不然就只好整天关在病房里。今天我看见一个小护士，相貌很像你。我想起了你这个小鬼。我还记得你那张圆圆脸，你那对黑亮黑亮的眼睛。我还记得你皱起鼻子、闭紧嘴唇、眼睛一闪一闪的那个样子……

杨林念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发笑。他小声地说："首长也爱开玩笑啊。"可是他并没有不愉快或受辱的感觉。

王理明在旁边跟杨林一起念信，杨林念不出的字他也能念出来。任何从上海来的东西都能够牵住他的心。他对任何有关上海的事情都特别感到兴趣，这封信虽然不是写给他的，他却仿佛在读家信一样。同时他还暗暗地盼望着：多写点上海的事情罢。

> 你那天没有哭鼻子罢。

杨林含笑地说了一句："首长的记性真好。"他觉得又看见了那张长方脸，连两道黑黑的浓眉和左眼下面的伤疤都清清楚楚地显了出来。

我不喜欢看见你哭鼻子。我要你坚强，我要你加油干。今天的小青年应当昂起头、挺起胸膛大踏步前进。我回国以后，我的确天天翻看报纸，看朝鲜战场的新闻，天天找你的名字。我没有看到你立功的消息，我不扫兴，不失望。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在报上看到你的名字，看到你们那些小青年的名字。

杨林红着脸侧过头看了王理明一眼，说："你也有份。"他又感激地、兴奋地念下去：

不要忘记：你们中间谁立了功都要写信来向我报告。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很关心你们。我回国以后已经作了好几次报告，大家都喜欢听志愿军的英雄事迹，都以志愿军为学习的榜样。我也听到一些上海人民热爱志愿军的生动故事。例如有两个小学生，他们是两兄弟，哥哥十一岁，弟弟九岁，他们夜里睡在一起。有一天早晨，他们妈妈起来，看见他们睡在地板上，觉得奇怪。他们便说："人家志愿军叔叔在朝鲜生坑道，睡在石头上、砂土上，都是为了祖国。我们睡在地板上，比他们好多了。我们长大了，也要到朝鲜去打美国野心狼！"这样的故事多得很。可见当志愿军真是光荣。连我也羡慕起你们来了。我也很关心你们，你们有成绩，有进步，都要写信来告诉我。我不知道你学文化现在有多大的进步？这封信里有好些字，你可能还不认识。不过你可以向指导员或文化

教员、文书请教，一定要把这些字学会。还要给我写一封回信来，写短些也不要紧。总之，一定要亲笔写。我很想看看你究竟有了多大的进步。致以

革命的敬礼

汪正东 ×月×日

又：这封信请拿给另外几位通讯员同志看一遍，我也很想念他们，关心他们。总之，你们都是我们的接班人。你们不能有一分钟、一秒钟的懈怠啊！

信的最后还有一个通讯处。

两个人一起念完了信，移过头，对望了两眼，两个人的嘴都动了一下，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只有杨林说了一句："首长太关心我们了。"这封信来得太突然了。那位经过长征的首长居然还记得他这么一个小通讯员，在养病的时候还给他寄了这么亲切、这么关心的信来！每句话都进了他的心里，他的心更暖和了，他的全身更暖和了。"首长讲得真好，真对。我要听他的话，"杨林又说了两句。

"他要是多讲讲上海的事情，那就更好了，"王理明低声说。他心里想，要是首长知道读信的通讯员中间有一个从上海来的小青年，首长一定会多讲几件上海的新鲜事情。但是那两个小学生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了：胖胖的圆脸，红红的脸颊，黑黑的短头发，明亮的眼睛，白白的翻领衬衫，黄色的短裤，光着的腿和亮黑的小皮鞋。他们用尊敬的眼光望着他亲热地唤着"志愿军叔叔"。他的脑筋动得快，这只有片刻

的功夫，他在心里说了一句："他们比我们幸福。"两个男孩的面影马上消失了。他望着正瞪着眼睛在想什么的杨林，感动地说："小鬼，你一定要写回信啊，也好让首长知道你已经有进步了。"

"我一定写，"杨林接连地点头答道。可是他还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他有什么好消息向首长报告呢？难道他就只用几句空话来回答首长吗？"不过我究竟写什么好呢？"他不自觉地把他的思想讲出来了。

"你就写你已经填好入团志愿书交上去了，"王理明含笑地提醒道。

"批都没有批下来，就到处宣传，这不好，"杨林摇头说。

"你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为啥不可以说？你怕宣传，我替你写，"王理明鼓舞地说。

杨林想了片刻。他脸发红，两眼发亮，兴奋地说："我一定要等到有好消息才给首长写信。"他看见王理明张开口要打断他的话，连忙接下去说："你何必这样急？我们已经到前沿来了，难道还愁没有立功的机会？"

王理明不再作声了，杨林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他自己哪一天又忘记那件事情？他忽然想起了上海北站的一个场面：他在车厢里，制服上面戴了一朵大红花，人们在月台上敲锣打鼓，他的姐姐同她（亲手做了慰问袋送给他的那个人）一路来了。她们跑得气咻咻的，两个人笑着对他挥手。姐姐讲了好几句话，那个瓜子脸、细眉毛、薄嘴唇、头发烫成波纹式的姑娘只说了一句："你要写信来啊。"他真的写了信去，她没有直接

回信，却常常请他的姐姐代她向他问好，还请姐姐转达过一句话：等着你立功的喜报。他不曾把有关这个姑娘的事情对任何人讲过，所以连刘加亮也只知道在糖果厂做工的是他的姐姐，没有想到那个厂里还有一个他关心的人。每逢他想起上海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她。他并不是在胡思乱想，他也不过觉得她那张瓜子脸带着笑在他的眼前晃了过去，又仿佛听见了那句话："等着你立功的喜报。"然后他高兴地在心里回答：不会叫你久等的。于是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机会的确近了。他好像看见灰黑色的朝鲜军功章在他的眼前晃了两下。他想，他一定要写封信给她："我并不是为名、为自己，我不过用行动表示我对祖国、对人民、对你的感情啊。"……他的思想活动得很快，在短短的一两分钟的时间里它们走了一趟上海，又回到了朝鲜，回到了他们刚搬来的这个洞子。杨林已经把首长的信郑重地折好，放回在信封里，离开了条桌，到炕前去整理已经铺好的连长睡的被窝。他看见条桌上还有一叠文件，马上想起自己未做完的工作，连忙坐下来，把思想集中在文件上面，将它们分类地放进抽屉里去。这些文件只是剩下的一批，大批的文件指导员今天早晨已经叫他烧掉了。他刚刚把抽屉锁上，就听见了讲话声和脚步声，指导员和刘加亮两人进来了。指导员揭起白布帘子以后，还对刘加亮讲了一句：

"你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

刘加亮答应了一声，两个人的谈话就算结束了。这句话叫王理明和杨林同时吃了一惊。杨林不知道刘加亮在要求什么。王理明却会意地笑了笑，心里想："你又占了先了。"

二十一

国庆节的前夕，杨林知道自己入团的申请被批准了，他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他想了许久，也做了不少长长短短的梦。他梦见自己跟着连长出发到前线去。他又梦见自己跟在连长后面，冲上敌人守着的山头，连长带了一个战斗小组，他们连离主峰不远了，忽然敌人在机关枪的掩护下反击过来，他看见两个同志挂花、一个同志牺牲（好像就是八班长），接着他的左膀也打断了。这时敌人打出来几颗照明弹，他看见一架敌人的重机枪正朝着他们，连长要亲自上去打掉这架机枪。他听见哗啦一声，知道敌人顶上了的子弹就要发射了，他连忙往上一扑把连长压在自己身子的下面。于是机关枪子弹接连地打在他的身上。他并不觉得痛，他只觉得一阵冷，他叫了一声："队长！"就醒了。他听见刘加亮在说："不要叫，会给敌人听见的。"他吃了一惊。以后却又没有声音了。只是远方的炮声和机枪声还在断续地响。原来刘加亮在说梦话。他不知道刘加亮梦见了什么。他还记得自己的梦。但是不久他就忘了这个梦，因为他又在做新的梦了。他梦见自己跟着指导员攻上了一个山头，还有一个大母堡没有打下来，指导员抱着一包炸药站在交通沟口，偏起头望着它。他知道指导员要自己冲上去

炸掉这个母堡，他便拉住指导员的衣服说："指导员，你不能去，让我来，我保证完成任务！"他从指导员手里接过了炸药包，猛冲到母堡的侧后，把炸药包丢进母堡里面。母堡炸毁了，他的左膀挂了花。他下去找指导员，却找不到。他便又往上面走，走不到几步，忽然碰到了一个高大的敌人。敌人正要过来抓他，他就把敌人拦腰一抱，两个人就摔起跤来。他也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大的劲，几下就把敌人摔倒在地上，他连忙抱住这个美国鬼子，用力打，他又醒了。原来他一只手紧紧抱住一段铺盖，另一只手拳成了拳头在打击那段揉乱了的铺盖。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抱怨自己："我怎么这样容易激动？如果真的叫我去打仗，我又怎么办？"他心里很热，炕上铺了稻草也还暖和，只是洞子里仍然有些阴湿寒冷。他卷好了被窝静静地仰卧着，他希望再不要做梦了。可是不到多大一会儿功夫，他又做起梦来。这一次他回到了祖国。他，还有刘加亮，还有王理明，他们三个人在一块儿，穿着崭新的军服和皮鞋，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齐步走过天安门广场，让毛主席检阅。天气好，人人高兴，军乐队奏着振奋人心的进行曲。他们走到城楼下，他忽然向右侧过头去，朝城楼上看了一眼，他看清楚毛主席，脸带笑，向他们举着右手答礼。他高兴极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掉队，可是他听见刘加亮在他左边批评他："你怎么搞的？你把队形弄乱了！"他还高兴地分辩道："我看毛主席嘛！"王理明在右边接嘴说："你回去要认真地检讨，你违反纪律，出了洋相，连毛主席也生气了。"他大吃一惊，又醒过来了。洞子里黑黑的，有一种使人呼吸不畅快的霉味。他把脸掉向

左面，刘加亮正在打呼；他又把脸掉向右面，王理明在磨牙齿。他安静下来了。“我并没有出洋相啊，”他放心地想道。他忽然听见了脚步声，有人走进洞里来了。他不加思索，大声问一句：“哪个？”

“小鬼，你还没有睡着？”这是连长的声音。杨林马上想起来：连长来查铺了，便亲切地回答道：

“我做了梦，刚才醒过来。”

“小鬼，不能胡思乱想啊，”李连长关心地说，他打着手电在炕上照了一下，另外两个通信员都睡得好好的。手电光射到杨林的脸上，他那两只黑亮的眼睛闭了一下。

“队长，现在到了前沿来，我也要打仗立功啊，”杨林等李连长灭了手电光、要转身出去的时候，忽然鼓起勇气要求道。

李连长微微笑了起来，他温和地说：“小鬼，你好好地睡罢。这些事不用你着急。要打仗，一定少不了你。不过你平日也要好好地锻炼，不然上了战场完不成任务，那才够呛。”李连长说到这里，并不等杨林的回答就匆匆地走出去了。

杨林满意地闭上了眼睛。他想：我一定可以睡个好觉，不再做梦了。队长说得不错：不要胡思乱想。他知道自己的生活习惯。平日他钻进了被窝，一闭上眼睛就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东方发白的时候，连一个梦也没有做过。即使敌人打到附近来的冷炮有时会把他惊醒，他不到一两分钟又会沉沉地睡去。可是他一有什么心事，不管是大的、小的，他躺在炕上多动了点脑筋，那么他就会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会被一连串的怪梦惊醒。先前他睡下来的时候的确想得多一点。现在

他听了队长这几句话，疑问已经得到了解答，要求也已得到了满足。他的心应当安定了。他也用不着再动脑筋了。

他的嘴角带笑、心情愉快，仰卧在发香的稻草上面。他听见刘加亮和王理明两人的不太响亮的鼾声，他想笑，他觉得高兴，他等待睡眠到来。可是他的脑筋又在动了。他想起了先前的梦。明天就是国庆节了。他要是真的能够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不说游行受检阅，就是在那里站两分钟，那有多好！他什么都不要看，就只看城楼上的毛主席。他要看得清清楚楚，看画报上面那张大像片有没有走了样。他还要写封信告诉他妈：毛主席满面红光。他想：我为什么不该看看毛主席呢？要不是有了毛主席，我妈一定活不到今天，我自己恐怕还在乡下给地主当牛当马，说不定早给保长抓去当了壮丁。他又想：虽然是在做梦，王理明的批评也不错，我应当多做些让毛主席老人家高兴的事情才对；他老人家也会知道我当了团员了。团员要比群众多作些贡献啊。那么我明天总要比今天不同，一定要多做些好事情。应当做些什么好事情呢？他想着，又感到一点不安了。团员，青年的榜样，党的助手……这不是简单的称号。我不能够让这个称号沾上一点泥！我不能给这个称号丢脸！他越想越着急，思想渐渐地停滞了，脑筋渐渐地迟钝了，心却静不下来，眼睛闭上又睁开，睁开一会儿又闭上。左右两边的打呼声也妨害他的睡眠。他想今晚上是睡不成的了，就生气地出了声骂起自己来："杨林，没有毛主席，你还会有今天？你在考虑些啥子？你难道还有啥子宝贝舍不得交出来？"这一骂反而使自己脑筋开窍了。他接着爽快地答道："没有！"

他讲的是真话。他什么都可以交出来，什么都愿意交出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他感到浑身轻快，满心欢喜。他不再去想睡不睡的事情。可是他闭上眼睛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天刚发白，杨林迷迷糊糊地听见刘加亮和王理明在讲话，他连忙睁开眼睛，洞子里有一点点深灰色的亮光，他看见他们两个站在炕前，衣服都穿好了，看不清楚他们的面貌，只看见他们的轮廓。他想：这不是梦，我今天又迟了！他马上披起衣服叠好铺盖，跳下炕来。

王理明正要出去，听见杨林在说："你起来，怎么不喊我一声？"便带笑地回答一句："时间不到，我还没有吹哨啊！"他马上到办公室去了。杨林和刘加亮一起走到坑道口去。天还没有大亮，雾已经罩下来了。白茫茫的雾越来越浓，他们看得见白雾在交通沟里移动，还在他们的头上移动。王理明在他们后面吹起了哨子，哨子声越来越近。王理明从坑道里出来，又顺着交通沟往右走去，他的身体一下子就让浓雾吞下去了。

刘加亮和杨林两个人拿连长和指导员的脸盆盛了冷水，把脸帕搭在盆上，又把牙膏、牙刷拿出来放在一边。他们刚刚弄好，连长和指导员就谈着话走出来了。

连长和指导员的脸上都带着笑容，他们到了外面便挺起身子，接连地眨了几下眼睛。杨林和刘加亮含笑地招呼了他们。

李连长注意地看了杨林一眼，笑问道："小鬼，你后来睡着没有？"杨林就在他的面前，开始在消散的白雾并不曾遮住小

通信员的圆圆脸。

"报告队长，睡着了，"杨林高兴地笑答道。他这时才看见连长的眼睛里有几根血丝。他不觉关心地想道："队长他们睡得很少啊。"

"不见得罢？"李连长摇摇头说；"我听指导员说，他查铺的时候，几次看见你睡不着觉。你究竟在想些什么？"指导员埋着头在洗脸，没有参加谈话，不过他们的话他都听见了。

"我的确睡着了，"杨林红着脸分辩道；他看见连长黑黄黑黄的瘦脸上露出怀疑的表情，便带笑地接下去说："我听了队长的话以后，一个问题也没有了。报告队长，我后来睡得很香。"

李连长点了点头，就走到放脸盆的矮架前。指导员洗好了脸，刚刚掉转了身子，看见李连长，会意地相对一笑。"老郝，这些小青年就只有一件事情，都想打美国鬼子。我们倒落在后头了，"李连长说，虽然带了一点埋怨的口气，其实心情很愉快。

"老李，大家情绪很高，我看大有可为，"指导员满意地答了一句。雾已经散尽了，蓝蓝的天幕高高地挂在他们的头上，好像比往天高了许多。交通沟里的光线带了一点金黄色，指导员抬起头向四面看看，他觉得心里十分爽快。他又听见了那个非常熟习的苍蝇、蚊子似的叫声，他又看见了那个展翅小鸟般的校正机，接着又是两声炮响。他听见杨林在旁边自言自语："大清早就给我们道喜来了。我们要到十点钟才放礼炮！"他不觉微微地一笑。他掉头去看杨林，这个小鬼正在把

一盆水泼在交通沟里。他心里想："小鬼的心在北京啊。"他接着又想："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个时候是不是在看从朝鲜战场上来的电报？要是我们这个连能够打个大胜仗多么好！"

"老郝，你在想什么？"李连长走过来含笑问道。

指导员转过脸来，带笑地答道："我听见杨林那句话，我的心也到了北京了。"

李连长收起了笑容，看了看指导员，他的脸上现出了严肃的表情，他一面想，一面说："说句实话，谁又不想上北京？我每年到这一天，心里总有些不安定。"他说到这里，忽然停顿了一下。指导员就在这个时候插嘴问道：

"为什么不安定呢？"

"到这一天我就要想，人不能上北京，总得送点礼物上北京啊。这一想我就着急起来了，"李连长恳切地答道，他拿下帽子，不怎么用力地搔着他的短发。

指导员也不笑了。他朝坑道口看了看，只有王理明一个人弯着腰在那里打扫。他压低声音对连长说："同志，你不能着急啊。这些小鬼已经着急得不得了，我们要是也着急，怎么办呢？"他伸起右手用前四根指头把两腮用力擦了一下，又说："这几年我很少着急，反正我把自己的力气全使出来，不断地朝前跑。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向哪里我就朝哪里跑。我决不偷懒。"

李连长拍了拍指导员的肩膀，摇摇头答道："老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脾气你还不知道？我并不是着急。不过每逢国庆节，我就想到我平日应该多做点工作。"

"这一点我懂!"指导员忽然抓住连长的两只胳膊用力摇了摇,带笑地说:"老李,你说谁又不想多做工作呢?你的脾气我难道还不知道?我要去给教导员打电话,我的稿子里面有个地方我还弄不明白,我要向他请示。"

"那么你快去打电话罢,吃过饭,就要开会了,"李连长连忙催促道。指导员就匆匆地走进坑道去了。

不久杨林挑着早饭飞快地走回来了。是满满的两大桶鸡蛋粉和白菜煮的面条。大家或者蹲在坑道口外面,或者放个小凳坐在洞内甬道上,高兴地吃着还在冒热气的面条,平日不大喜欢"用面食当顿"的杨林也吃得很满意,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面食。司务长和文书有说有笑,刘加亮吃得最快,王理明边吃边跟刘加亮开玩笑,他忽然注意到杨林又盛了满满一饭碗面,嘴唇包不住笑地站起来,便问道:"杨林,你不是吃不惯面食吗?"

"我在吃我们祖国的寿面;就是十碗八碗我也吃得下!"杨林兴奋地答道,面碗里腾腾的热气直扑到他的脸上来,他闻到那股使他觉得非常亲切的从祖国来的面香,他的心又到了北京。他挑起面条,满脸笑容地小声说了一句:"多谢你老人家啊。"他好像看见毛主席含笑地望着他,动了动右手,那慈祥的眼光似乎在说:"你要多吃啊。"他不知不觉地点两下头,就一挟一挟地挑起面来大口地往嘴里送。

王理明看见杨林那么高兴,虽然不了解杨林的心理,可是他自己舒畅的心情却使他愿意多看别人的笑脸,而且喜欢多讲话给别人添一些喜悦。他笑着对刘加亮说:"你更应当多

吃两碗，你的喜事就要到了。”

“啥喜事？”刘加亮诧异地问道。

“慰问团快来了，秀兰同志的慰问袋也要到了，”王理明眨了眨眼睛笑答道。

刘加亮觉得好笑。他听见王理明提到秀兰的名字，并不害羞，反而十分高兴。慰问袋的确快到了，他已经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慰问团出国的消息。他不仅暗暗地等待着那个慰问袋，他还在考虑收到袋子以后在回信中告诉她一些什么事情。这些都是王理明所不了解的。所以刘加亮不露一点窘相，也不着急，反而心平气和地微微笑道：“慰问袋迟早总会到的，谁像你那样成天就在想这些事情？”他两眼显得特别明亮，两道浓眉平平地横在眼睛上，连那个小伤疤现在也突然褪了色，就是在他说完话以后，他的思想还不曾离开山东农村里的“秀兰同志”。他自己常常想到“秀兰同志”，这倒是事实。不过他的想法跟人不同。每逢他亲眼见到、或者听见人说起、或者自己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他就会想到那个“秀兰同志”。于是他觉得她同那件事情就连在一起了。虽然那张晒黑了的椭圆脸和那根黑黑的大辫子常常在他的眼前出现，他却渐渐地把她抽象化了。他把她当作了美好事物的代表，“代表”两个字也许不恰当，总之她是美好事物有关的人。所以他虽然并不常常给“秀兰同志”写信，可是每逢别人提到或者自己想到她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而且常常会产生一种向前奔跑的欲望。

王理明碗里的面条已经光了，他拿着碗站起来，看看杨

林，又看看刘加亮，他含笑地对刘加亮说："你不要强辩了。我们就拿现在来说罢，人家杨林的心在北京，你的心却在山东。"他说到这里连忙住了口，因为下面的话差一点漏了出来："我的心在上海。"他的脸有点发红了，他便走开去洗碗。这个时候他的心的确在上海，不过并不是在糖果厂，而是在人民广场，在欢呼口号的游行队伍的中间。笑容始终不曾离开他那孩子似的红红的脸。

刘加亮不回答，他只是笑笑。其实他的心此刻并不在山东，它也在北京天安门。他毫无根据地想象"秀兰同志"也在广场上游行队伍的中间，拿着花向毛主席欢呼。去年他也曾这样地想象过。他仿佛听见了那种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当时他多么高兴！今天他更高兴。他的确有许多应当高兴的理由。其中有一个是：他们到了前沿，队长和指导员说可以考虑他的要求。——他的这一类的思想和这一类的心情都是王理明所猜不到的。同样，他也不知道王理明在上海还有一张瓜子脸。他们彼此间无话不谈，却始终不曾谈到这些连他们自己也讲不明白的心情。

连长和指导员坐在甬道上，他们一边吃一边低声商量事情。有时他们也停下来听听坑道外面的谈话，看看那几张年轻人的笑脸。后来他们谈到了刘加亮的事。指导员听见刘加亮那两句话，又看到刘加亮那张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他便接着连长的话往下说："其实我本来还想留他，不过我看见他那样坚决，他又有战斗经验，我便同意了。"

"老郝，你说得对！这些小青年怎么留得住啊？他们是要

向前跑的，"连长兴奋地说。"我入朝以后看见过多少可爱的小青年，现在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只再见到一个，他不但当了副班长，而且当上了二级英雄，我听了他的典型报告，觉得他跑得真快！"

指导员注意地看了连长一眼。从坑道外射进来的光线，好像就集中在李连长黑黄的瘦脸上，给这张脸涂了一层发亮的油一样。再加上满脸的笑容，它的确会给人带来昂扬的情绪，这说明连长真正为那些可爱的小青年感到莫大的高兴。他感动地唤了一声："老李，我同意你这个意见。我见过的小青年也很多，有几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看这几个小鬼一定会跑得很快，很远！他们的确比我们强。我们不能拉住他们，只能扶他们一把。"

"对！对！扶一把！"连长点头说。他先站起来，捧着空碗走出去。他刚刚走出坑道，手里的碗就被杨林接过去了。指导员跟着出来，王理明又把他的碗拿去洗干净放好了。

指导员跟在连长后面俯着头经过雨道走到办公室去，掀开白布帘子，第一眼便看见洞壁上那张彩色画片。连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包恒大香烟，拿出一根来，用打火机点燃了，满意地抽着，坐在炕上翻看自己的笔记本。指导员看了连长一眼，又看看画片上国庆节游行的场面，走到条桌前，从袋子里摸出了一叠折好的纸，他坐在凳子上，把那叠布满了潦草字迹的纸在桌上摊开来，低声念了两段，忽然抬起头，唤连长："老李！"连长应了一声，也抬起头来看他。

"老李，我看用不着讲那样长了，我想再删掉三分之一，"

指导员带笑地说，

"为什么呢?"连长诧异地问道。

"其实许多话都是多余的。单单每年从祖国送来的一批一批的小青年就可以证明我们祖国的变化有多大！进步有多大！这是大家亲眼看见的，"指导员又激动、又欣喜地说。

连长点点头，抽了两口烟，笑了，他好意地望着指导员说："老郝，我又看到你动感情了。先前我自己也动了感情。谁又怀疑过祖国的变化、祖国的进步呢？不过我还记着你常常讲的那句话：人离开了祖国，就知道自己跟祖国有多么深的感情。我抽这根烟，真像在抽宝贝一样。"他把捏着烟头的右手举起来："你瞧，只剩这么一丁点儿了，我宁可烧到自己的手指头，也不肯扔掉它，这是二〇一从祖国带来的。"他笑了笑，黑黄脸上现出了红色。"要是有人从祖国、从我家乡给我带了一撮土来，你瞧我会不会吞它下去！"(指导员插嘴笑道："你会吞的。")"所以只要是有关祖国的事情，你讲得越多，你的报告越长，大家只会高兴……"

过了半个多钟头，指导员就在大洞里，向着挤满了洞子的听众，报告祖国三年来各方面的辉煌成就。连长主持这个小规模的庆祝会，除了连部的全体同志外，各排都有代表来参加。洞子里点了油灯，又点了蜡烛，不过还是不怎么亮。右边洞壁上就在条桌的后面贴了一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半身像，不用说这是杨林出主意从他们的住室里移过来的。条桌上点了一支长长的蜡烛，高高地插在那个烛架上面，指导员站在条桌的旁边作报告，让所有的听众都能借着烛光看到

毛主席的笑容。洞子里空气不好，咳嗽声此起彼落，好像从四面八方都在放出冷气。可是大家很专心地听指导员的报告。

指导员虽然拿着草稿，不过他并不照着稿上的文字念下去。他望着眼前那些年轻人的脸，那些瞪着他动也不动的眼睛，他又动了感情。好像祖国的手温柔地抚着他的心一样，他那么亲热地、那么情深地、那么高兴地、又那么充满信心地讲着亲爱的祖国的一切。他讲到最后，几乎要含着眼泪叫出声来："祖国，我亲爱的妈妈啊！"可是他控制了自己，他叫出来的却是些振奋人心的响亮的口号。

指导员一个人讲了一个钟头的话。接下去发言的有功臣代表和战士代表。功臣代表是二班的副班长起雷英雄王方；战士代表是八班的王振江。他们都讲得很短，不过是在会上表示杀敌立功的决心。以后便是自由发言，连长问了几次，都没有人站起来讲话。指导员忽然点了杨林的名。杨林一下子就脸红了。他起初非常注意地倾听着指导员讲的每句话和每个字。他的心跟着指导员的话到处跑，在一个钟点里面跑遍了全国。他好像亲眼看到了那一切了不起的成就。他好像听见了成渝路上火车头的叫声，他好像看见了鞍钢平炉里流出来的钢水……他多欢喜，多兴奋，他两眼发亮，听得出神了，不住地在心里说："真好！真好！"他只希望指导员不要停顿，一直讲下去。他的眼光时时停留在照片上毛主席的脸上，好像他还在央求毛主席叫指导员一直讲下去。指导员最后喊口号的时候，大家都跟着喊，大家在大声欢呼。他也用力喊口号，他把脸挣得通红，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毛主席的脸，他觉

得自己就像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样。代表发言的时候，咳嗽声又起来了，大家又感觉到空气不大流通了。可是杨林仍然在留神静听。他虽然认为他们讲得简单，不过他还觉得他们的想法跟他的相差不远。他正在暗想要是他站起来应当讲些什么话，还以为庆祝会马上就要结束，却没有料到指导员会叫他站起来自由发言。他红着脸，瞪着眼睛望着指导员，讲不出一句话。他又暗暗觉得王理明在旁边对他眨眼睛做鬼脸。

"杨林，站起来，讲几句罢。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指导员亲切地说，他带着和蔼的微笑、鼓励的眼光望着这个小鬼。

这一下叫杨林安定下来了。他马上在人丛中站了起来，敬了一个礼。他仍然有点着急，有点紧张，可是他大声地说：

"我没有多少话好说。我比大家笨，我没有文化。不过我到朝鲜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我在旧社会是挨打挨骂、挨冻挨饿长大的。如果再晚两年解放，我早就见阎王了！"他停了一下，听见王理明在旁边笑道："现在没有阎王了。"他更加着急，额上的汗更多了，军帽上除遮阳外全打湿了。他结结巴巴地接连念了两个"我"字，接不下去。脸涨得更红，他没有办法，不敢朝别处看，只好瞪着两眼望对面的洞壁。他忽然看见毛主席在对他微笑。毛主席举起手好像在鼓励他："你讲下去罢！"他真的觉得浑身轻快了许多，他不再着急了，他昂起头又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救了我，也救了大家。我们真的翻身了，有了幸福了。我们指导员常常说：'好日子来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我也懂得今天不是享福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正在千方百计想法子破坏我们的幸福。"他的眼光又停

到那张像片上面："我们一点儿也不害怕。我们有毛主席给我们当家作主。他老人家领导我们走向胜利，从来没有失败过。"他又停了一下，他觉得指导员和连长都在点头微笑，他又说："我没有别的话好说。我是自家坚决要求出来抗美援朝的。我把自家交给祖国，交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叫我往东我就朝东跑，叫我往西就朝西跑。他老人家举手一指，哪怕前面是水是火，我也要心甘情愿奔过去，因为我晓得我是在朝着胜利奔过去。个人死活，都是芝麻大的小事情，横竖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来越强大，五亿人民越来越幸福。我实在讲不好。我今天特别喜欢。我想到天安门前那么多的人在游行，毛主席就像这个样子(他指着那张像片)在招手。我不论啥子都可以交出来，我一点也不保留。我决不讲价钱。我请队长、指导员派给我最艰苦的任务，来考验我配不配当个志愿军战士，配不配当个青年团员。"他说到这里把胸膛挺了一下，他本来还有话讲，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他站在那里红着脸不知道怎么才好。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他。他忽然说了一声："完了，"敬了一个礼，就蹲了下去。他听见一阵热烈的掌声。刘加亮在他背后轻轻地拍他的肩头，说了一句："你讲得好。"王理明拉拉他的袖子眨了眨眼睛笑道："小鬼，我起先真替你着急啊！谁晓得你讲得这样好。你真有一套。"杨林红着脸答不出一个字，他掏出白布手帕来揩掉额上的大滴汗珠。

庆祝会结束了。各班的代表陆续回去，他们还要参加本班的座谈会。好几个认识杨林的人临走时都带笑地邀请他："到我们那里去玩啊。"或者，"你要是忘记了，再来学嘛。"三排

长的紫红色脸膛上露出愉快的笑容，那对眼白常有血丝的眼睛喜爱地打量着杨林，亲切地说："小鬼，你去向指导员要求到我们排里来好不好？"炊事班长眯起小眼睛在他的耳边小声说："等会你到厨房来吃晚饭，我请你喝两杯酒。"杨林对这些好意的邀请，都用感谢的微笑含糊地回答了，好像他说了那一段并不太长的话以后，现在连话也不大会讲了似的。

卫生员范阳拉着杨林谈话，一路走到坑道外面。他紧紧地拉住杨林的一只手，他的颧骨显得更高了，脸上的笑容也更滑稽了。他高兴地说："杨林，我倒愿意走四十里路去看你妈妈，告诉她杨林这个小鬼在朝鲜很乖！"他说到这个"乖"字，杨林忍不住一嗤笑起来，拍了一下他的膀子，骂了一句："呸！哪个听你乱说！"就转身走开了

杨林正要回到里面去，却看见指导员走了出来，他便站在洞口让路。指导员到了外面，抬起头，开口就唤"杨林"，他连忙带笑地答应一声，他忽然觉得指导员对他更亲切了。

"小鬼，我知道你会讲得好的，"指导员满意地说；他注意地看了杨林一眼，又加一句："我知道你也会做得好。"

杨林满脸笑容地望着指导员，说："那么就请指导员多给我任务，我一定好好地完成。我不懂的就学。"

指导员想不到杨林会说这样的话，不过他留心看看这个小鬼的脸色和那对牢牢地瞪着他的亮黑眼睛，他看出这是诚恳的要求。他心里很高兴。可是他并不答覆杨林，却问道："你学会使用武器没有？"

"报告指导员，我都学过了。会不会我自己不敢说，哪天

请你考考我，"杨林昂起头笑答道，他并没有自负的意思，他虽然有时抽空到班里去请人教过他，可是他还没有把握在战场上把各种武器使用得好。

"我哪天真要考考你，"指导员笑道，"我还要考你学文化学得怎样了。"他想起了一件事情："哦，这样罢，你就把你今天讲的话写出来交给我。"

杨林带笑地吐了吐舌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自己找出事来了。"

指导员听到了这句话，心里暗笑，却大声再问一句："你写得出写不出？"

"写得出，"杨林不加思索爽快地答道。他是这样想的：我讲过我决不讲价钱；我不会也要学会；那么我还怕这点困难吗？

二十二

国庆节以后八连的工作紧张起来了。上级新派来一个副指导员。副指导员姓王，年纪轻，身材瘦小，脸给太阳晒得黑黑的。他常常留在办公室看家，也到各排去走动。这个副指导员工作的时候，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他离开工作，却有说有笑，也喜欢讲故事、讲笑话，同杨林他们在一起好像是熟朋友一样。他来了以后，连长和指导员差不多整天都在外面，有时杨林跟着他们出去，有时又是刘加亮或者王理明。他们常常去营部，也到过团部，甚至去过师里开会。杨林也看得出来连长和指导员在忙着准备什么重要工作。不用说，他首先就猜到他们可能在作战斗的准备。但是这件事太好了，这正是他早夕所梦想的，因此他不敢轻易相信自己的这个猜想。有时他也疑心连首长在准备迎接从祖国来的慰问团，但仔细想想，他又觉得这种想法并没有根据。他很想向刘加亮或者王理明发问，可是找不到他们三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处畅谈的机会。有一天刘加亮在吃早饭的时候，对他讲过一句话："我要到三排去了。"他知道三排的九班守着最前面的阵地，不过刘加亮并没有说清楚去的是哪个班。他还想问个明白，刘加亮却拿着空碗走开了。说来也凑巧，不到两个钟头以后，他

跟着连长和指导员到了营部。他的熟人张少林正在右边洞口等候他们。张少林向李连长同郝指导员敬过礼，等他们进去以后，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好久不来看我？我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了。"他连忙高兴地问："哪天来？"张少林兴奋地小声答道："刘加亮要到班里去了，我就到你们那里去。"可是这以后好几天不见刘加亮走，也不见张少林来。有一天他无意间向刘加亮问了一句："你怎么还不走，"刘加亮只是笑笑不回答。他以后也就不再问了。他知道连长和指导员都到前面去看过地形，是刘加亮跟去的。他也不曾向刘加亮问过半句。又有一次，营长到前面去过一趟，那是在天刚黑的时候，张少林跟着营长来了。他亲热地拉着张少林的手，忽然漏出了一句："你说要来，怎么还不来？"张少林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他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杨林有时也溜到班里去，继续向几个熟悉的战士学习使用各种武器，听他们讲解各种武器的性能。他看见班里也很紧张。战士们纷纷开小组会讨论怎样作战、怎么取得胜利这一类问题，大家都在写要求任务的决心书。好几个战士都在决心书上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一定要打个漂亮的胜仗向祖国来的亲人献礼。"杨林知道他所盼望的事情就要来了。他又高兴，又兴奋。不过他也不曾对别人讲过什么。他只有在心里盘算到了那天自己应当做些什么事情。

有一天他从班里回到连部，知道自己已经会使用两三种武器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见见指导员，刚刚走到办公室，站在白布帘子外面，听见连长在小声讲话，他从帘子的

缝隙悄悄地朝里望，看见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和几个排长都在里面，便连忙走开。他刚刚走到大洞口，就听见刘加亮、王理明和范阳在里面谈话，他不想进去，转身便走。王理明在洞里唤他，他答了一句："我有事，等一会儿来。"他回到自己的住室。洞子里虽然不算亮，可是连洞壁上贴的图片他也看得清楚。现在只有两张图片了。他最喜欢的那一张在国庆节那天由他亲手揭起来贴到大洞里以后，也就再没有拿回来，他以为让大家看看更好些。他看看《北京初雪》，又看看《江楼春晓》。他从没有见过那么可爱的雪景，可是他记得那座漂亮的楼房，那丛绿幽幽的竹子，那条一直缓缓地流着的锦江。它们都在他的眼前活了起来。他心里热烘烘的。他掏出笔记本来，撕下一张空白页。他把砂石台上那个"花瓶"拿开，自己站在台前，摊开纸，俯下头，写他的决心书，他边写边念，越写越激动。他甚至要求连首长派他到八班去当战士受锻炼。他写得简单明白，字数不多，可花了很多功夫，为了几个字写不好，他翻了书又翻字典。他写得满头大汗，写得眼睛痛，正在紧张的时候，忽然有人在背后拍他的肩头。他大吃一惊，回过头去。他觉得眼睛花了，但是他听见了王理明的笑声："小鬼，你说等一下，我们等了一个钟点了。你原来在写这个。"他一面揉眼睛，一面问："你们等我，有啥子事情？"他的心还在没有写完的决心书上面，王理明指着台上摊开的这张纸说："就是这件事。"他马上惊喜地说："真的要打了？"王理明并不直接回答，却含笑说："我们要开个团小组会。你快来罢。"杨林不说什么，便收起决心书跟着王理明走了。

大洞里又来了一个人，就是炊事班的老郑。于是他们五个人坐在炕上开起会来。杨林听见刘加亮的讲话，觉得心都要跳出口腔来了。他极力压住自己潮水一样奔腾的情感，小声对坐在他旁边的王理明说："你们怎么早不告诉我？"王理明含笑地轻轻答道："谁叫你那样老实？以后旁人讲一句，你要听进两句才好。"他也不再发问了。刘加亮讲完以后，大家都要抢先发言。这个小组会开得很热烈。没有人表示顾虑。大家都兴奋地表示个人的决心。范阳保证做到抢救及时，使挂花的同志都得到包扎；老郑保证仗打下来每个人都能喝上热汤，打仗的时候还要做好担架的工作，不让重伤号留在阵地上。王理明保证认真、准确地完成通信任务。刘加亮保证全心全意做好首长交给他的任何工作。杨林到了这时，便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要求到班里锻炼的思想"并不对头"，他也保证要坚决地执行首长的命令，他甚至昂起头，红着脸说："我妈在家乡过得很幸福，我哥哥嫂嫂都在努力工作，我们祖国建设得这样好，我还有啥子丢不开！只要对胜利有益，哪怕我身上挨一千颗子弹，我也不在乎。"他一激动，头上又出了不少的汗，可是他不去管它，就让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忽然冲动地说一句："我还要争取火线入党！"其实他也不大明白"火线入党"的事情，不过他常常听见人讲起这四个字，到这时他觉得他需要找一个更高的目标，这句话就冲出口来。他说了这句话，还有点耽心他们批评他夸大，同时他又高兴自己找到了奋勇前进的目标。王理明在旁边拉拉他的袖子，小声说："小鬼，倒看不出你越跳越高。"他的

脸涨得通红．他侧过头去看王理明，王理明鼓励地望着他微笑，他才放心了。

杨林刚说完话，金文书忽然大声唤着刘加亮的名字，走了进来，说是连长在叫刘加亮，又说是营部来电话叫刘加亮马上去。刘加亮有点紧张地跟着文书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大洞里的会还不曾结束。刘加亮匆匆地走了回来。大家围着他问是什么事情。刘加亮含笑地回答："我也弄不明白，听说是到师里去看表演，还要穿得整整齐齐。为啥一定要叫我去，我实在不懂。"刘加亮露出了一点困惑的表情。王理明马上接下去说："我晓得一定是慰问袋到了。送袋子的人要见见你的面。"刘加亮带笑摇摇头说："慰问袋到了，留下来就是了，为啥一定要我去？"王理明噗哧一笑："那么就是做袋子的人到了。"他因为自己说了这句开玩笑的话正在得意，忽然听见文书在唤"王理明"，他连忙答应一声。文书正经地说："队长说，叫你跟刘加亮一块儿去，马上就动身，要换上新衣服。"王理明楞了一下，答不出话来。范阳在旁边做出滑稽的笑容说："王理明，那么你的姐姐也来了。"王理明马上红了脸，也不理睬范阳，却问刘加亮道："我们要不要现在就走？"他红脸，只是因为那张瓜子脸在他的脑子里闪了一下。刘加亮点点头，又对杨林他们说："你们还是谈下去罢，我们先走了，回来还可以谈。"

刘加亮和王理明回到小洞里换上了新军服，把毛巾、牙刷、搪瓷饭碗都带上了。两个人一路到办公室去见过连长和指导员，听了几句简单的指示以后，便挎上枪走出了坑道。杨林和范阳正在坑道口外等候他，老郑已经回厨房去了。杨林笑着

说："会已经结束了，我们来送你们。"范阳接下去说："表演节目是带不回来的，不过如果有上海糖果厂的水果糖，一定要留几颗给我们尝尝啊！"王理明这次不红脸了，他大方地笑答道："好，包在我身上，我就是向人讨也要讨几颗带回来。"他们两个人一挥手，就顺着交通沟走了，一路上发出庆孔庆孔的声音。

杨林站在交通沟里呆呆地望着他们的背影。范阳在旁边关心地问道："他们走了，剩你一个人，要不要我来帮忙？"杨林连忙摇头道："我一个人做得了。我看我倒可以抽出时间来给你帮忙。"范阳笑了笑："小鬼，不要讲大话了。你如果跟着我跑来跑去，哪个来完成通信任务？"杨林自己也觉得好笑，便恳切地说："那么你有空，多来几趟罢。"

范阳走后，杨林觉得空闲了。他回到坑道里把大洞和小洞都检查了一遍，到处去找可做的事。他又走到办公室，在帘子外面站了片刻，里面还是谈得很起劲。他兴奋地想：他们在讨论那件重大事情。他便往外面走，他很想到炊事班去看看，他以为在每个地方都会看到不同的气象，可是他又不敢走动，他应当准备着随时听候连首长的差遣。他走过小洞口，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决心书，便拿出来在坑道口念了一遍。他想了一阵，后来决定删掉要求下去的话，把刚才在小组会上谈的意思加了进去。他就走进小洞，仍然站在砂石台前俯下头把决心书写完了。他觉得眼睛酸痛，心里却很轻快。可是他闲不惯。他又在小洞里东看西看，洞子里干干净净，炕上三个人的包袱和铺盖仍然放得整整齐齐。连那个代用花瓶里插的花也是刘加亮今天早晨换上的。他看见无事可做，就开始演习他在班里

学过的使用那些武器的动作。他端起枪瞄准，他做着掷手榴弹的姿势……这个洞子太小了。他便到大洞里去点起灯演习，一个人忙着，弄得满头大汗，虽然他除了一支枪，连一颗演习用的木头手榴弹也没有，可是他干得很起劲。他时而趴在地上，时而站起，时而跑两步，时而蹲下。他整个背都打湿了，他才在炕上坐下，掏出手帕揩头上和脸上的汗水。他的眼光朝着洞壁上的画片。灯光不亮，油快点完了。但是毛主席的笑容仍然清清楚楚地现在他的眼前，因为他看得太熟了。"现在又干啥子呢？"他揩掉汗，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他忽然从怀里掏出了笔记本，翻着他自己抄下来的一些生字。他又站起来，吹灭了放在条桌上的那盏罐头油灯。他拿着笔记本走到坑道口，就蹲在洞口，专心地念那些生字。他念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找到了一根树枝，就蹲着在脚前的砂土上面一笔一划地写来写去。他写了一阵，忽然醒悟似地站了起来，朝左右看了看，也不进去，就顺着交通沟跑。他已经望见了炊事班洞子旁边的一丛灌木，却不料老郑挑着担子迎面走来，开口便问："你到哪里去？"他吃了一惊，并不回答，倒反问一句："你到哪里去？"老郑不慌不忙地笑答道："我给他们送饭去。"

杨林知道自己来迟了，便红着脸央求道："老郑，给我挑罢。你看我双手空着怎么好回去？"老郑带笑地望着他，什么话也不说，就把担子放下了。杨林说声："多谢，"挑起担子一闪一闪地在交通沟里小跑起来。老郑连忙唤住他，他回过头问："啥子事？"老郑含笑说："我们班长要请你去吃东西。"他答了一句："你替我吃好了。"他跑得很快，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老

郑仍然带笑地站在那里，校正机像老鹰一样在天空打旋，冷炮在远处响一声，又在近处响一声。老郑一个人在叽里咕噜："把好的让给人家，见苦的就抢过去，我说这也是自私。我要向他提意见。"老郑讲的是杨林，可是他已经跑远了，听不见了。

杨林挑着晚饭回到连部，把担子放在小洞里，便到办公室去通知连首长。办公室里的讨论还没有结束。大家正在注意地听三排长讲话，连长说了一句："你跟文书两个先吃罢，把我们的留着。"他刚要退出又听见指导员吩咐："给我们弄点水来。"他顺便把几个空水瓶都拿出去了。他出了坑道口就飞跑，在交通沟里没有人拦阻他。他到了厨房，赵班长正在用借来的磨子推豆浆，老郑在打扫厨房。别的同志给八班送饭去了。赵班长看见他，便露出和蔼的笑容，好像连颊上的麻子也在发亮。赵班长刚刚叫出"小鬼"两个字，他连忙插嘴说："班长，我已经吃饱了，"他却没有料到他的肚皮咕咕地响了起来，自己也觉得好笑。赵班长望着他笑了笑，看见他要到灶前去舀水灌水壶，便说："你让老郑给你灌罢。"老郑马上走过来。杨林已经灌好一壶了，便把水瓢交给老郑。老郑本来要讲话，看到杨林满脸的笑容，又不作声了。赵班长从蒸笼里拿出四个还在冒热气的馒头，用报纸包好，递给杨林。杨林起初不肯接。赵班长笑道："你不要客气。这是我自己省下来的面粉做的，还放得有糖。连首长一人一个。剩下的一个才是你的，你一定要吃啊！"杨林道了谢，接过了馒头，又把水壶挂好，亲热地说声："再见，"就跑回连部去了。

杨林回到连部，看见担子放得好好的没有人动过，知道文

书也不曾出来吃饭，他便打开报纸包，把馒头放在饭盒子里面，然后把水壶送到办公室去。指导员正在讲话，他也不去打扰他们，只是看了文书一眼，用眼光问："你要不要吃饭?"就退了出来。文书也跟着出来了，在帘外甬道上拉住他小声说："我等会儿跟队长他们一块儿吃，你先吃罢。"他也不说什么，一个人走到小洞里，站在饭盒子跟前，自言自语道："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可是他的肚皮又在叫了。他走到坑道外，又走进来。他终于从饭盒子里拿出一个糖馒头吃了。他的食欲还没有压下去。他想道："队长说过要我先吃，我现在吃也没有关系。"但是他马上又反驳道："队长他们能够忍饿，我怎么不能？我在解放前哪天不挨饿?"他又想："今天并不需要忍饿。我热的不吃，要等到冷了才吃，有啥子好处？队长明明叫我先吃。"他心里又不同意："这是考验，这是锻炼嘛。看你是不是受得了。如果你连这点小事都熬不过，以后打起仗来几天吃不上饭，你要不要熬?"他想到这里忽然笑了笑，说了一句："没有问题。"接着他又带笑地批评自己："天天吃饱饭吃惯了，坏脾气都来了。"他真的把吃饭的事情丢开了。他拿了一本小人书打算走到坑道口去念一遍，顺便把《新字典》也装在裤袋里。书上讲的是刘胡兰的故事，这是王理明的姐姐新近从上海寄来的，他想好好地学习一下。可是他刚刚走到坑道外面，忽然想起连首长开会的事情。他奇怪会怎么开得这样久，他又觉得会应当开得这样久，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会的内容。他也知道他们讨论的事情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他甚至希望会越开得长越好。"那么他们要到啥子时候才吃饭?"他给自己

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马上想到了一件事情：不能让连首长吃冷饭啊。他连忙回到小洞里去。他揭开饭盒子的盖子，饭还是热的，馒头也还是热的。他高兴极了。他朝炕上看了一眼，就把饭盒子拿到炕上去，把自己的铺盖摊开，被面朝里地翻过来，紧紧包住饭盒子。然后再把自己刚领到的棉军衣盖在上面；接着他把那个菜盒子也用自己的旧军服包着，外面再盖一件自己还没有穿过的崭新棉大衣。这样炕上就添了两个大包袱。他自己看看非常得意。他心里想：连首长不会吃冷饭了。

连首长吃饭的时候，菜还没有冷，饭也是温热的。这是一个多钟点以后的事情了。会议已经结束，排长们纷纷散去。三位连首长吃得津津有味，他们特别满意那三个糖馒头。杨林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他自己很快地就吃光了三碗饭。指导员表扬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洗碗了。可是他听见指导员的话，尽管人弯着身子，仍然会脸红，他觉得表扬超过了他做的事情。

晚上连长和副指导员都出去了。指导员在家，他把杨林叫到办公室里去，跟这个小鬼谈了将近两个钟头的话。起初就只有他同杨林在办公室，他知道一点杨林过去的情况，这时便详细地问起来。他也对杨林讲了一些自己的故事。他什么都问，什么都谈。杨林渐渐地把他当作自己的哥哥一样，没有拘束地讲出心里的话来。指导员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小鬼思想上毫无顾虑，小鬼的心就像一块透明的玻璃，上面没有一点肮脏的灰尘。小鬼虽然不曾上过战场，可是没有疑问有决心完成他交下的一切任务。他又欢喜、又放心地望着杨林那张

充满着朝气的圆圆脸和那对又黑又亮的眼珠。他想要是这个小鬼能够去北京见到毛主席那多好！他对杨林说了好些鼓励的话，也谈到打仗的事情，又了解了杨林最近常常到班里去学习使用武器的情况。后来卫生员范阳和文书都来了。范阳提到杨林白天讲的“火线入党”的话，杨林马上红了脸，他还耽心会挨指导员的批评。谁知指导员露出喜色点着头说：“对！要立大志啊！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越高越好。”他又含笑地问杨林：“小鬼，你说对不对？”杨林瞪着两只眼睛，望着指导员黑黑的长方脸，接连答了两声“对！”指导员又说：“小鬼，我还记得你在国庆节会上讲的话，你给我写下来的也还不错。我相信你，你讲得好，一定也做得好。”他愉快地笑了。

杨林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这张长方脸。他仿佛还看见旧军帽遮住了的那块大伤疤。他昂起头，挺起胸，激动地说：“请指导员考验我。”

在办公室里谈完了话，杨林陪着范阳出来，他要把卫生员送到坑道外面。谈话的时候，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现在他才感觉到洞子里的潮湿空气阻碍他的呼吸畅通，也想到洞外站一下。范阳紧紧地拉住他的手说：“同志，努力啊！”他也拍拍范阳的肩膀答道：“你也努力啊！”范阳把他的手用力捏了一下，忽然问一句：“你想不想你妈？”他兴奋地答道：“我怎么不想？她好像就在我身边。我越想她，越高兴，胆子越大，我啥子都不害怕，哪怕——”他马上咽住了以后的话。范阳摇摇他的手追问道：“你怎么不说下去？哪怕，哪怕，哪怕啥子——？”坑道外是一片漆黑。范阳看不见杨林的颜色，却看到那对在

滚动的发亮的眼珠。杨林笑了，他吸进凉爽的夜气，感到满身轻快，他仍然兴奋，并没有留恋或伤感，他坦白地答道："我说顺口了，其实心里并没有想到这个。我说哪怕——哪怕我下不了山，回不了国，我说，哪怕牺牲了，我也心甘情愿。"范阳更使劲地捏着杨林的手，好像害怕杨林马上缩回去似的。范阳说："我不相信你会下不了山。我要好好地照顾你。我看这样罢：你跟着我学学包扎。我明天就来教会你。我挂了花你给我包扎；你挂了花我来。指导员刚才不是说过：准备得越好，损失越小。对不对？"范阳又摇摇杨林的手。杨林高兴地点点头："对。只要是有用的，我啥子都要学。你不能失信啊！"范阳满意地笑了笑："一言为定。"又加一句："我明天把我家里地址写给你。"杨林马上接一句："我也把我的写给你。"范阳放开杨林的手，说声"再见"，就转身走了。

熄灯时间到了以后，杨林一个人睡在炕上，听不见刘加亮和王理明的打呼声，他感到一点寂寞，他觉得有满肚皮的话没法讲出来。但是他仍然很兴奋。他想象那两个同志在师里看表演的场面，他又想象那件就要到来的大事情。他决定不要再胡思乱想。可是他又想起了指导员讲的一些话。然而出乎他自己的意外，不多久他就沉沉地睡去了。他实在疲乏了。

二十三

刘加亮和王理明到了营部，也不曾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拿到一封介绍信一直往师里去。两个人一路上东猜西想，你一句我一句把什么都讲到了。不用说，王理明讲得更多，因为他知道"秀兰同志"和慰问袋的事情。他们高高兴兴，脚步轻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师部，走进山沟口，意外地看到一座松枝和柏枝扎成的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的牌楼。他们到了司令部，交出介绍信，报了到，被安置在临时招待所里面。招待所在半山，就是在这个山坡上挖走一大块长方形的黄土，然后搭起木头架子，盖上树枝树叶，涂上黄土泥修成的。三面都是黄土，屋顶也是黄土，只有正面留着两道门和两面窗。里面有三个大炕，已经住了十个人。他们把背包打开，铺在中间一个炕上，并不显得挤。

先到的同志们看见这两个通信员，都过来问长问短，热情地给他们帮忙。刘加亮以前见过其中的两三个，现在仔细一问，原来都是本师著名的英雄和模范。他们夹在中间，开始惶恐起来，有点坐立不安了。英雄模范们好像猜到了他们的心理一样，并不问立功的事情，只谈祖国和慰问团。他们渐渐地就跟这些人熟习了，而且对话题感到了很大的兴趣，一直到通

知开饭的时候，他们才跟着英雄模范们一起出去。

他们起初还以为这不过是像平日那样地吃饭，主要的节目是在晚上的表演。可是他们跟着众人走下山去，过了一个干沟，顺着小路走不多远，看见好些人站在一处讲话。原来那里有一个大洞，洞口也扎了一座牌楼。他们跟着英雄模范们到了洞口，马上有人招呼这十二个人进去。他们只知道这个人是政治部的干部，却说不出他的姓名和职务。这个人还指定了他们在席上的座位。

这个洞子不算小，里面装成了一个干干净净的饭厅。白木天花板上挂着几盏汽灯，把整个洞子照得很亮。洞子里摆了二十张白木方桌，每张方桌上放得有一瓶花，两瓶酒，四个冷盆。刘加亮和王理明揭开厚厚的帘子走进洞来，马上楞了一下，两个人对望了一眼，还疑心走错了地方。等到那个干部给他们安排了座位、把他们分在靠近的两张桌子上的时候，他们只觉得心里发慌，还担心发生了误会，那个干部弄错了名字，把他们找来了。但是他们也只好忍耐地站在方桌旁边等候着。

人越来越多，差不多每张桌子旁边都站得有人。刘加亮的这一桌已经有了五个，王理明的一桌也有了四个。他们并不认识同桌的人，大家第一次见面，相对笑笑，好像就熟了。他们两个，尤其是王理明，有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他们从来不曾参加过这样的宴会，而且也觉得自己没有参加这种宴会的资格。刘加亮只立过一个三等功，王理明连芝麻大的功劳也没有。所以他们会疑心别人弄错了名字。他们正在这样胡思

乱想的时候，忽然听见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同桌的人都在鼓掌，他们也跟着拍手，而且特别用力拍，他们看见师长和政委陪着客人进来了。

师长和政委都是他们见过的。他们先看客人。客人不少，有男有女，饭厅里一阵拥挤，他们的眼睛都花了，看到这个，又漏掉了那个。他们好像把每个新从祖国来的人都看清楚了，可是连一个面貌也没有记在心上。不，他们两个都看到了一个人，虽然是匆匆的一眼，却使他们吃了一惊，他们仔细地用眼光去找寻，许多陌生的面孔拦住了他们的眼光。他们看见别的桌上的人都拉开板凳坐下，连忙转身就坐。王理明先坐下。他抬起头忽然看见一张瓜子脸，他眨了眨眼睛再仔细一看，仍然是细眉毛、薄嘴唇，和波纹式的浓发。他看见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注意地望着他，瓜子脸上露出了他熟习的笑容。原来是她。于是一切的疑惑与不安都消除了。上海来的！又是她！一个文工团女同志在旁边陪她讲话，向她介绍同桌的人，她点点头说一句："你辛苦啦！"便伸出手来。文工团女同志介绍了本师的一等功臣李中和二等功臣方文英以后，就要介绍王理明，她只知道王理明是那位上海女代表的熟人，却忘记了他的名字，她刚刚伸出手指着王理明，上海女代表就含笑地说："王理明同志，你还认得我吗？"多么亲切的上海口音。王理明的心忽然跳得更急了。他又眨眨眼睛，回答道："周金妹同志，我怎么不认得你！"便站起来紧紧握着她伸过来的手。周金妹高兴地笑笑，又说："你想不到我会来罢？阿姐有东西带给你。你穿上军服我要不认得你了。"她还想讲话，可是看

见文工团女同志继续介绍其余的同桌的人，只好住了口含笑地向别的人伸出手去。

王理明趁这个时候朝右面看了一眼，刘加亮正在跟一个垂着一根黑黑的大辫子的女同志讲话。刘加亮和那位女同志正好坐在两只角上，谈话很方便．刘加亮高兴地在笑，那位女同志稍微带点黑色的椭圆脸上也现出愉快的笑容。她的两边脸颊红红的就像苹果一样。他想，是不是“秀兰同志”来了？原来刘加亮刚转过身就听见一个非常熟的声音在唤：“加亮哥。”他常常想念的那个人站在他的眼前，一只结实的手伸了出来。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了一句：“你到底来了！”她满心欢喜地笑道：“我说来就会来的。我给你带来好消息，刘大婶身体健康。”他等到大家坐下以后，又问她：“你要来为啥不先写个信通知我？”她含笑回答：“我不知道来朝鲜能不能看见你。写了信反倒让你着急……”她的话没有讲完，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师长站起来讲话敬酒了。

师长身材瘦小，但是声音洪亮，话不长，却很有力量。他讲完话，整个厅子里的人都站起来敬酒。刘加亮这一桌上除了王秀兰外，还有一位从祖国来的代表，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模范，她有三个儿子参加抗美援朝，大的两个已经牺牲，小的一个还在前沿的连队里，说是明天可以赶来跟母亲见面。老大娘向志愿军同志敬酒，一喝就是一大口，王秀兰喝得很少，她就批评一句：“你是志愿军的未婚妻，敬杯酒还不诚心。”刘加亮担心王秀兰不好意思，就打岔说：“我们向志愿军的妈妈敬酒。”老大娘果然又大口地喝起来。王秀兰虽然红了一下脸，

可是她仍然有说有笑，她看见刘加亮劝老大娘喝葡萄酒，便对刘加亮说："不要让施老妈妈多喝，老人家酒量浅。"老大娘接连地摇摇头说："不要紧。我见到最可爱的人很高兴，不会喝酒也要喝。"师里休养所的女同志马上接下去说："请吃菜罢，"她挟了一筷子菜送到施老妈妈面前的碟子里。

在隔壁那张桌子上，周金妹向功臣们敬过酒后，还举起杯向王理明敬酒，她还笑着说："阿姐说的：'你见到他要多敬他两杯酒。'"王理明拿起酒杯望着这张两颊带点红色的瓜子脸，想起了姐姐那张爱笑的圆圆脸和北站月台上、来信上等喜报的话，他觉得自己了解她的意思。他没有一点顾虑。他怀着信心地望着她笑笑，说一句："我吃。"他把小杯子里面的酒慢慢地喝光了。他喝酒的时候，心里想着一件事情：我就要走上战场了。他相信自己绝不会给她们丢脸。

又是一阵响亮的掌声。慰问团分团的副团长讲话了。大家恭恭敬敬地坐在板凳上，倾听祖国亲人的声音。刘加亮和王理明注意地望着那个瘦长的中年人，听见那个人热情地谈到祖国的时候，忍不住回头看看自己家乡的来客。他们有一种回到祖国、欢庆佳节的感觉。这个亲人的长篇讲话结束了。于是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嘈杂的人声和欢乐的笑声。

现在是慰问团同志们正式敬酒的时候。连不喜欢喝酒的王秀兰也认真地跟志愿军的功臣们碰杯。她最后跟刘加亮碰杯，施老妈妈逼着他们两个干杯。两个人都很高兴，都有许多话要说，也很满意整个厅子里这种欢乐的气氛，他们甚至不讨厌施老妈妈好意的开玩笑，经她逼了两次，他们真的喝干了。

王秀兰马上挽住施老妈妈一只胳膊，带笑央求道："老妈妈，我不能喝酒，再喝就要醉了。你老人家要照顾我啊！"施老妈妈轻轻拍一下王秀兰的肩头："你们干了杯就好了。以后要喝酒我替你喝。"王秀兰又带笑向那位休养所的女同志示意，还说："同志，请你多多照顾她。"那位女同志笑答道："不要紧，"因为她知道师首长不让多预备酒，免得有人喝醉。

在隔壁的桌上，周金妹也在向王理明敬酒，她已经向功臣们敬过了酒，功臣们喝得不多，她说了许多话，才使他们干了杯。她知道王理明能喝酒，又向他提到阿姐，又讲起他家里的情况，王理明倒愿意喝光她敬的酒，不过还有点替她担心，他老实地说："我吃完就是了。你的酒留着回到上海敬我阿姐罢。"周金妹真的喝了一口就放下了杯子。

宴会在亲切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厅子里灯光辉煌，笑语喧哗，人们纷纷离座敬酒。洞外却看不见一线亮光，敌机在这附近盘旋了好久，终于找不到目标失望地飞走了。宴会结束后还要举行舞会。慰问团的代表们先回招待所去休息了一会儿。刘加亮和王理明留在这里等候他们的熟人，看见同志们收拾碗筷、搬桌子、板凳，他们也动手帮忙。桌子全搬走了，板凳都靠壁放在四周。乐队进来了，坐在大门对面的一头。王秀兰和周金妹跟着副团长和别的代表们一起来了，在一片掌声中走进里面。她们看见刘加亮和王理明站在离大门不远的一个角上，就走去找到他们，王秀兰把一个用牛皮纸包好的装得满满的慰问袋交给刘加亮，周金妹把一个包得很好、用线缝起来的布包递给王理明。两个包上都写得

有部队的代号和收件人的姓名。他们四个人找到两根空板凳坐了下来。周金妹满意地说："我担心在朝鲜见不到你，写好了地址，打算请人交给你，后来我们副团长在军里向首长提起来，就把你找来了。这里面有阿姐带给你的，有我带给你的。你回去拆开就晓得。"王秀兰小声问刘加亮："你觉得我有改变吗？"刘加亮带笑地打量打量她，说了一句："你说呢？"王秀兰忍住笑说："我要听你说。"

乐队奏起了舞曲。慰问团副团长和师长都走下舞池。有一个慰问团的同志走过来，对周金妹说了一句话，周金妹站起来，笑着对王理明说："你要等我啊！"就跟着那个人走了。过了一会儿王理明就看见周金妹一只手搭在副师长的肩头跳过他面前，对他微微点了点头。周金妹跳完一个曲子，回到王理明身边来。她从青呢人民装的袋里掏出手帕揩了揩鼻头，拿着它在嘴下胸前搧了几下，抱歉般地说："你等久了吗？"王理明笑答道："不，我看你跳舞。你跳得不错。你在上海好像不跳舞。"周金妹含笑道："我在上海只跳过集体舞。这是出国的时候才学会的，我们副团长也是才学的。不过我倒愿意多跟你讲讲话。"曲子早已奏了起来，她以为可以休息一场了。谁知话刚说完，那个塌鼻头的同志又过来把她拉走了。王理明很希望多听她谈谈上海的事情。可是看见她又走了，他也不觉得扫兴。他看看舞池里的人，又想想祖国和上海，他刚才还听见上海的口音，从上海来的人就要回到他的身边。他跟上海靠得多么近。他又看见她那含笑的眼睛在招呼他，他又想起先前散席的时候她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的那句话："我要特别谢谢你，

你在保卫我们上海啊。"他很兴奋，他觉得他懂得这句话的意义了。他拿起那个浅蓝色布包看了一阵，布包上面好像还有上海的气息.他又仿佛闻到了糖果的香味。他高兴地想：杨林有糖果吃了。布包缝得很好，上面的字迹不是他的姐姐写的，虽然大小粗细不匀，但是笔划清楚，可能是她写的，他应当感谢她。他抬头用眼光找她。她轻轻地滑过来了。她在回答政委的问话，一面向他含笑地点头。他兴奋地想道："我决不辜负你到朝鲜走一趟！他立功的决心更坚定了。"

刘加亮和王秀兰仍然同坐在另一根板凳上谈话。他们和王理明中间隔了一根板凳，先前周金妹给人拉去跳舞的时候，刘加亮就带笑问王秀兰："你怎么不去？"王秀兰摇摇头，说："我不会。我才不要跳。"她又笑道："我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我。"刘加亮看她一眼，他觉得浅黑脸包不住那种衷心愉快的笑，好像它马上就要绽出来在她脸上开花一样。他高兴地答道："你变得多了。我跟你握手的时候就知道。"她满意地笑了笑，又问一句："你高兴吗？"刘加亮忍住笑答道："我不说我高兴不高兴。我问你为啥当了模范不告诉我？到朝鲜来也不告诉我？你赶到我前面了，我难道不高兴？我还记得我出来的时候，你哭肿了眼睛。"王秀兰掩住嘴轻轻地笑起来："那是去年的王秀兰，不是我。人家才有点进步，你不该挖苦人家，我哪里比得上你，加亮哥，我到朝鲜来看看，才知道你们真不简单。听说你们在前面住坑道更苦。"刘加亮又注意地看她一眼，她笑容收起来了，两只眼睛亮晶晶地瞪着他，不等他开口，低声惊问一句："加亮哥，你眉毛上是啥？"她伸起右手的食指指着

那个伤疤。刘加亮微微笑道："这是给炮弹皮子崩了的，不要紧。"她忍不住伸过那根指头去挨了一下那个伤疤。刘加亮连忙把头往后一动。她立刻缩回手关心地问一句："痛吗？"刘加亮用感激的眼光看她，摇摇头笑答道："不痛。"王秀兰仍然望着那个伤疤说："好险啊。加亮哥，下次要小心啊。"刘加亮点点头说："我知道。不过你回到祖国，回到家里，千万不要对我娘乱讲啊。"王秀兰揩了一下眼睛，忽然又高兴地微笑道："加亮哥，我不回家了。"刘加亮马上惊问道："你不回家，你到哪里去？"她从容地答道："我就留在这里。你不能再说不收女的了。你瞧这里明明有好多女的！为什么单单不要我？你不给我帮忙，反倒扯我的后腿！"刘加亮望着她着急地说："秀兰妹，办不到，首长不会答应的。不是我扯你后腿不让你来，我当初就说过：要是收女的，你也得去！可是现在不收女的，我也没办法。"王秀兰又掩住嘴轻轻地笑了："瞧你又在着急了。人家倒想跟你一块儿工作。只要在一个地方，就是半年见一面也不要紧。我只要跟你过一样的生活就放心了。要吃苦，咱俩一块儿——"刘加亮听到这里，连忙插嘴道："你说吃苦，你瞧，这个地方多漂亮，大家跳得这么高兴，"一个小通信员端着搪瓷盆子送水果糖来，刚刚走到他们的面前，两个人各抓了一把拿在手里，通信员走了。刘加亮接着说下去："我们还有糖吃。我说这是享福啊。"他剥开了糖纸把糖果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尝着甜味。王秀兰看到他那愉快的脸色又笑着说："好罢，你说享福就享福，咱俩也要一块儿。"她也吃着糖，而且嚼出了响声。刘加亮看看她的脸色，知道她说的不过是个人的愿望，她虽然

没有笑出声来，可是满脸都是笑意，那双眼睛比杨林的还要圆，还要黑，还要亮，不但眼睛亮，整个脸都在发亮，她一年半前不是这个样子，她一年半前哪有这样地可爱。他不看舞池里的人们，他也不留意四周的一切。音乐声、脚步声、谈话声都不曾打扰他的注意，他并不是一直呆呆地看她，但是他的眼睛里一直有她。他不再谈"留下不留下"的问题了。他兴奋地称赞了一句："你的确变得多了！"她知道他满意她的变化，不过她故意再问一句："你喜欢吗？"刘加亮捏捏自己的手，笑道："我觉得好像在做梦一样。我昨天完全没想到。你忽然来了。我平日就是这样想的……"王秀兰听到后一句话不了解，便插嘴问道："你怎么想的？我不明白。"刘加亮自己也觉得好笑，不过他仍然很兴奋，很喜欢，他想了想，才说："我平日每逢想起美好的事情，总会想到你们。今天看见你变了，我想我们村子一定也变了，一定也变得多么好！我娘一定也很好。我在朝鲜还有啥放不下心的事情！我问你朱大福抓到没有？你快跟我谈谈我们村子里的大小事情，谈谈我娘的情况，谈谈你自己的情况。你也不多给我写几封信来。"王秀兰本来准备趁这个时候对他谈谈他关心的一些事情，可是听到最后一句，便解释道："人家写了两封信，你都不理。"刘加亮连忙说："我不是写过回信吗？"王秀兰第一次撅起嘴说："你自己说，隔了多久！你那封信还是人家动身前一天收到的。人家收不到你的回信，还当你嫌人家——"刘加亮马上分辩道："我初到朝鲜半年多，你一个字也没有写来。写信给你，你也不回。这又怪谁呢？"王秀兰听见这些话，又掩住嘴笑了："加亮哥，你莫怪我，人家从

前不好意思，不知道要写些啥才好。当初人家不明白朝鲜的情况，只顾替你担心，你走后，人家不知道哭了多少回。就说这回人家来一趟，也不容易啊！起初大家都爱开玩笑，叫人家做'志愿军的未婚妻'，拿人家当新媳妇儿看待。人家脸红过多少次，都是因为你！不过人家也不怕，脸红了还是要来。不说是上级要人家来的，就是不让我来，我也要争取！你瞧现在人家到底来了。你还不多讲几句鼓励话！"其实她不再需要鼓励的话了。刘加亮对她说过的每句话都是很大的鼓励。他称赞她的进步很大，他把她跟美好的事情联起来，他那么高兴、那么满意地看她……这些她都懂得。

他们不知道疲倦地一直谈下去。没有人打扰他们。刘加亮要知道他们家乡的事情，他母亲的情况和秀兰一家的情况，他甚至想知道逃到外面去了的恶霸地主朱大福是否已经捉回。王秀兰也愿意把自己的见闻完全讲给他听，让他丢开一切挂念，更安心地在朝鲜工作。所以这以后就开始了王秀兰的长篇谈话，刘加亮只是偶尔插嘴问一两句。他一面听她讲话，一面注意地望着这张充满健康少女朝气的可爱的脸。她不害羞，也不躲避他的眼光。她讲的都是美好的事情，连朱大福在上海被捕，送回来公审处决，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她越讲越高兴，她好像陪着凯旋归来的未婚夫去看家乡的大小变化一样。她有时也剥出一颗糖送进嘴里。他早已把自己那几颗糖放进袋里，准备给杨林带回去。他们就这样地谈着谈着，一直谈到舞会结束的时候。

王理明有时也掉过头看看刘加亮，看见他们谈得又亲密、

又大方，好像旁边没有人一样，他有点羡慕他们，同时又奇怪：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讲不完？周金妹虽然坐在他的旁边，可是一连好几次都让那个塌鼻头的同志拉到斜对面那个角上去了。最近一次他看见她的手搭在他们团长微微俯下的肩头上，边跳舞边讲话经过他的面前，她带笑对他点点头，团长回过头来看他，他连忙站起来，但是他们已经消失在人丛中了。他又坐下，感到兴趣地望着人们一对一对地旋转过去。连面容严肃的师长也现出了轻松愉快的表情。他平日很少有机会见到师长，他却听到不少关于师长的传说。师长喜欢跟战士们同甘苦，空闲的时候常常到处跑，什么事都肯做，有时一个人跑到连队里，找战士谈话，或者跟战士一起劳动，战士们不知道他是一位首长。可是打起仗来，师长对别人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对准备工作也抓得很紧，一点都不松懈。王理明高兴地想，师长脸上的笑容就是胜利的保证啊。他认为胜利是肯定的了。“我一定要让她把喜报带回上海去！”这是他心里的话，他觉得自己已经有把握了。他一时又兴奋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乐声停了，舞池里的人散了。他看见周金妹向着他走来，她旁边还有一个人，就是身材高大、面貌和善的方团长。他马上站了起来，略有一点紧张，向站在他面前的首长敬礼。团长先请周金妹坐在中间，然后叫王理明坐在她的右边，自己坐在她的左边。团长先开口笑道：“同志，下个曲子你不要跳了，不要单单慰问首长，也要慰问战士啊。不然我们这位同志会有意见的。”团长又伸出头来问王理明：“战士同志，你说对不对？”王理明红着脸答不出来，不过他的脸上仍然保

留着愉快的笑容。周金妹满意地看看方团长，又看看王理明，笑答道："在此地应当慰问首长，以后我们还要下连队慰问战士。"方团长摇摇头说："我要替我这个战士讲话了。他千盼万盼，盼到一个同乡来了，正好谈谈家乡的事情。你来一趟不容易，他上来一趟也不容易，你们好好地谈罢。有任务我给你挡住。"团长说完，就站起来，和周金妹握了手，看见这两个上海人都站起来了，又紧紧握了一下王理明的手，亲切地说："我还记得你，崔东玉常常问起你们。这两天他病了。"王理明变了脸色连忙问道："首长，他病得厉害吗？"方团长拍一下王理明的肩头："同志，不管厉害不厉害，我们会尽力治好他。你不用着急。在这里见到你那位同乡，不是简单的事。你们应当多谈谈，谈谈祖国，谈谈上海，谈谈你们的亲人。把好事都记在心上，打起仗来会更有劲。"他又向周金妹说声："再见。"他一转身，那个塌鼻头的同志正站在他背后听他讲话，周金妹也正打算跟着那个同志走开，可是他却拉着那个同志的手说："同志，让她慰问慰问我这个小战士罢。碰到家乡来的亲人，谁不想多讲几句话？你不要看轻我这个小战士，过两天他就会当英雄的。你去动员另一位女同志罢。"他拉着塌鼻头的同志走开了。

周金妹和王理明在板凳上坐下来。周金妹含笑道："你们这位方团长真和气。我应该谢谢他。"王理明还想到团长那几句话，他带着感激的心情称赞道："有这样的首长真是幸福。"周金妹把身子挨近王理明高兴地说："我们现在可以好好地谈了。我回去要告诉阿姐，你身体很好，穿上军服更神气了。阿姐一定很高兴。我还要说，我跟首长跳舞，你对我眨眨眼睛，

你拿起这个包裹看了，又想拆开，又不好意思拆——"王理明截断她的话，笑着辩道："不是我不好意思拆，是你叫我回去才拆开。不要讲这些了。你快跟我谈谈上海的事情。说不定那个塌鼻头又要来找你了。"周金妹噗哧笑起来，她在他的耳边小声说："你不要乱叫，人家有名有姓，我们都叫他李科长。"王理明连忙解释："我不是讲他，我是讲你啊。"周金妹明白他的意思，她只是笑笑，又说："不过你也要讲讲你的事情，我回去才好向阿姐交帐，不这样，她会说我在朝鲜没有见到你，那就冤枉我了。"王理明马上爽快地答道："我讲，我讲。你要我讲多少，我就讲多少。"周金妹又含笑点点头，说："这样我就放心了。还是我先讲罢，你要好好地听啊，阿姐说——"两个人就这样亲密地、大方地谈下去。一个谈上海、谈亲人，一个谈朝鲜、谈自己。他们常常担心李科长会来打断他们的话头，却没有想到身材魁伟的方团长坐在对面板凳上，时时用喜爱的眼光看他们，并且两次拉开快要走到他们面前的李科长，不让别人妨碍他们愉快的谈话。这以后李科长好久都不曾过来找周金妹，一直到有人宣布开始最后三次交谊舞的时候，他才匆匆地走来把谈得高兴的周金妹拉走了。

最后一次的跳舞结束了。王理明兴奋地等着周金妹回来告别。刘加亮和王秀兰也站起来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周金妹急急地走到王理明的身边，她看自己的手表，快十二点了，她向王理明伸出手笑着说："阿弟，再见。"她在上海总是称他做"阿弟"，他也叫她"周阿姐"。可是整个晚上她还是第一次使用这个称呼。他也就满心欢喜地回答一声："周阿姐，再

见。"他们好像回到了上海一样。他们以为马上就要散会了。周金妹和王秀兰都在等着李科长来找她们，等着她们的副团长带头走出会场。忽然爆发了一阵掌声，许多人带笑地在大声讲话。原来三个志愿军的同志把慰问团的副团长抬了起来。接着慰问团的三个同志(李科长也在里面)又把师长抬起来了。接着政委也给抬起来了，慰问团的秘书长也给抬起来了。他们给人抬着在会场里打转。乐队奏起了《歌唱祖国》的曲子。人们起初用手打拍子跟着唱起来，后来大家都跟在抬人的同志后面打转，再后就互相拥抱，笑着，跳着，不肯散去。周金妹和王秀兰两个起先掩住嘴吃吃地笑着，后来也拍着手跟着曲子低声唱歌，再后她们也望着王理明和刘加亮笑，拉住他们的手，不知不觉地在会场里转起来。周金妹说："我回去对阿姐讲，我在此地跟你一道跳舞，她不晓得多开心！"王秀兰对刘加亮说："我回去跟大婶讲，咱俩在朝鲜跳过舞，她一定不相信。"王理明说："你告诉阿姐等着我的喜报罢。"刘加亮说："你讲啥话，我娘都会相信的。你不要忘记说，加亮哥决不给大家丢脸。"他们都沉醉在强烈的幸福感觉里，刘加亮紧紧握住王秀兰的两只手，王理明也紧紧捏住周金妹的两只手，四个人都觉得祖国把他们更紧地拴在一起，其实不单是这四个人，整个场子里的人都有和这类似的感觉。尽管许多人都是第一次会见，而且第二天傍晚就要分别，大家一直跳着、笑着、唱着，没有人想到已经过了午夜了，他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记得一个祖国，祖国像一颗鲜红的太阳，在他们的四周放射出万道金光。

慰问团副团长带头走出会场的时候，刚巧是十二点半钟。刘加亮看见那个垂着大辫子、穿着红底白花布棉袄、浅蓝色长裤、黑布鞋的身形在门外了，他不自觉地捏紧手里那个慰问袋。王理明的眼前还现着那个披着波纹式浓发、穿一身青呢人民装、黑皮鞋的苗条身形。两个人都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

刘加亮和王理明回到了招待所，还听见敌机飞过的声音。他们走进里面，有些人已经在炕上睡着了。还有三个人在被窝里谈话。条桌上点着一支蜡烛，他们走到桌子跟前，刘加亮马上打开了牛皮纸包，绣花的慰问袋里面装得有一双毛线手套、一双布鞋，两张手帕，和一个用几张白纸小心包着的劳动模范的奖章。王理明用自己带的小刀拆开了布包，取出来一件毛线背心、一包水果糖和一只手电筒，另外一个信封里有他姐姐的一封短信，信里只有几句话，不过还附了一张她和周金妹两人合摄的半身像，照片背面写着“赠给理弟”，下面是她们的亲笔签名。这两个通信员把各人得到的礼物反覆地看了几遍，他们觉得自己再没有什么要求了。

第二天早饭的时间推迟了，刘加亮和王理明就在这个屋子里同英雄模范们吃了饭。过了一个多钟头，他们又同英雄模范们去参加慰问大会。会场里人挤得满满的，前面的人都是拿横放在地上的木头当座位，后面的人有的坐在自己做的矮凳上，有的就站着，到了开会的时候，会场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表演节目开始以前，还有几个人讲话。第一个讲话的是慰问团的副团长，这是刘加亮和王理明认识的，以后还有两个他们不认识的人和两个他们认识的人，王理明知道周金

妹会讲话，却不曾见过她登台发言。刘加亮更熟悉王秀兰，她不喜欢当着陌生人发表意见。可是今天她们两个在台上都讲得那么好，又亲切，又热情。她们的发言都不长，一个人讲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一个还带着胶东的口音；一个代表工人，一个代表农民，一样地把心献给志愿军。王理明不眨眼地望着周金妹，刘加亮出神地望着王秀兰，他们觉得她们把他们拉回了祖国，也把家乡带到了他们的身边。王理明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但又是新的上海，刘加亮好像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却又变了样的山东农村。他们还看了好些精彩的节目，可是王理明一直在想那个上海女工的热情的讲话，刘加亮也始终忘不了那个山东农村姑娘的亲切的发言。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精彩的节目了。那两个讲话的人就坐在他们前面，离他们不过三排的座位。她们有时也回过头来用眼光找寻他们。表演节目不少，有歌有舞，有口技有魔术。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每个节目都得到如雷的掌声。

慰问会终于结束了。慰问团的代表们还有别的活动。刘加亮和王理明吃过晚饭后也要赶回连队去，他们就要跟自己的熟人分别了。他们把周金妹和王秀兰送到半山上她们的住处，她们恰好住在一个房间里，就是那间山洞里的客房。他们站在客房前面小小平台上跟她们告别。彼此紧紧地握着手，高兴地、亲切地含笑对望。王理明忽然说一句："周阿姐，谢谢你的礼物……。"周金妹连忙说："毛线背心阿姐先打，合身么?"刘加亮小声问王秀兰："你怎么把你的奖章也带给我了?"王秀兰答道："你看见它就会想到我。"她又加一句："想到我在

跟你竞赛。"刘加亮又问王秀兰："你现在不怪我吗？"王秀兰笑着答道："我说过我不是过去的王秀兰了。我还想到你们住的坑道去看看，你等着我罢。"周金妹正在跟王理明讲话，这时也来插一句嘴："你去，我也要去！"王理明大声说："你们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四个人又握了一次手，又带着笑彼此说了一声："再见！"刘加亮和王理明就急急地跑下山去了。他们到了山脚，又一次抬起头望她们。她们还站在平台上挥手带笑地对他们说："再见！"他们边走边挥手。王理明忽然对刘加亮说了一句："可惜杨林的妈妈不曾来。"刘加亮兴奋地答道："没有关系。我们不是早说过：'三个人手拉手一同前进'吗？"

二十四

刘加亮从师里回来的第二天就到八班去了。王理明和杨林陪着他走了一段路。他自己很高兴，他们也替他高兴。谁都没有惜别的心情，却有一种类似竞赛已经开始的感觉。王理明和杨林一方面羡慕刘加亮，另一方面对自己也有信心。他们已经在想象三个人在前面山头"会师"的场面了。他们刚刚在交通沟分岔的地方跟刘加亮分了手，转身回去，一边走一边谈刘加亮的事情，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大声问道："小鬼，你们到哪里去了来？"他们连忙站住，身材高大的方团长走过来了。杨林马上敬礼回答："报告首长，我们送刘加亮到班里去。"团长眯起眼睛看了看他，带笑地说："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太多。"团长又看看王理明说："你回来啦？你得感谢我帮忙，让你多听到些上海的消息。这一回你可以给上海的亲人争光了。"杨林连忙插嘴问道："首长，崔东玉的病好了没有？"他从王理明的嘴里听到崔东玉生病的消息以后，一直把这件事搁在心上。团长又看看杨林，温和地答道："这不像我们打仗，十几分钟就解决问题。我答应你们两个，谁立了功，就让谁去看崔东玉。小鬼，我不是开玩笑啊……"团长说到这里就急急地往前走了。李连长紧紧地跟在团长的后面，王理明知道团长从前面

回来，现在到连部去，一定有重要的事情，也不敢去打扰他，只是默默地把他的话记在心上。

团长在连部一直谈到夜深，他就睡在这里。排长们都参加了这次的谈话。第二天一早李连长同郝指导员就跟着团长出去了。王副指导员吃过了早饭带着杨林到三排的几个班走了一趟。三排长也到团部去了。杨林一直跟在王副指导员后面，他发觉副指导员特别关心八班的战士，跟每个战士都谈过话，又向八班长问起战士们的思想情况；他也看见每个班的战士或者练习使用武器，或者讨论作战计划……没有一个人闲着。他在八班见到了刘加亮在那里仔细地擦枪，副指导员带笑地问刘加亮："你到班里惯不惯？"刘加亮连忙站起来兴奋地答道："报告副指导员，只要能打上仗，我什么都惯。"副指导员满意地说："对，我知道有人亲自到朝鲜来等你功上加功的喜报，这不简单啊！你一定把喜报给她捎回去。"刘加亮满面笑容地望望副指导员，又望望杨林，然后有信心地含笑答道："我服从首长的命令，保证一定完成任务。"副指导员带笑地点点头，说了一句"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马上又看了杨林一眼，好像在说：我也相信你。可是他说出口来的话却是："你跟刘加亮谈谈罢。等会儿到七班来找我。"副指导员走后，刘加亮又埋下头继续擦枪，忽然问一句："王理明呢？"杨林答道："他在看家，队长他们都出去了。"刘加亮又问："你武器都会使用了？"杨林答道："我只懂得一点点。"刘加亮又问："你地形摸熟了吗？"杨林忍不住笑起来："我们才分别了一天，我的事情你哪点不晓得？你还要东问西问的。"杨林看见刘加亮也笑

了，便拉住刘加亮一只胳膊问道："刘加亮，你是打过仗的。我问你，你当初害怕不害怕？"刘加亮抬起头看了杨林一眼，那两只黑亮的眼睛急切地在等待回答。可是刘加亮并不答复他，却反问他道："你现在怕不怕？"杨林老实地说："我害怕我就不来朝鲜了！不过我有点紧张，我怕自己缺少经验，完成不了任务。我先前听见副指导员跟战士谈话，忽然想起这个问题。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啥子都可以交出来献给祖国。我怕的就是我笨，临时手忙脚乱。"刘加亮看见杨林脸红了，额上冒出大颗的汗珠，他马上放好枪站起来，拍拍杨林的两只肩膀，鼓励杨林道："小鬼，你不用担心，你不笨。我当初什么武器都不大会使用，我也没有打过败仗。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当初只有恨，现在我还是恨，恨美国鬼子好霸道，把朝鲜老乡害得好苦！"杨林瞪着刘加亮呆呆地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大声说一句："我明白了。"他拉拉刘加亮的手，又说："多谢你，下回再来找你，"就高高兴兴地走了。刘加亮在洞口伸出头去，杨林已经跑远了，看不见了。刘加亮一边擦枪，一边想：要是我们三个人都立了一等功，那多好！

杨林跑到七班的洞子，副指导员还在跟几个战士讲话。他坐在炕角听了一阵，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比自己强，他们情绪很高，一点顾虑也没有。他不知不觉地把胸口挺得很直。他听见一个战士激动地说："祖国需要我，我愿意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后退一步！"他忍不住在旁边插嘴说了一个"对！"副指导员掉头看了他一眼，几个战士也都抬起头看他。他不由得红了脸。不过他并不惊慌，也不害羞，只是因为打断了同志们

的谈话感到一点抱歉。可是那句话一直在他的耳朵边响，它仿佛还到了他心里，不断地震摇他的心。他多么喜欢这句话，它好像是从他心里出来的，现在又回到了他的心里一样。

王副指导员从七班的洞子出来，带着杨林回连部去。他们走不多远，副指导员忽然问杨林道："小鬼，你刚才说'对'，为什么'对'呢？"杨林楞了一下回答道："副指导员，我觉得那句话说得对，说到了我心上。我们一定要打胜仗。"副指导员点点头，又说："小鬼，我知道你已经下了决心，这很好。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屯兵洞里的滋味不好受啊。"他注意地看杨林。杨林马上红着脸瞪着眼睛回答："副指导员，你请放心。别人受得了的我也受得了。别人受不了的我也要忍受。我只担心自己没有经验。"副指导员插嘴说一句："没有经验，就学呗。"杨林立刻接下去说："我保证多动脑筋。"副指导员看看杨林，微微笑起来："看不出你的自信心这么强。"杨林还以为副指导员不相信他，脸涨得更红了，着急地说："副指导员，我不是吹牛皮的人，我说得出，就做得到。"副指导员满意地笑道："小鬼，你干吗这么着急，并没有人批评你吹牛皮。"杨林想想也就笑了。他们走了一段路，王副指导员忽然回过头问杨林："小鬼，你看哪一班的战士情绪高？"杨林马上回答道："副指导员，我看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大家都有一股气憋在心头，巴不得马上拿起枪替朝鲜老乡报仇。"王副指导员走了几步，忽然又问："小鬼，要是调你到班里去，你愿意去哪个班？"杨林惊喜地说："真的调我去吗？我就去八班。"副指导员接着就说："那么你以为八班情绪最高了。"杨林连忙摇头分辩道："副指

导员，我不是这个意思。每个班都是一样。”副指导员笑道："我明白了。刘加亮在八班，所以你也想到八班去。是不是这个意思？”杨林本来想说，八班可能有战斗的任务，可是他又害怕自己的猜想不对，便简单地答道："是这个意思。”他接着又问一句："副指导员，我可以到八班去吗？”副指导员感到兴趣地笑了笑："你到八班去。不用说，王理明也要去。那么连部通讯员一个也没有了。我来当通讯员好不好？”杨林楞了一下，他的脸又红了，他严肃地说："报告副指导员，王理明跟我都愿意留在队部。”副指导员再问一句："你不去八班了？”杨林红着脸说："不去了。我跟着连首长，一样能打仗。”副指导员笑了两声，说："小鬼，我看你脑筋很灵活。打仗的机会有的是。这次打不上，下次一定少不了你。”杨林听见这句话，着急起来，暗暗地想：是不是改变了计划，不带我上去呢？但是他马上想到了指导员对他讲过的那些话，他猜想副指导员在跟他开玩笑，又渐渐地放了心。他默默地跟着副指导员往前走，望着副指导员瘦小的背影，副指导员脚步坚定，身体结实，走了一会儿，没有听见杨林答话，便回头看一两眼，也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副指导员又回过头来，两个人的眼光遇在一起了。副指导员看到杨林红红的圆脸上的笑容，有点奇怪小鬼为什么这样高兴，便问道："小鬼，你是不是接到家信了？你妈妈给你写些什么？”杨林答道："我妈还没有信来。多半是我哥哥嫂嫂很忙，来不及替我妈写信。算日子，我那封信也该收到了。”副指导员又问："你想不想你妈妈？”杨林含笑道："我说不清楚。副指导员，你说哪个不想自己的亲人？不过光想

又有啥子好处？我越想越容易做梦。我现在索性不想了。我看，多给我妈打几封信回去，让她老人家晓得我在朝鲜很好，这比啥子都强！”副指导员忍不住赞了两声“对！”，这个小通讯员的谈话使他很满意，他觉得他看透了杨林的心，也了解了杨林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他在心里暗暗笑道：“这些小青年都在盼望马上出发去打仗，把喜报捎回家去！要是我带着他们三个一块儿上战场，那多好！谁也不会落在后面。”

连部就在前面了。副指导员加快了脚步，杨林也紧紧地跟在后面。王理明和张少林正站在坑道口讲话。张少林看见副指导员走来，连忙立正敬礼。副指导员带笑问张少林：“你来了？”张少林笑答道：“我来报到。刚刚见到文书了。”副指导员看了看张少林，吩咐道：“你过几分钟来找我，我要跟你谈谈。”他又对杨林说：“小鬼，你跟王理明一块儿研究研究罢，”便匆匆地走进坑道。

杨林额上冒着热气，兴奋地拉着张少林的手，说：“你到底来了。我天天在等你。刘加亮一走，我少了个老师了。”张少林也紧紧捏住杨林的手满意地笑笑说：“我们又在一块儿了。不过我也做不了你的老师啊。听说你学会使用武器了。”杨林放开张少林的手，正经说道：“我学倒学过了。就是害怕到了时候手不灵活。”王理明在旁边插嘴笑道：“哪里是手不灵活？明明是胆子不够！”杨林红着脸瞪了王理明一眼，看见王理明眨眼睛做怪相，便笑道：“不用你来激我。到时候大家看嘛！”张少林看到杨林那对睁大了的眼睛，忽然想起一件事，便伸手去掏自己军服的袋子，一面说：“杨林，你得谢我，我给你捎来

好消息。杨林带笑地望着张少林那个袋子，看见张少林掏出一封信来，他不看信封就知道他的家信来了。他又激动，又欢喜地伸出手去接信。张少林得意地把信递给了他。他看看信封上的字。是他哥哥的发信地址和笔迹。他满意地说声"谢谢"，就把信往自己的袋子里塞。他得到了哥哥的来信，现在更放心了。

"杨林，你看信罢。你怎么不拆开就放进袋子里去？好消息啊！"张少林笑着拍拍杨林的肩头说。他又看看王理明："我现在去看副指导员。王理明你也进去，让杨林一个人好好地看完家信，我们一会儿再来听他的好消息。"

过了半个多钟头，王理明走出办公室去找杨林。张少林还在跟副指导员谈话。王理明以为杨林看完信一定会去找他们，让他们分享他的喜悦。可是等了这些时候，还不见杨林来。他有点着急。他走到坑道口，不见杨林的影子。他想，杨林可能在住室里写回信。他便掉转身到他们住的洞子去。杨林果然在那里。他亲热地唤了一声。杨林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动也不动一下。他觉得奇怪，轻轻地走到杨林背后。杨林还是不动。他发觉杨林呆呆地望着贴在洞壁上的成都望江楼的照片。他静静地站了几分钟，他也看看照片上的红楼绿竹和平静的江水，他仍然不明白杨林在干什么，他只觉得洞子里又暗又静，他实在憋不住了，便动手拉杨林的胳膊，关心地大声问："杨林，你怎么哪？信里讲的啥事体？"

杨林转过身，紧紧握住王理明的手，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

来。王理明惊问道："杨林，信里有啥消息？"他马上猜到信的内容了。他心里也难过。

"我妈死了，"杨林带哭声说。他的眼泪落到了王理明的手上了。

"杨林，你不要难过，难过也没有用。人死了是哭不活的，"王理明觉得一阵鼻酸，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他自己感到幸福的时候，对同志的不幸也有更深的体会，而且为自己的幸福感到一点惭愧。

"我晓得，我晓得，"杨林松开王理明的手，一面揩自己的眼睛，一面说，声音不高，不过还是痛苦的哭声。他又把头掉去望壁上那幅《江楼春晓》，诉苦般地说下去："我上次那封信写得太慢了，我哥哥嫂嫂还没有收到。我妈只看到我头一封信。这封信是嫂嫂写的。嫂嫂说，我妈病了一个多月才死。她一直不让哥哥嫂嫂把她的事情告诉我。她临死前还特别嘱咐哥哥嫂嫂不要给我晓得她的死信，好让我安心在朝鲜打仗。"

"做母亲的都是这样。你妈既然这样说，那么你更不应该难过，"王理明眨着眼睛感动地说。

"我怪我自家为啥子不早给她多写几封信！现在我有一肚皮的话，她一句也不晓得！"杨林又转过身望着王理明，激动而痛苦地说："我心里不好过！我心里不好过！"眼泪又落下来了。

"杨林，你不能这样想。她晓得不晓得现在还不是一样！她的后事都办好了罢？你嫂嫂怎样说？"王理明充满同情地挽

住杨林的一只胳膊，十分关心地劝道。

杨林稍微镇静了些，他又把脸上的眼泪揩去，点了点头回答道："我妈的后事都办好了，人民政府对我们家照顾很大。我哥哥嫂嫂都过得好。我也没有啥子牵挂了。……"

王理明摇了摇杨林的胳膊，插嘴说："那么你就不应该难过了。你妈妈也不希望你难过……"

杨林点点头说："我晓得。"他又看看王理明说："王理明，多谢你。你不用替我担心。你让我再想一会儿，我就好了。"他说到这里就让张少林打岔了。张少林刚进洞来，只见他们两个在洞里谈话，也看不清楚他们的脸色，就带笑说："杨林，信里有什么好消息？还不谢谢我！"

杨林不回答。王理明轻轻地拍两下杨林的肩头，低声说："好，我走了。你不要难过啊。"他便转身迎着张少林，拉住张少林的一只胳膊，小声说："你跟我一道出去，我告诉你。"张少林不懂他的用意，还要讲话，他只好再讲一句："他妈妈死了。"张少林马上变了脸色，默默地跟着他走出洞去了。

他们两个在坑道口谈了一阵。王理明把知道的一切全讲了。张少林一直责备自己："我真不该把信给他。我要是知道信上讲些什么话，就把信藏起来了。"他又说："偏偏在这个时候遇到这种事情，你说该怎么办？"王理明也惋惜道："要是刘加亮在就好了。"张少林说："我看，等指导员回来，报告指导员。指导员跟他说说，一定会解决他的思想问题。"他接着又说："报告副指导员也是一样，我现在就去。"王理明连忙拉住他说："你不要急。让他多想想，他一定能想通的。他比我坚

强得多。"

张少林皱紧的眉毛渐渐地开展了。他点一下头同意道："就依你罢。我也知道他很坚强。只要不影响他的情绪就好了。这两天我们两个都要好好地注意他。"

杨林一个人在洞子里，仍然站在《江楼春晓》图片跟前，望着那丛碧绿的竹子和缓缓地向前流去的江水，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家。他的家离有名的望江楼并不远。他还记得居孀的母亲送他参军的情景。母亲的头发花白了，她在旧社会受了多年的苦，弄坏了身体，只有在解放以后她那消瘦的长脸上才有了血色和笑容。母子分别的时候，她没有哭，他的眼睛倒红了，她含笑说："你要去，就高高兴兴去嘛。早点打垮美国鬼子早点回家。我等你得胜回来。"她颤巍巍地向他挥手，对他笑。他哥哥嫂嫂来信说，她回到家伤心地哭过一回。她就只哭过这一回，以后她讲起他，总是高高兴兴的。她得到他入朝后寄回的第一封家信，欢喜得不得了，逢人就讲儿子在朝鲜的事情。……他想着想着，他的脸上也现出了微笑。他觉得他母亲就站在竹子前面对他含笑招手。他轻轻地喊了一声"妈"，他仿佛回到家乡了。……他忽然向前伸出手去。他的手指挨到了冷冰冰的、潮湿的洞壁。他吃惊地掉头回顾。他楞了一下。他慢慢地把手伸进衣袋去，又掏出信来。他刚刚把信纸取出，马上又将它放回。他叹了一口气，拿着信封似想非想地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责备自己："我真笨！"他又把信封放回衣袋里去，转身离开了洞子。

杨林一边走一边想，他先到办公室，还不曾揭起白布帘子，就听见副指导员在讲话。他走进里面，副指导员刚刚放下听筒，见他进来看了他便惊问道："小鬼，你怎么啦？什么事教你哭鼻子了？"杨林垂头丧气地说："副指导员，我妈死了。"副指导员温和地问道："你得到家信了？"杨林答道："我哥哥嫂嫂写来的信，张少林带来的。"副指导员沉默了片刻，又说："你哭得对。索性伤心地哭一场，以后就再没有牵挂了　我从前也是这样。我哭够了，就上战场，打起仗来什么也不怕。小鬼，你哭够了没有？"杨林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哭了。"副指导员点点头说："对！我知道你爱你妈妈。不过人不能光用眼泪来表示爱，我们得用行动，用事实。志愿军都是这样。我还记得你先前那两句话。你说：'别人受得了的我也受得了。别人受不了的我也要忍受。'你能说，就一定能办到。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杨林抬起头望着副指导员，他感激地说："报告副指导员，没有问题了。"副指导员仔细地看看杨林，鼓励道："那么以后就不用再想家了。是不是？"杨林接连答了两声"是"。副指导员又用怜爱的眼光看他两眼，说："那么你去休息一会儿。你有问题再来找我。你出去把张少林给我找来。"

杨林又答应一声："是，"他觉得先前压在他心上的那块大石头给人搬走了。他感到轻快地掀起白布帘子走了出去。他走了不多几步，便在甬道上遇见了张少林和王理明。王理明亲热地说："我们刚刚到住室去找过你。"杨林说："我在副指导员那儿，他要张少林马上去见他。"他的声音里没有悲痛，口气也是十分亲切。他听见王理明继续说："那么你现在——"连忙

插嘴解释道："我现在不难过了。都过去了。"

张少林已经到办公室去了。王理明听见杨林的解释，高兴地拉住杨林的手，含笑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你晓得我先前真替你着急。看情形，……就在这几天……你不能放过那个机会！……"

二十五

当天晚上指导员回来，知道杨林的母亲病故，也把杨林叫去劝导了一番。杨林充满自信地回答，现在没有问题，他已经想通了。他也不再向人提起他母亲的事情。可是他一夜接连几次梦见她。他醒过来既不好过，又生自己的气。一方面他想念母亲，另一方面他又责备自己：为什么这样软弱，不能做到人们常说的，化悲痛为力量，这是他入朝后第一次思想的斗争。不用说，他这种内心的矛盾和那些奇怪的梦，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不愿意教别人替他担心，又害怕首长因为这个不让他上战场。他一连几个晚上睡不好觉。然而他没有丝毫沮丧的神情，也不露一点倦容。他一天从早忙到晚，见着人仍然有说有笑，干起事来还是生气勃勃。别人以为他的悲痛的确已经过去，王理明也暗暗称赞杨林的坚强。只有指导员看出他心上还搁着些什么东西，不过指导员相信它们决不会把他压倒，而且指导员又是那么忙。

杨林内心的冲突继续了几天。连他自己也感觉到斗争一天比一天地缩小，减弱。他的自信心也一天天地加强。到了出发的那天，在出发前那个短短的会上，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和功臣代表李方的讲话使他的血沸腾，使他的心激动。他

们不仅表示了个人的决心，也鼓舞了全连战士的信心，那些短短的话像火一样把杨林脑子里任何的杂念都烧光了。他只有一个思想：胜利。他跟着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出发去屯兵洞的时候，虽然有点紧张，可是意气十分昂扬。

灰白色的天空落下一阵一阵的小雨，一股一股的风吹动山路两旁的绿叶，戴着伪装帽、披着雨布的同志们静悄悄地向前疾走。杨林一面小心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一面注意脚下的路，不教脚碰在路边的石头上。他偶尔也抬头看看前前后后的人，他看到的都是严肃的脸色，他又紧张起来。不过他一直在想坑道口那个场面：师文工队员代表首长热情地敬酒；李连长带着出击部队庄严地宣誓；方团长、陈营长和王教导员站在坑道口含笑地跟他们一一地握手，祝他们胜利。他头一次看到这样严肃的场面，头一次有这样严肃的心情。李连长的每句话都既像是说给他听的，又像是他自己心里出来的。方团长和陈营长的带鼓舞的笑容像闪电似地在他的脑子忽现忽隐，他觉得首长们跟他的距离一下子缩得很短，他们仿佛就是对他期望很殷切的父亲或者哥哥。他越往前走，越是兴奋。他不像先前那样地紧张了，他心里却又并不平静。他毫不胆怯。但是他想到自己受考验的时刻越来越近，也有点担心。他的确已经忘记了哥哥的来信，他也不再想家乡的竹子和江水。家乡和亲人以及他喜爱的种种事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隐隐约约地跟在他的后面。他不去想，也不去看，却时时意识到有这么一座靠山在支持他，保护他。他知道他和同志们平日朝夕想念的祖国就在他的近旁。他越往前走，觉得自己跟

祖国挨得越近，跟祖国的关系也越密切。他甚至觉得祖国的眼睛在望着他。他在这里的一举一动在祖国的人都会知道。他现在的心情相当复杂。他感到幸福，又感到兴奋，还有一种执行任务时的责任感。李连长庄严的誓言就像挂在他的耳边一样，他的思想跑了一段路，他就会听见那个响亮的声音。有时他也会想起郝指导员从前对他讲过的那些英雄故事，和他自己做过的那些梦，于是他的思想马上集中在李连长的身上。雨下一阵又停一阵，路全湿了，他身上披的雨布也湿了。天已经黑尽，同志们全隐在阴暗里。连长的穿着雨衣的身形依旧明显地在他的眼前移动。连长走得急，他紧紧地跟在后面，注意着连长四周的声音。连长脚步轻快地跳过了一个小水沟，他也像连长那样地跳了过去。下了大半天的雨，山上到处都有淙淙的水声。也有虫叫。还有炮声，不过比平日少得多了。却始终听不见任何人咳一声嗽。走了一会儿，杨林的思想又开始活动了。他想起了王理明和刘加亮。他在出发前不久跟他们讲过话。王理明就在他后面，还带着信号枪；刘加亮在八班的战士中间，也在这个行列里面。他们三个人同时走上战场，他们的竞赛现在真的开始了。他想道："他们是不是也像我这样？"他好像又看见他们两张年轻脸上那种兴奋、昂扬的微笑。他暗中回答："他们比我勇敢，比我坚强。"就在这个时候连长刚刚走下山坡。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杨林一个不小心，右脚给一棵矮松绊了一下，幸好后面有一只手将他扶住，他不用回头便知道是王理明的手。王理明不讲话。杨林也不作声，连忙进了开阔地。他虽然动作敏捷，可是他暗中大

吃一惊，而且感到羞惭。他不敢再想任何事情了。他聚精会神地紧紧跟在连长后面过了开阔地，静悄悄地向屯兵洞奔去。

他们在夜色最浓的时候安全地到达了屯兵洞。屯兵洞有两个，都是战士们前些天每天夜里摸到敌人占着的这个高地的山脚偷偷地挖成的。两个排的人在一个洞子里，他们只能背靠壁、脸对脸、弯着腿、半蹲半跪地待着。洞子又矮又窄，又潮湿，里面空气不够，不说不许点蜡烛，就是要擦一根火柴也擦不燃。杨林跟着连长在黑暗中爬进了洞。他头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也弄不清这是个什么样的洞子，只记得副指导员的一句话："屯兵洞的滋味不好受。"他想："就苦一点罢。好在不到一天，也容易熬过去。"他和连长本来在一起，都在离洞口不太远的地方，后来有人把他往里挤进去了些，王理明也不见了。他当时很着急，但是不久听见了连长粗大的呼气出气声，知道他仍在连长的近旁，便放了心。他没有想到这一着急会使他突然感到十分气闷，好像有一只手把他的嘴捂住了一样。他静静地待了一阵，内衣已经给汗水打湿了，可是他觉得稍微好了些。他想，以后会慢慢习惯的，便闭上眼睛把身子紧紧地贴在潮湿的洞壁上。他不再动脑筋了。他认为，如果能够睡一觉，这里的生活就容易熬过去了。他这个办法居然见了效，他打起瞌睡来了。他似睡非睡地过了好一阵。他好像听见有人在讲怪话，有人在叫"难受"；又好像听见八班长和三排长先后讲话，鼓励大家遵守屯兵洞的纪律。他也弄不清是梦是真，只觉眼皮重，头昏脑热，浑身不好受。忽然有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一个熟习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杨林，

杨林，你不好过吗？”他顺口答道：“我受得了，”也不去管说话的人是谁。那只手紧紧地捏住他的右手。那个声音又说：“我听见你在呻唤，才晓得你在这儿。你要不要喝点水？我给你。”杨林听出来范阳在旁边对他讲话，连忙睁开了眼睛朝右面看了一下，差不多要挨到范阳的脸了，他惊喜地小声说：“你在这儿！”范阳亲热地说：“你喝点儿水，会觉得好些。”杨林小声回答：“我自家有。你留着慢慢儿喝罢。”范阳已经把水壶取了下来，递过去说：“你就喝点儿罢。现在还讲啥子你的我的！”杨林还没有伸手去接，范阳便揭开盖子把水壶送到杨林的嘴边。杨林不再推辞，就捧着水壶喝了一小口。他那干燥的嘴唇立刻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他把水壶递还给范阳。这口水并不曾解渴，他真想一口气喝它个痛快，可是他不再喝了。他还要在这里待十几个钟点，以后他更需要它。他紧紧地捏了一下范阳的手，表示谢意。他忽然高兴起来。他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了范阳那张颧骨显得高的圆脸，薄嘴唇上挂着微笑。接着他又看见了王理明和刘加亮的脸。他想道：“他们都在这儿。他们都会熬过去的。我也会熬过去的。”他又把自己缩成一团，闭上了眼睛。他刚才还听见连长讲话，现在洞子里好像只有喘息声。他注意地倾听连长的声音，却听不见。他自己不仅口干舌燥，还有透不过气的感觉。汗衣湿透了，满头大汗。他伸手把军帽帽檐朝上推了一下。范阳又在他的身旁小声讲话：“你坐好不要动，就容易忍受些。”范阳又说：“这个洞子已经好多罗，这是马蹄式的。从前挖的半坑道式更差。有啥子办法呢？在敌人脚下挖洞子搞他们……”范阳说到这里，

忽然听见人们在嚷(声音不高),有人昏过去了,便闭了嘴。接着连长说:“马上把他抬出去。”杨林正要站起,范阳伸手按住他的肩头,说:“这是我的事情。你好好地坐着。”范阳吃力地挤出去,帮忙抬人去了。

范阳走后杨林再也坐不住了。两个昏倒的人给同志们抬着走过他跟前,他觉得自己也应当出一份力,便参加抬人的工作,但也只是帮一点忙罢了。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人抬到洞外。雨已经住了。一股冷风扑到杨林的脸上,他觉得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好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要把风全吸进肚里一样。他们把昏倒的人放在地上,范阳弯下身子照料那两个同志。夜开始在褪色,杨林抬起头望自己的阵地。那个黑呼呼的山头若隐若现地耸向蓝色的天空,它在他的眼里显得非常亲切。雨后的空气非常清爽,只有草木香,毫无火药味。这是很短的时间里的事情。杨林不过站了一分钟罢,他就听见连长的声音批评说:“小鬼,你出来干吗?这是违反纪律啊。”声音并不严厉,他也看不见连长的面容。可是他的脸马上红了。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洞里。他经过连长的身旁,连长拍一下他俯着的肩头,小声嘱咐道:“小鬼,还有十几个钟头,你无论如何也要熬过去。以后不能乱动啊。”他惭愧地回答:“我晓得。”他挤到里面离连长不太远的地方,蹲下来。他带了感激地想着连长的话,不自觉地在黑暗中连连点头,心里想道:“我自家说过,我受得住,熬得过。”他暗暗地念着自己的这句话,念了许久。

洞子里静一阵,又闹一阵,所谓闹也不过是有人昏倒给

抬出去，或者让身体较弱、呼吸困难的人出洞透透气，或者有人呻吟。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总有人发言鼓舞大家的情绪。有一次他听出来讲话的人是刘加亮。他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听见刘加亮的声音了。虽然还是几句内容差不多的鼓励话，可是他听起来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有力量。而且声音里充满了喜悦。他不能不暗暗地称赞道："刘加亮真是个好战士，他这个时候还这么高兴。他多么想看见那张左眉上有伤疤的长长脸！外面天早已大亮了。洞子里也有了一点点亮光。杨林一面轻轻地喘气，一面揩掉额上的汗，他略略移动头朝四处看。他看到好些张黑黑的脸，却找不到刘加亮的笑颜。他好像听见王理明一声轻轻的咳嗽，可是他看不见王理明在哪里。只有范阳抬起脸对他微笑。范阳刚才还到洞口去照料过昏倒的人，现在就蹲在他的对面。他也对范阳笑笑，他很感谢这个小卫生员对他的关心。但是他的眼光还在徒然地找寻刘加亮和王理明的脸，他很想知道他们这时候在洞子里干什么事情。尽管天亮以后昏倒的人不见减少，喘气声仍然是此起彼落，可是杨林近旁的一些战士开始谈起打仗的计划来。他们在讨论怎样打，怎样分工，甚至还谈到谁做代理人这一类的问题。杨林注意地倾听。听他们讲话虽然吃力，可是那些断断续续的辞句吸引了他。他渐渐地忘记了洞子里的一切，他的心好像飞到战场上去了。他尽量地吸收他们的意见，好像在吸取养料一样。

其实王理明就在连长的身旁，连长的身体遮住了他。刘加亮的确在离杨林不远的地方。刘加亮曾经上过战场，立过

小功，也知道打反击战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天他和八班的同志们在一起讨论、演习、进行了种种的准备工作。他带着充分的信心走进屯兵洞。他一点不紧张，也不去想前前后后的事情。他想的只是：怎样出洞，怎样上去进行爆破，怎样炸垮敌人一个一个的地堡……最后取得了胜利。他的思想集中在“胜利”两个字上面。在他的脑子里“胜利”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这里面包含着战士们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有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也有朝鲜老大娘的欢喜的笑容，还有那张浅黑色椭圆脸的微笑。他知道那个人还在朝鲜，虽然不清楚她现在在什么地方，但是可以断定她离他不远，她在等候他的喜报。他决不给她丢脸。他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说：“我一定不教你白白走一趟。”他相信她会把胜利的喜报捎回祖国，捎回他的家乡，捎回给他的娘。他没有丝毫的疑惑，仿佛对未来的胜利已经有了绝对的把握。所以他一路上脚步坚定、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进了屯兵洞以后，他也不慌，不急，不叫苦，不烦躁。他感到气闷的时候，反而尽情地想象结束战斗后的欢乐场面；他在忍受痛苦的时候，时时看到那对含笑的亮眼睛。于是一切困难都过去了。他听见有人讲怪话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发言鼓舞某些人的情绪。他知道杨林在他的近旁，会听见他这些话，他也想到那一双好像在古辘古辘地转动的滚圆眼睛。他并不替杨林担心，他相信杨林一定会干得好，正如他相信王理明一样。三个人奔赴同一个目标，开始一场竞赛——这又是他的喜悦的另一个原因。后来各班分组讨论作战计划的时候，他的心便完全放在战斗的细节上面了。他对于胜利的信心始终是坚

定的。可是他也知道胜利并非伸出手就可以取到，他必须拿出自己的全副精神和全副精力，熟悉每个细节、每个动作。老战士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对他有很大的好处。他在洞子里一直不曾休息，甚至在他张口喘气、讲起话来断断续续的时候，他还跟同志们一起检查自己的武器。他并不以为自己比旁人更能忍受痛苦。不过他相信这些痛苦会替他们换来很大的代价。因此他觉得比这些再大的痛苦也容易熬过去。只有在太阳已经落山、出发的时间渐渐逼近的时候，他才有一点急躁和紧张的情绪。在那个时刻，连一分一秒都显得特别长。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忍耐心比这一切苦更长。他仍然集中注意在等候炮声。他等的当然不是敌人打过来的稀稀落落的冷炮。他等的是落在敌人山头的暴雨似的炮弹。他一生也不会忘记这种万炮齐鸣的巨声，仿佛千万个响雷一齐打下，使得山崩地裂，他的耳朵快震聋了，整个洞子摇来晃去，好像要塌下来一样。然而这种声音却给他带来极大的喜悦。不用说，这种声音也给杨林、给王理明、给屯兵洞里所有的勇士们带来极大的喜悦。躲在洞子里憋着气受苦的时间终于过去了，熬过了便是胜利！他们马上就要使这座正在我们万炮射击下颤栗的高地变成一座英雄山，每个人在那里表示自己最深厚感情的时刻就要到了！的确每个人刚刚钻出洞子以后，"祖国"这个最亲爱的字眼在他的脑子里亮了一下。各人似乎看到了对自己最亲密的事物。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所有的眼睛都注意地仰望着火光闪闪、硝烟笼罩的山头。密密麻麻的炮弹带着呼啸声从他们的上空飞过，消失在一片烟雾里面，发出来接连不

断的巨大的爆炸声。

杨林和王理明跟着连长出洞了，刘加亮跟着八班的同志们出洞了。各班的战士跟着排长、班长们出洞了。

“敌人的炮火给我们压住了，变成哑巴了！”有人高兴地说。

王理明听见这句话差一点流出眼泪来。他又激动又高兴地低声说："你们等着罢，我就是交出一切，也甘心。"这是他整整憋了一天的感情的爆发。他说到"你们"的时候，那张照片又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下，他看到了那两个"阿姐"的笑脸。他说"交出一切"，不过表示他争取胜利的决心。他知道在朝鲜至少有一对眼睛在注视他现在的行动。最近几天来一直在他脑子里活动的思想在这一刻变得更明显更具体了："不管死活，我一定要做英雄！"这就是他争取胜利的决心！它给了他力量、勇气和喜悦。他蹲在屯兵洞前听到震撼山岳般的强大炮声，他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劲，浑身都是感情。

炮火急袭的雄伟的场面整整继续了五分钟。敌人平日耀武扬威的大炮完全沉默了。整个山头给打得烟雾弥漫，火光冲天，树木乱飞，砂土翻身，好像在哀声号哭似的。王理明、刘加亮、杨林和他们的同志们一样，看见敌人挨打不敢还手，心里痛快得不得了。有些人不觉失声欢呼，有的人感到信心百倍，有些人全神贯注地等着连长的命令。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胜利越来越近了。连长和指导员怀着严肃的心情，屏住呼吸地望着自己的手表。绿色的夜光指针不仅吸住了他们的眼光，也吸住了他们的心：一分钟，一分钟……他们的思想仿佛也停

止活动了。五分钟！于是连长发出了出击的命令。就在这个时候，阵雨一般的炮弹也带着吼声朝敌人的纵深飞去。

八班副班长李方带着爆破组最先冲上山坡。刘加亮扛着爆破筒拚命地跑，丘文金抱着炸药，王振江扛着爆破筒紧紧跟在后面。山头上挂起了一排一排的照明弹，把天刚刚黑尽后的山坡照得很亮。铁丝网已经给炮弹打坏，乱成了一堆一堆。他们踏过这些绊脚的东西向主峰冲去。刘加亮非常兴奋，他这时正在干他想望了许久的事情。但是他也十分小心，他充分地利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忽然一道屋脊形的铁丝网拦住了他们的路，这道铁丝网不曾被先前的炮火摧毁，他们必须把它爆破。李方看见刘加亮跑到他面前，便说："刘加亮，你去爆破！"刘加亮应了一声，他一个箭步跳到铁丝网跟前，拿一根爆破筒插到铁丝网里面，他正要拉火，忽然一串子弹打过来，他连忙把身子一闪，只觉得有一只蜂在他的左胳膊上螫了一下，那里又热又痒。李方看见这样，便在后面问道："你行吗？要是不行，让丘文金来！"李方的话还没有讲完，便听见一声巨响，铁丝网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刘加亮立刻跑过缺口冲上去了。李方便带着丘文金和王振江追上去。机关枪又响起来，子弹接连地落在缺口的附近。突击部队已经跟上来了。李方听见下面的同志在喊"冲啊！"他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一闪一闪的火光，知道那里有敌人的暗堡。他刚叫丘文金去炸掉它，却听见刘加亮在上面嚷："副班长，让我去！"刘加亮跑过缺口的时候，就下了决心，要解决它前面那个暗堡，好让突击部队顺利地冲上来。他趴在坡上注意地朝那个嘴里吐火的黑黑的

凶恶东西望了一眼，心里在盘算怎样去打掉它。但是他没有再多的时间考虑了。突击部队已经冲了上来，他这个爆破组员应当为他们把道路打扫干净。他早已忘记了自已左胳膊上那个未包扎的伤口。他对副班长讲了话，就敏捷地连爬带跳绕着小弯贴近了那个暗堡。他的动作又快又灵便，敌人并没有发现他。机关枪子弹只顾朝缺口打过去，突击部队中有人倒下了，也有人上来了。刘加亮刚刚站定，就端起爆破筒，用力一拉，马上把它塞进射口里面，自已连忙往旁边退开。他听见那么响的一声爆炸，眼前砂石飞舞，他趴在地上，昏了过去。可是机关枪不响了。突击部队也接连冲上去了。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刘加亮！刘加亮！"原来副班长弯着腰在给他包扎胳膊上的伤口。他连忙说："副班长，我伤得很轻，不要紧。"李方替他包扎好了，让他站起来，含笑地说："你打得不错。包扎了，更好打仗，"就同他一路上去了。

好像是给强大的炮火吓昏了的敌人现在醒过来了。几个地堡和暗堡一齐发出机关枪声。挂在空中的照明弹一个一个地灭了，却又在另一个地方一个一个地亮起来。敌人打过来的空中爆炸炮弹像一团一团的红球接连地爆开，放出无数灿烂的红花，朝着正在前进中的战士们落下。有人给炮弹片打伤倒下去了。可是更多的人冲过突破口，朝不同的方向冲往山头。一个地堡给炸塌了，另一个暗堡变成了一堆土。各个班的战士争先恐后地奔上前去打击那些还在猖狂活动的敌人的火力点。

刘加亮跟着李方朝着山头跑去。丘文金刚刚用炸药炸毁

了一个大地堡，可是他自己腿上中了弹，在地上慢慢地爬行。身上还留着一包炸药。他看见李方和刘加亮便唤声："副班长。"李方关心地问："你挂了花了？"丘文金答道："右腿打断了。不要紧，我还能打仗。"李方说："不行，你应当下去。你藏起来，等会儿我找人来抬你。"刘加亮同情地看看丘文金，心里很生气，他激动地说："丘文金，把炸药给我，我一定替你报仇。"他便把十斤重的炸药包拿过来，扛在肩上。他忽然听见李连长大声在喊："同志们冲啊！……"便向李方要求："副班长，我先走罢。"他看见李方表示同意，便扛起炸药包朝前走。空中炸的炮弹还在他的四周爆炸，机关枪声和手榴弹在他的附近响着。他刚刚跳进一条交通沟，李方赶上来了。李方说："刘加亮，敌人在顽强抵抗，你要注意啊。"刘加亮答声："知道。"他们继续往前走，忽然听见连长的声音大喊："同志们，冲啊，再加一把劲就到主峰了。"刘加亮觉得心里一阵热，好像这个声音渗透了他的全身一样。他加快脚步往前跑，一阵机关枪子弹打在附近的坡上，他听见有人小声叫"王振江"，那是八班长的声音。他从一个缺口跳上坡去，只见火光一亮，一串子弹落到他的近旁，他连忙趴在地上，一身都是砂土。他听见李方在沟里低声喊道："刘加亮，你没有事罢？"他略略抬起头，看见右面地上一个影子晃了一下，他马上明白倒在地上的王振江起来了。王振江刚刚朝地堡冲了两步又倒下去了。机关枪一直在响。他说了一句："八班长，让我来。"并不管八班长听见不听见，他注意地望了望地堡，就从交通沟绕过去，不多几步便到了大地堡的后面。这是一个半坑道式的地堡。敌人正在紧张

地朝前面发射火力，却没有料到有人顺着交通沟从坑道口扔进了一颗手榴弹。刘加亮趁着敌人慌张的时候，连忙把炸药包塞进射口去，一拉火，转身就跑。他在交通沟里兴奋地听见那一声巨响，他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定了定神，知道大地堡完全炸塌了。李方在他的后面说："干得好，"他吐了一口气，他已经替丘文金和王振江报了仇了。他们同八班长一起把王振江的尸首移到交通沟旁一棵给炮弹打坏了的矮松下面，又继续朝主峰奔去。

敌人的火力渐渐地减弱了。空中炸的炮弹却仍然不断地放射红花。他们又从交通沟的缺口跳上坡去搜索敌人的地堡。忽然间一颗炮弹在他们的上空炸开，他们马上卧倒。刘加亮的左腿痛了一下，好像给烧红的铁烙了一下。可是他仍然跟着八班长和八班副站了起来，他觉得腿发软，知道自己中了弹片，他并不哼一声，也不让班长他们知道。他害怕他们会不让他继续前进，甚至会命令他退出火线。他咬紧牙齿提起左脚跟在他们后面，他还是走得不慢。他知道伤得轻，更不在意了。他们走了几步，忽然前面人影一晃，八班长问了一声："谁？"人影答道："杨林。"刘加亮惊喜地说："小鬼，你怎么来的！"八班长又问："你来干吗？"杨林答道："队长差我去向三排长传达命令，我回来找不到队长了。"从声音听出来他很焦急。李方说："你怎么搞的？"刘加亮马上拉住杨林的胳膊说："你不要急，沉着些，会找到的。王理明哪？"杨林好像见到亲人一样，拉着刘加亮的手带哭声地说："王理明跟着队长，他也不见。我害怕他们挂花了。"八班长说："不会的！小鬼，我跟你

一块儿去找。"杨林放开刘加亮的手走了。刘加亮还在后面关心地叮嘱："小鬼，要小心，要灵活啊！"

刘加亮冲上山坡以后，除了眼前的战斗外，他什么也没有想过。他的心思完全集中在"炸垮地堡，消灭敌人"这八个字上面。可是杨林的突然出现和马上离开，好像把他的心也带走了一样，他的眼前接连地闪着杨林的背影。他一面眼看李方往前走了，担心地想道："小鬼，找不到队长怎么办？"忽然听见八班副小声警告道："快趴下。"他连忙趴在地上。一排子弹从他的头上飞过去了。八班副端起冲锋枪，扫了一梭子。只听见敌人发出哇哇的叫声。刘加亮吃了一惊，出了一身汗。他立刻把心收回来了。他看见敌人转身朝交通沟旁边跑，知道美国鬼子想跳下交通沟逃命。他马上跳起来大吼一声，向那些人奔去。八班副又朝着敌人扫了一梭子。鬼子又倒下去几个。剩下的敌人叫得更厉害了。他们不再逃跑，却放下枪举起手一齐跪在地上。刘加亮高高地举着一颗手榴弹，大声嚷着他前两天才学会的英语喊话："缴枪不杀！"他到了敌人跟前点点数，一共七个。他把他们的武器全收了，看见八班副端着枪走来，便问道："副班长，这些俘虏怎么办？"八班副满意地答道："你把他们押下去罢。"刘加亮不愿意在战斗还没有结束就下去，他便说："我还——"可是刚说出这两个字，八班副就挥手道："不要说了。你不下去，难道把这些鬼子放掉不成？"刘加亮马上觉得自己的脑子清醒多了，连忙正经地回答："副班长，我去！保证完成任务再上来。"他一面做手势，一面说山东话，要鬼子站起来，跟他走。鬼子不懂话，却明白他的意思。

就站起来仍然高举着双手，排成了一行，由他押着朝山下走去。他挎着冲锋枪，拿着手榴弹，昂起头挺起胸，十分严肃地在后面监视着七个俘虏的一举一动。他一个人押着七个敌人，一路上并无一点畏惧和焦虑。但是他始终不放松警惕，他的左胳膊和左小腿上的伤口时痛时止，他却没有心思去注意这些不厉害的伤痛，他竭力不让俘虏们看出他腿上的伤。虽然伤口还在淌血，可是他觉得把俘虏押送到屯兵洞交给指导员处理，并不是困难的事。

杨林遇见刘加亮的时候，李连长正在主峰下面，站在交通沟口，一只脚踏在坡上，另一只脚踩在沟里，弯下身子侧着头仔细地在打量主峰上那个大母堡。李连长并没有挂花，他在阵地上跑来跑去，到处喊鼓动口号，向战士们交代任务。王理明一直跟在连长的身边，手里端着冲锋枪，信号枪挂在身旁，他不见杨林回来，有点担心，可是他又不能离开连长去找寻那个小鬼，而且更不能不注意观察他们的四周。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连长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他估计那个大母堡大概是敌人最后一个大火力点罢，从那个射口接连发出来达达达的机关枪声。火光一闪一闪地亮个不止。此外整个山上枪声炮声都已经稀少了。那么搞掉这个大母堡，就可以拿下整个阵地了。王理明在连长后面观察大母堡的时候，他又高兴起来。他忽然听见连长沉吟地小声自言自语："有一包炸药就可以解决了。"连长接着回头一看。王理明马上站定，激动地问道："队长，要给我任务吗？"连长摇摇头，也不说什么，又把头掉回去看大母堡。这个黑黑的怪物仍然不断地喷出火舌来。王理

明连忙伸出手去拉连长的军服，连长立刻缩回踏在坡上的脚，弯下了身子；王理明也埋下了头。一串一串的子弹从交通沟上面飞过，到下面去了。王理明掉过头朝那个方向看，只见一片尘雾。头顶上又挂起"天灯"来，照亮了这个光秃秃的山坡。他看见一些黑黑的人影给压在下面上不来，不但自己着急，也替连长着急。他又掉头去望那个大母堡，火力越来越猛了。他暗想，我不能老是看着连长发急。这时连长忽然提起右脚从沟口上去。王理明忽然灵机一动，他想通了。他慌忙拉住连长的衣服，等到连长掉转身来，他取下信号枪交给连长，一面要求道："队长，让我去，我一定干掉它。"连长看了他一眼，才接过信号枪来，又看看他的身上，把先前从烈士身上检来的手雷拿给王理明，温和地叮嘱道："你用这个。"王理明答应一声："是。"连长又关心地拍拍王理明的肩头，说："你不能大意啊。大家都等着你的喜报。"王理明意气昂扬地答道："我保证一定干掉它。"他就跳上了山坡。他觉得马上有一串子弹来欢迎他，他趴在地上，砂土盖了他半身。他等枪声稍停，立刻连滚带跳、带爬地奔向大母堡，他不是对直地朝着大母堡，他绕着弯子一步步接近它。他停一阵动一阵，在给炮弹打翻起来了的松软的土上爬着、跳着、滚着，棉军服早挂破了，两只手给碎石、破片磨出了血。空中炸的炮弹继续在他后面爆炸，仿佛在追赶他一样。可是他的瘦小的身子动作得那么快，那么灵敏，他已经安全地到了大母堡的右侧，离那个怪物不过几步的光景。大母堡里的敌人似乎并不知道有人到了它的近旁。它仍然向着下面前进的部队疯狂地射击，密集的枪弹像暴雨一

样打得那一带砂石飞溅，烟雾弥漫。有些战士挂了花，也有少数人冲过了这个封锁口上来了。李连长站在交通沟口，一双眼睛紧紧地跟着王理明移动。他看见王理明几个箭步就到了大母堡旁边，蹲在它右面，拿出手雷拉开了插鞘，突然站起来，朝射口丢进去，马上又向原路跑开。李连长听见了轰然的一声巨响。大母堡跟前升起了一片灰雾，连王理明也不见了。他又高兴，又有点难过，他担心王理明牺牲了。他便跳上交通沟，大声喊道："同志们，冲啊，冲啊！敌人已经给打垮了！冲上主峰便是胜利！……"他听见上面有人用上海口音接下去喊："冲啊，给祖国争光，给毛主席争光，给自己的亲人争光！"他知道这是谁的声音，他满心欢喜，十分感动地微笑了。连长用喜爱的眼光去找寻王理明。尘雾散了，大母堡塌了。王理明站在先前卧倒的地方，他并不下来报告胜利的消息，他却举起手榴弹朝炸坏了的大母堡扔过去。又是一个响雷似的爆炸声！过了一会儿，连长刚向上来的二排战士交代了任务，王理明回来了。他衣服破烂，满身是土，却没有一点轻花。他伸出手向连长要回信号枪。连长把信号枪放到他那只有血有土的湿漉漉的手里，按住他两只肩头用力摇了摇，满意地说："小鬼，你讲得对，你已经替祖国争了光了。"王理明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他带点傻相地向连长解释道："队长，母堡炸塌了，鬼子还在里面哇哇地叫。我才再给它一颗手榴弹。"连长松开手，点头说："我知道。你跟我上主峰去，就要用你的信号枪了。"

几分钟以后，从一七〇高地的山头升起了非常美丽的三颗红色信号弹。这是表示全部占领阵地的胜利信号弹。

二十六

一七〇高地占领以后，李连长指挥战士们在这个新阵地上赶修工事。天还未大亮，郝指导员得到坚守阵地的任务带着一个班上来了。连长把阵地交给指导员，自己去掌握全连。指导员布署了兵力，检查了临时构置的工事，他的信心相当大。他忽然注意到杨林跟在他后面一声不响，脸色发黄，眼睛发红，皱着眉毛，叫鼻梁上面现出一个“川”字，便问：“小鬼，你今天怎么啦？”他看见杨林红着脸急得讲不出话来，他也知道杨林的事情，便说：“你昨天没有立上功在生气吗？”杨林马上答一声“不是”，意思只是：不生气。指导员温和地说：“小鬼，你昨天的事情我知道。昨天没有打上仗，还有今天。在朝鲜每时每刻都在出英雄。”杨林说：“指导员，我知道，”又用感激的眼光看了看指导员。指导员拍拍杨林的肩头说：“小鬼，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杨林说了一句：“指导员，请你放心，”一面伸手去揉眼睛。指导员却装做没有看见杨林的眼泪，他也不再讲话了。他朝山下看了看，不曾看到一个敌人的影子。可是他听到了敌机的声音。很快地三架飞机就到了阵地的上空。指导员大声说了一句：“注意！”他的脸上换了严肃的表情，他却十分镇定。敌机一架跟着一架地朝这个山头俯

冲扫射，扔炸弹。一排一排敌人的炮弹朝这里打过来。一霎时只见烟尘满天，碎石和弹片横飞。指导员和战士们全躲在简单的工事里什么也看不见。杨林仍然在指导员的身旁，他一头一身都是碎石子，脸上还出了血。硝烟熏得他睁不开眼睛。可是他并不注意这种容易忍受的痛楚。他也忘记了先前还使他不愉快的那个思想。他更不会害怕枪弹落到他的身上，炸弹和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甚至忘记了自己，他唯一的思想就是指导员的安全。他几次轻轻地爬到指导员的身上，都被指导员轻轻地把他挡住。有一次指导员还说："我知道小心。"另一次指导员说："敌人要上来了，去通知三排长教大家把武器准备好。"杨林本来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指导员，可是他又不能不服从命令。他带跳带爬地到了三排长那里，并没有挂花，只是脸给一块碎石划破了。他把话讲完，敌人的炮火就停止了，飞机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三排长小声说了一句："上来了。"杨林跟着三排长朝下一看，那么多的钢盔闪着光在移动！三排长兴奋地说："小鬼，你回去报告指导员，我们一定狠狠地揍死他们。决不放一个鬼子上来。"杨林忽然高兴地笑道："好嘛，三排长，我一定要给你们庆功！"他连忙回去见指导员。他还不曾向指导员开口讲话，忽然听见哗哗哗的一阵冲锋枪声，接着手榴弹也响了，他忍不住说了一句："打得好！"然后才把三排长的话向指导员报告了。指导员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张长方脸最近瘦多了，下巴尖了，颧骨也显出来了。可是一对熬红了的眼睛仍然射出强烈的光芒。指导员并没有讲什么话，他们的右侧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的声

音，打得很激烈。指导员马上跑到前面去，杨林紧紧地跟在后面。一班长在那里指挥。战士们个个又沉着，又勇敢，使用各种武器在打击成群地上来的敌人。一片烟雾中只见美国鬼子乱叫乱挤地滚下去。可是接着又有一群敌人爬上来，快要进交通沟了。指导员忽然大声喊起了鼓动的口号："同志们，狠狠地打啊。是钢是铁，就看现在了！"枪声和手榴弹声更密了。杨林躲在工事里，听见指导员响亮的声音，看到眼前紧张的形势，他十分激动，忍耐不住，便向指导员要求："指导员，让我干他一下。"指导员看了杨林一眼，说了一声："好！"杨林这时高兴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大的劲。这时少数的敌人跳到交通沟里来了。一班长大吼一声，举着枪跳下去，一梭子就扫倒了几个。杨林马上跟着下去，他要放枪，不想他一紧张，子弹给卡住，打不响了。他虽然又惊又急，可是他眼明手快，他看见旁边有一支上了刺刀的枪，就丢下自己的枪，抓起它来，朝着逃跑的敌人追上去。一刺刀就戳穿了一个敌人的腰。他刚刚把刺刀抽了出来，另一个跑着的敌人忽然回转身来，拿着手枪朝他开枪。他怒火冲天，端起枪朝那个高个子扑过去，一下子就把敌人戳倒在交通沟口，刺刀深深地插在敌人的胸口上，从那里冒出大股的鲜血。他听见一班长叫他回去，一班长正举着枪在掩护他，他连忙跑回上面去。"小鬼，干得好。"一班长拍拍他的肩头鼓励道。他用感激的眼光看了班长一眼，马上就回到指导员身边去了。

指导员含笑地望着杨林，问一句："小鬼，你消灭了几个敌人？"指导员看见杨林兴奋的脸色，知道他不是空手回来的。

杨林得意地答道："两个。"但是他马上想起自己的枪给子弹卡住的事情，又想起自己把第二支枪丢在敌人尸首上面的事情，他红了脸不再作声了。指导员还在打量他，忽然带点惊讶地问道："小鬼，你腿上挂了花，怎么不讲？"杨林看了看自己的还在淌血的左腿，他这时才觉得伤口还在痛，可是他做出不在意的样子回答："指导员，不碍事，多半是给石头碰伤的。"他撒了谎，因为他害怕指导员以后不让他打仗，其实他自已也知道这个伤口是高个子敌人用手枪打的。指导员关心地说："明明是打伤的，你还不肯承认！过来，让我给你包扎。"杨林看见没法掩饰，只好笑笑承认道："指导员，的确不碍事。这是敌人手枪打的，不过我已经报了仇了。我自己会包扎的。"他掏出救急包将伤口包扎好了。

敌人的反扑完全失败了。山坡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血淋淋的尸首，和在朝阳下面发光的钢盔。一班长头上负了轻伤，一个战士牺牲了。这时阵地上显得很静。烟雾已经散尽了，敌机不再出现，也不见有炮弹落下。指导员便趁这个空隙督促大家修整打坏了的工事。这里就只有几个人了，指导员动手挖，杨林也使劲地掘土。他们刚刚放下铁锹，敌人又上来了，人数比上次多。杨林兴奋地叫了一声："指导员。"指导员不等他讲话，就说："你痛快地打罢。给大家多送几个手榴弹去。"杨林慌忙地答应一声，照着指导员的命令办了。大家不声不响，等着敌人到了二十米以内，突然动作起来，只听见一片爆炸声。手榴弹还不曾打完，敌人死的死，逃的逃，山坡上一个也不见了。杨林越打越高兴，他看见敌人狼狈逃窜的样

子，直想跳下去，再干掉几个。他觉得好些时候来憋在他心里的仇恨都发出来了。他满头大汗，他感到痛快。他希望敌人上来越多越好，他决不放过这个迎头痛击的好机会。果然并不要他等多久，敌人又上来了。

他们一连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反扑。又有一个同志挂了花。杨林的棉军服又给枪弹弄破了好些处，可是他并没有再负伤。他的信心更大了。每一次敌人打退以后，指导员就要出来表扬打得好的同志。到第四次他听见指导员在夸赞他，而且看见指导员用父亲一样的眼光望了他一眼，他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到第五次敌人刚刚上来，指导员就对大家说："同志们，挨打不如打人好，我们不能老是在山头等着挨打啊。鬼子要冲上来，我们就给他们来个反冲锋……"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擦他的两腮，说完就带头冲了下去，杨林立刻跟在后面。敌人的枪弹从他们身边擦过，他们的手榴弹和冲锋枪子弹接连不断地打在敌人的身上或者在敌人的身旁爆炸。只听见敌人哇哇地叫。不过五六分钟，一个活着的敌人也不见了。大家都背着缴获来的武器。杨林跟着指导员回到山头，各人扛了一挺轻机枪。他看见指导员放下轻机枪，脸不改色，很佩服指导员的镇静和勇敢，可是他严肃地对指导员说："指导员，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你冒险，我有责任……"指导员听杨林说到这里，觉得好笑，看了看那严肃的脸色，温和地说："小鬼，打仗嘛，不像在家种地，不冒一点儿险，怎么成？"杨林睁大两只眼睛瞪着指导员，认真地说："你比我们重要嘛，要冒险，让我去冒险。"指导员轻轻地拍一下杨林的肩头，他心里有

点激动，他多么喜欢这样的小青年！可是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压低声音说："我也有我的责任。小鬼，你不要看我胆大，我比你心细啊。我不是没有仔细考虑过。"他看见杨林带点疑惑的神情望着他，一对漆黑的眼珠好像一直在古辘古辘转动一样，又见一班长头上缠着纱布在同稍下的几个战士讲话，便换过话题对杨林说："小鬼，给你一个任务，你到三排长那里去看看他们打得怎样。你说我要求他们坚决守住阵地。记住，快去快回。"杨林不知不觉地挺起身子站起来答应一声："是。"他正要动身，听见指导员说："路上要小心啊，"连忙再答一句："是，我晓得。"他又看了指导员一眼，忽然说一句："指导员，你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指导员忍不住掉头看了一眼小青年灵活地跳动的背影，他的眼前忽然闪过一个人的面颜。他怎么又想起他的"老师"来了！他仿佛又听见那个熟习的声音说："要坚强啊，要乐观啊！"他心里一惊。眼前就只有一班长几个人。敌人还没有动静，也听不见炮声。但是这种安静的时刻是不会长久的。他用眼光点了点人数，连他一共六个。他仍然怀着信心：没有问题。他心里想：我一定不辜负我的"老师"。他正在跟一班长谈话，忽然听见正面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敌人又从正面上来了。他匆匆地跑回正面去。……

杨林完成了任务，回去看不见指导员，正要到正面去，敌人又从右面上来了。他遇见这样的"好机会"，哪里肯放过？他看见一排长他们五个人个个像猛虎一样，他也躲在单人掩体里面，拿起先前检来的敌人的手榴弹打下去，手榴弹打完，他

又端起机关枪向敌人猛扫。他看见同志们打得比他狠，他想赶过他们。他这时什么都忘记了，只有一个念头：报仇！他把山下那群乱叫乱滚、服装古怪、钢盔遮脸的敌人当作罪恶的化身。他们不仅杀害了朝鲜老乡（他还记得那两母女！），他们还给许多许多人带来灾难——他甚至有这样的想法，他从心底憎恨他们。他的确抱着有你就无我的决心打击他们。他等着把这次敌人的反扑打垮了，才满脸尘土地到正面去见指导员。路很近，他一会儿就到了。这时敌人的飞机已经到了上空，指导员不等他开口，就把他拉倒，让他趴在一个炮弹坑里。飞机一共来了八架，一个接一个轮番扫射，投弹。坦克的履带声也听得见了。炮弹大雨似地落在山头。他整个身子都给尘土盖满了。耳朵也给震得快聋了。他静静地趴着，自言自语地小声骂起来："你打不死我，我就不让你活。"整个山头快要让炮弹和炸弹翻了一个身。杨林知道会有人牺牲，他也想到自己可能牺牲，但是他又想：决不能教指导员受到损害。他趴在炮弹坑里，心里充满了怨气，咬牙切齿，可是他时时微微抬起头看，或者侧耳倾听，他关心指导员的安全，准备随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指导员。有一次他的确把自己的身子压在指导员的身上，几块碎石（幸好不是弹片）打得他的右胳膊一时举不起来。指导员命令他规规矩矩地趴着，指导员趴在地上带了点激动地说："小鬼，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要活着才能够多杀伤敌人。你准备狠狠地打罢。"炮火停了，飞机逃了。敌人大批地上来，哇哇地不知嚷些什么。指导员跳起来，大声喊："狠狠地打啊，祖国亲人的眼睛在望着我们。不怕死的跟我一块儿坚守，哪

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把敌人打退！”杨林也起来了。他觉得指导员讲的都是他心里的话。他的哥哥嫂嫂都在望着他，他整个乡里的人都在望着他。他的妈……他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半句：“我妈如果在的话……”他听见了手榴弹的声音。他也把手榴弹盖子拉开朝着薄薄烟雾中现出来的大群敌人打下去。爆炸的不止是他一颗手榴弹的声音，是许多颗的声音。指导员也蹲在单人掩体里开起机关枪来。杨林看见敌人一堆一堆地倒下去，各顾各地四散逃窜，他感到一阵痛快。可是过了几分钟，敌人又集合起来，上来了。指导员等着敌人爬到二十米以内，便大声喊“打！”，各种武器同时发挥威力，敌人倒的倒，逃的逃，乱了一阵，又往上爬。炮弹又像暴雨似地落到山头，三辆喷火坦克一齐朝着山上喷火，原来它们从侧面爬到山腰来了。指导员连忙对杨林说：“你去通知三排长要大家战斗到底。你快回来，还有任务。”杨林看见形势紧张，不愿意在这时离开指导员一步。可是他又不能违抗命令，也只好赶到左面去。

路虽近，只是炮弹横飞，硝烟扑面。他躲来避去，没有中弹，但是右胳膊的袖子烧起来了。打烂了的布和棉絮，延烧相当快，他连忙在打松了的土上打滚，而且还把胳膊在地上擦，将袖子整个撕掉。火灭了。他的左手烧伤了，右胳膊也在肿了。他到了那里，一颗炮弹刚刚把三排长的右腿打断了。三排长的左胳膊和左边脸颊上都缠着纱布。三排长还在那里嚷着“打啊，打啊！”旁边有一个人弯着身子在劝三排长下去，三排长不肯，他注意地一看，原来是卫生员范阳在替三排长包

扎，一面在说服三排长离开火线。杨林惊喜地说："范阳，你上来了。"范阳听见杨林的声音，抬起头来看他，范阳显得瘦多了，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亲热地说："小鬼，你在这儿！"又埋下头去包扎三排长的伤口。杨林激动地答道："我来给三排长送口信，指导员命令你们坚守到底啊。"三排长马上兴奋地说："是啊，我是在坚守啊。可是卫生员吵着要背我下去。"范阳着急地插嘴说："杨林，你回去报告指导员：三排长挂了重花，要不要他下去？"三排长不依道："我腿断了，可是我手能动，口能说啊。"范阳匆匆地包扎好了，也不再说什么，事实上他已经没有讲话的时间了。他马上离开三排长，爬到前面，拉开手榴弹的盖子，接连扔了三颗手榴弹。杨林不管自己的左手又烫又痛，他也拿起身上那颗手榴弹朝上来的敌人打去。打了几分钟，敌人又给打散了。范阳就在杨林身边，他忽然发见杨林左手烧伤，说要给杨林包扎。杨林猛省地说："我要回去了。"范阳看他一眼，便说："你报告指导员，说我在这里照料三排长，一定坚守到底。"杨林点头说："我晓得。"他正要动身，范阳一把抓住他的左胳膊，低声说："你将来回到成都，一定把我的事情告诉我家里。"杨林并不完全了解范阳的话，也没有功夫去想，他不加考虑顺口答道："我一定走四十里路传这个口信。"他说完又去对三排长讲了几句话，便赶回指导员那里去。

阵地上又显得很静，连杨林也知道敌人在准备新的更厉害的反扑了。但是他始终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类似兴奋的感觉。不过他朝着指导员在的那个简单工事跑去的时候，忽然因为那种出奇的安静打了一个冷噤。他找到了指导员，指导

员正半昏迷地倒在工事旁边一个炮弹坑里，一身都是血。他觉得血往上冲，他又悲痛，又愤恨，扶起指导员半个身子，接连唤"指导员"。指导员醒过来了。他说："小鬼，不要管我，坚守阵地要紧。"杨林连忙答了两声："是。"指导员又睁大了眼睛问："他们呢？还有几个人？"杨林听见这问话，连忙抬起头朝四面扫了一眼。没有一点动静。那几个同志要不全牺牲，也都挂了重花。杨林又打个冷噤。但是他马上装出笑容答道："他们都在准备打敌人。"指导员微微点一下头说："那就好，"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接着又很勉强地伸起右手，手指头刚刚挨到下巴，马上又垂下去了。杨林又朝四周扫了一眼，便温和地说："指导员，我背你到防空洞，我给你包扎好，你休息一下。"指导员摇摇头说："你不用管我。你跟他们一块儿准备打敌人罢。"杨林忽然迸出了几滴眼泪，他说："你从前也背过你的指导员，我为啥子不能背你嘛？"他就动手把指导员湿漉漉的身体放在自己的背上，他动作慢而且很小心。指导员起初还说："不，"可是接着就把两只无力的手放上杨林的肩头，说："想不到会轮着你来背我。"杨林咬着嘴唇皮不做声，快进防空洞的时候，指导员又说一句："小鬼，你背起来我的确不痛，一点儿也不痛。"杨林仍然不答话，他把指导员轻轻地放下，让指导员坐在地上，背靠着洞壁。他还要替指导员包扎伤口，可是一摸身上，救急包没有了。他痛苦地唤了一声"指导员"，指导员皱紧的眉毛展开了，温和地笑了笑，说："不用包扎了。……你快去打敌人罢。……你去告诉同志们……要坚守到底……"指导员看见杨林不肯马上离开，便又催促道："快去罢。……

我相信你一定……听我的话。……我等着你打退敌人再来看我。"敌人的炮弹又打过来了。杨林知道情况危急，他并不感到紧张，他只觉得有一团火在他心里燃烧。他下了决心说："指导员，你放心，我安全你就安全，我在阵地就在！"他马上跑出洞去了。

杨林出洞没有走多远，两颗炮弹落在他附近，他本来浑身发烧，忽然眼前一阵大火，他什么也听不到，看不见了。他一下子醒过来，才发觉帽子烧着了。他连忙起来扑灭了火。他遍身轻伤，衣服破烂得只剩下一点布片和棉絮。他端起冲锋枪，两眼发火地大声骂道："有老子在，你们休想上来一个！"他就趴在前面炮弹坑里等着敌人走近，突然站起来，一梭子扫下去，接着又扔一颗手榴弹，然后再换梭子。敌人也扔了手榴弹过来，有一颗刚刚扔到杨林的脚跟前，他连忙捡起它扔了回去。他看见手榴弹在一堆敌人中间爆炸了，满意地笑了笑。敌人又朝山下退去了。他听见左右两面还有枪声和爆炸声。他知道这时并不止他一个人在守山头。虽然他手边的弹药越用越少，可是胆子却更壮了，他便趁着这个战斗的空隙把牺牲了的同志的武器搜起来。过了不多久敌人又上来了。这次上来的人好像比以前两次都要多些。杨林一个人打了一会儿，看见子弹已经打光，便退到防空洞去。

指导员半昏迷地坐在防空洞里，杨林匆忙地跑进把指导员惊醒了。指导员睁大眼睛问道："小鬼，怎么啦？"他已经猜到情况更严重了。杨林满头大汗，激动地答道："指导员，你放心，我决不让敌人碰你一下！"指导员微微一笑，说声"好"，接

着看了看身旁地上几颗手榴弹和冲锋枪子弹，又说："我有一颗手榴弹就够了。别的你都拿去用罢。"杨林答应一声，拿起它们就走出去。他刚出洞，还回过头叫了一声："指导员。"他叫得很亲热，就像他从前叫他父亲那样。他听见指导员温和地说："小鬼，狠狠地打罢。"但是他也听见了敌人的脚步声。这次敌人没有开枪，也没有扔手榴弹，可能是想上来抓俘虏，或者他们以为这里已经没有活人了。杨林屏住气站在洞口，等敌人走近，先扔手榴弹，然后开枪。敌人乱了一阵以后便是乱枪齐发，杨林中了几枪，可是他还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到敌人中间。他手里紧紧地捏住冲锋枪，子弹打完了，他昂起头挺起胸，拿身体堵住防空洞，来保护指导员。他想：我决不让敌人碰一下指导员！最后敌人的几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身体，他在断气之前还仿佛看见指导员的笑容，又好像看见刘加亮和王理明的笑容。"你们都比我强，"他想这样说，可是他只吐出两个字："祖国，"他并不是有意说出它们的，而且这时已经不大清楚它们的意义了，他只知道自己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爱都在这两个字上面。

十分钟以后王副指导员带着增援部队上来，把敌人完全消灭了。同志们走到那个防空洞跟前，看见杨林拿着枪守在洞口，洞前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十几具敌人的尸首。范阳惊喜地远远叫了一声："杨林！"不见答应。大家走近一看，杨林睁着一对无光的眼睛，闭紧刷白的嘴唇，满身的枪洞还在淌血，已经断了气。王理明气咻咻地跑过来，拉住杨林的一只胳

膊，说了三个字："小鬼你……"一松手，杨林便倒下去了。王理明听见副指导员在后面大声说："指导员呢？"他连忙到洞里去。他看见指导员静静地坐在地上，身子斜靠着洞壁，右腿上放着一颗手榴弹。他走近摸了一下指导员的嘴唇，还在出气，便轻轻地唤一声："指导员。"听不到应声，他又唤一声。指导员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动一下头，说："你来了，杨林呢？"王理明没有回答，他刚刚扶一下指导员湿漉漉的上身，马上又到洞口，兴奋地大声叫道："指导员在！在此地！"眼泪在他的脸上滚着。范阳正在洞外弯下身看杨林，他刚刚伸出手去使杨林那双睁着的眼睛阖上了，听见王理明的叫声，便立起来，大声说："副指导员，指导员还在啊！"他也进洞去了。两个人把指导员抬了出来。副指导员和几个战士在洞口迎接。副指导员弯下身子热情地用双手握着指导员的右手，道歉地说："指导员，我来迟了。让你吃了苦。"指导员勉强地笑道："你来得不迟。怪我自己粗心大意，差一点见不到你了。……杨林呢？"指导员躺在地上，范阳在替他包扎腿上的伤，他忽然问起杨林，看见范阳掉头，他也跟着范阳的眼光去看，一眼就认出来杨林的尸首在那边。他收回眼光，皱起眉毛说："果然是他，我知道他会这样干的。让我好好地看他一眼。"大家不作声。副指导员说："把杨林同志抬过来让指导员看看罢。"战士们马上把杨林的尸首抬到指导员的左侧，王理明扶起指导员的上半身，指导员注意地看了一眼：那张浅黄色的圆脸，那一双松松地阖上的眼睛，那一张有血迹的嘴……指导员立刻这样想道："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睛对我讲一句话呢？"他马上掉开眼光，吃

力地说："把我抬下去罢。……老王，阵地交给你们了。"副指导员说："指导员，你放心下去罢，我们一定守住它。"范阳带着担架员把指导员抬下去了。杨林的遗体也让人抬下去了。指导员睡在担架上，他知道杨林就在他的后面。他不要再想这个小鬼，可是他的思想始终绕着一件事情活动：——要是小鬼能够再活几十年，那多好。他在战场上见过多少人死，从没有心软过。他的右腿打断了，十分之九保不住，他也不在乎。只是他不能不想：为什么不让小鬼多活几十年？他真愿意像他从前哭他那个老师那样哭一场。但是他又想：有什么用处呢？他的头越来越热，脑子越来越不灵活。他闭上了眼睛，似睡非睡地过了一会儿，忽然给炮声震醒了。他睁开眼睛，天色已经暗了。一滴水落到他的前额上，接着又是一滴……下雨了，他也清醒了。范阳把披在身上的棉军服取下来盖在指导员的身上。指导员右手一动，顺口说道："我不要，你给杨林盖上罢。"范阳惊讶地问："给杨林盖上？"指导员惊醒地动动头。他用力说："他不会死。他要活在我身上。"他并不注意别人是否听懂了他的话，他是说给自己听的，他已经下了决心："不管残废不残废，我要促使小鬼那些美好的愿望一个一个地实现。"

他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不算大，不过在这一天下了这样的决心的人却不止他一个，还有几个……几十个，而且人数一天一天不断地增加，因为杨林的愿望也就是每一个来到朝鲜的"志愿军同志"的愿望。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信心，这些愿望一定会实现，而且要在他们的手里实现！

尾　声

杨林的故事就这样地在一九五二年十月结束了。他的遗体后来迁葬在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在那里朝鲜的老大娘、大嫂子和男女青年整年不断地到墓前来献花。他的立功奖状给配上了镜框，挂在成都郊外他哥哥家中清洁的白壁上，他嫂嫂经常把镜框上的玻璃揩得干干净净，不让它沾上一点灰尘。在奖状旁边还有一个镜框，里面有三张照片，左角那张一寸半身照上的年轻军人便是杨林。依旧是他那张胖胖的圆脸和那双灵活的眼睛，这张照片还是实习团的首长汪正东同志从上海寄给他的，他没有来得及转寄回家，王理明和范阳在他很少的遗物中发见了它，便连同其它的遗物给他哥哥寄去。他哥哥得到他这张唯一的照片，便把它放在母亲遗照的旁边。这一对母子以后永远不分离了。不用说，放照片的镜框也是很干净的。附近的年轻人经常来看杨林烈士的遗照，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也常来听"婶婶"讲志愿军英雄的故事。杨林的哥哥有一男一女，孩子们非常崇拜他们的"二叔"，常常采些好看的野花插在瓶里供在像前的方桌上。他们已经听过多少遍二叔壮烈的英雄事迹，可是他们仍然不断地央求爹妈重讲那些听熟了的故事。他们不仅愿意知道二叔在朝鲜的事

情，他们也想知道二叔在家乡的生活细节，甚至二叔在他们这样年纪的所作所为。他们并不把听来的有关二叔的大小事情藏在心里，他们很高兴向人讲二叔的故事，他们讲起来有声有色，而且非常亲切，好像杨林还活着，好像杨林仍然跟他们在一个家里生活一样。其实不止是他们，许多比他们年长的青年都暗中拿杨林做自己学习的榜样。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归国部队坐火车回到了祖国。从三月十六日上午到十七日晚上这两天中间，有好几次列车满载着志愿军的官兵经过安东车站往祖国各地驶去。这些列车在安东车站停留的时间不多。可是每一次列车进站，站上便响起鞭炮声、锣鼓声和拍掌欢呼声，扩音器立刻播送出人们熟习的雄壮的《志愿军战歌》。最后一次列车进站的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欢迎大会早在前一天举行了，可是月台上仍然十分拥挤，灯光雪亮，锣鼓和鞭炮一齐响起来，穿着新衣的人们尽情欢呼，真像在办喜事一样。列车刚刚停稳，大群的青年男女就拥上前去。有的献花，有的握手，有的跳上了车，有的就在车厢外谈话。身材高高的年轻工人把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从开着的车窗递到刘加亮的手里，带笑说："送给你！"刘加亮坐在窗口，拿着这个礼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握着那只伸进来的手，接连说了两声："谢谢你。"王理明坐在刘加亮的旁边，他刚刚站起来看窗外那些笑脸，忽然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学生递给他一支英雄金笔，说了一句"你请收下罢，"马上就不见了。他拿着笔说了几句"不"字。他的眼光找不到那个穿红毛线衫的女学生，却看见深红色笔杆上刻着的

这样一行字："献给最可爱的人。"他感动地对刘加亮说："副排长，你看这个。"刘加亮正在跟下面几个年轻工人谈话，忽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人们高声唱起了"雄赳赳，气昂昂……"刘加亮兴奋地跟着唱起来。王理明也在唱，车上的官兵们都参加了这个大合唱，车上和车外的歌声唱成了一片。列车慢慢地开动了。

火车驶进黑暗中的时候，车上的人渐渐地平静下来。刘加亮才接过王理明的金笔，同时也把笔记本递给王理明。笔记本的里封面也有一行字："欢迎你，最可爱的人！"可是并没有写上人名。刘加亮带笑对王理明说："一班长，他要是写个名字，也好写封信去感谢他。"王理明把笔记本递还给刘加亮，说一句："我也是这样想，他手里捏着笔，眼前出现了穿红毛线衫的人形。他想的是另一个穿红毛线衫的人。刘加亮忽然轻轻地推了一下王理明的左胳膊，小声说："王理明，要是杨林能够跟我们一块儿回来那多好。"王理明眨了几下眼睛，变了脸色，压低声音答道："今天大家高高兴兴地回来，让他一个人留在开城，我很想念他。"刘加亮接嘴说："你想念，难道我不想念？"他们的谈话让背后的人听见了，那个人站起来按住王理明的肩头，说："你们不要难过，我不会让他留在开城，我一定要送他回家去。"王理明望着这张颧骨高、嘴唇薄的椭圆脸，诧异地问道："你送他回家去？"范阳一面揉眼睛一面回答："我将来回家一定多走四十里路，去找他哥哥嫂嫂，我把他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讲给大家听。"刘加亮马上接下去："他留在朝鲜，我们的心也跟他在一块儿。"刚巧副营长走过这里，听见范

阳和刘加亮的谈话，略略皱起黑黄脸上的一对浓眉，停在王理明面前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这些青年，在朝鲜住了好几年，怎么还是婆婆妈妈的？大家要往前看，不要向后看啊。"三个人勉强笑了笑，点了点头。他们不作声，副营长用爱惜的眼光看了看他们，便走过去了。

读者们大概猜得到副营长便是从前的李连长。那么你们也会知道范阳的圆脸变成椭圆脸了，他比从前瘦了些，也高了些，他不再是卫生员，他现在是刘加亮下面的立过二等功的二班长了：一班长是王理明，他仍然是从前那张孩子面孔，不过左边脸颊上有一个小小的伤疤。还是他那瘦小的身材，只是身材更加结实，精神更饱满，他参加过几次战斗，当上了一等功臣。刘加亮现在是一排的副排长，又是二级战斗英雄。他在停战前一天还带着两个班的战士夺取了一个敌人占据的山头，并且打退了几次反扑，消灭了六七百个敌人，缴获了很多的武器。他的相貌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人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些。虽然他的胳膊上、腿上多了三个伤疤，可是他的身体长得更健壮了，脸也晒得更黑了。他离开祖国七年，现在回到鸭绿江的北岸，仿佛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时间长了，变化大了，车窗外的一切在他的眼里显得又新鲜又亲切，他尽情地看，注意地倾听，满意地呼吸祖国的空气。列车从安东车站开出以后，过了一个整天，第三天清晨，到了天津。车站上又有一番热闹的景象，人们对于归国英雄们的欢迎，既热烈，又诚恳。仍然是一片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鼓掌声。刘加亮只见万头攒动，好些张不认识的脸在对他微笑，许多只手朝着他这面车窗挥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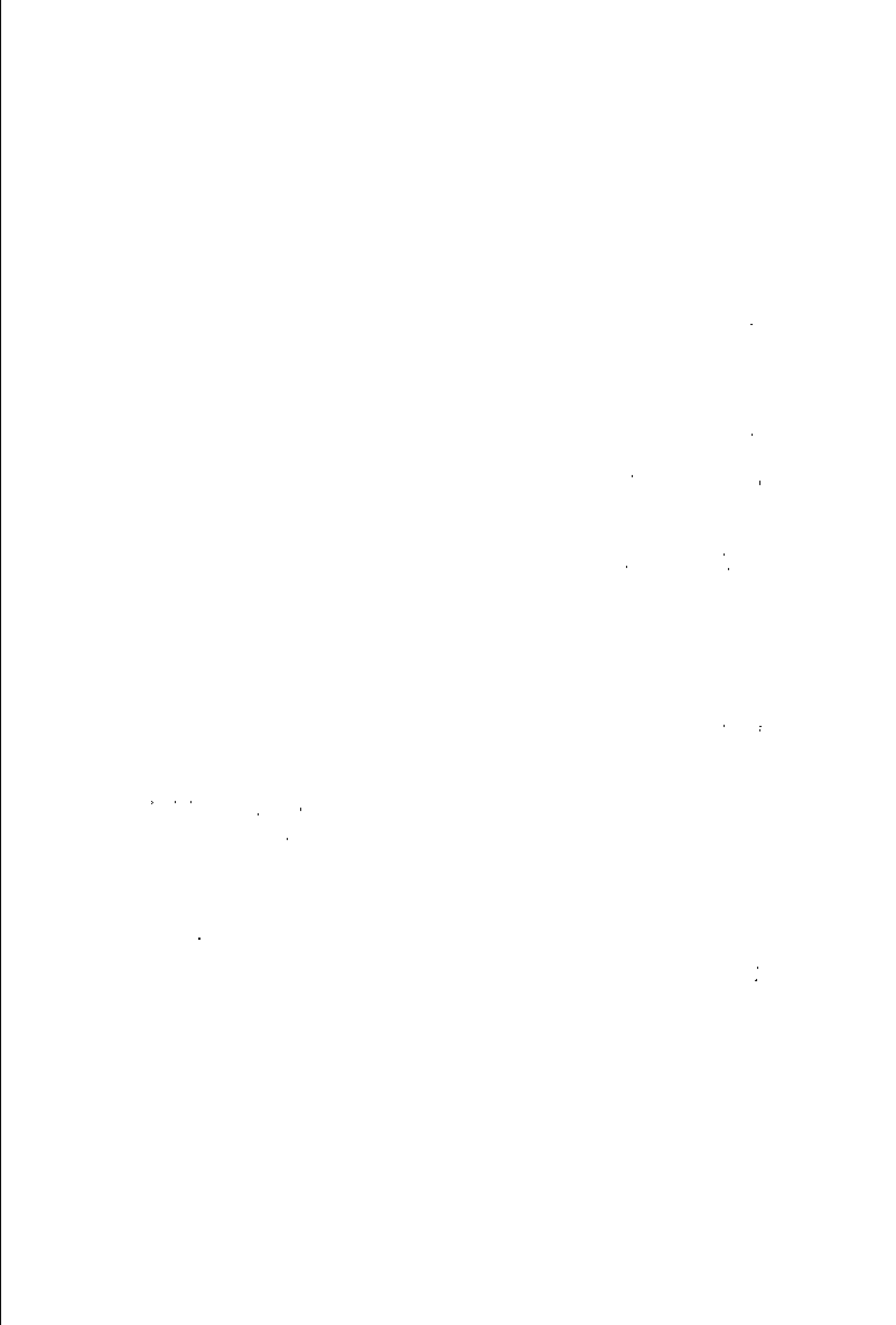
他兴奋地微笑着，挥着手。他觉得自己是在对每个人笑，他把每个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和熟人。他知道他在这里不会见到另外的熟人和亲人了。

王理明忽然推一下刘加亮的右胳膊，高兴地笑着说："你看，啥人来了？"刘加亮随着王理明的手指望去。王理明再说一句："看见没有？"刘加亮惊喜地点点头，他看见了。她正穿过人丛中朝着他这个方向走过来。她用眼光在找寻他。她伸起手挥舞着，一面叫："刘加亮同志。"月台上人声嘈杂，不过她的声音即使给别的声音压住了，刘加亮也不会听不见。他红着脸大声叫着："秀兰！秀兰！"他使劲地摇手。她看见他了。她在对他微笑。仍然是那张浅黑色的椭圆脸，不过现在更丰满了。两边脸颊还是像苹果那样地红。脑后的大辫子不见了。却有一头厚厚的漆黑的齐耳根的短发。她那么高兴地叫着："加亮哥！加亮哥！"人们带笑地看她，给她让路。她红着脸跑到他的车窗外，脚步便停了下来。刘加亮还想再看她两眼，但是他的眼前只有一些挥动的手，整个车站一下子就消失了。王理明轻轻地拍拍刘加亮的肩头，笑着说："副排长，我要对你提意见：秀兰同志看见我就只笑笑，连一句话也不说。要不是我，你还不会找到她。"刘加亮笑笑，他没有答话，范阳忽然在背后插嘴了："王理明，你也不用急，到下一站就有人从上海赶来了。"王理明并不生气，他也满意地笑笑。他知道不会有人从上海赶来的。但是他有一天总会回到上海去，上海一定变得更加可爱了。还有在上海工厂里劳动的人……

火车不停地在轨道上飞奔，离它的目的地越来越近，我们

应当向这些英雄们告别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见到郝指导员那张黑黑的长方脸。他并不在车上,早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底他就回到祖国了。他现在是高级农业社的党总支书记。他在县里开会,读到《人民日报》,看见志愿军首批回国部队到达安东的消息,见到他熟悉的军长的名字,才知道他从前那个部队已经回国,他多么激动地读着那篇详细、生动的报导,一口气读了两遍,然后支着木拐,用他的独脚走十几里路,回到社里。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他深夜在油灯下给他的老战友李副营长写信,老婆和儿女都睡熟了,他听见他们均匀的鼻息声,从容地下笔,他想到大跃进以来农村的新气象,想到今年可能有的大丰收,衷心欢快地写好了一封报喜的信。他放下笔并封好信,天刚发白,窗外树林上已有鸟声。他拄着木拐走出去,站在门前空地上,他看到大片油绿的麦田,他看到东方天空的一片红霞,他不但毫无倦意,而且浑身有劲,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战场上,而且是在一个更大的战场上。这时候他好像又看见了那张可爱的圆脸。其实他一直不曾忘记过那个小鬼。不论是在高兴的时候,或者是在遇到困难想办法的时候,他都会想起杨林,他不再因为失去杨林而感到悲痛,他把杨林当作学习的榜样,用这个小鬼的英雄形象来激励自己,鼓舞自己。



炸不断的桥

《炸不断的桥》，作于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其中部分曾发表于报刊。一九六六年春，作者将已发表及未发表者(四篇)编为一集并作《后记》，拟付印单行本，后以"文革"起而未果。一九九〇年初，未发表稿连同《后记》稿于复制中不慎遭遗失。

并肩前进*（代序）

——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

我刚刚从农村回来。在上海郊区下霜的清晨，我听到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声讨美帝国主义、支持刚果人民斗争的正义吼声；我听到了越南人民声讨美国空中强盗的怒吼；我听到了越南南方解放军指挥部关于边和大捷的最新战报，刚刚到来的寒潮好像也让这些响彻云霄的声音吓退了。我心情振奋，热血沸腾，我的心又飞到了你们中间，飞到了越战越强的越南南方人民中间，您的热情的诗句，又在我的耳边响了起来："你可看见东方已经破晓？囚禁奴隶的长夜眼看到了尽头！""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堵住敌人的坦克，堵住敌人的炮口……"敬爱的江南同志，您这位用笔也用枪写诗的优秀诗人，您的豪迈的语言，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您的英雄的气概给我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在您的诗句里我看到了越南南方诗人和作家的面貌，在您的信函里我接触了越南南方诗人和作家的心。

在农村里，一连几天我都在想你们那里的事情。晚上静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下来我便同几位熟人畅谈我所知道的你们那里的一切。甚至在梦中我也常常见到茂盛的椰林，发光的河流，青葱的竹丛，独木的小桥和用各种武器射击美国直升飞机的青年战士。一年半以前我在河内看到在你们那里摄制的大型纪录片《英勇不屈的越南南方》，每一个镜头都像火一样使我的血燃烧，我真想拿起一枝枪奔向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刽子手；每一个镜头都紧紧抓住我的心，我的心在同英雄的人民在一起受锻炼；你们人民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我不仅受到鼓舞，也受到教育。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热烈地爱越南人。今天，我仍然怀着强烈的感情向屹立在反美斗争南方前哨的越南弟兄表示最大的敬意。我走过铺上一层薄霜的独木桥，访问上海近郊农民家庭的时候，我的眼前还出现戴着伪装帽前进的越南南方人民军队和为敌人准备的"桩板坑"，我的眼前还出现捣毁了的战略村和打坏了的美国新式飞机，不用说，我的心仍然在你们中间，同你们一起斗争，同你们一起胜利。我在窄小的田坎上来来去去，看到一片欢乐的丰收景象的时候，我也常常想起另一部影片上的一些镜头：越南南方人民在生产，在学习，在进行文化活动和业余教育。我指的是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介绍越南南方解放区情况的影片，在这部影片上我看到无数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敢于建设；他们有勇气、有信心、也有力量打击世界上最凶恶、最残暴、最野蛮的敌人，保卫最亲爱的祖国；任何困难也难不住他们，任何危险也吓不倒他们；在他们面前，美帝国主义最新式的武器、最野蛮的暴行也毫无用处。把美国侵略者打

得狼狈不堪、走投无路的正是他们。我指的是战斗中的越南南方人民，我指的是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的越南南方人民，我指的是你们。敬爱的诗人同志，您充满感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 谁能忘记，在自己的身边　有一位谦虚、坚贞、高举革命大旗的战友——中国！

我们却这样说，我也在信里告诉过您："中国人民，中国文艺工作者都认为，有你们这样的战友，是可以引为光荣的事情。"这是你们的中国弟兄真诚的语言，这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共同的感情。我们是怀着感谢之情讲出这些话来的。你们不仅是为着自己在战斗，你们也是为着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在战斗。你们在战斗中流的每一滴血，你们在生产建设中淌的每一滴汗都会开出美丽的花，结起丰硕的果。越南人民给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一个极其光辉的榜样。在你们手中熊熊燃烧的火炬，也在英勇的刚果人民的手里燃起来了。革命的火炬越燃越旺，越传越广，世界上一切牛鬼蛇神都会让这股不灭的烈火烧成灰烬，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逃不了灭亡的命运。纸老虎见不得真火，你们一定会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南方！三千万越南人民朝夕盼望的祖国统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袭击边和机场取得极其辉煌战果以后，谁都可以肯定地说：最后胜利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从谅山到金瓯的越南的不能分割的美丽河山将会放射万丈光芒，三千万顶天立地的越南人民将会对全世界人民

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你们最亲密的弟兄的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都要同你们紧紧地站在一起，并肩前进。

敬爱的诗人同志，我们十分关心你们的斗争，坚决支持你们的斗争，我们一直把你们的斗争看成自己的斗争一样。我们和越南的弟兄有许多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理想。中国读者含着热泪，燃着怒火反复阅读《南方来信》，中国观众屏住呼吸观看由《南方来信》改编的话剧，和剧中人一起受苦、一起战斗。中国青年把《南方来信》当作精神食粮，从这些用生命用血写成的信函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因为能够同越南的诗人和作家站在一起共同奋斗而感到自豪，你们那些战斗的诗篇，你们那些英雄的事迹对我们有多大的吸引力，你们不仅是英雄形象的塑造者，你们自己也是英雄。我们衷心地敬爱你们。

我从丰收的农村回到写字桌前，寒潮已经过去，暖和的阳光给我的信纸薄薄地染上一层金色，我的手边有您的信和您的诗，抽屉里放着一束从河内寄来的信件和几册诗集，还有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印行的青海同志的诗。从越南弟兄那里来的任何东西，越南诗人和作家寄来的片纸只字对我都是非常宝贵的，它们不仅是友谊的凭证，还是鼓舞我不断前进的战斗号角。

阳光一直照在我的信纸上，我多么希望能够把上海的阳光连同信一起寄到您跟前。我想起您，想起从你们那里不断地传来的捷报，想起您讲过的"同越南南方战友们紧紧握手"的那一天，我真是万分兴奋，我的心暖和得和春天一样。我知

道在你们那里是没有冬天的，你们将在炎热的阳光下庆祝你们的欢乐的节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四周年。我不能到您跟前，紧紧握着您的手同你们一起欢度这个胜利的节日，但是我的心，我的声音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通过它们，我向您，向越南南方的战友们，向越南的诗人和作家们，向全体英雄的越南人民表示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敬爱的诗人同志，您会听见中国人民的声音吧，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心同你们在一起欢度节日。我们两国人民将永远并肩前进！

美国飞贼们的下场*

——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

前天清晨我又到了贤良江边。我立在一棵年轻的椰子树下，面对着南岸。东方霞光开始上升；对岸浅灰色天空有两三道亮光，下面依然是一片冷酷、荒凉的景象，伪装的碉堡和造谣的宣传画也不曾改变它们的豺狼面目。平静的江上有两只小船，一只停在江心，靠近没有行人的贤良桥，船上有一个人影，仿佛他静静地坐在那里钓鱼。江上和南岸都没有声音。北岸哨所里有人在从容地谈话。清晨的空气使我感到舒适，南国的草木香一阵一阵地送到我的鼻端，清凉的露珠随着风落在我的手腕上，我就这样在椰子树下立了好一会，我不瞬眼地向远处望，我不是在欣赏风景，我不是在看浅灰色天空和深绿色树丛的交界处，我是在望南方，我是在眺望正在进行英勇战斗而且不断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南方。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想着您，敬爱的江南同志，我知道在我的肉眼望不到的地方，有多么丰富的生活，有多么尖锐的斗争，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战斗事迹，有多少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在我的肉眼望不到的地方，有多少人牵系着我的心，我想着您，我想着您那封充满英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文学》十月号。

雄气概、战斗热情和兄弟情谊的长信，我想着您在那封信里提到的许多亲爱的同志，我的心已经飞到了你们的身边。敬爱的江南同志，倘使我真像在昨夜梦中那样，跨过了贤良桥，来到你们中间，站在您的面前，那么我一定紧紧拉住您的手谈个不停。谈什么呢？不用问，您也了解，谈十天，谈一个月，也谈不尽我对你们伟大的国家、美丽的河山和英雄的人民的热爱，也谈不完我无穷无尽的友爱的感情。我是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来到越南北方的。单说友谊，也许简单了些，这是同战斗、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的友情。敬爱的同志，您说得多么恰当："人们有许多感情是用言语不能完整地表达出来的。"何况你们和我们的心早已让一根红线牢牢地拴在一起，用言语表达彼此的感情有时反而成为多余的了。然而要把这半年中间积蓄起来的千言万语长久锁在我的心里，也不是容易的事。

正如您所希望，我是在上海的春天里读到您的来信的；也正如您所希望，您的长信把南国的温暖带给了我们。多少中国读者从您那些战斗故事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您那支有力的笔把许多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引到了我们的面前，您那些豪迈的语言让我们分享到你们胜利的欢乐。我迟了这么久才写回信，只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愿望：我要在你们亲爱的国家里，在战斗的生活中间，在尽可能离您最近的地方，向您表示谢意。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又一次在贤良桥头留下我的脚迹。江水那么平静，我的心里却涌起了波涛。我无法对贤良江水倾吐我的感情，那个时候我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够压下

那许多涌到我唇边的语言。今天在日丽河南岸一个安静的农家里，对着门外连绵不断的雨丝和院子里的积水，我又觉得千言万语像火一样烧着我的心，我在一张小桌旁边坐下来，摊开我身边那个笔记本，在上面记下我心里的话，我对自己说：我在给江南同志写回信了。

我拿起笔写了几百字，就听见熟习的飞机声，美国喷气式轰炸机越过日丽河往北去了。那些飞贼在下雨的日子也要到越南北方来骚扰，而且每天来来去去，至少几次，好像他们不在北方的土地上扔下一些炸弹，不摔下两三架美国飞机，住在华盛顿的百万富翁们就没法活下去。我离开河内以来，每天都听见美国飞机的声音：高飞，低飞；一架，多架；喷气式的，螺旋桨的；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雷神，鬼怪，应有尽有；每天都听见炸弹和火箭落下，声音实在难听。美国飞贼们想尽方法要吓唬越南人民，给人民制造种种困难，可是他们在北方遇到的却是"丛林一样的枪"。在河内我听见一位空中英雄畅谈他们以少胜多、打落两架美国"雷神"的战斗经历。南行后，一路上我听过不少民兵打落美国飞机的故事。十天前我还见到用三发步枪子弹打落一架喷气式轰炸机的三位英雄。在清化市郊区我看到给民兵打落的一架AD5型美国飞机的残骸，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参加了掩埋飞贼的工作：当天挖出两个飞贼的尸首，头盖削去，手指全落，两天后又挖出其余两个，已经成了两堆肉酱。越南人民给美国飞行员起了一个多么恰当的称呼：飞贼！因为他们正是闯进人家杀人放火的强盗。在荣市，人们还习惯把美国飞机叫做"约翰逊"。从荣市到永灵，人们

听见机声就说："约翰逊又来了。"都良县一位打飞机的民兵还形象地说："我看见美国飞机来轰炸，我以为来的不是飞机，是约翰逊本人，我真想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按在地上活活地掐死。"

雨小了些，"约翰逊"又飞过日丽河，而且在远处投了炸弹。反正他们有的是炸弹，不扔掉，回去交不了账。"约翰逊"究竟在北方扔了多少炸弹？我算不清这笔账。可是我还记得两笔数字：在荣市郊区，七月三十日十六架"约翰逊"投下四十颗炸弹，只炸死一只鸡，却给打落了一架，打伤了三架；七月三十一日二十一架各种类型的"约翰逊"投了一百四十多颗炸弹，一位老人牺牲了。我经过一道不过十几米长的公路桥，一共有六百多颗炸弹落在桥的四周，桥的前前后后都是大小弹坑，桥身却完好如旧，车辆通过无阻。我未到荣市以前听说荣市的发电厂给炸坏了，可是我们的车子一进荣市，就看见一排明亮的路灯。在经过"约翰逊"多次轰炸的胡舍市，每晚也亮着电灯。我走过街头一个人家，门开着，猎机组的自卫队员们正在耀眼的灯光下下着棋。班长是我们的熟人，他邀请我们进去作客，我在屋子里看到他经常使用的缝纫机，还有理发师的用具，屋后廊上陈列着修理自行车的工具，原来这个猎机组的成员有成衣匠、理发师和修理自行车的人。他们的家属已经疏散到农村。他们的阵地就在马路的另一面。"约翰逊"炸坏了他们的住处，他们索性把生产工具搬到阵地附近，有警报，就到机枪旁边等着打敌机，没有警报，他们就从事生产劳动。"猎机组"，这三个字不用说您早已熟习，但对我来说，却是个

很新奇的称呼。我只是在这次的旅行中才听到许多猎机组的故事。这些专打"约翰逊"的"猎人"在北方有千千万万，不论在城市或乡村，我天天遇见他们，处处遇见他们。一个中尉飞贼给抓到以后曾经老实地招认他和他的伙伴们害怕民兵。其实乡村的民兵和城市的自卫队员并不是三头六臂的壮汉，论身材，论体格，他们都不一定比美国飞贼高大多少。这些年轻小伙子和十七八岁到二十左右的身材苗条的姑娘，不仅是生产能手，还是战斗英雄。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专找"约翰逊"打，常常你一枪我一弹，凑在一起，打得"约翰逊"倒栽在土里，身首异处，或者尸骨成灰。这些年轻人还有一种特长：活捉飞贼。在清化市郊区一个村子里，民兵队长看见飞贼跳伞逃命，他来不及回去取枪，就拿着扁担跑去捉贼。降落伞挂在树上，飞贼右手拿枪，左手拿电台，头顶上还有八架"约翰逊"在盘旋，两个民兵到了那里，他们手里没有武器，飞贼正要开枪，可是扁担打中了他的右手，他只好束手就擒，八架"约翰逊"也救不了他。在河内军事博物馆中陈列着一把农民叉稻草用的木叉，手执现代武器的美国飞贼，碰上这把木叉却吓得失魂丧胆，连忙低头认罪。义安省演州县一个村子里两个民兵，一个当枪架，另一个开重机枪，六发子弹就打落了一架F101型侦察机。中尉飞贼落地后躲在树丛中，几个民兵拿着刀子围住他。一只蜗牛爬到飞贼脚上，他害怕地动着脚，想甩掉蜗牛，女民兵以为飞贼用脚踢人，便向他挥刀，吓得他脸无人色，连忙作揖。这些胆小鬼的丑态您一定看惯了！

在清化市一位越南朋友对我讲过两个飞贼就擒的故事。

一天下午十八架"约翰逊"从不同的方向飞来，轰炸一个地方，当场给打落三架。人们看见一个白点从三千米高空慢慢落下，知道飞贼跳伞，便拿起简单的武器朝飞贼可能降落的地方跑去。突然一阵风把降落伞吹向对岸。一位民兵副排长善于划船，带一个民兵划着船去捉飞贼。飞贼看见船过来，远远地举手投降。他们把船靠近，抓住飞贼一只胳膊，用绳子套住他，把船划到竹筏旁边，别的船上的人也来帮忙，把飞贼拖上竹筏，叫他脱去衣服(飞贼还穿着救生衣)换上便衣。上岸后民兵叫飞贼步行，他却愁眉苦脸，说腿肿，不肯走，其实腿上连皮也没有擦破。最后民兵们用四个人抬着他的手和脚，又在他的背后垫上一块木板，再加两个抬木板的人，像抬猪一样把他送到了公安所。民兵们正在江上活捉这个中校飞贼的时候，在附近的村子里，一个姓阮的民兵拿着菜刀向江边跑去，忽然听说村子里也有飞贼跳伞，便折回来，正看见降落伞缓缓下落。他约了一个民兵同去捉贼，只见伞挂在椰子树梢，飞贼悬空吊在那里，离地面还有一米光景，右手拿手枪，左手抓住降落伞的绳子。阮用菜刀在飞贼眼前晃了晃，飞贼马上扔掉手枪，举起双手投降。可是他吊在树上下不来，这两个民兵抓住他的双脚往下拉，也没有用。后来一个民兵爬上树，砍掉一些叶子，飞贼才落在地上。这个中尉飞贼年纪轻，投降后高高兴兴，讨烟抽，还时时哼一两句歌词，好像庆幸自己的性命保全了。

这个真实的故事正好说明今天在越南北方经常发生的事情，美国飞机挨打，美国飞贼被擒；也正好说明越南人民的英

雄气概和美国侵略者的丑恶面目。

敬爱的江南同志，请原谅，听见飞机声，提起"约翰逊"，提到美国飞贼，我就不由自主地写了上面一大篇。我本来想用我这支秃笔向您传达中国人民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对你们的生死不渝的战斗友谊，可是我住在日丽河边的农家，和主人一家老幼在一起，不要翻译同志帮助，用最朴素的语言或最简单的比划，就能够表达彼此的感情，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心早已和越南同志的心连在一起，大家早已互相了解，现在在我的心里翻腾得最厉害的倒是我这些时候在你们北方土地上的感受和见闻，我不写出它们，我的心就不能平静，而且，它们也要跟着我的感情飞到我敬爱的朋友和同志的跟前。那么就让我继续同您畅谈我两个月来的见闻和感受吧。敬爱的同志，我在这里提到两个月的见闻和感受，因为我早已离开日丽河南岸的农家，也不是在女英雄索大娘的家乡松软沙土上那间门多窗多的屋子里，更不是在洞海市郊区那个屋里有防空洞的招待所内，在那些地方我都曾摊开笔记本像同您交谈似地写下几段几行，可是放下笔我就没有能续写一个字。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五十天的旅行，回到河内，坐在旅馆里一张写字桌前，摊开稿纸，首先抄下我在笔记本上给您写的那些话，然后——

我还是接着谈飞贼的事情。我离开日丽河南岸不多几天，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在广平省旅行，车子离开洞海市不到一个半小时，遇见"约翰逊"来骚扰，在不很远的地方投下几颗照明弹。我们刚下车，就看见高射炮弹的火光，一团小小的

火球忽然从照明弹附近朝我们这个方向飞过来，有人说房子着火，但是红光一现之后，四周漆黑，只见半天星斗、大片乌云和几颗摇摇欲坠的照明弹。几个越南同志兴奋地说："约翰逊给打下来了！"以后美国飞机一直在这一带盘旋，整整一个小时里我们都看见机翼下的灯光。我们说："约翰逊"一定在找寻它失去的伙伴，可能是飞贼跳伞了。我们乘车继续前进，不久便看见坠毁的机身在远处燃烧。车子经过防空灯跟前，带枪的民兵们拦住车告诉我们：飞贼跳伞，民兵们正在搜捕。我们越往前走，见到搜捕飞贼的民兵越多，听说已经找到了电台和坐椅。不久下起了大雨，雨一落就是通宵。我们在车子里说，飞贼一定躲在树林里打颤吧。过几天我们回到洞海市，人们告诉我，民兵们在第二天清晨六点捉到了那个飞贼，他像落汤鸡一样，浑身战栗，连手也举不起来。

我们回到河内以前，经过清化市，正是夜深人静，月明如水，市内异常安静，招待所的同志一见面就对我们说这天在清化省北面的一个县里打落了一架美国飞机，活捉了一个飞贼。第二天下午在招待所里人们告诉我，今天在南面一个靠海的县里又打落了一架美国飞机，又活捉了一个飞贼，晚上开车前又听人说，先前打落的飞机掉在海上，恰好落在鱼网里面，给捞了起来。当时几架敌机来找寻跳伞的飞贼，又给打落了一架。越南同志笑着说："我们用这个胜利给你们送行，"我答道："这太隆重了。"的确我们离开每一个地区，同志们都是以这样的捷报给我们送行。

敬爱的同志，我们这次一共访问了清化、义安、广平三个

省和一个永灵特区。我称这次旅行为“望南方”的旅行，因为车子前进一公里，我和您的距离就缩短一公里；因为到了贤良江边，我可以在几个地方望南岸，可以听到南岸游击队的炮声。那天我站在贤良桥头，南方游击队包围着一个伪军的据点，几架直升飞机正在向那里空投物资。我称这次旅行为“望南方”的旅行，因为一路上我们越来越多地听见人带着深厚、强烈的感情谈到南方，讲起南方的故事；因为我望着在贤良桥头三十三米高的旗杆上刚刚升起的二十米长十六米宽的金星红旗，我的心跟着那一片鲜艳的红色飞到了南方。您也许不会想到，我到达永灵区的那个晚上，躺在胡舍市郊外农家的一张小床上，一夜不能合眼。我兴奋地想：我已经到了贤良江边了。美国飞贼拦不住我们的车子，“约翰逊”也不能带给我们多大的困难。我怀着一种胜利的喜悦在计算我一路上看到的和听到的给打落的“约翰逊”的数字。

在胡舍市郊外我也看见“约翰逊”冒烟落下。在胡舍市内我们在月光下走到F101型美国飞机坠毁的地方，看“约翰逊”肮脏的尸骨。敬爱的同志，在这次旅行的五十天中间，我天天都在同“约翰逊”打交道。我没有计算过每天闯进北方天空来骚扰的“约翰逊”究竟有多少架次，但是我算出来每天总有两三架“约翰逊”给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我和同行的越南同志在清化招待所里庆祝过北方军民击落第四百架美机的捷报。在广平招待所我们又因为击落第五百架美机碰过杯。短短的五十天中间，“约翰逊”一共给打落了一百三十八架。美国统治集团天天在吹嘘他们的空中优势，他们想用死亡和毁灭来吓唬

北方人民。可是在"望南方"旅行的五十天中间，我们来回走了三千公里，我到处看见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到处听见衷心愉快的笑声和歌声，到处听到生产战线的捷报，到处接触胜利的气氛，到处受到革命英雄主义的感染。我们访问过几个高射炮阵地，听见不少守在炮盘上的青年英雄用豪迈的语言谈他们打败美帝的决心和信心，谈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他们的英雄事迹是写不完的。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我前进。"约翰逊"最害怕他们，碰到他们的炮火，总是连忙仓皇逃窜，否则就会落个死无葬身之地！敬爱的同志，现在不说高射炮部队，连十八九岁的女民兵每天也要在自己的阵地上"战斗值班"，等着"约翰逊"来，准备狠狠地揍它们。这些日子人们正在开展打飞机的竞赛，就是怕"约翰逊"不来。我要是说民兵们打飞机已经入了迷，也并非夸张。有一天我在洞海市遇见一位高射炮部队的战士。他前不久还是机器厂的工人，也是打飞机的自卫队员。他的未婚妻是日丽河南岸一个村子里的民兵。他说他有时休假回乡去看她，他们总是在一起交流打美国飞机的经验，他要帮助她打落更多的敌机。这一对英雄的未婚夫妻都是"约翰逊"的死对头。"约翰逊"妄想给越南北方带来死亡和毁灭，可是据我亲眼看见，死亡的却是美国飞贼，毁灭的却是各种类型的"约翰逊"。我在荣市火车站附近就看到这样的毁灭和死亡：一个水荡里露出一架F—8U—2型飞机的尾巴，这架"约翰逊"整个身子埋进了土里。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土堆，便是飞贼的坟墓，不用说是民兵们把他挖出来埋葬的。这是飞贼们一种

极不光彩的下场。

在河内军事博物馆里我看到一架F105D型飞机的残骸，机翼上用黑漆绘了一些小炸弹，五颗一组，三组一排，我数了数，一共五十六颗炸弹。这个数目便是这架“雷神”在越南北方土地上犯罪的记录。不管飞贼当时如何猖狂，他终于得到粉身碎骨的惩罚，他是死有余辜的。五十六次的罪行中，可能包括对学校、医院、疗养院、水闸、居民点等等的轰炸。在胡舍市我看到一所规模不小的现代化医院的废墟，过去的手术室变成了一个大炸弹坑。在义安省，在清化省，在其他地区，“约翰逊”也干过同样的罪恶勾当。在义安省，“约翰逊”不仅炸毁了医院和疗养院，它们还冷酷地屠杀麻风病人和肺痨病人。无恶不作的美帝国主义还在做一百年前的旧梦，以为杀人流血便可以发财致富，然而越南人民是现代的捉贼英雄和猎机好汉。要给他们造成一些损失和困难，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胡舍市的医院虽然被炸了，可是医生、护士和病人中没有一个伤亡。北方人民已经取得了对付“约翰逊”的很好的经验。城市里应当疏散的人全疏散到远方去了。留下打飞机的人，他们一手拿枪，另一只手使用生产工具，生产也是为了战斗。“约翰逊”来就猛打，走了就生产、就工作。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岗位、生产岗位，也有自己的战斗岗位。农村里也是这样。敌机打得越多，生产的热情越高。美国飞贼妄想犯了罪不受惩罚，这是办不到的事 。到今天为止，北方军民打落“约翰逊”的数目是五百六十七架。真是来得越多，打得越快。我听说北方有个美国飞机残骸展览会，它的名称是“美国飞机的坟墓”。想

得好！越南北方的土地的确是美国飞机的坟墓，成千上万的猎机组都是“约翰逊”的送葬人。五百六十七架“约翰逊”全做了越南北方土地的上等肥料。所以今年美帝国主义轰炸北方以来，在整个北方出现了生产、战斗、思想三丰收的大好局面。在每个地区我都听到“收割提前完成、粮食产量增加”的喜讯。

敬爱的同志，您说如果我“有机会看到游击队打直升飞机，一定很感兴趣”。我感谢您的好意，但可惜我无法到你们那里，我想这样说，再没有比看见民兵和自卫队员猛打“约翰逊”更激动人心的事情了。回河内的途中，我访问过称为“民兵打落美国飞机的故乡”的某乡，这个乡在生产、战斗两方面都取得丰收，今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四。几个月来，这个乡的民兵用步枪和机关枪打落了四架“约翰逊”，还打伤了几架，可是并没有一个民兵伤亡。我见过几位民兵英雄，一位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妇女，身材、相貌有点像我们的山东姑娘。她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又是村里民兵排的副排长，还是这个乡的第一名重机枪射手。过去她什么也不是，她结了婚，夫家人口多，家务劳动相当繁重。但是烈火炼出真金，她学会了使用重机枪的本领，四月以来“约翰逊”袭击这个乡三十九次，她参加了每一次战斗，在值班的时候，她使用重机枪，不该她值班，她也上阵地用步枪打敌机。那天她挎着枪束着子弹带来找我们，后来又陪我们去看她的阵地，同去的有一位十八岁的女民兵，一看就知道是生长在南国海滨的渔家姑娘，身材瘦小，黑皮肤，厚嘴唇，亮眼睛，还有一位十八岁的小伙子，在合作社当会计，他个子更小，皮肤更黑，外号叫“漆黑勤”。可是挎起枪束

上子弹带，这三个年轻人都有一种可以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我们到了那里，只见交通沟像血管一样通过这一大块平地，在一个接一个的圆形阵地上，在指向天空的机枪跟前，守着两三位精力充沛的青年民兵，救护组的两三女青年站在旁边矮矮的茅棚前面。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带着自豪的感情介绍他们制造的活动枪架，使用他们心爱的轻重机枪。这天下午"约翰逊"没有来，阵地上非常安静。但是站在交通沟外，我也会想象到"约翰逊"可能在这里遇到的场面：丛林一样的枪，和骤雨一样的子弹。敬爱的同志，您说直升飞机是游击队的好礼物，那么"约翰逊"就是民兵的好礼物了。世界上哪里还有像这样不花钱的活动枪靶？民兵们就只愁"约翰逊"不来！这种心情您我都很了解，然而住在华盛顿的百万富翁们是不会知道的。他们要"逐步升级"，就让他们成千上万地来投火吧，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烈火只有越烧越旺。

敬爱的同志，话总是谈不完的，关于美国飞贼和"约翰逊"的事情，我已经谈得够多了，可是我还没有写出我十分之一的感受和见闻，我更没有写出这些天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的幸福的感觉和感激的心情。我游泳在友谊的海洋里面，生活在健康的气氛中间，天天分享着越南人民的精神财富和胜利果实，我的心同千万颗英雄的心紧紧贴在一起。我的心里充满了对越南青年的强烈的爱，这样的年轻人我一路上不知见过多少，想起他们的笑脸和干劲，我自己也变得年轻了；想起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我仿佛也增加了力量；想起他们那颗为祖国、为人民、为集体、为胜利的鲜红的心，我感到无限的温暖。

敬爱的江南同志，我多么想和您谈谈这些年轻人的事情，您已经对我谈过不少南方青年的故事，您一定高兴听我谈有关北方青年的一切。然而请您原谅，我的第二次旅行就要开始，明天我们要动身去奠边府，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我的笔，中断我和您的谈话。奠边府！这么一个光辉的名字，帝国主义提起它就吓得浑身发抖，革命人民想到它就感到欢欣鼓舞。在南方，在你们那里不知有多少奠边府在等待着美国强盗，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一定会自投罗网。美帝国主义把它的王牌军队骑兵第一师运进南方，也无非为这个在朝鲜打过败仗的军队挑选一个更好的坟墓。人说进门容易出门难，神出鬼没、英勇善战的南方解放军和游击队决不会放过这些送上门来的活靶！写到这里，我真想鼓掌欢呼：越南南方解放军和游击队万岁！越南人民万岁！敬爱的同志，我从奠边府回来还要同您畅谈北方青年的事情。现在，让我紧紧地拥抱您！

1965年9月18日在河内。

越南青年女民兵*

——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

我从奠边府回到河内，听说您又给我寄了信，还知道有人根据广播作了记录，我多么希望马上读到您告诉我的一切大小事情！只是我在回国前两天才收到一份打印稿，已经来不及请人翻译了。幸而《新越华报》译载了这封信的摘要。虽然报上发表的只有几段，可是我从那些充满感情的语言中体会到您对我、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厚的友谊。报社的朋友把同一天的报纸拣出十份让我拿它们同原信的打印稿一起带回中国，他们可能认为只有用十倍的篇幅才能表示原信中感情的份量。我到了北京便托人将打印稿送给一位精通越语的同志，请他翻译，我带着《新越华报》回到上海。

今天我坐在上海楼房里书桌前面，窗外下着像我在日丽河畔见到的那样连绵不断的细雨，我侧过头，望见灰色的天空，就像那天我在日丽河南岸农家里见到的那样。我想起了我在越南北方过的那些令人兴奋的、很有意义的日子。我想起了越南同志的深情厚谊。我想起了您的来信，敬爱的江南同志，今天我还在等待北京友人寄来您原信的译文。我喝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从永灵带回的花茶，仿佛还闻到十七度线上的花香；我摊开从河内带回的《新越华报》，好像又在同您对谈一样，有多少话，多少感情在搅动我的心，我不能不向您倾吐它们，所以我又拿起了笔。

我首先感谢您在我国成立十六周年的国庆佳节的前夕寄发了祝贺节日的长信，你的信，给我们带来许多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我是在西北自治区森林中高脚屋里和越南同志们一起度过我们国家这个光辉节日的。同志们告诉我一连串北方和南方的捷报。山区的夜相当凉，但是充满笑声的高脚屋却显得十分暖和，仿佛这间竹楼外面没有百年的老树，没有峥嵘的岩石，没有古怪的毒虫，只有一片友谊的海洋。越南同志们特地为我们举行了这个国庆宴会，宾主不断地碰杯，热情地交谈，一直谈到夜深，还有话犹未尽的感觉。第二天同行的越南同志又为我们举行了联欢会，在这个会上，我听说昨夜主人回家，河水暴涨，车子不能通过，只得泅水过去。这天午后又下过一阵大雨，傍晚我们便走过泥泞的小道下山坐车去奠边府，也没有机会向那位热情的主人表示谢意。但是他的声音相貌一直鲜明地留在我的心上。敬爱的诗人同志，您明白我的意思，不仅那位副书记同志常在我的怀念中，我今天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每一位越南友人。在访问越南北方的一百一十天中间，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多么的深厚，这种友谊，我一生也忘记不了！

从奠边府回来，我还访问过海防市和广宁省。在访问结束，我准备回国的时候，一个下午，广平省的女民兵陈氏理同

志到河内市统一宾馆来看我。前些时候，诗人春生同志对我讲过，陈氏理参加广平省代表团去山萝省访问，同当地的民兵们交流经验，她经过河内，停留了一天，那时我还在广宁。我以为一时见不到她了，忽然听说她在楼下等候，我连忙把她接到屋里来。她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张被太阳晒黑了的孩儿脸，还是那一身简单而整洁的深色衣服，连垂在背后的又长又密的黑发，经常挂在脸上的诚恳而天真的微笑，都是我在洞海市郊和她分别时见到的那个样子。我看见这个身材苗条的十八岁姑娘，仿佛见到成千上万的越南女青年。今天在越南北方各地旅行，都会遇见这样的姑娘，她们有时挎着枪，束着子弹袋，准备打敌机，有时扛着东西，在田埂上飞奔，有时拿着铁锹修桥补路，有时弯着腰在田里劳动，……夜间守在防空灯旁边的有她们；带着武器在海边巡逻的有她们；抓特务、捉间谍、擒飞贼的也有她们。我在西北自治区旅行，山区多水，秋夜有雾，黑夜开灯行车，经过没有桥的浅水河，吉普车就靠着对岸辉煌的火光认路，高举火把的民兵中也有好些像陈氏理这样的姑娘。我忘不了山萝市一位圆圆脸的女民兵，她在公路上等了两晚，到午夜才接着我们的车子。她在前面带路，陪我们登山涉水，走过一座小桥，她看见搭桥的树干在我的脚下摇动，便跳下水去扶我一把。我在半山上高脚屋里住了三夜，却没有机会再见到她。在义安省的时候，有一夜我们借着月光上山访问高射炮阵地，同年轻的英雄们亲切地交谈了一个多钟头，听了不少豪言壮语。几位女民兵送我们下山，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一路上有说有笑，笑语中流露出胜利的

欢乐。我听说前一天敌机还在这附近投过弹。在这个阵地上和在别的高射炮阵地上一样，只要发生战斗，女民兵就奋不顾身跑去，为战士们服务，擦炮弹、递炮弹、运送弹药。饮食店的女服务员还冒着枪林弹雨把吃的喝的挑到阵地。陈氏理在今年二月第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划着船在日丽河上来来去去，送干部过河，把弹药送到民兵阵地。这个年轻的民兵通信组组长，从来不曾见过火箭。敌机投下几支火箭离她的船不过半米光景，她把船划到一边避开了它们。她想，不管河面多么宽，也要划到对岸。她终于划过去了，而且来去几次，很好地完成了市防空指挥部和民兵阵地的通信联络任务。那天来偷袭的美国飞机相当多。陈氏理亲眼看见三架敌机冒着黑烟从空中掉下来，她还跑到几个阵地去报告胜利的消息。下午她把弹药和茶水送上高射炮阵地，晚上她参加修筑高射炮阵地的工作。阵地需要伪装，天亮前她一个人划船到一个岛上去砍树枝。第二天敌机又来骚扰，她仍然划着船在日丽河上执行任务，她送弹药、送稀饭到阵地，战士们看见她老是带着两颗手榴弹，便笑她："你能够用手榴弹打下飞机吗？"她严肃地回答："手榴弹既然是武器，就应当把它们带在身边。"可是她心里想：要是有一支枪多好啊！过了三天，她果然领到了一支步枪和六十粒子弹。防空指挥部还调动了她的工作，现在的任务是：战斗和救护。她可以端起枪打敌机了。她是编席子的合作社的社员，没有警报，她在社里劳动；有警报她就拿起枪、带着药箱走上阵地。不管有无战斗，她编的草席从来不曾减少。有一个晚上，洞海市市委书记推着自行车陪我和

另一个中国同志步行到她家去作客，她挎着枪站在村口等待我们。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生长在南方的姑娘阮氏大。女孩对她很亲切，还常常抚摸她挎在肩上的枪。女孩多么羡慕"姐姐"有一支枪！她多么愿望像"姐姐"那样上阵地去打那些闯进越南领空来的美国飞贼！我们走了一大段路才弯进陈氏理的家。敌机一直在空中盘旋。天色并不太暗，不用手电筒，我也看得见村里的路。到了家，陈氏理把枪取下，郑重地交给女孩。女孩像接受宝物一样满面含笑地接过了枪。越南姑娘喜欢枪，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清化市咸龙高炉厂的女自卫队员阮氏芳定，参加第二次战斗时领到了一支步枪，她对人说："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敬爱的江南同志，您读到这句话，您的脸上一定现出会心的微笑，你们南方的姑娘都是打美伪军的英雄，您也一定知道北方的姑娘使用枪就像用针线那样熟练。在义安省演州县一个村子里，我遇见二十三岁的女民兵邓氏青同志。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以前，她只是一位给繁重家务劳动束缚了的家庭妇女，现在她是这个乡的第一名重机枪手。今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架美国飞机来炸附近的一座公路桥，她和同志们在四个民兵阵地上一齐向飞机开火，她使用重机枪，第一排炮弹就打中了敌机，这架F8U型飞机后来落在海上。同陈氏理比起来，邓氏青显得高大而健康，她还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和今天的许多越南英雄一样，她也是生产能手。

话题现在回到陈氏理的枪上来，我和她第一次见面，她谈起她的枪，脸上便露出孩子似的满意的笑容。她领到了枪，

可是过了将近五十天，才有开枪的机会。她真等急了！她说，她头一天打了七发，装子弹的时候，激动得发抖。打头三发，手还打颤，以后她就镇静了。第二天她又打过十几发子弹。四天后美国飞机又来轰炸她的家乡，那天她正挎着枪划船过河上班，刚划到日丽河中心，便看见六架美国飞机在阮氏巧的乡里投下几支火箭，又看见飞机向高射炮阵地投下两颗炸弹，她轻蔑地笑了笑，原来高射炮阵地已经转移，飞贼们又在浪费钢铁了。炸弹片落在她的附近，她仍然往前划去，船快靠岸了，她连忙跳出去，涉水上了岸。飞机又到附近桥头扫射。她知道离桥四百米有一座碉堡，一个轻机枪组守在碉堡顶上，她决定到那里去。这个机枪组的组长是民兵排的副指导员，他留她参加战斗。她记得很清楚，她怀着多么强烈的仇恨心朝着"约翰逊"开枪(在靠近南方的几个省里，人们习惯把美国飞机叫作"约翰逊")。这位十八岁的姑娘在碉堡脚下的单人掩体里一共打了十八发子弹，他周围的房屋已经炸平。美国飞机发现碉堡顶上的轻机枪，就转过来用机枪扫射，并且扔下一连串炸弹。她仰起头，看见六颗炸弹：四颗掉在河里，两颗朝着她的头往下落！她连忙把枪放在工事上面，把它掩盖好。枪是她的宝贝。她想：如果我被炸死，武器仍然完好，同志们还可以用它来打击敌人。她动作敏捷，一下子便跳到离她三米光景的另一个工事里去。炸弹果然落到她刚才离开的单人掩体上面，土给掀起来压在她的头上和身上，有二十公分厚。机枪组的同志们以为她受了伤，不住地大声喊她，碉堡里还有几个没有枪的女民兵，也在叫她。她

过了一会才醒过来，她并没有受伤，她想起自己的战斗任务，便用力挺起身子，揭起伪装布，又把枪拿在手里，枪是完好的，她用伪装布揩揩脸，擦擦枪。工事全炸坏了，她便拿着枪跪在地上继续射击。飞机逃走以后，女民兵跑来拉起她，要替她包扎。她很倦，可是她勉强笑着说："我很好，还要继续战斗呢！"后来组长叫她回到她的排里去，她才兴奋地挎着枪找她的同志们去了。……

像这样的战斗经历，每一个访问越南北方的人都可以从女民兵的口中听到许多。体重只有四十二公斤的吴氏选，在战斗中不顾敌机的轰炸扫射，扛起足足有九十八公斤重的两箱子弹，送上阵地。胡氏当的身材和吴氏选差不多，三年前她还只有十八岁。一个下雨的黑夜，她带一根竹矛同一个带绳子的女民兵一起在海边巡逻，黎明前发现了登陆的特务，她们跟在特务后面，特务走上河堤，她们也轻轻爬上河堤。胡氏当出其不意用长矛抵住特务的背，大叫："举手不杀！"特务果然举起了手。她又高呼："一班，派一个同志来捉特务。"另一个女民兵马上过来绑住了他的双手。特务还以为后面有不少的人，不想就只有两个年轻姑娘！广平省某工地的二十一岁的自卫队员丁氏秋雅，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去支援高射炮阵地，除了运送炮弹、递炮弹外，还充当过六炮手、五炮手，后来一炮手也牺牲了，她在班长指导下代替一炮手，转炮盘，管方向，一直坚持到敌机逃走、战斗胜利。清化市咸龙高炉厂的自卫队员阮氏芳定，这位二十二岁的姑娘是全国闻名的"咸龙高炉六姐妹"中最出色的一位。她参加过多次战斗，到阵地送弹

药，送饭菜，通信联络，包扎救护，救火，打飞贼。五月七日她在交通沟里打敌机，一颗炸弹在她附近爆炸，她头发烧光，左手食指和中指同步枪上半截一起被弹片切去，可是她仍然以战斗的姿态屹立在交通沟里。她遍体鳞伤，到医院后皮肤脱落，躺在蕉叶上面，她还安慰她的母亲："你不要哭，你看见我这样应当高兴。"现在她的伤已养好，头发也长了。有一天她到河内看病，坐的是押送被擒飞贼的车子，她看见那个少校飞贼低头乞怜的丑态，感到万分自豪。她们和陈氏理一样，都是普通的越南姑娘，虽然她们的名字已经传遍北方，可是她们所作所为，都是一般越南姑娘做过的，或者正在做的，或者将要做的。陈氏理受到了表扬。可是她不止一次地表示她做得太少，她需要学习的太多。她对我谈起山萝之行，她说山萝省的女民兵在介绍情况时因为打落敌机较少，表示歉意，她安慰她们："不是你们不敢打飞机，是美国飞机来得太少。你们要是住在我们家乡，一定打掉更多的飞机。"我听见她这样说，忽然想起了最近到河内访问的南方解放军战斗英雄谢氏娇，这个槟椥省的姑娘参加了三十三次胜利的战斗，捣毁了四百七十一个"战略村"，还赤手空拳夺取了敌人的三个据点，要是她和陈氏理会见交谈，她也会说："你要是在槟椥，一定打更多的胜仗！"越南姑娘就是这样！陈氏理还告诉我："这些傣族姐妹都很聪明、很勇敢。"我忍不住接上一句："她们也很谦虚，和你一样。"她孩子似地笑了。我望着陈氏理的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笑脸，想到今天的越南姑娘不但不躲避美国飞机，反而到处找它们打，而且把打美国飞机当作自己的职责，像这样的事情真

令人精神振奋！

敬爱的江南同志，我现在向您说，我多么喜欢这些年轻人。您一定了解我真挚的感情，您今年春天写给我的长信里也曾用充满自豪感的语调讲起南方姑娘的英雄故事，而且您知道像陈氏理这样的女青年正像花一样开遍在整个越南的土地上。我谈陈氏理的事谈得较多，只是因为我有更多的机会看见她，同她交谈。我时而想起树丛中的广平省招待所，她在那间简单的小会议室里对我们畅谈了她的生活故事和战斗经历；我时而想起涧海市长桥附近她的家。她的父母带着小弟弟疏散到别处去了，姐姐是抗法时期的党员干部，在乡里工作，只有她和弟弟陈文香两人留在家中，还有那位十五岁的南方姑娘阮氏大同她住在一起。阮氏大叫陈氏理做“姐姐”，她们真像是一对亲姐妹。她们穿着同样的黑色衫裤，脑后垂着同样的长发，阮氏大把陈氏理当作学习的榜样。我看见她们那样亲热、友爱，要不是陈氏理亲口告诉我，我很难相信她一个多月前还不认识这个南方姑娘，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前些时候陈氏理在一所学校里讲过战斗故事。学校放假以后，有一天，四个年轻人结伴到陈氏理家里来，四个人中间年纪最大的是阮氏大，第二是阮氏归，今年才十三岁，也是南方姑娘，另外两个是十岁和九岁的男孩。他们并不知道陈氏理的住处，可是到处打听，终于见到了陈氏理。他们的突然拜访使这位年轻的主人感到惊讶。不过谈起来大家很快就熟了。他们要参加这附近的修堤工作，或者在本市新建的盐田上劳动，各人身边都带了粮食，希望找到一个住处。陈氏理就

留他们住了下来，好在父母已经疏散，家里有空地方。洞海市委一位干部用开玩笑的口气对陈氏理说："你们这个家六个小鬼太多了。"可是他们处得非常好，比一家人还要亲热。四个小客人都把陈氏理叫作"姐姐"。每天大家抢先做家务劳动，把这个家收拾得十分整洁。阮氏大带头，她总是比别人做得更多；阮氏归爱听故事，她希望参加打飞机的训练班，她做梦也想得到一支步枪。九岁的男孩黄文福和陈氏理的弟弟一样，平日讲话不多，每天陈氏理回家，大家围住她问长问短，他却站在一边，等别人走开了，他才到她身边，小声问她一些事情，特别是打飞机的事，陈氏理总是详细地讲给他听。十岁的黎文一是个爱讲话的孩子，一开口就喋喋不休，不让别人打岔。他想当通信员，他说他将来做通信工作，一定比"姐姐"强。但是四个小客人加上陈文香，没有例外，都喜欢"姐姐"那支枪。每次她拿出枪来，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望着她，看她怎样拆，怎样擦，怎样把枪装好。她的每一个动作他们都记在心上。她要是回家早，要是有空时间，她不仅细心地教他们擦枪、用枪，她还对他们讲一些她从别处听来的革命故事，还讲美国强盗的种种罪行，还争着替他们洗衣服。两个南方姑娘很快地就学会了使用步枪。可是两个男孩力气小，弄不动里面的弹簧，等到他们学会了时，却因为开学期近要赶回家去，他们的父母已经搬到为疏散的人新建的村子里了。两个男孩临行前都哭着说："我们不想离开'姐姐'，我们和'姐姐'和香哥在一起过得很愉快，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爸爸妈妈都要来感谢你。"他们的父母曾经来看过他们，还给他们送来粮食，都因为孩子

们在这里过得愉快、过得有意义而感到高兴。学校老师也常常来看这几个学生。有一次老师对陈氏理说："他们在你家里住得好。我们教一年还不及他们在你家里住这些天。"

陈氏理到广平招待所来同我们会见的时候，黄文福和黎文一已经离开了她的家，两个南方姑娘还住在那里。广平省委宣传部的同志留她在招待所住了两天，第三天吃过中饭她要回村去参加党支部的整风会议，就匆匆地告辞走了。我讲起晚上我要过日丽河到海边的村子里走走，过一天可能去她的家访问，看看那些可爱的年轻人。她兴奋地说她要把这个消息带回家去。第二天晚上我在她家里见到了好些人，可是十三岁的南方姑娘阮氏归已经走了。

我们在陈氏理家里坐了一个多钟头，却没有时间听她谈她过去的生活。我也很想知道那四位小客人的事情，阮氏大一直站在陈氏理的身后，肩上还挎着陈氏理的枪，陈氏理便立在她姐姐的身边。客人不断地来。党支部正在附近开会，听说中国同志来访问，人们都想来看看，谈谈，表示欢迎。好些同志讲了话，理的姐姐也在内，大家都表扬理，称赞越南的青年，也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兄弟情谊。美国飞机几次来骚扰，人们不得不把煤油灯光扭暗，但谈话并未中断。等到客人陆续散去，我们有机会同那三位年轻人交谈时，夜已不早了，想到同志们也需要休息，书记同志还有别的工作，只好向主人告辞。我恋恋不舍地看看四周，阴暗的灯光使我看不清楚屋子里的陈设，除了眼前这些小桌子，除了我背后靠壁的两张床外，好像没有多少东西。和我同去的那位中国同志也不想走，

他指着挂在墙上的照片问了两句话，理姑娘从镜框里取出一张三寸光景的照片来，在后面写了两行字，把它送给我们。我还记得前两天她告诉我，她对阮氏大他们说："你们的文化水平比姐姐高，你们教姐姐学文化，姐姐教你们打枪。"其实她念完了六年级（初中二年级）才参加生产，听她谈话，她懂得的东西不少，看她写字，我真想说：你写得一笔好字。

"约翰逊"的声音早已消失，开会的人都回到原地继续开会。市委书记和三个年轻人陪着我们一行走到村外大路上，我们的吉普车已经开来了。上了车我还看见挎着枪的陈氏理在黑暗中挥手，还有阮氏大，还有讲话不多的陈文香，他也和姐姐一起说："伯伯，叔叔，再见啊！"

敬爱的江南同志，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有机会在河内同陈氏理再见。她是那么兴奋，那么愉快，那么充满信心，却又那么孩子气。她讲起她的旅行和到山萝省的访问，突然严肃起来，长长的眼睛睁大了，雪白的牙齿仍然露出了一些。她说广平省代表团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从洞海市赶到河内，在一号公路上有一次看见前面一辆车中弹起火，另一次，代表团的车子刚刚过去，敌机突然向后面的车辆袭击。代表团到了灯火辉煌的河内市，大家坐在饮食店里，对着明亮的灯光，对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差一点流下眼泪。"这是我们到首都的第一顿饭，大家本来有点饿，可是端起饭碗，却激动得什么也咽不下。我们看见我们的首都灯火辉煌，我们更懂得我们在家乡战斗的意义。我们战斗，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首都，我们也因此感到自豪，要我们付出任何代价，我们都

愿意！"这个十八岁的女民兵仍然像往常那样不疾不缓地讲话，只是微微俯下头，身子偏向沙发的一边，似乎平稳的声音里却含着很深的感情。她停了停又往下说："我们在山萝省做了报告，讲了我们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离开的时候，省委书记和同志们送我们走了一公里，大家都舍不得分手，流了眼泪。……不过我在外面天天都想家乡，不参加战斗，不参加生产，有些不惯了。我们家乡战斗激烈，我们都想早些回去。"

我没有往下问，我觉得我现在更加了解她，也更了解今天的越南青年了。她，他们成长得真快！敬爱的江南同志，关于陈氏理的事情，我一写就是几千字，我看已经不少了。其实她的事迹我知道的还有好些，我不知道的可能更多。但是对您来说，不用我多写，您也了解一切，因为今天在南方有许多这样的青年同您一起工作，在您的周围成长。他们都是在烈火里锻炼的真金。陈氏理不过是无数北方青年中间的一位。虽然她过去是很好的团员，现在又是受到表扬的党员，但是她才开始在人民战争的烈火中受锻炼。南方姑娘阮氏大把她当作自己的老师。她呢，她说："我要向陈氏理学习！我要向阮文追学习！"她把一位南方的女英雄和一位永垂不朽的南方烈士当作她前进的目标。我相信她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她一定能够实现她的愿望。

我不知道她在河内见到陈氏理同志没有。那位被称为"光荣的女儿"的南方姑娘正是她（陈氏理）这样的年纪落在美伪集团的魔掌里受尽毒刑拷打，多次死去活来，却从不低头屈

服，终于带着四十几处伤疤到了北方。她（甲）要是见到这个十八岁的女民兵，或者听到她（理）的一些事迹，她一定喜欢她（理），而且要尽力帮助她（理）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长。

敬爱的诗人同志，我今天向您谈起陈氏理和北方女民兵的故事，我又想起了你们越南流行的一首诗：

你所走的路将无比宽广，

…………

你的眼睛睁得多么明亮，……

永远发射着钢铁般的光芒，

啊，你——越南的女儿多么坚强！

我要借用这样的诗句表达我的心情，向广平省洞海市的陈氏理同志，也向所有在伟大的抗美斗争中尽过自己职责的青年女民兵，表示我最深的敬意。我也相信有一天您会为这许多您未见过面的北方姑娘写出激动人心的诗篇。

1965 年 12 月初写完。

炸不断的桥*

——再致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

今天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的光辉节日，我的热烈的祝贺通过电波已经到了您的跟前，敬爱的江南同志，我的心和您的心在一起欢度佳节。这几天一连串的捷报使我感到欢欣鼓舞，我一直生活在胜利的气氛中间，想到你们那里无数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和震惊世界的英雄事迹，我只恨自己没有一双翅膀，不能立刻飞到越南南方，我有多少话要向您说，多少感情要向您倾吐啊！

三个月前我在河内给您写信，我说过要对您畅谈北方青年的事情。后来我在上海寄出的信里讲了些北方女民兵的故事，可是都很简单，只有广平省洞海市陈氏理的事情我谈得比较多些，但也只是"比较多"而已。在那封信里我还谈到清化市咸龙高炉厂的女自卫队员阮氏芳定。今天我翻看从河内带回来的《越南画报》，又看见炼铁厂女工六姐妹在交通沟里的照片，每一位年轻姑娘都拿着一个救护箱，芳定站在最前面，戴一顶人民军帽，左胳膊上缠着有红十字符号的布条。在她的脸上我又看到那种对美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战斗的胜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香港《文汇报》。

利信心。她的肩上不曾挎枪。照片大概是在战斗前演习的时候拍摄的。画报没有印上六位女工的姓名，可是我一看就认出芳定的面貌，正是我在清化、在河内见到的那位圆脸姑娘。

清化省今年(一九六五)的战斗是从四月三日开始的。这一天美国强盗飞机闯进来四百架次，给打落十七架；第二天来四百五十架次，给打落三十架。真是像越南的高射炮手和民兵们常说的那样："来得越多，打得越痛快！"您知道在清化省省会清化市，有一座把两个很陡的山坡连接起来的大铁桥，有人把这座桥比作专钓美国大鱼的鱼饵。我前些时候听人说在这座桥附近一共打落美国强盗飞机八十六架。美国报纸不止一次地宣传美国飞机已经炸毁了这座桥。可是今年七月和九月我两次走过这座通火车又通汽车的大桥，我的确是用自己的脚走过去又走过来的。美帝国主义所吹嘘的"空中优势"却奈何不得这座三百公尺长的铁桥；目标这样显著，火箭、炸弹投了那么多，却偏偏炸不中。我想到这些，当然很高兴。要不是同行的越南同志连声催促，我还想趁着月色在桥上从容散步呢。桥下便是奔腾的马江，江水好像在怒吼，又好像在欢笑，它看见了美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也看见了越南人民的辉煌胜利。我第二次走过桥，还回头去看这座世界闻名的英雄桥，黑色桥柱仍然雄伟地立在那里，桥上满是尘土，还有不少弹痕，附近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炸弹坑，可是桥身十分牢固。我们的车子也跟着过来了，后面还有几辆大卡车，它们都要在这个晚上回到河内。我看了又看，我在回想几个月前的战斗场面，我也在想象今后的战斗场面。我没有机会看见这里的战斗。有

一天清晨我刚到附近一个高射炮阵地，就发了警报，我听见观察员连声报告敌机的动向，还以为可以目睹美国空中强盗遭到应得的惩罚。这些年轻的炮手多么兴奋地守在炮盘上，等着敌人来做扑火的飞蛾，没有料到美国强盗飞机不敢挨近就仓皇地逃走了。那天要是美国强盗飞机敢于飞到桥的上空，它们一定会让地面的炮火打得粉身碎骨。有人说四月三日和四日那两天，美国飞机多得像白鹭一样，不用讲，当时地面上的炮弹和枪弹也像雨一样地密。我不能在桥头徘徊，我怀着惜别的心情上了吉普车，我忍不住连声称赞："有这样奔腾的江水，就有这样炸不断的桥！"

敬爱的诗人同志，我说的是江水，想的却是人，是无数拿枪和不拿枪参加战斗的人，是在这座桥四周生活、工作、劳动和战斗的那些人。我这时看不见他们，可是我知道倘使美国强盗飞机来侵犯这座桥，他们的枪、炮立刻从四面八方发出震天的吼声。以前曾经是这样，今后也会是这样。我没有到过芳定"六姐妹"的炼铁厂，只是远远地看见炸后的空厂房。我访问了著名的南岸小区，我去的时候却是在一个下雨的黑夜，区里的同志引我去看民兵阵地，但是雨大、天黑、路滑，阵地上有水，我匆匆地看了一两处，没有深的印象。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人的面貌。陪我们去南岸小区的就有炼铁厂高炉女工阮氏芳定，还有小区的民兵队长阮氏嫦。听说阮氏嫦的民兵排二十七人全是年轻的女同志，可惜那天我们去得太晚，只见到一位吴氏选，而且还是她冒雨到一位烈士家里来找到我们的，谈起来才知道她刚从河内回家，她本来要出去参加国际

会议，会议延期举行，她便赶回来参加战斗。关于吴氏选，我在前一封信里提过她扛弹药箱的事情。这件事我刚到清化就听见人讲过。她走进烈士家，我正在和烈士的父亲讲话，屋子里点着油灯，并不怎么亮，可是她进来以后好像房里也亮了些，因为她脸上带一种对前途有无限信心的笑容，眼睛亮，个子小，身体却很结实。她和许多越南北方的姑娘一样，讲起话来，声音里也充满信心。甚至在同她交谈以前我也不曾感到惊奇：这个十九岁的姑娘会扛着超过她体重一倍多的子弹箱飞跑到阵地。其实这一类的事在今天的越南是很寻常的。在宁静的雨夜，我不会看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是在战斗激烈的时候，会到处出现光芒四射的红心。就拿吴氏选来说罢，今年五月里某一天有一只小型越南军舰参加战斗，在这座桥附近遭到美国强盗飞机多批轰炸，军舰开炮还击，高射炮阵地上炮声隆隆，两岸的自卫队员和民兵们也一齐向敌机开火。马江上硝烟弥漫，炸弹和火箭接连落进水里，可是不但军舰无恙，而且民兵和小船仍然来往不绝，把军舰上需要的东西及时送去，将伤员尽早接到岸上。这一天一共进行了三次战斗，第一次吴氏选不顾敌机的轰炸扫射，泅水到军舰跟前，把军舰旁边的小船拉到岸边，装满一船弹药，再将船推到军舰那里；第二次，她到军舰上救护伤员，和男同志一起将伤员们安全地送上岸，然后回到军舰边学边做装炮弹的工作；第三次，她和另一位女民兵再上军舰，舰长要她们上岸，她们藏在舱里，等到军舰开到江中，她们才从舱里出来，接着敌机又来骚扰，战斗十分激烈，她们参加了递炮弹的工作。后来那位二十四岁的

女民兵大腿中弹，倒在甲板上，血不断地涌出，她自己并不在乎，用一位男同志撕下来的裤腿塞住伤口，要那位男同志替她踏住，她就这样地躺在那里，擦拭炮弹，递给炮手，继续为战斗尽力。当时战斗十分激烈，吴氏选正在舱内紧张工作，不知道同伴已经在上面受了重伤，仍然不停地从舱内送出炮弹，后来她便到上面来接替她受伤的同伴。战斗结束，负伤的女民兵让人送到医院，两天后伤重逝世。烈士的姓名是黎氏蓉，我就是在她的家里见到吴氏选的。烈士的父亲向我们谈起自己的心情：哪一个越南人对美帝国主义没有深仇大恨？仇是一定要报的！有一个女儿在抗美救国斗争中贡献了力量，自己也感到光荣。他给我看了烈士的照片，这是不久前在一次劳青团的会上照的。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其实我看见的是别人，因为烈士的相貌和一般越南姑娘的差不多。我在照片上也看到了那种不可动摇的决心和信心。我把照片递还给老大爷，我看看坐在旁边的吴氏选，我的眼前忽然出现了马江上铁桥边的战斗情景，照片上的姑娘和坐在我旁边的姑娘一起在岸上，在水里，在小船上，在军舰上，像生龙活虎一样地战斗；不用说，这只是我短时间的想象。我的思想仍然回到这个整洁的农家。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可是满屋子的人都像是我熟习的亲友，他们多数是这一家的邻居，冒着雨来看从远方来的中国弟兄，也来表示他们对烈士的敬意。

我穿上雨衣走出了烈士家，好些人送我们走了一段路，吴氏选在半路上离开我们，我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见到她。可是我身边留着她用击落的美国飞机的碎片做成的戒指，这是她

从自己手指上取下来送给我的。用击落的美国飞机的碎片做戒指和梳子在越南北方是一件流行的事情，不仅是青年女民兵，甚至年轻的高射炮手坐在炮盘上值班，等敌机等不来，有时也拿出随身带的锉刀一刀一刀地把自己的战利品锉成一只小飞机、一把梳子，准备送给到阵地访问的客人和亲人。我非常珍爱这一类的礼物，因为接受它的同时，我也接受了无畏战士的自豪的感情。每一样礼物都有一段动人的英雄故事。美国的“雷神”、“鬼怪”遇到像黎氏蓉、吴氏选、阮氏嫦、阮氏芳定这样的越南人居然乖乖地变成了小飞机、小梳子、小戒指，讲起来有点像古代斩龙得剑的神话，可是我的衣袋里明明放着吴氏选的戒指和南岸小区的“小飞机”。南岸小区这个全国闻名的英雄集体后来得到了“决胜单位”的光荣称号，它在保卫铁桥的历次战斗中都有过贡献，南岸小区有一种用美国飞机残骸做成的“小飞机”纪念章，外国访问者都认为得到这样的纪念章是一种荣誉，是在分享越南人民的胜利的欢乐。在民兵队长阮氏嫦的家里，小区的支部书记赠我一枚小区的纪念章，我戴着它访问了两个烈士家庭。

在看见黎氏蓉的父亲之前，我还见到了吴寿六的母亲。劳青团团员吴寿六是同黎氏蓉一起在军舰上战斗，一起受伤的。那天他负伤三次，终于在甲板上牺牲。烈士的父亲，吴寿蔺老人是合作社的饲养员，夜间他到饲养场喂猪，我们等了好一会没有能等到他回家。我只见到烈士的母亲、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柱子上挂着烈士的照片，圆圆脸，大眼睛，带点孩子气的笑容，头发梳得光光，穿一件很干净的白衬衫。他是一

个可爱的年轻人，一个十七岁的活泼的越南青年。那天到军舰上为战斗服务的民兵和自卫队员不少，除了吴氏选、黎氏萘、吴寿六外，还有吴寿六的三个哥哥和别的同志。吴寿六念完七年级（初中毕业）以后，在村里供销社工作，晚上他又是文化补习班的教员。在战斗中他的任务是宣传鼓动。他母亲说："那天放了警报后，小六看见我躲在防空洞里，笑着问：'您躲在这里吗？'我答道：'是我。'他把'哈罗'（喇叭筒）交给我，说：'妈妈，您把"哈罗"交给H同志。我要到军舰去，我要在战斗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他上了军舰就不肯下去。他们四弟兄都在一门高射炮的炮盘上战斗。他有两个哥哥过去在部队当过炮手，现在也当炮手，他替他们装炮弹，他还要求他们教他射击。后来他的下巴给弹片打伤，他掏出手帕，束在脸上。他三哥对他说："你还小，你就在烟囱下面趴着罢。"他回答哥哥道："我向你作揖，请你替我的下巴报仇！"这门炮又向敌机发出一排炮弹。这时他的左脚受了伤。他哥哥要他到岸上去，他又向哥哥作揖说："我求你让我战斗到底。"他还举枪向敌机开火。后来他后脑袋又负重伤，他只来得及向哥哥们做一个敬礼的姿势，马上倒了下去。他二哥抱起他走了几步，把他放在甲板上。他三哥和四哥也受了伤。敌机逃走以后，二哥把小六放在军舰旁边的小船上，岸上人划船过来将吴寿六和伤员们接到岸上。

这一天小区的青年都上了阵地。吴寿蔺老人听见警报便动身去饲养场，社里的猪一共有五十头，他得小心地照顾它们。后来有人来报信：他的四个儿子都上了军舰。他想：好，这

是他们的任务。以后又有人跑来问，他家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做担架的东西？他问：有人受伤吗？回答说：你的儿子六受了伤。他打了一个冷噤，觉得心里和平时不一样。但是他仍然留在饲养场里。他想：要是这里遇炸起火，没有人放猪出去，怎么办？最后同志们给他带来小六牺牲、另外两个儿子受伤的消息，还打算搀他回家去。他心里悲伤，可是他没有哭。他说："我自己能走，不用人搀扶。"又说："做父母的谁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也感到自豪。他牺牲了，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不能回家，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直到当天晚上有一位姑娘来接替他，他说："你来了，我现在可以回去看看我那两个负伤的孩子。"才慢慢地走回去了。

我多么希望见到这位可爱的老人，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完成任务"不会回家，烈士的母亲身体不大舒服，听说来了中国同志，才从床上起来，接待客人，她的小女儿寿七在旁边照料，我不能让她一直坐着陪我们谈话，我终于怀着留恋的感情离开了这个英雄的家庭，我又看看柱子上的照片，那对年轻的眼睛还在发光，我和烈士的两位哥哥握了手，这两只参加过战斗的手仍然十分有力。他们的伤早已治好了。我走在积着雨水的路上，还想着这间小小的茅草屋和住在这里的人们。炸不断的铁桥的雄姿像闪电一样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好几回，每一回都有一位瘦小的老人在桥上走。原来我把吴寿蔺老人和铁桥连接在一起了。

这只是我的愿望。当时我也没有想到隔了一天我就会站

在老人的面前，坐在老人的旁边，听他谈自己的心情："我们前些时候在海防市访问，我听说家里打落了三架美国强盗飞机，活捉了两个飞贼，心里着急，恨不得马上回家。我们到海防去，还是搭渡船过的江，回来却走过铁桥，我在桥上很兴奋，心里想：你美帝国主义炸了多少次，我反而可以在桥上走了。你有什么本领呢？"

这一次不是我们去访问老人的家，是老人来看我们。我们头天晚上刚刚向越南朋友提出重访南岸小区的要求，老两口就像探亲戚一般带着几颗椰子到我们正在那里工作的村子里来了。椰子是老人从自己种的树上摘下来的。下午三点半钟光景，天气相当热，我们正在屋子里同省妇联副主任记同志谈话，连忙把他们请进来，让他们坐下，喝茶抽烟。于是两位老人像见着亲人一样，对我们亲切地谈起家常来。听他们夫妇谈儿子和自己的事情，我好像接触到这一家贫农的火热的心，我的心也燃烧起来了。老人去海防是参加本省的代表团到那里去作报告、介绍战斗经验和英雄事迹。他给我们看他们在海防市的留影，我在照片上还看到吴氏选的面貌。老人今年六十四岁，还有充足的精力做人民需要他作的任何事情。他一家过去在法国和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给地主作牛马，受过说不尽的苦，可是他不想再提它。六十二岁的老大娘还不能忘记过去，老大爷却拦阻了她："以前的事不要说了。"他要讲的是党和人民对他们家的关心和帮助，是党和人民给他们家的荣誉。他们家有四个党员，还有好些奖状和勋章。小六牺牲后被追认为劳动党党员，政府还授给他二级战功勋章。战

斗结束，当天晚上省委书记到小区来慰问烈士家属、伤员和参战人员。他到吴家看两位老人，称赞他们"一家英勇"，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老大娘说："小六为战斗献出自己一份力量，虽然牺牲，也很光荣。如果美国强盗飞机再来捣乱，我报名，我愿意代替小六去战斗。"老大爷看了看老伴，接着说："她身体不好，应当让我去。"老大娘又说："我身体差一点，不要紧，要我做什么，我也能做。"夫妻二人都要求上阵地为保卫铁桥尽一份力量。老大娘还告诉我们："有些战士到我们家来，我对一个战士说：'你把你们的地点告诉我，我下次给你们送很多、很多的炮弹去。'战士说：'好。我打头一排炮就把敌机打掉。'过两天美国强盗飞机来炸桥，那个战士果然用第一排炮弹打掉了一架飞机。"老人家笑了起来："这些年轻人啊，个个都是英雄，什么工作都做得了，打起美国强盗飞机来，劲头大得很，比我们的小六还强！"

这两位老人家谈起年轻人就高兴，流露出一种慈爱的感情。我了解他们。我到过两个高射炮阵地，见到不少年轻的英雄，有些人非常年轻，和他们的小六同样年纪，有些人脸上还有孩子的表情，可是在战斗中都表现得十分勇敢，而且都立过或大或小的功劳。每个人都表示人在桥在，甚至人不在也要桥在。这些年轻人，笑起来就像灿烂的阳光，坐在炮盘上就像坐在课堂里，那么专心，那么自然，那么愉快，又那么平凡，仿佛要在这里坐上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这些年轻人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责任感使我感动。他们打落了多架美国飞机，可是还觉得打得太少，还准备接受更大的战斗考验，同时

他们又那么乐观，那么充满信心。同他们在一起、或者离开他们的时候，我常常设身处地揣摩他们的心情，我觉得我接触到的是没有一点点个人杂念的革命红心。以后我在别的省、市，别的高射炮阵地上也见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年轻人，接触到很多、很多这样的革命红心。同这样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的确是莫大的幸福。

我在月光下平安地走过了铁桥，没有机声，也没有照明弹，车子在公路上飞跑的时候，我还在想："值得歌颂的英勇的战斗啊，伟大的人民战争啊，桥保卫住了，人也锻炼了。"

阮氏嫦和阮氏芳定也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就是在我们接待两位老人的屋子里，我见过一个动人的场面：嫦和芳定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你望我、我望你，边讲话、边笑，眼里闪烁着泪花。后来她们又拉着手坐在旁边一张木板床上亲切地交谈。芳定激动地告诉我们，嫦负了伤，和她同住在一个病房里，嫦出院后，现在是她们两人的第一次再见。人们从医院把芳定接到这里来，嫦已经同我们谈了半天了。清化市的主人早作了安排，让她们两位陪我们去访问南岸小区，而且似乎有意选择了一个阴天，后来下起了雨，同志们说，下了雨更好，比较安全。可是我们离开南岸小区以后不过五个小时，美国强盗飞机就到那里投了两颗炸弹。据吴寿蔺老人说，凌晨三点钟他听见马达声，起来点燃小油灯把它放在桶里提着到饲养场去，他刚动身，美国强盗飞机来投了两颗炸弹。炸弹落在离饲养场不远的地方，没有爆炸。美国的炸弹正是要向全世界说明约翰逊是甘心同全体越南人民为敌的。阮氏嫦说："我们要抓

住美国飞贼的脖子狠狠地按在地上，为我们的同胞报仇。"她说出了每一个越南人心里的话。这位身材高大的姑娘(她比芳定高一个头)今年才二十一岁，可是她作为民兵队长，担任着小区战斗的总指挥，常常冒着枪林弹雨，在相距一百米的两个阵地上跑来跑去，指挥民兵们"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她不仅直接指挥打敌机，她还指挥调遣小船，运送弹药，送饭菜、送茶水。在那次支援军舰的战斗中她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今年七月的一次激烈的战斗里她看见两个飞贼跳伞，便带了两组民兵奔去捉贼，美国强盗没有一个漏网。有一次她负了伤，同志们发现她的褐色衣裳都让血打湿了，劝她下去，她说："我不要紧，你们狠狠地打，消灭美国强盗!"她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才离开阵地去治伤。

我常常听见人谈起阮氏嫦的事情。有人说："有一次美国强盗飞机来骚扰，她在发电厂，正要同几个学生运稻谷去合作社，她大声说：'谁不愿意跟我去，就进防空洞!'学生们同她一起去了。"陪同我们访问清化的部队作家涯同志看见嫦便向我们介绍，他上次同一位画家来清化，到了嫦的阵地，画家起初有点紧张，可是看见嫦不在防空洞里，却勇敢地四处奔跑，他的胆子也渐渐地大起来了。涯同志还记得那天嫦忙着指挥江岸民兵战斗，同时又注意他们的安全，她是那么勇敢，却那么镇定，而且对他们又是那么亲切，他至今还保留着非常鲜明的印象。

"有的人头一次参加战斗总有些紧张，"民兵队长听见谈起画家的事，便接嘴解释道，就这样岔开了涯同志表扬她的

话："我们队里有个女民兵，她头一次看见美国强盗飞机来扔炸弹，有些害怕，便跑回家去。她到了家，看见天空有很多飞机，可是地面上的炮火十分猛烈，人们大声叫喊：痛打美国强盗，情绪非常高，真是热火朝天！她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终于跑到阵地上来，从此她就不害怕了。"不用说，这位女同志后来也立了功，成了痛打美国飞贼的女英雄。

阮氏芳定也是这样。以前她从未见过美国飞机、炸弹、火箭，也未见过高射炮，她头一次看见美国强盗飞机投弹，还有一种古怪的想法，她说："看，大飞机在生小飞机！"她看见敌机在附近射下火箭，还有些害怕。后来她再去阵地，看见许多飞机朝她飞来，还有些紧张，可是她看见阵地上的同志们都很镇静，向着敌机接连打出一发一发的子弹，她也就不慌、不怕了。她看见地面炮火猛烈，构成一个火网，把敌机包围住了，一架敌机中弹起火，她高兴地跳出工事，大声叫起来："飞机起火了！"她看见一架喷气式飞机带着怪叫声俯冲下来，投下一连串八九颗炸弹，炸弹在她四周爆炸，弹片横飞，耳边一阵轰隆声，她的心跳得厉害，她又跳进了工事。在工事里她看见附近一个小村子房屋着火，火越来越旺，她想起了自己当初报名参加"三准备"的情况，她的胆子又大起来，她怒火填胸，又跳出了工事，要去给炮手们送弹药。从她的工事到阵地要爬行一段路，她爬行的时候，又紧张起来，她看见房屋在燃烧，敌机在袭击，一架敌机中弹，另外几架敌机朝她这里投弹，炸弹落在水中，炸死的鱼肚子向上，水里白茫茫一片。她想起自己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倘使祖国需要我，我可以献出最后一滴血。"

她在心里说："现在是祖国需要我的时候了，我自己报名送弹药，为什么还要害怕？"她这样一想，胆又壮了。她在阵地上看见一架敌机中弹起火，一名飞贼跳伞，当时无法与指挥部联系，她便请求任务让她到那里去报告情况。指挥部离阵地五百米，路上她遇见敌机投弹，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爆炸。她跳过一道田埂和一面土墙。一架敌机在追她，她看见敌机俯冲下来，连忙躲在土墙下面，土墙塌了，扫射的子弹从她旁边飞过，草房起了火。她的脚碰到石头上，碰伤了，痛得厉害。但是她想：绝不能耽搁一分钟！绝不能让飞贼逃走！便奋勇向前，赶到了指挥部，美国飞贼终于给捉住了。她从指挥部回阵地，半路又碰上一架敌机向她追击，并且投了弹，她翻过一个土堆又跳过一道长满野菠萝树的田埂，躲在田埂的另一面，弹片打进她的脚跟，她拔出弹片，用棉花堵住伤口，她顺着田埂继续往前走，看见敌机满天飞，她现在一点也不怕，她说："敌机不一定就打中我，即使打中了，我也不一定就死。"晚上进行总结，芳定受到了表扬，她安静不下来，她一再向上级要求："还是给我一支枪罢，我要狠狠地打美国飞贼。"第二天她果然领到了一枝枪。她原先学过射击，拿到枪就可以向敌机开火了。她高兴地对省妇联的记同志说："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这一天芳定整天没有离开阵地，这一天全省军民一共打落三十架美国飞机，她也有一份功劳。

好几位同志（记同志在内）向我们介绍过芳定的事迹，她自己也谈了两次，第二次是在清化城内招待所电灯明亮的房间里，谈的是她负伤的那次战斗。那是在五月七日。五月七

正是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打败法国侵略者的胜利纪念日，人们预计美国飞贼一定要来捣乱，早已作好了准备。芳定这天从零点到九点在炼铁厂劳动，刚下班，听见了警报声，她到了阵地不多久，警报便解除了。这样一连几次，加上她一夜未睡，因此感到十分疲劳，可是她又不愿放弃战斗的机会，她在宿舍里休息，也拿着救护箱，枪里装好子弹，一直放在她手边。十二点以后又听见警报声，她拿起枪跑出去，到了南岸桥头她的新阵地。起初因为敌机飞得高，她没有开枪，不久敌机来得多，她也参加了战斗。她嫌在交通沟里不好打，便跳上土坡去，刚打了五发子弹，就看见炸弹从飞机上落下，她断定炸弹会落在她们的阵地上，连忙朝上推移了十五米光景，炸弹果然在她的阵地上爆炸了。过了一会，她觉得在坡上打不方便，又退回交通沟里。敌机又向她的阵地扔下炸弹来，她正要避开，忽然看见一架敌机朝下俯冲，离地面只有三百米左右，她只觉怒火烧身，仇恨绞心，她想：我宁死也要打你一枪！她不再躲避了，她反而向前一扑，跳到交通沟的另一面，端起步枪朝着那架敌机迎头就打。她开了枪，可是炸弹在她附近爆炸了，一块弹片飞过来，把她左手的两根指头同步枪的上半截一起切掉。她两眼模糊，身上盖了一寸厚的土，她推开了土，还想再开枪，用右手去摸左手，才知道负了伤，她用右手和断枪把脸上的土拨开，才知道皮肤也烧焦了，她用力说："同志们，坚持战斗，我负伤了！"……以后六姐妹中的同伴找到了她，给她包扎，她勉强支持着走了一段路，才让人用担架抬她到医院。到了医院，她遍体鳞伤，头发烧光，三天不省人事，医生们想尽办

法一定要救活她。不少人报名给她输血。第五天她才开始清醒，很多人来看她，当时她眼睛看不清楚，眼科医生说再迟两小时治疗，她的视力就不能恢复了。她的母亲赶到医院里看她，见她身上烧伤，耳朵出血，只能躺在香蕉叶上面，不能穿衣服，身上盖着蚊帐布，母亲心里难过，但是又怕女儿激动，五天里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流泪，到第十二天知道女儿病情好转，才哭了一场；她反而安慰母亲，说："妈妈，您不要哭，您看见您女儿这样应当高兴。"她在医院里忍受了很大的痛苦，可是一天到晚有说有笑，又喜欢唱歌，她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使所有探病的人都受到感动。今年七月她陪一个中国代表团"参观"铁桥，向中国同志们介绍了那几次战斗的情况，她坚决地表示："我养好了伤还要参加战斗。我的左手虽然给炸断了两根指头，但是还能够托枪，右手是好的，照样能够握枪射击。……"

在清化，芳定同我们一起活动了四天，并且同去一个村子里美国飞机坠毁处，看到给乡里民兵打落的强盗飞机的残骸。她没有讲什么话，可是我在旁边也感觉到她对美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她对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不仅是这样，她还有一种胜利的喜悦，还有一种参加战斗的迫切的愿望。我们离开清化的那个傍晚她到吉普车前送行，她也说到要早日回去参加战斗的话。的确她没有一个时候忘记过她的战斗岗位。有一次替我们作翻译的宪同志和我谈起芳定的事情，他告诉我，前一天晚上芳定在招待所对我们谈了她那次负伤的战斗情况以后，非常激动，走出了我的房间，还同他交谈了好一会，她

说，她今年三月在清化市看过一部关于南方斗争的大型纪录片。片上有许多南方妇女受酷刑拷打，死尸一大堆，一个小孩给恶棍绑住剖腹取肝，孩子还在叫唤"妈妈"，一个年轻妇女被美国强盗拷打、用电刑、割去乳房……她看完电影回到宿舍一连几夜都睡不好觉。她当夜记日记不知流了多少眼泪，连日记本都打湿了。她觉得被害人就是她自己，不是南方同胞。她还在影片上看见阮文追烈士被捕到牺牲的真实情况，她在日记里写着："好像被杀的、被拷打的是我自己，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南方去和骨肉同胞们站在一起，恨不得同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拚个你死我活。"芳定对我们谈五月七日的战斗，她也说当时她想起影片上那些成堆的尸体，回头又看见房屋在燃烧，她想：这种情况就要搬到北方来了，如果不狠狠地打击美国强盗，她和北方同胞都会遭到残杀。她发誓要战斗到底。

两个月后芳定到河内治耳病，坐在押送美国飞贼的车子里，一路上看够了那个少校飞贼贪生怕死、摇尾乞怜的丑态，她讲起来又是笑，又是恨。再过一段时期我又见到她一面，仍然是她到宾馆来看我们，她笑得更多，她的气色也更好了。她仍然戴着那顶人民军帽，可是头发比上次又长了些。我忘记问她回清化的日期，但是我相信她不久便可以回到战斗的岗位上去。

离开越南民主共和国两个月了，我今天仍然怀念我在那里见到的许多英雄人物，仍然在回忆我在那里见到的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连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也都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前些天我收到河内寄来的最近一期的《越南画报》，在封

面上看到阮氏嫦的半身相，她挎着枪，束上子弹带，褐色短衣上还挂着"八五"纪念章和战功勋章。这位年轻的民兵队长自豪地挺起胸膛，笑得十分爽朗。在另一期《越南画报》上我又看到了吴氏选的半身相，脸上还带着我在南岸小区见过的那种笑容。那么清化市三位女民兵的照相都通过《越南画报》出现在全世界读者的眼前了。我把三期画报摊开放在面前，就仿佛同三位敬爱的朋友交谈一样，我不仅见到三位女英雄，我好像还见到了奔腾的马江和江上那座炸不断的大铁桥。今天桥仍然英勇地屹立在马江的两岸，它和屹立在越南北方大江小河上数不清的大小木桥、石桥、铁桥一样，是永远炸不断的，只要有像阮氏嫦、吴氏选、阮氏芳定这样的人在，只要有像吴寿瀾老人这样的家庭在，美帝国主义再扔下千吨、万吨的炸弹也炸不垮它。而越南北方一千七百万人民偏偏都是阮氏嫦、吴氏选、阮氏芳定和像生龙活虎一样守在高射炮炮盘上的青年炮手们！越南北方的家庭偏偏都是像吴寿瀾老人一家这样的英雄家庭！黎氏蓉、吴寿六烈士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北方人民。

敬爱的江南同志，我写到这里，一九六五年已经到了尽头。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在迎接一九六六年的时候，我还听到从你们那里，从南方、从北方、从整个越南传来的胜利喜讯，我怀着万分兴奋和感谢的心情向您、向南方和北方的同志们表示极其热烈的祝贺，敬祝英雄的越南人民在就要到来的一年中取得更多、更辉煌的胜利。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实现统一祖国的神圣愿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九六六年将是一个

伟大的胜利年。美国侵略者倘使不从越南的土地上滚出去，那么他们就会作为肥料给埋在这里。让你们和我们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继续大踏步前进，迎接一九六六年光芒万丈的太阳。

1965年12月31日夜半写完。

重访十七度线*

——再致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

最近一个时期约翰逊政府派出大批要员，到处奔走，花言巧语，装模作样，兜售“和平谈判”的骗局，推行扩大战争的阴谋，再加上一群披着各色外衣的仆从跟在后面敲锣打鼓，摇旗呐喊，作广告，做掮客，正如一家英国报纸所说，开始了一场“五光十色的马戏表演”。就在这场令人作呕的“马戏表演”越闹越起劲的时候，从越南南方不断地传来胜利的捷报，我仿佛听到了地雷爆炸，手榴弹发出巨响，迫击炮轰鸣，机关枪连放，弹无虚发的步枪声不绝，我仿佛听到了美国侵略军的呻吟、叫号、抱怨、哀鸣……英雄的越南人民懂得怎样接待这些“马戏”丑角，越南南方的革命烈火会把一切牛鬼蛇神烧成灰烬，不管你文来也罢，武来也罢，不管你摇着橄榄枝来也罢，撒着化学毒药来也罢，越南人民早已为美国侵略者挖好了坟墓。

敬爱的江南同志，在越南人民越战越强、越战越胜的时候，在美帝国主义越战越弱、越战越败的时候，在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越尖锐、越深入的时候，你们英雄人民向前迈进的坚定步伐给世界革命人民带来很大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人民文学》三月号。

的鼓舞，你们英雄人民响彻云霄的雄壮声音压倒一切妖魔鬼怪的疯狂叫嚣，使得战争贩子和他们各色各样的帮凶们胆战心寒，你们英雄人民对美国侵略者的每一下狠狠的打击，都喜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上。

越南！越南南方！在这些时候全世界有多少万颗心向往着越南，多少万颗心飞到了越南南方！我的心不过是千万颗心中的一颗，我多么愿望它能够溶化在你们英雄人民的革命红心中间。同战斗的人民在一起，是莫大的幸福；在革命的洪炉里受锻炼，是无上的幸运。敬爱的江南同志，今天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用钦佩和羡慕的眼光注视越南人民的斗争，用最大的力量支持你们的斗争，把越南人民看作亲密的战友和学习的榜样，坚决站在你们这一边同你们并肩战斗，彻底戳穿美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叫约翰逊的千军万马完全埋在越南南方肥沃的土地上，让成千上万架美国强盗飞机葬身在越南的山头和海底，这将是越南人民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

敬爱的江南同志，我不止一次地说过："越南人"这三个字已经成为光荣的称号和亲密的称呼。最近两三年我有机会接触一些外国朋友，每当话题转到你们人民的斗争上面，毫无例外，谈话中充满了这种敬爱的感情。你们人民那种金石可摧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放下武器的不可动摇的决心，给正在为正义事业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打，从这一个地方打到另一个地方，在美国强盗进攻的任何地方都要打。打，从这一代打到下一代，只要美国侵略者还存在一天，就要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越南

人民从来不讲空话。去年八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到荣市车站附近田野里，看过越南军民击落的第三百架美国飞机的残骸，飞机的尾巴露在外面，它四周成了一个小小的水荡，旁边有一个小土堆，我在土堆旁拾了一块飞机的碎片，给我作向导的越南同志指着土堆说："这就是美国飞贼中校戴勒伏林的坟墓。"戴勒伏林曾经是约翰逊手里的王牌，后来却做了越南北方军民练枪练炮的活靶。这样送上门来的活靶，再增加几十万、几百万，越南军民也一样照单收下，他们决不会因为担心容纳不了，就请强盗们在谈判桌旁坐下。英雄的人民绝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

越南同志常常说，越南是一个整体，越南人民是一个整体。这句简单明瞭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两次站在贤良江边，都敏锐地感觉到仿佛有人用刀子刺我的心，深刻地体会到越南人民要求统一祖国的愿望是多么迫切，多么正当。我在广宁省见到一位书记同志，他是北方人，抗法战争时期中他曾在南方工作。他说有一次到了贤良桥头望南岸，他有一种胳膊被人砍掉的感觉。他声音低沉，可是眼里射出强烈的怒火，这股火使我的血也沸腾起来，我真想把他的手紧紧地握着，拉着他一起到十七度线，走过贤良桥。我想起了一句越南的俗话："手砍掉了，心不能不痛。"现在砍掉的不仅是手，多少家庭被拆散，多少亲人遭残杀，美国侵略者一直肆无忌惮地在南方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狂轰滥炸、放毒放火。我离开贤良桥以后，听人说美国飞机到桥上投弹两次，它们要炸桥，却炸毁了北岸的哨所和南岸的伪警营房。美帝国主义轰炸非军事区，

它辩解说，事出“意外”，其实谁都知道它是有意为之。它想永远霸占越南南方，为了它的“利益”，它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连它走狗们的性命也不顾惜。可是桥并没有给炸断，即使桥断了，南方和北方仍然是分不开的整体。砍掉的胳膊可以再植，痛了十年的心已经炼成一股熔化金石的烈火。这股火一定会烧掉贤良江上任何人为的障碍。书记同志和我谈话的时候，平台下隔着一条马路，海水不停地拍打石头堆砌的岸边；廊上灯光明亮，树枝间还闪烁着眼睛似的灯泡，我朝外看，海上群山若隐若现……在这样安静的环境里，我的心一直静不下来，我不是在想战争会不会扩大到这里的问题，美国飞机这一天中午到过这个地区，下面渡口附近岩石上还留着一年前那次战斗的痕迹，而且越南同志已经作好准备让海上群山做美国强盗的大坟场，高射炮手和民兵们也等着机会大显身手。我的心跟随着书记同志的话又到了贤良桥头。

我在想象经过两次轰炸后的江两岸的情景。我听说我去过的北岸的哨所炸毁了，后来又听说我去过的一座空的营房也炸毁了，再后又听说桥头那座牌楼也炸毁了。南岸呢，还没有人对我讲过南岸的情况，可是我读到一则法国记者的西贡电讯，说两次轰炸一共炸死了伪警和他们家属一百多人，炸毁了十一间伪警营房。那么，在我见到的荒凉景象之外，又增加了不少的弹坑和废墟，南岸一定显得更荒凉了。而北岸，金星大红旗仍然迎风招展，鲜明无比。我还记得我离开永灵以前几个小时，在江边农村小路上散步，我跟着越南朋友东弯西转，到处都是长得很好的庄稼，我的眼里只有一片绿色。后来

我们从一个地方转了出来，我一抬头，猛然看到迎面一幅金星大红旗，它是那样巨大，那么鲜红，衬着蓝蓝的天空，随着晚风微微飘动，给我留下一个极其雄伟、非常鲜明的印象。听说有人从南岸送信过来，将这面大旗比作“不落的红太阳”，他们不断要求把旗加大，把旗杆加高，让更多的南方人看到。还有人走了不少的路到附近来看看这面红旗，这面不倒的红旗真像一轮不落的太阳永远照亮他们生活的道路。为了满足南方人民不断的要求，北岸的旗杆从八米加高到了三十三米，本来只有一点二米长、零点八米宽的金星红旗经过几次加大，也变成了现在这面长二十米、宽十六米的大旗。这一面大红旗是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英雄气概、战斗意志、革命精神和辉煌胜利的象征，美帝国主义即使把它所能运来的炸弹全部扔在贤良桥头，它也炸不倒这面英雄人民的英雄旗帜。

我望着这面大红旗，心里充满了对英雄人民的崇敬和热爱。我跟着越南同志的脚步边走边谈的时候，忽然想起两年前听到的一句话，那一次我和几位越南同志沿着贤良江走过一段路，带路的上尉同志指着平静的江面说：“这不是江水，这是越南人民的血。”一句话里面包含了许多意思，我首先体会到的就是那种令人永远忘不了的血海深仇。上尉同志的家在南方，这是寻常的事情，在永灵，在胡舍市，绝大多数人的家都在南方，不少人的父母、妻子就住在南岸。在整个北方有好几十万只身集结北上的革命干部，他们十年中得不到家里人的一点消息，可是不断地看到剖腹、挖肝、剥皮、刺心的照片和关于美伪集团进行大屠杀的记载。在美伪集团对北上干部家属

进行了十年残酷迫害之后，在美帝国主义在南方撒毒药、放毒气推行杀光、烧光、毁光的政策的时候，多少同志的亲人已经牺牲，多少同志的家属已经给拷打成残废，多少同志的妻儿、父母至今还在监牢里受苦。要问美帝国主义究竟在南方杀死了多少人？当然有一笔细帐，俗话说："血流成河。"越南南方人流的血积起来，岂止一条贤良江？何况美国强盗还闯进北方天空狂轰滥炸，连麻风病人和肺痨病人也遭到残杀。美帝国主义残害越南人流了那么多的血，妄想把贤良江变成一堵永久分割越南土地的"铁墙"。每一个越南人来到江边，看见清明如镜的江水，都会感觉到痛苦绞心，仇恨似火。贤良江仿佛是一堵"血墙"，墙上的斑斑血迹在呼唤人们替死难的烈士们报仇。

在贤良江边一个村子里，我遇见一位合作社的干部S同志，他是一个普通的越南人，身材瘦小，身体不怎么健康，我们交谈起来，才知道他已经四十八岁。他给我看他写的一首诗，他把它抄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经常带在身边，翻译同志把原诗的大意讲给我听："我的房子给敌人捣毁，妻儿被捕，别无音信，香蕉翠竹全给砍掉，园子里长满荒草，村庄萧条。吴庭艳、庭儒那些嗜血成性的走狗，把美国侵略军接了来，造成这分离的情况。我多么渴望去南方，把他们消灭光，报家仇，重建自由，南北欢聚一堂，贤良桥欢迎老父亲南下探望。"敬爱的江南同志，可惜我无法将原诗抄录在这里，但是您比我更理解作者的感情，原诗是在吴庭艳还未垮台时写的，他的家在南岸，离贤良江不远，父母、妻子和五个儿子都住在那里，过去他

在北岸也能望见自己家的房屋。一九六二年美伪集团军警要将居民集中在一处建立"战略村"，把他们原来的房屋捣毁，他望见自己的房屋给捣毁以后便写了这首诗。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诗，我也不管它像不像诗，我只是写出我心里的话。"我接触过不少集结北上的南方干部，他们都对我倾吐过同样的爱憎。人们还告诉我一些动人的故事；在博物馆里我见过这样朴素的木雕和塑像：老母亲送儿子到北方，含着一眶眼泪，捧着一把泥土，千言万语，不住地叮咛。我也见过这样的图画和照片：年轻女人抱着婴儿送丈夫出发，战士面带笑容抚摩孩子的头。哪一个南方来的干部能够忘记自己家乡的泥土同那些亲爱的人？在河内有一个统一俱乐部，据说这是专供南方干部休息的地方。我在河内进行访问，一连几夜上街散步，经过俱乐部门前，看见人们进出，翻译同志说："这里不需要别的出入证，口音就是最好的出入证。"进出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都在遥远的南方。他们在俱乐部里度假期和星期日，和熟人在一起畅谈南方的一切，正如一位著名诗人所说：

啊！叫人如何能忘情？
我们心坎深处的南方……

我遇见的每一位南方来的干部都兴奋地告诉我，自己已经报了名，只要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出号召，就马上动身回去。越南人民绝不把南方交给美国侵略者。而南方人则认为他们更有责任把敌人"消灭光"。"多么渴望去南方"的S同志，

不过是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位。

S同志不是集结北上的干部，他在抗战干部们北上以后因为暂避美伪政权的迫害，才离开了家。分别的时候夫妻们都抱着这样的希望：过六七个月，根据日内瓦协议进行投票，祖国统一，一家人便可以团圆，没有料到美帝国主义利用它的走狗撕毁协议，霸占了南方，从此音信隔绝。他知道母亲和妻儿在南岸生活困难，也无法接济，他想念最深的时候，一有空就到河边散步，或者钓鱼，希望能见到家里人一面。前几年他的妻子常常拿着竹子编的三角形捞鱼工具到河边水中捞鱼，希望能见他一面，或者听到北方的消息。他们一年可能见面两三回，却始终没有机会交谈一句。他说，他每次看见妻子的面影，只能向她举手示意或者摘下斗笠，她也只能动动手作为回答。有一次他见到了自己的一个儿子，儿子默默地向他指着搬去的新家的方向。又有一次他刚走到河边，忽然看见妻子就在对岸，妻子看了他两眼，弯下腰，装作在河边洗头的样子，过一会就走了。还有一次他听见人说他八十岁的母亲生了病，过了三个月，他看见妻子在水中捞鱼，头上带孝，才知道母亲已死。后来从南岸传来口信，说他妻子被捕，一个六岁的儿子患病死去，他心里很难过，他恨不得马上回到南方参加战斗。他最后说："今年我还没有见过她一面，不知道她是死是活，但是我相信祖国统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越是想念在南岸的亲人，我越是觉得只有把全部力量献给祖国，才能够把侵略者消灭干净。倘使我的妻子还活着，她一定也这样想，她一定也参加了战斗。"

S同志的话不只这么一点，但是我想也用不着在这里多引了。S同志说过他现在更了解南方人民热爱胡伯伯的心情，我也听说人们从南岸偷偷送信来，说看见大幅金星红旗，就好像看见了胡伯伯，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感到信心百倍，前途光明。

我在江边的村子里还听见人们谈起两位老大爷的故事。B老人家在南岸，家中有一个儿子，他北上时孩子不过十一岁，现在二十二岁了。有一次父亲在江边，儿子在船上，两人见了面，彼此都不认识，儿子问父亲："伯伯，你认识我的爸爸吧？他健康吗？"B老人问旁边一位老大娘："他是谁的孩子？"老大娘低声说："他就是你的孩子。"B老人担心父子相认后，孩子回去会遭到迫害，便不作声。两人对望一会，老大爷极力忍住眼泪，默默地分开了。另一位老人也叫B，他北上时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九六四年他在江上划船，遇见他的女儿，这时她们有十四、五岁了。他问："你们是谁的女儿？"她们回答："我们是B老大爷的女儿。"他说："我就是B老大爷，你们不认识我吗？"她们来不及答话，伪警就把她们抓走了。

我不能把我在贤良江北岸听到的故事全抄在这里，因为这一类的故事太多了。我不曾问越南同志当初从南方集结北上的部队和干部究竟有多少，我只是在一位日本作家的旅行记中看到一个数目：八十万。那么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拆散了八十万个家庭。根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表的材料，我知道美伪集团在南方一共杀害了十七万人，拷打成残废的人有八十万左右，还有四十多万人给关在监牢里受酷刑，被剖腹挖肝和被活埋的人也有五千多。这还是一年前的统计，美帝国

主义扩大战争、在南方实行"三光政策"以后，受害者的数目一定增加很多。这样的血海深仇，每一个越南人都牢牢地记在心上。美伪集团想用恐怖手段吓唬越南南方人民，他们曾经在南方提倡吃人肝、吞人眼、剥人皮、吃人肉，甚至拼命宣传吃人胆、吞人眼的好处。我在河内遇见一位新从南方来的同志，他说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期，一对眼球售价伪币五百元，一副人胆卖到伪币一千元，由美伪军官出钱收购。(南方作家英德在一九六三年年底写给一位北方作家的《金瓯书简》中说人胆已经涨价，在西贡还有"专门收买人胆的行商"。)

在越南，我没有一天不听见人们控诉美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它们至今还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像火一样燃起我的仇恨。我想起那些视死如归的烈士，我就觉得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不断地高呼：复仇！我见过几位在南方监牢里备受毒刑的男女干部，他们带着遍体鳞伤和一身疾病来到北方。一位A同志被捕以后给整整拷打了两年，敌人还经常把她关在一间黑屋里用强烈的电灯光照她的眼睛，使她的视力受到很大的损害。我听见她谈过一位X姑娘的事情。X姑娘现在二十五岁，她十七岁那年被捕，敌人将她严刑拷打，却始终得不到她的口供。有一天敌人带来一箩筐蛇，在她的上身内衣里面放进三条，在她下身放进四条，然后将她的裤管扎紧，让她站在屋子当中，八个人把她团团围住。她跑到一个人身边，那个人就抓住她乱打，将她打倒在地上。一条蛇给压死了，敌人又放一条蛇进去。她一共压死了二十四条蛇，却始终没有招认什么，最后她昏过去了，醒来以后，敌人放了她，她回

家只有一公里的路，可是她从清晨三点走到晚上八点才到家。她身上尽是蛇咬的伤痕和粘液，母亲替她把身上的粘液揩净了。她要母亲抱住她才能够睡一忽儿。半夜里她常常叫起来。后来人们把她送到了解放区。过了一年多A同志见到她的时候，她身上的伤痕还很显著。

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听见X姑娘的遭遇都会感到愤怒填膺，心如火焚，严厉谴责这种灭绝人性的残暴罪行。然而在越南南方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受到更残酷的迫害，遭到更恶毒的拷打。还不提那些凶狠毒辣的大屠杀。要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单是在越南南方就有无数杀不绝的人证和毁不掉的物证，还不讲它在越南北方造成的那许多废墟。让我在这里引用一段美国兵自己讲出来的话罢："一个星期以前我们队长叫人带进来三个囚人——我也是押送他们进来的士兵……由情报局来的一个人员审问……这个情报局人员叫他们三个人站成一排——三人中有一个女人——他把她的衣服齐腰脱光，把两个男人的衣服完全脱光——他有一个小小的新玩意儿，我还以为这是步行对话机一类的东西——他拿铜线的一头贴住女人的胸部，原来这是一种电击，她烧伤很重。听见她那种叫声，我和同伴都可以想到她并不知道什么——然后他们又把铜线放到她的丈夫和哥哥的下身上……"这是从一个"每天祷告"早日"离开这个地狱回家"的美国兵写给朋友的信里引来的。这是美国兵的口供。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和比这更凶恶、残暴、野蛮的事情，美国侵略者在越南南方哪一天没有干过！他们的双手哪一天没有染上越南人民的血？越

’
洋南方的老大娘叫他们做“野兽”。他们的确是最凶恶、最残暴、最狡猾的野兽。要越南人民同这些披着人皮的野兽“和平共处”、邀请它们坐到茶桌旁边进行所谓“无条件谈判”，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这只是强盗们、帮凶们、狗腿子们的痴心妄想。

三年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两次访问贤良桥，我望着没有变化的荒凉的南岸，平静的江水消不了我心头的恨，但是这一次我听到南岸人民的声音了。那天早晨我在后来被美国飞机炸毁了的哨所里同人民公安人员谈话，忽然听见了炮声，人们说南岸游击队在攻击伪军的一个据点，还说有四架直升飞机向那个据点空投物资。我还听到一些新的故事，南岸离江边几公里出现了游击区和解放区，一个作恶多端的伪警头目被游击队员处死，伪警们也不敢再像从前那样张牙舞爪。他们任意欺压人民、为所欲为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已经在担心有一天会让人民武装力量赶到贤良江里去。美国强盗的飞机、大炮、毒药、毒气都救不了他们。在我访问十七度线的几天里，每天傍晚，我望见南岸远远的天边挂着大片奇形怪状的浓密的乌云，就会想到大风暴以后的万里晴空。离开永灵特区的时候我真是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在永灵我还去过胡舍市重访旧居。听说我两年前住的招待所早已炸毁，月亮还不曾升起，靠着灰暗的光线，我没有找到它的废墟。我找到了那所规模相当大的医院，却只剩下一些空屋，原先是手术室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炸弹坑，旁边还有土堆。我站在土堆上望望空旷的四周，想到美国侵

略者连病人也不放过，连医院也不留下，这种恶毒的野兽心肠激起我难消的仇恨，我憎恨那些替野兽搽脂抹粉的人，我憎恨那些鼓吹同野兽"和平共处"的人，他们要不是也有这种心肠，就是欣赏这种野兽心肠，他们也要受到世界人民的裁判！

胡舍市是由集结北上的南方人建设起来的。那些只身北上的南方人在荒凉的废墟上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为了表示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的热爱。他们决不让美帝国主义毁掉这个城市，他们要用全力来保卫它。尽管美国强盗飞机不断地骚扰，胡舍市始终英勇地屹立在贤良江的北岸，只要夜里没有警报，全市电灯明亮，人们照常工作，各人有自己的阵地，美国飞机一到上空，便受到地面火力网的接待，打得它们不是狼狈逃窜，就是粉身碎骨。我到医院的遗址之前，还去看过一架美国喷气式飞机的残骸。医院是在四月初炸毁的；美国飞机是在五月初打落的，这架F101型的飞机受到这里军民的惩罚以后，落在拖拉机站，它的庞大的身躯摔得不像样子，我用手电筒照着捡了些铝片，还站到折断的翅膀上，看矮墙外的田野和树丛。这架暴尸示众的强盗飞机，不过是永灵特区军民打落的七、八十架美国飞机中的一架。它那种身首异处的丑恶样子至今还留在我的脑中。毁灭的并不是胡舍市，而是美国强盗飞机。那个夜晚我们坐车到胡舍市，看见了明亮的电灯，我们下车顺着大街步行，街头一家孤零零的木造平房大开着门，射出来雪亮的灯光，我离开清化以后常住在乡下农家，用小小的煤油灯照明，忽然见到这样亮的电灯，又见有人在灯下着棋，满心高兴，便和同行的越南朋友朝着灯光走去，

刚跨进门就看到熟悉的面孔，一位三十出头的民兵排长带笑招呼我们，巧得很！我们走到黄番同志猎机组的阵地来了。

这天下午，胡舍市的成衣匠黄番同志到郊外我们借住的农家来看我们。我刚到永灵，就听见人讲黄番同志猎机组保卫胡舍市的战斗事迹，同他会见交谈以后，便请他介绍他的经历。这位著名的英雄民兵排长和绝大多数的越南同志一样，不喜欢多谈自己的事，提起来总说很寻常，没有什么可谈的。他们这个排是以街道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民兵都是手工业者，猎机组九个人，里面有成衣匠，有理发师，有铁匠，也有修理自行车的人，他们的阵地就在工作地点的附近。一有警报他们全拿起武器跑到阵地，准备战斗；警报解除，他们就恢复工作，为顾客服务。他们的猎机组经过了几次激烈的战斗，黄番同志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他的妻子。她也是成衣匠，原来同他住在一起，当他的助手，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轰炸北方以后，她才疏散到农村，在合作社仍做成衣匠的工作，每隔几天回家一次。去年五月四日她回家遇到警报，便同丈夫一起到阵地上，给民兵们帮忙，为战斗服务。这一天敌机多架分批轰炸胡舍市，单是在黄番同志阵地的附近就落下二十八颗炸弹，最近的离阵地四米，远的也不过二十米，四周的土都翻起来了。他的妻子被炸断了大腿，受了重伤，当时黄番同志正在指挥战斗，一位同志跑来告诉他这个消息，建议他送她到救护站去；另一位同志来报告一位民兵牺牲，还说阵地可能已被敌机发现，建议全组撤退。但是黄番同志不同意放弃阵地，也不肯因为妻子的关系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请求别的同志把他妻子送进医

院。他更坚决、更勇敢地鼓动大家:"为南方同胞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对准目标迎头打!狠狠地打!"大家果然用更猛烈的火力、更密集的子弹狠狠地打敌机。最后看见两架敌机中弹起火,虽然一时不知道是哪一个阵地上的火力打中的,但敌机总是给打下来了,每一支步枪、每一挺机枪、每一尊高射炮都起了作用。战斗结束,黄番同志和全排民兵还要去抢救被炸毁的房屋,帮忙工兵搬走不曾爆炸的炸弹。他听说救护组已经把他妻子送进医院,还以为她锯掉了断腿以后可以活下去。他正要去医院探病,便得到消息:妻子已经逝世。他妻子是在夜间埋葬的,他参加她的葬礼,心里很难过,他们夫妻生长在同一个小村子里,他们在南方结婚以后五个月,便一起集结北上,当时他们都是民兵,母亲、弟妹和亲戚全留在南方。他想起妻子被美国飞贼杀害,想起南方同胞们遭受美国侵略者蹂躏,他只希望能够参加更大的战斗,他要尽一切力量保卫胡舍市。"我妻子还是游泳健将,一九六〇年得过奖。当初夫妻两个到北方来,还以为不久便能同留在家乡的母亲、弟弟、妹妹和亲友们团聚,没有想到美帝国主义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灾难。现在我妻子又让美国飞贼杀害了。我真恨美国侵略者,我们只有彻底消灭他们,为北方和南方的同胞报仇。只要美帝国主义存在,越南人就不能安居乐业。……"黄番同志说上面这段话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头略向前俯,两只手捏成拳头,搁在木头桌面上,声音不高,脸上现出激动的表情,眼睛发红,说明他睡眠不够,但是眼光仍然很锋利,它扫到我的脸上,我立刻感觉到那种钢铁一般的决心。当时我们几个人围着一张

木桌坐在一间宽大茅屋的阶前，头顶上有一个藤架，架上铺了些树叶，他的谈话被美国飞机发出的古怪叫声打断过，在这种时候他的眼光就朝架外的天空一扫。谈话告一个段落他马上起身告辞，说是要回到岗位上去打击敌人。我送他沿着灌木丛转了出去，我完全没有料到这天晚上我们便有机会再见。

在木屋里除了黄番同志外，还有好几位民兵，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身体结实的小伙子。屋子里灯光下一张方桌，桌上有棋盘、棋子，有画刊，有小册子。屋角有缝纫机，屋里还有理发师用的工具，屋后廊上放着修理自行车的工具。黄番同志带着愉快的表情，引我到各处看了看，向我作了些简单的解释，又把那些年轻小伙子介绍给我，这些行业不同的手工业者住在一起仿佛是一家人，黄番同志就像是他们的长兄。这个和睦的家庭热情地接待我像接待一个远游归来的弟兄。他们让我看了他们工作和住宿的地方，又领我去看他们战斗的地点。跨过马路便是他们的阵地。我跟着黄番同志到了那里，看了他那挺指向天空的机枪，在阵地上停留了一会，有人指给我看过去的阵地，说前面就是黄番同志的妻子负重伤的地方。我向右面看了几次，只见到一个斜坡、一些小土堆。坡上阴暗，在我的想象中忽然出现了一个苗条的身形，一个挎着枪的黑衣黑裤的女民兵昂着头快步前进。一个思想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子：她明明活着！是啊，像这样的女民兵我哪一天哪一刻不看见！黄番同志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了起来："我们人在阵地就在，人不在，也要阵地在，只要有一个越南人活着，就不让美国强盗占我们的土地，毁我们的城市。只要有一个美国

强盗留在我们土地上，我们就要打，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打！打到底！”

敬爱的江南同志，美国总统约翰逊今天悍然下令恢复对越南北方的野蛮轰炸，这个强盗头子果然亲手拆穿了自己的“和平”骗局，再一次暴露他的狰狞面目。其实这是越南人民意料中的事。越南人民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存过幻想，美国侵略者的全部现代化武器也动摇不了越南人民的抗战决心。黄番同志响亮的声音就是越南人民对美国强盗的有力回答：来罢，不管多少万军队，不管几百几千架飞机，越南人民已经挖好坟墓在等待它们。美帝国主义不管怎样扩大战争，它一定要还清它在越南土地上欠下的全部血债；越南人民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斗争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越南北方和南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永远是一个整体。敬爱的江南同志，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站在你们这一边，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同你们肩并肩朝着胜利前进！

1966年1月31日。

一块头巾*

我从越南山萝省带回来两件珍贵的纪念品：一件是傣族民兵击落的"雷神"式美国飞机的碎片；另一件是傣族妇女用的长头巾，黑布头巾的两端有红色和别种颜色的简单花纹，又用红布镶了边，还有二十四个五色丝线缠就的小圆圈作装饰。这块普通的长头巾是山萝省行政委员会主席送给我的。主席是一位傣族诗人，我们到山萝省访问的时候，他参加了越中友协代表团在中国作客。十天以后我们从奠边府回河内，又到山萝省，仍然过小溪，走独木桥，攀巉崖，登高脚屋，在铺上坐下来，天才大亮。主席同志刚从中国回来，对中国人民怀着火一样的友爱之情，他听说我们第二次上山，立刻到高脚屋来问好，他想留我们多住一天，他要向我们畅谈他访问中国的感受。但是有人在河内等待我们，越南同志为我们作好了准备在第二天黎明前赶回首都，我们只能在出发之前和主席同志在山洞里欢聚一个多小时，听他用热情的语言描绘他在中国的见闻。就是在这个宽大的天然洞子里，主人拿出包好的四块头巾，让我们每人带一块回去，说这是山萝省傣族女民兵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新建设》第三期。

亲手织成的，她们请主席同志转交给中国客人。纸包上已经写好我们各人的名字，可是我们找不到织头巾人的姓名，只知道其中一位是这里的女英雄韦氏金线。她织的一块头巾主人指定送给我们中间唯一的一位女同志。我羡慕那位女同志，因为我也见过韦氏金线，知道她的事迹，容易把头巾和人连起来。我们访问山萝省的时候，会见过这里邮电局的书刊发行员韦氏金线。她在这个山洞里和我们谈过两个上午，当时讲话的还有别的工作岗位上的模范，例如饮食店的京族服务员陈氏麟，她们下山之前，我们还请她们站在洞外岩石上，替她们拍了一张照片。那天金线同志不曾束头巾，但同陈氏麟站在一起，她还是显得高大。她们都是二十岁的姑娘，麟是两年前从远远的河静省报名来开发山区的，父母兄姐都在家乡工作。她现在是一位优秀的服务员，在每次战斗中她都冒着枪林弹雨把饮食送上阵地，有时给石头砸伤，身上青一块红一块，她仍然留在阵地上为战士们服务。我们还见过二十二岁的傣族女民兵广氏调，是一位个子高高的妇女，她讲的是我们一个字也不懂的傣族话，她对我们谈话，首先要请人把她的话译成越语，因此她讲得更少，只讲了些本地妇女在旧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虐待。据说她在阵地上的工作很出色，给机关枪压子弹速度最高，救护伤员成绩很大，没有绷带，她就用自己的头巾代替绷带。她和她乡里民兵猎机组的同志们到山洞来向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头巾高高地束在她的头上，就是主席同志交给我的那种头巾，式样、颜色、材料都是一个样子。我接受了头巾，却忘记问主席同志，它是不是调同志送来的。我们

刚刚说完感谢的话，出发的时间到了，旅行前的准备已经作好，我们要在天色黑尽之前下危崖，过小溪，走独木桥，穿过田野到停车的地点。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照原订计划准时开车。三部伪装的吉普车在炸塌了的桥旁边涉水而过，好像三匹骏马似地一跃就上了对岸，担任翻译的越南同志指着倒在水中的桥身说，美国强盗飞机炸这座小桥，也给打落了一架，我兴奋地答了一声"好"。这样的事在今天的越南北方是很普遍的。越南的桥可以说是美国飞贼的催命符，而在越南北方偏偏到处都是桥。别处不讲，单说在山萝省，有人告诉我，美国强盗飞机几次来炸一座桥，先后扔下一百四十五颗炸弹，只炸坏一个桥墩，却给打落了五架；应州县有一座桥，美国飞贼一共投下一百一十四颗炸弹，飞机给打落两架，打伤四架，一个飞贼跳伞给民兵捉住，可是桥仍然通行无阻。我在越南访问，大桥小桥不知经过多少，大多数桥旁边都有炸弹痕，起初我们车子过一座桥，我总要想一想：怎么这座桥不曾炸坏？怎么那座桥上没有弹伤？后来我见到用步枪打落喷气式飞机的民兵多了，我拾到给打落的美国飞机的碎片多了，我过桥时便有一种自豪的感情：我的确在分享越南人民胜利的欢乐。

车子过了河，上了公路，在暮色苍茫中向前奔驰，山区夜来得早，山上升起了薄雾，公路两旁许多千年老树幻成了奇形怪状。路上车辆不多，行人更少，入夜便听不到飞机声，路旁也不见一盏防空灯，有时对面射过来两道亮光，自远而近，那是卡车开大灯赶路。山区的路不怎么平坦，我在车上也感到颠簸，刚闭上眼就给颠醒了。我们的车子开着灯不断前进。山

区的夜很静，一路上只听见滚滚的车轮声。大约颠了三个钟头，我们的车子忽然停了下来。接着后面两部车子也陆续赶到。三辆车灭了灯停在路旁，司机同志们需要抽烟、休息。我下了车，在满天星光下看山间的静夜。公路两旁有原始森林，有奇峰峭壁，也有幽静山谷。我沿着公路闲步，车声一静，别的声音都听得见了：水在流，虫在叫……。我倾听着很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的各种声音，望着路旁各种怪虫、毒蛇在那里藏身的高山密林，我忽然想起了我在山萝省那个山洞里会见的傣族英雄，那些在山林中战斗的男女民兵，他们把我的心拉向山萝，拉向我几小时前离开的地方，于是两个傣族民兵猎机组用步枪打落美国飞机的故事又到了我的心头。故事就是专打敌机的英雄们在山洞里讲的。讲第一个故事的阎同志是一位三十一岁的下中农，他们用的步枪是老式的，他们打落的飞机却是最新式的，而且是F105D型的"雷神"。阎同志讲话明确、干脆，仿佛在叙述一件日常生活里的事情：

"我们这一组经常到高地去看地形，练习打伏击，一去就是七、八天。敌机来回的两条路线，我们都弄清楚了。六月二十八日我们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地点，就在三座山峰的第三峰上面埋伏下来。当天十一点三十分钟，两架敌机飞来，在我们乡投弹，离我们埋伏的地方很近。它们绕第一圈，我没有打，绕第二圈，刚好在我的射程内，组长下令打，我就朝一架敌机迎头开枪。我们三个人有两支步枪和一支冲锋枪，组长使用冲锋枪不顺手，就用另一位同志的步枪打，那位同志便代替组长观察。敌机离我只有一百米的光景，我又打，我一共打了三

枪，组长打了两枪，观察的同志看见敌机在两百米的地方冒烟，冒烟后起了红光，红光灭了又起，到第四次，火不熄，敌机便在离我们七公里的地方落下来了。”

这以后不到三个月，在附近另一个乡，也是一个傣族猎机组，也是用两支步枪打下了另一架“雷神”（F105D型敌机）。二十七岁的下中农拉同志讲第二个故事，讲得更简单：“敌机炸山萝，每次都要经过我们乡。敌机飞得低，站在最高点不好打，我们决定找中型的山埋伏。我们到了那座山，为了便于观察，把树木砍光。九月十七日中午一批敌机到山萝轰炸，炸后经过这里回去，我们当时正在观察，一架敌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去，我们来不及打，组长要我们作好准备，我们还不曾趴下，便看见另一架敌机向我们飞来，等它飞到离我们两百米光景，我们两个人同时用两支老式步枪各打一枪，敌机冒出黑烟飞走了，在下面搞生产的老乡们大声欢呼：‘敌机着火了！’敌机起火后，越烧越厉害，终于落在离我们阵地大约十公里的地方烧毁了！”……

在山萝省我不仅听了两个真实的故事，我也见到两架“雷神”的残骸，我还听见傣族英雄的坚定声音和豪迈语言：“我们民族很早就受法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生活非常苦，后来我们在劳动党和胡伯伯的领导下打败了法帝国主义。现在美帝国主义又来侵略我们，它比法帝国主义还要坏，我们一定要消灭它，彻底消灭它！”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语言又在我的耳边响了起来。我再一次望着两旁黑黝黝的高山密林，我好像听到了接连不断的清脆的枪声，我真是万分兴奋，忍不住一个人

自言自语:“这都是美国强盗的坟场啊。”……

有人在唤我,原来是我们的翻译梁同志到了我跟前,他问我在想什么,他递给我两只香蕉,说是在路边少数民族的无人售货摊上买来的。我们一起去看了那个售货摊。售货摊就在路旁,是一间很小的茅棚,用竹子搭架,架上放着一堆一堆的香蕉、旁边有写明低廉售价的小纸片。棚顶下一根横竹上吊了一个小篮子,篮中有钞票和辅币,谁买了香蕉就把钱放在篮里。这种售货摊据说在山区相当普遍,公路旁没有人家,司机同志通宵开车,路上没有水喝,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水果。在西北山区开车的司机同志都熟悉这种无人售货摊,也感谢少数民族同胞的关心。这样的茅棚路边有两处,相隔不远,一处架上还有香蕉,另一处架上空空,钱还留在篮子里。要不是梁同志向我介绍,我走过路旁,也不会注意到这样的茅棚。现在我用手电筒照着把两间茅棚都看过了,我还在棚前站了一会。我在想象茅棚的主人黄昏时分把水果放到架上从篮里取去果钱的情景,我在想象她离开这里走回家去的心情。我仿佛看见一位束头巾的傣族妇女缓缓走着的背影,我的思想在头巾上停了一下,于是我想到了广氏调和韦氏金线这两位傣族女民兵。

车子离开无人售货摊,跑了一大段路,我还在回想我访问山区的见闻。秋夜凉如水,寒气逐渐从车外侵入,我一连加了三次衣服,身上才有暖意,可是我的心始终是暖洋洋的,因为我的思想一直停留在山区人民的革命红心上面,不是一颗心,是许多颗心。我从头巾想到售货摊,从售货摊又想到头巾,我想的还是那许许多多像火一样在山区燃烧的红心。

我又想起了韦氏金线。想到金线同志，我便记起广氏调的话。她说："傣族有句俗话：'妇女和水桶连在一起'，就是说在旧社会妇女永远给拴在家务劳动上面。"但是时代变了，傣族妇女也拿起了枪保卫自己的土地，保卫祖国。可惜我不曾见到这两位同志挎着枪的英姿，从外表上看，她们不过是普通的傣族妇女（广氏调已经结了婚，她还是军属）。听她们谈话，我却感到意气昂扬。她们有一种不怕任何敌人的英雄气概，有一种完成一切任务的坚定决心，而且都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英雄大集体中的一粒沙子。金线同志说："我们省打掉美国强盗飞机比别的省少，我们有决心赶上去。大家都准备好，它来了就不让它回去。就只愁美国飞贼不来。"她又说："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少，比别人差得多。"她又说："我想到美帝国主义残杀南方同胞，想到美帝国主义滥炸北方，我真恨，这种仇恨比山高，比海深。"

妇女翻了身，贫农翻了身，山区的少数民族人民翻了身，枷锁打碎了，魔爪斩断了，痛苦消失了，黑雾消散了，就像傣族歌手们唱的那样，"斑花① 重开了，浑浊的水又清了，人的肠子又直了。"然而金线同志的故事还是从旧社会的痛苦开始的。她的父母是贫农，她兄弟姊妹多，单靠在自己开荒开出来的地上种杂粮，不够吃。她八岁还不能上学，白天跟着父母到山上挖野菜、找野果，回家要做家务劳动。有一个时期她一家人连这样的生活也过不下去，便离开了家乡，等到山萝省解放后，

---

① 西北山区人民非常喜爱斑花，斑花在春天开放出香甜的白色花朵。

才迁回来，仍然开荒种地，先后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生活渐渐地好起来。她十四岁学会耕种，参加了生产劳动，十六岁正式成为社员，并且加入了劳青团。就在那一年十一月她得到机会进了干部培训学校，边学习边劳动，一共学习了十四个月。后来县里又派她到太原省初级邮电学校学习。一年后学习结束，一九六四年五月她回到山岁市，开始在邮电局工作，担任书报发行员。不到三个月，美国政府拿它自己制造的北部湾事件作借口，八月五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空，在北方几个滨海的省内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广宁省的胜利捷报特别引起金线同志的注意，因为在那个地区的战斗中受到表扬的英雄模范的名单上她发现了她最好的朋友、她的同学的名字：韦氏贤。她想起了她们在邮电学校学习的情景，她想起了她们分别的情景。韦氏贤比她小一岁，是土族姑娘，她们性情相近，爱好相同，感情也非常好。当时还有一位比她们大几岁的土族男同学仙同志，也和她们处得很好，三个人家庭情况差不多，又同是劳青团员，她们把仙同志当作长兄看待，仙同志常常在学习上帮助她们，鼓励她们。学习结束那一天，刚巧太原钢铁厂出第一炉铁，学校组织参观，学生们都去了。前些时候三个好朋友知道毕业后不可能派到一处工作，离别就在眼前，虽然互相鼓励今后要保持联系，彼此帮助克服工作上的困难，但是都有一种惜别的心情。他们在一起谈今后各人的工作，话题常常转到这样一件事情上：分别的时候最好用什么东西作个纪念，以后各人遇到困难，取出纪念物看看，可以得到鼓励，增加勇气。在钢铁厂看见第一炉铁水出来，年纪最大的仙

同志，拾到了一小块铁，他把它郑重地包好带回学校。三个人在一起把这个小小的铁块打碎，分成三份，每人拿一份，贤取了一块最小的，仙拿的是最大的一块。学校的决定公布了：仙暂时留校，贤到广宁工作，金线回山萝。贤比金线早一天离开太原，两个好友送她上车。金线说："将来有一天这三块铁总会合在一起。"贤说："只要我在，这块铁也在。"仙说："我们三个人一定要听胡伯伯的话，今后遇到方便，要留给别人，有困难就让自己包下。"

金线同志回到山萝以后，积极工作，有时想念朋友，也取出她那个用手帕包得很好的小铁块，看到这个小小的纪念品，她仿佛仍然同两位好友在一起学习。她多么希望祖国早日统一，朋友们在一起工作，用全部力量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乐园。

"我听见贤同志受到表扬，真是说不出的高兴，马上打了一个电报去向她祝贺，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学习她。"金线同志带着愉快的笑容说，圆脸上略微突出的颧骨上面一对小眼睛发出了亮光，不用说，她今天还因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她马上寄来了回信谈起战斗的情况，还讲到她的同事阮氏秋水的事情。"韦氏贤给分派到下龙湾一所邮电局里工作，刚刚升为正式电话员，秋水的年纪大一些，已经作了两年的电话员了。那天美国飞贼偷袭广宁，敌机飞到下龙湾上空，她们不顾轰炸扫射，坚持工作，在四十五分钟的战斗过程中，始终保持线路畅通，两个人都得到胡主席的纪念章和本省的奖状。后来全国邮电局展开学习本单位英雄们战斗精神的运动，贤的来

信、她那熟悉的形象、手帕包着的小铁块、三个朋友分别时的诺言，这一切都鲜明地印在金线的心上。"她做得到的，我一定做得到！"金线这样一想，便觉得有一股暖流通过自己的全身，仿佛也见到了自己面前的光明前途。金线在这些日子里想得很多，但她总是向前看的。敌机来了，她做什么，敌机不来，她又做什么——这些她都想过了。后来山萝市成立民兵自卫队，她马上报名参加，每星期抽出一个上午学习军事。她这个中队在战斗准备和练兵方面都受到了表扬，得到一九六四年军区奖发的"决战决胜"的红旗。这个集体的荣誉加强了她的信心，可是她渴望的是战斗，是拿起枪打击敌人的战斗啊！

战斗的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年（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美国强盗飞机开始轰炸山萝省木州县的农场，十四日炸木州县草原镇，十六日炸木州县。敌人的企图十分明显，魔爪越伸越近。中队马上整顿队伍，积极练兵，金线给编入了战斗组，全组积极学习打落敌机的有效办法，学习广平省的战斗经验，因为靠近十七度线的广平省当时击落敌机最多。全组、全队、全市都已作好了准备，要痛击来犯的敌人。

十八日上午，美国强盗飞机侵犯了山萝市。金线当时在局里工作，听见警报，便跑上阵地。第一架敌机俯冲下来，指挥员下命令：打！她以前练武用的是汽枪，现在对着敌机端起步枪，不免有些紧张，她还不曾开火，敌机已经过去了。后来指挥员下令转移阵地。她到了第二号阵地，敌机来得不少，投了很多炸弹，她的耳朵已经听不见了，她望着指挥员的手所指的方向，一共打出了十四发子弹。她把仇恨放在枪口上，她不

再紧张了。战斗继续了一个多钟头，她这个小组虽然没有打落敌机，可是敌机给高射炮打落了三架。战斗结束，整个小组还留在阵地上修理工事。晚上她给派到另一个地方去修筑新的工事。当晚下起雨来，可是大家干劲大，不到天明，工事就修筑好了。

十九日，整天下雨，敌机没有来，她被调到重机枪组去送子弹。指导员问她能不能做，她说：能。

二十日，大清早她就到重机枪组去，认真学习送子弹，取得了一点经验。

二十一日，她接到新任务：代替一位男同志管一挺重机关枪。她一直是这样：交给她任何任务，她都爽快地接受，不懂就学，边学边做。她一心一意，要打败敌人，保卫家乡，保卫祖国。

二十二日上午，敌机又来骚扰，这一次强盗飞机在金线他们的阵地上受到了惩罚，一来就给打落了一架！

二十三日，敌机来得更多，它们从各个方向飞来，投下不少炸弹，金线他们的阵地也炸坏了。中队长叫她下去，她不肯离开阵地。她要保护重机关枪，她要痛打美国飞贼。后来她的脚踩到一块炸弹片上，给烫伤了，她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当晚她整夜都在修筑工事。

二十四日，她继续留在阵地上参加战斗。从这天起邮电局因工作需要抽回了六个干部，只剩下六个人在这个阵地上全天值班，其中只有她一个女同志，她要参加战斗，要做救护工作，战斗结束她还要替大家做饭。

以上不过是像金线这样一个侬族女自卫队员七天战斗生活的简单的说明。这里面包含着多少艰辛的劳动、繁重的工作和英雄的行为啊！她就这样和五位男同志一直在阵地上坚持下去，中间还经过七月里一次激烈的战斗，后来——

"我们机关每个人都想参加战斗，后来上级决定采用轮换制，每人值班几天，这样大家都有战斗的机会，我们六个人也就回到机关照常工作了。"金线同志这样朴素地结束了她的故事。她抱歉似地对我们微微一笑，便闭上她两片厚厚的嘴唇。她谦虚地坐在我对面，翻看我们带来的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画册。围着这张长方形大木桌坐了好些人，有中国同志，也有越南同志。我们在这个天然山洞里参加座谈会，这是第三天。洞子高大，洞口也不小，光线充足，只是洞里阴湿，洞外阳光灿烂，洞内寒气袭人。我在笔记本上记下金线同志的话，放下圆珠笔，抬起头，通过洞口望外面映着阳光的绿叶，心里还在想金线同志的事情。这时有人问起铁块的下落，我听见金线同志回答："我把铁块保存得好好的。我们三个人当初分铁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诺言：保卫我们这三块铁（这也是保卫我们祖国的第一炉铁），就要坚决保卫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到我们祖国统一的那一天，我们就让三块铁永远合在一起。"还有一位同志想看看这个宝贵的纪念品，可惜她没有把小铁块带在身边。

这天上午我们在洞外和金线同志分别后，就不曾再看见她。后来我们访问广宁省，在下龙湾见到了吉氏贤，我们把金线同志的口信带给她，谈起她们的友谊。穿着京族服装的贤同

志掏出一个手帕小包，打开手帕，从奖章、纪念章……中间挑出一块比小虫稍微大一些的黑色东西，她带着笑容郑重地递给我们。我接过这个很小的铁块，看了看，倘使我不曾听见那一段故事，我一定讲不出这是什么东西。我看见这位不怕美国强盗飞机的瘦小姑娘那么小心地把小铁块放在手帕上包了又包，我很愿意知道她这个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我自己的思想也在活动，在我的眼前三块铁忽然一下子合在一起了。她想的是祖国的统一！她想的是三个朋友肩并肩用同样的步伐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起了这块铁，我取出这块铁看看，好像还听见两个熟悉的声音：'勇敢些，再要勇敢些！'我的勇气、我的信心更大了。我做出成绩，他们就来电话、来信鼓励我。"韦氏贤微微埋下头说，她的声音不高，但声音里有感情。"他们有成绩，我也非常高兴。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金线同志最近还有信来。三个人中间我年纪最小，他们把我当作小妹妹看待。仙同志在T县邮电局工作，还负责民兵自卫队的对空射击组。我同他经常有机会通电话。他工作积极。可是他们那里还不曾发生过战斗。他说，他很羡慕我们，他多么希望参加战斗啊！"

我们也多么希望听到这个清秀、文静、朴素的姑娘滔滔不绝地谈她的战斗经历，可是她谈话不多，谈自己的事更少。她的脸上始终露出谦虚的笑容。这时我们大家围坐在一张藤条编的矮圆桌的四周，圆桌放在海滨一所楼房的廊子上，炎热的阳光逐渐移向我们的桌椅，我抬起头便望见坡下金光点点的

海面和海上的群山。我的眼光移到贤同志刚刚闭上的嘴唇，我忽然想起了我什么时候读过的一位越南同志的文章。我觉得她的嘴张开了，她又在说话了："秋水呀！咱们的炮打上去了，出现了许多烟束，紧紧地围住敌机。""看，秋水呀！敌机这样疯狂扫射，可是公安人员和自卫队员还在马路上跑来跑去。咱们的架线工人同志也在对岸电线杆上操作呢。""秋水呀！一架敌机冒烟了，歪歪扭扭地向海那边飞去了，它是不是给打中了落下去了呢？鸿基那面山头，老乡们也在大声喊着，你来看看！"这些话都是韦氏贤同志在一年前讲过的。阮氏秋水是她的同事、她的战友。一年前八月五日那次激烈的战斗就在这一带进行，她们工作的地点离敌机轰炸扫射的地方更近。她那天下午在窗前看见的，我们当时在这里也可以看见。我这样一想，那个下午在邮电局二楼总机室发生的一切都在我的眼前重现了：八、九架美国喷气式飞机在空中盘旋俯冲，不断地发出尖锐的呼啸声，不断地轰炸、扫射，地面的炮火像雷声一样震得连墙壁也摇摆起来，她们两个轮流坐在总机前紧张地工作，两只手不停地拔插销、插插销，两只耳朵聚精会神地倾听从耳机里传来的一切呼唤。贤守总机的时候，秋水站在旁边照料，还时时给她打气。后来秋水接管总机，贤有时在旁边帮忙，有时站在窗前看外面，给秋水报告好消息。过了四十五分钟，飞机声和枪炮声忽然静止了，耳机里传来指挥所的通报：敌机给打落两架，打伤三架，北方领空再没有一架敌机了！两个人听到胜利的消息高兴得拥抱、欢呼。

我前一天已经看见一年前美国强盗飞机轰炸、扫射的痕

迹，也看到她们当时工作的地点，现在又见到了人，再想象当时的情景，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活起来了。我用不着再请贤同志讲下去，多谈她自己的事情，她没有讲出来的许多话我已经知道了。过去她在这里勇敢地战斗过，现在她勇敢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将来她还要勇敢地战斗到底。她身上那个小包里有胡主席的纪念章，有别的纪念章和奖章，还有她念念不忘的小铁块。她会永远记住当初的诺言："保卫这三块铁，就要坚决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十九岁的土族姑娘和千千万万的越南青年一样，为了保卫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争取祖国的统一，可以献出一切。那些会发出怪声呼啸的"雷神"、"鬼怪"，怎么能吓倒他们？

韦氏贤同我们一起，在充满阳光的廊上过了一个多小时，她想起自己的工作，总机室两人值班，现在她在外面，担心会发生情况，到了防空时间便匆匆告辞下楼走了。第二天我们刚吃过午饭，听说有警报，回到房里便听见高射炮的声音，连忙下楼到园中树荫下，想看看是哪一类型的敌机。招待所副所长会讲中国话，他看见我就笑着说："打下了一架飞机。"问起来才知道来了两架敌机，高射炮一打就中，中弹的敌机冒着黑烟朝矿区方向下落，另一架马上狼狈地逃走了。四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得到了确实的消息：打落敌机一架，活捉飞贼两名。真是打得快，落得快！

我们离开下龙湾的前夕，参加了广宁省主人为我们举行的家庭团聚般的宴会，宴会后大家坐在庭院中大树下畅叙友情。后来主人们离开了招待所，我们也准备上楼，副所长同志

忽然请我们留下，他恳切地说："我没有什么款待中国同志，我要给你们弹一曲独弦琴。"我们静静地坐在藤椅上，听他弹了两支曲子。我不能说他弹得好，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向他表示谢意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真是千言万语不知从哪里说起，他连声说："你们要再来啊！"我回到房里已是深夜，月亮升了起来，在深蓝色的海面上照出了一条宽宽的银路，楼前两棵凤凰树还隐在黑暗里。我不想进房间，一个人靠在廊前栏杆上，望着那条仿佛跟明月连接起来的银路，一阵阵南方树木的芬芳送到我的鼻端，刚才听到的两曲独弦琴和那一句"你们要再来啊！"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我站了许久，我苦苦地思索着，我在想，这句极其朴素而又充满感情的话我在越南北方听过了多少回。多少回？这一县，那一处，这一乡，那一村……我哪里记得全？我刚刚想到山萝省主席同志在半山水塘边同我们分别的情景，接着又记起了另一个场面：半个月前我们离开西北自治区的时候，天空中挂起一钩新月，车子停在公路旁，我们站在车前，自治区的文化局局长同志站在我们身边，野草盖住他的赤脚，他是一位诗人，他正在用傣族话对我们唱一首送别的新诗，我不懂诗的内容，但是通过翻译我听出了这样的一句："你们要再来啊！"这是用多么深的友情反复唱出来的一句诗！

从一块头巾我想起了许多事情，从山区想到海滨，从海滨想到山区，我想来想去，想的始终是人，是我永远忘不了的许多越南同志，许多越南友人。我怎样回答你们这种亲逾骨肉的战斗友情呢？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

你们，让我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永远，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战斗，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2月19日写完。

附　录

春天的来信*

——越南南方诗人江南给作者的信

我与九龙江、溪草河两岸的同胞和解放军战士们一起生活和战斗了五个月之后，刚刚回到家里来。我拿起您的那封还带着朋友们手的温暖的上海来信，内心非常激动和自豪。当我们越南南方人民正在庆祝我们光荣的伟大节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四周年的时候，我还听到了北京广播电台广播了您给我的那封动人的信。您那带着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及文艺界朋友们感情的声音，越过了长江、黄河和千里长山，传到了敌人作为"平定"重点的省份，A地南面的门户——B省的文艺大会来。五十多个与会的文艺工作者，非常激动地倾听着您信中的诚挚的意见。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意见，也不是只寄给某一个个人的信。大会的全体同志们也托我转达他们对中国文艺界朋友们和中国人民的最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希望你在春天来临的时候收到我这封信，它将给你带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人民文学》三月号。王云峰译。

我们最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带来隆美、边和、安老、西贡，尤其是一九六五年初平也的一系列捷报。不过在叙述我们的胜利之前，请允许我先谈谈你们吧。一九六四年，一件令我们南方人民和文艺工作者无比兴奋的历史事件，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我想你们很难想象我们听到中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正式公报时，是怎样的兴奋和激动啊！我们大家都跳了起来，相互拥抱着，欢呼声几乎震破了胸膛。这一件事的确给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记雷劈似的耳光。公报的言词既坚决又合情合理，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怎样才是正确的政治斗争路线。我们同胞称中国的原子弹为"自己"的原子弹，我们的诗人和文学家则称为"正义"的炸弹，"希望"的炸弹，"和平"的炸弹。当然，我们和你们一样，从不认为原子弹能够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能够代替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的革命斗争，能够代替越南南方人民目前的神圣抗战中的陷阱、火枪和地雷。但很显然，中国的原子弹，掌握在你们手中的原子弹，是有着无比威力的武器，它对我们的斗争是有力的支持，对走投无路而正在企图把战争扩大到我们的北方和你们国土的战争贩子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严重的警告。

知道你们已经翻译出版了《南方来信》，印数很大，并且向中国人民作了郑重和广泛的介绍，我们也万分的感动。此外你们还把它编写成剧本，成为文学艺术的作品。这一切都使我们南方同胞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我们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革命斗争事业给予了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崇高友谊。

人们往往有许多情感是用言语不能完整地表达出来的。中国人民在泥泞中站了起来，争取自己解放的伟大榜样，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你们的革命斗争的路线和经验照亮了我们目前正在前进的道路。如您所说的，您的心永远在英雄的越南人民这一边，那么，我们的心也时时刻刻都在你们及中国人民的身边。

我在敌人作为"平定"重点的B省——一个遭到敌人残酷破坏的战场生活和战斗了五个月，我看到和听到了从来没有看到和没有听到过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我生活在战斗极为剧烈的环境中。美国强盗为了挽救他们的失败，用尽了一切野蛮的手段。我在那里的期间，美国强盗在二十四天内先后制造了杀害安盛、安和和德和三个学校的学生的惨案，有十六个学生死亡，五十三个学生受伤(大部分是七、八岁的孩子)，此外还有一位女教员和十四位同胞死亡或受伤。在这里，每走一段路就可以看到激起人们仇恨的写着被敌人大炮和炸弹杀害的死者姓名的牌子。在这里，不分昼夜地随时都可以听到飞机的隆隆声和炮弹的爆炸声。敌人的各种类型的飞机，包括用来进行"宣传战"的直升飞机和教练机，都装有火箭和机关枪。敌人用"炮群"、"照明弹"、"磷弹"和"鲈弹"来屠杀人民和牲畜。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敌人的三架"空中袭击者"向正在吃草的水牛群连续地投下了二十多枚炸弹，当场炸死了两头，炸伤了十来头。我也几次遭遇到夜间窜扰的敌人用HU.1A喷气式飞机，它们毫无目标地向着村庄扫射。而且一旦遭到HU.1A的扫射，那就像块布一样地缠得没个完的。

但是也是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场既激烈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奇异的战斗。在弹火纷飞的情况下，人们仍然进行着生产、学习和文艺活动。在敌人"平定"重点的重点地区——新宙，敌人投入一个团(三个营)的兵力，用了几百架直升飞机、军舰和两栖坦克，进行"扫荡"和占领。可是结果怎样呢？仅仅四个月的时间，这个被敌人以印度支那公路和溪草河两支流包围着的狭小的地区，我们用游击战粉碎了敌人著名的侵略计划。敌人到处遭到游击队、自卫队和全体人民的榴弹、踏雷和陷阱的包围、打击和歼灭。人民打死打伤了一百五十多名敌军，不但完全解放了敌人侵占的地区，而且还解放了一个乡，把敌人赶到印度支那公路上和新宙镇去。敌人在新宙镇，驻扎着两个连，但是，他们常年不敢离开驻扎地到三百米以外的地方去，因为这里的游击队日夜在监视和伏击他们。那里的水路、陆路都被游击队切断了。敌人凡是要接济、换防、运输伤兵等等都得使上直升飞机。而直升飞机又是游击队的好礼物。因此，每当直升飞机降落之前，敌人总得向周围倾泻大量的炮弹，弄出一个地方来让飞机降落。我想如果您有机会看到游击队打直升飞机的话，一定会很感兴趣的，尤其是夜间，敌机飞到哪个村庄，那里的弹火就一簇簇的飞了起来，把椰树顶照得明晃晃的……敌人有两架装有扩音器的专门进行反动宣传的 HU.IA 飞机，最初它们还可以勉强飞得低一些，后来也只得在云霄里打转了。他们说些什么没有人愿意听，也实在无法听到。一方面因为他们飞得太高了，另一方面是这里的人民有了好办法对付它们。村里家家户户都设有

木鱼或铁桶，一听到很容易辨认出像击木棍的噼叻啪啦声和敌人叽哩哇啦的叫喊声，人们无论是在家里或在田里，无论是年迈的老人还是五六岁的孩子，都一边敲起木鱼和铁桶，一边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响声震撼了整个村庄。少年儿童们尤其喜欢这项活动，他们有时边敲着铁桶边唱着歌……至于敌舰则每次都要三五成群才敢出来活动，同时还得一边行驶一边向两岸射击出密如雨点的子弹。但是，那些无法计算的子弹只能打掉那些无辜的水椰子树叶，同时进一步地暴露了敌人的恐慌心理。敌人尽管怎样肆无忌惮地胡乱射击一通，但是，游击队仍然能出其不意地给他们以迎头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军官只得下令船只开足马力逃跑，同时船上除了射击手，全部士兵都得卧倒在船舱里抬不起头来。您想想看，这是从新安到槟陆长达三十公里的水路交通线啊！至于陆路交通线，那是敌人的生命线，但他们也没有办法保护！仅仅通过B省的长约三十公里的一段印度支那公路，敌人就得指挥一个团的兵力来驻守，这还不算通过槟陆等各大据点的公路段呢。目前在这段公路上，夜里每隔五十公尺就有敌人的一个岗哨。敌人从前的第七师团和现在的第二十五师团的大部分兵力都用在保护公路上。尽管如此，敌人还是经常被袭击，沿途的C、D等据点仍然被消灭！

我曾经访问过J县的X乡，这个乡的游击战运动开展得很好，尤其是妇女也普遍地参加了武装战斗。我访问了乡自卫队的女指挥员，她是第一个敢于布设榴弹的妇女。我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当初这里的妇女们都不敢布设和使用榴

弹。由于稍有疏忽榴弹就会爆炸，因此有的妇女拿着榴弹就要发抖。这位第一个布设榴弹的女自卫队员，在试验时嘱咐姐妹们道："我万一遭到不幸……你们得好好吸取经验，直到成功为止。没有这个玩意儿就不好对付敌人。咱们妇女不能落在男人的后面。"但她并没有死，同时现在X乡已经有三十多个女自卫队员和她一样掌握了使用榴弹的技术，并且成为全县的旗帜。她们最初布设榴弹时还要编竹筐套住榴弹，控制住雷管，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她们就这样把榴弹埋在地下，利用榴弹的重力压住雷管，只要地面上稍为震动，榴弹就爆炸了。此外，她们还在树干上，约一人高的地方挖洞放进榴弹，外面贴上标语。这是用来惩办那些专门撕毁标语的恶棍的……我在X乡还访问了一个游击队员的家庭。这一户人家，父母都已四十多岁，有十个孩子和两个十七八岁的侄女，他们都参加了战斗。父亲是这支"混合小队"的指挥者。他们每人都分工负责一个地区的战斗工作。大的负责田边布设榴弹等工作。十三四岁以下的孩子负责搬运踏雷和尖桩板，并且照顾院子内外的事情。最小的负责放哨、供应尖桩。有一次敌人来进犯，这家人的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布设榴弹炸死炸伤敌人各一名，使敌人慌成一团。他们乱射击一阵后，抬走了被炸死和炸伤的人，然后又倒回来埋伏在那儿。小队员以为敌人已经逃窜，便匆忙跑出布设榴弹的地方喊道："报告爸爸，我的榴弹炸死炸伤敌人各一名。你输给我了！"这时敌人开枪射击小队员，但他敏捷地卧倒匍匐到掩体里去了。敌人一看，便摇头相告道："小孩都当了游击队，真是无话可说了，

我们难以战胜越共啊!”在参加武装斗争的同时，母亲还带领着几个大姑娘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政治斗争。有一次，敌人指挥了一个营的兵力到这个乡来进行“扫荡”。他们用飞机、大炮来配合作战，但先后三次进攻，都被榴弹打退下来，还伤亡了不少。而在这同时，乡里的三十多个妇女，到公路上来揪住敌军，不让他们向村里开炮，并且敌人不撤，她们就坚决不走。结果到了晚上，敌人不得不撤走了。

在我们这里有着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敌人懂得吸取教训的话，他们的愚蠢事将会少一些。当然，您知道，他们是绝不会吸取到必要的教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在我访问过的E郡，就有两个据点：F和G，在几年中被我们连续拔除了四次。奇怪的是G据点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先后被拔除了四次，其中，有三次都是在中午，一次是午夜十二点发动的。而且都是运用了敌运工作来实现的。最有趣的是每次被拔除之后，敌人总要总结一番经验教训，接着他们又调动士兵和一群恶棍来“防”和“反”“越共”的敌运工作。而每次尽管他们采取了许许多多的措施，如禁止士兵和人民接触，进行歪曲解放军的宣传，等等。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里的人民仍然有办法进行活动、争取伪军，最后终于达到外攻内应拔除据点。敌人在第四次被拔除据点后，一个恶棍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专门煽动‘国家’士兵的越共老奶奶们”(指我们的妇女在敌运工作中的厉害)。

我想以我感受最深的心灵来歌颂我们南方的妇女。她们

在我们的第二次抗战的特定历史阶段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好多次在晚间外出工作的路上，常碰到一、二百个女民兵，冒着倾盆的大雨，肩扛着枪弹在滑得如泼了油的田埂上走着。她们有的人运用自己的尼龙布包裹着武器而自己却淋着雨。她们涉水过河，通过敌人驻守密集的战略公路，经常遭到敌人的炮击。这些公路上敌人随时都可以用炮轰击他们怀疑有解放军经过的五、六公里远的公路线。尽管这样，敌人仍阻挡不了我们的抗战的血管的流通。此外，妇女们还逐渐代替了男人在地方上的各项工作，如交通联络、教育、文艺，甚至扶犁耕地等。

我还见到了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而在日常生活中却非常简朴、善良的大娘和姐妹们。如果说在前几年的斗争中，妇女们只着重做些争取伪军和诉苦的工作，那么近来，妇女们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她们揪扯着敌军，要他们把她们的丈夫和儿子送回来，就这种斗争形式有时使一个排的敌人被"监禁"，毫无办法行动。敌人在槟榔曾公开说，"这些女鬼比解放军还可怕。"敌军军官看到他们的士兵调戏去赶集的T乡的妇女时，便骂道："他妈的，你们还不知道T乡的女孩子的厉害，别做梦吧，她们才看不上你们那副面孔，人家嫁也要嫁给越共。"另一些敌军则摇头吐舌说："当心！解放区的女孩子一碰就会炸的。"

我们还可以把第七和第二十五师团作为活的例子来谈。当第七师团还驻扎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同胞曾经和敌人进行了百来次面对面的斗争，和一系列争取士兵的工作。因此，

敌人的阴谋遭到了惨重的打击。当敌人把这个师团调走时，恶棍们威胁人民说："告诉你们，不要用惯了你们的那套政治斗争，有一天你们会遭殃的！二十五师团可不像第七师团那样好惹呀！"可是二十五师团还未到达这里，就在印度支那公路上遭到了一系列的打击。九月中旬的十天中，就有二万人次参加了斗争。而最使敌人料想不到的是这些斗争却得到他们的大多数士兵的响应。这个二十五师团的一个连的士兵脱下钢盔，放下枪参加了长达二百多米的群众的示威游行，他们还高呼反美的口号。后来我所见到的老大娘和姐妹们，她们意味深长地说："啥玩意儿，我们以为第二十五师团怎么了不起，原来也是那样一攻即破的！"确实是这样，一九六四年头十一个月中，B 省就有三千名敌人的主力军被我们瓦解。

我还想给您再讲一个一九六四年九月我们和敌人第三次较量中的故事(我们和敌人打了三次，每次都消灭敌人一个驻扎在野外的连队)。这次，敌人新调来一个连队，其中有八个士兵到老百姓家里来串门。他们带着收音机连续地收听了河内电台、解放电台和北京电台的广播。这家人的女主人假装惊讶地问道："怎么你们敢收听共产党的广播呀？不怕军官们发现吗？"他们都回答说：

"你以为他们不听呀？我们反正说不定哪天就活不成了，先听个痛快再说！"走之前，他们还叮嘱女主人说：

"请你转告解放军，进攻的时候动作别太快了，让我们来得及投降呀。说实在的，因为我们被看管得太严了，一时走不掉。但是迟早总得走的！"

每天夜里，这几个伪军都要轮流看守，以便一听到动静好来得及投降。正如他们所想的，两天后，除了两名敌人掉到井里未被解放军发现外，这个连全部被歼灭了。我还没有查问这次战斗被捕的俘虏中是否有那八个士兵。但我想是会有的。

我还想告诉您很多故事，但是怎么办呢？信已经写得很长了。知道您想向我们了解的不是数字的总结，而是真人、真事。而这里的真人、真事怎样能说得完呢！因此，在结束这封信之前，让我讲几个关于我们南方的文艺工作者的有趣的故事，这也是咱们"文艺家庭"里的故事。

B省文艺大会闭幕的那天，省文工团为当地同胞表演了一场。草地当舞台，观众席地而坐。正在演着改良戏《福绥老人的心愿》时，敌人便打过来二十多枚炮弹，它们就在距舞台一百多米的地方爆炸，弹片在头顶上吱吱地乱飞。三千多名观众和演员都卧倒在地上或偷跑入战壕……说老实话，当时我很担心！一刻钟后，情况平静了，大家又集合起来。剧团的负责同志担心群众的情绪受到影响，便问道：

"乡亲们！咱们还演不演了？"

群众大声喊道：

"演，看到够为止，到天亮也可以，我们不怕大炮呀！"

就这样，演出又继续。最受罪的是演员，表演间断之后，他们得重新回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里。但是演员们很快地就演起来了。我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感动。我们的群众真是伟大，我们的队伍真是伟大，这一点中国和越南都是一样的。我

还没有告诉您，在演出中有许多老大娘跑上舞台把钱送给表演得好的演员的事情。剧中有一个小姑娘，因为把父母亲留着支援解放南方的钱弄丢了正在发愁。看到这里，台下有一位大娘便说道：

“别哭啦，来，大娘给你钱垫上，以后可要小心呀，孩子！”

演员不能离开岗位去接钱，只好让团长同志出来代收了。当老大娘们的心与舞台上的生活、也是自己亲切的生活起着共鸣时，那谁还能说服她们遵守秩序呢……

敬爱的同志们！

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战争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得到五湖四海千千万万的同志和朋友们的支援才取得的，因此，就是取得多么大的胜利，我们从不感到满足……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解放了的我们的越南南方的土地上，迎接您及中国文艺界的其他朋友们。到那一天，就像文工团的一位小同志所讲的，我们要请你们畅饮南方的甜椰汁，为你们表演中国和越南的舞蹈，唱我们两个兄弟国家的战斗和胜利的歌曲。我们将通宵达旦地围着茶桌痛饮我们家乡的散发着香气的布劳茶——越南南方著名的香茶，朗诵我们的诗文。我们还要叙述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战友间、同志间的故事。

还有一个月春天就要降临。上海可能还是正冷的时候。我希望这封信将在春天里把南方的温暖带给你和其他的中国朋友。

1965年1月10日。

谈自己的创作

《谈自己的创作》，曾辑入一九六二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巴金文集》第十四卷。

小　序

我幼年时候学习作文，老师不惮烦地教导我，文章应当怎样开头，如何结束。中外古今的文学巨匠常常苦口婆心地劝告人，尽可能少写废话，要写得短，写得深，写得精。这些都是至理名言。

可是轮到我来谈自己的创作，我却拉拉杂杂地写了一大堆。自己出了题目，写起来，遣辞造句，开头结尾，全不讲究；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有话便长，无话就短；从不该起头的地方开始，在不应结束的地方收场。我不是一个文章家，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真羡慕那些能够做到'惜墨如金'的人。"我有时的确想向他们学习。然而我常常不能控制自己。在过去那些黑暗的年代里，我有话讲不出来，有感情无法宣泄，而心中的爱憎必须倾吐，因此我不能不多写，越多越好。我在旧社会里整整写了二十年，练就了我这支爱唠叨的笔。真是积习难改，拿起笔，就像扭开了龙头，水荷荷地流个不停，等到我把龙头关上，水已经流了那么一大摊。

我这十篇"漫谈"，就像是这样流出来的十摊水。严格地说，它们不会有多大的用处。倘使没有人管它们，过一个时候，它们连一点痕迹也留不下来。不过要是有人拿坛坛罐罐

一类的东西放到龙头下面接住水，也许可以派一点点用场。

我称后面的十篇文章为“漫谈”，我还给集子起了一个名字：《谈自己的创作》。它们倒是名副其实的漫谈。我在这些“漫谈”中曾经坦率地承认：我在向我的读者讲“私话”，告诉他们这些作品是怎样写成的。我还说：“我好像在对亲近的人谈个人的秘密。”我刚巧在最近编完了我的《文集》，便把这本《谈自己的创作》当作我过去作品的注解，附印在《文集》的最后一卷中，不另印单行本。

流在地上的水到时候自己干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倘使有人能用什么东西留起一点一滴来，我将会感到十分荣幸。

1961年11月29日。

谈《灭亡》*

每一个作家走向文学，都有他自己的道路。在发表《灭亡》之前，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作家"。《灭亡》是我的第一本小说。我开始写它的时候，我并没有写小说的心思。当时我不是一个文科学生。我的大哥希望我做工程师，我自己打算在巴黎研究经济学。结果我什么也没有学，连法文也不曾念好，只是毫无系统地读了一大堆书，写了一本《灭亡》。

我动身去法国的时候，的确抱着闭户读书的决心，准备在课堂上和图书馆里度过几年的光阴。可是我刚刚在巴黎的旅馆里住下来，白天翻看几本破书，晚上到夜校去补习法文，我的年轻的心就反抗起来了：它受不了这种隐士的生活。在这人地生疏的巴黎，在这忧郁、寂寞的环境，过去的回忆折磨我，我想念我的祖国，我想念我的两个哥哥，我想念国内的朋友，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斗争和希望，我的心就像被刀子割着一样，那股不能扑灭的火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每天晚上十一点以后，我从夜校出来，走在小雨打湿了的清静的街上，望着巴黎的燃烧一般的杏红色天空，望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艺月报》四月号。

着两块墓碑似地高耸在天空中的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想起了许多关于这个“圣母院”的传说。我回到旅馆里，在煤气灶上煮好了茶，刚把茶喝完，巴黎圣母院的悲哀的钟声又响了，一声一声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在这种时候，我实在没法静下心来上床睡觉。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来，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我写的不能说是小说。它们只是一些场面或者心理的描写，例如汽车轧死人，李冷遇见那个奇怪的诗人等等。我下笔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写出这样的东西，但是它们却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有时写了又涂掉，有时就让它们留下来。在一个月中间我写了后来编成《灭亡》头四章的那些文字。它们原先只是些并不连贯的片段，我后来才用一个“杜大心”把它们贯串起来。我以前见过汽车轧死人；我在成都听见别人讲起土匪杀死农人的事，曾经想根据故事写一首诗，苦思了好久，只写出一两段再也写不下去，就丢开了；我住在上海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我无意间把这些全写下来了。倘使我没有见过、听过、经历过这些，我一定会写出别的东西。至于杜大心失恋的故事，我在成都不止一次地听见人摆过这样的“龙门阵”，而且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更不会缺少这种“古已有之”的悲剧。

以后我又写了像《爱与憎》(第十章)和《一个平淡的早晨》(第五章)那两章。我是在暴露我的灵魂，倾吐我的苦闷，表示我的希望。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经历，譬如在广元县衙门里养大花鸡；也有我自己的爱与憎的矛盾，我在跟我自己辩论。

那些日子正是萨珂(N. Sacco)与樊塞蒂(B. Vanzetti)的案件①激动全世界人心的时候。这两个意大利工人在美国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他们在六年前受到诬告被判决死刑，上诉八次都遭驳斥。那个时候刚刚宣布了最后的决定——七月十日在电椅上烧死。整个巴黎都因为这件事情骚动起来了。我住在拉丁区一家旅馆的五层楼上，下面是一条清静的小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咖啡店门口就贴了"死囚牢中的六年"的大幅广告，印着"讲演会"、"援救会"、"抗议会"的开会日期。报纸上每天也用不小的篇幅刊载关于他们的事情，他们写的书信和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的请求重审或减刑的声请书。工人们到处开会发出抗议的吼声，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示威。我有一天读到了樊塞蒂自传的摘录，有几句话使我的心万分激动：

>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我不再徒然地借纸笔消愁了。我坐在那间清静的小屋子里，把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全写在信

---

① 我回国后为这个案件写过两个短篇：《我的眼泪》和《电椅》。

纸上，好像对着一个亲人诉苦一样，我给美国死囚牢中的犯人樊塞蒂写了一封长信。信寄到波士顿，请萨樊援救委员会转交。信寄发以后我也参加了援救这两个意大利工人的斗争。报纸上不断地刊出从全世界各地发出来的援救萨樊的呼声，不少的妇女和儿童都给报纸写了动人的信。巴黎的每个区都经常举行"抗议会"。然而美国"民主"政府的态度始终非常强硬。我怀着恐惧等着七月十日的到来。

一个阴雨的早晨我意外地收到了从波士顿寄来的邮件：一包书和一封信。信纸一共四大张，还是两面写的。这是樊塞蒂在死囚牢中写的回信。他用恳切的话来安慰、勉励我，叫我"不要灰心，要高兴"。他接着对我谈起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他谈到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别的许多人。他说他应当使我明白这些，增加我的勇气来应付生活的斗争。他教我：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

我把这封信接连读了几遍，我的感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马上写了回信去。这几天里面我兴奋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又在练习本上写了一点东西，那就是《立誓献身的一瞬间》(第十一章)了。

不久我因为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到玛伦河畔一个小城去休养，后来又在中学校里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那个"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

"巴"字。还有一个姓桂的同学跟我在一起学了好几个月的法文，后来到另一个地方去进大学。有一次他在来信中写了他认识一个法国少女的事。以后他又谈了一些。《一个爱情的故事》就是根据他的来信写成的。那是第二年（即一九二八年）的事情了。他住在学校里的时候，跟一个普通的女朋友通过几封信。那个女同学在里昂念书，名字叫吕淑良。我喜欢这个名字。我就根据它给我的女主人公起了名字：李淑良。后来我才把淑良改成了静淑。

我在那个小城里得到樊塞蒂的第二封信。他开头就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他仍然用乐观的调子谈到未来的变革和人类的前途。信是七月二十三日写的。他们两人的刑期已经被麻省的省长推迟了一个月。在八月十日的晚上我焦急地等待着从美国来的消息。那个小城里没有晚报。我除了三四个中国同学外就没有一个熟人，我没法打听消息。我坐在书桌前翻读旧报纸。我看到前些天法国援救会的两个电报。一个是给萨柯的："刚刚读了你给你小女儿的告别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动了。人家读了这封信以后还能够杀你吗？我们爱你，我们怀着希望。"另一个电报是给樊塞蒂的："我们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不相信美国就会立在反对的地位。你们会活下去。你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把你抱在怀里，并且替我们吻你。"我的心好像给放在火上煎着一样，我没法安静下来。我又找出练习本，在空白页上胡乱地写下一些句子，我不加思索地写了许多。有些字句连我自己也认不清楚，有些我以后就用在我的小说里面，《灭

亡》第十三章中“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来”的问题，第二十章中“爱与憎”的争论等都是后来根据这些片段重写的。

八月十一日下午我读到当天巴黎的日报，才知道昨夜临刑前二十六分钟麻省省长又把两个意大利工人的死刑执行期推迟了十二天。报纸上更掀起了抗议的高潮。在这个小城里我看不到较大的骚动。可是巴黎的报纸都把萨樊事件当作头条新闻，而且用整版的篇幅报导有关他们的消息和文章，《人道报》上还发表了大幅的漫画。二十二日的夜里我不再像十二天以前那样地痛苦了。我相信美国政府不敢杀死这两个人。我想他们很可能用缓刑或减刑的办法来缓和全世界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愤怒，因为在这些日子里正如一家美国的周报所说："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挂起美国国旗，就得找人保护。"在世界各大城市的美国使馆或领事馆都受到示威群众的包围。

但是我完全想错了。波士顿的午夜是巴黎的早晨五点钟。二十二日午夜萨柯和樊塞蒂的死刑是否准时执行，二十三日的巴黎日报上来不及刊登消息。巴黎的几家报纸在二十三日都出过号外，报导那两个人上电椅的情况。可是我住在小城里，一直到二十四日下午才在当天的巴黎《每日新闻》上读到那个可怕的消息。我第一眼就看到这样的句子：

> 罪恶完成了。……两个无罪的人为着增加美国官僚的光荣牺牲了……

同时我收到一个朋友从巴黎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写着：

“两个无罪的人已经死了！现在所等的是那有罪的人的死！我告诉你：不会久候的！”

合法的谋杀终于成功了（二十六年后罗森堡夫妇的事件便是萨樊事件的翻版）。我所敬爱的人终于死在电椅上面了。我不能够像往常那样地工作。我绝望地在屋子里踱了半天。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住在中学校饭厅楼上一个大房间里面。学校还没有开学，整个学校里除了一对年老的门房夫妇外，就只有四五个中国同学。我写了一天的信，寄到各处去，提出我对那个“金圆国家”的控诉，但是我仍然没法使我的心安静。我又翻出那个练习本把我的心情全写在纸上。一连几天里面我写成了《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和《决心》三章，又写了一些我后来没有收进小说里的片段。

当时我除了念法文外，已经开始根据英译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说老实话，这本书我自己也看不大懂，尤其是下半部。为了翻译它，我读过一些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后来也翻看过斯宾诺莎、康德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不用说也没有全看懂）。而且我还读了《新旧约圣经》。我做的是硬译的工作：就是按照原文，按照外国文文法一个字一个字地硬搬。这种工作容易使我的脑筋变迟钝，并且使我的文字越来越欧化。我实在没法再写小说之类的东西了。

到第二年我结束了翻译工作以后，脑筋得到了解放。我有时间读小说，读诗，读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了。我仍然住在玛伦河畔那个小城里，过着安静的生活。有一天我接到了我大哥的来信。他的信里常常充满感伤的话。他不断

地谈到他的痛苦和他对我的期望。我们间的友爱越来越深，但是我们的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我觉得我必须完全脱离家庭，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我终于要跟他分开。我应当把我心里的话写给他。然而我又担心他不能了解。我又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想来想去，我想得很痛苦。但是最后我想出办法来了。我从箱子里取出了那个练习本（可能是两本或三本了），我翻看了两三遍。我决定把过去写的那许多场面、心理描写和没头没尾的片段改写成一部小说，给我的大哥看，让他更深地了解我。就像我后来在《灭亡·自序》上所说的那样："我为他写这本书。我愿意跪在他的面前，把书献给他。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的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我就十分满足了。"

这样我就认真地写起小说来了。我写了《李冷和他的妹妹》（第六章），我写了《生日的庆祝》（第七章），我写了《杜大心和李静淑》（第九章）。每天早晨我常常一个人到学校后面那个树林里散步。林子外是一片麦田，空气里充满了麦子香，我踏着柔软的土地，听着鸟声，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小说中的世界，一些人物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他们帮助我想到一些细小的情节。傍晚我陪着朋友们重来这里散步的时候，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散步回校，我就坐在书桌前，一口气把它们全写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功夫我写完了《灭亡》的其余各章。这样我的小说就算完成了。在整理和抄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又增加了一章《八日》（第十六章），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

段。我用五个硬纸面的练习本抄写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我还在前面写了一篇自序和"献给我的哥哥"的一句献辞。自序上提到的"我的先生"就是樊塞蒂。他坐上电椅以后说过好几句话，最后的一句是："我愿意宽恕那些对我不好的人。"所以我在序文里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在电椅上他还说他愿意宽恕那些烧死他的人。"我自然不能同意他的这种"大量"。

这篇序说明了我的小说的主要内容。我写小说的时候，我自己的思想上、生活上都充满了矛盾：这就是爱与憎的矛盾，思想与行为的矛盾，理智与感情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我的身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后来回忆我的创作生活的时候，我还说："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不说"斗争"，而说"挣扎"，这就说明我没有力量冲破那个矛盾的网，自己一直在两者之间不停地碰来撞去，而终于不能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一下子彻底解决。我为了要求我的大哥更深地了解我起见，我在小说里毫无隐瞒地暴露了我自己的全部矛盾。我在序上说"横贯全书的悲哀是我自己的悲哀"，这是真话。《灭亡》不是一本革命的书，但它是一本诚实的作品。它没有给人指出革命的道路，但是它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

我专为我大哥写书，这不是第一次。以前在国内就写过几本游记。在赴法途中写的《海行杂记》，也是写给他和三哥两个人看的。在大哥自杀以后，我才向嫂嫂要回《海行杂记》的原稿整理出版。但是《灭亡》写好以后，我并没有把原稿直接寄给大哥，却把原稿寄给了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

友，因为我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打算自己花钱把小说的稿本印成书，寄给我的大哥。我估计印二三百本，并不要花多少钱，我只要翻译一本书就可以换来全部印费。稿本寄出以后，过了两个月，我才得到朋友的回信。他说，稿本收到，他正在翻阅。当时我已经在作回国的准备了，也就不曾去信催问。直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那个朋友才告诉我他把我的小说介绍给《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①、郑振铎两位前辈，他们决定在《月报》上发表它。《灭亡》的发表似乎并没有增加大哥对我的了解，可是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灭亡》当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且我的写作方法也大有问题。这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位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其实电影导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些剪接修补的工作。我以后写别的小说，不论是短篇、中篇、长篇，有的写得顺利，几乎是一口气写完，有的时写时辍，但它们都是从开头依次序写下去的。例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就是一口气写下去的。这部作品的初稿我曾经投给《小说月报》，但很快就被退回，说是写得不好。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死去的太阳》的失败并非由于一气呵成，而是生活单薄。更重要的原因是：硬要写小说，这里面多少有点为做作家而写小说的味道了。这个中篇初稿的题名是《新生》，退回以后，我就把它锁在

① 《小说月报》的主编是郑振铎同志，一九二八年他出国的时候由叶圣陶同志代理他的职务。

抽屉里，过了几个月偶然想起，拿出来改写一遍。那时我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刚出版，我就引用了《丹东之死》中的一段话放在小说前面，根据这段话改写了小说的结尾，而且把书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阳》。但是即使做了这些加工的工作，我仍然没法给我的失败的作品添一点光彩。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但这都是题外的话了。

《灭亡》出版以后我读到了读者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也常常在分析自己的作品。我常常讲起我的作品中的"忧郁性"，我也曾虚心地研究这"忧郁性"来自什么地方。我知道它来自我前面说过的那些矛盾。我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里也有相当浓的"忧郁性"。倘使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火热的实际斗争，我便不会再有矛盾了，我也不会再有"忧郁"了。《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在他的遗著中有着这样的一句话："矛盾，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他的朋友李冷说："他的灭亡就是在消灭这种矛盾。"（见《新生》）杜大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灭他的矛盾，所以他选择了死亡。他疲倦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他觉得"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他自然地会采取用暴力毁灭自己生命的一条路：报仇、泄愤，杀人、被杀。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浪漫的革命家"，他只是一

个患着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我写杜大心患肺病，也许因为我自己曾经害过肺病，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动，容易愤怒。倘使杜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说找到了共产党，他就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最孤独的人"，他是在单独地进行绝望的斗争；他就不会"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因为孤独，因为绝望，他的肺病就不断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易激动，更容易愤怒，更不能够冷静地考虑问题。倘使有一个组织在领导他，在支持他，他决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感到绝望，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更不会用灭亡来消灭矛盾。

我不能说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作者和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杜大心是单独地在进行革命的斗争，我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写出杜大心这个人物来。要是我走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我就不会写小说，至少我不会写出像《灭亡》这样的作品。有些细心的读者，只要读过几本我的作品，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么东西。我自己也说过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事实上我缺少一种能够消灭我的矛盾的东西。我不断地追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我今天无法再讳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我在写《灭亡》以前和以后常常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时候我也说我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因为克鲁泡特金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赞成个人主义。但是我更喜欢说我

有我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过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几乎各人有各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很不容易认真地在一起合作，虽然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各尽可能、各取可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其实怎样从现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没有具体的办法。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去研究这样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真正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容。有少数人也承认阶级斗争，但也只是少数，而且连他们也害怕听“专政”的字眼。我讲的是那一个时期西欧的“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因为我过去接触到的，过去受过响影的都是这些外国的东西。我接受了它们，却不曾消化，另外我还保留而且发展了我自己的东西。这两者常常互相执制，有时它们甚至在我的脑子里进行斗争。所以我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无法解决。我坦白地承认我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我写作时常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我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而且说实话，我所喜欢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响的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人。凡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贡献出自己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爱。我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无政府主义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我也读过更多的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或别的革命者的书，例如《牛虻》作者丽

莲·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和小说《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尔的《回忆录》。我还读过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读了这许多人的充满热情的文字，我开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灭亡》里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① 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而且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高出我的《灭亡》若干倍。我记得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里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写科茹霍夫在刺杀沙皇之前向他的爱人(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

《灭亡》里面的人物并不多。除了杜大心，就应该提到李静淑和她的哥哥李冷，还有张为群和别的几个人。所有这些人全是虚构的。我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倾吐自己的爱憎，编造了这样的几个人。自然我在生活里也或多或少地看见过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们的服装和外形。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却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写了这样的人。"杀头的盛典"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见过绑赴刑场的犯人和挂在电杆上示众的人头。我也听见人有声有色地谈起刽子手杀人的情形。《革命党被捕》和《八日》两章多少有些根据。我去法国之前住在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一个弄堂里。我和两个朋友同住在三楼的前后楼。房东可能是旧政客或者旧军人，他和几个朋友正在找出路，准备招兵买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来的北伐军。不知道怎样，有

① 科茹霍夫：С. М. 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енский(1851—1895)著长篇小说"Андрей Кожухов"中的男主人公。

一天他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在华界被孙传芳的人捉去了，据说是去南市刻字店取什么司令的关防，给便衣侦探抓去的。他的妻子到房东家来过一两次，她是一个善良的年轻女人。她流着泪讲过一番话。后来房东一家人全躲到别处去了，只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不久我就在报上看到那位张先生被杀头的消息，接着又听说他在牢里托人带话给房东：他受了刑，并未供出同谋，要房东以后照顾他的妻子兄弟。过两天我就上船去马赛了。两三个月以后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联谊会或者这一类的地方看到几张《申报》，在报上又发现那房东的一个朋友也被孙传芳捉住杀头示众了。孙传芳退出上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头。要不是接连地看到杀头的消息，我也不会想到写《杀头的盛典》。那位张先生的砍头帮助我描写了张为群的英勇的牺牲和悲惨的死亡。

关于李静淑我讲得很少，因为她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只见过她的外形、服装和动作。我指的是一个朋友的新婚的太太。我创造李静淑出来给我解决爱与憎的问题。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曾经同一位年纪较大的朋友辩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爱》一章中李静淑讲的一段话，就是根据他的来信写成的。

关于《灭亡》我已经讲了不少的话。我谈创作的过程谈得多，谈人物谈得少。我在前面说过我创造人物来发泄我的感情，解决我的问题，暴露我的灵魂。那么我在小说里主要地想说明什么呢？不用说，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来。贯穿全书的响

亮的呼声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所以《灭亡》并不是一本悲观的书，绝望的书。不管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多大，作品的缺点有多少，《灭亡》决不是一本虚无主义的小说，否定一切的小说，也不是恐怖主义的小说。

《灭亡》这个书名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歌颂。《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书名是从过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或者歌词）来的。这八句关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的诗决非表现"革命也灭亡，不革命也灭亡"的虚无悲观的思想。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①]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погибель）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②]而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我这几句改译的诗不仅歌颂了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辛，也歌颂了为俄国民主革命英勇战斗的十二月党人，也歌颂了一切"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

1958年3月20日。

---

① 雷列叶夫（К.Ф.Рылеев，1759—1826）：十二月党五烈士之一，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处绞刑。

② 见雷列叶夫著叙事诗"Найливайко"第八篇《纳里瓦依科的自白》。

谈《新生》及其它

我一九二八年八月初在法国沙多-吉里城邮局寄出《灭亡》的原稿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完全忘记了写小说的事情。当时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本地中学里过暑假。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了。那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比我来得早。另一个朋友是山西省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上等玻璃灯罩工厂里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整个学校里冷清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看门人老古然和他的妻子。古然夫人早已过了六十，可是身体健康。假期中她还要为我们准备每日的三餐。我们在传达室（也就是古然夫妇的小客室）里坐得舒适，吃得愉快。那一对整天劳动的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待我们十分亲切，就像待亲人一样。从巴黎来的山西朋友不曾见到我的小说。学哲学的朋友却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我最初在袁润身教授的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见才改成“约会”的。一年来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朗读中国古诗，陆游的《剑南诗稿》经常在他的手边。我和他都住在大饭厅的楼上，我住的是一个较大的房间。山西朋友则住在学监宿舍旁边的阁楼上。学校前面有一个大院子。后面也

有一大块空地，种了不少的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整个学校里大概只有我们五个人。校长全家到别处去了。总学监住在这个小城里，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来看看。我们对他没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狮子》里的总学监。那个中学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学。我初期的好几个短篇像《洛伯尔先生》等等都是以这个可爱的又安静又朴素的法国小城作背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我返国后多年回想起来，还有如在眼前的感觉。

在那三四个星期里面，我们起得早，睡得早。早晨，天刚亮，我们三个中国人先后走到学校后院空地上，在那里散步聊天。吃过早饭，我们便走出校门，有时走到古堡脚下，有时在街上逛逛，有时顺着河岸，走到田畔小路，有时便走上古堡，在那里喝瓶啤酒……我们回到学校以后，便回各人的房间，看书写信。晚饭后我们又到河边田畔，散步闲谈，常常谈到夜幕落下、星星出现的时候。路上我们又会遇到一些熟人，互相道一声“晚安”。我们走到校门，古然夫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听到她那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那位好心的贫苦老太太，她今天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我写到她的姓名，还像听见她的声音，见到她的面颜，虽然有些模糊了，但是“麦歇李”① 这两个字（两个法国字）和满是皱纹的十分和善的瘦脸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里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

① 麦歇李：即“李先生”。

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桥头一家花店和正街上一家书店是我们一年来常去的地方。我和那位安徽朋友过一些时候便要去买一束花，或者买几本书。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我们也要到花店买花束送礼。校长姓“赖威格”，他那个十二岁的女儿叫“玛丽-波尔”。我后来在短篇《老年》里借用过校长的姓，还把“玛丽-波尔”这个名字写进了另一个短篇《洛伯尔先生》。书店里有些什么人，我记不起来了。花店里有一个十七岁的金头发、苹果脸的姑娘，名叫曼丽，是我们的熟人。我们走过花店门前或者在路上遇见她，她总要含笑地轻轻招呼一声："先生，日安"，或者“先生，晚安”。

在巴黎，我们作为中国人不止一次地遭受人们的白眼。可是在这个小城，许多朴实、善良的人把我们看作远方来的亲戚。我为了那一个时期的安静而愉快的生活，至今还感激、怀念那些姓名不曾上过报章的小人物。在那种友好的气氛中，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又在正街格南书店里先后买到十本硬纸面的练习簿，用整整五本的篇幅抄录了它。《灭亡》的原稿早已毁掉，可是那样的练习簿我手边仍有两册，我偶尔翻出来，它们仿佛还在向我叙述法国小城生活的往事。

我在沙多-吉里最后两三星期安静的日子里，看了好些小说，我在这里不用“读”，却照我们的老习惯用个“看”字，因为我当时的确是匆匆地翻看，并非逐字细读。此外我和那两个中国朋友在一起聊天，虽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小说。那个山西朋友在法国住得久，看过不少的

戏，他还向我们介绍那些戏的内容。有一次他谈起根据左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酒馆》，他讲到柔尔瓦丝的丈夫，那个盖屋顶的锌板匠，听见女儿在人行道上叫"爸爸"，失脚从屋顶上摔下地来，他讲得有声有色：幕怎样轻轻地落下，报告灾祸的音乐还在观众的心上回响……好像那个惨剧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我以前读过两三本左拉的小说，这时又让朋友的谈话引起了兴趣。下一天我就到格南书店去买了《酒馆》。我在饭厅楼上我那个房间里看完了它。我接着还看过左拉的另外两部作品《萌芽》和《工作》(那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柔尔瓦丝的两个私生子)。因此我一连几天向朋友介绍左拉的连续性的故事。安徽朋友不久以前才读过我的小说稿本，便带笑问我，是不是也想写有连续性的小说。他也许是开玩笑，然而这对我却是一个启发。这以后我就起了写《新生》的念头。故事倒还不曾认真考虑，书名却早想好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那么《灭亡》之后接着出现的当然是《新生》。我在那些日子里想来想去也不出以上的范围。《新生》里应当有些什么人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是少不了的，那是李静淑，我在《灭亡》的最后就预告过她的行动了。

后来我从沙多-吉里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又看了好几本左拉的小说，都是收在《卢贡-马加尔家族》这套书里面、讲两家子女的故事的。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多读了几本小说，我的手就痒了，我的脑子也痒了，换句话，我也想写小说了。在那个短时期里，我的确也写了一

点东西，它们只是些写在一本廉价练习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春梦》写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写李静淑的双亲。我在廉价练习簿上写的片段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我后来在马赛的旅馆里又写了一些，在海轮的四等舱中我还写了好几段。这些细节中有一部分我以后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后加以修改，作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珏搬到城外生产、觉新在房门外捶门的一章。照我当时的想法，杜大心的父亲便是觉新一类的人，他带着杜大心到城外去看自己的妻子，妻子在房内喊"痛"，别人都不许他进去。他不知道反抗，只好带着小孩在院子里徘徊；他的妻子并不曾死去，可是他不久便丢下爱妻和两个儿子离开了人世。

我在十月十八日早晨到了马赛，准备搭船回国，下了火车赶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海员罢工、往东方去的船一律停开。我只好到一家旅馆里开了房间，放下行李，安静地住了下来。这样一住便是十二天。马赛的生活我已经老老实实地写在短篇《马赛的夜》里面了。连海滨的旅馆和关了门的中国饭馆也是真实的。我在贫民区里的中国饭馆吃饭，在风景优美的"美景旅馆"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读（其实是"看"）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整套书中的二十部长篇我先后读过了一半以上，在马赛我读完了它们。我不相信左拉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的写法，可是他的小说抓住了我

的心，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我不仅一本接一本热心地读着那些小说，它们还常常引起我的“创作的欲望”。在等待轮船的期间，我只能写一些细节或片段，因为我每天必须把行李收拾好出去打听消息，海员罢工的问题一旦解决，我就得买票上船，否则我会在马赛老等。然而我的思想并不曾受到任何的限制。我写得少，却想得多。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虽然我看到海的各样颜色，听见海的各种声音，可是我的思想却跟着我那几个小说中的人物跑来跑去。我的思想像飞鸟一样，在我那个隐在浓雾里的小说世界中盘旋。我有点像《白夜》①里的“梦想家”，渐渐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世界。《春梦》等四本小说的内容就这样地形成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

但是我回国以后，始终没有能把《春梦》和《一生》写成。我不止一次地翻看我在法国和海轮上写的那些片段，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完全丧失了信心。《灭亡》的发表也不能带给我多少鼓励。我写不好小说，便继续做翻译的工作。《伦理学》的后半部教我伤透了脑筋，我咬紧牙关拚命硬译，越译越糊涂，

① 《白夜》：中篇小说，旧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

但是总算把它译完了。我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革命者的回忆录》和斯捷普尼雅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这两本书不像《伦理学》那样难解释，书中热情的句子和流畅的文笔倒适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译时一再揣摩、体会，无意间受了一些影响。我还从世界语翻译了意大利亚米契斯和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和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总之，我还不曾灰心断念，我借翻译来练习我的笔。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大哥来上海，我和他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愉快的生活。他对我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却表示了更大的友爱。他常常对我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许多往事。我有一次对他说，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写一部《春梦》。他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不置可否。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过了几个月我写信给他又提起《春梦》。我手边还有他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四日寄来的回信，他很坦白地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等书报读过以后，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他没有想到我写的小说同他想写的并不一样：他想谴责的是人；我要鞭挞的是制度。他也没有想到我会把他老老实实地写进我的小说。我更不会想到他连读这部小说一行一字的机会也没有。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我的小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我把《春

梦》的名字改成了《激流》(一九三三年我把小说交给开明书店印单行本的时候，才改用《家》作书名)。第二天下午我得到了报告他去世的电报，原来他死在《激流》开始发表的那一天，当时我的小说只写到第六章。我每隔一个星期向报馆送一次稿；我还不曾想好整个的结构，脑子里更没有那许多细节。说实话，我还有一些顾虑。可是大哥意外地死了，我的主人公死了，我不用害怕我的小说会刺伤他，或者给他带来他所忍受不了的悲痛的回忆……。不久我读到了成都寄来的我大哥的遗书，才知道他服毒自杀。我想起一年前他来信中那一段话："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的人，奈何。……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你却忘记兄了，唉！……"我的悲愤更大了，我的悔恨也更大了。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现在太迟了！我不能把他从坟墓里拉出来了。我只好把我的感情、我的爱憎、我要对他讲的话全写到我的小说里去。

《新生》的写作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我开始写《新生》比写《激流》早几个月，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年底或者一九三一年年初；我结束它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也比结束《家》早些。那时我早已抛弃了写五部连续的长篇小说的计划，而且把从法国带回的廉价练习簿中一部分可用的细节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了。《新生》的内容、结构以及人物也逐渐地形成而固定了。我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我选择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灭亡》里已经预告了李静淑

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动它们，写李静淑附带写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笔可以写出两个人的言行同他们的思想活动，对于像我这样学习写作的人，的确有不少的便利。况且我前不久有过失败的经验，我指的是《死去的太阳》，我写完它，自己不但感到疲倦，还有失望的情绪，这并非由于小说的调子低沉（我在小说初稿的结尾还说："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以后，太阳又会以同样的活力新生于人间"），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力、无才来适当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我把那个中篇小说的初稿题作《新生》，也可以说明我当时的心境。我完全失掉了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我连李静淑的故事也放弃了，我想拿那个失败的作品来结束我的文学生活。

不用说，这只是一时的沮丧。过了若干时候我又有了拿笔的勇气。我先写了几个短篇，后来我就用日记的形式，让自己作为李冷写起《新生》来。因为我打定了主意要写主人公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大转变，便不得不先教和平主义者的李冷转变为否定一切的个人主义者。虽然杜大心的惨死让李冷受到很大的刺激，但是这个转变总有些勉强。同样，写另一个女主人公张文珠由《灭亡》里的陈太太转变而来，也显得不自然。张文珠的转变本来是多余的，倘使把她作为新出场的人来写可能更好，我还可以在她的身上加一些色彩。至于我那样写法，也不过是加强人物同前一本书的联系而已。

我写《新生》，一共写了两遍。第一稿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写完的。我九月里把稿子送到小说月报社去，后来见到一

九三二年一月号《小说月报》的“目录预告”，知道我的小说在这期《月报》上开始连载。我听见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在装订中，却没有想到“一·二八”的炮声一响，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厂房全给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和炸弹毁得一干二净。当天的号外上就刊出这样的消息：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我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我在一九三二年七月，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功夫，第二次写完了《新生》。这一次我是一口气写完它的。我从早写到晚，什么事都不做。第一稿的内容和文字还很清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必须趁我不曾忘记的时候，把它们记录在纸上。我写得快，因为我的脑子里装满了东西，用不着我停笔苦思。我的确写得痛快，因为那许多东西自己要从我的脑子里跳出来。我写第一稿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我当初写得很吃力，写得很痛苦。

《新生》的第一稿和第二稿大致相同，但也不能说没有差别。我凭着记忆重写十万字的旧作，我不可能把行行字字安排得跟过去一模一样，况且时间隔了一年多，我的环境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写第一稿的时候，我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写第二稿的时候，我已经搬进当时的“法租界”，住在环龙路花园别墅我舅父家的二楼，脑子里还装了不少日本军人的暴行。第一次，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自己的心、挤自己的血一样。有些时候我仿佛在写自己的日记，虽然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设身处地替李冷写他的见闻。

我说过《新生》第一稿在商务印书馆的大火中全部焚毁。可是仍然有两三节给保留了下来。那两三节是在全稿完成以前由我摘出来作为随笔或者作者的日记在刊物上发表了的。那是我在北四川路和顾家宅公园①里的见闻。在李冷的日记里的确有我自己的东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呼声。我在那个时候写的《复仇·序》中第一句便是："每夜每夜我的心痛着"（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新生》里面，李冷在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说："我快要被自己毒害到不能挽救的地步了。"在十九日他又写道："我真的被个人主义毒害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文珠也批评过李冷的"空虚的个人主义"。我并不是李冷那样的个人主义者，但是我常常像他那样感到"孤寂"和"空虚"，因为我正像他那样有很多的矛盾。其实他的"否定一切"和"个人主义"也是假的。他在外表上好像很倔强，可是心里空得很。除了渺茫的理想外，他还有一种对什么都不相信的"怀疑"。这种怀疑可能影响他的行动。不过我想这样说，要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架子支持着他，他早就跟着妹妹李静淑和爱人（未婚妻）张文珠走新的路了。我也见过有人一直顽强到底，逐渐走上毁灭的路，当然不仅是由于"怀疑"和"空架子"，同时也因为替自己考虑太多。我们那一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都或多或少地跟个人主义有关系。我当然也不是例外。我向往革命，而不能抛弃个人主义；我盼望变革早日到来，而自己又不去参加变革；我

① 顾家宅公园：即现在的复兴公园，当时一般人叫它做"法国公园"。

追求光明，却又常常沉溺在因怀念黑暗里冤死的熟人而感到的痛苦中；我大声嚷着要前进，过去的阴影却死死地把我拖住……其它种种自己克服不了的内心的斗争、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等等，我也不想在这里提说了。我只想提一下，那几年中间我不但深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我还沉溺在骨肉的感情里面，个人的悲欢离合常常搅乱了我的心。我前不久在旧书中找到了两页残信，那是我从前寄给我大哥、在他死后又回到我手里来的旧信的极小部分。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整理《海行杂记》的时候我把那些旧信全撕毁了，不知道怎样却留下了这两页。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我刚到巴黎不久寄出的信上有这样的话：

……我永远是冷冷清清，永远是孤独，这热闹的繁华世界好像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大哥！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的洋、高的山而达到你的耳里么？窗外永远只有那一线的天，房间也永远只是那样的大，人生便是这样寂寞的么？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的。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从上海寄出的信上，我又写了如下的话：

这几年很少哭过的我今天却流了眼泪了。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离开了你。一只小小的木船载着我们四个人向外滩码头划去。蓝空中有几颗明星，凉风吹动我的衣服。

前面是万盏灯光的上海，后面是载着你们的"其平"。我离你愈远了。这时多年前的旧事一齐涌上心头。……你的流着泪的脸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上码头时，分明四个人都上了岸，我却东张西望，寻找你在哪里。"大哥，这边走。"这句话几乎要说出口来，自己才陡然明白你不在上海了。一阵从来不曾感到过的凄凉侵袭过来，我觉得在这么大的上海市，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这几年来我在表面上似乎变得不像从前那样的孤僻了，其实在心里我依然造了一个囚笼锁住了自己。……

我不再抄下去了。今天我还珍惜这份感情，可是我不能不责备自己的偏执、软弱、感伤、孤僻和近视……我写《新生》第一稿的时候还没有能摆脱那种有时突然袭来的孤独、凄凉的感觉，我甚至还不曾打破那个囚笼。所以我能够那么有耐心地描写李冷的孤寂而痛苦的不正常的心境，我仿佛在受一次审问或者受一次考验，我又好像在解剖自己，看看自己身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总之，我绝不是冲锋陷阵、斩将搴旗的战士，也不是对症下药、妙手回春的医生。

我写《新生》第二稿的时候，刚从南方旅行回来，发表了《春天里的秋天》，"孤寂"和"空虚"的感觉已经开始减淡，过去二十八年的阴影也逐渐消失，而且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我要证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不能毁灭我的创造的冲动"；帝国主义的炸弹毁灭不了我的精力和作品。所以我当时兴奋多于痛苦，不吃力，却感到痛快。虽然前半部中仍然充满

阴郁的调子，但大半是过去心境的追忆和旧日文字的默写，我脑子里常常响着一个声音，就是我在《春天里的秋天·序》中说的："这应该终结了"。"这"字指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在那篇序文的结尾甚至说："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我控诉'。"我这样说，未免太狂妄。我除了一管幼稚、无力的秃笔，什么武器也没有，又不曾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且整天关在屋子里写文章，不参加实际的斗争，我怎么能够损害我的敌人呢？我当时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我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自己的矛盾，反而放任矛盾发展下去。我不断地说，我要放弃文学生活（写作的确带给我不少的痛苦，像我在《灵魂的呼号》中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反而捏紧笔让自己越陷越深；我为"在白纸上写黑字廉价地浪费了年轻的生命"而感到不幸，而不断地诉苦，可是我反而日也写、夜也写，愈写愈多，好像一旦放下笔我的生命就会从此完结。我写完《新生》第二稿后两个多月，便写了像《灵魂的呼号》那样的诉苦文章。《新生》的第二稿里当然也有我自己的那些矛盾。不过倘使我的记忆力不算太坏，那么《新生》第二稿中阴郁的调子比第一稿中的淡了些；第二稿的字数也稍微多了些，大约增加了万把字罢。全书一共三篇，第一篇加了些，第二篇减了些，第三篇只有一句话，还是从《约翰福音》中引来的，因此不增也不减；至于增减了些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现在更说不上来了。

我再仔细一想，第二篇中减少的可能是李冷在禾山牢房里回忆往事的片段，这不是我有意删去的。我记得我曾经在

一篇文章里说过，《新生》的第二篇是根据一个朋友的日记写成的，这是真话。我写第二稿的时候，那本狱中日记还在我的手边，可是后来却找不到了。我不知它是在我几次迁居中遗失了，还是朋友把它拿了回去，因为那位朋友并不曾遭枪决，他让熟人花了点钱保释出来了。我把朋友的经历借给李冷，但是我还得把一、二两篇连接起来，把人物的性格统一起来，因此我虽借用了一些事实，却无法借用文字，我还得加上李冷自己的东西，回忆往事的片段便是这样地加上去的。这种地方可多可少，我第一次从容地执笔，构思的功夫较多，便写得长些；第二次我一口气写下去，当然容易跳过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但是当时如果没有朋友的日记，我绝不可能想到资本家勾结军阀所干的杀害工人的勾当和在禾山进行的事情。这些事实在第二稿中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连王炳这个人也是原来有的，我不过改变了他的姓名和结局。他既不曾越狱逃走，更没有中弹身亡。原来的日记里也有那个同情"犯人"的北方看守。"用驳壳枪打死三个，得赏十元"的话也是从日记里抄下来的。我增加的只是他奉命枪毙李冷的事情。我增加的还有李冷就义前那个"把个体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上……在人类的向上繁荣中找到个人的新生"的信念。这个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尽管我的作品里有多少"阴郁性"，尽管我常常沉溺在个人的感情里，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孤寂"和"空虚"，甚至发出"灵魂的呼号"，可是我始终不曾失去这个信念。因此我才没有让"绝望"和"悲观"压倒，我才相当健康地（我指的是身体，不是思想）活到现在。我在充满矛盾的痛

苦生活中不断地叫嚷："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凭借的便是这个。

我两次写了李冷的"新生"，我自己在感情上也得到一些鼓舞。但是我既不曾走到"灭亡"的边缘，也没有得到"新生"的光明。所以我一直在无数的矛盾中间苦苦地挣扎。《新生》以后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挣扎中写成的。例如一九三三年写成的《萌芽》(后来改名为《雪》)，这个中篇也暴露了我的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我在写作的时候，宣泄了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的确有鲜明的爱憎：一方面是作威作福、荒淫无耻；另一方面是辛勤劳动、受辱受苦。我当初写了两个不同的"结尾"：——一个是：工人的起义胜利了，曹科员夫妇搭火车离开了大煤山，男的说："我不能等着看他们灭亡……所以我走了……"；另一个是：工人的起义给镇压了，曹科员夫妇离开了大煤山，在车上男的说："倘使赵科员能够活起来……他又会责备我逃避现实了。他真倔强，临死……还说种子已经落在地下……。"在两个"结尾"中，女的都是"低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这几个月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怕的梦！……现在落雪了。'……"调子是同样地低沉。虽然我是在批评那一对改良主义的年轻夫妇，可是我无意地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向读者宣传了，可能有一些读者会受到感染。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刚才还说过我是相信未来的光明的。但是从当时到那未来的光明究竟要走多长的路？而且怎样才能够走到？我自已却茫然了。所以在我的作品中，黑暗给暴露了以后，未来的光明却被写成了渺茫的希望，当然不会有昂

扬的调子了。在《雪》的"结尾"中只有"种子已经落在地下"这句话。在《砂丁》的"结尾"里我也只写了"……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这样的希望。在《新生》第二稿之前完成的中篇小说《砂丁》的调子更低沉。砂丁们的静悄悄的惨死和少女的徒然的等待……，小说带给读者的，不是哀愁大于希望么？我说过，我也想过，我要用笔做武器，控告不合理的旧社会，可是在我不少的小说中我都充当了束手无策、摇头叹息的旁观者的脚色。

《砂丁》是根据一位朋友的谈话，加上我自己大胆的想象写成的。当时我没有到过云南的箇旧，也不曾看见一个砂丁。我那位朋友在矿上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亲眼看见砂丁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不能够在那个"人间地狱"里待下去，后来就跑到上海来了。他对我谈了不少，他谈的只是砂丁们的生活。故事是我编造的。我的同情，我的愤怒……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现代的奴隶"喊冤。我没有实际的生活，甚至连背景也不熟习，因此我只好凭空造出一个"死城"来。小说出版后二十八年，我才到了我从前写的那个城市和矿山。去年三月在箇旧迎接我的却是金湖上一片灿烂的阳光和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砂丁"已经成了历史上的名词，我只能在文化馆的"矿工今昔展览室"里看到我所描写的那种生活了。

我在《雪》里写的是浙江长兴煤矿工人的生活。背景是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却是编造的。我一九三一年初冬同一位朋友坐小火车到过那个矿山，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朋友在矿局当科长，我作为他的客人在矿山得到不少的方便。我整天

到处看看，还跟着一个机工下窑去待了两个多钟点。在这个窑里，一个多月前发生过一次爆炸事件，死了十五个人，要不是靠那位朋友帮忙，我一定下去不了。我并非去找小说材料，我只是想尝尝生活的各种味道，体验体验生活。过了两年我答应别人写一部连载小说，才想到了这个题材。我可以说是充分地利用了两年前的"生活体验"，我把知道的全写进小说里了。不知道的能避开就避开，没法避开的只好靠自己编造。我那个朋友早已离开长兴，我无法再到矿山去体验生活，连参观的机会也得不到，我怎么能够写得更真实呢？我平日同工人接触的机会极少，那一个星期中间虽然常同矿工们交谈，但是谈得不深，我又没有把谈话记录下来，两年后我要塑造工人的形象，当然连"貌似"也办不到了。小说最后矿工们的起义，不用说也是出自我的想象。不过当初我在矿山作客的时候，也曾听见朋友讲起两个月前（？）"土匪"打进矿局的故事。他说是"土匪"，又说里面有开除了的矿工。他们大清早冲进了局长（或者叫"经理"）的寝室，当着妻子的面打死了丈夫。我的朋友当时听到消息，打开房门，正要出去，看见有人奔向他的房间，马上退回关上房门，又拉过方桌将门抵住。外面的人推不开房门，也就走了。所谓的"土匪"在矿山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军队开到他们就散了，又说是远走了。我在矿山的时候，人们还暗暗担心"土匪"会再来。新的局长（或者经理）刚刚就职，同事们正为他举行贺宴，朋友要我参加，我推辞了。小说的那个胜利的"结尾"便是根据上面的真实的故事想出来的。矿局职员口中的"土匪"很可能是起义的工人。

《新生》发表以后，我几次想写它的续篇《黎明》，一直没有动笔。一九四七年《寒夜》出版了，我又想到预告了多年的《黎明》，我打算在那一年内完成它。可是我考虑了好久，仍然不敢写一个字。我自己的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未来社会的轮廓，我怎么能写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呢？我找了几本西方人讲乌托邦的书，翻看了一下，觉得不对头，我不想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写乌托邦的小说。因此我终于把《黎明》搁了下来。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我现在谈《新生》，又想到了那个未了的旧债，我的思想活动了，信心也有一些了。我觉得在新社会里试一试过去干不了的那个工作，也不见得毫无成功的可能，至少方向明确了，道路清楚了。今天拿起笔写未来社会、理想社会，绝不会像在写童话；正相反，我会觉得自己在写真实的生活，在写明天便要发生的事情，多么亲切，多么新鲜，多么令人兴奋！

我真想试一试，而且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我写从《灭亡》到《寒夜》十四卷《文集》的当时所未曾有过的"写作的快乐"。

1961年11月27日。

谈《家》*

有许多小说家喜欢把自己要对读者讲的话完全放在作品里面，但也有一些人愿意在作品以外发表意见。我大概属于后者。在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或者短篇小说集中都有我自己写的《序》或者《跋》。有些偏爱我的读者并不讨厌我的唠叨。有些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的人甚至好心地写信来探询他们的下落。就拿这部我在二十六年前写的《家》来说罢，今天还有读者来信要我介绍他们跟书中人通信，他们要知道书中人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新中国的光明才放心。二十六年来读者们常常来信指出书中的觉慧就是作者，我反复解释都没有用，昨天我还接到这样的来信。主要的原因是读者们希望这个人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享今天的幸福。

读者的好心使我感动，但也使我痛苦。我并不为觉慧惋惜，我知道有多少"觉慧"活到现在，而且热情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在努力工作。然而觉新不能见到今天的阳光，不能使他的年轻的生命发出一点光和热，却是一件使我非常痛心的事，因为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七月《收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和读者谈谈〈家〉》。

哥。二十六年前我在上海写《家》，刚写到第六章，报告他去世的电报就来了。读者可以想象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完这本小说的。

我很早就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过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姐(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罢。"一直到我在一九三一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要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我可以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

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封建大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一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他们甚至有“为祖先赎罪”的想法。今天长一辈的已经死了，下一辈的连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年轻的一代中有的为中国革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有的作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者。然而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这就是《家》的年代），虽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爱国热潮使多数中国青年的血沸腾，可是在高家仍然是祖父统治整个家庭的时代。高老太爷是我的祖父，也是我们一些亲戚朋友的家庭中的祖父。经济权捏在他手里，他每年收入那么多的田租，可以养活整整一大家人，所以整整一大家人都得听他的话。他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想不到年轻人会有灵魂。他靠田租吃饭，却连佃户们怎样生活也弄不清楚。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他相信这个家是万世不败的。他以为他的儿子们会学他的榜样，他的孙子们会走他的道路。他并不知道他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

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亲手在给这个家庭挖坟。他创造了这份家业，他又来毁坏这个家业。他至多也就只做到四世同堂的好梦（有一些大家庭也许维持到五代）。不单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爷们全走这样的路。他们想看到和睦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但是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毕竟冲出去了，他们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人的旧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我的祖父虽然顽固，但并非不聪明，他死前已经感到幻灭，他是怀着寂寞、空虚之感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觉离开了世界。以后房子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的五叔以一个"小偷"的身份又穷又病地死在监牢里面。他花光了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一切，又花光了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后，没有脸再见他的妻儿，就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家》中很少写到：他面貌清秀，能诗能文，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华。可是封建旧家庭的环境戕害了他的生机，他只能做损人害己的事情。为着他，我后来又写过一本题为《憩园》的中篇小说。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出来，他也许会看见了横在他面前的深渊，那么他可能不会落到那里面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上海的《时报》上连载，他就在成

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后我的另一个哥哥在上海病故。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像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梦魇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的文章。我不能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始终不忘记这个原则："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这九个字在那种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帮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是靠着这九个字才能够逃出那个正在崩溃的家庭，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却把一个年轻有为的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

有些读者关心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希望多知道一点关于她们的事情。她们四个人代表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两种不同的结局。瑞珏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虽然我祖父死后我嫂嫂被逼着搬到城外茅舍里去生产，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样悲惨地死在那里。我也有过一个像梅那样的表姐，她当初跟我大哥感情好。她常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这一辈人不论男女都喜欢她。我们都盼望她能够成为我们的嫂嫂，后来听说姑母不愿意"亲上加亲"（她自己已经受够亲上加亲的痛苦了），因此这一对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三、四年后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以后的十几年内她生

了一大群儿女，而且胖得成了一个完全可笑的女人。我们有过一个叫做翠凤的丫头，关于她我什么记忆也没有了，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远房的亲戚要讨她做姨太太，她却严辞拒绝了，虽然她并没有爱上哪一位少爷，她倒宁愿后来嫁一个贫家丈夫。她的性格跟鸣凤的不同，而且她是一个“寄饭”的丫头。所谓“寄饭”，就是用劳动换来她的饮食和居住，她仍然有权做自己的主人。她的叔父是我们家的老听差，他并不虐待她。所以她比鸣凤幸运，用不着在湖水里找归宿。

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

的确我的悲愤太大了。我记得我还是五六岁的小孩的时候，我在姐姐的房里找到了一本《列女传》。是插图本，下栏是图，上栏是字。小孩子喜欢图画书，我一页一页地翻看，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人。但是她们总带着愁容。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水上浮沉，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在高楼上投缳自尽。都是些可怕的故事！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专落在女人的身上？我不明白！我问我那两个姐姐，她们说这是《列女传》，年轻姑娘要念这样的书。我还是不明白。我问母亲，她说这是女人的榜样。我求她给我讲解。她告诉我：那是一个寡妇，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当着那个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砍下来；这是一个王妃，宫里发生火灾，但是陪伴她的人没有来，她不能一个人走出宫去，便甘心烧死在宫中。为什么女人特别是年

轻的女人，就该为那些可笑的陈旧观念，为那种人造的礼教忍受种种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本充满血腥味的《列女传》就应当被看作女人的榜样？连母亲也不能说得使我心服。我不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别人拥护它，我也要反对。不久这种“道理”就被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打垮了，《列女传》被我翻破以后，甚至在我们家里也难找出第二本来。但是我们家里仍然充满着那种带血腥味的空气。甚至在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女生了，两三个剪了辫子的女学生在成都却站不住脚，只得逃往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说，我的姐姐、妹妹们享受不到人的权利了。一九二三年我的第三个姐姐，还被人用花轿抬到一个陌生的人家，一年以后就寂寞地死在医院里。她的结局跟《春》里面蕙的结局一样。《春》里面觉新报告蕙的死讯的长信，就是根据我大哥给我的信改写的。据说我那个最小的叔父当时还打算送一副对联去："临死无言，在生可想。"灵柩停在古庙里无人过问，后来还是我的大哥花钱埋葬了她。

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然而希望的火花有时也微微照亮了我们家庭的暗夜。琴出现了。不，这只能说是琴的影子。这是我的一个堂姐。在我离家的前两三年中，她很有可能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人，她热心地读了不少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我的三哥每天晚上都要跟她在一起坐上两个钟头读书、谈话。可是后来她的母亲跟我的继母闹翻了，不久她又跟着她母亲搬出公馆去了。虽然

同住在一条街上，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机会相见。我的三哥还跟她通过好多封信。我们弟兄离开成都的那天早晨到她那里去过一次，总算见到了她一面。这就是我在小说的最后写的那个场面。可是环境薄待了这个可爱的少女。没有人帮助她像淑英那样地逃出囚笼。她被父母用感情做铁栏，关在古庙似的家里，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法看见。我在小说里借用了她后来写的两句诗，那是由梅讲出来的："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她那一点点锋芒终于被"家庭牢狱生活"磨洗干净了。她后来成了一个性情乖僻的老处女，到死都没法走出家门，连一个同情她的人也没有。

我用这许多话谈起我二十七岁时写的这本小说，这样地反复解释也许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作者当时的心情。我最近重读了《家》，我仍然很激动。我自己喜欢这本小说，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1956年10月作，

1957年6月改写。

谈《春》*

我那篇谈《家》的短文发表以后，有些读者来信要我继续谈谈《春》和《秋》。我的创作经验是不值得多谈的。读者们关心小说中几个人物的命运，希望多知道一点关于他们的事情。有些热心的读者甚至希望那些书中人物全是真实的人，而且一直活在读者中间，跟读者们共同呼吸新中国的健康空气，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不忍辜负这些读者的好心，便要求《收获》编辑部的同志们允许我占用杂志的几页篇幅，谈一些我自己差不多已经忘记了的琐碎事情。

我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写过一篇《爱情的三部曲·总序》，在那篇长序的最后，我引用了"一个青年读者"的来信。我接着说："这个'青年读者'不但没有告诉我她的姓名，她甚至不曾写下通信地址，使我无法回信。她要我写'一篇新文章来答复'她。事实上这样的文章我已经计划过了，这是一本以一个女子为主人公的'家'，写一个女子怎样经过自杀、逃亡……种种方法，终于获得求知识与自由的权利，而离开了她的专制腐败的大家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三年以后（就是在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三月《收获》第二期。

九三八年七月)，我第一次修改《爱情的三部曲》，在这一段文章的后面加了一个小注："这就是最近出版的《春》"，因为《春》刚刚在三四个月以前出版。

我当初计划写的那本小说并不是《春》。淑英的故事是虚构的，连淑英这个人也是虚构的。我所说的"真实的故事"是我在日本从一个四川女学生的嘴里听来的。这位四川姑娘有一次对我谈起她自己出川求学的经过，她怎样跟她父亲进行斗争。她自杀未遂，逃亡又被找回家，最后她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又得到哥哥的帮助，顺利地离开了家乡。她的话非常生动，而且有感情。我说我要把她的故事写成长篇小说，她并不反对。可是不久我就动身回国，在上海忙着别的事情，连这个长篇的计划也搁起来了。

一九三六年《文季月刊》在上海创刊，由我和靳以主编。其实全是他一个人负责。我不过在旁边呐喊助威。他刚刚在北平编过大型刊物《文学季刊》，气魄很大，一开目录就是三个长篇连载：曹禺的四幕剧《日出》，鲁彦的长篇小说《野火》，第三个题目他派定我担任。那个时候，我的小说《萌芽》被禁止发卖，《电》虽然出版，却被国民党的审查老爷删得七零八落，而且良友图书公司为了我这本书和几本别人著作的顺利出版，曾经花过几百元稿费买下某一位审查老爷的一部不能用的大作。我一方面不愿意给新刊物招来麻烦，另一方面又要认真地完成新刊物交给我的任务。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四川姑娘的故事，我也想到了《春》这个题目。接着我又想到了《家》的续篇。于是我找到了"淑英"这个人物。轮到我拿起笔写小说的

时候，我就把四川姑娘的故事改成了淑英的故事。一个在花园里长大的深闺小姐总不是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人物罢。我想用她来骗过审查老爷的眼睛。我不仅写了淑英的故事，我还创造了另一个少女蕙的故事。但是刊物出到第七期，终于同其它十二种刊物同时被禁止了。没有什么理由，反正审查老爷看不顺眼。我的小说只发表了十章，其实我就只写了那么多。按期出版的时候，我每个月至少总要写一万多字。刊物一停，没有人催稿，我又忙着做丛书编辑的工作，也写一点别的文章。后来稍有空闲，我翻出发表过的那十章旧稿，信笔增删了一些，高兴时接下去写一点，有时写得较多，有时写得少。小说还没有写完，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印小册子。后来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租界当局改变态度，朋友们相继离去。我也曾有意离开上海，又知道不能把《春》的原稿带在身边，想来想去，终于抽出十几天的时间，日也写，夜也写，把小说告了一个小段落，作为第一部，交给开明书店。我心想短时期内不会续写第二部了。

倘使我当时真的走出了被称为"孤岛"的上海，《春》的第二部也许就不会完成了。可是我终于没有走。开明书店也准备在上海排印、出版这本书。我便重新拿起放下的笔，将淑英同蕙这两个少女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那些日子的确不是容易度过的。正如我在《春》的《序》上所说，我好几次丢开笔，想走；好几次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写不出一个字；好几次我几乎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但是我终于写完了《春》，写下了"春天

是我们的"这句话。我觉得我的身上充满了力量。

这些力量是成千成万的青年给我的。在那个时候不断地给我鼓舞、使我能够支持下去的，是千万青年的纯洁心灵，是我对青年们的爱。那个时候我除了写作外常常在霞飞路上散步，我喜欢看那些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孔。每次看见青年学生抱着书从新开办的学校和从别处迁来的学校里走出来，我就想到为他们写点东西。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笔写小说，我就看见平日在人行道上见到的那些天真、纯洁的脸庞。我觉得能够带给他们一点点温暖和希望是我最大的幸福。

写完了《春》，看完了全书的校样，我就坐上海船，经过香港到广州去了。我在《序》上写着："我一定是怀着离愁而去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还有着成千成万的男女青年……我关心他们，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我却愿意将这本书作为一个小小的礼物献给他们。"

我在这里用了"不配"两个字，有人说："过于谦虚就是虚伪。"但是甚至在今天还珍惜我这点真诚的感情。倘使我的作品果真能够给当时的青年带来一点点温暖和希望，那么我这一生便不是白活了。作品能够帮助人、鼓舞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的好的东西，这才是作家的光荣。我没有做到，但是我愿意我能够做到。

在《春》的扉页的背面我预告了《秋》。我开始写《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写《秋》，正如开始写《家》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写《春》。《春》和《家》一样都是匆匆地结束的。《春》是《家》的补

充，《秋》又是《春》的补充，三本书合在一起便是一本叫做《激流》的大书。《家》在《时报》(一九三一年)上面发表的时候用的就是《激流》这个名字。

我在《时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是完全意外的事情。我并不认识《时报》的编者，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他忽然托一位我在世界语学会常常遇见的朋友来跟我商量，要我替《时报》写一部长篇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我感谢朋友推荐的好意(可能是由于他的推荐)，就答应了编者的要求。我写了《总序》和小说的前二章交给那位朋友转送报馆。编者同意先发表它们。以后我每隔一星期光景送一次稿给报馆，随写随送。(小说的每一章原来都有小标题：第一章是《两兄弟》；第二章是《琴》。开明书店的单行本也保留了它们。一九三七年《家》改排新五号字本的时候，我才把它们删去。但是这个本子刚印好就被"八·一三"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了。以后重排的新版本里也就没有了小标题。)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领土，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上艰苦作战，全国人民纷纷起来参加救亡运动。我和别人一样，也"动"了一个时候。《时报》上发表小说的地位也被更重要的东北消息占去了。但是那些时候国民党政府不仅一味退让，而且千方百计阻挠和压制人民的爱国运动。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气焰越来越高。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也经常在虹口演习作战，威胁当时所谓"华界"的安全。我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离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厂不远)，有时候一天中间谣言四起，居民携儿带女搬进租界，不到一个月功夫弄堂里的住

户竟然迁走了一小半。住在我楼上的朋友全家也搬进租界去了。我一个人住一所二层楼房，石库门里非常清静。白天我不常在家。晚上回来，我受不了那样的静寂，对着一张方桌和一盏孤灯，我又翻出几个月来的小说剪报，重新拿起我那支自来水笔，接着一两个月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我写得快，也写得匆忙。哪怕我这两扇石库门内静得像一座古庙，我也不能够从容落笔。日本的兵营就在这附近，静夜里海军陆战队很可能来一个"奇袭"，我也不能不作万一的准备。所以我决定趁早结束我的小说。

那个时候《时报》也换了编辑，原来的那一位编者请假回乡去了。我的小说停刊了一个时期之后，时报馆忽然写来一封信，抱怨我的小说太长，说是比原先讲定的字数多了许多。他们并没有明白地拒绝续登我的小说，但好像有这样的暗示。这样的信自然不会使我高兴，不过我也不想跟时报馆打官司。好在我的小说也可以收场了。过了几天我写完了《家》的最后一章，我就把剩下的好几万字原稿送到时报馆，还附去一封信，向编辑先生道歉：我的小说字数超过了他们的需要。我说他们不登续稿，我无意见。现在送上这批原稿，请他们过目。倘使他们愿意继续刊登，我可以放弃稿酬。结果我的小说终于在《时报》上全部刊完了。不用说，报馆省掉了几万字的稿费。他们的做法并不是公道的，但是我总算尽了我做作家的责任。我不是为稿费写作，我是为读者写作的。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这样地结束了。这时候我才想到《家》和《群》这两个书名。我结束的是《家》，不是《激流》。《家》

并没有把我所要写的东西完全包括在内，我后来才有写《春》的可能。《春》固然写完了蕙和淑英的故事，但是还漏掉了高家的许多事情，我还并没有写到"树倒猢狲散"的场面。觉新的故事也需要告一个小段落。因此我在结束《春》的时候，就想到再写一部《秋》。我并非卖弄技巧，我不过想用辛勤的劳动来弥补自己作品的漏洞。

我唠唠叨叨地叙述这些琐碎事情，无非说明：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曾写出完整的作品。我的几部小说写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也并非苦心构思的结果。一些偶然的事情对我的作品的面目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我认为艺术应当为政治服务。我一直把我的笔当作攻击旧社会、旧制度的武器来使用。倘使不是为了向不合理的制度进攻，我绝不会写小说。倘使我没有在封建大家庭里生活过十九年，不曾身受过旧社会中的种种痛苦，不曾目睹人吃人的惨剧；倘使我对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并不深恶痛恨，对真诚、纯洁的男女青年并无热爱，那么我绝不会写《家》、《春》、《秋》那样的书。我曾经多次声明，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拿起笔来写小说。倘使小说不能作为我作战的武器，我何必花那么多的功夫转弯抹角、忸怩作态，供人们欣赏来换取作家的头衔？我能够花那么多的笔墨描写觉新这个人物，并非我掌握了一种描写人物的技巧或秘诀。我能够描写觉新，只是因为我熟悉这个人，我对他有感情。我为他花了那么多的笔墨，也无非想通过这个人来鞭挞旧制度。

我想借这些话来说明我的创作方法，来说明我怎样写《激

流三部曲》，让读者们知道我的浅薄和我的作品的缺点。有人不了解我为什么要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明白：我不断地发现它们的缺点。我去年又把《家》修改一次。最近我改完了《春》，补写了婉儿回到高家给太太拜寿的一章。补写的一章更清楚地说明冯乐山究竟是怎样的人。在这一点曹禺改编的剧本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提到了冯乐山打骂婉儿的事，不用说，这是看了曹禺的戏以后才想到的。但是我们两个人心目中的冯乐山并不完全一样。曹禺写的是他见过的"冯乐山"，我写的是我见过的"冯乐山"。我见过的那个冯乐山高兴起来也会把婉儿当成宝贝一样。他害怕他的太太，因为他的太太知道他欺负孤儿寡妇的丑事。我还把《春》的第一部同第二部合并成一部。我从前觉得把小说分成两部好，现在却认为合并成一部也未尝不可。这说明一则我手中并无秘诀；二则像分章、分卷这些小节与一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并无多大关系。屠格涅夫在《父与子》里面记错了人物的年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面也有把时间弄错的事。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去改正这些"错误"，而且那两部伟大作品也并不曾因此减色。我即使在这些小节上花了很多功夫，也不能使我的几部作品成为杰作。一部作品的主要东西在于它的思想内容，在于作者对生活、对社会了解的深度，在于作品反映时代的深度等等。

现在我又回到《春》上面来。应当首先提到的人是淑英和蕙。这两个少女性格相似而结局不同，环境决定了她们的命运。蕙被人虐待痛苦地死去，淑英得到堂哥哥们的帮助逃出

了囚笼。这两个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我也并非完全无中生有，凭空创造。我在我的姐姐妹妹和表姊妹们的身上看到过她们的影子，我东拼西凑地把影子改变成活人。我写蕙的时候，我常常想到我死去的三姐。我离开成都的前一个月参加了三姐的婚礼。三姐上轿的情形就跟我在小说中描写的蕙的出嫁差不多。不过三姐心目中并没有一位表哥，而且她出嫁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几岁，只能做人家的填房妻子。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她上轿时挣扎得很厉害，看见的人都有点心酸。在那个时代男人娶妻、女子出嫁都好像抓彩一样，尤其是从来脚不出户的少女，去到一个陌生人家，一切都得听别人支配，是好是坏，全碰运气，自己作不了一点主。旧式女子上花轿前的痛哭不是没有原因的。据说三姐相当满意她的丈夫。三姐夫并不是郑国光那样的人，然而他的父母却很像郑国光的父母。我根据三姐的病和死写了蕙的病和死，连觉新写给觉慧报告蕙的死讯的信也是从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信中摘录下来的。觉新所说"三叔代兄拟挽联一副"也是我的二叔替大哥拟的挽联。觉民想的一副对联："临死无言，在生可想"，其实是我的六叔想出来的。他在来信中提到这八个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信早已遗失，可是这八个字到现在我还记得。三姐去世的时候，我同三哥都在南京读书。要是那个时候我在成都，我一定知道更多的事情，我也会写得更详细，更动人。

我的三姐夫姓陈。我同他见面一共不到十次。他给我的印象，比我的一位堂姐夫给我的印象好。郑国光的作文中"我刘公川人也……我戴公黔人也……"这两句就是从我堂姐夫

的作文中借来的。他把作文送给他的岳父(我的二叔)批改。我在二叔的书房里看到这篇有趣的文章，到今天还记得那两句，就把它们写进《春》里面了。我的姐夫像一个文弱的书生，我的堂姐夫像一个土财主。我把他们揉在一起写成了郑国光。《春》里面的郑国光像我的堂姐夫，《秋》里面的郑国光就是我的姐夫的写照了。我这位姐夫让我姐姐的棺材停在古庙里，连看也不去看一眼。他还找我大哥替他借了好几笔钱，不但不还，甚至避不见面。后来大哥终于设法把他请到我们家里去作过一次谈判。那个场面跟我在《秋》里描写的相差不太远。我当然没有参加谈判的机会。好几年以后我才听到那些详情，我就把它们写了下来。《秋》出版后第二年我头一次回到成都，才听见人说，我那位姐夫的第三次结婚也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后来抽鸦片烟上了瘾，落魄地死在西康。

我的堂姐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地主。他现在还在劳动改造中。这个人又像土财主，又像暴发户，一生靠剥削享福。他只懂得买田，田越买越多。他从不想用这种"不义之财"做一两件有益的事。他不读书，不学技能。他花钱修了一所别墅，却不懂如何布置房间。他需要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财产，却什么也生不出来。拚命讨小老婆，也没有一点影响，他每年过生日，想到自己无儿无女，一定要伤心地哭一场。他讨过几个小老婆，一个上吊自杀，一个跟人跑掉，最后的一个在他被捕以后也找到一位门当户对的丈夫另外结婚。听说他在劳动改造中倒学会了一种技能，以后期满出来大概可以独立生活了。

我在《家》和《春》里都提到陈克家父子共同欺负丫头的故事。这就是我堂姐夫的父亲和胞兄的"德政"。当初我的四姐还没有嫁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了这个故事。不过堂姐夫一家是成都南门的首富。他们有的是钱。我的二叔虽然熟读《春秋》，但是对于钱的看法，大概也未能免俗，所以他终于把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嫁到了那样的人家。接着我堂姐夫的那位胞兄又变做了我的表姐夫。我们亲戚中间对他们弟兄并无多大的好感。我们弟兄因为都喜欢那位表姐，对这门亲事的反感更大。但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我们亲戚中间那样的人家常常成了羡慕的对象，即使人品不可取，金钱却能通神。

从我上面的这一段话看来，淑英可能就是我那位堂姐。其实论性格我的四姐完全不像淑英。在我的记忆中四姐好像是一个并不可爱的人。但是关于四姐婚姻的回忆帮助我想出来《春》的一部分的情节。从这里我创造出周伯涛这个人物，我也想出了高克明的另一面。既然做父亲的忍心把女儿嫁到那种人家去，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忍心的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一笔一笔地画出周伯涛和高克明的面貌，这种旧式的父亲我看得多。不用说他们中间有的人面带慈祥的笑容，可是照我分析起来，他们不见得比周伯涛或者高克明慈祥。读者也看得出我写周伯涛时，心里充满憎恨。我恨这样的父亲，我愿意用我的笔来刺伤他。我常说我恨的是制度，不是人。但是这些人凭借制度来作恶。多少年轻、可爱的生命的毁灭都应当由他们负责。我不能宽恕他们。

我在前面说过，淑英不是四姐，但淑英的父亲高克明却

是我的二叔，也就是四姐的父亲。我这次修改《家》和《春》，给高克明和陈克家两位都添上名律师的头衔，又把他们两人的律师事务所放在同一个公馆里面。堂姐夫的父亲不是律师，他一生只做过一件陈克家大律师做过的事，那就是父子共同欺负一个丫头。有人说，他在分家的时候欺骗了自己的哥哥。那样的事冯乐山干得出来，我在补写的一章中已经提过了。高克明做律师是他的本分。我的二叔就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事务所设在我们公馆里面。高克明在高家的地位和处境也就是二叔在我们李家的地位和处境。我五叔并没有把喜儿收房。不过他和四叔都干过偷偷摸摸勾引老妈子的"风流"事情。他包了一个娼妓在外面租了小公馆。女人的名字是"礼拜六"，他还给她起了一个号叫"芳纹"。我意外地在商业场后门口见过"礼拜六"一面，她的相貌跟我在《春》里面描写的差不多。倘使没有"礼拜六"这个真名字，我纵有"天才"，也想不出"礼拜一"这名字来。倘使我没有遇见她一面，那么《春》里面淑英姊妹们也许就不会遇见她了。连五叔、五婶吵架彼此相骂的话中也有一两句是他们当时骂过的话。我把它们记在心里，并非为了日后好写小说。其实我并不要记住它们，可是它们自己印在我的心上了。大家庭中那些吵吵闹闹的琐碎事情，像克安同陈姨太吵嘴、觉群把刀丢进房里去砍弟弟等等都是真事。克明在那些事情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我二叔扮演的角色。觉民因打觉群被王氏告到周氏同克明那里去，这也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这还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扮演了觉民的角色。王氏应当改成我的五婶。五婶并不是淑贞的母

亲，她一共生过三个男孩，活下来的就只有我的一个堂弟。五婶她自己打肿了孩子的脸却要我来负责。我大哥起初希望我能够认错，后来又希望二叔能主持公道。他后来在二叔那里挨了骂，含着眼泪来到我的房间呜咽地说："四弟，你要发狠读书，给我们争一口气。"这个场面跟我在小说里所描写的完全一样。我大哥就是这样的人。他代我挨骂，我并不感激他。本来就用不着他跑到二叔那里去替我挨骂。他希望我扬名显亲，我那个时候就在打算将来有一天把李家的丑事公开出来，让大家丢脸。

不用说，觉新仍然是我大哥的写照。大哥的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一个蕙，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蕙的影子。《家》的《初版代序》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一个女人是一定有的，你曾经向我谈到你对她的灵的爱……"这是我的另一位表姐，她的相貌和性格跟蕙的完全不同。但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保留着的表姐的印象，和我大哥去世前一年半对我谈起的"灵的爱"，使我开始想到应当创造一个像蕙这样的少女。后来我才把三姐的事加在蕙的身上。三姐的凄凉的死帮助我写成蕙的悲惨的结局。

海儿是我大哥的第一个儿子。孩子的小名叫庆斯。海儿的病和死亡都是按照真实情形写下来的。连"今天把你们吓倒了"这句话也是庆儿亲口对我说过的。祝医官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到今天我还仿佛看见那个胖大的法国医生把光着身子的庆儿捧在手里的情景，我还仿佛看见那个大花圈，和"嘉兴李国嘉之墓"七个大字。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到现在还

不能忘记？因为我非常爱这个四岁多的孩子。"嘉兴李国嘉"在《春》里面就变成"金陵高海臣"了。

我二叔并没有像克明对待淑英那样地对待他的女儿。听说我的四姐出嫁后，二叔一个人在堂屋里对着他亡妻的神主牌流过眼泪。我二叔中过举，在日本留过学，做过清朝的官，最后他又是有名的律师。他喜欢读《聊斋志异》，说蒲松龄的文章有《左传》笔法，他为我同三哥讲解过一年的《春秋》、《左传》。可是他会同意教我的嫂嫂搬到城外去生产，教他的小女儿缠脚。他续弦两次，头一位二婶我也许没有见过。他的两个女儿都是第二个二婶生的，缠脚很可能是那位二婶的主意。我们小时候听见那个堂妹的哭声，看见她举步艰难的情形，大家都可怜这个小妹妹，因此也不满意她的父母。过了两年她的母亲就死了。二叔又接了一位新的二婶来。我们都喜欢这位新的婶娘，她是一位忠厚老实、讲话不多的年轻女人。缠脚的事似乎也就取消了。淑贞就是我那个堂妹的影子。但是我那位堂妹并没有受到父母的虐待，因此也并不曾投井自杀，像我在《秋》里面所描写的那样。然而我也想说，她并不曾受到父母的钟爱。我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个时候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做父母的人似乎就不懂得爱自己的儿女。孩子生下来就交给奶妈。母亲高兴时还抱一下，父亲向来是不抱孩子的。孩子稍微长大起来，父亲就得板起面孔教训他。对女儿父亲连话也不愿意多说。我的父亲在他的最后几年中间常常带我逛街看戏，那是非常特殊的事情。我的三叔习惯用鞭子教育子弟。他打得儿子看见他就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庆幸

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位严父，否则我今天也许不会在这里饶舌了。

重读我的《激流三部曲》，我为自己的许多缺点感到惭愧。在我的这三部小说中到处都有或大或小的毛病。大的毛病是没法治好的了，小的还可以施行手术治疗。我一次一次地修改，也无非想治好一些小疮小疤。把克安丑化和简化，也是《三部曲》中的一个小毛病。丑化和简化不能写活一个人物。这个人即使在书中常常见面，也只是一些影子。这次我有意给克安添上几笔，我让他进克明的律师事务所给他的哥哥帮忙，我还写出他擅长书法，又点明他做过县官，在辛亥革命时逃回省城……这都是从我的三叔那里借来的。我的三叔虽然在外面玩小旦，搞女人，抽大烟，可是他写得一笔好字，又能诗能文，也熟悉法律，在二叔的事务所里还替当事人写过不少的上诉状子。人原来是复杂的。丑化和简化在作者虽然容易，却并不能解决问题。然而我也应当说老实话，我添的几笔并没有把克安写活。可见我并非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只消用简单的几笔就可以写活一个人物。

在《春》里我还写了年轻人的活动。这也是我当时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有人责备我把活动面写得很窄，有人责备我没有写到工人运动。我没有话为自己辩护。我只能说，当时我们这一群青年的活动范围并不宽，也没有人来领导我们。觉民散发五一节传单的经验是我自己的经验。觉民在周报社的活动也就是我自己的活动。不过我并没有参加演戏。张惠如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现在还在成都担任学校的工作。方继舜

的真名是袁诗尧。他编辑《学生潮》，为了梨园榜痛骂某名流的时候，还是高师的学生。他同我们在一起工作过一个时期，我们都喜欢他。他后来加入共产党，在某中学当教员。在一九二八年的白色恐怖中，他在成都被某军阀枪毙了。

我那些朋友当时的确演过《夜未央》。这是一个波兰人写的描写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三幕剧。一九〇七年在巴黎公演，轰动一时，后来有人译成中文在法国出版。一九二〇年有人在上海翻印了这个剧本。我当时看见报上的广告，用邮票代价买了一本来。朋友们见到它，便拿去抄了几份，作为排演的底本。在《春》里我本来不想多写《夜未央》的演出。其实描写淑英的成长和觉悟，不用《夜未央》的启发，也未始不可。一九三八年年初我在孤岛上写《春》的后半部，当时日寇势力开始侵入租界，汉奸横行，爱国人士的头颅常常悬在电灯杆上。我想带给上海青年一点鼓舞和温暖，我想点燃他们的反抗的热情，激发他们的革命的精神，所以特地添写了琴请淑英看《夜未央》的一章，详细地叙述了那个革命故事，把"向前进"的声音传达给我的读者。也许有人会责备我为什么不给当时的青年指出一条更明显的路。我无法为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掩饰。而且我当时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是写得太明显，也许书就不能送到孤岛青年的手中。其实，就是在二十年前我写下"春天是我们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不曾料到"我们的"春天会来得这么快！

关于《春》我写了这么多的话，我觉得我也应当在这里结束了。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写一篇谈《秋》的文章。今天还没有

谈到的有些人和有些事情，我想留在下一篇文章里详谈。

1958年1月27日。

谈《秋》*

有一位读者写信问我：用“秋”字作书名，除了“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这个意思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我因此想到《家》里面钱梅芬说过的那句话：“我已经过了绿叶成荫的时节，现在是走飘落的路了。”在《秋》的最后，觉新也想起了这句话，他自己解释道：“我的生命也像是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秋》里面写的就是高家的飘落的路，高家的飘落的时候。高家好比一棵落叶树，一到秋天叶子开始变黄变枯，一片一片地从枝上落下来，最后只剩下光秃的树枝和树身。这种落叶树，有些根扎得不深，有些根扎得深，却被虫吃空了树干，也有些树会被台风连根拔起，那么树叶落尽以后，树也就渐渐地死亡。不用说，绝大多数的落叶树在春天会照样地发芽、生叶，甚至开花、结果。然而高家不是这样的落叶树。高家这棵树在落光叶子以后就会逐渐枯死。琴说过“秋天过了，春天会来……到了明年，树上不是一样地盖满绿叶”的话。这是像她这样的年轻人的看法。琴永远乐观，而且有理由乐观。她决不会像一片枯叶随风飘落，她也不会枯死。觉民也是如此。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收获》第三辑。

是他们必须脱离枯树。而且他们也一定会脱离枯树(高家)。所以即使像琴和觉民那样的高家青年会看见第二个春天、第三个春天乃至三十五年以后的这个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空前明媚的春天，但这早已不是高家的春天了。高家早已垮了，完了。克明和觉新想挽救它，也没有办法。克明是被它拖死的。他死在它毁灭之前。觉新多活了若干时候，也可能一直活到今天，等待改造，因为究竟还有新的力量拉了他几下。在小说的最后觉新好像站起来了。其实他并没有决心要做一个"反抗者"。他不过给人逼得没有办法，终于掉转身，朝着活路走了一步，表示自己的"上进之心并未死去"。以后或死或活，或者灭亡或者得到新生，那要看他自己怎样努力了。

《秋》只写了高家的"木叶黄落"的时节。下一步就是"死亡"。"死亡"已经到了高家的门口。不用我来描写，读者也看得见。高家一定会灭亡。但是我在那个时候不愿意用低沉的调子结束我的小说。当时连我自己也受不了灰色的结局。所以我把觉新从自杀的危机中救了出来，还把翠环交给他，让两个不幸的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互相安慰，互相支持地活下去。我曾经说过觉新是我大哥的化身。我大哥在一九三一年春天自杀。这才是真的事实。然而我是在写小说，我不是在拍纪录片，也不是在写历史。

关于《秋》的结尾，我曾经想了好久。我也有过内心的斗争。有时候我决定让觉新自杀，觉民被捕；有时候我又反对这样的结局。我常常想：为什么一定要写出这样的结局呢？在近百年来欧美的文学作品里像这样的结局难道还嫌太少吗？我

读过好多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里面有不少传世的佳作或者不朽的巨著，作者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的现实，对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这些都是值得我佩服的。我知道他们写出了真实，我知道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制度一定会毁灭。但是作为读者，我受不了那样接连不断的黑漆一团的结尾。我二十四岁的时候，有两三个月一口气读完了左拉描写卢贡-马加尔家族兴衰的二十部小说。我崇拜过这位自然主义的大师，我尊敬他的光辉的人格，我喜欢他的另外几本非自然主义的作品，例如《巴黎》和《劳动》，但是我并不喜爱那二十部小说，尽管像《酒馆》、《大地》等等都成了世人推崇的"古典名著"。我只有在《萌芽》里面看到一点点希望。坏人得志，好人受苦，这且不说；那些正直、善良、勤劳的主人公，不管怎样奋斗，最后终于失败，悲惨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遗传作祟。我去年又读过一遍《大地》（这次读的是新出的英译本），我好几天不舒服。善良、勇敢、纯洁的少女死亡了，害死她的人（就是她的姐夫）反而承继了她的茅屋和小块土地，她的丈夫倒被人赶走了。我受不了这个结局，正如三十年前我读完莫泊桑的《漂亮朋友》，那个小人得志的结局使我发呕一样。我并不是在批评那些伟大前辈的名著；我也不否认在旧社会里，坏人容易得志，好人往往碰壁；我也了解他们带着多大的憎恶写出这样的结局，而且他们是在鞭挞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我不过在这里说明一个读者的感受和体会。我读别人的小说有那样的感受，那么我自己写起小说来，总不会每次都写出自己所不能忍受的结局。固然实际生

活里的觉新自杀了，固然像觉新那样生活下去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他多活几年或者甚至活到现在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事实上也有像觉新那样的人活到现在的。而且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想过，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没有觉新的东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还没有把它完全去掉，虽然我不断地跟它斗争。我在封建地主的家庭里生活过十九年，怎么能说没有一点点觉新的性格呢？我在旧社会中生活了四十几年，怎么能说没有旧知识分子的许多缺点呢？只要有觉悟、有决心，缺点也可以改造，浪子也可以回头。觉新自然也可以不死。

我常常说我用我大哥作模特儿写了觉新。觉新没有死，但是我大哥死了。我好几次翻读他的遗书，最近我还读过一次，我实在找不到他必须死的理由。如果要我勉强找出一个，那就是他没有勇气改变自己的生活。不用说，这是我的看法。他自己的看法跟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所以他选择了自杀的路。他自己说得很明白：

>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于是通盘一算，帐上每月只有九十元的入项，平均每月不敷五十元，每年不敷六百元，不到

几年还是完了。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罢。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只恨我为什么不早死两三个月，或早病两三个月，也就没有这场事了。总结一句，我受人累，我累家庭和家人。但是没有人能相信我，因为我拿不出证据来。证据到哪里去了呢？有一夜我独自一算，来看看究竟损失若干。因为大病才好，神经受此重大刺激，忽然把我以前的痰病引发，顺手将贴现的票子扯成碎纸，弃于字纸篓内，上床睡觉。到了第二天一想不对，连忙一找，哪晓得已经被人倒了。完了，完了。……

遗书里所提到的“痰病”，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神经病”。我大哥的确发过神经病，但也并不怎么厉害，而且也不久，大约有一两个月的光景。我记得是在一九二〇年，那就是《家》的年代。在《春》里觉民写信告诉觉慧（一九二二年）：“大哥……最近又好像要得神经病了。有一天晚上已经打过三更……他一个人忽然跑到大厅上他的轿子里面坐起来，一声不响地坐了许久，用一根棍子把轿帘上的玻璃打碎了。妈叫

我去劝他。他却只对我摇摇头说：'我不想活了。我要死。我死了大家都会高兴的。'后来我费了许多唇舌，才把他说动了。他慢慢地走下轿子来，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里去。……以后他就没有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件真事，我今天还记得三十八年前的情景。觉新仅仅有过两次这样的发作。还有一次就是在《秋》里面，他突然跪倒在他姑母的面前，两只手蒙住脸，带哭说："姑妈，请你作主，我也不想活了。"又说："都是我错，我该死……请你们都来杀死我……"这次他被陈姨太和王氏逼得没有办法，才一下子发了病。这是小说里的事情。觉新休息了半天也就好了。我大哥不像觉新，在一九二〇年冬天的晚上，电灯已经灭了，他常常一个人坐进他的轿子，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那时已经不住在觉民弟兄住的那个房间。我和我三哥搬到那间利用大厅上通内天井的侧门新建的小屋里面了。这样的装了大玻璃窗的小屋一共有两间。我们住的是左面的一间，离所谓"拐门"最近，离大厅也最近（右面的一间里住的是我们一个堂兄弟）。轿子就放在大厅，大厅上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传到我的小屋里来。我自来睡得晚，常常读书到深夜。我听见大哥摸索进了轿子，接着又听见玻璃破碎声，我静静地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但是我的心痛得厉害，我不能再把心放在书上。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涂写一些愤怒的字句，或者捏紧拳头在桌上擦来擦去。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大哥的这个病是给家里人的闲言蜚语和阴谋陷害逼出来的。他自己在我们离家后写给我的信里也说："那是神经太受刺激逼而出此。"自然他后来也还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不

过总离不了"刺激"两个字。觉新受到的刺激不会比我大哥受的少。但是他并没有发过神经病。我大哥自杀跟他所谓的"痰病"有关系。

我大哥是我们这一房的"管家"。他看见这一房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知道不到几年就要破产。他自己因为身体不好辞掉了商业场电灯公司的事情，个人的收入也没有了。他不愿意让别人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向他建议放下空架子改变生活方式。他心里情愿，却又没有勇气实行。他既不想让家人知道内部的空虚，又担心会丧失死去的祖父和父亲的面子。他宁肯有病装健康人，打肿脸充胖子，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真实情况。钱不够花，也不想勤俭持家，却仍然置身在阔亲戚中间充硬汉。没有办法就想到做投机生意。他做的是所谓"贴现"，这种生意只要有本钱，赚钱也很容易。他卖了田把钱全押在这笔"赌注"上。当时在军阀统治下的成都，谁都可以开办银行、发行钞票。趁浑水摸鱼的人多得很。他也想凭个人的信用在浑水里抓一把，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妄想，跟赌博下注差不多。不久他害了一场大病。在他的病中，那个本来就很混乱的市场发生了大波动，一连倒闭了好些银行。等他病好出去一看，才知道他的钱已经损失了一大半。他回到家里等着夜深人静，拿出票据来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神经病发作了，他把票据全扯掉丢在字纸篓里。第二天想起来，字纸已经倒掉了。连剩下的一点钱也完蛋了。他瞒着别人偷偷地做了这一切，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懂一点医学，认识不少中医界和西医界的朋友，也可以给熟人看脉开

方。他半夜服毒药自杀，早晨安安静静地睡在床上，一个小女儿睡在他的身边。他的身体冰凉，可是他的脸上并无死相，只有嘴角上粘了一点白粉。家里人找到了他的遗书，才知道他有意割断自己的生命。柜子里只有十六个银元，这就是我们这一房的全部财产了。他留下一个妻子和一男四女。除遗书外他还留下一张人欠欠人的帐单。人欠的债大半都没法收回，欠人的债却被逼着要还清。我那位独身的堂姐逼得最厉害。她甚至说过："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两丢开。"她就是写过"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的那个少女！我的继母终于用字画偿清了大哥欠她的钱。她这样一来，别的债主更有话说了："你们自己人都是这样！不能怪我们！"我的继母给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卖尽一切还清了大哥经手的债，有的债还是他为了赌气争面子代别人承担的。

这是一九三一年四月里的事情。我正在写《家》，而且刚刚写完《做大哥的人》那一章（第六章）。《秋》结束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正是我从成都到上海的那一年。《尾声》里觉新在一九二四年秋天写给觉慧的一封信是根据我大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来信改写的。自然我增加了许多材料，例如琴和觉民的事情，例如沈氏的事情，例如芸的事情，尤其是翠环的事情。翠环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我那位新的二婶有一个陪嫁丫头，叫做翠环。她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孩。一九四二年我回成都意外地见到她一次。我嫂嫂告诉我这是翠环。她已经是一个中年妇人了。我只借用了她的名字。在另一个"翠环"身上没有一点她的东西。人们读我的小说不一定会注意到那个

身材苗条的少女。前年香港影片《秋》在四川放映后，有些观众对红线女同志的演技感到兴趣，居然有人问我的侄女："你是不是翠环生的？"还有人去问我的嫂嫂："你是不是翠环？"这是把文艺作品跟真实混在一起了。

我拿我大哥作模特儿来写觉新，只是借用他的性格，他的一些遭遇，一些言行。觉新身上有很多我大哥的东西，然而他跟我大哥不是一个人。即使我想完全根据我大哥的一切来描写觉新，但是我既然把他放在高公馆里面，高家又有不少的虚构人物，又有那么一个大花园，他不能不跟那些虚构的人物接触，在那些人中间生活，因此他一定会做出一些我大哥并未做过的事情，做出一些连作者事先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倘使我拿笔以前就完全想好觉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按照计划机械地写下去，那么除了觉新外，其他的人都会变成木偶了。自然这是拿我的写作方法来说的。别的作者仍然可以写好大纲按照计划从容地写下去，而且写得很好。我在这里只说明一件事情：我大哥虽然死了，小说中的觉新仍旧可以活下去，甚至活到今天。

高家比我们李家有钱。《秋》结束的时候觉民已经毕业，可以靠自己生活。此外高家大房也只有周氏、觉新、淑华、翠环几个人，即使他们放不下太太、少爷的架子，每月开支也不会"入不敷出"。觉新在商业场被焚以后虽然失掉工作，还可以靠遗产过活。他用不着做投机生意，更不会干"孤注一掷"的冒险事情。公馆卖掉搬到新居以后，觉新反而觉得"生活倒比从前愉快"。他"在家看书"过着"安静的日子"，他不愿意自杀，

也很近人情。我再解释一次：我让觉新活下去，并非我过分地同情他，而是他本人想活。写到那里，我也收不住自己的笔，而且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受不了阴暗的结局。

在《秋》里面真事并不多。我仔细地想了一下，也举不出几件大事来。商业场烧光是一件事，卖公馆是一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家》的时代以前，是我亲眼见到的；后一件事发生在《秋》的时代以后，是我在法国接到了大哥的信才知道的。那是我二叔去世后两年的事情了。利群周报社的工作也只是前一年工作（见《春》）的继续和发展。三姐灵柩的安葬，我在谈《春》的文章里就已经提到了。其余全是由我虚构出来的。我应该说虚构那些事情，那些场面，并不十分困难。因为那些人物在我的小说里生活了几年，他们已经能够照他们的脾气，照他们的生活方式行动了。所以我常常说是他们自己在生活，不是我在写他们。我在这里随便举一个例子，觉新弟兄把郑国光请到周家谈话。周伯涛夫妇也在周老太太房里。他们谈的是蕙的灵柩下葬的事情。周老太太、陈氏和觉新弟兄都逼着郑国光给一个明确的答复。郑国光拚命躲闪，周伯涛暗中替女婿帮忙。我只消写出周老太太的几句话，郑国光的答话就自然地出来了。周伯涛马上讲话想帮忙郑国光结束这个问题。周老太太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自然要生气地追问。周伯涛还想掩饰。郑国光还想逃避。陈氏气得讲出心里的话来。女婿还要虚言解释，惹得岳母气上加气。周伯涛反面不满意自己的妻子，郑国光也恼羞成怒想借这个机会溜走。于是觉民怂恿觉新出来说话……。最后郑国光不得不写了定期安葬

的字据。我写完一个人讲话，第二个人的话就很自然地从我的笔下流出来。我一定要写出了第二个人的话，才会想到第三个人的一言一语。我在这些话上面，并没有花过多少功夫。但是在我写《秋》的那一段长时间里，那些人物常常占据了我的脑筋，我想到他们，就像想到一些活人一样。

《秋》跟《家》、跟《春》都不同，它是一口气写成的。我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写《秋》，一直写到第二年五月，每天晚上从九点或十点写到两点或三点，有时还写到四点，没有一天间断过，也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章、一节。白天我或者读书，或者看稿子，或者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那个时候上海是所谓"孤岛"，四面都是日本侵略军占据的地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围在当中。我的住处就在法租界的霞飞路霞飞坊（淮海中路淮海坊）。我住在一个朋友家的三楼，我三哥从天津来养病，住在三楼亭子间。他刚刚开始翻译冈查洛夫的小说《悬崖》。星期天下午我们两个照例到兰心戏院（上海艺术剧场）去听音乐会。他喜欢去电影院，我有时也看电影，但我常常去的地方却是巨籁达路（巨鹿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因为我还担任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别的地方我不大敢去，害怕碰见认识的人，更害怕碰到当时在租界上相当活动的文化界汉奸。所以我在家的时候多。我除了做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情以外，空下来我就想《秋》的情节。我想的跟我写的不一定相同。但是我想得多，人物就跟我越来越熟了，他们不停地在我的脑子里活动。他们跟着我的笔自己在生活。我常常说我的人物自己在生活，有些读者不大了解。然而这的确是事实，譬如我

开始写《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淑贞会投井自杀，我倒想让她在十五岁就嫁出去，这也是很可能办到的事。但是我越往下写，淑贞的路越窄，写到第三十九章（新版第四十二章），淑贞朝花园跑去，我才想到了那口井，才想到淑贞要投井自杀，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它完全是虚构的。只有井是真实的东西。它今天还在原来的地方。前年（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到那里去过一趟。我离开那口井三十三年，它还是那个老样子。井边有一棵松树，树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们家伙夫挑水时，挂带钩扁担的地方。松树像一位忠实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着这口老井。可是花园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当初我写到觉新和觉民抬着淑贞尸首的时候，我流了眼泪，我几乎要哭出声来了。也许会有人笑我："上了自己编造的故事的当。"我的解释却是：我在跟书中人物一起生活。据说旧俄作家符·迦尔洵写一个短篇，写一个不幸女人的遭遇，写到中途就伏在书桌上伤心地哭起来。我翻译过他的作品，我觉得我了解他的心情。

我写这些话无非说明：我写《秋》的时候，虽然有从容构思的时间，但是正如我在《序》上所说："《秋》的写作也不是愉快的事。"我当时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这本书把我苦够了。"我所谓"苦"，并不是"苦思"、"苦吟"，我不会为了推敲一个字花去整天整夜的功夫，也不会因为想不出一字一句，就废寝忘食。我是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书上，跟书中人物一同受苦，一起受考验，一块儿奋斗。既然我是在跟书中人物一块儿生活，当时出版《秋》的开明书店又没有催我限期交稿（虽然前半部的原稿

已经送到印刷所去排版了），我只管每夜每夜地写下去，所以文章越写越长，已经写到四十万字，离预定的结局还远得很。那个时候我在上海越住越烦，局势越来越坏，谣言越来越多。单是耳闻目睹的一切就够使人不能安心工作。朋友们又接连来信催我到内地去，也有人不赞成我关在上海埋头写《秋》。最后我就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像现在这样地结束了我的小说。但它至今仍然是我的最长的作品。下半部原稿交出去以后，不到两个月，我就离开上海经过越南的海防，坐滇越路的火车到了昆明。我在上海上船的时候，《秋》已经出版了。书出得这样快，其实对作者并没有多少好处。我倘使能把这部小说仔细地修改两遍然后付印，《秋》的内容也许会比现在的好一点。这一个月我正在慢慢地校改我这部长篇小说。我自己发现了不少的缺点，但是我也找不到好的挽救办法。譬如修整房屋，我今天只能做些补漏刷新的工作，要翻造已经不可能了。我揽了一大堆事情在手边，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处理它们。所以我很佩服比我年长十三岁的李劼人同志重写《大波》的决心和毅力。我在新中国生活、工作、学习了九年，即使进步不大，但是看问题总比以前清楚许多，从前所不了解的今天也有点了解了。今天要是能够好好地把《秋》从头到尾改写一遍，我也许会写出一部较好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修改一次总比不修改好，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毛病。我愿意做一个"写到死，改到死"的作家。

现在又回到人物上面来。关于觉新我已经谈得很多了。我还想再谈一件事情，就是"卜南失"的跌碎。有好些读者曾经

写信问我,"卜南失"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写过几封回信。这次我打算在《秋》里面加上一个小注。一九一七年或者一九一八年我们家得到过一个"卜南失",可能是我大哥找来的,也可能是某个年轻的亲戚送来的。这是从日本输入的东西。"卜南失"大概是法文"木板"的译音。这种心形的木板有两只脚,脚上装得有小轮,心形的尖端上有个小孔,孔里插了一支铅笔。人坐在桌子前面,闭上两眼,双手按住木板,他慢慢地进入了催眠状态,木板也就渐渐地动起来,铅笔就在纸上写字。旁边有人问话,纸上就写出答语,这是一种催眠作用。纸上写的全是按"卜南失"的人平日心里所想的话,他进入了催眠状态,经人一问,就不自觉地写在纸上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我们玩这种把戏一连玩了两个月。总是我那个表哥按着"卜南失",我在旁边辨认铅笔在纸上写的那些难认的字。有一个晚上我继母知道了,要我们把"卜南失"拿到她的房里试一下。她把我死去的父亲请来了,问了几句话,答语跟我父亲的口气差不多。我祖父听说我父亲的灵魂回来了,也颤巍巍地走到我继母的房里来。他一开口就落泪。那时我第二个二婶的坟在不久以前被盗,盗墓人始终查不出。我二叔也找我表哥来按"卜南失",把二婶的灵魂请来问个明白。结果什么也讲不出来。以后我们对这个把戏就失掉了兴趣,"卜南失"也不知让我们扔到哪里去了。当时我们并不相信鬼,也知道这只是一种把戏。但是我们讲不出什么道理。后来我读到《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陈大齐的《辟灵学》,才知道这是一种下意识作用。我早已忘记了"卜南失"的事情,一直到一

九三九年写《秋》的时候才想起了它，我把它写进小说里面，无非说明觉新对死者的怀念。蕙的灵柩不入土，觉新始终不能安心。觉新也想借用这个东西来刺激周家的人。"卜南失"在纸上写的话全是觉新一直憋在心里的话，例如"枚弟苦"、"只求早葬"。还有"人事无常，前途渺茫，早救自已"这几句其实就是觉新本人当时的思想：他对前途悲观，看不到希望。但是他仍然想从苦海里救出自已。

蕙死在《春》里面，可是到了《秋》她的灵柩才入了土。我在谈《春》的文章里就说过，蕙的安葬就是写我三姐的安葬。要是没有我姐夫不肯安葬我三姐的事情，郑国光也许就不会让蕙的灵柩烂在莲花庵里。我既然想不到，也就写不出。我今天翻看我大哥三十二年前写给我的旧信，还读到这一段话：

> 三姐之事，尤令人寒心。三姐死后即寄殡于离城二十余里的莲花庵，简直无人管她。阴历（去年）腊月二十二日我命老赵出城给她烧了两口箱子，两扎金银锭。老赵回来述说一切，更令人悲愤不已。当与蓉泉大开谈判，但是毫无结果。现已想好一种办法，拟于年节后找他交涉。……

我大哥信里所说的"办法"，我已经在《秋》里面写出来了。蓉泉便是我那位姐夫的大号。他正在准备举行新的婚礼的时候，被我大哥设法请到我们家里，谈了好久，终于不得不答应安葬三姐。所以两个多月以后，大哥来信便说："三姐定于三月初八日下葬。她可怜的一生算是结束了。"《秋》的读者单单

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加工工人，用生活的原料来进行了加工的工作。生活里的东西比我写出来的更丰富，更动人。没有从生活里来的原料，我写不出任何动人的东西！

谈过了觉新，就应该谈觉民。但是关于这个年轻人，我似乎没有多少话可说。在《家》里面，觉民很像我的三哥（我第二个哥哥）；在《春》里面他改变了，他的性格发展了。主要的原因是觉慧走了以后，高家不能没有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否则我的小说里就只有一片灰色，或者它的结局就会像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的结局。人死了，房子卖了，失掉丈夫和儿子的主妇空手回娘家去了，留下一个离婚两次的姑太太和老小姐们寂寞地谈着过去的日子。两年半以前去世的托马斯·曼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最后的一位大师，他这部二十六岁写成的关于德国资产阶级家族的小说已经成为近代文学中不朽的名著。他写了一个家族的四代人，写了这个家族的最兴盛的时期，也写到最后一个继承人的夭亡。他写了几十年中间社会的变化。篇幅可能比《秋》多一倍或者多一半。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的作品只能说是一个年轻人的热情的自白和控诉。所以我必须在小说里写一个像觉慧或觉民那样的人。在《秋》里面写觉民比在《春》里面写觉民容易多了。在《春》的上半部觉民对家庭和长辈还有顾虑，他还不能决定要不要参加秘密团体，要不要演戏，但是经过王氏那次吵闹以后，他的顾虑完全消除了。他把心交给那些年轻的朋友。好些年轻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股力量，居然能帮助堂妹淑英脱离旧家庭逃往上海。对觉民来说，淑英的逃走是一个

大胜仗。在这次胜利之后觉民的道路也就更加确定了。他只消挺起身子向前走就行了，何况还有那些年轻朋友给他帮忙！在觉民的身上有我三哥的东西，也有我的东西。但是在那些时候我三哥比我沉着，比我乐观，而且比我会生活，会安排时间。他会唱歌，会玩。所以在高家觉民并不说教，他用各种方法使妹妹们高兴，鼓起她们的勇气。但是觉民在外面的活动就是借用我当时的经历了。我写得简单，因为我当时的经历并不丰富，而且像我这个没有经过锻炼的十七八岁的青年除了怀着满腔热情、准备牺牲一切为祖先赎罪外，也不知道应当幹些什么事情。办刊物，散传单，演戏，开会，宣传……这就是我们那些年轻人当时的工作（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演过戏，不过看朋友们演戏罢了）。我最近修改《秋》，很想给觉民们的活动添一点色彩，但是我也没法添得太多。要是能把《秋》的时代推迟就好办了。即使我自己的经历简单，我还可以请教别人。我既无法推迟小说的时代，就只好在觉民的几个朋友身上多加几笔。张惠如拜师傅学裁缝倒是真事。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讲过，张惠如今天还在成都当中学校长。他大热天穿皮袍，走进当铺脱下来换钱办刊物，也是真事。可惜他离开"外专"只做了几个月的裁缝，又考进华西大学去念书了。他有一个兄弟，跟张还如差不多。但是我们在一起不到两年，他的兄弟就离开了成都。一九二三年我和三哥一路出川经过重庆，还见到这个朋友，但是一两个月后他就害伤寒症死在重庆了。

关于琴我不想多说什么。到了《春》和《秋》，琴就完全是虚构的人物了。但是她的性格已经形成，她的影响逐渐在扩

大，她可以靠自己活下去了。不用说，她的影响只限于高家，只限于她的两个表妹，或者加上两个丫头。觉新和觉民也常常受到她的鼓舞。我很想把我青年时期见到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全加在她的身上。但是她不需要。她仍然是一个平凡的少女。她不是"五四"时期某一种解放的女性，《家》里面的许倩如倒有点像。许倩如在课堂中写给琴的字条上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便抛弃你所爱的人，给人家做发泄兽欲的工具吗？"我现在删去了它，因为有人认为这不像一个少女的口气。其实当时有些少女不仅说话连行动也非常开通，只为了表示女人是跟男人"完全"一样的人。许倩如写出那样的话也是很寻常的事情。我觉得琴跟觉民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们的确是情投意合的一对。我在《秋》里写琴，也就只注意到这一点。

觉民和琴两人都喜欢淑华。淑华也可以说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的性格有一面很像我的一个妹妹，就是心直口快，对什么都没有顾忌，也不怕别人说长论短。但是淑华比我那个妹妹开朗，乐观。在这个家里的确也需要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爱说爱笑的少女。倘使全是像淑贞那样的女子，我自己也没法写下去了。

在克明、克安、克定三个"长辈"的身上有不少我那三个叔父的东西。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谈过他们。我二叔生前并没有一个像觉英那样的儿子。他是我二哥、五弟和十六弟的父亲。五弟只比我小几个月。一九一七年成都发生巷战，二哥和五弟害白喉，请不到医生，同时死去。过不到几年十六弟也害病死了。以后新的二婶又给他生了两个小弟弟。二叔去

世的时候，这两个弟弟年纪都很小。但是二叔留下的田产害了我那个较大的堂兄弟。他的母亲死后，姐姐们相信金钱万能，不放他好好地念书，却给他接来一位年纪比他大的少奶奶，把他关在家里。结果他在外面胡作非为，花光了钱，比觉英做出更多的丢脸的事情。然而这是我一九三九——四〇年写《秋》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我当时只是这样地想：高家的那种家庭教育只能培养出像觉英、觉群这样的子弟。

克安有点像我的三叔，但也只能说是"像"而已。因为三叔的性格比克安复杂得多。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丑化克安的缺点。我在这里只想讲两件事情：一是克安邀张碧秀到高家来游园，二是觉新到克安的小公馆问病。这都是有根据的。我三叔喜欢过一个叫做李凤卿的川班小旦。有一次他把李凤卿弄到我们花园里来照相，我看见李凤卿在客厅里化妆。他先扮成一位小脚的女将，后来又改扮一位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都挂在三叔的房里，三叔还在照片上题了诗。还有一次有名的旦角陈碧秀和另一个小旦到我们家来玩，主人可能是我祖父，自然三叔也在场。他们下轿的情形跟我在《秋》里写的差不多。至于觉新问病的故事，那是从大哥给我的信上联想起来的。一九二三年七月大哥写给我的信上有这样几句话："至三叔寄寓视疾。至则王三巧在焉。另有所谓烟堂倌之妇在床上为三叔烧烟，累进不已。三叔人甚委顿，脚心生一水疔。"我根据这几句话写了一章小说。我把王三巧换成了张碧秀。张碧秀的悲惨的遭遇就是李凤卿的。李凤卿是在小时候被叔父教人拐去卖给戏班学唱小旦的。辛亥年三叔在

南充做知县，看见他演戏，很喜欢他，就把他带到成都来，他以后在成都演戏，常常到我们家来找三叔。有时三叔不在，他便在律师房（就是二叔的律师事务所）等候三叔。我常常跟律师事务所的郑书记员下象棋。他就在旁边看我们下棋。他是个非常亲切、温和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他在我祖父死后不久病故，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三叔正在居丧期间，但是听见人来报信，也坐轿出去料理他的后事，把他安葬了。三叔还做了一副挽联送去，上联有"……也当忍死须臾，待侬一诀"的句子。

这种事情在今天的青年读者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了，但是我十几岁时候看得不少，它们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次改《秋》，我本来想把关于张碧秀的三章完全删去，然而我又想留下它们，好让人知道旧社会中竟然有那样不合理的古怪事情。我看它们，好像是过去了的梦魇一样。

克定还是我五叔的写照。但是他并没有一个喜儿，也没有一个淑贞。我五婶也并没有离开他到她哥哥那里去（她根本就没有哥哥）。五叔在公馆卖掉以后，把"礼拜六"接到新居跟五婶同住，"天天吵嘴。而五叔的烟也吃成大瘾了。"（见大哥的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最后的结局我已在谈《家》的文章里讲过了，以后我在谈《憩园》时还要谈他。

《秋》里面写到枚少爷的地方不算少。枚少爷的悲剧同时加强了他姐姐蕙的悲剧，另外还加重了他父亲周伯涛的罪行。枚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这一类的年轻人我看得太多了。自然，吐血死掉的还是占少数。多数的枚少爷会糊里糊涂地

活下去，生儿育女，坐吃山空，最后只好靠他们的儿女来养活。我好些过去的阔亲戚今天就是靠儿女养活的。从前是父亲养他，现在是儿女养他，他们始终没有对社会尽一点力。这就是另一类的枚少爷的悲剧了。

最后我还想谈谈陈姨太。我写这个人物的时候，我脑子出现了一个真实的人，那就是我祖父的"黄姨太"。我们小时候叫她"黄黄"，年纪大起来就叫她"黄老姨太"。她的确是一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女人。一九一四年我的生母去世的时候，我弟弟还很小。她通过祖父叫我父亲把我那个弟弟抱给她。十二年以后我大哥要管教那个弟弟念书，她却认为我大哥有反悔的意思，竟然向法院递状子控告他。后来我们家开了一个亲族会议才解决了这个纠纷。当时我不在场，我后来看到一张字据才知道了详情。这个"永敦和好"的字据上第一条便是：

> 开麐之废继并无其事，系属误会，经亲族会议敦劝，双方言归于好。原控之案由黄老姨太自行呈请撤销。

开麐是我弟弟的小名。我那个弟弟自然一直做她的孙儿，不过并没有在她死后继承她的遗产，她的股票（小说里写成了银行股票）在商业场烧掉以后已经成了废纸。她的公馆由三叔自行接管变卖了。那个时候三叔是家长。他自己说他替她还债，又安葬她，卖掉那所公馆还是得不偿失。但是有一位亲戚说他连一块好好的碑也不给人家立，未免太对不起死者。这已是题外的话了。

过去陈姨太的外形跟黄老姨太的外形完全一样。但是我这次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陈姨太渐渐地长胖了，脸也显得丰满了。老太爷活着的时候，她经常浓妆艳抹，香气扑鼻。我去年写过一篇谈电影的短文，里面也谈到陈姨太。我现在还想在这里把那一段话重复地说一遍："我在陈姨太的身上增加了一些教人厌恶的东西。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不能说陈姨太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坏女人。她没有理由一定要害死瑞珏。她平日所作所为，无非提防别人，保护自己。因为她出身贫贱，又不识字，而且处在小老婆的地位，始终受人轻视。在高家，老太爷虽然喜欢她，但是除了老太爷就没有一个人对她友好。因此她不得不靠老太爷的威势过日子，更不能不趁老太爷在世时替自己打算。她不曾生儿育女，老太爷是她的靠山，她当然比别人更关心老太爷。她没有知识，当然比别人更容易为迷信所俘虏。她相信'血光之灾'，她不能想象老太爷死后满身浴血的惨状。高家的太太们不一定真相信，也不一定不相信，但是她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克明三弟兄当然不会相信'血光之灾'，不过他们也不愿意承担不孝的恶名，反正搬出去的又不是自己的妻子。这才是我控诉的那个'家'。在那个家里，暴君是旧社会中的'好人'高老太爷，那些年轻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把丫头当作礼物送人，把孙儿孙女看成没有灵魂的东西。克明是他的儿子兼学生。克安和克定都是他培养出来的'不肖子弟'。陈姨太也得拿他做护身符。陈姨太其实是一个旧社会的牺牲者。事实的确是这样：在坏的制度中'好人'也往往作坏事。倘使把一切坏事全推在出身贫

贱的陈姨太的身上，让她替官僚地主家庭的罪恶负责，这不但不公平，也不合事实。这样就等于鞭挞了人却宽恕了制度。”

我的本意是：通过人来鞭挞制度。一切作恶的人都是依靠制度作恶的。我在大家庭里生活了十九年，我这方面的体会太深了。

关于《秋》我还有不少的话想说。但是我怀疑，一个人唠唠叨叨对读者究竟有多大的好处。我写了这么多的字，也应该让读者疲倦的眼睛休息了。

然而在我放下我这支“幸福金笔”之前，我还想引起我的读者注意：《激流三部曲》是为当时的年轻读者写的。除了那个封建旧家庭灭亡外，我还写了年轻的同年老的两代人的斗争，新的与旧的斗争。虽然这样的斗争大半是在高家的小圈子里进行的，虽然小说中有那么多的阴暗的场面和惨痛的牺牲，但是年轻人终于得到了胜利。旧的、老的死亡了，新的、年轻的在生长，发展，逐渐成熟。“春天是我们的！”这是当时的青年的呼声，它仍然是今天的青年的呼声，所不同的是今天的青年已经看到了无限美好的春天，而且在用自己的脑子和双手给春天增加更多的光彩。因此我的许多未说的话也成了多余的了。

1958年4月1日。

谈《憩园》

前一阵子有人写文章指出我的中篇小说《憩园》和其它作品的缺点，我今天还要向人们推荐那些文章。一个人不大容易知道自己的病，所以要请医生来诊断开方。我连一点点医理也不懂，更不用提给自己拿脉看病了。我是个喜欢唠叨的作者，有时情不自禁会向读者谈起自己的创作，但绝无替自己吹嘘或者给作品做广告的意思。我只有一个用意：向那些读过我的作品的人讲几句“私话”，告诉他们这些作品是怎样写成的。这也算是一种职业上的秘密罢。我好像只是在对亲近的人谈个人的“秘密”。

讲私话，谈秘密，难免要犯信口开河的毛病，而且事过境迁，记忆力又衰退，更不免有记错讲错的事。但是现在不讲，将来要讲也会不知道从哪里开头。就拿《憩园》来说罢，我在贵阳一家旅馆楼上客房里开始写小说第一页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可是一晃就是十七年。我连旅馆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我记得的是小说的大部分是在贵阳郊外花溪的“花溪小憩”里写的。我把未完的小说稿带到重庆，在那里写完了它。倘使我在十五年前或者十年前谈这本小说，我可能多谈一些事情，也许谈得更清楚。我现在才深切地感觉到记忆力是多么可贵

的了。

《憩园》是拿一叠西式信笺当稿纸写成的。我早习惯了用自来水笔写文章。我并非不爱毛笔字，恰恰相反，我很喜欢。只是我年轻时候不曾认真学习书法（几十年来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我的字实在难看，用自来水笔既可以藏拙，又能写快。所有我的作品几乎全是用自来水笔写成的，只有《憩园》和《第四病室》两个中篇除外。《寒夜》的最初若干页也是用毛笔写的，因为在那些用嘉乐纸印的稿纸上墨笔字倒更显眼，后来我找到较好的稿纸，也就丢开了毛笔。我写《第四病室》的时候，手边连嘉乐纸稿纸也没有，我用一种通行纸，写起字来不受拘束，倒很痛快。可惜这种纸见不得水，即使落上一滴深色的墨水，也会浸成一大团。我只好用毛笔蘸浓浓的墨汁在那种纸上写字了。我写《憩园》时用的西式信笺上倒宜于写钢笔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不便带墨水瓶旅行。当时我只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住下来，借到一个小碟子，水到处都有，拿出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可以坐下来写文章。要是找不到碟子就用茶碗盖，没有茶碗盖，只好把茶杯翻过来在小小的茶杯底上磨墨。整部小说就是这样写成的。我在贵阳的旅馆里写，在花溪的旅舍里写，在渝筑道上的小客栈里也写。最后到了重庆也不是一下子就安定下来，我还到过几个地方，我记得有一夜在北碚一个旅馆里续写《憩园》，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段蜡烛，我的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得到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让我从容地写下去。可是在那样的黑夜，要找到一线亮光

也实在不容易啊。……那种日子的确一去不再来了。

我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开始写《憩园》。小说刚刚开了头，我就进医院了。病房的生活，我后来老老实实地写在《第四病室》里面。我六月出院后，先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后在"花溪小憩"住了一个短时期，每天从早写到晚，只有在两顿饭以后散步休息。旅行社招待所的房间内电灯明亮，茶水方便，院子里相当静，离大街又不远。我写倦了时，便冒着小雨走到冠生园去吃碗汤面，或者喝碗猪肝粥，外加两个包子，算是解决了一顿饭。住在"花溪小憩"的时候，不论吃点心吃饭，都得走半个钟头到镇上去请教饭馆。"小憩"是一所很漂亮的花园洋房，位置在一个大公园里面。没有楼，却有一间又宽大又华丽的客厅。"小憩"虽是对外营业的招待所，客房却不多，客人更少。我在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常常只有我一个客人。白天静，夜里更静。日里也难得听见几声人语。然而不分昼夜都有水声。水流得急，声音很大，从来不停，但是单调没有变化，听惯了就好像没有声音一样。总之，它不会妨碍我写小说。"小憩"里没有电灯，我不得不靠一盏清油灯的微光埋头写作。我在这里也是从早写到晚，除了一天两次步行到镇上吃饭以外，我有时感到疲乏，还要在这个公园里散步。我的眼睛常常有小毛病，在油灯的微光下写字较多，会发生视线模糊的情况，因此我睡得较早，也起得不迟。当时我正在壮年，每天伏案十小时以上，并不感到文思枯竭。在"小憩"的短短几天中我的确写得不少。我写小说也有像《苦难的历程》的作者那样的习惯，想到了一个细节就坐下来，动着笔让这个细节慢慢地

引出了全部的故事。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曾经作过这样的自白："我在工作极其紧张的时候，不知道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着他们。"我过去常常是这样进行创作的。我开始写《憩园》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杨老三的故事，和"我"回到久别的家乡、在街上遇见旧友、接受邀请住到他家花园里去的一些细节。说实话，我写了头一段，还不知道以后怎样安插杨老三的故事，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可是我从容地写下去，一切难题都解决了，人物自己在说话，在行动，在斗争，我需要的什么东西都像喷泉一样，很自然地出来了。

我并不是在编故事，也无意把创作讲得十分神秘，我只是解释我个人的习惯。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习惯。据说列夫·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工作，他认为在晚上作家容易写出大量的废话。我们的冰心大姐也说："我爱在早上写作，早上头脑清醒些，晚上我是写不出东西的。"还有人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写得累赘"，有一个原因便是他在夜里写作，又不断地喝茶。那么我的唠叨也有了解释了：我常常工作到夜深，而且手里捧着一杯热茶，我更感到舒适。

现在我还是谈《憩园》罢。我有心写杨老三的故事，还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我第一次回到成都的时候。我十九岁离开家乡，一去便是十八年，回来住了五十天，"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死了许多人，毁了许多家；许多可爱的生命埋进黄土，又有许多新的人接着来演那不必要的悲剧"，正如我在一篇短文里所说的那样。在短短的五十天中间我的确

有很多的感触。两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第一件便是五叔的死。我回成都不过几天便听到五叔病死的消息。就在那天晚上一个亲戚邀我在一家菜馆里便饭，大家刚刚坐好，我一个堂兄弟忽然走进楼上房间来，一句话也不说，就朝着我跪倒叩头。我大吃一惊，但是不到一分钟也就恍然大悟了。这是旧礼节、老规矩。从前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向人们叩过多少头。没有想到这种封建的糟粕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我当时仍然谈笑自若，五叔的死亡丝毫不曾引起我的哀痛和惋惜，我对他始终没有好感。在我的心目中他早已是一个死人了。在饭桌上人们不断地讲笑话。我那个堂兄弟也是有说有笑。我听见人讲过他和他母亲一起把他父亲赶了出去。事实可能是这样：他父亲用够了妻子的钱，抛弃了家，不顾母子二人的死活，后来自己无法度日，便厚着脸皮回去，妻儿不肯接待这个已经成为"惯窃"的丈夫和父亲。也许有人因此责备我那个堂兄弟，可是我倒赞成他的做法。为什么不应当让高克定那样的人尝尝他自己栽的树上结出来的苦果？那种人一辈子除了剥削和浪费以外，还干过什么呢？只有在他给"赶出去"以后，只有在他给关起来以后，他才劳动过一个极短的时期，但是不久他由装病而传染到真病，接着就是糊里糊涂的死亡。据有些亲戚说，我五叔就是在这个冬天给警察抓起来，关在牢里的。他当时并没有犯什么罪，不过他是个出名的小偷，又抽大烟，平日手脚不干净，冬防期间更有可能到处做点小买卖。治安当局认为，索性教他在牢里过一个冬季，倒可以省却一些麻烦。像他这样地给关起来的人当然不止一个。

后来他不得不和同伴们一块儿出去拾东西干重活，他害怕让亲友们看见丢脸，便装病，不肯上街，因此同有病的人睡在一起，可能是得了传染病，也可能是烟瘾发了，无法过瘾，总之他很快地就死了。他的妻儿领回他的尸首，收殓了他。棺材停在一所破庙里，一个下午我到了那里，一间小屋，一副廉价的棺材，一张旧供桌，桌上一个灵位，还有普通的香烛。一切都显得阴暗。我鞠了一个躬，我那个堂兄弟在旁边答礼。没有哭声，也无人为死者掉一滴眼泪。我和同来的人(可能是我的一个侄女，也可能是另一个年纪同我差不远的堂兄弟)谈了几句跟死者毫不相干的闲话，便坦然地走了。我一点也不难过，我倒觉得这些事好像早已发生了一样，我毫无意外的感觉。我来到庙里，并非向死者表示敬意，我只想看看他的应有的结局。

当天晚上我同嫂嫂、妹妹和侄女们谈起我在庙里的见闻，没有人怜悯死者，似乎大家都有一种关上一本看厌了的旧书的感觉。夜深人静，我躺在老式架子床上，忽然想起若干年前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五叔拉着我要我花几角钱买他一本《清宫二年记》的事情。我起初只觉得好笑，以后渐渐地严肃起来了。我并不打算多想他的事，可是开了头就没完没了。嫂嫂她们对我谈过的许多事情都上了我的心头。我五叔是我第二个祖母唯一的孩子，他长得清秀，人又聪明，所以我祖父特别宠他。当时要是有人批评他，哪怕是一句话，也会引起我祖父发脾气。他就是在阿谀和称赞中间长大的。官僚地主封建家庭的环境，加上那种毫无原则的溺爱毁了这个年轻人。他后

来又交了一些坏朋友，有的是像他那样的阔少爷，有的想从他的身上得一点好处。总之，人们拿他在家里找不到的种种享乐去引诱他。他甘心情愿地朝那个陷阱跳下去。他的母亲早死，那位一向偏爱他的父亲盲目地相信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旁人的忠告对他和他父亲都不会起什么作用。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许多事情，嫖、赌、吃、喝，无一不精。他父亲不相信他会花钱，也不曾按月交给他若干钱让他乱花。他先花他妻子的钱，拿他妻子的陪奁换钱花，后来就偷，就骗，就借。只要能弄到钱，他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他用他父亲的名义在外面借了不少的钱，他包下一个叫做"礼拜六"的私娼，租了一所小公馆。"定情之夕"还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海誓山盟的大文，仿佛要昭告于皇天后土与万代子孙："某年某月某日忏影盦与芳纹定情于×××……"文章的确写得不错，我无意间在我们家大厅上拾到一份草稿，我不喜欢这种艳丽的文章，也不想代他保存，匆匆看了一遍，不是当面交还给他，就是丢进字纸篓去了。现在就只记得这么半句。忏影盦是我五叔的"室名"，芳纹便是他的意中人。"礼拜六"这样的名字当然不便在这种堂而皇之的文章里出现，因此他给她另外起了个雅致的名字：芳纹。小公馆弄好之后，他在外面的开支更大了。他不久就因为骗去妻子的首饰无法交还，引起妻子大吵大闹，终于在父亲面前露出马脚，现了原形。

我在《家》里描写的那个场面完全是真实的。真实比我的小说丰富得多，许多细节都是我想象不出来的。总之，我祖父睁开了眼睛，看见他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真实使他吃惊，

使他愤怒，可是并没有使他觉悟，也不可能使他认识自己的错误。他只认为他的儿子不学好，对不起他，却始终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害了他的儿子。他以为自己有的是钱，钱是万能的东西。等到他发现钱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他又改用他的另一个武器：骂。他不但骂，而且命令五叔跪在地上，伸起双手左右开弓地打自己的耳光。五叔任何丑态都做得出来，父亲教做什么就做什么，只图混过眼前这个难关，最后赌咒发誓地答应从这天起守在家中读书习字，不再出去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祖父居然相信了这种誓言，不过他还吩咐父亲注意五叔的行动，不让五叔出去。

谁都知道五叔的誓言不可靠。他过不了三天就偷偷地溜出去了。天刚黑，我正在大门口，他即使像一阵风那样地跑得快，也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常常到门房找听差、到大门口找看门人李老汉闲谈，其实是请他们讲讲各自的经历。那个时候我不过十一岁，他们都喜欢我，在我面前用不着顾忌，无话不谈。我也真心地喜欢他们，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的知识。他们里面也有抽鸦片烟的，年纪大一点的轿夫多数抽大烟，因为他们的体力不够，不得不用这种兴奋剂来刺激，明知这是饮鸩止渴，但是也无其它办法。我常常躺在老年轿夫（其实他们的年纪不过四十左右，可是已经衰老了）的烟灯旁边，听那些讲不完的充满人世艰辛的故事。我跟这些人很亲近，我喜欢他们，我觉得我连他们的心也看得清楚。我一点不了解我那几位叔父，也无法跟他们接近，只有在我父亲去世以后，二叔才开始关心我们，虽然只是一般的关心，但在我们这已经是十分

意外的了。至于祖父，全家不论大小，早晚都要到他房里去请安，我们弟兄看见他便感到拘束，连话也不敢多讲，所以我们都不喜欢祖父。可是在他临死前半年（我父亲死后两年的光景），他忽然变得温和，对我也表示了很大的关心。只有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对我讲了些亲切、和善的话。不久他就露出精神错乱的现象。他的健康也越来越坏，一直到死，他头脑完全清醒的时候并不多。我还记得他坐在轿子里面教人抬着在天井里转来转去；我还记得一天上午他坐在上花厅里把我叫了去，他正在写一张字条："我在花厅冷得很，可催邵、方二公速来救命。"他写到"来"字，忽然一本正经地问我"救命"的"救"字怎样写。……他的发狂跟五叔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五叔大现原形，对祖父应当是第一个沉重的打击。不用说以后还有别的。祖父死的时候我伤心地哭过一场。然而就是在当时我也认为错在他自己。四十多年前的十五岁少年当然没有像今天十五岁少年这样的思想感情，况且我又是地主家庭的"少爷"，所以我只有这样一个看法：人应当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把金钱留给子孙让他们过寄生生活，这是最愚蠢的事情，因此封建家庭里培养不出有用的好人来。我自己很幼稚，我懂得的事情极少，但是我蔑视那些靠遗产生活的人，我蔑视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我对五叔当然不会有好感。

我跑了一趟野马，现在又回到五叔溜走的事情上面来。这件事让我看见了，我当然不会保守沉默。我进去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听着了急，但是也没有出去找回五叔，更不敢让祖父知道，只有等他悄悄地回来以后，把他找来认真地告诫一番。五

叔不会重视我父亲的话，过了两天又溜出去了。然而他每次在外面耽搁的时间并不长，好像还用了花言巧语骗得五婶在家中一声不响。我祖父照常威风凛凛地做他那一家之主，却不清楚五叔究竟在干什么事情。不到一个月五叔居然不回家了。大家找不到他，也并不热心去找，只是不让祖父知道这件事情。过了若干时候，五叔忽然从上海打电报给我父亲。我父亲翻译电码的时候，我在他的身边，像我这样爱管闲事的孩子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电文中有两句话我至今还没有忘记："望念手足之情，速汇□百元来。"

不用说，钱照数汇出了，人也终于回来了。五叔可能又挨了一顿骂，也可能靠着他哥哥们多方掩饰不曾让他父亲发觉他这次的旅行，也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曾离开四川，只是靠朋友们帮忙玩了一个大花招，我现在说不上来了，人的记忆力毕竟是有限度的。总之，这以后五叔的胆子越来越大，花招越来越多，动作越来越熟练。撒谎、骗人、偷钱、偷东西、打牌作弊，他无一不精，一切为了个人的享乐。但是不劳而获的钱也有用尽的时候。"礼拜六"终于离开他逃跑了（她后来给某军阀讨去当小老婆，听说我五叔穷了，还送钱给他），他妻子的钱也快要让他花光了，他仍然不肯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据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到任何地方都要来一下"顺手牵羊"① 的表演。他不但在所有亲戚的家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连他的妻儿也讨厌他，恨他，最后把他从他们家里赶了出去。甚至到了这种时

① 过去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话："顺手牵羊不为偷"。

候，他还不肯放下老爷架子，靠自己两只手劳动度日，重新作人。他还是照样地偷，骗，混，再加上讨。生活水平越来越降低，最后他真正成为“惯窃”，在冬防期间给关在牢里，由装病而变为真病，终于丧尽面子病死在监中。盖棺论定，这个人一生不曾做过一件对人有益的事情，他活着只是为了自己。他白白吃了几十年的大米，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浪费了。

我躺在那张几经沧桑的破床上，想着我五叔的可耻的一生，我并没有怀旧的感情，他的这个结局是我早就料到了的。但是我不能没有愤慨，因为在当时成都的社会中，我到处看见过去的幽灵，在我们亲戚的圈子里，还有人继续走我祖父的路和我五叔的路，有些地主靠着剥削越来越富，越无顾忌地作威作福；在不少的人中间金钱仍然是万能的宝贝，为了它他们甚至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在《憩园》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你以为赵家现在有钱，那么他们就永远有钱，永远看着别人连饭都吃不饱，他们自己一事不做，年年买田，他们儿子、孙子、曾孙、重孙都永远有钱，都永远赌钱、看戏……吗？你以为我们人吃的是钱，睡的是钱，把钱当作父母，一辈子抱住钱啃吗？”我的确动了感情，这不是“黎先生”对“姚国栋”说的话，这是我对许多亲戚讲的话。那个时候我早已不是地主家庭的少爷，我的思想水平也比十五岁的少年高了些。不过我虽然一文莫名靠稿费生活，却也不能说自己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会由五叔的死想出了一个杨老三的故事。

最初的杨老三的故事并不像我后来写出的那样，而且我那时还想把它编进一本叫做《冬》的中篇小说里面。那个冬天

的深夜、我躺在架子床上想到的中篇小说《冬》应当是《秋》的续篇，《激流三部曲》的尾声。我写《冬》的念头并非如夏日的电光一闪即逝，它存在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另一件事甚至帮助我想出了中篇小说的一些具体情节。它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第二件事情：有一天傍晚，我走过正通顺街我们老家的门前。

我走过我离开了十八年的故居。街道的面貌有了改变，房屋的面貌也有了改变。但是它们在我的眼里仍然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见到旧雨故知一样。石板道变成了马路，巍峨的门墙赶走了那一对背脊光滑的石狮子，包铁皮、钉铜钉的门槛也给人锯掉了。我再也找不到矮矮的台阶下、门前路旁那两个盛满水的长方形大石缸。我八九岁的时候常常拿"国恩家庆、人寿年丰"木板对联下面的石狮子做我的坐骑。黄昏时分我和堂弟兄们常常站在石缸旁边闲谈，或者吃着刚刚买来的水果或糖炒板栗。我们称石缸为"太平缸"。但是一九一七年军阀们在成都进行巷战的时候，我家对门(或者隔壁人家)一个年轻听差就在右面那个太平缸旁边中弹身亡。我只见到小小的一摊血，尸体已经抬走了。据说那个人正在跟人谈话，一颗枪弹落在街心，它跳起来，钻进了他的身体。他只轻轻地叫了一声，就按住伤口倒了下去。我对太平缸并无感情，可是我倒希望能在原处见到那一对石狮子。我不觉暗笑自己这种孩子气的梦想，我明明知道石狮子早在我离家不太久、成都街道改修马路的时候给人搬走了。那是第一次的改变。我见过一张照片，还是在我二叔去世后不久摄的。门面焕然一新了。

但有人在门口烧纸钱、冥器，看起来教人不愉快。其实门面的设计不中不西，既不朴素，又不大方，花花绿绿，不像住宅。"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没有了，连门框也变了样，换了西装。门楣题上"怡庐"二字，颇似上等茶馆。大门两边的高墙也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两排出租的铺面。听说我们家一位大师傅还在这里开过饭馆。这一天我来到门前，看到的不知道是第几次的改变。有人对我讲起，这所公馆曾经是某某中学的校舍。我一个侄女在那里上过学，我的姑母也曾进去参观，还对着花园里的茶花和桂树垂过泪。可是我看见的不再是"怡庐"，却变成"藜阁"了。门前还有武装的兵在守卫。铺面都没有了，仍然是高不可攀的砖墙。新主人是保安处处长，他想用自己的名字来确定他的所有权。他的卫兵也用凶恶的眼光注视每个走近的行人。我无法在门前多站片刻，我来回看了两次。大门开了，我看见原来的照壁，壁上仍然有那四个篆体的图案字："长宜子孙"。完全是我十八年前见过的那个样子。它们唤起了我的回忆。我用留恋的眼光注意地多看了照壁一眼，我昂起头走了。对门楣上那两个字，我不感兴趣。我相信下一次再来这里，我一定会看到另一个人名。过了一年多，我第二次来到这里，门楣上仍然是那两个字。过了将近十六年，我又到这里，"藜阁"依然，而那个作威作福的主人已经完蛋了。我终于得到了进去参观的机会。又过四年我再到这条街，不但"藜阁"二字无踪无影，连那个花花绿绿的门面和有彩色玻璃窗的门也都拆掉了。又干净、又简单、又大方的西式大门使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门墙上钉着"战旗文工

团”的牌子。我看见这个新的景象，真是满心高兴。找到了适当的新主人，连这所老屋也终于得到彻底的改造了。不消说，这是后话。当时我一边走一边想。我想的只是那四个字："长宜子孙”。它们又把我引到那个稍有眉目的中篇小说《冬》上面去。我的信心更大了。十几天以后我离开了成都。当时我写过一篇散文《爱尔克的灯光》，我说："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我想在中篇小说《冬》里说明的不外乎这个意见，后来写在《憩园》里面的也跟这样的意见差不多。今天的年轻人读到我上面那些关于“家”的话，关于“钱”的话，可能觉得好笑，但是若干年前我们许多亲戚连那种话也听不进去。我们这一房人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反而遭受那些用祖先“遗产”养肥自己的新式老爷、少爷的轻视和欺侮。我一九四一年一月和一九四二年五月两次回川，都看到金钱的威风，和钱滚钱、利滚利、坐吃山“不”空的大表演。成都正是寄生虫和剥削鬼的安乐窝，培养各式各样不劳而获者的温床。有钱的地主收了租用不完，田越买越多。头脑灵敏点的或者更贪心的老爷们还要干点囤积居奇的“生意”，因为他们看见做黄(金)、白(米)、黑(烟土)买卖的暴发户钱来得更加容易，而且那种挥金如土的阔气也着实教他们羡慕。至于那些靠枪杆子发财的大小军阀之流，在地主老爷们的眼里固然很了不起，可是他们学不上，办不到。人家可以买

尽一个县的田地，可以在家里私设水牢，可以在自己辖区内为所欲为。他们却躲在家中靠"狗腿子"奔跑，过剥削的生活。心思虽多，欲望虽大，可是能力差，胆子小，他们除了靠祖宗吃饭（当然是靠农民生活）外，什么事都干不了，换句话说，他们是些低能的废物。然而在解放以前，在旧社会里，他们却过着极舒服的日子，而且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们认为他们的家业是万世不朽的。其实头脑清醒的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走到灭亡的边缘了。

我头一次回成都住了五十天，以后仍旧到重庆去写了《火》第二部；第二次由桂林回到成都住了两个多月，以后仍旧去桂林写了《火》第三部。这其间我还写了别的文章。可是关于《冬》我一字未写。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由桂林去贵阳，在火车和汽车上我东想西想，偶尔想到那个尚未动笔的中篇小说，忽然激动起来，再也丢不开它。接连几天（当然不是整天）我的思想都在一些情节上转来转去。我五叔这个人物不断地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他把那些情节贯串起来。有头有尾的故事形成了。这就是杨老三的故事，不过"杨梦痴"的名字却是以后想出来的。此外，我还想到了两个人：离家十五年归来的小说家"黎先生"和他的旧友"姚老爷"。

到了贵阳，我无意间买到三叠西式信纸，在当时的大后方，这算是很好的纸了。我拿在手里翻了几下，非常高兴，下决心要好好地利用它。怎样利用呢？我不用多考虑，已经有了主意了。我要在短时间内开始我的中篇小说。我甚至想好了书名：《憩园》。我决定拿我们老家那个小小的花园作背景。我

曾经在那里消磨过多少青年的岁月，有一年在一次军阀混战之后，听说军队要来驻扎(先是一个马弁护送连长太太进来找房子，给挡了驾，发脾气走了。他说要引军队来驻扎，果然当天就来了一排人，但是只住了一夜。我们家里的人都担心军队再来)，我二叔要我和三哥临时搬到园里去住几天。我们两人在所谓"下花厅"里大约住了两个多星期。军队并未再来，省城里秩序逐渐恢复，我们也没有在这冷清清的客厅里住下去的必要，便搬回原处。连长太太光临的场面我已经写在《家》里了(第二十三章)。至于两个多星期的"下花厅"里的生活，它对《憩园》里的小说家"黎先生"倒有用处。因此我让"姚老爷"邀请他住到"憩园"里来。那么我不但可以把自己过去若干见闻和亲身感受借给他，而且我对"憩园"非常熟悉又有感情，写起来可以挥毫自如，不受拘束。"憩园"正是我们家那个花园的名字。我后来在小说里有这样的描写："右边一排门全闭得紧紧的，在靠大厅的阶上有两扇小门，门楣上贴着一张白纸横条，上面黑黑的两个大字，还是那篆体的'憩园'……"我们家花园的入口就是这样。不单是这个入口，连整个花园，上花厅，下花厅，以及从"长宜子孙"的照壁到大厅上一排金色的门，那一切都是照着我十九岁离家时看见的原样描写的。拿我这样的作家来说，对着范本描绘毕竟比凭空创造容易些。只有大厅上那三部包车是新添的，过去放在那里的是轿子。还有大门和门面也改变了，我是照"蓁阁"或者"怡庐"的样子，改写了它们，因为门槛不去掉，包车便拉不进去；而那两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又过时了，我也不便留他们长住。但

是我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门面，所以只用了这样简单的句子："灰砖的高门墙，发亮的黑漆大门，两个脸盆大的红色篆体字'憩园'傲慢地从门楣上看下来。"我早已说过我们老家大门上没有题字。然而堂皇地题上"憩园"二字的住宅也是有的。它是我三叔后来在玉皇观街修建的住宅，字也是我三叔自己写的。我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头一次走进这所房子，当时我一个堂姐和一个堂兄弟住在那里。房子坐落在一个窄巷里面，都是平房，地方小，没有花园，一共不过几间屋子。我对房屋不会感到兴趣，倒是"憩园"两个字唤起了我不少的回忆。我想说，倘使我不是在那两年中间到"憩园"里去过若干次，我的中篇小说一定不会有那个书名。背景用不着改变，因为花园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门楣上的题字即使不曾忘却，也不会时时在我的脑子里出现。那所房屋现在还在成都。我今年一月某一个上午散步到玉皇观街，过弯进那个巷子。我看见灰色的"憩园"二字仍然留在灰色的门墙上。可是房屋的主人早已改换，如今住在那里的应当是更适当的住户了。关于我三叔，我也曾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总之，人们对他似乎并无好感。据说他荒唐地花去了自己分到的遗产(可能只是遗产的大部分)之后，挖空心思，发挥剥削的才能，抓回来一些东西，修建了这个新居。他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死在他的"憩园"里面，还留下一个年轻的小老婆，那是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花钱买来的，她当时还只有十六岁。他相信自己的灵位在这里会得到长期的供养。可是我头一次走进"憩园"的小院，就感觉到我的堂姐和堂兄弟都不会在"憩园"里久住。我并

不是预言家。然而道理很浅显，谁也看得出那个就要到来的社会变革，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抵挡不住的。其实我那个堂兄弟也有些知道自己不过是"憩园"中的旅客，他只是在这里挨着日子。亲戚们都说他是个糊涂的老实人，他比我小两岁。我自小就同情他，我是亲眼看见他挨着他父亲的鞭子长大的。我只提鞭子，还是替他父亲掩饰。他父亲发起脾气来就喜欢打人，尤其是打他，不管他有错无错，而且不择武器，有时也用棍子打，倘使手边没有棍子、鞭子等等，那位父亲甚至会将椅子、凳子朝儿子丢过去。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我那个堂兄弟只要看见他父亲板起面孔就会发抖。然而甚至这样一位严父也没法教会儿子继承自己那一身本领。他的脑子里永远留着父亲的鞭痕。他虽然也在工作，却不能养活他一大家人，已经走上了坐吃山空的下坡路。但是解放拯救了他。现在他的住处虽然不及从前，身体也渐渐衰老，可是他心情舒畅，没有精神的负担，而且他的子女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了正路，他们都会有光明的前途。不用说，这又是以后的事了。

我喋喋不休地讲了这许多琐细的往事，我觉得它们和我那本中篇小说都有关系。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虽然只想好一个杨家的故事和一些细节，而且都很简单，可是我写起来十分顺利，因为我近旁还有一个取之不尽的仓库，仿佛有一根输送管从那里一直通到我的案头，把材料源源不绝地送到我的笔端。我带着原稿旅行，从贵阳搭长途汽车到重庆，写作不能不常常中断。然而我始终不曾遇到写不下去的困难或者停笔苦思的愁闷。我倒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笔带着我在走路。人

物自己在生活，在成长，他们常常要推翻我的计划。我也有斗争的时候，我跟我自己的缺点、我的温情作斗争，因为我动了感情，我爱上了小说中的人物，我替姚太太和杨家小孩想得太多。我更偏袒杨家小孩，由于他，我对他父亲也很宽大了。最初的杨老三故事并不是这样，可是我写出来的却不同了。我本来应当对杨老三作更严厉的谴责和更沉重的鞭笞的。可见我在这场斗争中并未得到胜利。会有人认为这是立场问题，我的说法是在替自己开脱。我不能否认。我并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是当时的读者都知道的事实。否则我也不会让笔带着自己走路，更不会让理智迁就感情。我常说我鞭挞的是制度，旁人却看到我放松了人。因此有些读者就弄不明白作者的意图何在了。

小说的叙述者黎先生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我当时已经写了几篇“小人小事”；我从前也常在朋友家中做“食客”；我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去日本，改名为“黎德瑞”，回国以后也常用这个名字。小说里有我自己的感情，也有我自己的爱憎。像关于钱的话，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还有黎先生关于“那个有钱的叔父”的话，关于“卖掉的房子”的话，都是我对人讲过的。小说里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唯一可以使我记起我幼年的东西也给他们毁掉了。”二十年前我头一次回成都，的确为不能看一眼埋葬我的童年的地方感到遗憾。虽然我明白地写道：“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可是我开始写《憩园》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没有怀旧的感情。所以我每次重读那个中篇，我便觉得“黎先生”就是一九四一年一

月到二月和一九四二年五月到七月的我。我知道“憩园”会卖掉、杨老三会惨死，姚诵诗也保不住他的儿子和他的公馆，我觉得事情应当这样发生。但是我讲起这些事情，无意间会露出几分惋惜。这种惋惜是不对的，我过去这样想，今天更不能不这样想。

我刚刚说过“黎先生”是我。现在我又得补充说：他并不是我。甚至在二十年前我也不会温情到他那个程度，为了迁就心地单纯的杨家小孩，居然心甘情愿把拯救那个无可救药的寄生虫的担子挑到自己肩上。我曾经反复地说，我的生活里、我的作品里都充满了矛盾。这样的矛盾在《憩园》里更容易看出来。“黎先生”虽然替我讲过不少的话，可是他有些言行我并不满意。

“黎先生”的朋友姚诵诗夫妇都是虚构的。姚诵诗的大名是国栋，他父亲希望他做国家的栋梁。这个人自命不凡，眼高手低，自以为比什么人都清高，却靠着父亲留下的将近一千亩田的遗产过安闲日子；他平日喜欢发几句无关痛痒的牢骚，批评旁人，宽待自己；他留过洋，做过官，当过教授，翻译过半本没有能出版的小说，却不曾认真地做过一件对人、对社会有益的事。他固然不会公开主张有钱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可是他断送了自己那个独养子的性命，就因为他相信金钱可以保障一切。说实话，我写到他儿子的死亡，写到他的眼泪，我感到痛快，感到满足。我说过我当时太温情，我不会带着过多的憎恨写这个人。但是我不喜欢他身上的许多东西，我也不喜欢他为人的态度，我更恨他岳母赵老太太一家人。这些人在

小说里始终没有露面，"黎先生"甚至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像一个鬼影笼罩在整个姚公馆的上空。其实不止是在这里，那个鬼影还在许多地方兴妖作怪，一直到解放以后鬼才让人捉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我两次回到成都，都见过那样的鬼影。我指的不一定是"赵老太太"。在那些时候像赵老太太那样的人有男有女，数目不会太小，我感觉到空气都被他们弄脏了，他们吐出了那么多的铜臭，教人给憋得透不过气来。可是一九五六年我再到成都，空气干净多了，鬼影也消失了。姚国栋也感觉到作寄生虫的可耻，老老实实地依靠自己的劳动度日了。但这不过是第一步，过去的"姚老爷"是否能得到彻底的改造，我还无法作一个肯定的回答。

姚太太万昭华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聪明美丽，性情温柔，心地善良，在小圈子里度过了二十几年，她自己说得明白："我的天地却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两个家，一个学堂，十几条街。"她好像是温室里的花朵，她只有在书本中见到广大的世界和复杂的生活，她只有在书本中"才认识那许多的不幸同痛苦"。她承认自己"像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她也想过飞到外面世界里去，她想"帮助人，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人家，让哭的发笑，饿的饱足，冷的温暖"。可是她空有好心，却缺乏勇气。最后她不得不承认自己"飞不起来。现在更不敢想飞了"。其实她在姚家不正是一只笼中小鸟吗？不正是一个"玩偶"吗？倘使没有大的社会变革，或者家庭事故、个人灾祸，她很可能安静地或者憔悴地死在笼子里面，白白地活了这一辈子。像她这

样寂寞地死去的女人在旧社会里不知道有过多少。我写《憩园》的时候，对这些好心女人的命运的确惋惜，我甚至痛苦地想，倘使她们生在另一个社会里，活在另一种制度下，她们的青春可能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她们的智慧和才能也有机会得到发展和发挥，总之她们不会做一辈子的寄生虫。的确从前办不到的事，在新社会里办到了。解放后我亲眼看见好些"小鸟"破笼飞去，像万昭华那样的女人也走出了家庭的小圈子，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做一点对旁人有益的事情，甚至对社会有用的事情。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我在成都住了四个月，我颇想写一本《憩园》的续篇，写一些家庭的变化，写万昭华个人的改变。

杨家小孩当然也是虚构的人物。我创造他，只是为了帮助杨老三。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有了这样一个小孩，我更容易把杨梦痴的性格写得明显。没有配角或"下手"，主角的好些看家本领都使不出来。我五叔不会有这样的儿子，连像寒儿的哥哥那样的儿子也没有！我在熟人家里也不曾见过类似的人物。不消说，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别的儿童的身上也有。儿子爱父亲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像"寒儿"那样依恋父亲、原谅父亲、痴心盼望父亲回心转意、苦苦地四处寻找父亲、一心一意要改变父亲的命运，这就不是"常情"了。然而我也不能说那种古怪的没落地主的家庭不会产生"寒儿"。正相反，很有可能，但并不常见。拿我自己来说，我喜欢这个小孩的"死心眼"。不过我不喜欢他对父亲那样宽容。我倒愿意他父亲得到自己应得的惩罚，所以我不曾严厉地谴责他哥哥赶走父亲的

行为。这在清朝，就是一桩了不起的“逆伦案”。倘使我的小说在清王朝兴盛的时期写出、印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定会引起“文字大狱”，连累若干人失掉生命。甚至在“五四”前后还有少数人认为“父要子亡，不死不孝”。若干个“家长”的确任意毁掉了年轻人的生命和幸福。据我所知，在一九三二年还有父亲因为女儿不遵父母之命毁弃婚约同别人恋爱，逼着女儿自杀。但是女儿并不曾使用父亲交给她的刀和麻绳，她跟所爱的人一块儿逃到了别的地方，安稳地过着幸福的生活。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还在另一个地方看见一位因为父亲干涉她的婚姻而发狂的少女。一个反抗了父亲的命令，不承认父亲的权威而取得了幸福；另一个忍受痛苦顺从了父亲的意志而终于发狂。虽然我在小说里对待杨老三过于宽大，杨家“寒儿”讲起他哥哥对待父亲的态度也颇有“微词”，但是他哥哥仍然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愉快地工作和生活，这说明时代究竟不同了。封建势力在当时已经成了纸老虎，它不可能强迫多数年轻人在愚忠愚孝的招牌下牺牲自己所宝贵的一切了。然而要说像这样的年轻人就能够长久愉快地工作和生活下去，连我也不相信。在旧社会大崩溃的前夕，还想靠一些人事关系和一点事务才干来保全自己这种苟安的生活，简直是梦想。他要是不动，就没有前途。事实上他也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可能。他同我那位堂兄弟（我五叔的儿子）一样，一直埋怨自己父亲把祖先遗下的田产卖光，教自己过不了阔日子。解放以后他倒应当感谢他父亲不曾留给他这样的遗产，他今天还可以用自己两只手工作度日；否则他就只有步我另

一个堂兄弟的后尘了。那是我一个远房的兄弟。他比我小两岁，他父亲在日，他是个阔少爷。他父亲死后留给他不少的田产。成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过了四十。可是他除了花钱以外，什么事都不会干。我当初在家，他不过十六七岁，就听见人说他在外面荒唐。他婚后多年果然一个孩子也没有，退了押以后他们夫妇毫无办法，他只好靠卖烟丝跑茶馆过日子。他的妻子受不了苦发了精神病。他自己也熬不下去，悄悄地投河而死。我写《憩园》的时候，他正过得很舒适，也有少数亲戚因为他有钱常常跟在他后面拍他的马屁。他当时沉醉在金钱万能的好梦里，绝不会想到十年以后有这样的下场。我对他的死毫不惋惜，我觉得这是他自己挑选的路，也是他父亲替他挑选的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很公平的事。不过论为人，他倒胜过他两个哥哥几分，他不及他们狡猾，也没有他们那些害人的心思。但是他们有儿有女，还可以勉强继续过寄生的生活。他们固然不可能得到改造，然而在人民掌权的新社会里，他们更不可能作恶害人了。

我讲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杨梦痴呢？"读者们一定明白我是拿我五叔作模特儿写了他的。但是我写出来的杨梦痴跟我脑子里想的那个人并不完全相同。我的笔给那个人增加了一些东西，我把他写得比我五叔好。他最后毕竟关心别人了。我五叔却始终只顾到自己（卖公馆分到的钱当然也是他花光的），倘使完全照我五叔的性格写下去，杨梦痴的故事可能缩短一半。人物自己向前跑，改变了故事，打破了作者脑子里的那个框子，教作者的笔跟着他跑，这样的事在有些作家中

间也常常发生。他们把这个叫做"人物的背叛"。有一些根据提纲写作的作家也会遇到这种事情，何况我这个习惯了信笔直书的人。其实这里并没有神秘不可理解的地方，作者的思想、感情、立场、观点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缺点无可掩盖地暴露出来了。我至今还感到遗憾的是，我的小说带了挽歌的调子。

任何事情都有结束的时候，我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发表了以上的长篇大论，也应该休息了。反正话是说不完的。有人认为作者不应当在作品以外发言，那么我写的全是废话罢。废话当然也有穷有尽。请允许我在"闭嘴"之前讲一讲李老汉和老文这些人。话不会多，但是怀念很深。我是照着他们的本来面目写下来的。这所谓"本来面目"也只限于我当时看见的。我承认我的了解很浅。然而我爱他们，我的确曾经把他们当作我的好朋友，我至今还想念他们。虽然他们早已逝世，可是我闭上眼睛，好像他们还在我的眼前。作家也有为自己写作的时候，我写这些人，可以说是为我自己留一个纪念品。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他们给我幼年的回忆增加了色彩。善良的人的纪念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人死了，花园成为平地，在废墟上建起新的房屋。旧时代、旧社会的垃圾逐渐地扫除干净了。今天新社会的灿烂阳光照亮我的书桌的时候，李老汉这般人仍然活在我的脑子里。但这不一定是读者们所关心的事情了。

1961年11月12日。

谈《第四病室》

我最近翻出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写的《第四病室》的原稿。那些用毛笔写下的歪歪斜斜的字在我的眼里显得非常亲切。我想起我那个时候的生活，我想起小说中的故事，我想起"第四病室"本身。我的确住过这样的病室。小说《第四病室》其实是真实生活的记录。

一九四四年五月到六月我在贵阳中央医院的三等病房"第三病室"里住了一个时候。我记不起正确的日期，也忘记了我究竟做了多少天的病人。可是"第三病室"的情景和病人的日常生活，还有某几位医生和护士的面貌以及言语动作，我闭上眼睛就看得清清楚楚。我并不愿意把这些人和事情长久记住。然而太深了的印象是无法轻易抹去的。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开始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因为"记忆犹新"，我的确有"重温旧梦"的感觉。不过这不是"好梦"，这是一连串的噩梦。无怪乎我当时为小说中许多繁琐的细节十分激动。读者们有理由不喜欢这本书，因为小说中来来往往的人物较多，而病室里人们又喜欢用号码代替病人的姓名。匆忙的读者翻开书只见"第×床"、"第×床"在活动，却弄不清楚那些病人"姓甚名谁"。我们的祖先有个好习惯：自报姓名。我自小爱好戏曲，

看见人物上场，自言自语，几句话就把自己介绍得明明白白，故事讲得清清楚楚，我不但当时很满意，到现在我仍然佩服剧作者那种十分出色的简练手法。不幸我没有学到这个本领，因此我一开头就把读者引进迷宫去了。更可笑的是我竟然"赐"给某一个病人两个姓，过了十五年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在《文集》付印时改正了。

我一开头就谈这个，无非老实告诉读者《第四病室》是失败之作。尽管这样，我还是要说，我颇喜欢它。小说写出了我过去的那段生活。不过任何时候我翻开书，我看到的都不是自己，都是当时同我在一起受苦的那些人，还有我们在其中受苦的那个社会。我还记得小说写好交出去的时候，出版公司要我写一个简短的"内容提要"作广告的底本，我便写了这样的话：

> 作者让一个简单、朴实的年轻人为我们叙述一些痛苦的故事。第四病室，一个阴暗的角落，人们在受苦、挣扎、死亡，不管另一些人怎样企图改善他们的命运，但是友情也在这环境中生长，人与人互相接近，甚至死亡和离别也不能分开他们，阴暗的病室被这友情照亮了。……①

我记得"提要"里还有"小小的第四病室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缩影"这一类的句子，出版者大概害怕得罪人招来麻烦，没有采用它们。其实我写出那一段真实的生活，我的动机便

① 这是广告辞的初稿，与解放后重版的《第四病室》的"内容提要"或"内容说明"不同。

是控诉当时的社会。出版者虽然在广告上删去那句主要的话，可是读者们仍旧了解作者的用意。要不是为了控诉，我为什么不惮烦地把过去的生活那么详尽地记录下来，拿它折磨别人，折磨自己呢？

我一再地提到“记录”二字，只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和事情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实的。经过作者加工的人物只有两个，一是书中的“我”，二十三岁的陆怀民；另一个不用说便是年轻女医生杨木华。第六床朱云标最后的死也是我增加的，我当时只看见朱云标给人用担架抬到内科病室去，并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搬走后两天我就出院了。至于烧伤工人悲惨的死亡，患梅毒、吃长素的老人静悄悄的去世，摔断了手的司机的受尽折磨……全是真人真事。我在这里做的不过是照相师的工作。生活本身已经够丰富了，还用得着我这管破笔为它加一些颜色？既然有人从一滴水中看出了一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在一个病室里看到当时半壁江山的中国社会呢？

第四病室同我在十七年前住过的第三病室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在小说里取消了十张病床。那间真实的外科男病房一共有三十四张床位，因此也显得更拥挤，更嘈杂，更不干净。在那里的生活也可能更不舒适。我记得自己在病房里睡的就是小说中陆怀民睡的那张第五床。原来的病人死在我入院那天的早晨，听说他是个害传染病的内科病人。我住院的时期中，整整有两天我左右两张病床上都是斑疹伤寒的患者。我虽然患着另一种病（我的胆囊并未发炎），虽然我的年龄比陆怀民的大得多，我们的思想感情也并不相同，可是我们

两个住的是同样的病床，接触的是同样的一些人，我们同样是远离家乡的单身旅客——我把自己的一部份经历借给陆怀民了。我并不是头一个，一般的小说家都喜欢干这种事情。有些"好事者"因此常常把小说人物同作者扯在一起，热心地做什么考证或者索隐的工作。我不怕别人说陆怀民是我的化身，因为我并不是陆怀民。我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经历写在小说里面，并无特别的用意，我觉得这样写更方便，更真实，也更亲切。我的确有这样的体会：耳闻不如目睹，目睹不如身受。然而我的"身受"毕竟有限，我写一个人物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包办代替"。所以陆怀民的身世就不同于我的。他也另有他的结局。我还害怕有人误会，又在小说的前面加上一篇《小引》，发表了陆怀民写给我的信和我的回信，让读者相信陆怀民这人并非虚构。不消说，不会有人上当，正如没有人相信《狂人日记》的作者真是狂人。

话说回来，我当初住进这个病室，它的拥挤、嘈杂、不干净等等都不曾使我感到惊奇。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觉得奇怪的倒是，住进了医院，还得自己花钱买药。在这里并不是对症下药。你虽然害着可治之症，你没有钱买药，医生们也会眼睁睁看着你死去。那个烧伤的工人就是这样地断气的。断手司机的病也是这样地给耽误了的。有的人没有钱买胶布，便不能及时换药，更不用提营养品等等了。其实不仅医生和护士，不仅院长和工友，连病人和家属也知道医院的职责在于治病救人，在于减轻病人的痛苦。可是这一切在当时的病房里都成了空话。我亲眼看见病人在这里受到多大的折磨，

医院里的人怎样给病人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痛苦。我躺在病床上常常问自己："这种种不合理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回答十分简单："在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下，在不合理的社会里，天天处处都在发生不合理的事情。"我并非不知道这个，我也明白这个小小的病室跟蒋介石统治下的地区是分不开的：在这里发生的事在外面也一样地发生。可是看到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我仍然会愤慨，痛苦，会因为自己束手无策而感到痛苦。我相信在医生和护士的脑子里一定发生过这样的疑问，而且我也曾听见他们(他和她，我特别提出"她"字，我觉得那些十七八岁的护士小姐都是很纯洁、很善良的)不止一次地发过牢骚。然而像杨木华那样的医生却不是真实的人，至少我没有见过，也不曾听见任何人讲起她。

好罢，我就先从杨木华大夫谈起。拿外貌说，我在病室里常常看见这样一个浓发大眼的女医生，连举止、连服装都同我所描写的一样。我不知道她的姓名，我也没有机会跟她谈话，因为我不是她的病人。只是我常常看到她的笑容，在这个阴暗的病室里，这样的笑容也能带给人一点希望和亮光。当时在贵阳我的朋友少，而且没有人知道我住进了医院，所以从入院到出院，我始终是孤零零一个人。我在医院里施过两次手术，两次开刀都是局部麻醉，我的脑子始终是清醒的。虽然没有剧痛，但是那种小的痛楚和不舒服也会达到难熬的地步，那些时候，我除了背诵唐诗以外，还常常幻想听见一两句温言暖语。手术完毕，给人抬回病室，麻醉药性已过，我感到极不舒服，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人对我讲两句安慰和鼓舞的话。在疼痛难熬

的时候，在头痛心烦不能睡眠的时候，我会单纯得像一个少年，就像陆怀民那样，我的确把医生当作救星，盼望他给我灵药，使我的心灵得到休息和安宁。可是医生们并不注意病人的心灵，他们倒习惯于把病人当成机器，认为只有用科学医治百病，甚至于吝啬一个好意的微笑或者一声亲切的招呼。我若说我所遇到的医生有点像冷冰冰的机器，一定有人责备我有成见，不然便说我根据片面的观察。而我自己的解释却是这样：我对他们的期望太高，所以失望也很大。不过小说中写的一个医生粗暴地批评病人、另一个医生跟病人吵架的事情却是千真万确，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在那些时候只有把期望寄托在幻想上，我想象出一位“爱跟病人讲话”的杨木华大夫。每逢我体力较差、心烦意乱，我常常把幻想同真实混在一起，在现实的环境里放上那个虚构的人物。反正外形是现成的。我看到那位貌似豪爽的实习医生（我甚至不曾跟她谈过话，也难得听见她讲话，因此我只能用“貌似”二字），就好像看见小说中的杨大夫，她渐渐地在我的眼前和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读者同志不要笑我在做“白日梦”。请原谅，受到疾病折磨的人的心灵仿佛干枯的禾苗，多么需要甘霖。我就这样一天一夜、一点一滴地创造了杨大夫的心灵 今天看来她的心灵也极不丰富。可是当时她却给了我一些安慰和鼓舞。不然，要我那么寂寞地在这样的病室里度过二十天，可把我憋死了！我在这里只说到心灵，因为我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创造、加工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相貌是现成的，我天天看见；至于举动、工作等等，也不需要我凭空创造。这个病室里还有一位姓洪

的女医生，身材高高，面孔白白，爱讲话。她好像是外科的值班医生，整天相当忙，像后颈生疮的老人、骑自行车摔伤腿的少年……都是她的病人。小说里杨大夫的病人除了陆怀民以外都是由洪医生治疗的。我把洪医生诊病、上药、换药等等的动作和讲话完全真实地写了下来，而且全记在杨大夫的账上。所以也可以说，杨大夫是由那两位女医生拼凑成功的。这就是说：一个出外形，一个出技术。心灵和感情呢？那得由作者拿出来了。至于身世等等，作者也可以随意编造。我把她的家放在衡阳，只是为了安排她回家去把母亲、兄弟接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以便造成她在金城江火车站大爆炸中的死亡。

在小说的《小引》里我终于写出了杨大夫死亡的消息。但是我并未肯定地说她已经死亡。我只是暗示，我又声明这是道听途说。我还说要继续打听她的消息。其实我最初的企图并不是这样。我很想明确地说像杨木华大夫那样善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里活不下去，她一定会得到悲惨的结局。然而写到最后我的想法变了，我愿意留下一点希望，哪怕是渺茫的希望也好。去年年底我在成都校改《第四病室》，我自己也受不了那种等于空虚的渺茫的希望，我要让她活下去。我又把《小引》中我那封回信改了一遍。改动虽然不大，但是她不死的可能性更大了。我愿意让这样一个人长久地、健康地活下去。她要是活到今天，一定能够认真地改造自己。

是的，杨大夫一定会接受改造的。过去她不是革命者，也不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人士。然而她是一个热心帮助人的心地善良的医生，也热爱她这个治病救人的职业。她不仅关心病

人的肉体，也常常注意他们的心灵。她爱读书，也喜欢把自己读过的书介绍给病人。她一共借了两部书给陆怀民。第一部是《唐诗三百首》。我当时进医院就只带了这一部书。我常常读它，第六床也借去朗读过。我在手术台上心里难受的时候，也不断地暗暗背诵唐人的绝句，那些诗可以把我带到另一种境界里去，也可以使我的心平静。我觉得好诗对病人有益处，爱读书的杨大夫一定会注意到这个。所以我把《唐诗三百首》写上了。第二部书本来是《在甘地先生左右》，这是一个崇拜甘地的中国青年写的一本薄薄的小书。在小说的原稿中杨大夫还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这本书，它把甘地写得可爱极了。他多么善良，多么近人情，他真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真正的伟人应该是这样的。"我自己当然不是甘地的信徒，我也不想替他宣传。我在写小说的时期中，无意间读到这本书，便想起了杨大夫。我开始想象她读了这本书有什么意见。我想来想去，就写出了上面的话。用那一段话来说明杨大夫的思想和她的性格，也并非不适当。那本书和那段话在头几版的《第四病室》里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后来我这本小说换了出版的地方，好心的编辑同志认为替甘地宣传，可能引起读者的误会。我听到这样的意见以后，又想起知道那本小书的人既然很少，我为什么要替它做广告呢？来不及仔细考虑，我匆匆地替杨大夫换上另一本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约翰·克利斯多夫》第一卷。我不过设身处地替杨大夫想：这本书可以给病人一些安慰和忍受痛苦的勇气。罗曼·罗兰当初是人道主义者，杨木华大夫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不用说，还得加上"资产阶

级的"这个形容词。我还得声明，我自己有一个时期也喜欢《克利斯多夫》，我从它那里得过益处，所以我一想就想到了它。我为什么不换上另外的书呢？有的书我一时想不起来，有的书对杨大夫不合式。要是杨大夫常常把进步书报借给病人，她可能早就给人抓起来或者赶出医院去了。那么她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了。

谈过了杨大夫，我还想提一提陆怀民。我已经说过，这个二十三岁的失业青年完全是虚构的。他在小说里也不起什么作用。我仅仅借用了他的一对眼睛，让它们看出病室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那些平凡人物的生活的悲剧。但是我为什么写他入院来割胆囊呢？我自己不曾有过那样的经验，连"全身麻醉"是什么滋味我也弄不清楚。要不是睡在我右面第三床的病人因为胆囊发炎住院来"施大手术"，那么我做梦也想不到让陆怀民进医院来割胆囊。第三床跟我离得近，他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耳朵和眼睛。医生给他施了手术，却来不及拿掉胆囊，这也是真事。甚至病人和实习医生关于头等病房那个病人的谈话也有一半是真话。不消说，感激的话是我加的。医生也不是像杨大夫那样的女医生，他的确好意地向病人解释头等病房那个人身体好，受得住，并非大夫另眼看待。只是第三床始终不满意，虽然他当时精神差，不曾大发牢骚。至于是否另眼看待，连我也怀疑那位医生的解释。头等病房和三等病房明明是两个世界，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要说不是分别待遇，怎么能教人相信呢？难道头等病房的病人也常常让"老郑"骂来骂去吗？

在病室里我眼睁睁看见两个病人的死亡。那个烧伤工人的惨死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至今还不曾忘记他那充满痛苦的号叫。他在断气之前不知道叫了多少声，却始终没有人为他做任何事情，就只见工友来把他那只鲜血淋淋的胳膊牢牢地绑在板凳脚上。在我的小说里第十一床怨气冲天地向他的朋友诉苦道："我没有钱，哪里有药吃？我的伤怎么好得了？天天打针受罪……他们就让我死在医院里不来管我……"我的确听见那个烧伤工人说过这样的话。大夫天天给他打针，打的是医院里制造的盐水针。至于要花钱的治病和止痛的针药，他当然享受不到。医院里一位年轻大夫对他说："你是替公司做事烧坏了的，论情理、凭良心、他们都应该出钱把你医好。"可是公司里的"股长"却答复他的朋友和同事道："他受伤是他自己不小心，公司并没有责任，上次给的医药费已经很够。现在一个钱也不给！"公司完全不管，医院不认真管，他一个钱也没有，就只好受尽痛苦地死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真人真事。我当时的愤慨是很大的。可是我睡在病床上又能作什么呢？十四年以后，一九五八年六月到八月我到上海广慈医院去采访丘财康同志的事迹。我和几位外科医生谈过话，我也看到烧伤工人丘财康同志的病房和他在医院里受到的医疗和看护。十一床的病比丘财康同志的病轻，他的烧伤面积也小得多。可是丘财康同志今天健康地活着，十一床却死得那么悲惨。今天整个社会同心协力救活一个烧伤工人，要药有药，要血有血，要皮有皮；十四年前一个烧伤工人在三等病房里受尽冷落和侮辱、得不到治疗，甚至没有人为他尽一点

力。这就说明了新旧社会的不同。两个制度的优劣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我还记得丘财康同志在广慈医院中有一次病势恶化，右下肢感染厉害，发生了截除右下肢的问题，一天晚上我到医院去，在那间专门为丘财康同志布置的隔离病房附近的一个较大的阳台上，医生和专家们正在举行会诊，严肃认真地研究怎样保存病人的右腿。情况严重，病人的痛苦增加，医生、护士们脸上都带着愁容，但是没有一个人放弃希望，大家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行战斗。我们称这个为"挽救生命的战斗"。这的确是一场艰苦的战斗，然而胜利来了。丘财康同志的生命保全了，他的腿也保全了。后来有一部关于这个战斗的记录电影片，叫做《生命的凯歌》，又有一部故事片叫做《春满人间》。它们感动了、教育了多少人。其实真实的生活比艺术更丰富，更激动人心。广慈医院一位医生谈到他那个烧伤的病人，他情不自禁地说："我们爱他。"一个护士说："病人每一次痛都痛在我的心上。"另一个护士在日记里写着："时间真快，夜班又要下班了，真想在病人旁边多留一会。"第三个护士报名献皮以后在日记里写道："只要能为老丘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都是光荣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在旧社会里连做梦也想不到。我惭愧我这管无力的笔没有能替过去时代许多屈死的冤魂报仇雪恨，我只做了一个袖手旁观的空头作家。

此外，我还想谈谈第二床那个生疮的老病人和他的儿子。我在这父子两人身上并没有增加过什么。连他们的谈话，连"李三爷的地"，连"四宝"母子的探病，连漱口盐和猪肝汤，连

最后静静的死亡……无一不是真实的。在小说最初的版本里，第三章有一段杨大夫拉着儿子扎耳朵取血的描写。过了几年忽然有人提意见，说要输血不能靠扎耳朵取血去化验。这明明是我目睹的事实。然而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把那一小段删去了。我从前看见那位姓洪的女医生"提住他的左耳，拿针往肉里扎"。后来我把这笔账记在杨大夫的名下了。这是我的粗心。我当时不曾想到，洪医生可以干那件事，杨大夫却不可以。杨大夫纵然不同情那个小公务员，她至少会可怜他，无论如何总不会不得他同意就捉住他扎耳朵取血。杨大夫不是那样的人。我应当删去那些不适当的描写。这说明虚心对待别人的意见，总有好处，即使他指的是东，我若认真考虑，也有可能看出西面的绊脚石来。

从上面这几句话，细心的读者也看得出我并不像洪医生那样厌恶那个小公务员。刚相反，我倒有点同情他，我至今还责备老病人的自私。但是可能有许多读者另有不同的意见。我当初写文章，喜欢说个痛快，本来用两句话便说得明白的，我往往写上四五句。稍后我懂得了一点"惜墨"的道理，话也渐渐地少起来。可是积习难改，我还会重犯唠叨的旧病。所以在我后期的小说《第四病室》中，我有时说了又说，还怕人不明白；有时又省去一句两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论断或者下结论。我写那个儿子到病房一次要洗几回手，我写他不断地向人诉苦……这都是他自己做过的事，而且也有权利这样做，谁也没有理由批评他。愚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父亲只关心自己，丝毫不顾儿子的死活。老人的这场病和丧事一

定会缩短儿子的生命。他要偿还那笔债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应当受谴责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是那个靠薪水度日朝不保夕的小公务员！但也有人认为我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儿子的不满，甚至有人说我有意批评儿子的不孝，这要怪我不曾说得痛快，没有讲得明白。我省去了当讲的话，只好在这里向读者认错了。

写到这里，我觉得可以打住了。关于那些用英国粗话骂病人的架子十足的名医，我本来还有不少的话可说，然而在那个时期，他们过的生活还不如任何一个偷带"黄鱼"、盗卖汽油的货车司机，更比不上做黄（金子）、白（大米）、黑（鸦片烟）生意的商人。他们的气派只是在外表，回到家里他们一样地叫苦，走到外面也一样地遭白眼、受冷落。我不忍心再让他们出洋相了。我在《小引》里讽刺了当时重庆的卫生局局长，我至今还因为挖苦过那种不负责任的道地官僚感到高兴；我也因为骂过当时充满"陪都"书店的色情读物感到十分痛快。那些我无法写进小说里的话，总得找个地方记下来，所以我很重视《序》、《跋》、《后记》、《小引》等等别的作者不一定喜欢的东西。我这个人缺乏口才，不善词令，因此拿起笔就哓哓不休。倘使能治愈这个毛病，当然也不是坏事。

1961年10月25日。

谈《寒夜》*

我前不久看过苏联影片《外套》，那是根据果戈理的小说改编摄制的。影片的确不错，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可是我看完电影，整个晚上不舒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上，而且有透不过气的感觉。眼前有一个影子晃来晃去，不用说，就是那个小公务员阿加基·巴什马金。过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渐渐淡去。但是另一个人的面颜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务员。

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少肉，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像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像这样的人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认识不少。他们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饱。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儿的生活不曾得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作品》新一卷第五、六期合刊。

到安排和保障，他们到死还不能瞑目。

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像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了几页就搁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那时在重庆，在国统区仍然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像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我对他们有感情。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用照相机整天摄影；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讯报导。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

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我熟习的，咖啡店是我熟习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习的。小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习。我住在那间与老鼠、臭虫和平共处的小屋里，不断地观察在我上下四方发生的一切，我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写进小说里面，我经常出入汪文宣夫妇每天进出若干次的大门，早晚都在小说里那几条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开水”的老主顾，整夜停电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骚，我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阴暗环境。《寒夜》第一章里汪文宣躲警报的冷清清的场面正是我在执笔前一两小时中亲眼见到的。从这里开始，虽然过了一年我才继续写下去，而且写一段又停一个时期，后面三分之二的原稿还是回到上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脱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虽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写得很顺利，好像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像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甬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

菜……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幸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感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的看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

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幢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被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像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镂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像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

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像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像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

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者。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像我的朋友彼得罗夫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间有的完全忍受，像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树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也感到惭愧，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谅，把不行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

像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整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合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这个平日锺爱儿子的母亲到了怒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了。结果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么些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

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然而苟安的局面也不能维持多久，他终于害肺病，失业，吐尽血，失掉声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终没有能等到她回来再见一面。

曾树生和她的丈夫一样，从前也是有理想的。他们夫妇离开学校的时候，都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可是到了《寒夜》里，她却把什么都抛弃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金较高的位置，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来培养儿子读书，来补贴家用。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写信给她丈夫说：“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绝不会想到，也不肯承认，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她从来就不曾为着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她离开汪文宣以后，也并不想离开“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花瓶”。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年纪比她小两岁的陈经理，但是除非她改变生活方式，她便难

摆脱陈经理的纠缠。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点钱。她要跟他决裂，就得离开大川银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了。她很可能在陈经理的爱情里寻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她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她不像一般母亲关心儿子那样地关心他，他对她也并不亲热。儿子像父亲，又喜欢祖母，当然不会得到她的欢心。她花一笔不算小的款子供给儿子到所谓“贵族学校”念书，好像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她在享受她所谓“自由”的时候，头脑里连儿子的影子也没有。最后在小说的《尾声》里，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只看见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影片中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感激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

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是自私的女人。

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局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的控诉"①。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抗战胜利后一切都有办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的时候。我的憎恨是强烈的。但是我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的是希望，而不是绝望。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曾树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我的"控诉"也是没有出路的，没有力量的，只是一骂为快而已。

我想起来了：在抗战胜利后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停电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国路一带散步，曾树生所见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回上海，却走不了。我听够了陌生人的诉苦，我自己闷得发慌，我也体会到一些人的沮丧情绪。我当时

---

① 解放后我为《寒夜》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甩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

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出我在寒风里地摊前的见闻。一年多以后，我写到《寒夜》的《尾声》时，也曾参考这篇短文。而且那个时候（一九四六年最后两天）我的情绪也很低落。无怪乎我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

我还想谈谈钟老的事。并不需要很多话，我不谈他这个人，像他那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里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旧社会里钟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帮一点小忙。谁也想不到他会死在汪文宣的前头。我写他死于霍乱症，因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霍乱流行，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却偏偏大言不惭，公开否认。文化生活出版社烧饭老妈谭嫂的小儿子忽然得了霍乱。那个五十光景的女人是个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乱，却跑去向中国菩萨祷告，求来香灰给儿子治病。儿子当时不过十五六岁，躺在厨房附近一张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劝谭嫂把儿子送到小龙坎时疫医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儿子抬去了。过两天儿子便死在医院里面。我听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讲起时疫医院里的情形，对那位局长我感到极大的憎恶。我在《寒夜》里介绍了这个“陪都”唯一的时疫医院。倘使没有那位局长的“德政”，锺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说里当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这些话只是说明作者并不常常凭空编造细节。要不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害霍乱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对我讲过时疫医院的情形，我怎么会想起把锺老送到那里去呢？连锺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那位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

病。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见他，他脸色苍白，经常咳嗽，以后他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像汪文宣，他从来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伤害别人，他到处都不受人重视。他没有家，孤零零的一个人，静悄悄地活着，又有点像钟老。据说他进医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开口，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病痛。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文安"。听说他是因别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发展到喉结核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我为他们感到不平、感到愤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愧悔。我根据我的耳闻和目睹，也根据范予病中的来信，写出汪文宣病势的逐渐发展，一直到最后的死亡。而且我还把我个人的感情也写在书上。汪文宣不应当早死，也不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终于惨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应该受尽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们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了。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过旧社会，为那些人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像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优越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

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两天我重读《寒夜》，好像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20日。

谈我的短篇小说*

我写过将近一百篇短篇小说，可是到现在我还讲不清楚短篇小说的定义。我对自己写过的那些短篇全不满意。我读过不少好的短篇作品，普希金的、莫泊桑的，契诃夫的，高尔基的……作者的名字太多了，用不着我在这里一一地举出来。有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当时所谓"被压迫民族"（当时更习惯用"弱小民族"这个不大适当的字眼）的作家们写的短篇小说：它们字数少，意义深，一字一句都是从实际生活里来的。那些作家把笔当作武器，替他的同胞讲话，不仅诉苦，伸冤，而且提出控诉，攻击敌人。那些生活里充满了苦难、仇恨和斗争，不仅是一个人的苦难和仇恨，而且是全体人民的，或者整个民族的。那些作家有苦要倾吐，有冤要控诉，他们应当成为人民或民族的代言人。他们应当慷慨激昂地发言，可是他们又没有那样的机会和权利，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不让他们讲得太多。所以他们必须讲得简单，同时又要讲得深，使读到他们作品的人不仅一下子就明白他们的话，而且还要长久记住他们的话。这些短篇中国过去介绍了一些，对中国的读者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人民文学》六月号。

和作家都有一点点影响。我感觉到它们跟我们很接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受到内外的压迫，我们人口虽然众多，却被人当作"弱小民族""宰割"。不论是在北洋军阀或者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时期，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见到外国人不敢抬起头。我们受到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受到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压迫。有一个时期我们的记者对军阀政客说了不恭敬的话就要坐牢，砍头。有人写了得罪外国人的文章也会吃官司。二十三年前我在日本住过几个月。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天天骂中国，把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我实在气不过，写了一篇短文回敬几句(题目是《日本的报纸》)。谁知文章寄到国内，已经排好，国民党的检查老爷终于看不顺眼把它抽去。在那一年四月溥仪到东京的前一两天，神田区警察署的几个便衣侦探半夜里闯进我的房间，搜查了一阵，就把我带到拘留所去关了十几个钟头。我出来写过一篇《东京狱中一日记》，寄给上海的《文学》月刊。在这篇文章里我比较心平气和地叙述我十几个钟头的经历，而且我删去了一些带感情的句子。我万想不到这篇文章仍然过不了检查老爷这一关。他还是用笔一勾，把它从编好的刊物中抽去。幸好他还不曾没收原稿。我后来在原稿上加了一点虚构的东西，删去东京和日本这一类的专名词，改成了一篇小说。这个短篇没有在刊物上发表，却收在集子里出版了。这就是《神・鬼・人》里的《人》，我还加了一个小标题：《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机构因为《闲话皇帝》的事件①得罪了日本人，已经偷偷地暂时撤销了。倘使它还存在的话，恐怕

我连关在屋子里做噩梦的机会也不会有了！

我本来在讲所谓“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讲它们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现在却扯到国民党检查老爷的身上了。为了对付检查老爷，我也学到一点“本事”。这也许跟那些小说有点关系。要通过检查，要使文章能够跟读者见面，同时又不写得晦涩难懂，那些小说的确是好的范本。可惜我没有好好地学习，自己也缺少写作的才能，所以在我的短篇小说里不容易找到它们的影响。我想起了我那篇叫做《狗》的小说，它也许有点像那一类的作品。这个短篇的主人公“我”把自己比作一条狗，希望自己变成一条狗。他“在地上爬”，他“汪汪地叫”。他向神像祷告说：“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他最后被人关在“黑暗的洞里”。他说：“我要叫，我要咬！我要咬断绳子跑回我的破庙里去。”今天的青年读者也许会疑心我这个主人公有精神病。不然人怎么会愿意变狗呢？怎么会“在地上爬”、“汪汪地叫”呢？其实我的主人公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只是在控诉旧社会。旧社会中，就像在今天的英、美国家那样，穷人的生活的确比有钱人的狗还不如。几十年前上海租界公园门口就挂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殖民主义者把普通的中国人当作“狗”看待。小说里那些“白皮肤、黄头发、绿眼珠、高鼻子”的“人上的人”就是指殖民主义者。小说

---

① 一九三五年五月《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闲话皇帝》，文中提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名字，日本外交当局便以侮辱友邦元首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马上查封该刊，并判处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

主人公是在诅咒那些殖民主义者。他并不是真正在地上爬，汪汪叫，想变成一条狗。他在讲气话，讲得多么沉痛!“黑暗的洞”不用说是监牢。主人公最后给捉起来关在牢里去了。不过他仍然要反抗，要叫，要咬。我在这篇小说里写的是在内外的压迫与剥削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悲惨生活。小说一共不到五千字，是在一个晚上一口气写成的。我拿起笔，用不着多想，手一直没有停过。那天下午《小说月报》的编者托人带口信，希望我为他们写一个短篇。我吃过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上走了一阵。那条马路当时被称为“神秘之街”，人行道上无奇不有。外国水手喝醉了，歪歪倒倒地撞来撞去，调戏妇女，拿酒瓶打人。有时发了火，他们还骂人为“狗”。我散步回家就拿起笔写小说。那个晚上我又听到了“狗”字，我自然很激动。我已经有了小说的题目。我写的是感情，不是生活。所以我用不着像工笔画那样地细致刻画，在五千字里面写出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只需要写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小说的结尾本来不是“要咬断绳子”的那一句。我原来的结尾是“我再也不能够跪在供桌前祷告了”。后来这篇小说翻成英文，英译者把最后这一句改为“我再也不向那个断手的神像祷告了”。我看到了译文才感觉到我原来那个结尾的确软弱。所以我一九三五年编辑短篇小说集的时候，便改写了结尾，加上“要咬断绳子”的话。

《狗》自然不是我的第一个短篇，不过它总是我早期的作品。其实不论是我早期的或后期的短篇，都不是成功之作。我在创作的道路上摸索了三十年，找寻最适当地表达自己思

想感情的形式，我走了多少弯路，我的作品中那些自己的东西也都是很不成熟的。《狗》也许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可以说是我的"创作"。我在前面说过它有点像当时所谓"被压迫民族"作家写的小说，也只是就情调而言。我和那些作家有相似的遭遇，也有一种可以说是共同的感情，所以作品的情调很接近。但是各人用来表现感情的形式却并不相同。我有我自己的东西。然而哪怕是我的"创作"，它也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它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连那个"狗"字也是租界上的高等洋人和外国水手想出来的，我不过把它写在小说里罢了。

严格地说起来，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不过这所谓生活应当是我所经历的生活和我所了解的生活。生活本身原来极复杂，可能我了解得很简单；生活本身原来极丰富，可能我却只见到一些表面。一个作家了解生活跟他的世界观和立场都有极大的关系。我的生活知识本来就很有限，我的思想的局限性又妨碍我深刻地了解生活。所以我的作品有很多的缺点。这些缺点在我的短篇小说里是一眼就看得到的。我常常想到爱伦堡的话："一个人在二十岁上就成了专业作家，这是很危险的。他不可能做好作家，因为他不知道生活。"我觉得我充分了解这句话的意义。倘使拿我的短篇跟我所尊敬的几位前辈和同辈作家的短篇相比，就可以看出来我在二十几岁就成为专业作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了。

我在前面讲到我的短篇小说，把它们分成早期的和后期的。我的早期的作品大半是写感情，讲故事。有些通过故事写出我的感情，有些就直接向读者倾吐我的奔放的热情。我

自己说是在申诉"人们失去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以后的悲哀"，其实也就是在攻击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但是我并没有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无情的暴露，也没有多摆事实，更没有明明白白地给读者指路。我只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在我早期的短篇里我写的生活面广，但是生活并不多。我后期的短篇跟我早期的作品不同。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让我的感情毫无节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了。我写了一点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小人小事》里的《兄与弟》、《猪与鸡》就是这一类的作品。但是这样的短篇似乎有一点点晦涩，而且它们在我的作品中也占少数。我在写作生活的初期也曾写过不倾吐感情、不讲故事的短篇小说。例如《罪与罚》，它写一个普通珠宝商人所犯的"罪"同他自己和他一家人所得到的"罚"。这是根据一九二八年巴黎报纸上的新闻改写的。完全是真人真事。我把报上几天的记载剪下来拼凑在一起来说明我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法律是盲目的；"罚"往往大于"罪"。但是在这篇小说里我却没法指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实：有钱有势的人犯了"罪"却可以得到很轻的"罚"，甚至免于处"罚"。这个缺点倒不是来自我的思想的局限性。说老实话，我的材料限制了我。我缺乏生活，我也缺乏驾驭文字的能力。

我又扯远了。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一件事：我的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可以归类在早期作品里面。它们中间有的是讲故事，更多的是倾吐感情。可见我的确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

也没法创造精心结构的艺术品。我写小说不论长短，都是在讲自己想说的话，倾吐自己的感情。人在年轻的时候感情丰富，不知节制，一拿起笔要说尽才肯放下。所以我不断地声明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想做艺术家。自然这也是我的一个缺点。

我在前面谈到《狗》的时候，我说过这个短篇是我的"创作"。但是我那许多讲故事、倾吐感情的短篇小说也并非无师自通、关起门凭空编造出来的。虽然小说里面生活不多，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知道多少写多少，这是我向老师学来的一样"本领"（？）。三年前一位法国作家到我家里来闲谈。他跟我谈起鲁迅先生的短篇，又转到用第一人称写小说的问题，他问我，如果写自己不大熟悉的人和事情，用第一人称写，是不是更方便些。我回答："是。"我还说，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不过他认为只要讲出重要的几句话就够了。鲁迅先生也是这样，他对中国旧社会知道得多，也知道得深。我却不然，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自己知道的实在有限。自己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的确更方便。我学写短篇小说，屠格涅夫便是我的一位老师，许多欧美的，甚至日本的短篇小说也都是我的老师。还有，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译的短篇都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先生。然而我所谓"学"，并不是说我写小说之前先找出一些外国的优秀作品仔细地研究分析，看他们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结尾又怎么写，还有写景怎样，写人物怎样……于是做好笔记，记在心头，然后如法炮制。我并没有这样"学"过，因为

我在写小说之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我以前不过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小就爱读小说，长篇也读，短篇也读，先读中国的，然后读外国的。读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也要写这样的东西，就像小孩喜欢听故事那样，小孩见到人就拉着请讲故事，并不是为了自己要做说故事的人。但是故事听得多了，听得熟了，小孩自己也可能编造起故事来。我读了不少的小说，也就懂得所谓"小说"、所谓"短篇小说"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读的时候，从来不管第一段怎样，第二段怎样，或者第一章应当写什么，第二章应当写什么。作为读者，我关心的是人物的命运。我喜欢(或厌恶)一篇作品，主要是喜欢(或厌恶)它的内容，就像我们喜欢(或厌恶)一个人，是喜欢(或厌恶)他本人，他的品质；至于他的高矮、肥瘦以及他的服装打扮等等，那都是次要又次要的事。我向那许多位老师学到的也就是这一点。小说读多了，那些自己喜欢的过了好久都不会忘记。脑子里储蓄了几百篇小说，只要有话想说，有生活可写，动起笔来，总不会写出不像小说的东西。至于好坏，那是另一个问题。就拿我自己来说，没有人讲过我那些短篇不像小说，但是它们中间坏的多，好的少，不用别人讲，我自己也知道。因为我生活不够，因为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虽然"请"了好多很高明的老师，但是老师只能给我启发，因为作家进行"创作"，不能摹仿，更不能抄袭，他必须写自己的作品。常常有好心的读者过分地信任我，寄作品来要我修改。我不熟悉他所写的人物同生活，简直不知道应当从哪里改起。读者们错误地相信我掌握了什么技巧，懂得了

一种窍门，因为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充实的生活同对生活的正确的认识和分析。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却不是能够从百篇小说和几位作家老师那里学得到的。只有一直参加革命斗争、始终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且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才可以说是懂得了窍门。但是连他也不能代替别人创作。创作是艰苦的劳动。我写了三十年，到现在还只能说是一个学生。

我常常向人谈到启发。我们读任何好作品，哪怕只是浏览，也都可以得到启发。我那些早期讲故事的短篇小说很可能是受到屠格涅夫的启发写成的。屠格涅夫写过好些中短篇小说，有的开头写大家在一起聊天讲故事，轮到某某，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那篇《初恋》就是这一类的小说)；有的用第一人称直接叙述主人公的遭遇或者借主人公的嘴写出另一个人的悲剧。作为青年的读者，我喜欢他这种写法，我觉得容易懂，容易记住，不像有些作家的作品要读两三遍才懂得。所以我后来写短篇小说，就自然而然地采用了这种方法。写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亲切、痛快。所以三十年来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我喜欢让主人公自己讲故事，像《初恋》、《复仇》、《不幸的人》都是这样。讲故事便于倾吐感情，这就是说作者借主人公的口倾吐自己的感情，讲故事用不着多少生活，所以我可以写欧洲人和欧洲事，借外国人的嘴倾吐我这个中国人的感情。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复仇》里收的十几个短篇全是写外国人的，而且除了《丁香花下》一篇以外，全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不过小说里的"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我自己，也有别人。

我自己看看，觉得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像外国人。我在法国住了两年，连法文也没有念好。但是我每天都得跟法国人接触，也多少看过一点外国人的生活。我知道的不用说只是一点表面。单单根据它来写小说是不够的。我当时并没有想到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可以掩盖“生活不够”的缺点，我只要倾吐自己的感情。可是现在想来那倒是近乎取巧的办法了。

屠格涅夫写小说喜欢用第一人称，可能是他知道得太多，所以喜欢这种简单朴素的写法。普希金一定也是这样。鲁迅先生更不用说了。他那篇《孔乙己》写得多么好！不过两千几百字。还有《故乡》和《祝福》，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然而我学会用这种写法，恰恰因为我知道得太少，我没法写出我自己所不知道的生活，我把我知道的那一点东西全讲出来，有何不可，不过这种写法也是无意地“学”到的。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从法国回来不久，还常常怀念那边的生活，也颇想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所以拿起笔写小说，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国生活的题材。因为自己对那种生活还有一点点感情，而又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了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写法。例如《初恋》是根据一位留法同学的几封信改写的；非战小说《房东太太》是根据一位留法勤工俭学的朋友的初稿改写的，我还增加了后半篇，姑然太太痴等战死的儿子回来的故事。第三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的背景就是我住过一年的玛伦河畔的某小城。关于这篇小说，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在一九三〇年七月的某一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

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悲惨的景象。我的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再睡下去，就起来扭开电灯，在清静的夜里一口气写完了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的带睡意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中挂着大片粉红的云霞……

这一篇开了端，所以我接连地写了好些短篇小说。然而这种写法其实是"不足为训"的。但我早期的十几篇小说都是这样写成的。我事先并没有想好结构，就动笔写小说，让人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生活，通过编造的故事，倾吐我的感情。所以我的好些短篇小说都只讲了故事，没有写出人物。《洛伯尔先生》就是这样。我在那个小城住过一年，就住在小说里提到的中学校里面。学校后面有桥，有小河、有麦田。音乐家就是学校的音乐教员。卖花店里的确有一个可爱的少女。我和另一个中国同学在节日里总要到那里去买花送给中学校校长的夫人。校长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名字就叫"玛丽-波尔"。我把这些全写在小说里面了。又如《不幸的人》写了贫富恋爱的悲剧，这是极其平常的故事和写旧了的题材。我偶然在一张外国报上读到关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在波士顿监狱里受电刑的樊塞蒂的文章，说他从意大利去美国之前有过这样不幸的遭遇。这不过是传闻，也可能是写稿的人故意捏造，樊塞蒂在他的自传里也没有谈到这样的事情。我后来为樊塞蒂一共写过两个短篇：《我的眼泪》和《电椅》。但是我却利用这个捏造的

故事写了一个意大利流浪人的悲剧。我的确在法国马赛海滨街的小小广场上见过一个拉小提琴的音乐家，不过我并没有把他请到美景旅馆①来，虽然我曾经在美景旅馆五层楼上住过十二天，也曾经在那里见过日落的壮观，像我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我把那个捏造的恋爱故事跟我在马赛的见闻拼在一起，写成了那篇《不幸的人》。一九二八年十月底我在马赛等船回国，一共住了十二天，每天到一家新近关了门的中国饭店去吃三顿饭。这家饭店在贫民区，老板还兼做别的生意，所以我有机会见到一些古怪的小事情。我那篇《马赛的夜》(一九三二)就是根据那十二天的见闻写的。再如《亡命》，这篇小说写出了政治亡命者的痛苦。在当时的巴黎我见过从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亡命来的革命者，也听到别人讲过他们的故事，还常常在报上读到他们的文章。意大利的革命者特别怀念充满阳光的意大利。我虽然跟他们不熟，但是我也能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我去法国以前在中国就常有机会见到从日本或朝鲜亡命到中国来的革命者，也了解一点他们的生活。再说我们中国穷学生在巴黎的生活也跟亡命者的生活有点相似，国内反动势力占上风，一片乌烟瘴气。法国警察可以随便检查我们的居留证，法国的警察厅可以随时驱逐我们出境。我一个朋友就是被驱逐回国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还可以回国，那些意大利人、那些西班牙人却没法回到他们的阳光明媚的国土。我的脑子里常常有那种人的影子，所以我在小说里

---

① 小说里改为"美观旅馆"，我当时住的是"美景旅馆"。

也写出了一个影子。

我没法在这篇短文里谈到我所有的短篇小说，在这里把它们一一地详加分析。其实我这样做对读者也不会有好处。我在前面举的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一切。我讲了我所走过的弯路，我讲了我的一些缺点。我说明我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东西。我手边放着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我把那些要我告诉创作经验的信放在一起。我没有回答那些热心的读者，因为我回答不出来。我不相信我的失败的经验会使青年朋友得到写作的窍门。倘使他们真有学习写作的决心和毅力，请他们投身到斗争的生活里面去学。要是他们在"生活"以外还想找一个老师，那么请他们多读作品，读反映今天新生活的作品；倘使还有多的时间，不妨再读些过去优秀作家的作品。任何作家都可以从好的作品那里得到启发。

我在这篇短文里不断地提到"启发"。可能还有人不了解我的意思，希望我讲得更具体些。那么让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我所说的"启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八七三年一个春天的夜晚，列夫·托尔斯泰走进他大儿子谢尔盖的屋子里。谢尔盖正在读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给他的老姑母听。托尔斯泰拿起这本书，随便翻了一下，他翻到后面某一章的第一句："在节日的前夕客人们开始到了，"他大声说："真好。就应当这样开头。别的人开头一定要描写客人如何，屋子如何，可是他马上就跳到动作上面去。"托尔斯泰立刻走进书房，坐下来写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头一句："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我们读到的《安娜·卡列尼

娜》却是以另外的一句开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作者后来加上去的。）托尔斯泰在前一年就想到了这部小说的内容。一位叫做"安娜"的太太，因为跟她同居的男人爱上了他们的保姆，就躺在铁轨上自杀了。托尔斯泰当时了解了详细情形，也看到了验尸的情况。他想好了小说的情节，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头。写过了《战争与和平》的大作家要写第二部长篇小说，居然会不知道怎样开头！人们常常谈到托尔斯泰的这个小故事。一九五五年逝世的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有一次也提到"这个极动人的小故事"，他这样地解释道："他不停地在屋子里徘徊，找寻向导，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头。普希金教会了他，传统教会了他。……"

这个故事把"启发"的意义解释得非常清楚。托尔斯泰受到了普希金的"启发"，才写出《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要是他那个晚上没有翻到普希金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很可能推迟一些时候，而且他也很可能用另外的句子开始他这部不朽的作品。托尔斯泰不是在抄袭，也不是在摹仿，他是在进行创作，但是他也需要"启发"。二十几年前我听见人讲起，有一个中国青年作家喜欢向人宣传，他不读任何作品，免得受别人的影响。这个人很可能始终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是他至今没有写出一本好书。连托尔斯泰也要"找寻向导"，何况我们！虚心对从事创作的人总有好处。人的脑子又不是万能的机器，怎么离得开启发？

我刚才引用了托马斯·曼的话："普希金教会了他，传统教会了他。"说到"传统"，我想起了我们的短篇小说。我们也

有同样的优秀的传统：朴素、简单、亲切、生动、明白、干净、不拖沓、不罗嗦。可惜我没有学到这些。我过去读"话本"和"三言二拍"之类的短篇不多，笔记小说我倒读过一些，但总觉得跟自己的感情离得太远。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戏。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随便举一个例子，川戏的《周仁要路》就跟我写的那些短篇相似，却比我写得好。一个人的短短的自述把故事交代得很清楚，写内心的斗争和思想的反复变化相当深刻，突出了人物的性格，有感情，能打动人心，颇像西洋的优秀的短篇作品，其实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可见我们的传统深厚。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的宝山，只等我们虚心地去开发。每一下锄头或电镐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收获。

至于其他，我没有在这里饶舌的必要了。

1958 年 5 — 6 月。

谈我的“散文”*

有些读者写信来，要我告诉他们小说与散文的特点。也有人希望我能够说明散文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有两三位杂志编辑出题目要我谈谈关于散文的一些问题。我没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我实在讲不出来。前些时候有一位远方的读者来信骂我，一定要我讲出来散文与小说的区别。我只好硬着头皮挨骂，因为我实在懂得太少，我不是一部字典或其他辞书。我并非故意在这里说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三十年来我一共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①还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之前写成的。最近我仍然在写类似散文的东西。怎么我会讲不出“散文”的特点呢？其实说出来，理由也很简单：我写文章，因为有话要说。我向杂志投稿，也从没有一位编辑先考问我一遍，看我是否懂得文学。我说这一段话，并非跑野马，开玩笑。我只想说明一件事情：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才想到写文章；一个人要对人说话，他一定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萌芽》第九期。

① 我后来还写过不少这一类的旅行记。这种平铺直叙、毫无修饰的文章并非足以传世的佳作，但是它们保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资料”看，也许不会上大当。

想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方法和声调，写出来的文章也不会完全一样。人是活的，所以文章的形式和体裁并不能够限制活人。我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没有事先想到我这篇文章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的只是我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话，而且怎样把那些话说得明白。

我刚才说过我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其实这二十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样叫法似乎把散文的范围搞得太大了。其实我倒觉得把它缩小了。照欧洲人的说法，除了韵文就是散文，连长篇小说也包括在内。我前不久买到一部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四卷本《散文集》，里面收的全是长短篇小说。而且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时候也不大容易给一篇文章戴上合式的帽子，派定它为“小说”或“散文”。例如我的《短篇小说选集》里面有一篇《废园外》，不过一千二三百字，写作者走过一座废园，想起几天前敌机轰炸昆明，炸死园内一个深闺少女的事情。我刚写完它的时候，我把它当作“散文”。后来我却把它收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还在《序》上说：“拿情调来说，它接近短篇小说了。”但是怎样“接近”，我自己也说不出来。不过我也读过好些篇欧美或日本作家写的这一类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日本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鲁迅译）就比《废园外》更不像小说。但是我们可以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里

找到它。我的一位苏联朋友牧得罗夫同志翻译过我好几个短篇，其中也有《废园外》。我去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见到他。他说他特别喜欢《废园外》。这说明也有人承认它是小说了。又如我一九五二年从朝鲜回来写了一篇叫做《坚强战士》的文章。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当作小说发表了。后来《志愿军英雄传》编辑部的一位同志把这篇文章拿去找获得"坚强战士"称号的张渭良同志仔细研究了一番。张渭良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我根据他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章改得更符合事实。文章后来收在《志愿军英雄传》内，徐迟同志去年编《特写选》又把它选进去了。小说变成了特写。固然称《坚强战士》为"特写"也很适当，但是我如果仍然叫它做"短篇小说"，也不能说是错误。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好多"特写"就可以称为短篇小说。我过去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第二集里面有一篇《我的眼泪》，要是把它编进"散文集"，也许更恰当些，因为它更像散文。

我这些话无非说明文章的体裁和形式都是次要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内容。有人认为必须先弄清楚了"散文"的特点才可以动笔写"散文"。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从前在私塾里念书的时候，我的确学过作文。老师出题目要我写文章。我或者想了一天写不出来，或者写出来不大通顺，老师就叫我到他面前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最后又怎样结束。我当时并不明白，过了几年倒恍然大悟了。老师是在教我在题目上做文章。说来说去无非在题目的上下前后打转。这就叫做"作文"。那些时候不是我要写

文章，是老师要我写，不写或者写不出就要挨骂甚至打手心。当时我的确写过不少这样的文章，里面一半是“什么论”、“什么说”，如《颖考叔纯孝论》、《师说》之类，另一半就是今天所谓的“散文”，例如《郊游》、《儿时回忆》、《读书乐》等等。就拿《读书乐》来谈罢，我那时背诵古书很感痛苦。老实说，即使背得烂熟，我也讲不清楚那些辞句的意义。我怎么写得出《读书乐》呢？但是作文不交卷，我就走不出书房，要是惹得老师不高兴，说不定还要挨几下板子。我只好照老师的意思写，先说人需要读书，又说读书的乐趣，再讲春、夏、秋、冬四时读书之乐。最后来一个短短的结束。我总算把《读书乐》交卷了。老师在文章旁边打了好些个圈，最后又批了八个字：“水静沙明，一清到底”。我还记得文章中有“围炉可以御寒，《汉书》可以下酒”的话，这是写冬天读书的乐趣。老师又给我加上两句“不必红袖添香……”等等。其实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看见酒就害怕，哪里有读《汉书》下酒的雅兴？更不懂得什么叫“红袖添香”了。文章里的句子不是从别处抄来就是引用典故拼凑成的，跟“书”的内容并无多大关系。这真是为作文而作文，越写越糊涂了。不久我无意间得到一卷《说岳传》的残本，看到“何元庆大骂张用”一句，就接着看下去，居然全懂，因为书是用白话写的。我看完这本破书，就到处借《说岳传》全本来看，看到不想吃饭睡觉，这才懂得所谓“读书乐”。但这种情况跟我在《读书乐》中所写的却又是两样了。

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我刚才还说过老师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从第一段讲

到结束。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少有的，这是在老师特别高兴、有极大的耐心开导学生的时候。老师平日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当时我背得很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不用说，这只能说是似懂非懂。然而现在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颠三倒四的胡话，不像我们常常念着玩的颠倒诗：“一出门来脚咬狗，捡个狗子打石头……”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从前容易些了，只要我的确有话说。倘使我连先生出的题目都不懂，或者我实在无话可说，那又当别论。还有一点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我写的那些作文全是坏文章，因为老师爱出大题目，而我又只懂得那么一点点东西，连知识也说不上，哪里还有资格谈古论今！后来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批“清顺”二字敷衍了事。

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

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自然我后来还读过别的文章，可是却没有机会把它们一一背熟，记在心里了。不过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我们有很好的"散文"的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百倍也不止！

"五四"以后，从鲁迅先生起又接连出现了不少写新的散文的能手，像朱自清先生、叶圣陶先生、夏丏尊先生，我都受过他们的影响。任何一篇好文章都是容易上口的。哪怕你没有时间读熟，凡是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就容易让人记住。我并没有想到要记住它们，它们自己会时时到我的脑子里来游历。有时它们还会帮助我联想到别的事情。我常常说，多读别人的文章，自己的脑子就痒了，自己的手也痒了。读作品常常给我启发。譬如我前面提过的那篇日本作家森鸥外的小说《沉默之塔》，我正是读了它才忽然想起写《长生塔》（童话）的。然而《长生塔》跟《沉默之塔》中间的关系就只有一个"塔"字。我一九三四年在日本横滨写这篇童话骂蒋介石，而森鸥外却把他那篇反对文化压迫的"议论"小说当作一九一一年版尼采著作日文译本（《查拉图斯特拉》）的《代序》。我有好些篇散文和小说都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受到"启发"以后拿起笔写的。我在前面所说的"影响"就是指这个。前辈们的长处我学得很少。例如我读过的韩（愈）、柳（宗元）、欧（欧阳修）、苏（东坡）的古文，或者鲁迅、朱自清、夏丏尊、叶圣陶诸先生的散文，都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文字精炼，不罗嗦，没有多余的字。而我的文章却像一个多嘴的年轻人，一开口就不肯停，一定要把什么都讲出来才痛快。我从前写文章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其

实我自己是喜欢短文章的。我常常想把文章写得短些，更短些。我觉得越短越好，越有力。然而拿起笔我就无法控制自己。可见我还不能驾驭文字；可见我还不知道节制。这是我的毛病。

自然我也写过一些短的东西，像收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散文集《龙·虎·狗》里面的一部分散文。其中如《日》、《月》、《星》三篇不过两百多字、三百多字和四百多字，但它们也只是一时的感想而已。这几百字中仍然有多余的字，更谈不到精炼。而且像这样短的散文我也写得不多。

我自己刚才说过，教我写"散文"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作品。但是我并没有学到中国散文的特点，所以可能有人在我的文章中嗅不出多少中国的味道。然而我说句老实话，外国的"散文"不论是 essay（散文）或者 sketch（随笔），我都读得很少。在成都学英文，念过半本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随笔集》，后来隔了好多年才读到英国作家吉星的《四季随笔》和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 essay 等等，也不过数得出的几本。这些都是长篇大论的东西，而且都是从从容容地在明窗净几的条件下写出来的，对于只要面前有一尺见方的木板就可以执笔的我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倘使有人因为我的散文不中不西，一定要找外国的影响，那么我想提醒他，我读过很多欧美的小说和革命家的自传，我从它们那里学到一些遣辞造句的方法。我十几岁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中文的修辞学，却念过大半本英文修辞学，也学到一点东西，例如散文里不应有押韵的句子，我一直就在注意。有一个时候我的文字欧化得

妨害，我翻译过好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中国字写外国文。幸好我还有个不断地修改自己文章的习惯，我的文章才会有进步。最近我编辑自己的《文集》，我还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好些欧化的句子。我自然要把它们修改或者删去。但是有几个欧化的小说题目（例如《爱的摧残》、《爱的十字架》等）却没法改动，就只好让它们留下来了。我过去做翻译工作多少吃了一点"扣字眼"的亏，有时明知不对，想译得活一点，又害怕有人查对字典来纠正错误，为了偷懒、省事起见，只好完全照外国人遣辞造句的方法使用中国文。在翻译上用惯了，自然会影响写作。这就是我另一个毛病的由来了。

我的两篇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小说和几篇在朝鲜写的通讯报导被译做英文印成小书以后，有位英国读者来信说这种热情的文章英国人不喜欢。也有人反映英国读者不习惯第一人称的文章，说是讲"我"讲得太多。这种说法也打中了我的要害。第一，我的文字毫无含蓄，很少一个句子里包含许多意思，让读者茶余饭后仔细思索、慢慢回味。第二，我喜欢用作者讲话的口气写文章，不论是散文或者短篇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个"我"字。虽然我还没有学到托尔斯泰代替马写文章，也没有学到契诃夫或夏目漱石代替狗写文章，我的作品中的"我"总是一个人，但是这个"我"并不就是作者自己，小说里面的"我"有时甚至是作者憎恶的人，例如《奴隶的心》里面的"我"。而且我还可以说，所有这些文章里并没有"自我吹嘘"或者"自我扩张"的臭味。我只是通过"我"写别人，写别人的

事情。其实第一人称的小说世界上岂止千千万万！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嗜好。我喜欢第一人称的文章，因为写起来、读起来都觉得亲切。自然也有人不喜欢这种文章，也有些作家一辈子不让“我”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也并非“生而知之”的，连用“我”的口气写文章也有“老师”。我在这方面的“启蒙老师”是两本小说，而这两本小说偏偏是两位英国小说家写的。这两部书便是狄更斯的《大卫·考柏菲尔》和司蒂文生的《宝岛》。我十几岁学英文的时候念熟了它们，而且《宝岛》这本书还是一个英国教员教我念完的。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两本小说。《大卫·考柏菲尔》从“我”的出生写起，写了这个主人公几十年的生活，但是更多地写了那几十年中间英国的社会和各种各样的人。《宝岛》是一部所谓的冒险小说，它从“我”在父亲开的客栈里碰见“船长”讲起，一直讲到主人公经历了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取得宝藏回来为止，书中有文有武，有“一只脚”，有“独眼”，非常热闹。它们不像有些作品开头就是大段的写景，然后才慢慢地介绍出一两个人，教读者念了十几页还不容易进到书中去。它们却像熟人一样，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书中，以后越入越深，教人放不下书。所以它们对十几岁的年轻人会有那样大的影响。我并不是在这里推荐那两部作品，我只是分析我的文章的各种成分，说明我的文章的各种来源。

我在前面刚刚说过我的文章里面的“我”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然而绝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却全是作者自己，不过这个“我”并不专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些散文里面的“我”就

不是作者自己，写的事情也全是虚构的了。但是我自己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这个“我”是不出场的，然而他无处不在。这不是说我如何了不起。决不！这只是说明作者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我并不是拿起笔就可以写出文章；也不是只要编辑同志来信索稿，我的文思马上潮涌而来。我必须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才能够顺利地下笔。我有时给逼得没办法，坐在书桌前苦思半天，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终于留不下一句。《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曾经劝人“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两个钟头”。他说，要是写不出来，你就拿起笔不断地写：“我今天什么都写不出来。”但是他在写《死魂灵》的时候，有一次在旅行中，走进一个酒馆，他忽然想写文章，叫人搬来一张小桌子，就坐在角落里，一口气写完了整整一章小说，连座位也没有离开过。其实我也有过“一挥而就”的时候。譬如我在朝鲜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就是一口气写成的。虽然后来修改两次，也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我想就这篇散文为例，简单地谈一谈。

这篇文章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一个半山的坑道里写成的。我们一个创作组一共十七个男女同志，刚到“志政”的时候，分住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睡到半夜，我们住处的附近忽然落了一个炸弹。所以第二天下午“志政”的甘主任就叫人把我们的行李全搬到半山上的坑道里去了。洞子很长，有电灯，里面还放了小床、小桌，倒有点像火车的车厢。山路相当陡，下雪天爬上山实在不容易。搬到坑道的那

天晚上，我去参加了"志政"的欢迎晚会。我在二十日的日记里写着："十一点半坐宣传部卓部长的小吉普车回宿舍，他陪我在黑暗中上山。通讯员下山来接我。我几乎跌下去，幸而他把我拉住，扶我上去。"一连三夜都是这样。所以我的文章里面有一句"好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的确是好不容易啊！

二十二日我们见了彭总（大家都是这样地称呼彭德怀司令员）以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创作组的全体同志开会讨论了彭总的谈话。在会上大家还讲了自己的印象和感想。同志们鼓励我写一篇"会见记"，我答应了下来。我二十五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话："黄昏前上山回洞。八时后开始写同志们要我写的《彭总会见记》，到十一点半写完初稿。"第二天（二十六日）我又有机会参加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听了彭总一个半钟点的讲话，晚上才回到洞子里。这天的日记中又写着："根据今天再听彭总讲话的心得重写'会见记'，十一点写完。"二十七日我把文章交给同志们看过，他们提了一些意见。我又参考他们的意见增加了几句话，便把文章交给新华社了。二十八日彭总看到我的原稿，写了一封短信给我。他这样说：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的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

彭总这个修改的意见提的很对，他更恰当地说出了当时

的场面和我们大家的心情。我看见彭总以前，听说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刚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位长者。后来他坐在我们对面慢慢地谈下去，我们的确有一种跟亲人谈话的感觉。这封信跟他本人一样，谦虚、诚恳、亲切，他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太苛刻。一个人的确应当对自己严，对自己要求苛。单是这一点，彭总就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了。

彭总的信使我十分感动。我曾经这样地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编造了什么来恭维彭总呢？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写这篇短文并不觉得自己在做文章，我不过老老实实而且简简单单地叙述我们会见彭总的情形。就好像那天回到洞里遇见一位朋友，跟他摆了一段“龙门阵”一样。连最后“冒雪上山，埋头看山下”一段也是当时的情景。全篇文章从头到尾，不论事实、谈话、感情都是真的。但是真实比我的文章更生动、更丰富、更激动人心。我们笔太无力了。那一天（二十二日）我的日记写得很清楚：

> 我们坐卡车到山下大洞内，在三反办公室等了一刻钟，彭总进来，亲切慈祥有如长者对子弟。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武装起来了！”接着又说：“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又问：“你们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我们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是坐车过来的。”他带笑纠正道：“不，还是跨过的。”彭总谈话深入浅出，深刻、全面。谈话中甘泗淇主任和宋时轮副司令员也进来了。彭总讲了三小时。

接着宋、甘两位也讲了话。宋副司令员最后讲到了"欢迎"。彭总接着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头是欢迎的。"会后彭总留我们吃饭。我和彭总谈了几句话，又和甘主任谈了一阵。三点吃饭，共三桌，有火锅。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风扑面。洞中相当温暖。回到洞内，五点半起放映了《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天》两部影片。晚会结束后，坐卓部长车回到宿舍的山下。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另一位同志在山下大声叫通讯员拿电筒下来接我们。山上积雪甚厚，胶底鞋很滑，全靠通讯员分段拉我们上山。回洞休息片刻，看表不过九点五十分。……

从这段日记也可以看出来我的文章写的很简单。它只是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地讲会见的事情，从我们坐在办公室等候彭总讲起，一直讲到我们回宿舍为止。彭总给我们讲了三个钟头的话，我没法把它们全记录在文章里面，我只能引用了几段重要的。那几段他后来在欢迎会上的讲话中又重说了一遍。我听得更注意，自然我也记得更清楚。第二天听他讲话，印象更深。所以我回到宿舍就把头天写好的初稿拿出来修改和补充。我没有写吃饭的情形，饭桌上没有酒，大家吃得很快，谈话也不多。我把晚会省略了，晚会并无其他的节目，我只有在电影放完后离开会场时，才再见到彭总，跟他握手告别。在我的原稿上最后一段的开头并不是"晚上"两个字，却是"晚会结束后"一句话，在前一段的末尾还有表示省略的虚

点。我想就这样简单地告诉读者，我们还参加了晚会。我的文章最初在《志愿军》报上发表，后来才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到国内。可能是新华社在发电讯稿的时候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虚点取消，"晚会结束后"也改为"晚上"，"花木兰"，"跨过鸭绿江"，连彭总戒烟的小故事也都删去了。在第九段上，"我忘记了时间的早晚"下面，还删去了"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的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上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的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这些句子。这些都是我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想到的，后来我的确把这一切全忘记了。但是新华社的删改也很有道理，至少文章显得"精炼"些。

我拉拉杂杂地讲了这许多，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不想有系统地仔细分析我的全部散文。我没有理由让它们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这里我不过讲了我的一些缺点和我所走过的弯路。倘使它们能给今天的年轻读者一点点鼓舞和启发，我就十分满足了。我愿意看到数不尽的年轻作者用他们有力的笔写出反映今天伟大的现实的散文，我愿意读到数不尽的健康的、充满朝气的、不断地鼓舞读者前进的文章！

1958年4月。

附　录

写作生活的回顾*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我和朋友卫在上海乘船到法国去。在印度洋舟中我给一个敬爱的朋友写信说：

>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贡献出我的一切……

二月十九日我便到了巴黎。

朋友吴在拉丁区的一家古老旅馆的五层楼上给我和卫租了房间。屋子是窄小的。窗户整日价开着，下面是一条寂静的街道，那里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从窗户里也可以望见人们在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但我却没有听见过酗酒或赌博的闹声。正对面是一所大厦，这古老的建筑，它不仅阻止了我的视线，并且往往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的那间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显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

* 本篇系据《写作的生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作）一文改作，曾先后收入一九三六年二月开明书店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及《巴金文集》第七卷，现移作《谈自己的创作》附录。

除了卫和吴外，在这城里我还有三四个朋友。有时大家聚会在一起，我们也有欢乐的谈话，或者热烈的辩论。我们都是彼此了解的，但是各人有各自的事务，不能够天天聚在一处。卫又喜欢整天到图书馆或公园里去。于是我就常常被留在那坟墓般的房间里，孤零零地拿破旧的书本来消磨我的光阴。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我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 Alliance Françaisecaise[①]附设的夜校补习法文。白天就留在旅馆里让破旧的书本蚕食我的年轻的生命。我在屋子里翻阅那些别人不要读的书本。常常在一阵难堪的静寂以后，空气忽然震动起来，街道也震动了，甚至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我自己简直忘了我这个身子是在什么地方，周围好像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变动。渐渐地闹声消失了。经验告诉我是一辆载重的汽车在下面石子铺砌的街道上驰过了。不久一切又复归于静寂。我慢慢儿站起来走到窗前，伸出头去看那似乎受了伤的街，看那街角的咖啡店，那里也是冷静的，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于是我的心又被一阵难堪的孤寂压倒了。

晚上十一点钟过后我和卫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那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的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一个幻境。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的铜像的脚下，不觉

---

① Alliance Françcaise：法文协会。

伸了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会儿，我忘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的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的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天晚上我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

渐渐地我的生活变得有生气了，朋友也逐渐多起来。我从他们那里借到了许多宝贵的书籍，我只担心每天没有够多的时间来读完它们，同时从E.G.，M.Nettlau他们和我往来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我便把我的未完的小说搁起来，我没有功夫再写小说了。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读到巴黎各报的号外，知道我所敬爱的那个鱼贩子（就是《灭亡·序》里说到的“先生”）和他的同伴被烧死在美国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里的时候，我重读着他写给我的两封布满了颤抖的字迹的

信，听着外面无数的人的隐约的哭声，我又从破书堆里翻出了那本练习簿，继续写了《灭亡》的十七、十八两章，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五章。

过后我的时间就被一些经济学书占去了。接着我就用全副精神来读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尤其是那本《伦理学的起源及发展》，我开始翻译它，而且为了翻译它的缘故我又不得不读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诸人的著作来。我甚至熟读了《圣经》。我已经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了。

第二年（一九二八年）的夏季，是在玛伦河岸上的一个小城市里度过的。我在那时候过着比较安适的生活。这城里除了我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他们都是我的好友。我们寄宿在一个中学校里面。那里安静而和平。每天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走过一道小桥，到河边的树林里去散步，傍晚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得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种各类的话，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

一个晴朗的上午，我挟了一本惠特曼的诗集在树林中散步归来，回到学校里，接到了一封经过西伯利亚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来的。信里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是时常这样地写信的。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读完了。我不觉回想到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光阴。我爱他，但我不得不永久离开他。我的苦痛是很大的。而他的被传统观念束缚着的心却永不能够了解。我这时候苦痛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决心。我从箱子里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说稿，陆续写了第七、第九、第十三三章。因为那时我已经译完了《伦理学》

的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有时间来写小说了。

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的第八章(《一个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所敬爱的，他的爱情里的悲欢也曾引起我的共鸣。我很抱歉我把他的美丽的故事送给了像《灭亡》里的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了一篇题作《初恋》的短篇小说来献给他。

以后这工作就没有间断了。每天早晨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时，我完全沉溺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的脑里却出现了小说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的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下午的时间就用来译书和读书)。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功夫我就写完了《灭亡》的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这五章。

这样我的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我加进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后又添了一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的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的两个朋友中的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地做了我的第一个读者。他给了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稿寄给国内的任何书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印出来给我的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恰恰这时候国内一个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理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

封好挂号寄给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后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们三个人又同车回到巴黎去作回国的准备了。过了两月上海那个朋友的回信到了。他说稿本收到，如今正在翻阅。我也不曾去信催促他。直到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才在那个朋友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的小说被采用了。那朋友违反了我的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的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然而使我后来改变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还陷在文学生活里而不能自拔，使我把年轻的生命浪费在白纸上，这责任却也应该由他来担负。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译了几本书，翻译《伦理学》下卷的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诸位坚硬的铁门。这样弄昏了我的脑筋。我没有写小说，而且我也不想写小说了。

第二年我才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和那一个叫做《房东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据一个朋友的叙述写成的，自以为都写得很不如意，有些扫兴，而且那些时候又忙着读书，觉得我这个人不宜于写什么小说。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心思：在一个七月的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够再睡下去，就爬起来扭燃电灯，在寂静的夜里我写完了那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的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里正挂着一片灿烂的云霞，一些麻雀在

屋檐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这样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以后，在这一年里我又写了《复仇》、《不幸的人》、《亡命》、《爱的摧残》等九篇。这些文章都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驱使着我写出来的。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我的朋友，都留着我的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现在我读着它们，还会感到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亚丽安娜》两篇是我所最爱的，它们表现着当时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的苦痛。亚丽安娜，这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要回到华沙去。那一天我和吴替她提着箱子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里，我们带着含泪的微笑和她握手，说几句祝福的话，就这样分别了她。当她的背影在一个旅馆的大门里消失的时候，我的精神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沐浴着，我的心是充满着一种献身的渴望，我愿我能够有一千个性命用来为那受苦的人类牺牲，为那美丽的理想尽力。我的眼里贮满着这青年女革命家的丰姿，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赛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分别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的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得流下眼泪来。我颤抖地握着吴的手诚恳地说："吴，不要失望，我们的理想一定会胜利的！"这时候他正用着留恋的眼光看那躺卧在我们下面的巴黎，便掉过头来回答我一个同志的紧握。他忘记了他自己和亚丽安娜一样，也是因为国际大会的事情被

法国政府下令驱逐的人。

以后因为驱逐令延缓了一些时候的缘故，我们还和亚丽安娜见过面，吴和她过往得很亲密。后来吴回了国，她也离开了巴黎，我就再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一点她离开巴黎以后的消息，我便带着悲痛的怀念续写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甚至到现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别的那一天的情景，我还感到心情的高扬。我感激她，我祝福她，我愿意把那小说献给她。①

翻过来就是一九三一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光阴几乎完全贡献在写作上面了。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的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好像我的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环境永远是如此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那张堆满了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送阳光进来的窗户，还有那张开始破烂的沙发(这是从吴那里搬来的)和两个小小的圆凳。这时候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痛苦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简直变成了一副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

---

① 一九三九年我在一份法国报上读到她死在西班牙的消息。

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激流》的第一部),十万字的《新生》(《灭亡》的续篇),和中篇小说《雾》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十多个短篇。

因为这些文章我又认识不少新的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

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海的炮声响了。二月五日我带着短篇小说《海的梦》的七页原稿从南京赶回上海,只来得及看见闸北的火光。于是继续了将近一个月的痛苦生活。后来在三月二日的夜晚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听见几个中年人的彷徨、绝望的呼吁以后,我一个人走过冷清清的马路,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睡觉。我在路上一面思索,一面诅咒,这时候我睁起眼睛做了一个梦。我决定把那个未完的短篇改写成中篇小说。

这其间我曾经几次怀着屈辱的、悲痛的、愤怒的心情去看那个在日军统治下的故居,去搬运我的被劫后的书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次枪刺几乎到了我的身上,但我终于把这一切忍受下去了。每天傍晚我带了疲倦的身子回到朋友那里,在似乎是平静的空气中继续写我的《海的梦》。

写完《海的梦》,我便到南方去旅行,看见一个疯狂的少女的脸上的秋天的微笑,在那里起了写《春天里的秋天》的心思,回来后就以一个星期的功夫写完了它。过后又写了《砂丁》,那材料是一个朋友供给我的,他到那地方去过。他对我谈起那里的种种详细情形,鼓舞我写下它来。那小说里也浸透了我的血和泪,贯穿着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那绝望的云雾并不

曾掩没了我的对于"光明的将来"的信仰。

夏天来了。我的房间里热得跟蒸笼里差不多。我的心像炭一般燃烧起来，我的身子快要被蒸得不能够动弹了。在这时候我却枯坐在窗前，动也不动一下，而且差不多屏绝了饮食，只是拼命喝着冰水来熄灭我心里的火焰。同时我忘掉一切地把头俯在那张破旧的书桌上，专心重写我的长篇小说《新生》。去年我已经写好了它，但是原稿跟着小说月报社在闸北的大火中化成了灰烬。这次花了两个星期的功夫我把它重写了出来，证明我的精力并不是敌人的炸弹所能够毁灭的。这其间我还写了收在《电椅》里面的几个短篇。我以为我会得到一些休息了，然而朋友又来催促我写长篇小说《雨》的续稿。直到写完了它，我才开始我那渴望了许久的北方的旅行。在青岛一个朋友的山中的宿舍里我写了《电椅》中的《爱》。一到北平，和一个患肺病的朋友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面，听了他每夜每夜的咳嗽声，我开始写了我的《灵魂的呼号》(《电椅·代序》)，到了天津才写完了它。

北方旅行归来，我开始写作后来收在《将军》里的一些短篇。同时在冻僵手指的寒冷的冬天夜晚我陆续写了我的描写煤矿生活的中篇《萌芽》。写完了它，我又去广东、福建旅行，写了一些短篇和一本《旅途随笔》。

写《萌芽》用力并不多，是正月初动手五月初完毕的。中间分了十一次，每次执笔还不到一天，写成一章便送到一家周报去发表。全部刊完后我曾把它校改一次。

《萌芽》里面没有什么空泛的想象，我确实充分地利用了

我的一部分的生活经验。我一九三一年冬天曾在一个煤山上作过客人，在那里受过一个星期的客气的款待。我又有着充分的自由，可以随意地看，随意地听，而且随意地和一个机工在窑里埋了两个多钟头。就在这窑里一个多月前曾发生过一次爆炸，死掉十五个人。因此曾有人劝阻我下窑，但我终于冒险地下去了。我这样做并没有别的用意，连找小说材料的心思也没有。说句实话，我只是在体验生活，尝尝生活的各种味道。所以直到两年以后我才利用这个题材写了小说。后来又把它修改一次，并改题作《雪》在美国三藩市出版。

从温暖的南方我马上又去寒冷的北国，这是一九三三年年底的事。在那里，在友情的鼓舞下，我完成了我的第四个短篇集《将军》。并且开始写了《沉默》中的所谓"历史小说"，用"王文慧"这个笔名陆续发表在《文学》上面。

同时我还写完了《电》。这篇小说是在一个极舒适的环境里写成的。一个朋友让我住在他寄寓的花园里面，过了三个星期的清闲生活，使我从容地完成了《爱情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应该感谢他。

从北平回到上海，我编好第五个短篇集《沉默》和杂文集《生之忏悔》，写了我的第六个短篇集《沉落》，就动身到日本去了。那里的生活使我写成了散文集《点滴》，和《神·鬼·人》，这是我的第七个短篇集。

这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大概了。

这种生活完全不是愉快的。我时常说我的作品里面混合了我的血和泪，这并不是一句假话。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

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和我在生活中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我的生活里充满了种种的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的。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苦痛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我许多年来在暗夜里所呼叫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同时惨痛的，受苦的图画，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鞭打我。在任何时候我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条路。

在《灵魂的呼号》里面，我曾经写过如下的诉苦的话：

> 在一年半的短促时间里我写了十部长短篇小说，我这样不吝惜我的精力和健康，我甚至慷慨地舍弃我日后几年的生活来换这八十多万字。我每写完一部书，总要抚摩自己的膀子，我明知道这部书又吞食了我一些血和肉，我明知道它会使我更近一步逼近坟墓，但我也不能没有一点悲戚。我默默地望着面前写成的稿子，想到过去和现在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怎样过着充实的生活的事情，我的眼睛就有些润湿了。但我并没有哭，我却把眼睛掉开去看别的东西，直到我的眼睛干了，我才以另一种心情来重读我的稿子。……
>
> 我的生活是很可悲的。我也跟一般人一样需要休息，需要快乐，需要活动。在这样轻的年纪就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头俯在书桌上，让纸笔做了自己的伴侣，这完全不是愉快的事情。不知道有若干次在不眠的夜里我睁起

疲倦的眼睛，用了最后的努力在纸上工作，在我的周围是一个睡眠的世界，那时候我真羡慕那些能够放心地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的人啊！我常常想：难道我的生命就应该这样零碎地消耗吗？……

然而我并不曾有过一个时候失掉我的信仰，所以我永远像一个硬汉似地忍受了这一切，我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呼号。虽然我的小说里有时候竟因此含有深的忧郁性，但这忧郁性也并不曾掩蔽了那一线光明。我对于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跟一切斗争。……我个人的痛苦，那是不要紧的。整个人类的光明的未来在我前面闪耀的时候，我个人的痛苦算得什么？

我是不会屈服的。我是不会绝望的。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那贯穿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永远忠实地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片刻的妥协。

也许将来有一个时候我的这枝笔会停止了活动，但这决不是如某一些人所说，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力量继续写下去了。固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然而我却始终相信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舍弃文学生活，而没有一点留恋。这一点我相信我的读者一定能够了解的。

1935年10月。

创作回忆录

《创作回忆录》，一九八一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初版。一九八二年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在日本东京
朝日讲堂讲演会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

* 本篇最初载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日本《圣教新闻》；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于南京《钟山》文艺丛刊第四期。

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十九岁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二十三岁我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萨珂(N. Sacco)和樊塞蒂(B. 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

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塞蒂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塞蒂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骚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塞蒂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过了五十年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塞蒂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藉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

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

郎，他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

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间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

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一九七九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

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很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

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和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

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

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骚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来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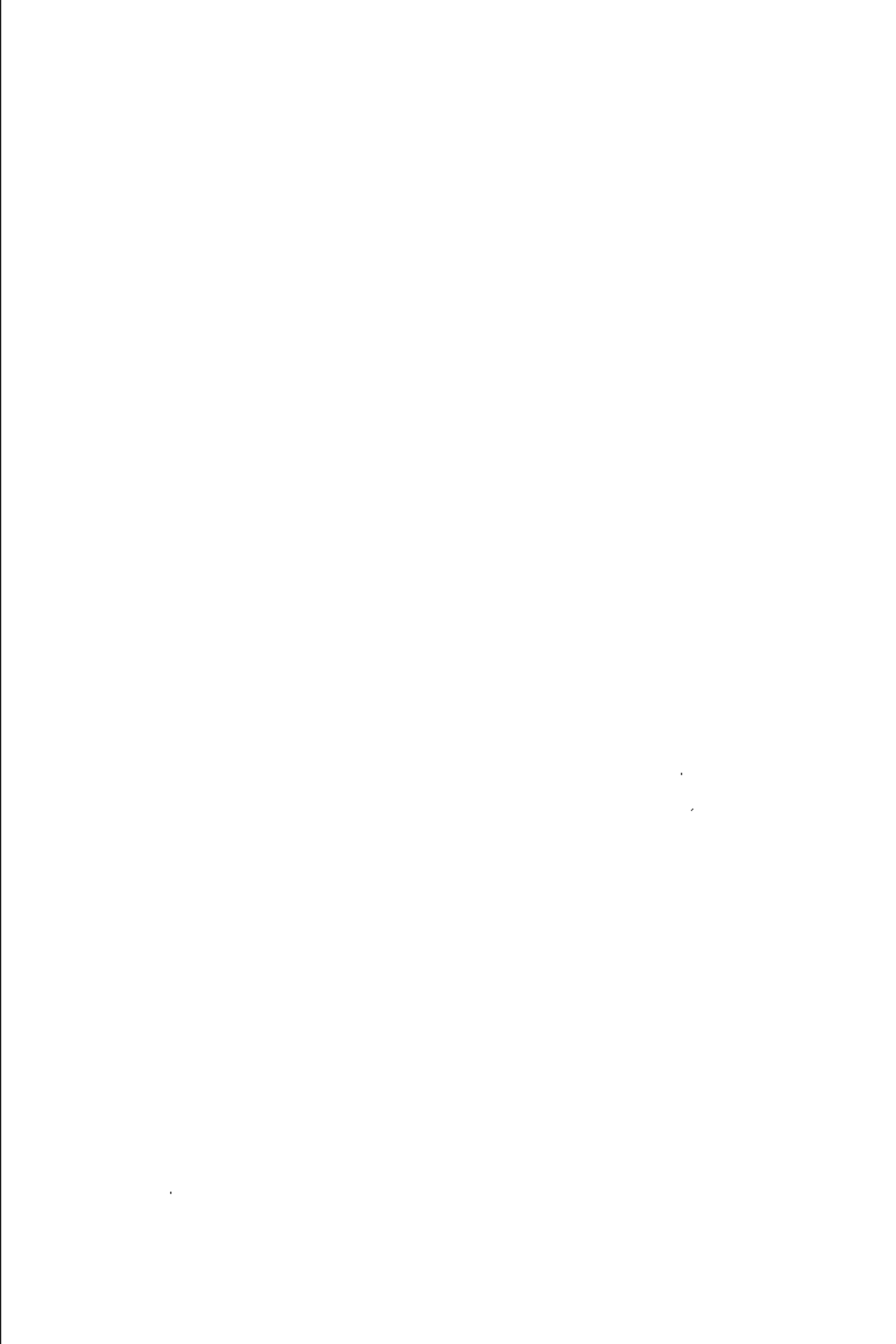
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饭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

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稀、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

> 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一　关于《春天里的秋天》*

香港《文汇报》创刊三十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这的确是一件大喜事。报纸能够长期存在，而且不断发展，这说明读者拥护它，人民需要它。

能够参加香港《文汇报》这样不寻常的报庆，我太高兴了。我的秃笔写不出什么像样的祝辞，但是我也不能不送上一份贺礼。记得若干年前我写过十篇《谈自己的创作》，后来编成集子附印在我的《文集》最后一卷里面，印数虽然少，读者虽然不多，却有人写信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后来我没有再写这类文章，因为有一个时期“四人帮”的魔爪扼住了我的咽喉。现在“四害”已除，我可以奋笔写作了。我要写几篇创作回忆录作为菲薄的贺礼献给香港《文汇报》。通过《文汇报》我恳切地向香港和海外的读者问好。我不会忘记我还在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一九七〇年我的《文集》还在香港重版发行。我感谢关心我的人们。

上星期我会见了两位瑞典文化界的朋友。他们送给我一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香港《文汇报》。

本瑞典文小书，原来是我的旧作《春天里的秋天》的译本。这是出乎我意外的。这本小书出版于一九七二年，那个时候我还在"靠边"，给剥夺了公民的权利，主要原因就是我写了"流毒很广"的十四卷"邪书"，其中也包括这本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

我带着这份礼物回家。我找出我的原作翻看到深夜。屋子里气温是摄氏三十三度。我听见远方火车驶过的声音。这是一个多噪音的炎热的夜。我不想睡。我翻开书，一页一页地，翻着，看着……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事情。那是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我在"一·二八"日军侵犯上海闸北地区以后，迁出了宝山路宝光里。不久，我到福建晋江去看朋友，在那里住了不到两个星期。在那个南方古城里，我有好些朋友，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从上海去的，他们在两所学校里当教师。一所叫黎明高中，校址是过去的武庙（关帝庙）；另一所是平民中学，设在文庙（孔子庙）的旧址。还有一家晋江书店，书店的主人姓沈，也是我的朋友。他常常跟我谈文化界的情况。他几次提到一个生病的少女的名字，简单地讲了她的故事。他希望我去看看这个年轻的读者。我同意了。

在一个雨后的晴天，沈和另一个教书的朋友陪我走过泥泞的田畔小路，去访问这个陌生的姑娘。在本地有钱人家的庄院里，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我看见了那个相貌端正的少女。她躺在宽大的架子床上，身上盖了一幅薄被，看见我们进去，便坐了起来。我们三个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沈说明了来意。

姑娘只是微笑。我讲了两三句鼓励的话，沈又重复解释一遍。她看看我，好像要说什么，却只说了两声"谢谢!"再也没有讲别的话。我们在她这里停留了半个小时，谈话不到十句以上。我们告辞的时候，她仍然默默地笑。但是我看见从她的眼里流下了泪珠。……

她的名字我早已忘记。她当时不过二十左右，听说一两年后她就逝世了。她的病一直没有治好。使她疯狂的原因是：父亲逼她同她所不爱的男人结婚，不许她继续上学念书。

这位疯狂的少女的故事折磨着我的心。我太熟悉了！不自由的婚姻，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专制，一句话，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摧残了千千万万年轻的心灵。我说，我要替他们鸣冤。

我回到上海，一口气写成一部中篇小说。放下笔，吐了一口气，我才感到轻松。我觉得我替疯姑娘讲了话了。

其实，我在小说里写的并不是疯姑娘的事情。我不熟悉她的家庭环境和故事的细节，也没有进行过调查或者采访。我想，我也不需要知道那些细节，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人物和情节了。我把小说的背景放在厦门鼓浪屿，因为我从上海到晋江，来回都在鼓浪屿小住。我喜欢那个风景如画的小岛。我常常坐划子来去厦门，晚上也在海上看到星星。鼓浪屿的春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南国的姑娘，她没有发疯，却默默地憔悴死去。我把她的悲剧写在小说里面了。郑佩瑢就是她。不同的是小说里的郑佩瑢向父亲屈服，免得父亲用手枪打死她的恋人，而生活中的那个姑娘却不

顾一切要求跟恋人一起远走高飞。

她姓吴，是归国华侨，我见过她，却并不认识她。可是我知道她的不幸的遭遇，而且在四十七、八年后我写这篇“回忆”时，我还满怀同情地想到她。我看见她是在一九三〇年我第一次到晋江的时候，那一次我在黎明高中作客，就住在武庙里面。我是到晋江过暑假的。学校的校长是我的朋友，还有两三个熟人在那里教书。学校附近公园里有几株龙眼树，正是龙眼熟了的时候。我有时到大街小巷闲走，有时同两三朋友逛公园；更多的时间则用来写短篇小说，或者做翻译工作，或者向一位姓陈的朋友学习：白天我观察显微镜下草履虫、阿米巴之类的生活，晚上坐在高高的露台上看秋夜的星星。偶尔我也坐坐办公室，帮忙办一点杂事，因为开学的日期近了，校长又患了伤寒症。吴来报到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以后我还见过她一两面。她是一个活泼、秀丽的姑娘。

不久，校长住进医院，我也回上海了。学期结束，一位在那里教书的朋友来到上海，在我们闲谈中他讲起了吴。吴爱上了学校的英语教师，事情被家里知道了，进行干涉。家里早替她作了安排，挑选的未婚夫就是这个学校的校董，本省一位有钱的绅士。英语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姓郭，爱好文学，喜欢写散文，年纪不过二十三、四。他唤起一个少女的爱、接受这个热情少女的爱，也是寻常的事。他们之间就只有这样一种感情的交流。然而压力来了。女的不肯屈服；男的先是受到批评，后来给赶出学校，逃到鼓浪屿，住在友人家中。校董胜利了。婚礼提前举行。姑娘还不甘心投降。但是她有什么

办法冲出樊笼呢？在结婚的前夕她还冒着大雨偷偷跑到鼓浪屿去找我那个朋友，表示要跟随他流浪到天涯海角，永不分离。我那个朋友一则没有胆量，二则不愿意让她跟他一起吃苦，他婉辞谢绝了她的爱。她绝望地回到家中，不再作任何冲出去的尝试了。寂寞的死亡在等待她。

我写的就是这样的爱情故事。我把两个少女不幸的遭遇合在一起了。其实，我奋笔写作的时候，在我脑子里活动的人物形象并不止这两个，我可以举出许多名字。我有一种习惯：小说写成了，常常没有题目。这部中篇写完，我也想不出题目来。当时我翻译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刚刚在《中学生》月刊上连载完毕，我准备交给开明书店印单行本。我把全书重读一遍，忽然"灵机一动"，给我的中篇想好了一个题目：《春天里的秋天》。我根据这个题目和小说的内容写了一篇序。这年十月，两本小说同时在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秋天里的春天》是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用世界语写的小说。中译本借用了原书的封面，突出一个人物的画像。我的小说的封面则是钱君匋同志参照这个格式设计的。译本中有一幅插图，表现中学生雇吉卜赛人在"小太阳姑娘"的帐篷外奏小夜曲，这是照原书的插图翻印的。钱君匋同志也为我的小说绘了一幅《海上看星》的插图。到一九四〇年，开明书店同时重排两本小说，封面一律简单化，插图也就给取消了。

关于《春天里的秋天》，我就写到这里。但是我的故事并没有完结。那位姓郭的朋友离开福建以后，又到别处教书。在那些日子里，人要找一个铁饭碗，很不容易。一个普通的知识

分子找工作更困难。没有靠山，没有"来头"，纵然精通英语，会写散文，也不得不东奔西跑，求人帮忙，找一碗饭吃。我写完《春天里的秋天》的时候，听说郭在武汉美专教书，又遇到了麻烦。他爱上了一个女学生，也可以说是他们彼此相爱。女学生姓许，她的未婚夫在国外留学，是校长的兄弟。事情明朗化以后，校长出来干涉。女的不屈服，她父亲就把她关起来，交给她一盘粗绳和一把利刀，要她自杀。不然她就得断绝同郭的往来。女儿不肯听话，父亲也是十分顽固。在这紧要的关头，靠了母亲和哥哥的帮忙，许逃出了家，拿了一张船票，上了长江轮船到南京去投靠亲戚。许动身的时候，郭到船上送行，两个人都很激动，谈着，谈着，郭就不下去了。他把许一直送到南京。他们就在南京结了婚，当时住在南京的一位姓陈的朋友家里(就是我在晋江黎明高中认识的那位"范兄")。陈后来告诉我：郭和许到了南京，一起去找他，打算托他照料许。陈听了他们的故事，非常感动，主动地让出屋子，把郭留下来，安排他们结了婚。陈后来又到福建工作。他患肺结核，后来病情恶化，一九四一年初死在武夷山。他几次对我谈起郭和许的事情，总是用赞叹的口气，而且很满意自己让出屋子成全了他们。

故事到这里还不曾结束。这一对夫妇有了两个女儿，生活虽不算宽裕，家庭中却没有纠纷。他们到过好些地方，后来在上海住了下来。郭写了不少篇散文，翻译了几部西方文学名著，生活比较安定了。但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打散了他们那个小小的家庭，他们又开始到处转

移。全国解放后几年，他们到北京，在西单区定居下来。五十年代中我也曾到那里看望过他们。他老了，话也少了，但笑容却多了些。我想他们可以“白头偕老”了。

但是林彪、“四人帮”的魔爪也伸到了他们的头上。他们在北京西单区有五间小屋，是一个院子里的一排上房，这是郭用他的稿费买下来的，他翻译的《贵族之家》和《前夜》在全国有不少的读者。打击来的时候，许一个人在家，郭在广州暨南大学教书，女儿在别处工作。于是房屋没收，扫地出门，许给送到了广州。她的丈夫已经给关进了“牛棚”，连见一面也不可能。广州没有地方收留她。他们又把她送回湖北老家。她后来才到了女儿那里。我去年年底意外地收到她一封信，告诉我她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得到学校通知，说她丈夫“因天气炎热劳动时晕倒而死”。那么郭死在一九六八年夏天了。这才是我的故事的结束。但是我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写那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的时候会想到这样的结局吗？不仅是我，便是那个一盘粗绳和一把刀子没有能使她低头的姑娘，她想得到四十五年以后会给我写这样一封信吗？

过去的终于过去了。今天我重读这部旧作，四十几年前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我用什么来安慰亡友的家属呢？听说郭的问题至今尚未彻底解决①，可能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但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不会忘记他在现代散文的发展上所作的贡献。他在二十年代写的三本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

①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暨南大学在广州举行了追悼会为郭和其他七位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歌》和《白夜》都还在我的手边，他翻译的小说《贵族之家》、《前夜》和他校改过的小说《罗亭》也都在我的手边。我会常常翻看它们。它们有权利存在。那么对这个善良的人的纪念也会跟着它们存在下去吧。

1978年7月14日。

二　关于《长生塔》*

我在前一篇回忆里，讲到瑞典朋友送我小书的事。那天晚上除了小书，外宾还送给我一本大十六开本的杂志《人民写实报》，是今年的"夏季特大号"，上面有我的童话《长生塔》的译文和大幅插图。真没有想到在北欧还有人记得我一九三四年写的那篇童话！

当时我住在日本横滨本牧町小山上一个高等商业学校副教授武田的家里。他是汉语教师，我本来不知道他。我有几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同他熟，我去日本，他们把我介绍给他。那个时候去日本非常方便，不用办护照，买船票很容易，随时可以买，不要交出证件。我买的是"浅间丸"的二等舱票，船上服务周到，到横滨上岸也不受检査。我动身前由朋友去信通知武田我到达的日期。船靠岸时武田夫妇带着两个女儿，打着"欢迎黎德瑞先生"的小旗，在码头上迎接。他的妹妹同我一个朋友讲过短时间的恋爱。他教授中文，也需要找人帮忙。因此我就做了他家的客人。我把副教授的书房借用了三个月。朋友们的介绍信上说我是一个书店职员，我用的名字是黎德瑞。我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香港《文汇报》。

改名换姓，也不过是想免去一些麻烦。早就听说日本警察厉害，我也作了一点准备。为什么叫"德瑞"呢？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和章靳以、陆孝曾住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时，常常听见陆孝曾讲他回到天津家中找伍德瑞办什么事。伍德瑞是铁路上的职工。我去日本要换个名字就想到了"德瑞"，这个名字很普通，我改姓为"黎"，因为"黎"和"李"日本人读起来没有区别，用别的姓，我担心自己没有习惯，听见别人突然一叫，可能忘记答应。我住下来以后，果然一连几天大清早警察就跑来问我：多少岁？或者哥哥叫什么名字？我早想好了，哥哥叫黎德麟。吉庆的字眼！或者结婚没有？经过几次这样的"考试"，我并没有露出破绽，日本警察也就不常来麻烦了。

副教授武田先生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神》里面的"长谷川君"。也就是《鬼》里面的堀口君。他信神，当然也信鬼。我借住的正是那间"精致的小书房"，我在《神》里面已经详细地描写过了。我在这间书房里一共写了三个短篇：两篇小说和一篇童话。十二月中写成的《长生塔》，是其中的第二篇。我离开上海的前夕答应给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月刊第二年一月号写一个短篇。《神》写成寄出以后，我翻阅《现代日本小说集》消遣，读了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鲁迅先生译)，忽然想起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1899—1952)的童话《为跌下而造的塔》(胡愈之译)，我对自己说："写篇童话试试吧。"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座摇摇晃晃的高塔，只摇晃了几下，塔就崩塌下来了！长生塔的故事我也想好了。

我写《长生塔》并不费力，可以说是一口气写成的。不过

我也遇到困难：我不能公开地写作，让主人知道我是作家。我只好偷偷地写。我放一本书在手边，听见脚步声就拿书盖着稿纸。在武田去学校教课、孩子上学去的时候，家里非常清静，我也可以放心地写作。但是我记得我写《长生塔》时，武田患感冒请假在家，他脖子上缠了一块毛巾，早晨晚上仍然在紧接书房的客室里念经，不过整天没有进书房聊天，只是推开门探头进来打了个招呼。这样我虽然有点担心，但在两天里也就把童话写成了。一直到我同他告别去东京的时候，副教授还不知道我是一个作家。

我在前面提过爱罗先珂的《为跌下而造的塔》。我的《长生塔》就是从爱罗先珂的两座宝塔来的。不过爱罗先珂的塔是两个互相仇恨的阔少爷和阔小姐花钱建筑的，为了夸耀彼此的富裕，为了压倒对方，为了谋取个人幸福。而结果两个人同时从宝塔上跌了下来，跌死了。我的童话里的长生塔是皇帝征用民工修建的，他梦想长生，可是塔刚刚修成，他登上最高的一级，整座塔就崩塌下来，他的尸首给埋在建塔的石头下面。这就是皇帝的结局。皇帝就是指蒋介石。我通过这篇童话咒骂蒋介石。我说，他的统治就像长生塔那样一定要垮下来。童话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

《长生塔》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号的《中学生》上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到上海，这年冬天《中学生》月刊社又向我组稿。我就写了第二篇童话《塔的秘密》。这一篇比较长，又有些自己编造的东西。那些细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一定是从我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和读到的童话书里搬来的。开始有些吃力，但写到后面就感到思想顺畅了。这是一篇爱罗先珂式的童话。"'父亲，你来吧。'我闭上眼睛不顾一切地向着他手里的刀迎上去。"我的童话中的叙述和爱罗先珂童话里那个要造"全人类都可以乘的幸福的船"的"阿哥"的愿望不是一样的吗？今天我重读它，我还看到《幸福的船》[①]的影响。说实话，我是爱罗先珂的童话的爱读者。二十年代爱罗先珂的童话通过鲁迅先生、夏丏尊先生和胡愈之同志的翻译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上个月（一九七八年八月）以德田六郎先生为首的十多位懂世界语的日本旅游者在上海见到我，其中一位女作家向我问起对爱罗先珂的看法，我说我喜欢他的童话，受过他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人类爱"的思想一半、甚至大半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四篇童话中至少有三篇是在爱罗先珂的影响下面写出来的。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爱罗先珂在中国读者中间有过很大的影响。

第三篇童话《隐身珠》是根据古老的四川民间故事改写的，就是我小时候听惯了的"孽龙"的故事。这一次我给旧的故事加上了新的内容，把原先用来增加财物的宝珠改成了"隐身珠"。至于孩子变成龙，回头望母亲，母亲拉住脚不肯放，大水淹没全城……这都是旧有的民间传说，要是没有它，我就写不出《隐身珠》来。

《隐身珠》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写成的。当时凌叔华女士

---

① 《幸福的船》：爱罗先珂作，鲁迅、夏丏尊等译。

在编辑武汉一家报纸的文学副刊，她两次来信要稿。这以前不久她到过上海，萧乾同志介绍我认识了她。我过去是《花之寺》[1] 的读者，谈起来，我觉得她很爽快，很容易就同她相熟了。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我在横滨写第一篇童话《长生塔》的时候，那位日本朋友武田几次对我谈起他单恋过一个中国女人，有一回他给我看一封信，原来是一个女作家写给外国读者的回信，写信人的名字是凌叔华。武田当时大概在北平进修，他喜欢她的小说。一直到我住在横滨的那个冬天，他求神念经以后，到小书房来找我聊天，他还说，神告诉他中国女人现在还想念他。我始终没有对凌叔华女士讲过这件事情，但是在一九三六年看见她，我不能不想到她的小说的魅力。我和她见面就只有这一次。全国解放的时候她不在国内。我四十年没有得到她的音信，只有一次听说她五十年代中回过北京。去年读徐迟同志的文章，我才知道她曾经打电话劝李四光同志提前回国。也是在去年，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中国新闻社记者写的关于我的报道，她从伦敦来信说她读了“记事”，“十分安慰”，她说她要回国探亲。她还说：“你或者不会记得我。”我当然记得她，而且我还保存着她四十二年前写给我的几封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上说：“您的文章到了。我该怎样高兴。”信里说的文章就是《隐身珠》。

这篇童话写起来更不费力，可以说，我只是把我小时候听惯了的、而且一直使我的心非常激动的故事忠实地记录了下

---

① 《花之寺》：凌叔华的短篇小说集。

来。我改动不大、增加不多，原来的民间故事就很动人。给我讲故事的人虽然大都是老妈妈，但她们讲得有声有色，而且很有感情，因为故事里含有人民的共同心愿，这就是：凡是压迫人民的都要灭亡。我的童话里说明的也就是这个真理。

第四篇童话《能言树》，是为开明书店的《新少年》半月刊写的。我自己很喜欢它。这是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二楼写成的。当时我替朋友马宗融、罗淑夫妇看房子（宗融在广西大学教书），一个人住一幢房屋。二楼那个房间不算大也不算小，除了桌椅和沙发，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有的是我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我发了狂似地奋笔写了两个晚上，每晚都写到两点钟。屋子里升着火，我心里燃烧着火，头上冒着汗，一边念，一边写，我在控诉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摧残青年的罪行。我写到"为什么那些同情别人、帮助别人、爱别人的年轻孩子就该戴镣铐、挨皮鞭、坐地牢、给夺去眼睛、给摧残到死？"我丢下笔在屋子里走了好几转。我感到窒息，真想大叫几声，我快要给憋死了。

在这个时候以前我写的是小女孩把脸压在树干上向大神哀告，神一直没有回答，因为神是不存在的。现在，那棵把小女孩的眼泪尽量吸收去了的年轻的树讲话了："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用镣铐、皮鞭、地牢等等来维持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他们终于会失掉幸福。"

这就是《能言树》的由来。即使是编童话，我也不愿让树木随便讲话。但是到了非讲话不可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了我的

"人物"，换句话说，我控制不了我的笔了。过去我常说我写小说就像在生活，这是真实的情况（当然不是指所有的作品）。

《能言树》发表以后不到半年，我的童话集《长生塔》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我在书前加了一篇"序"。我说："我勉强称它们为童话，其实把它们叫做'梦话'倒更适当。"没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见，因为这几篇童话并不曾受到人们的注意。

一九五四年初，我从朝鲜回来，北京有一位朋友写信来索取这本小书，说是打算介绍给一家出版社。我感谢他的好意，把书寄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书稿给退了回来。朋友来信说，他读了这本小书，不很了了，拿给孩子读，孩子也说不懂。朋友讲得干脆、老实，我应当感谢他。我虚心地把《长生塔》等四篇重读了一遍放在一边，觉得不印也好。但是过了两个月，另一个朋友偶然向我提起这本书，我又找出来看了一遍，坦然地把它交给另外一家出版社排印了出来。

《长生塔》就这样地保存下来了。但是我觉得那位朋友的话也有道理。今天的孩子的确不容易看懂我这四个短篇，它们既非童话，也不能说是"梦话"，它们不过是用"童话"的形式写出来的短篇小说。我的朋友用看安徒生童话的眼光看它们，当然不顺眼。至于孩子不懂，更不能怪孩子，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三十年代中国的事情。然而历史是不会迁就人的，而任意编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人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林彪和"四人帮"的下场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1978 年 9 月 24 日，

1979 年 7 月 25 日修改。

三　关于《第四病室》*

今天下午去医院看病，回来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第四病室》，就找出来翻了一下，我又回到抗日战争的日子里去了。

小说是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写的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贵阳发生的事情。那一段时期中我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里住了十几天，第二年我就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这部小说。

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贵阳的生活情况。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小憩”是对外营业的宾馆，这是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面的一座花园洋房，没有楼，房间也不多，那几天看不见什么客人。这里没有食堂，连吃早点也得走半个小时到镇上的饭馆里去。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香港《文汇报》。

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这样：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者中篇小说。

我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然后我拿着我舅父的介绍信买到邮车的票子。我送萧珊上了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

我对萧珊讲过，我回桂林之前要到中央医院去治鼻子，可能需要进行一次手术。我当天上午就到医院去看门诊，医生同意动手术"矫正鼻中隔"，但要我过一天去登记，因为当时没有床位。我等了两天。我在另外一家小旅馆开了一个小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这对我毫无不便，我只有晚上回旅馆睡觉。白天我到大街上散步，更多的时间里去小旅馆附近一家茶馆，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一两小时，因为我也有坐茶馆的习惯，在那里我还可以观察人。

就在这两天中我开始写《憩园》，只是开了一个头。

两天以后我住进了医院，给安排在第三病室，也就是外科病室。我退了旅馆的小房间，带着随身带的一个小箱子坐人力车到了医院，付了规定预付的住院费，这样就解决了全部问题。我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天，给我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治鼻

子，然后又转到外科开"水囊肿"。谁也不知道我睡在医院里，我用的还是"黎德瑞"这个假名。没有朋友来探过病，也没有亲人来照料我。贵阳开明书店办事处里有我的熟人，我的信件都由那里收转。我只对他们说我有事去别处。动过手术后的当天，局部麻醉药的药性尚未解除，心里十分难过。但是我在这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三等大病房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出院的时候，对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倒有一种惜别之情。

出院后我先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住了十多天，继续写《憩园》，从早写到晚，只有在三顿饭前后放下笔，到大街散步休息。三顿饭我都在冠生园解决，早晨喝碗猪肝粥，其余的时间里吃汤面。我不再坐茶馆消磨时间了。我恨不得一口气把小说写完。晚上电灯明亮，我写到夜深也没有人打扰。《憩园》里的人物和故事喷泉似地要从我的笔端喷出来。我只是写着，写着，越写越感觉痛快，仿佛在搬走压在头上的石块。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我就丢开了《憩园》的新旧主人和那两个家庭，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脸，那些痛苦的面颜，那些善良的心……。我忘不了那一切。我对自己说："下一本小说就应该是《第三病室》。对，用不着加工，就照真实写吧。"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这样一间有二十几张病床的外科病房不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吗？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人们怎样死亡，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但是我在贵阳写的仍然是《憩园》，而且没有等到完稿，我就带着原稿走了，这次我不是回桂林，我搭上了去重庆海棠溪

的邮车。萧珊在重庆两次写信来要我到那里去，我终于改变了主意，匆匆地到了四川。万想不到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再踏上桂林的土地，因为不久就发生了“湘桂大撤退”的事情。动身前我还再去花溪在“小憩”住了两天。我在寂寞的公园里找寻我和萧珊的足迹，站在溪畔栏杆前望着急急流去的水。我想得多，我也写得不少。我随身带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叠西式信笺，用信笺作稿纸，找到一个小碟子或者茶碗盖，倒点水，磨起墨来，毛笔蘸上墨汁在信笺上写字很方便。我在渝筑道上的小客栈里也没有停笔。最后在重庆我才写完这部小说，由出版社送给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装订成一本的西式信笺的每一页上都盖了审查处的圆图章。根据这个稿本排印，这年十月小说就同读者见面。这些图章是国民党检查制度的最好的说明，我把原稿保留下来，解放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手稿部了。

第二年我开始写《第四病室》。没有稿纸，我买了两刀记账用的纸，比写《憩园》时用的差多了，这种纸只能用毛笔在上面写字。我当时和萧珊住在沙坪坝一个朋友的家里，是土地，楼下一大间，空荡荡的，我白天写，晚上也写，灯光暗，蚊子苍蝇都来打扰。我用葵扇赶走它们，继续写下去。字写得大，而且潦草，一点也不整齐。这说明我写得急，而且条件差。我不是在写作，我是在生活，我回到了一年前我在中央医院三等外科病房里过的日子。我把主人公换成了睡在我旁边床上那个割胆囊的病人。但我只是借用他的病情，我写的仍然是当时用我的眼光看见的一切。当然这不是一个作家的见闻，所以

我创造了一个人物陆怀民(我在这里借用了第六床病人朱云标的本姓),他作为我一个年轻读者给我写了一封信，把我的见闻作为他的日记，这样他就可以睡在我当时睡的那张病床上用我的眼光看病房里的人和事了。

我写得很顺利,因为我在写真实。事实摆在那里,完全按照规律进行。我想这样尝试一次,不加修饰,不添枝加叶,尽可能写得朴素、真实。我只把原来的第三病室同第四病室颠倒一下,连用床位号码称呼病人,我也保留下来了。(我有点奇怪，这不是有点像在监牢里吗?)那几个人物……那个烧伤工人因为公司不肯负担医药费,终于在病房里痛苦地死去;那个小公务员因为父亲患病和死亡给弄得焦头烂额；那个因车祸断了左臂的某器材库员在受尽折磨之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得了伤寒,病情恶化;还有那个给挖掉一只眼睛的病人等等,等等,我都是按照真实写下来的,没有概括,也没有提高。但我也没有写出真名真姓，因为我不曾得到别人的同意。既然习惯用病床号数称呼病人，就用不着我多编造姓名了。小说里只有几个名字,像医生杨木华,护士林惜华,病人朱云标,当然都是我编出来的。朱云标的真姓名，我完全忘记了。我只记得他姓陆，我把他的姓借给日记(也就是本书)的作者了。可是对他的言语面貌，我还有印象。我初进病房，在病床躺下，第一个同我讲话的就是他。他睡在我左边床上，左臂高高地吊起来,缠着绷带,从肘拐一直缠到手腕,手指弯曲着,给吊在一个铁架上，而铁架又是用麻绳给绑在方木柜上面。这是那位中年医生的创造发明，他来查病房或者换药时几次向人夸

耀这个。他欣赏铁架，却从来没有注意那个浙江农村青年的灵魂，他的态度给病人带来多少痛苦。在这个病房里病人得用现款买药，自己不买纱布就不能换药，没有钱买药就只有不停地给打盐水针。这个从浙江来的年轻人在家乡结了婚，同老婆合不来，吵得厉害，就跑了出来。后来在这里国民党军队某某器材库工作。有一天他和一个同事坐车到花溪去玩，翻了车，断了胳膊，给送到陆军医院，然后转到这里。他常常同我谈话，我很少回答。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容易烦躁，一直想念他的家乡。他因为身边没有多少钱，不习惯给小费，经常受到工友的虐待。不久他发烧不退，后来查出他得了斑疹伤寒。他是在什么地方传染到斑疹伤寒的呢？医生也说不出。病查出来了，因为没有钱买药，还是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神志不清，讲了好些"胡话"。小说里第八章中他深夜讲的那些话都是真实的，只有给他母亲写信那几句才是我的"创造"。他并没有死，第二天就给搬到内科病房去了。这以后他怎样我完全不知道，也无法打听。

另一个病人是在我眼前死去的，就是那个烧伤工人。他受伤重，公司给了一点医药费，就不管他。在医院里因为他没有钱不给他用药，只好打盐水针，他终于痛苦哀号地死去。他对朋友说："没有钱，我的伤怎么好得了？心里烧得难过。天天打针受罪。……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他们就让我死在医院里，不来管我！"这些话今天还在烧我的心！他第二天就永闭了眼睛。工友用床单裹好他的尸体，打好结，还高高地举起手，朝着死人的胸膛，把断定死亡的单子一巴掌打下去。旁边

一个病人批评说："太过分，拿不到钱，人死了还要挨他一巴掌。"这就是旧社会，这就是旧社会的医院。一九五八年我在上海广慈医院采访了抢救钢铁工人丘财康同志的事迹，这一场挽救烧伤工人的生命的战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丘财康同志活下来了。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在医院里一个露台上旁听全市外科名医的会诊，专家们为丘财康同志的治疗方案提供意见，认真地进行讨论。我从医院回家，已经相当迟了，一路上我想着一九四四年惨死的烧伤工人，他的烧伤面积比丘财康同志的小得多，可是在过去那样的社会里哪有他的活路！我多么希望他能活到现在。

还有那个小公务员和他的后颈生疮烂得见骨的老父。这一家人从南京逃难出来，到贵阳已经精疲力尽了。儿子当个小公务员，养活一家六口人很不容易，父亲病了将近一个月，借了债才把他送进医院。我亲耳听见儿子对父亲说："你这场病下来，我们一家人都完了。"父亲不肯吃猪肝汤，说："我吃素。"儿子就说："你吃素！你是在要我的命。你是不是自己不想活，也不要别人活！"我还听见儿子对别人说："今天进医院缴的两千块钱还是换掉我女人那个金戒指才凑够的。"又说："要不是生活这样高，他也不会病到这样；起先他图省钱，不肯医，后来也是想省钱，没有找好医生……"又一次说："今天两针就花了一千六百块钱。我实在花不起。"过两天父亲不行了，还逼着儿子向一个朋友买墓地，说："李三爷那块地我看中了的。你设法给我筹点钱吧。我累了你这几年，这是最后的一回了。"他催促儿子马上跑出去找人办交涉。等到儿子回

来，就只看到"白白的一张空床板"。父亲给儿子留下一笔还不清的债，古怪的封建家庭的关系拖着这个小公务员走向死亡。虽然无名无姓，在这里我写的却是真人真事，我什么也没有增加。在这小人小事上面不是看得出来旧社会一天天走向毁灭吗？更奇怪的是，这个吃素的老人偏偏生杨梅疮，真是莫大的讽刺！

我不再谈病人了，上面三个人只是作为例子提到的。我还想谈谈那个年轻的女医生杨木华。她并不是真人，真实的只有她的外形。在这本小说里只有她才是我的创作。我在小说里增加一个她，唯一的原因是，我作为一个病人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位医生，我编造的是我自己的愿望，也是一般病人的愿望。在病房里我见到各种各样的医生，虽然像杨木华那样的医生我还没有遇见，但她的出现并不是不可能的。她并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她不过是这样一位年轻医生：她不把病人看作机器或者模型，她知道他们都是有灵魂、有感情的人。我在三等病房里住了十几天，我朝夕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位医生在病房里出现。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也曾这样想过：通过小说，医生们会知道病人的愿望和要求吧。所以我写了杨木华。我说：在这种痛苦、悲惨的生活中闪烁着的一线亮光，那就是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她随时在努力帮助别人减轻痛苦，鼓舞别人的生活的勇气，要别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①

---

① 见我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后记》。

但是像这样一位医生在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那个医院里，怎么能长久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所以我给她安排了一个在金城江大爆炸中死亡的结局："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且热心地帮忙着抢救受难的人……她自己也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后来我编印《文集》、一九六〇年底在成都校改这部小说，我自己也受不了那个悲惨的结局，我终于在《小引》里增加了一小段，暗示杨大夫到了四川改名"再生"，额上还留着一块小伤疤。她活着，我也感到心安了。

其实我也仔细想过：为什么杨大夫就不能在那个医院里工作下去呢？她当时不过是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学生、实习医生。她要改变思想和她的生活方式，总得在碰了无数次钉子之后，在她离开学校做了多年医生之后。根据我的经验，哪怕旧社会是多大的染缸，要染黑一个人、也不是容易的事。杨大夫的确应当活下去，工作下去。

小说写完了，出版了……。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它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给戴上了"毒草"的帽子，这是无足怪的。我接受批判时，心安理得，我看出来我的确和"四人帮"那一套"对着干"。我希望医生把病人当朋友，"四人帮"之流却把病人当敌人，在医院里实行"群众专政"。在一段长时间里，好几年吧，我没有去医院看病，因为我不愿意先到群众专政组去登记，不愿意让别人在我的医疗卡或病历卡上加批"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等等字样。友人王西彦纪念魏金枝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当病人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时，医生看到是个气喘吁吁的老人，原来态度是很积极的，可是等

到机关去了人以后，大概知道病人是个靠边的，医院里的态度就变了。"这是一九七二年年底的事，就在这之前四个月，萧珊患肠癌在上海某医院"动手术"，她一个人住院治病，却需要动员全家的人轮流看护、照顾，晚上也得有人通宵值班。萧珊病情恶化，我们要求医院代请一位较有经验的护理人员，医院也毫无办法。看来一个人生重病就可能拖垮一家。对"四人帮"之类搞的那种让病人（或者及其家属）自力更生的办法，即使在当时我也想不通。我守在萧珊的病榻旁边，等待她需要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几次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在贵阳医院里的一段经历。难道我是在做梦？难道我没有写过一本叫做《第四病室》的小说？难道我写的真实是假话？当时我一个人睡在病床上，甚至在开刀后不能动弹的时刻，没有家属照顾，也不要我自力更生，我居然活下来了。

今天是萧珊逝世后六年零八个多月[①]，想到她在上海医院中那一段经历，我仍然感到心痛。大概没有人再相信"四人帮"之类的胡说了吧。现在重读三十五年前我写的中篇小说，我还有一种和老友重见的感觉。重读它我更加热爱生活，它仍然鼓舞我前进，鼓舞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前进。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我还是在想："怎样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怀念当时第三病室的医生、护士和病友。

1979 年 3 月。

---

①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是萧珊逝世七周年纪念日。

四　关于《海的梦》*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文学小丛书”，把我的中篇小说《海的梦》收了进去。我在看校样时重读了它，因此想起了一些事情。说“最近”其实也是九、十个月以前，想起的事有些又给忘记了。我先把不曾忘去的写下来。

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正要结婚，就同我一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内租了房子，索非夫妇住在楼上，我住楼下，二房东住亭子间。过了不多久，二房东回到乡下，把亭子间也让了给我们。我在宝光里十四号一直住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像《家》、《雾》、《新生》（初稿）等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索非比我早离开，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闸北区内几次流传日军侵犯的谣言，索非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世，为了方便，他们全家搬到提篮桥开明书店附近去了。

我留在宝光里。整幢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搬到楼上，把楼下当作饭厅。原来那个给我们烧饭洗衣的中年娘姨住在楼下，给我作饭、看家。她会裁剪缝补，经常在楼下替别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八日、十五日香港《文汇报》。

人做衣服。

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写完了《家》，翻译了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在这几个月里面，我还到浙江长兴煤矿去住了一个星期。有一个姓李的朋友到上海出差，在马路上遇到我。他在长兴煤矿局作科长，他讲了些那边的情况，约我到他那里作客，他和我相当熟，我听说可以下煤坑看看，就一口答应，第二天我同他搭火车去杭州转湖州再转长兴。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写小说，否则我就会在那里多住几个星期，记录下一些见闻。我记得有一本左拉的传记讲左拉为了写《萌芽》在矿山调查了六个月。一九三三年我答应在一份刊物上发表连载小说，也写了《萌芽》，可是我就只有储存在脑子里的那么一点点材料。到了没有办法时，回避不行，我只好动手编造了。

在长兴没有多住，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上海还有一个没有人照管的"家"。那个娘姨只知道替别人做衣服挣钱，附带给我看看门，别的事她就办不了。她不会把我的东西搬光，这个我可以相信，而且我除了书，就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部份还是索非的。但是离开"家"久了，可能会耽误事情，我总有一点不放心。

去长兴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去南京，时间晚一点，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二十四、五日。这一次是友人陈范予写信约我去的。陈范予就是我在《关于〈春天里的秋天〉》里提到的朋友陈，我后来还写过《忆范兄》纪念他。那个时候他到南京工作不久，他告诉我，我们共同的朋友吴克刚（他在河南百泉教书）最近来了南京，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在中央研究院工作，

他就是在巴黎同我住了几个月的卫惠林。我也想去看看他。我得到陈的信，立刻决定到南京去玩几天。当时我的表弟高惠生在浦东中学念书，寒假期间住在我这里，我走了，有他替我照管房子。我上了去南京的三等车厢，除了脸帕、牙刷以外，随身带了一小叠稿纸，是开明书店印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面写了不到三页的字，第一页第一行写着一个题目：《海的梦》。第二行就是这样的一句：

> 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这是一篇小说的开头，是我去南京的前两天写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过什么题材，写怎样的故事。我应该怎样往下写，我也没有想过。我只有一个想法：写海，也写一个女人。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我后来在《序》上说我"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这是笼统的说法，其实那时我并未想到把它写成中篇，而且也不曾想过要写一篇抗日的小说，我去南京的时候不可能写完第一节，因为第一节的后半已经讲到杨的故事了，杨就是小说里那个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英雄"。

我把这一小叠稿纸塞在衣服口袋里带到南京，本来有争取时间写下去的打算。可是我在南京旅馆里住了几天，一个字也没有写，我哪里有拿笔的时间！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我按照预定的计划坐火车回上海。火车开到丹阳，停下来，然后开回南京。上海的炮声响了！日本军队侵入闸北，遭到我国十九路军的抵抗。不宣而战的战争开始了。

这样我被迫重到南京，在旅馆里住下来，然后想尽方法搭上长江轮船回到上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情况，我都写在《从南京回上海》这篇文章里面，而且很详细。

我到了上海，回不了我的"家"。宝山路成了一片火海，战争还在进行。我向北望，只见大片的浓烟。我到哪里去呢？

我首先到当时的法租界嵩山路一个朋友开设的私人医院。意外地在那里看到了索非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新生的婴儿)，他们也"逃难"到这里来了。从索非的口里我知道了一些情况。他们的住处并未毁，只是暂时不便出入。他们住在医院的三楼，我就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出去找朋友。两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住在步高里，他们临时从闸北搬出来，在这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客堂间"，他们邀我和他们同住，我当然答应。我每天晚上到步高里，每天早晨出去找朋友打听消息。所以一九三二年六月写的《序》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也找到了表弟，同他一起去看过我舅父一家，他们本来住在北四川路底，这次"逃难"出来，在环龙路(南昌路)一家白俄开设的公寓里租了一个大房间。

记得那个时候上海文化界出了一份短期的抗日报纸，索非在编副刊，他向我组稿，我就把上海炮声响起以后我在南京的见闻写了给他，那就是《从南京回上海》。至于我带到南京旅行两次的那一小叠开明稿纸，我还没有翻动过它们。

只有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日军完全占据闸北，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疲乏地走到步高里五十二号，我和朋友们

谈个不停，不想睡觉。后来我找出了《海的梦》的原稿，看来看去。这一夜我不断地做梦，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我开始了中篇小说的创作。我决定把海和那个女人保留下来，就紧接着去南京以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地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在写这小说的时候，我得到索非的帮忙，打听到宝光里安全的消息。不久闸北居民可以探望旧居的时候，我和索非进入“占领区”，经过瓦砾堆，踏着烧焦的断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头颅骨，一路上还看见侵略者耀武扬威和老百姓垂头丧气。小说中里娜在“奴隶区域”里的所见就是根据我几次进入“占领区”的亲身经历写的。《序》上说：“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也是事实。那一次我一个人到旧居去拿东西，走过岗哨跟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他不动声色，我也不动声色。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最后，那两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帮助我，我们雇了一辆“搬场汽车”去把我那些没有给烧毁的书籍傢具，搬到步高里来。书并不太多，只是因为楼下客堂间地板给撬掉，挖了一个大坑，后门又给堵塞，从楼上搬书下来出前门不方便，整整花了一个上午，还有些零星书本散失在那里。以后再去，什么也没有了，房子有了另外的主人。

起初我每晚写几页小说，等到书搬了出来，小说的人物、

故事自己在发展，逐渐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把感情越来越多地放了进去。白天我也不出去，白天写，晚上写，越写越快。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海的梦》写完了。

不久施蛰存同志创办《现代》月刊，托索非向我组稿，我就把写好的《海的梦》交给索非转去。这个中篇在《现代》上连载了三期。这以后我写了一篇《序》把它交给新中国书局出版，在小说后面附加了那篇同它有关的《从南京回上海》。那个时候我已经搬出步高里，住到我舅父家中了。《海的梦》是在步高里写成的。本来我那两个朋友和我都不想再搬家，可是那里的二房东要把房子顶出去。他愿意把房子顶给我们，已经讲好了价钱，但我们筹不够这笔钱，就只好搬家。两个朋友先后离开了上海，我就搬到我舅父住的那个公寓里。我在那里不过住了一个多星期，有个朋友从晋江来约我去闽南旅行，我答应了他，就同他上了海轮，开始了《春天里的秋天》的那次旅行。这其间我舅父在附近的花园别墅租了一幢房子，把我的东西也搬了过去。我回上海就住在舅父家里，舅父在邮局工作，我一直住到第二年（一九三三年）春天他给调到湖北宜昌去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向新中国书局收回《海的梦》的版权，交给开明书店"改版重印"，我抽去了《从南京回上海》，却加了一篇《改版题记》，又加了一个副标题：《给一个女孩的童话》。《改版题记》中引用了我一九三四年底在日本写的散文《海的梦》里的一段话：

> 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

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

新加的副标题就是从这里来的。"女孩"是我舅父的大女儿，名叫陈宗浩，当时不过十八岁，在武昌一所教会女中上学。她念书不一定念得很好，因为她父亲的工作经常调动，她跟着他到过不少地方。但是她十分善良、老实，而且柔顺听话。我不知道她是否在中学毕业，因为不久她又跟随父母回到成都。抗战期间我在成都、在重庆、在贵阳都到过舅父家作客；解放后在上海和北京我也去过他们那里。她习惯了管理家务，成了这个家庭不可缺少的成员。在她父亲身上精神病的症状越来越显著；母亲平日不做事情，整天坐在家里不动，她还要烧菜做饭。我看见她带着微笑渐渐地憔悴下去，也不能给她帮忙。听说她进了什么会计培训班，后来考进人民银行参加工作。他们不愁衣食，但生活条件也不曾有多大的改善。她下班以后还要做家务劳动。父亲回四川住过一段时期。母亲坐着不动，有一天就这样在家里死去。她妹妹在工厂劳动，结了婚走了。她的兄弟们都成了家分居各地。剩下她一个人照料她患精神病的老父。别人后来告诉我，她每天上班前还要做好饭菜留给父亲，而神经失常的父亲也不会体贴这个柔顺的女儿。

父亲死后她也患了不治的病——癌症。她生病，她死亡，我都不知道，那段时期我在靠边或者被宣告为"敌作内处"。她病危时，两个在南方的兄弟都去北京探望、照料，她也许不感寂寞，但死得相当痛苦，留下一笔不大的存款和不多的遗物，分送给几个兄弟。没有听说她留下什么遗言，她默默地活着，

也默默地离开这个世界，她还不曾活到六十。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初，我在京出席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刚摔了跤，左肩关节脱臼，左膀给绷带吊着。她同她妹妹一起来看我，我请她们在前门饭店附近一家湖北饭馆吃过饭，送她们到车站，看她们上车。在旅馆里她还谈过一些她目前的情况。她应当是在诉苦，但她的声音是那样温和，那样平静，略带倦容的脸上仍然带着微笑。这是最后的一面。十四年后的今天，我重看《海的梦》，想起那个"女孩"，那张略带倦容的笑脸还在我的眼前。我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还有像她这样善良的人？还有像她这样不为自己活着的人？但是她这一生又有什么意义？没有能够拉她一把，我感到遗憾。一九三四年尾我在信里同她谈海，有意拨开她的眼睛，因为当时我刚从上海到日本，在海上过了三四天。可是她一直到死都没有看到海，可能她也没有读过我这篇《改版题记》。我为什么不提醒她呢？我觉得没有见过大海的人是不幸的。我一个多月前还见过海，而且到过大仲马在小说《基度山伯爵》中描写过的伊弗堡，五十一年前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只是几次远远地眺望它，这一次我却冒着风浪登上了小岛。我站在岛上望海中起伏的波浪的白沫，我想起《题记》中引用过的话："我还有勇气，我还有活力，而且我还有信仰。"死了的人不能复活，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吧。对我来说，就是更好地完成我到八十岁的写作计划，让对死者的纪念鼓舞着我。愿那个平平淡淡、没没无闻地活了一生的人得到安息。

以上的话是由《给一个女孩的童话》这个副标题引出来

的。为什么我要在一九三五年加上这个副标题呢？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把《海的梦》称为"童话"，而又在《改版题记》中说"它不大像童话，又不大像小说"呢？它明明是中篇小说，而我在发表了三年以后却又说它不是小说，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一年五月发生了《闲话皇帝》的事件，国民党政府因为日本外交当局的抗议马上查封了发表《闲话皇帝》的《新生》周刊，判处周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罪名是"侮辱友邦元首"。我担心小说遭到查禁，又害怕会给出版它的书店老板带来麻烦（不能怪他们有顾虑），就给小说戴上一顶"童话"的帽子，算是化了妆。童话，是莫须有的故事嘛。不让"友邦外交当局"抓到辫子嘛。

小说中那个犹太女人里娜是编造出来的，故事的叙述者犹太人席瓦次巴德也是虚构的。本来我没有必要把叙述故事的人写成一个犹太人，唯一的原因就是想介绍一个真实的故事：犹太革命者席瓦次巴德在巴黎用手枪打死白俄将军彼特留拉。人是真的，故事是真的，小说里叙述的那些"波格隆"罪行，都是当时在法庭上揭露出来的。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席瓦次巴德被判决无罪释放。第二天法国《人道报》的头条新闻便是："席瓦次巴德无罪释放。陪审员谴责乌克兰'波格隆'负责者、反布尔塞维克的匪帮。"

关于屠杀犹太人的"波格隆"罪行，我一九三〇年还写过短篇小说《复仇》。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我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参观了六百万犹太人集体毁灭的惨剧的遗迹，含着眼泪写过一篇详细的报道。这惨剧是我写《海的梦》时所绝对想不到

的。今天我仍然诅咒那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罪行，我仍然纪念那无数的“波格隆”和奥斯威辛的受害者。他们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鼓吹者是毫不相干的。

写到这里我的“回忆”似乎应当结束了。可是我又想起一件事。一个多月前我访问法国时，在巴黎有人问我的作品里是不是有一种提倡受苦的哲学，是一位我见过几次的汉学家提出的问题，大意是这样（后来我再看见他，他还讲我写过“痛苦是力量”，“痛苦是骄傲”的话）。那一次是在一个类似我接受读者们考试的会上，一个半小时里，我要回答好些问题，因此我答得简单、干脆。我连发问人的原意也没有能弄清楚，就说：“我写作品只是反映生活，作品里并没有什么哲学，我并不是陀思朵也夫斯基一类的作家。”这是实话。回到旅馆，我想了一下，我记得好像在小说《雨》里面，主人公说过“痛苦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骄傲”一些话。今天在《里娜的日记》里又看到和这类似的语言。小说的最后讲到里娜时也说她是说“……痛苦就是力量，在痛苦中寻找生命”这样的话的一个女人，这并不是宣传受苦的哲学。我并不提倡为受苦而受苦，我不认为痛苦可以使人净化，我反对禁欲主义者的苦行，不赞成自找苦吃。可是我主张为了革命、为了理想、为了崇高的目的，不怕受苦，甚至甘愿受苦，在那种时候，“痛苦就是力量，痛苦就是骄傲”。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哲学。

最后可能有人要问：你这篇“回忆”里时而讲《海底梦》，时而谈《海的梦》，是不是你记错、写错了？对，我应该说明一下。《海底梦》并不是“海底下的梦”，它和《海的梦》是同样的意思，

是同样的一本书。《海底梦》就是《海的梦》。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文字相当欧化，常常按照英文文法遣词造句。我当时还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部哲学著作《伦理学》。这部书引用不少相当深奥的哲学名著，我并未读过，临时找来翻阅，似懂非懂，无法译得流畅，只好学习日文本译者内山贤次的办法硬译，就是说按照外国文法一个字一个字地硬搬，结果使我的文字越来越欧化。例如一个"的"字有三种用法，用作副词写成"地"，用作形容词，写成"的"，用作所有格紧接名词我就写成"底"。我用惯了，把凡是连接两个名词的"的"都写成"底"，甚至代名词所有格，我的，你的，都写成"我底"，"你底"。《灭亡》里是这样用法，《家》里是这样用法，《海的梦》里也是这样用法，明明是关于"海"的梦，或者海上的梦，却变成了海底下的梦了。当时还有人写文章把"底"当作形容词词尾使用，记得在这之前鲁迅先生翻译《艺术论》等著作也把"底"字用作形容词词尾。我看，再像我这样使用"底"字，只能给读者带来混乱，就索性不用它了，以前用过的也逐渐改掉。重排一次改一次。《家》、《春》、《秋》改得最晚。《灭亡》至今未改，留着"底"字说明我过去的文风和缺点。我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编辑我的《文集》时，的确把我所有的作品修改了一遍。五十年中间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不知改了多少遍。我认为这是作家的权利，因为作品并不是试卷，写错了不能修改，也不许把它改得更好一点。不少西方文学名著中都有所谓"异文"(la variant)。要分析我不同时期思想的变化，当然要根据我当时的作品。反正旧版还在，研究者和

批判者都可以利用。但倘使一定要把不成熟的初稿作为我每一部作品的定本，那么，今天恐怕不会有多少人“欣赏”我那种欧化的中文、冗长的表白、重复的叙述、没有节制的发泄感情了。说实话，我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进步的。

我说这些话，只是因为前不久我看到香港出版的英译本《寒夜》，译者在序言里好像说过，我在解放后编《文集》，为了迎合潮流修改自己的著作，他们认为还是解放前的版本比较可靠。我说“好像”，因为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书又不在我手边，但大意不大会错，他们正是根据旧版《寒夜》翻译的。其实说这话的不仅是他们，有些美国和法国的汉学家也这样说。最近我读过一遍《寒夜》，我还记得一九六〇年年尾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修改这小说的情景，我也没有忘记一九四四、四五两年我在重庆民国路生活的情景，我增加了一些细节，只是为了把几个人物写得更完整些。譬如树生离开重庆的凌晨和丈夫在楼梯口分别，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后来她回重庆探亲，听说丈夫已经死去，又记起了楼梯口分别的情景，她痛苦地想道：“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这更能说明我心目中的曾树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同情她和我同情她的丈夫一样，甚至超过我同情她的婆母，但是我也同情那位老太太，这三个都是受了害的好人。我鞭挞的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我鞭挞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不论作为作者，或者作为读者，我还是要说，我喜欢修改本，它才是我自己的作品。

1979年1月13日。

五　关于《神·鬼·人》*

最近我在看我的两卷本《选集》的校样。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

这三个短篇都是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则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关于〈长生塔〉》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丏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会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一九三四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是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二十一日香港《文汇报》。

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不然就是《小川未明童话集》的译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易）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

于是我十一月二十四日（大概没有记错吧）到了横滨。我买的是二等舱票，客人不太多，中国人更少，横滨海关人员对二等舱客人非常客气，我们坐在餐厅里，他们打个招呼，也不要办什么手续，就请我们上岸。不用我着急，武田副教授和他的夫人带着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打着小旗在码头等候我了。以后的情况，我在《关于〈长生塔〉》里也讲了一些，例如每天大清早警察就来找我，问我的哥哥叫什么名字等等，每次问一两句，都是突然袭击，我早有准备，因此并不感到狼狈。我在当时写的第一个短篇《神》里面还描写了武田家的生活和他那所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小山坡上的"精致的小木屋"。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了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也说明武田君是一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

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的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我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里面，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地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的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了一点，在小说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是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说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

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可以，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武田君就说过："在我们这里宗教常常是家传的"）。他想用宗教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拚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跳进深渊"去。我当时是这样判断的。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就难说了。我在武田君家里不是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只住了一个多星期，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光景。以后我在东京、在上海还接到他几封来信。我现在记不清楚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还是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他来过上海，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过"黎德瑞先生"。他写下一个地址，在北四川路，是他妹妹的家。当时有不少的日本人住在北四川路，但我在日本时，他妹妹不会在上海，否则他一定告诉我。我按照他留的地址去看他，约他出来到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大东茶室吃了一顿晚饭。我们像老朋友似地交谈，也回忆起在横滨过的那些日子。他似乎并未怀疑我的本名不是"黎德瑞"，也不打听我的生活情况，很容易地接受了我所讲的一切。他的精神状态比从前开朗，身体也比从前好。我偶尔开玩笑地问他："还是那样虔诚地念经吧？"他笑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他不曾讲下去，我也没有追问。我知道他没有"跳进深渊"就够了。以后我还

去看望他，他不在家，我把带去的礼物留下便走了。他回国后寄来过感谢的信。再后爆发了战争。抗战初期我发表两封《给日本友人》的公开信，受信人"武田君"就是他。一九四〇年我去昆明、重庆以后，留在上海的好几封武田君的信全给别人烧毁了，现在我手边只有一幅我和他全家合摄的照片，让我记起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小说里描写了武田君住宅四周的景物。可能有人要问这些景物和故事的发展有没有关系？作者是不是用景物来衬托主人公的心境的变化？完全不是。我只是写真实。我当时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我喜欢这四周的景物，就把它们全记录下来。没有这些景物，长谷川的故事还不是一样地发展！它们不像另一个短篇《鬼》里面的海，海的变化和故事的发展、和主人公堀口君的心境的变化都有关系。没有海，故事一时完结不了。小说从海开始，到海结束。

我在《鬼》里描写的也是武田君的事情。我写《神》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还要写《鬼》。要不是几次同武田君到海边抛掷供物，我也不会写出像《鬼》这样的小说来。《神》是我初到横滨时写的，《鬼》写于我准备离开横滨去东京的时候，因此我把堀口君老实地写作"商业学校的教员"，就是说我不怕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疑心我在写他了。

《鬼》不过是《神》的补充，写的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件事。在两篇小说中我充分地利用了我在横滨三个月的生活经验，这是一般人很难体验到的，譬如把供物抛到海里去，向路边"马头观音"的石碑合掌行礼吧，我只有亲眼看见，才知道有这

样一回事情。我说："在堀口君的眼里看来，这家里大概还是鬼比人多吧。"有一个时期在武田君家里的确是这样。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已经睡下了，他开门进来，连声说："对不起。"我从地上铺的席子上坐起来，他连忙向我解释：这几天他家里鬼很多，我这间屋子里也有鬼，他来给我念念经，把鬼赶走。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但终于忍住了。我就依他的话埋下头，让他叽哩咕噜地在我头上比划着念了一会经，然后说："好了，不要紧了，"一本正经地走了出去。我倒下去很快就睡着了，我心中无鬼，在梦里也看不见一个。说实话，我可怜武田君，我觉得他愚蠢。开始写《鬼》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我托一个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朋友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给我预订了房间。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武田君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我实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诉我，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我就会给"捉将官里去"，我也不改变主张。我当时刚过三十，血气旺盛，毫无顾虑，不怕鬼神，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来的我所没有的。我今天还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说《鬼》里面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现在的确衰老了。

《鬼》和《神》不同的地方就是：《鬼》的最后暗示了主人公堀口君的觉醒。故事也讲得比较清楚：他同一位姑娘相爱，订了约束，由于两家父亲的反对，断绝了关系。姑娘几次约他一

起"情死"，他都没有答应。他认为"违抗命运的举动是愚蠢的"。姑娘嫁了一个商人，后来患肺结核死去。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多少年前，百年、千年吧，就经常发生了，今天仍然在发生。"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他们反对恋爱，而且有所创造地用领导和组织代替家长安排别人的婚姻。十几年来，我见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事情，婚姻渐渐变成了交易，像日本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倒显得相当新奇了。不过，武田君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但在当时"情死"是普遍的事，在报纸上天天都有这一类的新闻。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在日本不能随便讲恋爱，搞不好，连命也会送掉。著名的日本小说家有岛武郎在他的创造力十分旺盛的时期，也走上了"情死"的路，因为像堀口君那样几次拒绝女方相约"情死"的建议是丢脸的事。然而要是有岛武郎不死，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好作品来。

我现在记不准《鬼》的手稿是从横滨寄出的还是在东京交邮。收件人是黄源，他是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月刊的助理编辑。我寄稿的时候，心血来潮，在手稿第一页上标题后面写了一行字：神——鬼——人。这说明我还要写一个短篇：《人》。这三篇是有关联的，《人》才是结论。我当时想写的短篇小说《人》跟后来发表的不同。我不是要写真实的故事，我想写一个拜神教徒怎样变成了无神论者。我对自己说："不用急，过两个月再写吧，先在东京住下来再说。"在东京我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里面，一个人一间屋，房间不大不小，陈设简单，房里有个两层的大壁橱，此外还有一张铁床，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和两三把椅子。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一间课堂，白天

有一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要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期杜宣、吴天他们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楼下还有食堂，我总是在那里吃客饭。每天三顿饭后我照例出去散步。

中华青年会会所在东京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可以说我每天要去三次，哪一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的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这里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的中年职员。后来我又发现几个经常出入的日本人，胖胖的，举动不太灵活，却有一种派头。我向别人打听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特务警察之类吧。我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暗中观察他们。我的观察还没有取得一点结果，我就让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这是后话，我下面就要谈到它。

到了东京，我对西文旧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不过我还是到楼下办公室报了名，听陈文澜讲日语课。我记得是念一本岛木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他的讲解还不错，只是我缺少复习的时间，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还不曾学好日语。回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得很。

在东京我有几个中国朋友，除了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人外，还有两个福建人，他们租了一幢日本房子，楼上让给两位中国女学生住。这些人非亲非戚，这样住着，引起了日本

人的注意。还有，我曾经坐省线电车到逗子，转赴叶山去看梁宗岱、沉樱夫妇，在他们家住过一晚。还有，卞之琳从北平到日本京都，住在一位姓吴的朋友那里，他也曾到东京来看我。还有，……我想不起什么了。到东京以后两个月中间我的活动大概就只有这些吧。"刑事"们一定也看在眼里记在帐上。幸而只有这短短的两个月，因为所谓"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四月初就要到东京访问了。日本报纸开始为这场傀儡戏的上演大肆宣传，制造舆论，首先大骂中国人。于是……

一场"大扫除"开始了。就在溥仪到来的前两天，大清早那个同福建人住在一起的四川女学生来找，说我那两个福建朋友半夜里给带走了，"刑事"们在他们那里搜查了一通。她讲了些经过的情形，要我注意一下。她走后我就把自己的书稿、信件检查了一番。两个福建人中姓袁的和我较熟，我是一九三〇年第一次去晋江时认识他的。我抽屉里还有他的来信，连忙找出撕毁了。我也把新买的西文旧书稍微整理了一下。

这样忙碌了之后，我感到疲乏，便躺倒在床上。脑子哪里肯休息，我就利用这一段空闲时间清理思想，把我在日本编造的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也好好理一下，什么事该怎么说，要记清楚，不能露出破绽。我也回忆了梁宗岱夫妇的事和卞之琳到东京看我的事。我想，要是他们问起，我全可以老实地讲出来，用不着害怕。

吃过中饭以后我仍然照常逛西文旧书店。晚饭后我也到旧书店去。吃晚饭时我看见那个姓"二宫"的胖胖的"刑事"，

但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从食堂出来，瞥见他和另一个"刑事"从楼梯上去。我心想：他们上来干什么？我考虑一下，才慢慢地走上楼。他们却不声不响地下来了。我警告自己：夜里要当心啊！

这一夜我心不定，书也看不进去。我估计"他们"会来找我，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来。我又把信件检查了一番，觉得没有什么破绽，把心一横就上床睡了。这时我们这里非常安静，不过十点多钟，我也出乎意外地睡得很好。

忽然我从梦中惊醒了。我朝房门看，门开了，接着电灯亮了，进来了五个人，二宫就在其中。"他们"果然来了。我马上跳下床来。于是"他们"开始了搜查：信抽出来看了；壁橱里的书也搬出来翻了。他们在我这个小房间里搞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叫我锁上门跟他们一起到警察署去。

在警察署里开始了"审讯"，审讯倒也简单，"问官"要问的话，我早就猜到了，梁宗岱、卞之琳、叶山、京都……"他们"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去，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

从我半夜里睁开眼睛看见"他们"推门进来，到我昂头走出神田区警察署，"看见落日的余光"，这其间的经过情形，我详细地写在短篇《人》里面了，没有必要在这里重述。不过我应当提说一下，这不是我初来东京时计划写的那个短篇。它是作为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写成的，最初的题目是：《东京狱中一日记》，打算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文学》特大号

上。稿子寄出去了，可是就在这年五月在上海发生了所谓"《闲话皇帝》事件"，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发表文章的《新生》周刊被查封，主编被判处徒刑。我的文章编进《文学》，又给抽了出来。我不甘心，把它稍加修改，添上一点伪装，改名《一日记》，准备在北平《水星》月刊上发表，已经看过了清样，谁知书店经济出了问题，刊物印不出来，我看文章无处发表，就改变主意，改写一下，在那个偷书的囚人身上添了几笔，最后加了一句话："我是一个人！"把回忆作为小说，编在《神·鬼·人》这个集子里面了。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文学丛刊》，有权处理自己的稿子，没有人出来干涉、不准我拿回忆冒充小说，而且通篇文章并没有"日本"的字样，不会有人把我抓去判处徒刑，何况我自己又承认这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文章就这样给保全下来，一直到今天。但是当时那些用武力、用暴力、用权力阻止它发表的人连骨灰也找不到了。

我从警察署回到中华青年会，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给抓走的事，就是那个中年的日本职员。他看见我，小声说："我知道，不敢做声。真是强盗！"后来我才知道我给带到警察署去的时候，在叶山、梁宗岱家里也有人进去搜查，在京都卞之琳也遇到一点麻烦。这以后再没有人来找过我，但是我在东京住下去的兴趣也不大了。我总感觉到人权没有保障，要是那些人再闯进我的房间，把我带走，有人知道也不敢做声，怎么办？我写信给横滨的武田君发牢骚。他回信说："您要是不去东京，就不会有这种事。我们全家欢迎您回到我们家来。"他

的确把事情看得像信神那样简单。我感谢他的邀请，但是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过了三、四个月，吴朗西、伍禅他们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用我的名义编印《文化生活丛刊》，要我回去参加编辑工作，我就离开日本了。这次我买了“加拿大皇后”的三等舱票，仍然到横滨上船。从东京来送行的人不少，只是我没有通知武田君。

我那两个福建朋友吃了不少的苦头。一个姓叶的因为第一次审问时顶了几句，给关了一个星期。一个姓袁的给关了半个月，放出来，他马上要回国，警察署怀疑起来就把他“驱逐出境”。后来听他说，他坐船到天津、一路上都有人押送。船停在一个城市，他就给带到监牢里囚禁。特别是在大连，他给关在日本监牢里过了一个时期。管牢的汉奸禁子，对同胞特别凶，有时领到一根新的鞭子或者一样新的刑具，就要在同胞的身上试一下，不管你是不是得罪了他们。到了天津，我那个朋友才得到了自由。他吃了那许多苦头，罪行就是：溥仪到东京访问时他住在那里；给带到牛込区警察署审问时他的回答不能使人满意；关了以后给释放出来，就要马上回国。这就是一九三五年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东京等地的遭遇。我在神田区警察署受到审问的时候，有人问我怎样在晋江认识他，我想起一个姓陈的朋友，就说是姓陈的人介绍，后来才知道他在审问中也是这样说。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当时住在黎明高中过暑假，他来找我，我们就熟了。但是审问的人非要我们讲出介绍人不可，我们只好随口回答，凑巧两个人的思路碰到一起，才没有露出马脚，否则他可能还要遇着更多的麻烦。

姓袁的朋友一九五八年患鼻癌死在福州，当地的报上还刊出他的讣告。他不可能讲述他的这段故事了。然而我还没有忘记四十四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这以后我还和"刑事"们打过交道，那就是在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六三年，我三次访问日本，进行人民友谊的活动，"刑事"们要为我的安全负责。我出门他们坐在车内前座，见到我默默地鞠一个躬。的确时代变了，二宫先生也一定不在人世了。那三年中间我昂着头进出日本现代化旅馆的时候，总是充满信心地想：我绝不会再做那样的"噩梦"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九三五年我在东京做过的"噩梦"竟然搬到上海来了，那是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事情，甚至继续了十年之久，各种各样的人代替了日本的"刑事"，而且比"刑事"凶残得多，蛮横得多。……我遭受侮辱和迫害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小说《人》，我怀着爱国主义的感情暗中祝愿：不要做得比"刑事"们更坏吧。但是当时许多人好像发了狂一样，好像喝醉了一样。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呢？究竟为了什么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些人似乎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怎么可能呢？让大家重新想一想。这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情。这绝不是一两个帮派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不要再做"噩梦"了！

1979年8月28日。

六　关于《龙·虎·狗》*

一

《创作回忆录》我准备写十篇，当然能多写更好。关于“回忆录”，我的看法常常在改变，最近有一位朋友劝告我丢开一切写作计划，集中精力写自己的“回忆录”，他说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工作”。恰恰相反，我认为我的结局应当是：“烧掉拉倒”，作家只用作品和读者见面，倘能得到读者的宽容，作品可以多活几年。至于个人所作所为，经过十年的内查外调，也应当弄得一清二楚，一、不需要再拿出来示众，二、不需要自己出来鸣冤叫屈，三、再没有人逼我写检查交代，四、我不想抬高自己也不愿贬低自己，那么为什么我还要罗嗦地谈自己的事情呢？因此我不打算写“自传”、“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即使以前写过，今后也不再写了。

但《创作回忆录》又当别论。我既然写了那许多作品，而且因为它们受到长期的批评和十年的批斗，对这些作品至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议论以至于吱吱喳喳，那么回忆一番它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一月六日香港《文汇报》。

们写作的经过，写出来帮助读者了解我当时的思想感情，自己似乎有这样的责任，因此在我的作品给摘下"毒草"帽子之后，我又写起《创作回忆录》来。这《创作回忆录》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发表的《谈自己的创作》差不多，《谈自己的创作》在十年"文革"中给打成"作者替自己翻案的大毒草"，在上海专门开过一次批判它的批斗会。因此今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还在想会不会再构成一次翻案的罪行。给蛇咬过的人看见绳子也害怕，我现在的顾虑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吧。

在以前几篇"回忆录"里我谈过了中、短篇小说和童话，这次我想谈谈我的散文，我就从《龙·虎·狗》谈起。《龙·虎·狗》是一九四一年八月我在昆明编成，寄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陆圣泉，由他发排出版的。我手边还有这个集子的两种版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的上海"初版"和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渝二版"，不用说，重庆版是用很坏的土纸印刷的。重庆版第一辑中少两篇文章(《寂寞的园子》和《狗》)，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原因，重庆版和当时在重庆出版的一般书刊一样，是经过了所谓"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的，封底还印着"审查证图字第二〇三〇号"字样。但是那两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日本侵略军的，不会得罪重庆市的审查老爷，而且他们也没有胆量抽掉它们。现在想不起不要紧，以后会慢慢想起来的，我用不着在这件小事上多花费脑筋。

我在抗战时期到昆明去过两次，都是去看我的未婚妻萧珊。第一次从上海去，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第二次隔了一年，也是在七月，是从重庆去的。《龙·虎·狗》中主要的十九

篇散文是在一九四一年写的，只有第一辑里收的四篇文章中的前两篇是第一次在昆明小住时写成的，后两篇则是到四川以后的作品了。今天我重读这本集子，昆明的生活又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寂寞的园子里，大黄狗是我的一个和善的朋友。

那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一九三九年年初我和萧珊从桂林回到上海，这年暑假萧珊去昆明上大学，我在上海写小说《秋》。那个时候印一本书不需要多少时间，四十万字的长篇，一九四〇年五月脱稿，七月初就在上海的书店发卖了。我带着一册自己加印的辞典纸精装本《秋》和刚写成的一章《火》的残稿，登上英商怡和公司开往海防的海轮，离开了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那天在码头送行的有朋友陆圣泉和我的哥哥李尧林。我在"怡生轮"上向他们频频挥手，心里十分难过。

我一去就是五年。没有想到过了一年多陆圣泉就遭了日本宪兵队的毒手，我回到上海只能翻读他用陆蠡笔名发表的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而李尧林呢，他已经躺在病床上等着同我诀别，我后来把他的遗体埋葬在虹桥公墓，接着用他自己的稿费给他修了一个不太漂亮的墓。然而十年浩劫一来，整个公墓都不见了，更不用说他的尸骨。

一九四〇年从上海去海防毫无困难：需要的护照，可以托中国旅行社代办，船票可以找旅行社代买，签证的手续也用不着我自己费神。那次航行遇到风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但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海防。在海防我住在一家华侨开设的旅馆里。上船时我是单身一个，在旅馆里等待海关检查行李时我

已经结交了好几位朋友。我随身带的东西少，一切手续由旅馆代办，我只消出一点手续费。同行的客人中有的东西带得较多，被海关扣留，还得靠旅馆派人交涉，或缴税或没收，由那里的法国官员说了算。还有人穿着新的长统皮靴，给强迫当场从脚上脱下来。总之，当时从上海到所谓"大后方"去的人大都经由海防乘火车进云南，去昆明。我经过海防时法国刚刚战败，日本侵略军正在对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要侵占越南，形势紧张，这条路的命运不会长了，但这里还是十分热闹、拥挤，也正是旅馆里的人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等在旅馆里，同行的人被海关扣留的东西都一件一件地给拿了回来。这样大家就动身继续往前走了。

我们自动地组织起来，身强力壮的人帮忙管理行李，对外交涉，购票上车，客栈过夜，只要花少许钱都办得顺利。我们从海防到河内，再由河内坐滇越路的火车到老街，走过铁桥进入中国国境。火车白昼行驶，夜晚休息，行李跟随客人上上下下，不仅在越南境内是这样，在云南境内一直到昆明都是这样。靠了这个自发的组织，我在路上毫不感到困难。跟着大家走，自己用不着多考虑，费用不大，由大家公平分担。所谓大家就是同路的人，他们大都是生意人，也有公司职员，还有到昆明寻找丈夫的家庭妇女。和我比较熟悉的是一位轮船公司的职员和一位昆明商行的"副经理"，我们在海轮上住在同一个舱里。"副经理"带了云南太太回上海探亲，这条路上的情况他熟悉，他买了好几瓶法国三星牌白兰地酒要带出去，为了逃税，他贿赂了海关的越南官员，这当然是通过旅馆的服

务员即所谓接客人员进行的。我看见他把钞票塞到越南人的手里，越南人毫无表情，却把钞票捏得紧紧的，法国人不曾觉察出来，酒全给放出去了。做得快，也做得干脆，这样的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常有机会见到。他们真想得出来，也真做得出来。

这以后我们就由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横暴行为，一旦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在河口住进了客栈，安顿了行李，就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去登记。这机关的全名我已经忘记，本来在一九四〇年我用过的护照上盖得有这机关的官印，护照我一直保存着，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海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所谓"革命行动"中从我家里拿走后，就像石沉大海，因此我连这一段"回忆"差一点也写不出来。机关的衙门并不堂皇，官员不多，然而他们有权威。他们检验了护照，盖了印，签了字，为首的官员姓杨。大家都给放过了，只有我一个人遇到了麻烦。我的护照上写明："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长官问我在哪一家书店工作，我答说"开明书店"。他要看证件，我身上没有。他就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他们把护照留了下来。看情形我不能同大家一起走了。同行的人感到意外，对我表示同情，仿佛我遭到什么不幸似的。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

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印、签了名，放我过去了。

这是上午的事。下午杨先生和他两位同事到客栈来找我，我正在街上散步，他们见到商行副经理，给我留下一张字条，晚上几点钟请我吃饭，并约了我那两位同行者作陪。到了时候三位主人又来客栈寒暄一通，同我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铁桥，拿出准备好的临时通行证进入越南老街，在一家华侨酒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到河口，主人们还把我们送到客栈门口，友好地握手告别。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那个一片原始森林的小城，以后再也没有同那三位官员见面，他们也没有给我寄来片纸只字。他们真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老街过的那一两个钟头，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愉快。

从河口去昆明仍然是白天行车，晚上宿店，我们还是集体活动，互相照顾，因此很顺利地按时到达了终点站。萧珊和另一位朋友到月台来接我，他们已经替我找到了旅馆。同行者中只有那位轮船公司职员后来不久在昆明同我见过一面，其余的人车站匆匆一别，四十年后什么也没有了，不论是面貌或者名字。

我在旅馆里只住了几天。我去武成路开明书店取款，见到分店的负责人卢先生。闲谈起来，他说他们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栈房，相当空，地点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个屋主的房屋，很安静，倘使我想写文章，不妨搬去小住。他还陪我去看

了房子。是一间玻璃屋子，座落在一所花园内．屋子相当宽敞，半间堆满了书，房中还有写字桌和其他家俱。我和卢先生虽是初次相见，但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和最近一本小说(《秋》)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书店的职员都知道我，因此见一两面，我们就相熟了。我不客气地从旅馆搬了过去，并且受到他们夫妇的照料(他们住在园中另一所屋子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写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来，开始了安静的写作生活，这对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动身时并没有想到在昆明还能找到这样清静的住处。《静寂的园子》和《狗》就是在这里写的。我坐在玻璃屋子里，描写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动，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结束就怎样结束，我写散文从来就是这样，但绝不是无病呻吟。住下来的头两个月我的生活相当安适，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找我。萧珊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暑假期间，她每天来，我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还约一两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间出名的牛肉铺，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傍晚或者更迟一些，我送萧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里写《火》。我写得快，原先发表过六章，我在上海写了一章带出来，在昆明补写了十一章，不到两个月就把小说写成了。虽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这本书的完成，卢先生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来在《文丛》上发表过的那几章，小说脱稿以后他还抄录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时候，他早晚常来看望。后来敌机到昆明骚扰、以至于狂炸，他们夫妇还约我(有时还有萧珊)一起

在郊外躲警报。我们住处离城门近，经过一阵拥挤出了城，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躲了两个钟头，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我在《静寂的园子》里还提到这件事。

这次在昆明我写的散文不过寥寥几篇，但全都和敌机轰炸有关，都是有感而发的。几篇随感和杂文给我编在杂文集《无题》里面了。收在《龙·虎·狗》中的就只有我前面讲过的那两篇(《静寂的园子》和《狗》)。有些数字在我的脑子已经模糊，我说不清楚我是在十月下旬的哪一天去重庆的，只记得是沈从文同志介绍一位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同志吧?)替我买的飞机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对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狂轰滥炸。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挤进了越南(河口铁桥早已炸断)，他们的飞机就是从越南飞来的。对于和平城市的受难，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广州，下半年在桂林，生命的毁灭、房屋的焚烧、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国人民吓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吓倒了呢？当然没有。上飞机的前一两天，我和开明书店的卢先生闲谈，我笑着说："我们都是身经百炸的人。"他点头同意。

他的经验更丰富。前一两年他坐公路车在贵阳附近翻车，左膀跌断，在中央医院治疗，左膀上了石膏给绑在架上，发了警报后他不便下洞躲避，人们给他一把剪刀，准备在危急的时候剪断绑带逃命。贵阳市遭大轰炸时，他正在医院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胳膊。关于他，我还有话可说。以前

我只听见别人谈起他，例如翻车断臂的事。在昆明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也有可能他在上海见过我)。听说他本来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在上海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一类职务，他的岳父是知名的学者，他的妻子也研究中国文学，不知道怎样他给派到昆明当了分店经理，可能因为他能干，可能因为他可靠。那个时候开明书店发行教科书，销售量大，做一名分店经理，只要不是傻瓜，就不会放过发财的机会，他的生活条件可以不断改善。他们夫妇一直待在昆明。全国解放后他们的情况有改变，后来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一九五七年听说他们夫妇给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什么都完了。果然不到几年，就听说他们都死了。我不曾仔细打听过他们的遭遇，也不知道向哪里打听方便、可靠，而且我没有精力和时间。现在萧珊已经逝世，孩子们都是新时代的人，我即使谈起武成路玻璃屋子的情况，家里也没有人感兴趣了。但是想到那个"身经百炸"的人的归宿，我觉得十分难过，但愿有人为这一对亡灵摘去沉重的"帽子"，让他们在泉下得到安息。

二

我第二次到昆明在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也是为了看望萧珊。她已经搬出联大宿舍，和几个同学在先生坡租了房子，记得是楼上的三间屋子，还有平台。我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写《火》第三部时，常常想起这个住处，就把它写进小说，作

为那个老基督徒田惠世的住家。"这是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房外有一道走廊，两间住房的窗外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平台，由廊上左右的小门出入。"楼下住着抽鸦片烟的房东。萧珊她们三个女同学住里面的一间，三个男同学住外面的一间。我来的时候，萧珊的一个女同学和两个男同学刚去路南县石林参观，她留下来等我，打算邀我同去。谁知我一到昆明，就发烧、头昏、无力，不得不躺下来一连睡了几天。有两天放了空袭警报甚至紧急警报，我跑不动，萧珊坚持留下陪我。敌机好久不来轰炸，大家也就大意了，这两次敌机都没有投弹，我们也不曾受惊。但一个月后（因为正碰到雨季，这中间下了一个月的雨）敌机在这附近扔了炸弹，那天警报解除，我们从郊外回来，楼上三间屋子里满地碎砖断瓦，倘使我躺在床上不出去，今天就不能在这里多嘴了。

我第二次来昆明遇到的轰炸，是在《龙·虎·狗》已经编成、原稿寄往上海之后，因此收在《龙·虎·狗》里的十九篇散文中没有一篇描述炸后昆明的情况。《龙·虎·狗》的《序》是在八月五日写的，当时我还在埋怨"差不多天天落雨"，说"听到淅沥的雨声……真叫人心烦"。还说"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为止"。但正是这雨使我能够顺利地写成这些文章、编成集子。在这落雨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头埋在一张小书桌上，奋笔写满两三张稿纸，一连写完十九篇。题目是早想好了的：《风》、《云》、《雷》、《雨》；《日》、《月》、《星》；《狗》、《猪》、《虎》、《龙》；《醉》、《生》、《梦》、《死》；《死去》、《伤害》、《祝福》、《抛弃》（只有最后四个略有改动）。我有的是激情、有的

是爱憎。对每个题目，我都有话要说，写起来并不费力。我不是在出题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读者见面。好像我扭开了龙头，水管里畅快地流出水来。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很平静，每天至少出去两次到附近小铺吃两碗"米线"，那种可口的味道我今天还十分怀念。当然我们也常常去小馆吃饭，或者到繁华的金碧路一带看电影。后来萧珊的同学们游罢石林归来，我们的生活就热闹起来了。虽然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不是自己烧饭，每天得去外面喂饱肚子；雨下大了，巷子里就淹水；水退了，路又滑，走路不小心会摔倒在泥水地上，因此早晚我不外出)，可是在先生坡那座房子的楼上我感到非常安适，特别是在早晨，我望着窗外的平台，让我的思想在过去和未来中海阔天空地往来飞腾。当时并没有人号召我解放思想，但我的思想已经习惯了东奔西跑、横冲直撞。它时而进入回忆、重温旧梦，时而向幻想叩门，闯了进去。在我的文章里回忆和理想交替地出现。在我的笔下活动的是我自己的"意志"。我在当时是没有顾虑的。我写《龙·虎·狗》，我说："我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子，对准它打过去。……从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我说："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应该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吧。"我又说："龙说：'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去追寻那丰富的充实的生命。'"为了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生命的"开花"。我重读三十八年前的旧作，我觉得我并没有讲过假话，骗过读者。

《龙·虎·狗》写成后在上海和重庆各印过两版，印数不

会多。后来我把它编在《文集》第十卷中，抽出了一篇《死去》，这并无深意。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挨的骂实在不少，仿佛我闯进文坛，引起了公愤。我当时年少气盛，又迷信科学，不相信诸葛亮会骂死王朗，因此不但不服，而且常常回敬几句。在这篇散文里我梦见自己死去给埋葬以后，人们在墓前"举行大会，全体围绕棺盖站立，来一个集体唾骂"。他们劈开棺材进行批判，我忍受不了，忽然坐了起来。大家吓得大叫"有鬼"，"马上鸟兽似地逃散了"。一九五九年我删去这篇一九四一年的文章，还暗中责备自己的"小器"和"不虚心"。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劈棺暴尸的惨剧在"四人帮"时期居然成了"革命的行动"。《人生蛋和蛋生人》的作者生物学家朱洗就是在死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既给挖了坟，又受到批判。这样看来我似乎成了预言家了。不过今天想想，还是删去它为好。

现在我实在想不起来，那讨厌的雨是在哪一天停止的，大约是在八月十日前后吧，因为我十八日写了一篇叫《废园外》的散文，讲起"八月十四日的惨剧"，至少这个城市在十四日遭到轰炸，先生坡附近就落过弹，我在前面讲到的楼房受震，砖瓦遍地，可能还是那天以后的事，所以散文的结尾有这样的句子："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一连几天我中午或傍晚出去散步，经常走到那个"灾区"，花园里的防空洞中了弹，精致的楼房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土坡上躺着三具尸首，用草席盖着，中间一张草席下露出一只瘦小的泥腿，有人指着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难道我没有

看够这样的惨剧？在我这年年底写成的《还魂草》里也有少女的死亡，那是在重庆沙坪坝发生的事情，我写得比较详细，真真假假，揉在一起。可是在一千多字的《废园外》中“带着旺盛生命的红花绿叶”还在诉说一个少女寂寞生存的悲惨故事。我的叙述虽然带着淡淡哀愁的调子，但我控诉了敌人的暴行，也不曾放过我的老对头——封建家长、传统观念和旧的风习。我不会向任何时期出现的封建幽灵低头。

我在昆明住到九月，就同萧珊、还有一个姓王的朋友、三个人一路去桂林旅行。我们都是第二次到桂林。萧珊只住了一个短时期就回联大上学。我和姓王的朋友留了下来，住在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我和萧珊谈了八年的恋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才到贵阳旅行结婚，没有请一桌客，没有添置一床新被，甚至没有做一件新衣服。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住在出版社里，住在朋友的家里，无法给自己造个窝，可是我们照样和睦地过日子。关于她，我要在下一篇回忆里多谈一点，在这里我不罗嗦了。

1979年12月26日。

七　关于《火》*

《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在广州开始写《火》的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年九月在昆明完成第一部；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五月第二部在重庆写成；第三部则是在桂林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动笔、九月脱稿。作品写得不能叫自己满意，也不能叫读者满意，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考虑得不深，只看到生活的表面，而且写我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我动笔时就知道我的笔下不会生产出完美的艺术品。我想写的也只是打击敌人的东西，也只是向群众宣传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为当时斗争服务的东西。我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诗和散文，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写的散文和诗都是这一类的东西，除了在这两个时期外，我再也写不出诗来。仅有的那几首诗我还保留在《文集》里，正如我不曾抽去《火》那样。《火》是为了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而写的，《火》是为了倾吐我的爱憎而写的。这三部有连续性的小说不是在一个时期写成，在不同时期我的思想也在变化。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上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四日香港《文汇报》。

半年,我的感情强烈,也单纯,我的憎恨集中在侵略我国的敌人身上,在上海我望见闸北一带的大火,我看见租界铁门外挨饿的南市难民,我写了几篇短文记下当时的见闻和感受,我后来写《火》就用它们写成一些章节。《火》第一部描写"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以后到上海成为孤岛的这段时期,写了短短两三个月中的一些事情,而且只是写侧面,只是写几个小人物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后,我还留在那里继续写我在前一年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春》。写完了《春》,第二年三月我和友人靳以就经香港去广州。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他在广州筹备《文丛》的复刊,我答应他再写一部连载小说。这次我写了《火》。《文丛》是半月刊,我每隔半月写一章,刊物顺利地出了三期,就因为敌机连续的大轰炸而中断了。靳以去四川,我也到汉口旅行。我从汉口回广州,又续写了小说的第四章,但是不久,日军就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州,而且进展很快,最后我和萧珊(她是七月下旬从上海到广州的)靠朋友帮忙,雇了木船在当地报纸上一片"我军大胜"声中狼狈逃离广州。到了桂林,我又续写了两章《火》,续印了两期《文丛》。一九三九年初我同萧珊就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上海我写完了我的最长的小说《秋》,萧珊已在昆明上了一年的大学。本来我想在上海把《火》第一部写出来,可是那个时期在上海租界里敌伪的魔爪正在四处伸展,外面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之一就是日军要进租界进行大搜查,形势越来越紧张,有一个晚上我几次接

到朋友们警告的电话(他们大都在报馆工作)，不得不连夜烧掉一些信件和报刊，看来我也难在租界再待下去；何况法国战败投降，日军乘机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一定要挤进印度支那，滇越路的中断是旦夕的事。我不能错过时机，不能延期动身，只好带着刚写成的《火》的残稿离开孤岛，在驶向南方的海轮上，我还暗暗地吟诵诗人海涅的《夜思》中的诗句："祖国永不会灭亡。"不久我在昆明续写《火》，贯串着全书的思想就是海涅的这个名句。

我在广州写《火》的时候，并未想到要写三部。只是由于第一部仓卒结束，未尽言又未尽意，我才打算续写第二部，后来又写了第三部。写完第一部时，我说："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写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写文淑和素贞在内地的遭遇。"但是写出来的作品和当初的打算不同，我放弃了刘波，因为我不了解"秘密工作"，我甚至用"波遇害"这样一个电报结束了那个年轻人的生命，把两部小说的篇幅全留给冯文淑。她一个人将三部小说连在一起。冯文淑也就是萧珊。第一部里的冯文淑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当护士都是萧珊的事情，她当时写过一篇《在伤兵医院中》，用"慧珠"的笔名发表在茅盾同志编辑的《烽火》周刊上，我根据她的文章写了小说的第二章。这是她的亲身经历，她那时不过是一个高中学生，参加了一些抗战救国的活动。倘使不是因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冯文淑那样在中国军队撤出以后参加战地服务团去了前方。我一个朋友的小姨原先在开明书店当练习生，后来就参加战地服务团去到前方，

再后又到延安。要是萧珊不曾读我的小说，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在上海，那么她也会走这一条路。她的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遇见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经带着战地服务团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活动过，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几二十个穿军装的团员在一起，她们都是像冯文淑那样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泼、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写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我写《火》第一部时手边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关于冯文淑就只写到她参加服务团坐卡车在"满天的火光"中离开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庆和几个朋友住在沙坪坝，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做过宣传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馆。在那些时候他常常谈他在工作团的一些情况，我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于是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动了。

《火》第二部就只写这件事情，用的全是那位朋友提供的材料。我仍然住在书店的楼上，不过在附近租了一间空屋子。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较清静，地方不大，里面只放一张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去，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一天大约写五六个小时，从三月底写到五月下旬，我写完小说，重庆的雾季也就结束了。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找那位朋友，问一些生活的细节，他随时满足了我。但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写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即使主人公是我熟悉的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我也写不好，因为环境对我陌生，主人公接

触的一些人我也不熟悉，编造出来，当然四不像。我不能保证我写出来的人和事是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因此作品不能感动人。但其中也有一点真实，那就是主人公和多数人物的感情，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因为这个我才把小说编入我的《文集》。我的《文集》里有不少"失败之作"，也有很多错误的话，或者把想象当作现实，或者把黑看成紫，那是出于无知，但是我并不曾照我们四川人的说法"睁起眼睛说谎"。当然我也有大言不惭地说假话的时候，那就是十年浩劫的时期，给逼着写了那么多的"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那十年中间我不知想了多少次：我要是能够写些作品，能够写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哪怕是一两部"失败之作"，那也有多好！在我写《火》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能够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后来听人谈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重庆的居民的确因此十分狼狈，但也不曾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个把星期吧，"疲劳轰炸"也就结束了。然而轰炸仍在进行，我在昆明过雨季的时候，我的故乡成都在七月下旬发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轰炸，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惨死在公园里。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详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写《火》的第三部，就用轰炸的梦开头：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在回忆

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

今天我在上海住处的书房里写这篇回忆，我写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灵活了（不是由于天冷）。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几次觉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个场面：我和萧珊，还有两三个朋友，我们躲在树林里仰望天空。可怕的机声越来越近，蓝色天幕上出现了银白色的敌机，真像银燕一样，三架一组，三组一队。九架过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们去轰炸昆明。尽管我们当时是在呈贡县，树林里又比较安全，但是轰炸机前进的声音像锄头一样敲打我的脑子。这声音，这景象那些年常常折磨我，我好几次写下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后来又写了小说《还魂草》，仍然无法去掉我心上的重压，最后我写了冯文淑的噩梦。我写了中学生田世清的死亡，冯文淑看见"光秃的短枝上挂了一小片带皮的干肉"。写出了我的积愤，我的控诉，我感觉到心上的石头变轻了。作家也有为自己写作的时候。即使写冯文淑，我也可以把我对大轰炸的感受和见闻写进去。就是在江青说话等于圣旨的时期，我也不相信大观园全是虚构，《红楼梦》里面就没有曹雪芹自己，没有他的亲戚朋友。

在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找得到我的朋友亲戚，到处都有我自己，连《寒夜》里患肺结核死去的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东西。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常常东拼西凑，生活里的东西多些，拼凑的痕迹就少些，人物也比较像活人。我写冯文淑时借用了萧珊的性格，在第一部《火》里，冯文淑做的事大都是萧珊做过的，她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她在上海爱国女校毕了业才在暑假里去广州，中间同我一起到过

武汉，后来敌军侵占广州，她回不了上海，我们只好包一只木船沿西江逃往广西，同行还有我的兄弟和两个朋友，再加上林憾庐和他的《宇宙风》社同人。我们十个人是在敌军入城前十多个小时离开广州的。关于这次"远征"，我在小说中没有描写，却详细地记录在《旅途通讯》里面。这两本小书正如我一位老朋友所说"算什么文章！"，可是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也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也生活在平凡的人民中间。我的《通讯》写到"桂林的受难"为止。后来我和萧珊又坐火车到金华转温州，搭轮船回上海。在温州我们参观了江心寺，对文天祥的事迹印象很深，我有很多感慨。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我后来在《火》第二部初版后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这段话其实就是三部《火》的简要的说明。我编《文集》时删去了它，觉得这说明是多余的。但是我那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地强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滴出来的血。现在我可以说，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

我们从温州搭船平安地回到上海，过了三四个月，萧珊就去昆明上大学。以后她到过桂林、贵阳、重庆和成都。她不可能有冯文淑在《火》第二部中的经历，我当时只是设想她在那样的环境该怎么办，我就照我想得到的写了出来。萧珊是一

个普通人，冯文淑也是。在这三本小说里我就只写了一些普通人，甚至第一部中视死如归的朝鲜革命者和第三部中同敌人进行秘密斗争或被捕或遇害的刘波、朱素贞们也都是普通人，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会做出特殊的事情。总之，没有一个英雄人物，书中却有不少的爱国者。《火》并没有写到抗战的胜利。但是我相信对这胜利贡献最大的是人民，也就是无数的普通人。作为读者，作为作者，我有几十年的经验，一直是普通人正直、善良的品德鼓舞我前进。普通人身上有许多发光的东西。我在朝鲜战场上见到的"英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年轻人。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我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

在《火》第三部里我让冯文淑来到了昆明。不像在大别山，萧珊未到过，我也很陌生，昆明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她更熟悉了。先生坡、翠湖、大观楼……都写进去了。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的桂林写一九四一年的昆明。我的信念没有改变，但是我冷静些了。我在小说里写了一些古怪的社会现象，当然我看到的多，感受到的多，写下来的还比较少。冯文淑离开上海将近四年，在昆明出现并不显得成熟多少，其实我写的只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看见的昆明，到四三年情况又有变化了。我记得清楚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和处境困难。当时

最得意的人除了大官，就是囤积居奇、做黑白生意的（黑的是鸦片，白的是大米），此外还有到香港，到仰光跑单帮做买卖的各种发国难财的暴发户。那个社会里一方面是严肃工作，一方面是荒淫无耻。在国统区到处都是这样。我在小说里只写了几个普通的小人物，他们就是在这种空气中生活的。冯文淑在昆明，同她过去的好朋友朱素贞住在一起。萧珊在昆明，从宿舍搬出来以后就和她的好友、她的同学一起生活。那个姓王的女同学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纪比萧珊大一点，诚实，朴素，大方，讲话不多，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选的，但不知怎样，我的朋友又爱上了别人，要把她推开，她却不肯轻易放手。我那朋友当时在国外，他去欧洲前同我谈过这件事情。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他无权无势，既然没有理由跟妻子离婚，新的恋爱也就吹了。萧珊的女同学后来终于给了我的朋友以自由。但是那位朋友在恋爱的道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头，离婚——结婚，结婚——离婚，白白消耗了他的精力和才华，几乎弄到身败名裂，现在才得到了安静的幸福，这是后话。我两次在昆明的时候，经常见到萧珊的好友，我同情她的不幸，我尊敬她的为人。我写《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贞时，脑子里常常现出她的面影。她后来结了婚，入了党，解放后当过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文革"期间有人来找萧珊"外调"她在昆明

时期的一些情况，萧珊死后又有人来找我外调，说是要给她恢复工作。六、七年没有消息了。我祝她安好。

在朱素贞的身上还有另一个人的感情，那是萧珊的同乡，她的中学时期的朋友，一位善良、纯洁的姑娘。我在广州开始写朱素贞的时候，萧珊还在上海念书，没有见到我朋友的妻子，我那朋友当时可能也还没有开始新的追求。其实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两个人，我在那几年中间遇见的，给了我好的印象的年轻女人在朱素贞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但朱素贞并不是"三突出"的英雄。她始终是一个普通人。在最初几版的小说（《火》第三部）中朱素贞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念书，忽然接到陌生人从香港寄来的信告诉她：她那分别四年的未婚夫刘波在上海"被敌伪绑架"，关在特务机关里。她决定回上海去营救他。她动身前又接到一封香港发来的电报："波遇害，望节哀。"她决心去替他报仇。她走后大约七个月冯文淑收到从上海寄来的一份剪报，上面有一则消息报道大汉奸特务丁默村遇刺受伤，他的女友朱曼丽是幕后主使人，供认不讳，已被枪决。"这个朱曼丽似乎就是素贞，不过文淑不愿意相信。"我这样写，就是暗示朱曼丽和朱素贞是一个人。在当时的确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年轻女人刺杀丁默村未遂遭害。我记得有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另一个朋友认识这位女士，对我谈过她，他也讲不出别的原因，大概是一位爱国志士吧。这样的人很难令人忘记，我就让她也留下一点痕迹在朱素贞的身上。在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敌人和汉奸暗杀上海爱国人士，甚至悬头示众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起，后来在孤岛也几次出

现鸡匡者惩罚汉奸的大快人心的壮举。我用在上海的朝鲜革命者惩罚朝奸的事实结束了《火》的第一部，又用朱素贞谋刺丁默村的消息作为《火》第三部的《尾声》，也就是全书的结局。当时我是这样想的：用那个年轻女人的英勇牺牲说明中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胜利的决心。但是一九六〇年我编辑、校改《文集》的时候，改写了这个结尾，正如我在《后记》的注解中所说："我让冯文淑离开了昆明，让刘波和朱素贞都活起来，让人们想到这几个朋友将来还有机会在前方见面。"我加上素贞从香港写给文淑的一封信，说明她在上海同朋友们一起营救刘波出狱后结了婚，又陪着"遍体伤痕"的丈夫到香港休养，准备等刘波病好就一同到前线工作。她在信里解释这所谓前线就是"如今一般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就是说延安。文淑在覆信中也说："三四天后就要动身到前方去"，也就是到"那个'圣地'去"。国外有些读者和评论家对我这种改法不满意，说我"迎合潮流"，背叛了过去。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几十年来我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不断地在变化，有时变化小，有时变化大。我不能说我就没有把作品改坏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火》第三部的结尾改得并不坏，改得合情合理。当时人们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这是事实。只有这样地结束我的所谓《抗战三部曲》(尽管我写的只是一些侧面)，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当然我在《后记》的脚注中也说："这个小小的改动并不能弥补我这本小说中存在的大缺点。"这是真心话，不过我仍然要重复我说过的那句话：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就不能改动。按照"四人帮"的逻辑，一个人生下来就坏，

一直坏到死，或者从诞生到死亡，这个人无事不好。所以那个时期孩子们在银幕上甚至在生活中看见一个陌生人，就要发问：好人？坏人？不用说，文淑和素贞都是好人吧。

第三部中另外一个主人公田惠世也是好人。这是我一个老朋友，我把这个基督徒写进我的小说，只是由于一桩意外的事情：他的病故。他大概是患肺炎去世的。他自己懂一些医理，起初自己开方吃药，病重了才找医生，不多久就逝世了。当时他的夫人带着孩子来到他的身边，就住在我的隔壁。看见这位和我一起共过患难的年长朋友在我眼前死去，我感到悲伤。参加了朋友葬礼后两个多月，我开始写《火》的第三部，就把他写了进去，而且让他占了那么多的篇幅。我在一九六〇年一月修改小说的《尾声》时，曾经写道："我们之间有深厚的感情。这感情损害了我的写作计划。……我设身处地替他想得太多了。"我在小说里借用了那位亡友的一部份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我想写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可是没有成功。我的思想混乱，我本来想驳倒亡友的说教（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每顿饭前都要暗暗祈祷，我发觉了常常暗笑），可是辩论中我迁就了他，我的人道主义思想同他的合流了。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的旧作中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差不多占同样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萧珊也有些像我。所以小说里年轻姑娘冯文淑同老基督徒田惠世作了朋友，冯文淑甚至答应看《北辰》的校样，暂时到北辰社帮忙。《北辰》是田惠世的刊物。刊物的真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宇宙风》，它是林语堂创办的。林语堂后来带了全家人移居美国，把他

哥哥从福建请到上海代管他的事业。他的哥哥原是教师兼医生，在上海参加了《宇宙风》的编辑工作，名叫林憾庐。《宇宙风》本来还有一个合作者，后来在香港退出了。林憾庐在上海和香港都编印过这个散文刊物，一九四二年他第二次到桂林又在那里将它复刊。我一九四〇年在上海，一九四二年在桂林都为《宇宙风》写过散文和旅途杂记。一九三九年萧珊也在这个刊物上用"程慧"的笔名发表了几篇散文。她第一次拿到稿费，便买了一只立灯送给母亲，她高兴地说这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钱买的。她初到昆明，还写了一篇旅途通讯，叙述经海防去内地沿途的情况，也刊在《宇宙风》上。一年后我踏着她的脚迹到昆明，虽然形势改变，但我的印象和她的相差不远，我就没有写什么了。

我和林憾庐相处很好，我们最初见面是在泉州关帝庙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大儿子来上学，虽然谈得不多，但我了解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会，这是一九三〇年的事。以后我和他同在轰炸中过日子、同在敌人迫害的阴影下写文章、做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办的刊物，质量不高，但在当时销路不算少，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我至今还怀念他。他很崇拜他的兄弟，听他谈起来林语堂对他并不太好，他却很感激他这个远在海外的有名的兄弟。可能是他逝世一年以后吧，林语堂一个人回国了，到桂林东江路福隆园来看他的嫂嫂。我在林太太房里遇见他，他在美国出版了好几本小说，很有一种名人的派头。话不投机，交谈了几句，我就无话可说。以后我也没有再看见他。斩以夫妇从福

建南平回重庆复旦大学，经过桂林住了几天，我送他们上火车，在月台上遇见憾庐的孩子，他们跟去重庆的叔父告别，我没有理他。后来林语堂离开重庆返美时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告别中国的诗，我记得是两首或者三首七律，第一首的最后两句是"试看来日平寇后，何人出卖旧家园"。意思很明显。有个熟人在桂林的报上发表了一首和诗，最后两句是："吾国吾民俱卖尽，何须出卖旧家园"。《吾国吾民》是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头一本"畅销书"，是迎合美国读者口味的著作。憾庐曾经对我谈起该书在美国出版的经过，他引以为荣，而我却同意和诗作者的看法，是引以为辱的。

小说中另一个好人洪大文并不是真实的人物，我只借用了一个朋友的外形和他在连云港对日军作战负伤的事实。他年轻时候进了冯玉祥办的军官学校，当过军官，又给派到苏联留过学，一九二六年回国后经过上海，我们见过一面，他回到部队里去了，我也就忘记了他。一九四二年我在桂林忽然接到他的信，是寄到书店转给我的。信上说他到桂林治病，定居下来，要我去看他。我到了他的住处，当时人们住得比较宽敞，他躺在床上，有时拄着双木拐起来活动活动。人变了，湖南口音未变。他告诉我他离开过部队，后来又到税警团（宋子文的税警团吧）当团长，在连云港抗拒日军，战败负伤。小说中洪大文讲的战斗情况就是我那位朋友告诉我的，他还借给我一本他们部队编写的《连云港战史》。小说第八章中洪大文的谈话有些地方便是从所谓《战史》稿本中摘抄来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和萧珊到贵阳旅行结婚，后来就没有能回桂林，

湘桂大撤退后我也不知道他转移到哪里。一九四六年尾或者一九四七年初我在上海，他拄着双拐来找我，说是在江苏某地荣军教养院作院长，还是像一九二六年那样高谈阔论。他约我出去到南京路一家菜馆里吃了一顿饭，就永远分别了。他坐上三轮车消失在街角以后，我忽然想起了洪大文，洪大文不像他，洪大文比他简单得多。

最后我想谈几句关于朝鲜人的事，因为《火》第一部中讲到朝鲜革命者的活动，而且小说以朝鲜志士的英勇战斗和自我牺牲作为结束。我在这之前(一九三六年)还写过短篇小说《发的故事》，也是怀念朝鲜朋友的作品。我小的时候就听见人讲朝鲜人的事情，谈他们的苦难和斗争，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我少年时期崇拜的一位英雄。我第一次接触朝鲜人，是在一九二一年或者二二年。我在三十年代写的回忆文章里就讲过，"五四"以后我参加成都的《半月》杂志社，在刊物上发表过三篇东西，都是从别人书中抄来的材料和辞句，其中一篇是介绍世界语的，而我自己当时却没有学过世界语。不久就有人拿着这本杂志来找我，他学过世界语，要同我商量怎样推广世界语，他在高等师范念书，姓高，说是朝鲜人。我便请他教我世界语，但也只学了几次就停了，推广的工作也不曾开展过。我和高先生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到朝鲜人和我们不同，我们那一套人情世故，我们那一套待人处世的礼貌和习惯他们不喜欢，他们老实、认真、坦率而且自尊心强。这只是我一点肤浅的印象。

出川以后，一九二五年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了

业，带着文凭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检查体格时发现我有肺病，虽然不厉害，我却心灰意冷，不进考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数理化等课无把握，害怕考不好。我就这样放弃了学业，决定回到南方治病。我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我记得离京的前夕遇上北海公园的首次开放，在漪澜堂前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当时住在北河沿同兴公寓，房客不多，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我住在这里，还是一个编报纸副刊的姓沈的朋友介绍的。他是朝鲜人，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一个同乡来看我，天气热，又是很好的月夜，我们就坐在院子里乘凉。沈比较文雅，他的朋友却很热情，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好些朝鲜爱国志士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故事。我第一次了解了朝鲜人民艰苦而英勇的斗争，对朝鲜的革命者我始终抱着敬意。我后来就把那些故事写在《发的故事》里面。这以后几十年中间我遇见的朝鲜人不多，也不常同他们接触，但是从几个朋友的口中我也了解一些他们的流亡生活和抗战初期的一些活动。我就在《火》第一部中写了子成、老九、鸣盛、永言这班人，和他们惩罚朝奸的壮举。在小说里子成回忆起朝鲜民歌《阿里朗》。据说从前朝鲜人到我国满洲流亡，经过阿里朗山，悲伤地唱着它。我一九三八年第四季度在桂林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听见金焰同志的妹妹金炜女士唱这首著名的歌曲，我十分感动，当时正在写小说的这一章，就写了进去。我以前对它毫无所知，却能够把歌词写进小说甚至将歌谱印在发表这一章的《文丛》月刊上，全靠一位朝鲜朋友的帮忙。这位朋友姓柳，是园艺家，几十年来在一些学校或者农场里工作，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园艺

人材。他在当时的朝鲜流亡者中也很有威望。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在台北都曾见到他。今天我还没有中断同他的联系。他在湖南农学院教书，有时还托人给我捎一点湖南土产来。我还记得四十几年前他被日本人追缉得厉害，到上海来，总是住在马宗融的家中，几个月里他的头发完全白了。那一家的主妇就是后来发表短篇小说《生人妻》的作者罗淑。抗战初期罗淑患病去世，我们在桂林和重庆相遇，在一起怀念亡友，我看见他几次埋下头揩眼睛。

朋友柳已经年过八十，他仍然在长沙坚持工作，我仿佛看见他的满头银发在灿烂阳光下发亮。听说他从解放了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得了鼓励，我应当向他祝贺。《火》第一部出版时我在《后记》的末尾写道："我希望将来还能够有第四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我不曾实现这个愿望，但我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朝鲜人民已经用行动写出了光辉诗篇，也一定能完成统一朝鲜的伟大事业。

1980年1月25日。

八　关于《还魂草》*

那篇关于《龙·虎·狗》的回忆发表后，我收到几封读者和朋友的来信，这事实就说明人们认真地阅读这一类文章，也愿意帮助我弄清楚一些事情。今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发了一份通知，说"卢芷芬同志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经我社复查并报上级批准已予改正，恢复名誉。并已将其骨灰盒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沉重的"帽子"总算是给摘掉了，卢先生在泉下也许可以得安息吧。在这之前不久，我接到了卢夫人的信，我说的卢夫人就是我听信了流言认为她已经死去甚至称之为"亡灵"的那位女同志。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她靠着"三十几块钱的生活费抚育着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十年浩劫中又给"逼得走投无路几乎死去"，但终于"咬紧牙关挺过来了"。她在干校期间认识了新的朋友，后来组织了幸福的家庭。

知道"卢夫人"幸福地度着她的晚年，三个孩子都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力，我非常高兴。但是想起卢先生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死在北大荒，据说临终"想喝上一碗大米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六月一日香港《文汇报》。

粥而不得"，我深为自己在那些年中间的沉默感到羞愧。为了保全自己，我掩盖了身上的伤痕，结果我也受到了旷古未闻的惩罚，我现在才明白这是自找苦吃，怪不了别人。我继续写《创作回忆录》就是偿还我这一笔心灵上的欠债。

另一篇关于《火》的回忆却给我带来不幸的消息。我在回忆里提到亡妻萧珊的好友王女士，我带着同情和尊敬谈起她，我说："她后来结了婚、入了党，解放后当过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五十年代后期她出差来上海，到我家找过萧珊，萧珊陪她上街买东西，请她在外面吃饭。"文革"期间有人从东北来找萧珊外调，把萧珊叫到里弄居民委员会去谈王在昆明的一些情况。萧珊病故后，来找萧珊的人又向我了解几件事情，说是要给王恢复工作。我相信她已经恢复了名誉，还在文章里"祝她安好"。谁知《关于〈火〉》在香港发表刚刚一个月，我访问日本的前夕，萧珊的一位朋友到旅馆来看我，他也是王的同学，他告诉我王住在北京她"大娘"的家里，最近有个姓杨的女同学去看过她。我从长崎回上海，收到了杨的来信，说："她已成了个活着的死人，只有两条腿不停地移来移去，不停地挫着牙齿，有时发出压抑的怪声音，眼睛发直，上身不会动，不会说话，不会吃喝，下身垫着尿布、塑料布，只能穿两只套腿的棉裤，被子横盖着，不然会给她踢掉。她的爱人摸摸她的脸，摸摸她的脚，也流了眼泪……"一个人给折磨成了这个样子！王已经不是第一个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现在我谈谈我的中篇小说《还魂草》。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还魂草》？还不是从"身经百炸"的"卢先生"联想起来的！

《还魂草》是控诉敌机滥炸平民的罪行的小说。关于这个中篇，我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某某人转来××的信，他认为《还魂草》收在'文学小丛书'内'不太合适'，要我另选。我即覆信同意抽去《还魂草》，并说我自己选不出来，只有两个办法：一、'小丛书'干脆不收我的作品；二，请他代选几个短篇凑成一本小册子，究竟怎样，由他决定。他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从爱护您的声誉……'，我看了心里很不好过，说实话，我自己颇喜欢《还魂草》。但是抽出它我也同意，绝无怨言。只是为什么对作家一再提到'声誉'二字呢？真正的作家并不常常想到自己，他重视自己对人民、对读者的责任。我并不在乎所谓的'声誉'，我也不是为'声誉'而写作的。我倒是真心想为人民服务。"我当时的看法是这样，今天的看法也还是这样。不同的是，当时我虽说"并不在乎所谓的'声誉'"，其实对"声誉"二字的解释自己还不曾搞清楚，对于长官的意见、编辑同志的意见、写"内参"(内部参考)或者写"汇报"的同志的意见，我还是重视、甚至害怕的。我同意把自己"颇喜欢"的作品抽去，这就说明我有顾虑，因此我今天还不明白为什么《还魂草》"不太合适"。

从一九六二年到现在我走了多长的路，我像一个平庸的演员跑了十几年的龙套，戏装脱掉，我应当成为我自己了。首先我就得讲自己的话，明明是自己的嘴嘛。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小时候看见我叔父责骂听差，事后我质问他："明明是你有理，为什么你要认错？"听差说："少爷，我吃老爷的饭嘛。"我当时很生气，说他"愚蠢"。今天联想到十八年前的日记，我不

能不怀疑：难道我也是因为自己吃了出版社的饭？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开端，后来竟然发展到站在上海巨鹿路作家协会的草地上，对着串连的学生自报罪行："我在解放前写了十四卷大毒草。"一个作家不敢爱护自己的作品，无怪乎他要遭受任何人的践踏了。

现在回到《还魂草》上面来。这小说是在一九四一年第四季度写成的。当时我住在桂林东江路福隆街一座新的木造楼房里。小说家王鲁彦兄住在我的隔壁，他正在编辑《文艺杂志》创刊号，指定我写一篇小说，我就在临街那个房间里写起来。

一九三六年我住在上海狄思威路麦加里朋友索非家的亭子间内，《作家》月刊的主编向我索稿，我就根据亭子间里的见闻编造故事，写了一个短篇《窗下》，是用书信体写的。五年后我在桂林写中篇小说，我也用书信体，也想根据自己的见闻编造故事。我写《窗下》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写《还魂草》也是这样。受信人在什么地方我不曾说清楚，写信人却从上海到了重庆，那就是作者我，小说里写的是我在重庆沙坪坝的一段生活，从雾季写到敌机开始轰炸，写到一个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死亡。小说中写的都是我真实的见闻，只除了最后短短的一节——第六节，那是根据我离开重庆后在那里发生的"疲劳轰炸"联想起来的。我在沙坪坝过的生活正如我在小说中写的那样，我写了我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我写了人和人的关系。奋笔直书的时候，我仿佛在给那段生活作总结，又是在重温旧梦。那几年中间我看见炸死的人太多、太惨，血常常刺

痛我的眼睛。不写，我无法使自己沸腾的血平静下来；写，我又不愿意用鲜血淋淋的景象折磨读者。我想起了几个月前在昆明看见的"废园"内的那只泥腿，就把它写进中篇，拿两张席子盖住了两个冤死的人。我对几年来敌机的狂轰滥炸发出了强烈的控诉。用两个女孩的友谊来揭露侵略战争的罪行。《还魂草》（用自己鲜血培养起来的能救活人命的一种草）并不是我国的民间传说，它是我编出来的故事。我开始写作，就想好了这个故事，就决定描写两个友好的小女孩。我住在沙坪坝互生书店楼上时，我的朋友有个小女孩。我在桂林福隆街木房里写小说，隔壁鲁彦家也有一个小女儿，莉莎正是她的名字。有人说我写了重庆的小姑娘，又有人说我写的是桂林的莉莎。我自己说呢，我把两个孩子捏在一起了。

我已经记不起我花了多少时间写成这个中篇，我只能说我写得顺利。我写自己的感情，写我的周围，写我熟悉的人和事，写我追求了一生的友谊，为什么不顺利呢？我又一次和我的人物一起哭笑。今天重读这篇小说，我还不能无动于衷。在轰炸中度过的那无数的日子，在我的作品里给保留下来了。我珍惜它们，我为自己写过这些作品而自豪。使我感到后悔的只是一件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编辑同志举出"爱护"我的"声誉"的理由抽出这个中篇的时候，我没有说出我自己的看法，没有站出来替自己的作品辩护。为什么呢？我问自己，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不敢深挖下去，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悬垂在我头上的"达摩克里斯的宝剑"了。我经常做怪梦，在梦中我也在保护自己。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人人自危，何况我

们又有"明哲保身"的古训，何况每个人都有"妻室儿女"、朋友亲戚，得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把别人牵连进去。要为自己的胆小怕事开脱，我可以找到更多的理由，但是人不能对自己说谎，我需要的是真实的答复。在"靠边"期间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有原谅自己，我甘愿经受更大的处罚，我认为自己跳下了泥坑，只有靠自己努力爬出来。今天我讲出对自己作品的意见，就说明我并没有在泥坑中给淹没掉。

我坐在用木板搭成的楼房里，在用竹子编成的小书桌前埋头写作，窗下有一个小院子，我们后来用竹篱笆围了起来，篱外坡上是一条马路，行人不多，但常常有，不吵闹，却也不太静。我写倦了，有时走出房间，站在走廊上栏杆前，可以看到一两位进城或者回家的熟人。晚上我点起一盏植物油灯，玻璃罩里的火光在我四周聚集了一堆一堆的黑影，我或者转动灯芯，或者拿油瓶来加油，更多的时候是奋笔写下去，写到窗外没有一点声音，写到板壁时时发出叫声，写到油干灯尽，我那颗燃烧的心得到宁静，我才丢开笔倒在床上。在这些长夜里，我的确感觉到我是在用火烧我自己。我写作绝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

我在四十年代中出版了几本小说，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集，短篇集子的标题就叫《小人小事》。我在长篇小说《憩园》里借一位财主的口说："就是气魄太小！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其实是欣赏这些小人小事的。这一类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才结束。那是一九四六年年底的事了。

但是读者并没有摈弃我这些作品。《还魂草》如期交稿，受到编者和读者的欢迎，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人物都是在那个小镇上来来往往的人，他们就是那样地混日子；小说还接触到人们关心的问题，而且它不是欺骗读者的谎言。《还魂草》在《文艺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后，我又为第二期的杂志写了短篇小说《某夫妇》。这也是反轰炸的作品，小说里也有我自己的见闻，例如一九四一年一月我在成都躲警报的经验。失去了丈夫的明方是一个普通的女教师，一个坚强的女人，但她绝不是一个英雄或者模范。我始终认为正是这样的普通人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搞不垮中华民族，主要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人民，并不在于少数戴大红花的人。四十年代开始我就在探索我们民族力量的源泉，我写了一系列的"小人小事"，我也有了一点理解。其实这样的探索在一九三五年就开始了。我当时住在东京，"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命运的日子里"，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力量中找寻"依靠和支持"。一九五二年我在朝鲜战场上，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接触到很多从祖国农村来的青年战士，这些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打动了我的心。只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和艺术手段塑造了八大英雄形象，我也给迷惑了好一阵子，我甚至承认写小人小事是犯罪、《寒夜》和《还魂草》是大毒草。可是后来，骗局揭穿，那些"样板人物"原形毕露，连人间究竟有没有所谓"高、大、全"的英雄也值得怀疑了。谁还相信喊"狼来了"的小

孩呢！我的梦也该醒了。想到给浪费掉的那么一大段时间，我真是欲哭无泪。今天翻看四十年代的旧作，我仿佛又坐在小小的竹书桌前不停地动着笔。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回到那样的年纪，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昨天我又在《新华月报》(文摘版)上看到这个中篇，是第三次了，以前在上海的《收获》和天津的《小说月报》上读过它。它使我想到我的中年，使我想到我写小人小事的那个时期。我不止一次地说过："青春是美丽的。"我现在要说："中年更美丽。"我的眼前出现了小说的主人公陆文婷医生。尽管她的情况和我的不同，但她的形象使我感到亲切。今天我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就因为我心里有无数的陆医生，这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普通人的形象。我们的祖国成长、发展、壮大，绝不是由于有那些天天在会场上、在报纸上夸夸其谈的"英雄"，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任劳任怨、默默工作、在困难环境中坚守自己岗位的普通人和他们做出来的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在谈自己的中篇《还魂草》，一下子动了感情就扯到谌容同志的《人到中年》上面去了，因为《人到中年》讲了我心里的话，给我打开了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我还有那么大的勇气，那么多的力量！对我们祖国，对生活我有那么深切、那么强烈的爱。我真想写，真想奋笔再写二十年啊。但是我已经不可能回到中年了。我读到小说的最后另一个女医生姜亚芬在机场写的那封信，心里翻腾得很厉害，我真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多么美好的心灵，多么高尚的感情！这就是文学的作

用，我自己也需要这样的养料。我去日本的前一天听说《人到中年》的作者在家中晕倒，我女儿是杂志的编辑，她要去探望谌容同志，我要她带去我的问候，请她保重身体，并且希望她奋笔多写。

美丽的中年，这是成熟的时期，海阔天高，任我翱翔，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展翅高飞吧。

1980年5月7日。

九　关于《砂丁》*

昨天在旧书堆里发现一九三二年排版的中篇小说《砂丁》的清样，是用铜订书钉订好的一个本子。它跟着我经过了战争，又经过多次的运动，还经过人生难逢的大抄家，竟然没有一点伤痕，真是想不到的事！

清样中有一篇《序》，是"一九三二年九月在青岛"写的。我到青岛是在朋友沈从文那里作客，大约住了一个星期。从文当时在山东大学教书，还不曾结婚，住在宿舍里面。他把房间让给我，我晚上还可以写文章。我就借用他的书桌写了短篇小说《爱》，也写了《砂丁》的《序》，因为我的中篇小说已经交给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那边正等着我在卷首写几句话。我在青岛写好《序》寄回去，然后去北平旅行，大约一个月以后吧，我回到上海，小说就在书店里发卖了。

中篇小说《砂丁》的脱稿日期应当是这一年的五、六月。我还记得这年三月我写了中篇《海的梦》，五月写成了另一个中篇《春天里的秋天》。就在那个时候上海一份大的日报《申报》准备创刊一本综合性的杂志《申报月刊》，约我写一篇小说。月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香港《文汇报》。

刊第一期将在七月刊行，我必须在六月内把原稿送去。在月刊社主管文艺栏的是黄幼雄，以前担任《东方杂志》的编辑。《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发行了多年的老牌综合性杂志，"一·二八"上海事变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楼给日军的炸弹摧毁了，《东方杂志》不得不暂时停刊，黄幼雄就转到新创办的申报月刊社工作。他同我熟，他来组稿，我一口答应。我当初想过写"死城"的故事，这是一位云南朋友告诉我的，他去过那个地方，对我讲起那里的种种情况。我第一次听人讲起"砂丁"，十分激动。朋友鼓励我写出来。但是不说没有生活，我手边连一点材料也没有。这个朋友姓黄，就是从日本回来住在步高里的两个朋友中的一位，我还把他写进了《爱情的三部曲》，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高志元。三部曲中《雨》里面的高志元可以说是真实的人物，大部份的描写都不是虚构的，连那个绰号"活的气象表"也是真的（但在《电》里面我就把他理想化了，甚至为他安排了"殉道"的结局）。我在第四篇"回忆录"中讲过，我写《海的梦》时和那两位朋友同住在步高里。有空我也找黄谈谈"砂丁"们的事情，他谈得不多，我也不曾记录下来，我年轻时候"记性好"，因此养成了不记笔记的习惯。我在《雨》里面写了高志元在上海法租界一家酒楼上谈的一段话，当时他对我讲的大概不过这些。

高志元说："我本来打算在锡矿公司里做事情……到了那里……我看过矿工的生活以后就决定不干了。……在那里作工的人叫做'砂丁'……。他们里面有的人是犯了罪逃到那里去作工的，有的却是外县的老实农民，他们受了招工人的骗，

卖身的钱也给招工的拿去了。他们到了厂里，别人告诉他们：'招工的人已经把你的身价拿去了，你应该给我们做几年的工。'如果他们不愿意，就有护厂的武装警察来对付他们。……'砂丁'初进厂都要戴上脚镣，因为怕他们逃走。……'砂丁'穿着麻衣，背着麻袋，手里拿着铲子，慢慢儿爬进洞口，挖着锡块就放在袋里。一到休息的时候，他爬出洞来，丢了铲子倒在地上，脸色发青，呼吸闭塞，简直像死人。……我在那里的时候，一天夜里听见枪响，后来问起，才知道一个'砂丁'逃走被警察开枪打死了。我对我那个同学说：'你们的钱都是血染出来的，我不能用一个！'我就走了。"

关于"砂丁"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一点。黄每次谈起"砂丁"都很动感情。所谓"死城"就是锡城箇旧。他去过那里，本来想到公司工作，但是住了不几天，他忍受不下去。他说，要是他不走，可能有两种前途：或者他患精神病，或者他给人抓走甚至枪杀。我认为他自己的估计不错。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热心家。我在四十几年前写的序言里称他为单纯而真诚的"大孩子"。在中篇《电》里面我给他安排了一个被军阀枪毙的结局，事实上他后来静悄悄地死在云南的家乡。我写《砂丁》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上海。第一年我们之间有过书信往来。他是个不爱写信的人。一九四〇年七月我从上海到昆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见到了不少云南朋友，却始终没有机会同黄见面。我等待他来昆明，他却希望我去玉溪。我在昆明写完了《火》第一部，还以为他会来找我。他只托人带来一个口信。我没有想到由于我的疏忽就错过了同他见面的机会。第二年

我再去昆明，也没有能见到他。一九五五年四月我从印度回来，经过昆明，没有遇见过去的熟人，来去匆匆，我也不曾打听黄的下落。第四次到昆明是在一九六〇年，在那里我没有见到一位老友。现在我记不清楚，究竟是由于时间的限制我无法问到黄的情况，还是我已经知道他离开了我们。那些年我的生活忙乱而紧张，颇像一个初上场的乒乓球员，跑来跑去忙着应付打过来的小球，别的都顾不上了。为了回忆写作《砂丁》的经过，我翻看了《爱情的三部曲》，在《总序》里我重读到黄写给我的旧信中的话："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你的生活会更寂寞，我知道我走后我的生活也会更寂寞。我愿意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天天见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恐怕再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了解我的人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找到更了解他的朋友，但是我辜负了他的信任。他说我"了解"他，我当时也是这样想，可是除了我四十几年前在小说中留下的那些话以外，我这里就只有他在日本东京买来、后来从家乡寄给我的英国版两卷本《克鲁泡特金自传》，我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说明我当时喜悦的心情："子方赠我"（子方是他的名字）。此外我什么都忘记了。忘不了的就只有中篇小说《砂丁》。写在纸上、印成了书的文字是抹不掉的，即使小说有种种的缺点。总之，我就这样轻易地失去了一位朋友，关于他，我今天什么也讲不出来了。

现在回到小说上面。我答应为《申报月刊》写稿，写什么呢？当时我刚写完《春天里的秋天》，还没有别的打算，又想到了"死城"的故事。我不再踌躇了，我还是决定写，决定编造故

事。这种写法是不足为训的，《砂丁》当然也不是成功的作品。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可以说是唯一的源泉。但作家也可以完全写他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别人的心灵的发展，不过这样的作品不会是多数读者所关心的。然而我也不是这样，我没有到过那个城市，不曾接触过那些人物，不了解那里的生活环境……也没有任何具体的材料，就凭着两三个简单的故事，搭起中篇小说的架子，开始写起了银姐和升义的会面。

我年纪轻，创作力旺盛，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写得快，一坐就是半天。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领导"我创作，因此我可以自由发挥，按期写完，准时交稿。《申报月刊》约我写一个短篇，我却交出一个中篇，让他们两期刊完，他们并无意见。写这个中篇时我住在环龙路（南昌路）花园别墅一号，我的舅父陈林不久前租下了那幢房子，让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不像现在我坐下来写不到几百字，就听见门铃在响，担心有人来找，又得下楼谈话。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打岔，我可以钻进自己编造的世界里去。小说中的"死城"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真正的锡城并不是这样。可是当时的读者不会管这些，他们不知道"死城"在什么地方，也不会有机会到那么遥远的城市去。我记起来了：我小时候我们家哪一房嫁女准备陪奁，总要把锡匠找来做锡器，如酒壶、烛台等等。"过礼"时这些锡器都要陈列在"抬盒"里给送到男家。我对这些锡器的制作很感兴趣，经常站在锡匠旁边看他劳动。但是我始终不知道锡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在一九三一年年尾会见黄以前就不知道中国有座锡城在云南个旧。我的读者不会比我知道得更多，即

使我任意下笔，也不会有人出来指摘我的错误。但是像这样地写中篇，我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我写另一部中篇《雪》也曾在书中进行编造，随意发挥，连自己也不满意。但是我毕竟到过长兴的煤矿，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下过一次矿坑，亲眼看见矿工们用鹤嘴锄挖煤。还有一部中篇小说也反映我所不熟悉的生活，那就是我在第七篇回忆中提到的《火》第二部。我描写对我完全陌生的地区，就只依靠朋友供给的第二手材料。当时那位朋友和我住在一处，我可以随时找他谈话，问一些有关生活细节、自然环境等等的事，他也可以替我出一点主意。没有他，我写不了这小说。但是《火》第二部虽然写了出来，印了几版，它仍然是"失败之作"。《雪》本来叫《萌芽》，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出版不久就被国民党党部查禁。一九三四年情况有了些缓和，我将书中人物改名换姓，又把书名改做《煤》，交给另一个书店出版，但是图书杂志审查老爷的硃笔仍然放不过它。我只好把它再改称为《雪》，秘密发行。这部"失败之作"早该"自行消亡"，可是国民党的查禁反而使它活到现在。因此我常常想起我小时候在鼓吹革命的小册子上面看到的"警句"："天下第一乐事未有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

我举以上三本小说为例，无非说明靠脱离生活、编造故事的做法写不出好的作品。我不仅反对"闭门造车"，我也不赞成把作家当作鸭子一样赶到生活里去。过去人们常说"走马看花"或者"下马看花"，我相信过这种作法，但是我也吃过亏上过当，我看到了不少的纸花。总之存心说谎的作品和无心地传达假话的作品都是一现的昙花。说谎的文学即使有最

高的"技巧"也仍然是在说谎，不能震撼多数读者的心灵。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倘使我没有记错，一位欧洲作家临终时说过："多一点光明。"让人看见多一点光明，并不是多说几句好话，空话。我为什么需要文学？我想用它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周围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一件事情：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即使是写《砂丁》，我也是在生活，在奋斗。"死城"虽然不是我所描写的那个样子，但"死城"是存在的，"奴隶劳动"是存在的。人们被骗到那里，甚至被绑架到那里，戴着铁镣下矿，劳动，受苦，受虐待，最后死亡，没有一个人活着离开矿山。在我的小说中主人公升义死在意外的事故里，水淹没了矿井，污泥封住了洞子。少女银姐还在大城市里"祷告神明保佑她的升义哥早早发财回来"。我在青岛写的序言中说过："它（指《砂丁》）和我的别的作品一样，里面也有我的同情，我的眼泪，我的悲哀，我的愤怒，我的绝望。……但这并不是一切。"我还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聪明的读者就不会从这伤痕遍体的尸首上面看出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产生么？"所以我在小说的《尾声》中提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甚至充满信心地说："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

那个时候的确来了。一九六○年我第四次到昆明，就是

为了去访问锡城箇旧。去的途中我游览了石林。在石山中间上上下下走得满头大汗，就只有我们一行三四个人。晚上我在路南县过夜，一路上照料我的是一位年轻的四川同乡。他已在昆明工作了几年，也比较熟悉锡城的一些情况。我还记得那一晚是很好的月夜，招待所很清静、没有什么客人。我想起了二三十年前的旧事，想起多年不通音信的朋友，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走了许久，也想了许久。我知道在前面等着我的不会是“死城”，但是过去那些受苦的人，那些数不清的旧社会、旧制度的受难者，他们的不幸遭遇在我的心上投下深浓的阴影，倒下了的人不会站起来诉苦了。我多么希望能找到一个熟人，向他倾吐我的感情。

第二天早晨我坐着车子奔向箇旧。离锡城越近，我越兴奋，我二十八年前发表中篇，不是为了争取名利，也不是为了讨好长官。我过去常说：大多数人的痛苦像一根鞭子似地抽打我的背，逼着我写作。我写过去的黑暗就是为了迎接今天的光明。升义他们，那些死去的冤魂看不到春回大地的景象，我就要看到了。

车子停在金湖宾馆的门前。喷水池边石栏杆上的盆景亲切地欢迎我，每一层楼玻璃窗上的浅红色窗帘仿佛在对我微笑。春天的风轻轻地揩去我脸上的尘土，从不远处送过来锣鼓声和人们的笑语。山坡上高高低低一幢一幢土红色和灰色的楼房，人们告诉我它们都是工人的宿舍。我不由得想起小说里没有窗户的阴冷潮湿的“炉房”。过去那两座光秃秃的山——老阴山和老阳山上不仅绿树成荫，而且修建了不少美

俪的楼房。我住的宾馆是在过去的乱坟堆中间建筑起来的。再也找不到乱坟堆，也看不到死城了。我来到一个充满生活力的兴旺的城市。

我住了六天，没有停过脚。我到处找寻同我在小说中描写的类似的遗迹，却什么也看不见。我下过矿井在地底下两百米的大坑道里，铁轨旁边洞壁上有一个小洞眼，矿工同志在背后推着我爬到那里，用煤石灯照着朝上看，洞子早给封住了，我只能想象当年童工们背着"垅包"从这里往上爬的情景。我还到过地下的小卖部，在明亮的电灯光下，坐在长凳上，捧着磁茶缸喝热气腾腾的糖开水。我也去过市文化馆，参观了那里布置的"矿工今昔展览室"，在那里我看到旧日"伙房"的模型，我才知道我当年误把"伙房"写作了"炉房"，那是一种吊脚楼，由一把活动的梯子通到上面，楼板上铺着烂草、滑席，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铺上，盖的是蓑衣、破絮。屋角有一个便桶。"砂丁"们一进去，门就给"凉饭狗"锁上了。"伙房"四周都是碉堡，矿警住在里面。有些"砂丁"得罪了他们，就给活活地打死。过去的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可怕，更黑暗，更残酷。但是那一切终于像夜雾似地被阳光驱散了。我在個旧看见了明媚的春天，中饭后我在金湖旁边散步，水面上好像浮起千万颗明珠，又好像千万条金色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我爱上了这个地方，离开这里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五位矿工（里面有从小被骗到矿山戴着脚镣下洞的老"砂丁"）同去京剧院看《杨八姐游春》，欣赏年轻演员的精彩表演。看到皇帝出洋相和杨八姐骂昏君的时候，大家笑得多高兴。……

我还要到别处去开会，不能在锡城多停留。匆匆地离开，我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我当初原想多搜集材料改写我的中篇，后来又想下次再来，多住些日子。但是运动和任务接连不断，上面还有“长官”们发号施令，哪能容你专心写作？（我只发表了两篇回忆箇旧的散文。）我还记得张春桥，他从一九五五年起就“领导”上海的文艺工作。我看见他步步高升，不由得不担心，等到他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我就大祸临头了。我从人变到了“牛”，哪里还敢想改写小说？连我在散文中提起矿工们看京剧，看到杨八姐骂皇帝笑得高兴，也受到造反派的严厉批判，要我交代，检查。我当时正在后悔自己写了十四卷“邪书”，听说有人烧毁《家》，反而感到轻松。否定自己，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但偶尔我会想到一些我写过的书和我去过的地方，例如想到锡城箇旧，我就起了一个疑问：连企图强占民女的昏君也不准人骂了，是不是在那里又有“翻转过去”的事情？这个疑问的确带给我一些精神折磨，然而并没有动摇我对未来的信念。

我跟锡城分别后，一晃就是二十年。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锡城经过十年的浩劫也得到了新生。我近来多病不容易再作一次长途旅行。但箇旧市现有它自己的文艺期刊《箇旧文艺》，这也是一件新的事物，它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而且它会向关心的读者介绍锡城的新貌。

关于《砂丁》，我想说的话就是这么一些。我现在的想法有了改变，我认为用不着改写它了。就让它这个样子存在下去吧，因为我并没有讲过假话。

1980年11月。

一〇　关于《激流》*

一

近来多病，说话、写字多了，就感到吃力。但脑子并不肯休息，从早到晚它一直在活动，甚至在梦中我也得不到安宁。总之，我想得很多。最近刚写完《随想录》第二集，我正在续写《创作回忆录》，因此常常想起过去写作上的事情。出版社计划新排《激流三部曲》，我重读了《家》。关于《家》，我自己谈得不少，别人谈得更多。我经常在想几件有关这本小说的事。我在这里谈谈它们。

第一件。一位美籍华裔女作家三年前对我说："你的《家》不行，写恋爱也不像，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结婚。"我当时回答她："你飞过太平洋来看朋友，我应当感谢你的好意，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笑了。我还听见人讲《家》有毛病，文学技巧不高，在小说中作者有时站出来讲话。我只有笑笑。

第二件。一九七七年出版社打算重印《家》，替这本小说"恢复名誉"，在社内引起了争论，有人反对，认为小说已经"过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香港《文汇报》。

时”；有人认为作者没有给读者指路、作品有缺点。争论不休之后，终于给小说开了绿灯。我还为新版写了《重印后记》，我自己也说“《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第三件。时间更早一些，是在我靠边受审、给关在“牛棚”里的时期，不是一九六八年，就是六九年，南京路上有批判我的专栏。造反派们毫不脸红地按期在过去马路旁的广告牌上造谣撒谎，我也已经习惯于这种诬蔑、无动于衷了。但是有一个下午我在当天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叙述北火车站候车室里发生的故事，却使我十分激动。一个女青年在候车室里出神地看书，引起了旅客们的注意，有人发现她看的书是毒草小说《家》，就说服她把书当场烧毁，同时大家在一起批判了毒草小说。

还有第四件、第五件、第六件……不列举了。

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它本来会自生自灭，也应当自行消亡，不知怎样它却活到现在，而且给作者带来种种的麻烦。我最近常常在想：为什么？为什么？

我还记得，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隔壁人家已经几次抄家，我也感到大祸就要临头。有一天下午，我看见我的妹妹烧纸头，我就把我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的来信全部交给她替我烧掉。信一共一百几十封，装订成三册，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写给我和三哥（尧林）的信都在这里，还有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的抄本。我在写《家》、《春》、《秋》和《谈自己的创作》时都曾利用过这些信。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但是我想到某些人会

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造谣诽谤，乱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纸灰。十年浩劫中我一直处在"什么也顾不得"的境地，"四人帮"下台后我才有"活转来"的感觉。抄去的书刊信件只退回一小半，其余的不知道造反派弄到哪里去了。在退回来的信件中我发现了三封大哥的信，最后的一封是一九三〇年农历三月四日写的，前两天翻抽屉找东西我又看见了它。在第一张信笺上我读到这样的话：

>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他(它)写成罢，怕什么！《块肉余生述》若(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这中间我受过多少血和火的磨练，差一点落进了万丈深渊，又仿佛喝过了"迷魂汤"，记忆力大大地衰退，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大哥的消瘦的面貌至今还没有褪色。我常常记起在成都正通顺街那个已经拆去的小房间里他含着眼泪跟我谈话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飞路(淮海路)一家公寓里我对他谈起写《春梦》的情景。倘使我能够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那里埋着多少大哥的诉苦啊！

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

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回国途中，在法国邮船（可能是“阿多士号”，记不清楚了）四等舱里，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我想可以把我们家的一些事情写进小说。一九二九年七、八月我大哥来上海，在闲谈中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我谈得不多，但是他极力支持我。后来他回到成都，我又在信里讲起《春梦》，第二年他寄来了上面引用的那封信。《块肉余生述》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考柏菲尔》的第一个中译本，是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他爱读它，我在成都时也喜欢这部小说。他在信里提到《块肉余生述》，意思很明显，希望我没有顾忌地把自己的事情写出来。我读了信，受到鼓舞。我有了勇气和信心。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我要拨开我大哥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些时候我经常背诵鲁迅先生翻译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句话：“可怕的是使死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我忍不住多次地想：不要等到太迟了的时候）。

过了不到一年，上海《时报》的编者委托一位学世界语的姓火的朋友来找我，约我给《时报》写一部连载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我想，我的《春梦》要成为现实了。我没有写连载小说的经验，也不去管它，我就一口答应下来。我先写了一篇《总序》，又写了小说的头两章（《两兄弟》和《琴》）交给姓火的朋友转送报纸编者研究。编者同意发表，我接着写下去。我写完《总序》，决定把《春梦》改为《激流》。故事虽然没有想

好，但是主题已经有了。我不是在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四月十八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毒自杀的电报十九日下午就到了。还是太迟了！不说他一个字不曾读到，他连我开始写《激流》的事情也不晓得。按照我大哥的性格和他所走的生活道路，他的自杀是可以料到的。但是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遗憾。

我当时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电报是下午到的，我刚把第六章写完，还不曾给报馆送去。报馆在山东路望平街，我写好三四章就送到报馆收发室，每次送去的原稿可以用十天到两个星期。稿子是我自己送去的，编者姓吴，我只见过他一面，交谈的时间很短，大概在这年年底前他因病回到了浙江的家乡，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激流》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在《时报》上连载了五个多月。"九·一八"沈阳事变后，报纸上发表小说的地位让给东北抗战的消息了。《激流》停刊了一个时期，报馆不曾通知我。后来在报纸上出现了别人的小说，我记得有林疑今的，还有沈从文的作品（例如《记胡也频》），不过都不长。我的小说一直没有消息，但我也不曾去报馆探问。我有空时仍然继续写下去。我当时记忆力强，虽然有一部份原稿给压在报馆里，我还不曾搞乱故事情节，还可以连贯地往下写。这一年我一直住在宝光里，那是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在这里除了写《激流》以外，我还写了中篇小说《雾》和《新生》以及十多个短篇。起初我和朋友索非夫妇住在一起，我在楼下客堂间工作，《激流》的前半部是在客堂间里写

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索非一家搬到提篮桥去了，因为索非服务的开明书店编译所早已迁到了那个地区。宝光里十四号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给我做饭的中年娘姨。这时我就搬到了二楼，楼上空阔，除了床，还有一张方桌、一个凳子，加上一张破旧的小沙发，是一个朋友离开上海时送给我的，这还是我头一次使用沙发。我的书和小书架都放在亭子间里面。《激流》的后半部就是在二楼方桌上写完的。这中间我去过一趟长兴煤矿，是一个姓李的朋友约我同去的，来回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向我催稿，报纸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形势紧张，谣言时起，经常有居民搬进租界，或者迁回家乡。附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随时都可能对闸北区来一个"奇袭"。我一方面有充分时间从事写作，另一方面又得作"只身逃难"的准备。此外我发现慢慢地写下去，小说越写越长，担心报馆会有意见，还不如趁早结束。果然在我决定匆匆收场，已经写到瑞珏死亡的时候，报馆送来了信函，埋怨我把小说写得太长，说是超过了原先讲定的字数。信里不曾说明要"腰斩"我的作品，但是用意十分明显。我并不在乎他们肯不肯把我的小说刊载完毕，当初也并不曾规定作品应当在若干字以内结束。不过我觉得既然编者换了人，我同报馆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就送去一封回信，说明我的小说已经结束，手边还有几万字的原稿，现在送给他们看看，不发表它们，我也不反对。不过为了让《时报》的读者读完我的小说，我仍希望报馆继续刊登余稿。我声明不取稿酬。我这个建议促使报馆改变了"腰斩"的做法，《激流》刊载完毕，我总算没有辜负

读者。少拿一笔稿费对我有什么损害呢？

《激流》就这样地在《时报》上结束了。但是我只写了一年里面的事情。而我在《总序》里却说过："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时间差了那么多！并且我还有许多话要说，有好些故事要讲，我还可以把小说续写下去。我便写一篇《后记》，说已经发表的《激流》只是它的第一部《家》，另外还有第二部《群》，写社会，写主人公觉慧到上海以后的活动。我准备接下去就写《群》，可是一直拖到一九三五年八、九月我才开始写了三四张稿纸，但以后又让什么事情打岔，没有能往下写。第二年靳以到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个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一九三九到四〇年我又在上海写了《春》的续篇《秋》。我为什么要写《春》和《秋》以及写成它们的经过，我在《谈自己的创作》里讲得很清楚，用不着在这里重复说明了。这以后《家》、《春》、《秋》就被称为《激流三部曲》。至于《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几次填表报告自己的创作计划，要写《群三部曲》。但是一则过不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二则应付不了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任务，三则不能不胆战心惊地参加没完没了的运动，我哪里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倒真正庆幸自己不曾写成这部作品，否则张（春桥）姚（文元）的爪牙不会轻易地放过我。

二

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说我不是艺术家，最近又几次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有人怀疑我"假意地谦虚"。我却始终认为我在讲真话。《激流》在《时报》上刊出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我为"新文坛巨子"，这明明是吹牛。我当时只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发表过十几个短篇。文学是什么，我也讲不出来，究竟有没有进入文坛，自己也说不清楚，哪里来的"巨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惭愧，虽说是吹牛，他们却也是替我吹牛啊！而且我写《激流·总序》和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墨水。在成都十几年，在上海和南京几年，在法国不到两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文学技巧，我也不曾学过现代语法。但是我认真地生活了这许多年。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我答应报馆的约稿要求，也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帮助别人，为了挽救大哥，实践我的诺言。我只有一个主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送出第一批原稿时我很有勇气，也充满信心。我知道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藉这个制度作恶的人，对他们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不是写我已经做过的事，是写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嘘，是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

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

倘使语文老师、大学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知道我怎样写《激流》，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胡说"，因为说实话，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人们说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我一点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时交稿。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我在前面说过，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我指出：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这里是屠刀。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说《新生》里我就描述过在这条所谓“神秘之街”上的见闻。

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怒，我不肯认输。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份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中篇《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

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我在十年中间（一九三一到一九四〇年）写完《激流三部曲》。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份，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拚死的斗争。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周伯涛和高克明。对周伯涛，我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我看见不少像他那样的父亲，他的手里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他凭个人的好恶把自己的儿女随意送到屠场。

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的三哥李尧林也在这幢房子

里，住在三楼亭子间，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来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后，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飞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没有活到两个星期。他是《秋》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厂排印。原稿送出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轻朋友谈起这类事情，他们觉得奇怪：出版一本七八百页的书怎么这样快、这样容易！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三

《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地写出来的。三本书中修改次数最多的是《家》，我写《家》的时候，喜欢使用欧化句子，大量地用"底"字，而且正如我在小说第五章里所说，"把'的'、'底'、'地'三个字的用法也分别清楚"。我习惯用欧化句子的原因在第四篇"回忆录"里已经讲过，不再在这里重述。我边写边学，因此经常修改自己的作品。幸而我不是文学艺术的专家，用不着别人研究我的作品中的 variant(异文)，它们实在不少。就拿《家》来说吧，一九三三年我第一次看单行本的校样，修改了一遍，第三十五章最后关于"分家"的几段便是那时补上去的，一共三张稿纸。《家》的全稿都在时报馆丢失了，只有这三页增补的手稿保留下来。五十年代中我把它们连同《春》和《秋》

的全部手稿赠给北京图书馆了，那两部手稿早在四十年代就已装订成册，我偶尔翻看它们，还信笔加上眉批，不过这样的批语并不多。一九三六年开始写《春》，我又读了《家》，作了小的改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书店要排印《家》的新五号本，我趁这机会又把小说修改一遍，删去了四十个小标题，文字上作了不少的改动，欧化句子减少了。这一版已经打好纸型，在美成印刷所里正要上机印刷的时候，"八·一三"日军侵沪的战争爆发，印刷所化成灰烬，小字本《家》永远失去了同读者见面的机会。幸而我手边还留了一份清样。这年年底开明书店在上海重排《家》，根据的就是这一份清样，也就是唯一的改订稿。我一边看《家》的校样，一边续写《春》。《春》的初稿分一、二两部。一九三八年二月写完《春》的尾声，不久我就离开上海去广州，开始了"在轰炸中的日子"。

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重印《家》，一九五二年十月我从朝鲜回来，又把《家》修改了一遍才交出去排印。这次修改也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一九五七年开始编辑《巴金文集》，我又主动地改了一次《家》，用"的"字代替了"底"。算起来这部小说一共改动了七、八次，上个月的修改，改动最少，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了。如此频繁地修改一部作品，并不能说明我写作态度的认真，这是由于我不是文学家，只能在实践中学习。但是这本小说已经活了五十年，几次的围攻和无情的棍棒都没有能把它砸烂，即使在火车站上烧毁，也没有能使它从人间消失。几十年来我一直听见各种各样的叽叽喳喳：什么没有给读者指明道路啦，什么反封建不够彻底啦，什么反封建已经

过时啦……有一个时期我的脑子也给搞糊涂了，我彻底否定了自己的作品。造反派说《家》是替地主阶级少爷小姐“树碑立传”的小说，批判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低头承认。但是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在“牛棚”里被“提审”或者接受“外调”的时候，不管问话的人是造反派，还是红卫兵，是军代表，还是工宣队，我觉得他们审问的方法和我父亲问案很相似（我五、六岁时在广元县衙门里经常在二堂上看我父亲审案），甚至更“高明”。这个事实使我产生疑问：高老太爷的鬼魂怎么会附在这些人的身上？在“牛棚”里，在五·七干校内，我一面为《家》写检讨，自己骂自己，一面又在回忆写作《激流三部曲》的情况和当时的想法。我写《家》就是为了让它消亡，我反封建是真的反封建，而不是为了给自己争取名利。反封建如已过时，我的小说便不会有读者；反封建不够彻底，就会由反得彻底的作品代替。总之，《家》如果自行消亡，我一定十分高兴，因为摆脱了封建，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社会一定有更大的进步，这正是我朝夕盼望的事。

《激流三部曲》中《春》和《秋》都只改了一次，就是一九五八年编辑《文集》时的修改，改动不算太小，还增加了章节，《春》也由一、二两部合并成了一部。现在进行的是第二次的修改，改得极少，只是删去一些字句，这是最后一次的修改了。关于《春》和《秋》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香港出版的《新文学大系续编·小说二集》的编者说“这两部续作……反而造成了《家》的累赘”，因为“作品中的许多人物、故事是他（指作者）根据过去生活中的一些记忆和一些偶然的见闻拼凑起来的，

是虚构的。"我不想替自己辩护，而且辩护也没有用，因为历史是无情的。我只说，在《秋》的序文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使死人活起来，又把活人送到坟墓中去。我使自己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看见那里的男男女女怎样欢笑、哭泣。"我还说："……在广州的轰炸中我和几个朋友蹲在四层洋房的骑楼下听见炸弹的爆炸，机关枪的扫射，飞机的俯冲，在等死的时候还想到几件未了的事……《秋》的写作便是其中的一件。"我写《秋》只是尽我的职责，人在生死关头绝不会想到什么"拼凑"和"虚构"。我从广州到桂林，再从桂林到金华转温州搭船回上海，历尽艰辛，绝不是为了给过去的作品加一点"累赘"。这些天我在校改《秋》，读到四十年前写下的这样的话："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一个顽固的糊涂人的任性可以造成这样大的悲剧。他对于把如此大的权力交付在一个人手里的那个制度感到了大的憎恶。"它们今天还使我的心燃烧。对封建制度我有无比的憎恨，我这三本小说都是揭露、控诉这个制度的罪恶的。我写它们，就好像对着面前的敌人开枪，我亲眼看见子弹飞出去，仿佛听见敌人的呻吟。

时间似乎在奔跑，四十年过去了，五十年过去了。出版社还要重印它们，我的书还不曾"消亡"。各式各样的诅咒都没有用。买卖婚姻似乎比我写《激流》时更加普遍，今天还有青年男女因为不能同所爱的人结婚而双双自杀。在某个省份居然有人为了早日"升天"，请人把他全家投在水里。披着极左思潮的外衣，就可以掌握许多人的命运、各种打扮的高老太爷千方百计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激流》我有满肚子的话，因为写了这个三部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当作“地主”，受过种种侮辱，有话不准说，今天我可以尽量倾吐自己的感情，但是也用不着多说了。在我的创作生活的最后四五年中我没有时间吞吞吐吐地说假话了，让我们的子孙来判断吧，我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句：

我写《激流》并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它们并不是写了等于没有写的作品。

四

按照预订计划，我写《创作回忆录》到第十篇为止，现在这一篇就要结束，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决定再写一篇《关于〈寒夜〉》。我写文章从来就是这样：是人写文章，不是文章写人；是我在说话，不是别人说话。

这些日子我已经没有体力在噪音更大、人流滚滚的人行道上从容散步了。我进行思考或者回忆的时候喜欢在屋前院子里徘徊。许多过去的事情都渐渐地模糊了。唯有一些亲友的面貌还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他们都想活下去，而且努力挣扎，但还是给逼着过早死去。我却活到今天。这是多么不公平！

我在中篇小说《利娜》（一九三四年）的开头引用过一位死在沙皇牢里的年轻女革命者的诗句："文字和语言又有什么用？"我在三十年代常常这样地伸诉自己的痛苦。今天我的旧

作还在读者中间流传，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面对着高老太爷的鬼魂，难道这些作品真像道士们的符咒？我多么希望我的小说同一切封建主义的流毒早日消亡！彻底消亡！

1980年12月14日。

一一　关于《寒夜》*

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这不是虚假的话，但是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过去我一直背诵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丹东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断头机上，后来给埋葬在巴黎先贤祠里面。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过先贤祠，但是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记得他在法庭上说过，他的姓名要长留在先贤祠里。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写过一个短篇《丹东的悲哀》，对他有些不满，但他那为国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我在三十年代就几次引用丹东的名句，我写觉慧时经常想到这句话。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并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四日香港《文汇报》。

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我看自己可以说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中了催眠术。看来并不恰当，我不单是中了魔术，也不止是别人强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得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病。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

人，还有卡车司机。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

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来，大家乱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萧珊当时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庆，我这年七月从贵阳去看她，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种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没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道上。这是我唯一的行李，里面有几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译稿，我自己的一些残稿，可能有《寒夜》的前两页。倘使火真的烧了起来，整座大楼一定会变成瓦砾堆，我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断之后也不会再写下去了，因为汪文宣一家住在这座大楼里，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讲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座楼、就在这几条街上进行，从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灾就给扑灭了，我的生活也不曾发生大的变化，萧珊从成都回来，我们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又搬到沙坪坝借住在朋友吴朗西的家中。家璧的图书公司办起来了。我没有失信，小说交卷了，是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坝写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边，另外写了一本《第四病室》，写我前一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里的经历。在重庆排印书稿比较困难，我的小说排竣打好纸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在重庆起初是万众欢腾，然后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似乎毫无准备，人民也没有准备。从外省来的人多数都想奔回家乡，却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处寻找门

路。土纸书没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显得更冷清，家璧的图书公司当然也是这样。小说没有在重庆印出，家璧把纸型带到上海。我还留在重庆时，有熟人搭飞机去上海，动身的前夕，到民国路来看我，我顺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带去。后来朋友李健吾和郑振铎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月刊，知道我写了这本小说，就拿去在刊物上连载。小说刚刚刊出了第一部份，赵家璧回到上海，准备出版全书。他和振铎、健吾两位都相熟，既然全书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继续连载，小说只发表了一次，为这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文艺复兴》的读者（事情的经过我后来才知道）。因此我决定把下一部小说交给这个刊物。

下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写了几张稿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那间楼梯下的屋子里接下去又写了二三十页。在重庆我并没有家。这中间萧珊去成都两次：第一次我们结婚后她到我老家去看看亲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写《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传出不久，一位中国旅行社的朋友帮忙买到一张飞机票让她匆匆地再去成都，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后来因为别的事情（有人说可以弄到长江船上两个铺位，我梦想我们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来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铺位，那样小的地方我们躺下去都没有办法，只好将铺位让给别的朋友），她还是回到重庆。我的女儿就是在重庆宽仁医院出世的。我续写《寒夜》是在萧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时候，那些日子书印不出来、书没有人要，出版社里无事可做，有时我也为交通工具奔

走，空下来便关在小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翻译王尔德的童话。

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悉。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灭，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里我像若干年前写《灭亡》那样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这样在我的小说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出来了，他的母亲也出现了。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写第四篇“回忆”时还说：“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样。”

我写《寒夜》也和写《灭亡》一样，时写时辍。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说放在一边。朗西有一个亲戚在上海办了一份《环球》画报，已经出了两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画报组稿，要我为它写连载小说，我把现成的那一叠原稿交了给他。小说在画报上刊出了两次，画报就停刊了，我也没有再写下去。直到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见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说，我把已写好的八章重读一遍，过几天给他送了去。《寒夜》这样就在八月份的《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开始连载了。

《寒夜》在《文艺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最后的《尾声》是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成。一月份的刊物说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实脱期是经常的事。我并没有同时写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当作资本家批斗过一次，就像我因为写过《家》给当作地主批斗过那样。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

《寒夜》写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那一段时期我在重庆，而且就生活在故事发生和发展的那个地区。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曾经想对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帮助，可是大哥因破产后无法还债服毒自杀；三哥在上海患病无钱住院治疗，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赶回上海设法送他进医院，他已经垂危，分别五年后相处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患肺病，不过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像汪文宣死得那样痛苦。但是他在日军侵占“孤岛”后那几年集中营似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没有能帮忙他离开上海，我感到内疚。我们在成都老家时他的性格比我的坚强、乐观，后来离开四川，他念书比我有成绩。但是生活亏待了他，把他的锐气和豪气磨得干干净净。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岁，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不曾结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学生，还留下几本译稿。我葬了他又赶回重庆去，因为萧珊在那里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庆我又度过多少的寒夜。摇晃的电石灯，凄凉的

人影，街头的小摊，人们的诉苦……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多么鲜明。小说《尾声》的最后一部份就是根据我当时的一篇散文改写的。小说的主要部份，小说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写成的。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我还有一个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过几个集子，长期患着肺病，那时期在官方书店正中书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医院里，据说他生病躺在宿舍里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在医院断气时也无人在场。他也是一个汪文宣。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说悲观绝望只是一个方面。我当时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我虽然为我那种"忧郁感伤的调

子"受够批评，自己也主动作过检讨，但是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指出将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溃烂，不能再继续下去。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奇怪的是只有在小说日文译本的书带上才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有一位西德女学生在研究我这本作品准备写论文，写信来问我："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你会不会把几个主角描写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么懦弱的，树生不那么严肃的，母亲不那么落后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过去我已经改了两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和一九六二年编印《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我本来想把《寒夜》和《憩园》、《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编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朋友认为这样做，篇幅过多，不便装订，我才决定多编一册，将《寒夜》抽出，同正在写作中的《谈自己的创作》编在一起。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迟，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才印出来，印数不过几千册。那个时候文艺界的斗争很尖锐，又很复杂，我常常感觉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后高高举着，我不能说我不害怕，我有时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动了感情健忘病又会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出笼"①的。我为这篇发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够了苦头，自己也作过多次的检查。现在回想那篇发言的内容，不过是讲了一些寻常的话，不会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讲的超过多少。我在一

① "出笼"："四人帮"时期流行的用语。

九六〇年写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后记》中谈到《憩园》和《第四病室》(也附带谈到《寒夜》)时,就用了自我批评的调子。我甚至说:"有人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我没法反驳他。"

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呢?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法庭审判一个罪人,有人证物证,有受害者、有死尸,说明被告罪大恶极,最后判处死刑,难道这样审判并不合法,必须受害者出来把被告乱打一顿、痛骂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爷"三呼万岁才算正确?我控诉旧社会,宣判旧制度的死刑,作为作家我有这个权利,也有责任。写《寒夜》时我就是这样想,也就是这样做的。我恨那个制度,蔑视那个制度。我只有一个坚定的思想:它一定要灭亡。有什么理由责备那些小人物不站起来"斗争"?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们就愿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当时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够。

关于《寒夜》我不想再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多说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空闲时候重读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我给憋得太难受了,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回忆"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写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〇年尾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修改这小说的情景",那

时的生活我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对我显得十分亲切。由于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顾，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座小楼上写文章。我在那间阳光照得到的楼房里写了好几个短篇和一本成为废品的中篇小说。在那三个月的安适生活中，我也先后校改了三本小说的校样，最后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时我的心并不平静。那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作为一个客人住在小楼上，不会缺少什么。但周围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挂在街上什么地方的"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我有时也看到，几次都是供应"凉粉"若干。有一天我刚刚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菜碗，里面盛了一块白凉粉，他对旁边一个熟人说："就这样一点点。"

就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时候，我的表哥病倒了。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我学英语，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一九二〇年秋季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补习班以前，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可是后来在他困难的时期我却不能给他任何的支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县都江堰工作，不曾见到他。一九六〇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刚刚退职回家，我们同到公园喝过茶。过了些时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满满一杯药汁。他的声音本来有点哑，这时厉害了些，他说医生讲他"肝火旺"，不要紧。后来我的侄儿告诉我，在医院遇见我表哥，怀疑表哥患肺结核，劝他住院治疗，他不愿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难。以后听说表哥住到城外他儿子的宿舍里去了，我让我一个侄

女去看过他。病象越来越显著，又得不到营养品，他儿子设法买一点罐头，说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骑车送些挂面去。没有交通工具，我说要去看他，却又怕麻烦，一天推一天。听说他很痛苦，声音全哑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样，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闭上了眼睛。有一天我一个堂兄弟来告诉我，表哥死了，已经火化了。没有葬仪，没有追悼会，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别死者。可是我永远失去了同表哥见面的机会。只有在知道他的遗体火化之后，我才感觉到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说什么呢？对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啊！没有他们，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能够像今天这样地活下去吗？

堂兄弟还对我说，他去看过姑母。姑母很气愤，她感到不公平。她一生吃够了苦，过了八十岁，还看见儿子这样悲惨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还说，表哥的退职费只花去一小部份，火葬也花不了什么钱。表哥死后我没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话。我不敢面对现实，只好逃避。不多久我因为别的任务赶回上海，动身前也没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没有同她母子告别，我总觉得欠了一笔偿不清的感情的债。我每次翻读《寒夜》的最后一章，母亲陪伴儿子的凄凉情景像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我的心。我仿佛听见了儿子断气前的无声哀叫："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我说，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识分子长时期的悲剧必须终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样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然后搭

火车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车。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帮助不少，以后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经常同他见面。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监狱中受尽苦刑，身上还留着伤痕和后遗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会堂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神情沮丧、步履艰难，我无法同他多谈。当时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跃，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计他也会遇到麻烦，但绝对没有想到过不了几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尽侮辱给迫害致死。两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我打电话托人代我献了一个花圈，这就是我对一个敬爱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点心意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绝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结束这篇"回忆"时，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愿宗林同志的灵魂得到安宁。也祝愿我姑母和表哥的灵魂得到安宁。

《创作回忆录》到这里结束。我写这十一篇"回忆"，并没有"扬名后世"的意思，发表它们也无非回答读者的问题，给研究我的作品或者准备批判它们的人提供一点材料。但我究竟是个活人，我有种种新的活动，要我停止活动整天回忆过去或者让别人来"抢救材料"，很难办到。别的人恐怕也是这样。但搜集资料却也是重要的事。我们过去太轻视这一类的工作，甚至经常毁弃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化成灰烬。我听说日本东京有一所"近代文学馆"，是作家们自己办起来的。我多么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

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1980年12月27日。

后　　记*

香港《文汇报》为了庆祝创刊三十年出版纪念文集，向我约稿，我答应写一组《创作回忆录》。一九七八年七月中旬开始写第一篇，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下旬最后一篇结束。起初打算只写十篇，后来写到第十一篇才觉得意尽搁笔。我写文章从来没有计划，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但我也给这十一篇"回忆"划了一个范围，让一次的回忆围绕着一部作品进行。不过我的笔有时会像一匹野马，跑起来很难把它拉住。我知道有人会引用我这几句话断定我的文章"不及格"。让它去吧！反正我是在向读者提供资料，完成了任务，这本小书就会自行消亡。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我写这些"回忆"，不管怎样东拉西扯，绝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无的放矢。

出版这本小书，我有一个愿望：我的声音不论是微弱或者响亮，它是在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出现喝道。让这样一所资料馆早日建立起来！

1980年12月28日，在上海。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四日香港《文汇报》。

再　记

在本书第七、第八两篇"回忆"中，我讲过萧珊的好友王同志的一些情况，还摘录了她一位女同学的来信，说："她已成了个活着的死人……"据说从一九七五年起，她就"不能听，不能看，不能说话，脸部肌肉不能动，全身瘫痪，最后只剩下食道功能还正常，喂食能咽下，消化……"她就这样地活了五年多。不用说，她的生活对她自己，对她的亲友，都是莫大的苦刑。我不止一次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这苦刑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回答终于来了。我那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她已于二月二十一日离开人间。他到八宝山参加了她的追悼会，还代我在死者的灵前献了花圈。这就是我对这位善良而刚强的女人所能表示的一点敬意了。

今天重读我去年中写成的那几段文字，我仿佛又在做梦。屠格涅夫的小说《活尸首》中的一句话忽然来到我的心头："死神终于来叫她了。"我这时的感情十分复杂。我难过，我悲痛，但是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再说："祝她安好，"也不说："愿她安息，"因为她已经得到安息了。

1981年3月6日，在上海，病中。

致　树　基（代跋）

一

树基：

《炸不断的桥》的目录已在六六年日记中查出，抄给你看看。

目　次

《明亮的星星》等五篇给丢失了。《春天的来信》的改订稿也丢了，不过江南的原信还登在《人民文学》三月号上。这个集子的《后记》是六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写成的，第二天我就把集子编好托济生转给上海文艺出版社。

没有想到不久我就进了"牛棚"，待到十年梦醒，手稿回到身边，一放就是几年，我连翻看它们的兴趣也没有。后来编印《全集》，找出旧稿拿去复印，终于丢失，仿佛命中注定，我毫不惋惜，倒觉得心上一块石头给搬开了。欠债的感觉少一些，心里也轻松些。

其他以后再谈。

芾　　甘　6月28日

二

这一卷还收入一部未发表过的中篇小说《三同志》。关于它我想写一个简短的说明。小说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脱稿的（未发表）。因为我认为它是一部失败之作，缺乏出版或发表的条件。小说写成后，只有萧珊一个人看过我的全部手稿，她也同意我把小说锁在箱子里，不给人看。但是我们不曾交谈过小说失败的原因，有一次她讲过一句话："小说要有点情节。"《三同志》的一个缺点就是缺少"情节"，因为我不熟习我所写的部队生活，我不理解那些土改后参军的青年战士的心灵。

这是事实。但是我最初动笔写《三同志》的时候，不会承认它，当时我已两次入朝，在志愿军部队中生活了一年多，对战士

们有感情，而且交了好些朋友，和他们的谈话记录，还有先后采访来的英雄故事，我也积累了十几册，自己不曾认真考虑，总以为写两三个普通战士不会十分困难。可是一旦拿起了笔，才明白自己懂的实在太少，连外表都描不像，更不用说内心。其实写自己不熟习的生活，写自己不熟习的事情，对作家来说是自找苦吃，除非深入生活，把不熟习的变为熟习，作家就难写出一个活人，更不要想什么成功的作品了。

我写出失败的作品，出了废品，我得承认自己的无能，本来我没有勇气揭露自己的疮疤，但是同你一块儿编辑《全集》，我不再有什么顾虑，写不出就写不出，写不好就写不好，即使写作了六七十年，我也无法将不熟习的题材编成美好的故事。

过去我常说我写作因为我有感情，那么我写《三同志》就没有感情？今天回忆那一段生活，我还忘不了杨林同志，对那样的年青战士，我仍有无限的爱，可是不熟习他们，对他们光有感情，却不理解，仍然不能把他们写活。这些年我的确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拚命写自己不熟习的东西，我口口声声"深入生活"，却始终浮在面上，深入不下去，自己不知道怎样下苦功，也不肯下苦功。写完了《三同志》，我对自己的前途绝望了。但是我并不后悔为写这废品花去的时间，和两次入朝的生活体验。这一年的生活我并不是白白度过的，我不是在替自己辩护，虽然没有写出什么作品，我却多懂得人间一些美好的感情。在我这一生，写作与生活是混在一起的，体验生活不单是为了积累资料，也还是为了改变生活。

两次入朝对我的后半生有大的影响。

三

不嫌啰嗦，我还要讲一下两次入朝的经过。

一九五二年一、二月我在上海接到家宝的信，他说丁玲要他动员我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我征求过萧珊的意见，她同意我去朝鲜，我便给家宝回了信，过了春节我就去北京报到。这个组由丁玲领导并主持学习，她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长。参加学习的人有二十几个，多数是赴朝的。我们出席了一些座谈会，听了一些报告，作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还打了反应强烈的防疫针。

我们换上军服，三月初离开北京。出发前宣布了组员的名单，一共十七人，我担任组长，两位副组长是葛洛和古元。入朝后我们小组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活动一个时期，然后访问平壤，同朝鲜文化界人士会见，再后去中国大使馆休息，小组停止了活动，各人到自己挑选的志愿军部队去。因为我第一次到部队，不熟习战士的生活，兵团政治部还派了一位干部陪同我下去，我们在一起活动了一个时期，他成了我亲密的朋友，今天我还常常想念他，我忘不了那一段生活。

我十月中旬回国。说实话，头两天我对国内生活倒有些不习惯了。我在部队有朋友，有感情，有联系，不参加小组我也可以再去朝鲜。

第二年我又去了。这一次我住了五个月，最后在平壤乘直达车回国，还准备第三次赴朝。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因此

《全集》中的赴朝日记只有两篇，记录了当时的生活体验。

萧　甘 91年7月5日

四

这一卷的后一部分是发表过而且收入集子的。两本小书都谈创作，不过《创作回忆录》写得较晚，因此我不曾为它作过自我批判。我写这小书倒是替几位朋友雪冤，洗掉污泥浊水，让那些清白的名字重见天日。我下笔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我要完成任务，而且我完成了任务，这小书起了作用。

萧　甘 1991年7月28日

致树基（代跋）二

树基：

我在去年写的关于《三同志》的《代跋》里没有提到短篇小说《杨林同志》，这是我一时的疏忽。其实我并没有创作《杨林同志》的计划。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在《文汇报》发表《一封信》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处理《三同志》那一堆手稿，当时上海作协恢复，准备创刊《上海文艺》，罗荪同志向我组稿，建议我从《三同志》中抽出几章发表，我答应了他。后来刊物催稿，我便找出旧作，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越读心越凉，最后不得不下决心，丢开这个废品，根据杨林的事迹另写一个短篇。

于是我找出一本空白的小学生用的练习簿写下了杨林的故事，这是十年浩劫后我第一次写的小说。一九二七——二八年在法国写处女作《灭亡》时用的也是小学生的练习簿，不过是法国小学生的练习簿。

芾　甘　1992年7月18日